聂荣臻军事文选

解放军出版社



聂荣臻

出 版 说 明

聂荣臻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党、国家、军队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为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我国尖端武器的发展和航天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特别是对人民军队的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巩固与发展，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创立和发展，有突出的建树。他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著述，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为适应广大读者学习、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我党我军的发展史，研究聂荣臻同志的军事实践活动的需要，我们编辑了《聂荣臻军事文选》。选入本书的九十七篇著述，是他的文稿、电报和书信的一部分，其中大部分是首次公开发表。

在编辑过程中，对部分文稿有的在文字上作了校正，对所有文稿作者都作了原则审定。

本书的编辑出版，得到军委领导的直接关怀，得到军事科学院、国防科工委、解放军出版社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聂荣臻传记编写组

一九九二年四月

目　录

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切军队在战争中之能取胜，它必具有两个条件：首先，物质和技术方面——战术上，组织上，及一切军需品的供给上都要很充足，并要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精神方面，兵士之能克己牺牲，很勇敢地上前去斗争，他决不是为那点薪饷所愿意如此的，他必定要知道他本身的责任和战争的目的；反之，不知道本身的责任和战争的目的，徒以机械命令的驱使是靠不住的，尤其以每月十余元钱更不能买他的生命的。如党军[1]能如此勇敢直前牺牲一切地去杀贼，一鼓气儿竟将天险惠州攻下，这就是证明党军能知道他本身的责任和此次出征东江的目的！也即是证明他们是在青天白日旗[2]下受了党的训练，受了主义的培养的表现！又如俄国的红军，完全出身于很少军事知识的工农，兼之装备组织等都远不及久有训练而且装备精良的白党和帝国主义的军队，然而终竟肃清了一切反革

---

*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得到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在改组国民党之后，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通称“黄埔军校”。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熊雄、聂荣臻等一批共产党人，被党派到该校担任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本文是聂荣臻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军事政治月刊》社编辑委员会政治编辑主任时所作，原载《黄埔潮》第五期，一九八七年《军史资料》第二期曾转载。

命的白党，降服了帝国主义的围攻，保障十月革命胜利，保护苏维埃政权及社会主义。为什么他们这样的厉害？因为他们很明白的知道为什么要战争。战争是为劳动者的利益。换言之，即为红军本身的利益。这样的目的，为帝国主义军队中所没有，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所保护的利益，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是为压迫他人和寄生虫的。红军的军纪，亦不是机械的、盲从的，完全是由他们的觉悟程度而定——担负解放劳动者的大责任。觉悟愈高，他们的战斗力愈强、坚忍不拔的勇气愈激昂，而战斗的进击愈勇往直前而不顾。所以红军的军营即是红色的学校，反对一切的压迫和虐待。国家的政权和党，不但很注意于兵士之学习军事知识，并且十分地注意于兵士政治学识之发展；授课、集会、演讲、党部学校、补习学校、俱乐部、戏园、图书馆、音乐会及一切的报纸杂志等，均普遍地实行于各军营中，这就是他们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然则军队中政治工作独有红军中才有吗？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何尝没有，不过不是教育的、觉悟的，而是欺骗的、愚民的政策罢了。如一九一四年的大战[3]，一般社会爱国派在军队中口号便是“保护祖国”。法兰西的《小巴黎》报用很好的纸张，很美丽的图画，很优雅的诗歌——保卫祖国，由交通很便利的铁路，每天每个兵士在战场上都有一张在手里。但是结果怎样？自然一时的欺骗手段见效了，法兰西是战胜国了。然而因战争而伤亡的是劳苦群众，因战争而感生活困难的也是劳苦群众；又因战争而发财的便是大资本家史来德、海乐等等。甚至高叫“保护祖国”的当时的财政总长还与德国通奸——私运粮食图发大财！由以上的教训给予劳苦群众的觉悟不少，因此，一九一八年的海军进攻俄国，在黑海里便向后转。一九二三年在鲁尔的军队也不受命令地向巴黎开回来，法兰西帝国主义者还要想欺骗劳苦群众去侵略它国是靠不住了。又如日本驻兵西伯利亚，他们的口号是为天皇而战，每

天早晚还要祷告天皇。可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故而侵略人地，把无辜的兵士放逐流刑似地安置在很寒苦的西伯利亚冰天雪地的生活中，接受了俄国工人的宣传，觉悟了——认清了他们的友敌，知道了受了政府的欺骗，便决然有倒戈之势。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但欲进兵不能，尤恐退兵回来之作乱，故西伯利亚的撤兵问题牵延久日，终将驻该地军队概行解散。意大利墨索里尼的军队中用教士做宣传工作，这种愚民政策，也是蒙昧不了觉悟群众的。其次再说到中国的一切反动军阀的军队，自然说不上有政治工作，他们——军阀也不曾会注意到此。他们是用很公开的愚民政策以压服一般不觉悟的兵士——农村破产的劳苦群众，用军人服从为天职，禁止兵士看阅一切出版物。兵士们也无非为的几块钱饷的生活费，"有奶便是娘"，哪能说得上战争的目的。兵士们所知道的是军官讨小老婆、住洋房子、凑银行，所以陈逆军[4]一见革命旗便逃！就是现在拥数十万的张大帅[5]部下的牛马畜牲似的军队，我们只要肯努力地去做点宣传工作，所有一切"纸老虎"的军阀，是不堪有主义有目的革命的觉悟军人一击的！

军队中政治工作是如何重要哟，尤其是我们革命军应当十分的准备着精神的战具，以对待那强有力的帝国主义者。现在国民政府之下各军队已先后设立政治部了，我们更希望所有的政治部不是为撑门面的，是要真正成为军队中思想上的指导机关、教育机关，使革命军人人都能了解我们的责任是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斗争，为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解放而斗争，目的也即是为我们自己求解放而斗争。

在黄埔的学生同志们，更容易接受政治知识，复有研究主义的工具。那么，就应当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去研究政治问题和主义。因此我们很希望学生同志们，课余都进图书室去，无论我们的时间怎样短少，只要我们自己肯去研究，多少我们总会有所得。还希望自动地起来在本部的刊物上多多发表意见，并且组织俱乐部，

设立各种有益的游戏，使我们在军事训练之下，得着精神上的愉快，使我们成为活活泼泼有训练有主义有革命精神的革命军人。同志们，准备着“精神上的战具”，高举我们的青天白日旗，完成党给我们的使命！

注　释

〔1〕党军，指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一九二四年十月，黄埔军校以军校干部和学生为骨干组成教导团，十一月，孙中山将该团称为党军，十二月又组成党军教导第二团。一九二五年四月，两团组成党军第一旅，八月第一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随后参加第二次东征，为东征军主力。

〔2〕青天白日旗，指中华民国国旗。

〔3〕大战，指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4〕陈逆军，指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军队。

〔5〕张大帅，指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

南昌起义失利后部队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

钧甫兄[1]：

本日得二十五师来人杨心余报告云，二十五师退至武平后复被十八师[2]追击，在该地应战，我军本占优势，但士第[3]下令退却，然行动不一致，损失颇大。经过此役，现尚存实力约有一千五百人左右，枪支在一千以下，机枪两挺。及退至信丰时，兵士疲倦已极，士第等又未得着党的指导和消息，虽然派赵自选[4]去，恐亦未曾赶及。因此士第及三个团长与李陶等均先后离队他去（闻系该军党部决定的）。现由玉阶[5]负总责指挥，七十三团由一萧营长负责，七十四、七十五两团由参谋长代理，改编为四个支队，拟开至崇义去。但七十五团参谋长张启图系南昌事变时加入的，人本不甚可靠，闻与七十三团参谋长勾结，意欲脱离他去。我恐士第走后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玉阶不能指挥。来人云，玉阶已曾表示向大众云："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由此可见，他掌握部队之难了，并且走的方向亦不妥。我的意见现在只好闯进湖南去，与湘农民会合。但有一层危险，就是玉阶既不能全掌握部队，而兵士又多湘人，入

---

* 这是聂荣臻在南昌起义失利后写给中央军事部的报告，一九九〇年九月曾在《党的文献》第五期上发表。当时编者拟的标题为"致中央军委"。

湘后部队更难维持了。如何是好，须待与代英[6]、毛子[7]共商量，决定办法。

注释

〔1〕钧甫兄，是中共中央军事部的代号。

〔2〕十八师，指广东军阀钱大钧的部队。

〔3〕士第，即周士第（一九〇〇——一九七九），广东省乐会（今琼海）县人，当时任南昌起义军第二十五师师长。

〔4〕赵自选（一九〇一——一九二八），湖南省浏阳县人，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

〔5〕玉阶，即朱德（一八八六——一九七六），四川省仪陇县人。一九二七年他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军长。

〔6〕代英，即恽代英（一八九五——一九三一），江苏省武进县人。南昌起义时任前敌委员会委员。聂荣臻写此报告时恽代英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一九三〇年五月在上海被捕，次年四月在南京狱中遭杀害。

〔7〕毛子，即罗曼，德国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的助手，当时代表共产国际指导广州起义。

广州暴动的经验教训*

（一九二八年一月）

这一次十二月十一日的广州暴动[1]与今年三月十二日的上海和八一的南昌暴动，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兵士的武装暴动，直接解除敌人的武装，夺取敌人的政权。但广州的暴动，比上海、南昌更添特色的是：

一、 参加暴动的分子有工人、农民、兵士。所以这次的广州暴动，是工农兵群众的大暴动。

二、 这一次暴动的旗帜都是镰刀斧头交叉的红旗，飘展于全广州市。

三、 这一次的政权，是工农兵代表大会产生的苏维埃政权。所以，这次广州暴动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暴动，虽然它的政权仅仅保有四十八个钟头。

至于这次暴动后，对于敌人营垒中的影响——中国一切军阀的崩溃，一切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勾结，一切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与苏联的关系，我且不说，我要说的是这四十八个钟头中的工作，可以作为我们将来工作中经验教训的部分。因为过去五十几年的巴黎公社，我们还常作很重要的功课不断的去研究它。列宁同志得到巴黎公社的经验，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方

---

* 这是聂荣臻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时，为总结广州暴动的经验教训而写的，一九二八年曾发表在《广东省委通讯》第七期上。

才在我们眼前过去的事实，我们怎能不去寻得经验呢？

我以下所说的是我们在这四十八个小时中的工作缺点或错误。

一、 起事前，在党内和在工人群众中缺少宣传与煽动工作。当起事时，党员尚有不知其事者，因此参加各种工作的甚迟缓。在举事前两点钟左右，有一位负责赤卫队工作的同志报告说：当他去召集赤卫队时，有位手车工人说："我们的车子还没有拉完呢！"这便是证明宣传煽动工作的不够。

二、 党的指挥机关缺乏指挥工作。在暴动的各种工作中间，几乎见不着党，除了个人的乱跳一场而外，没有一个健全的组织机关来指导一切。在十一日晚上，各部分的同志都在问："开了会没有？"这句问话的意思就是说，广州暴动已经过了一天，广州市面虽然尚有一部分敌人未有肃清，大体说来，广州已经在我们手里了，但下一步行动计划还不明确。计算敌人反攻广州当在明天，即十二日，可以说是最危险的一天，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当有一个讨论和决定。虽经催促好几次，在夜里十二点钟后才开会。会中不许讨论多的问题，也没有研究敌我情况，只是决定明晨四时先肃清长堤，再进攻兵工厂、河南[2]。下命令时已经两点多钟了，结果这个决定等于零。

三、政治方面

（一）虽然红旗招展于全广州市，虽然广州的政权已在工农兵大会产生的苏维埃手中了，但是广州的群众并未完全发动起来，十一日的代表大会流会，十二日到会者仅数百人。

（二）所有财政机关——除中央银行被焚外，大商店、阔佬、反革命的军政重要人物都未曾去触动他们一下。尤其是没有逮捕军事要人，使他们得以渡过河南去指挥军队，向我们反攻。若谓兵力不够分配而不去触动他们，其实并不要多的力量，只要派一部分赤卫队就可以牵制他们不能动。因为他们逃遁时都是很狼狈

的，所带的卫队很少，甚至黄琪翔[3]出走时，连卫队的手提机关枪都抛弃在家中。

（三）消灭反革命委员会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实际是不如反革命宣传的“红色恐怖”那样厉害。所杀的大都是反革命走狗无名小卒，有时赤卫队捕的人找不着人去理会，有的当时执行枪决，有的便关在一间屋里共百多人，退却时全数出来了，向革命进行反扑。

四、财政方面

事前就没有太注意财政问题。所有的兵力分配，差不多都是对付军事机关。第一步军事计划实现后，亦不曾分一部军事力量去占据财政机关，没收敌人财产，使敌人得从容布置，用军舰保护中央银行。因为如此，所以长堤之敌亦不能肃清。为肃清长堤之敌而放火，火便从中央银行烧起。结果苏维埃政府的各机关连买小菜的钱都没有。

五、交通方面

不但在广九、广三、粤汉[4]三条铁路上未有大的破坏工作，以阻止敌人前进。占了广州后，市内的电报、电话，敌人还在利用它调兵遣将。

六、军事方面

（一）这次军事方面的指挥亦没有一个健全的指挥机关，叶挺[5]虽为红军总指挥，而事实上能指挥者仅有参加起义的各部分军队，而赤卫队方面就难执行其命令了，以致军事的指挥不统一。

（二）赤卫队之最好者为罢工纠察队份子，这部分赤卫队若能有好的干部指挥，与正式军队一样的有战斗力。至于其余的赤卫队就差多了，来领枪的是非常踊跃，都是争先恐后的，但是有的能放枪，有的不能放枪，甚至有携长枪而带短枪子弹的，有拿短枪而带长枪子弹的，有的携了枪便回家去的，还有派去担任某一种任务而不执行的，种种情形都有。这当然无足奇怪，在平时我

们便没有注意赤卫队的训练，而中国的兵制亦不是征兵制。未经训练的民众，当然不会人人都知道用枪作战。但是我们要知道西欧的征兵制，工农都有受军事教育的机会，所以工人武装起来，便能与军队一样的作战。中国工人便不同。故以后在工人农民群众中要注意组织工作，同时要注意军事技术工作。

（三）军事技术人才的缺乏。这个问题在平时是不觉得的，并且同志们常说技术人才不要紧，不一定要党员同志，只要听我们指挥的什么都可以。不错，白将军也有变为红将军的，但在那种危险的时候，不但一般人都不愿来，就是党员同志欠勇敢的也不敢来，来了也不积极参加作战。所以缴了敌人几十门炮，十几挺机关枪，仅有三、四个朝鲜同志能用，多数利器都不能利用。以后每个党员都应该学习军事技术，并须注意培养一批军事技术人才。

（四）俘虏敌人炮兵、步兵有一团以上。步兵是新招募的，炮兵是北方的老兵，两种兵的政治观念都很薄弱。经派人宣传后，表现都很好。对于土地革命的宣传，将来要分土地给他们，饷银要提高，每月二十元等，他们尤表赞成。所以这部分兵，将教导团的学生调一部分来充作下级干部，便马上可以增加一团的兵力，但并未注意这个力量。

（五）不注意侦察工作。市委的各种组织中也有所谓侦察队的组织，但在这两天当中并没有见到一个敌情报告。故对在市内和四郊的各路敌人，大多情况不明，敌人一直冲到观音山，把警戒部队都打败下来，一部分敌人已经由观音山脚下绕道进到市内第一公园，省公署，以及大北街等处，才知道敌人来反攻了。这是何等的疏忽！

（六）退却情形——本来预先没有退却的计划。当十一日晚开会时，叶挺提出可否十二日退却以保存力量，当时遭国际代表[6]的反对。十二日晚军事紧急的时候，几位同志开会决定退却，但并

没有下退却命令而先走了。各部分军事同志和赤卫队负责同志也不知道。结果教导团方面大部分自己向北江方面退却了，但是赤卫队始终不知道退却，十三日敌人四面包围，欲退已不能退了，工农群众死亡的数目竟逾数千，大部分原因在此。

（七）因为无计划的退却，退却时又无命令，所有缴得敌人的武器，有数百箱子弹、大炮、机关枪等均不曾毁坏而又丢给了敌人。

（八）各部分军队情形都还好，教导团方面千多人仅有百多个党员同志，动作起来都能做到行动一致，而且都勇敢，比之打夏斗寅[7]时候要好得多。更使人注意的是四月十五日被捕之黄埔学生百余人，方由狱中出来，均长发而带白瘦的面容，一齐列队来公安局自请编制，发枪后即去作战，勇敢异常，是日未被枪击死，而劳累致死者六七人，犹不稍懈。此外，警卫团数连，宪兵一连，均有相当成绩。

（九）战术方面。各部分武装都不按巷战战术作战要求，尤其是赤卫队的干部，常常把部队置在小巷内或街头，遇敌一击即退。竟不知道进往各大街两边的大房子内，与敌人巷战。

以上便是我在这次暴动中所感觉到的一切，是否有当？同志们都可发表意见讨论广州的“巴黎公社”。

注　释

〔1〕广州暴动，即广州起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人的领导下，发动广州地区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的武装起义。

〔2〕河南，指广州市珠江以南地区。

〔3〕黄琪翔，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副军长（军长张发奎）兼第十二师师长。

〔4〕广九即广州至九龙，广三即广州至三水，粤汉即广州至汉口三条铁路。

〔5〕叶挺（一八九六——一九四六），广东省惠阳县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总司令。

〔6〕国际代表，指罗曼，见本书第六页注〔7〕。他斥责叶挺的正确意见是所谓“想当土匪”。

〔7〕夏斗寅，当时任武汉国民政府独立第十四师师长，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率部发动叛乱，由宜昌东下进攻武汉。五月十七日叶挺奉命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及独立第一师进行反击。五月十九日武汉三镇群众分别举行声势浩大的讨伐夏斗寅大会。五月二十一日叶挺率部击溃了夏斗寅部，其叛乱阴谋被粉碎。

关于东江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

我于十月二十九日由港[1]动身，次日抵潮安。因交通关系，在潮安住了二日，又在途中行了二天多，才到达“东委”[2]。兹将在“东委”的观察和我来后根据最近的政治情形对于东江工作的布置报告如下：

一、在我未到“东委”以前，“东委”对于目前的政治形势是不甚明了的。对于军阀战争的问题，知道两粤战争[3]已告结束，两粤战争还是有爆发的可能，但不知很快有爆发的可能。因此，他们以为在目前广州方面是可能增兵来东江的，并且已确定蔡廷锴[4]来东江。所以对于从前的布置固不可能，就是目前要转变方法亦不知道怎样的转变。大意是：对朱毛[5]意见可在西北游击，如不可能，还是退回赣南。至东江工作，对从前的布置既感觉困难，而秋收斗争[6]无形中有忽视倾向。总括说来，当朱毛入粤与省委的指示在东江布置时，全东江的确都是很活跃的现象。及到两粤军阀战争结束的消息传来和朱毛退出梅县（详后），或有不可能留东江的形势，东江斗争陡呈低沉之势。虽然“东委”仍指示各地照前

---

* 这是聂荣臻给中共广东省委的报告，他当时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东江巡视员是广东省委派出的全权代表，也称东江特派员。此文于一九八五年曾以《东江巡视员报告》为题在《军史资料》第八期上发表。

行动，但步伐很不一致，甚至有些地方表现不愿采取行动。

二、朱毛在未入粤前是不知道两粤军阀战争已告结束，所以他们入粤的计划完全是照着从前中央的指示[7]。及入粤后，始知两粤战争已结束，但他们仍愿到西北游击。在广州增兵来东江时（他们听说蔡廷锴已调来东江），拟退赣南。当他们由蕉岭入粤，本不直下梅县。及他们到松源后便直攻梅县（他们是为筹款，并不是愿占梅城，因梅城不能守故），梅县攻下，敌人便随着朱毛原路跟进，而红军不察。及敌人已抵梅城三里时始觉。被敌人猛力攻击，遂仓促退出梅城，军事上虽未受任何损失，但已狼狈不堪。退出后便集中梅南（赤色区）整理和休息。他们仍决定三十一号（指十月三十一日）反攻梅县（特别是一般士兵群众非常奋激，必须反攻，一面因感觉梅城物质优，一面感觉东江群众的好，不甘败绩）。近闻梅城已反攻得手，缴枪八百余，士兵多投降，并毙团长二名。但尚未接得党部正式报告。如果属实，红军在东江游击的决心当更坚决。否则他们在东江还是很犹豫的，因政治的形势不明，使他们感觉困难（现已派专人前去，详后）。

三、我抵“东委”当晚，即召集大中“东委”[8]负责同志会议，把目前政治形势作一报告，并且指示东江工作仍需积极布置。除红军进窥惠州和占领潮汕的计划，目前不应有这企图外，现决定朱毛红军坚决地留在东江西北游击，先向兴宁、五华动作（此计划后未实行）。东江红军[9]四十七团调回西南，一部在北山发动潮（安）、普（宁）、揭（阳）的斗争，一部在南山发动潮（阳）、普（宁）、惠（来）的斗争，并坚决地实行发动秋收斗争，使西南广大群众在秋收斗争中发动起来，并造成广大游击战争区域。一面使敌人在西南的基础动摇，一面与朱毛在西北的游击配合。第四十六团留住丰顺，帮助丰顺农民秋收斗争。丰顺反动派很顽固，朱毛在梅县时，敌仍积极向我们进攻。此地的秋收斗争完全是武装抗租，武装保护割禾。向榴隍方面发展，一面牵制韩江敌人，一

面作窥视潮汕状，使敌人后方动摇。第四十八团（此团成绩甚差）仍在东面向高陂方面发展，逼近韩江。此军事上的布置可以牵制敌人许多兵力，不敢集全力去对付朱毛。一面使敌人的战线延长，红军可得各个击破。东江目前的唯一中心工作，便是坚决地实行秋收斗争。只有在这秋收斗争中，才可以把东江群众发动起来，东江才是真正的斗争区域，东江的斗争才能与红军的势力汇合起来。否则东江的工作将不实际而走到失败的途上，这是目前极大的关键。此计划决定后，即当专人发我红军前委[10]要他们坚决地照此进行。一面专人赴西南，坚决地发动西南的斗争。

照以上计划看来，如果政治形势照我们的分析，两粤战争即将到来，广州当无兵增调来东江，东江的红军和群众是可以应付敌人的。并且计划引诱敌人到兴宁、五华赤色区域去解决他。因为在整个潮（安）梅（县）动起来，可以牵制敌人许多兵力，可能集中兵力应付朱毛者不过三团左右。以红军的全力决战于赤色乡村区域，我们的胜利是有把握的。

四、“东委”本身非常不健全，我来时常委只有二人，即道文[11]和尊导[12]，而工作极繁杂。道文每天应付一切技术问题，忙个不了，早上六点开工，晚上二、三点还不能睡觉。组织部无形消失。宣传部只有尊导。至于秘书处，一塌糊涂。昨日常委会，我提出关于“东委”本身问题的健全，“东委”常委经常要有三人在。我主张道文、尊导、汉章[13]三人任“东委”。汉章最近始由西南返来，精神甚好，且坚决，有干才。要他补杜式哲[14]。杜决定去饶平后即调省委。尊导现去西南，于最短时间返回。国英[15]调开东江去省委另分配工作。我出此主张后，他们颇犹豫。但我极坚决主张，如此，他们亦同意。杜到省委，由省委去解决工作。国英来省委时，我意仍须多用教育工作，派到海丰去工作，或者派往中央训练班[16]。总之，这些人并非不可工作者，是在教育的问题。

自黄平[17]由省委返来报告后，因黄平将开会的经过报告词句

上多少有增减，道文表示很痛苦，好似省委不相信他，东江的工作省委总说这样不对，那样不对，并说张木同志[18]来此，对于秋收斗争等问题都得圆满结果，而张木同志回去说“东委”一钱都不值……等等误会。经我解释后，问题当然可释。省委能经常加以政治上的指导是无问题的。现在任“东委”的同志还是可以做工作的。如逸园[19]能来对东江的帮助当更大矣！我主张逸园将来还是以省委巡视员的名义来最好。其他事项留在下次报告吧。最近政治形势望速告知，你们知道我是在深山中——不但不知道天下国家大事，连时日我都记不清了。

注　　释

〔1〕港，指香港。

〔2〕东委，即东江特委，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东江特别委员会，大革命时期成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特委统一领导广东东江流域至江西、福建边境的海陆丰、兴宁、五华、梅县、丰顺、潮安、普宁、惠来、揭阳等广大地区的工农运动和武装斗争。

〔3〕两粤军阀战争，指一九二九年夏天起，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与国民党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为争夺广东省军政大权而发生的战争。

〔4〕蔡廷锴（一八九二——一九六八），当时任国民党粤军第六十师师长。

〔5〕朱毛，一九二九年十月，朱德（毛泽东因病未到东江）率领红军第四军四千多人进入东江地区，攻克梅县。这里的“朱毛”即指红四军部队。

〔6〕秋收斗争，是当时广东省委指示东江特委执行的中心任务之一。目的是利用秋收时机，领导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争夺劳动果实，以实际的物质利益来发动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

〔7〕中央的指示，指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示信提出：“至两广军阀混战爆发，东江空虚时，红军可进至梅县、丰顺、五华、兴宁一带游击……相机围缴敌军枪械，集中东江各县赤卫队建立红军。”

〔8〕大中东委，即东江特委常委委员和特委委员。

〔9〕东江红军，一九二九年夏，建立了东江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古大

存。下辖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团和教导队，约三千人。

〔10〕前委，指红四军前敌委员会。

〔11〕道文，即林道文，广东海丰人，当时任东江特委书记，一九三〇年调广东省委，一九三一年被捕牺牲。

〔12〕尊导，即贺尊导，广东大浦人，当时任东江特委常委，宣传委员。

〔13〕汉章，即颜汉章，广东海丰人，当时任东江特委组织委员，一九三〇年任东江特委书记，一九三一年被错定为AB团分子遭杀害。

〔14〕杜式哲，广东海丰人，当时任东江特委副书记，后调广州工作时被捕牺牲。

〔15〕国英，即林国英，当时任东江特委农民运动委员。

〔16〕中央训练班，广州起义失败后在香港成立，训练党内干部。聂荣臻曾到训练班讲授军事课。

〔17〕黄平（一九〇一——一九八一），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曾参加广州起义，一九三二年被捕后自首变节，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外语系教授。据查，黄平此时在莫斯科。这里的“黄平”可能系“黄平民”之误。黄平民，当时任广东省委候补常委。“开会的经过报告”指广东省委对东江特委的指示。

〔18〕张木，当时任广东省委秘书，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广东省政协秘书处工作，一九六六年病逝。

〔19〕逸园，即罗逸园（或罗绮园），当时在广东省委领导农民运动，一九三一年被捕牺牲。

完全同意毛主席的行动方针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1]意见。目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纳）毛主席意见。三军团应暂在信丰西南一带工作，观察各方情况之变化。五军团应即随一军团到东北一带工作，打击福建敌人，速筹大批款子，赤化建（宁）、泰（宁）、宁（化）及清流等县。

一军团大概四月二日可到沙县，我们本日已电告十二军即出发到宁化以北箝制敌人。

注　释

〔1〕毛主席，即毛泽东，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

* 这是红一军团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的电报。一九三二年二月，红军攻打赣州失利后，毛泽东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要中央红军夺取赣江两岸城市的错误决定，主张红军主力向闽南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展。林彪、聂荣臻在听取毛泽东的说明后，发出了这份电报，建议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接受。不久，红军进行了漳州战役。

第四次反“围剿”中黄陂、大龙坪附近战斗详报*（节录）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三月一日）

一、战斗前彼我形势之概要

敌第一纵队在乐安之五十二师、五十九师两部均于二十六日向东陂、宜黄前进，在宜黄之十一师似有向神岗、党口前进模样。其企图为经新丰市向广昌进攻，以配合其向黎川、建宁进攻之二、三两纵队，消灭我军于黎（川）、建（宁）、广（昌）诸县之间。

我方面军[1]乘敌诸纵队分进而未合击之前采取各个击破之战略，首先消灭乐安东南前进之敌人，以粉碎敌人大举进攻，消灭蒋介石主力，开展第四次反“围剿”革命战争新局面为目的，故本军团[2]即于二十五日在金竹、小港、茶元、严坊诸地区内集中，三军团在五都附近，五军团及二十二军在候坊、横石附近，二十一军在望仙桥附近集中，我独立第五师在上下南源地域活动，独立第四师在永兴桥附近出没，乐安独立团在登仙桥附近活动。

二、影响及于战斗之群众、地形、天候气象

---

* 这是红一军团的一份战斗报告，详细地记录了红军史上仅有的大兵团伏击战役的胜利过程。经过这次战役和三月二十、二十一日红一方面军草台冈战斗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这份详报是在聂荣臻主持下，根据当时的史料，于一九五二年重新整理的。林彪当时也同意，并在详报上署了名。

作战地区内均为离赤区不远之边境，受苏区土地革命利益之影响甚大，故群众对红军之拥护和爱戴甚热烈。同时金竹、小港、跃龙坪均为很久之赤区，其游击队常在登仙桥、蛟湖诸地区活动，我军之行动企图均能隐蔽，群众亦能帮助我军作战一切事宜（如带路抬担架运胜利品给养等）惟近来春雨绵绵，大雾濛濛，兼属崇山峻岭，羊肠小道，故敌我运动射击及侦察事宜诸多不便，然亦有隐蔽行动袭击敌人之利。

三、彼我兵力及交战部队的敌我高级指挥员的姓名

与我左翼队作战之敌为五十二师全部约六团之众，均归该师长李明指挥。

我左翼队为一、三军团、二十一军约十师兵力均归林（彪）、聂（荣臻）指挥。

四、攻击部署和敌我阵地之占领与我攻击部署之理由及所下的战斗命令（略）

五、各时期的战斗经过及决战时的状况

（一）本军团之右纵队于七时半出发，十时许到苦竹坳附近，据群众云，蛟湖在二十六日只三四百靖匪驻扎，今（二十七）日晨即向黄陂方向前进；据侦察汇报云，大龙坪今（二十七）晨过了四、五百敌军，但不知为靖匪还是白军。现地既无白军和靖匪，亦无群众，故当即将主力集结在苦竹坳、杨明印附近待机作战，并继续侦察敌情，待敌人主力通过，我军不应暴露目标，否则被敌发觉即有过早与敌接触，不能与各兵团协同动作有遭受敌人各个击破或促使其退却之不利，因此我第七师在杨明印附近集结，并对蛟湖、大龙坪方向敌情进行警戒和侦察，第九师在苦竹坳集结。……至十三时许，第七师捉敌采买两名，知敌之先头第一团已到，旋敌之游击队亦由蛟湖向我方游击，与我第七师之警戒部队接触，并被俘二十余名，得如左之情况：

1. 敌五十二师之一、二两团今日在蛟湖宿营，第六团同师部

在大小龙坪宿营，四、五两团闻已到安槎宿营，其余部队尚在运动中。

2. 我左纵队时已与敌接触，枪声愈响愈近，其第十师三十团亦抵此。

决心以一部箝制并佯攻蛟湖之敌，以主力猛攻大龙坪敌人，并协同左纵队歼灭该敌，然后会合左纵队以全力进攻蛟湖之敌。

右纵队之处置：令第七师向蛟湖之敌佯攻，并以一团兵力进至大龙坪与蛟湖之间箝制蛟湖敌向大龙坪增援。令第九师及三十团由杨明印直向大龙坪之敌猛烈攻击，消灭该地之敌，并占领该地以开展全力进攻蛟湖敌人之局面。

战斗经过：部署完毕后，第九师即已向大龙坪前进，至十五时许该师遂与敌接触，时敌已占领大龙坪之西北端高地。我第九师当即以机枪集中火力向敌猛烈突击，敌亦以机枪、手榴弹猛烈还击，顽强力抗，战约一小时经过壮烈地白刃战后将敌击溃并俘获五六百人，缴枪三百余支，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负伤被擒，其参谋长阵亡。斯时我第七师亦与敌在激战中，时已十六时许，在通往小龙坪、蛟湖附近山上均有残敌。为了与左纵队打通联系，帮助左纵队解决当面之敌，即以第九师主力及三十团沿通小龙坪、登仙桥大道攻击前进。以第九师之一团（二十五团）位置于大龙坪附近为预备队并对蛟湖警戒。至十八时许左纵队即已到大龙坪附近，我第九师亦即在小龙坪附近停止宿营仍执行原任务。

（二）本军团左纵队于八时出发，十一时许前卫已到达路南坳下之线，据路南群众报称，有白军约一营昨（二十六）日下午与我红军游击队稍有接触，我游击队即撤退入苏区，于是该敌即乘机侵入坳下路南等处宿营，今日拂晓已向大龙坪方向逃去。又据我前方便衣侦探汇报：敌约一团十分钟前还在登仙桥集合训话；另有一部已向大小龙坪方向前进。我们当即令部队隐蔽集结在路南到坳下之线待机，亲自到最前方侦察敌情，并召集第十师师长

(即前卫司令员)同到坳下附近山上观察敌情，当时见敌军正在由登仙桥附近渡河，向通大小龙坪之大路从容不迫连续不断地前进中，对我方(即敌之右侧)并无丝毫顾虑和警戒。

左纵队之处置决心：

待敌后卫完全通过，方开始攻击，我可以包围该敌而易获完全消灭之效果。如我右纵队或二十一军已先打响，我左纵队若不进攻则有被敌充容应战各个击破或逃脱之害。如时已到十三时半犹不开始攻击，当日战斗一定不能解决，至入夜则更为难矣，且不能与右翼队及三军团协同动作。

当即以第十师之两团布置在路南之东北山上，待时机一到即向大路上敌人猛攻下去，另以一个团埋伏在坳下，待时机一到即由坳下至登仙桥之大路进到登仙桥附近从敌之右侧背压下去。以第十一师为预备队在坳下附近集结待命。以军团司令部吹奏冲锋号为各部开始猛攻之信号。

战斗经过：十三时我右纵队方向枪声已传来，当即吹冲锋号向该敌猛攻，同时令第十师在坳下埋伏之一团由坳下至登仙桥之大路冲出，猛攻登仙桥附近之敌，战未半小时即令第十一师之一团增加到登仙桥之东北端附近山上，协同第十师之一团解决该方面之敌。十四时二十分见右翼之敌已向蛟湖方向溃退，第十师(缺二十九团)已向该敌追击前进。

十五时许至小龙坪附近时，已闻不到右翼方向之枪声，我们当即率军团司令部及教导团沿小龙坪大路向大龙坪方向前进，到达大龙坪时已黄昏时分。此时据第十师师长面报，敌已在大龙坪以东至蛟湖之山上占领阵地，企图顽抗待援。当即令其将部队集结，另派少数部队与敌保持接触和警戒。不久见第九师师长率领所部来到大龙坪，因此我们亦在大龙坪宿营。不久右纵队之徐参谋长、罗政委[3]亦来此，左右两纵队即行会合。

(三)左右两纵队会合后之作战经过：至十九时许情况如下，

敌主力尚在蛟湖及西北端高地不断向我射击。各友军情况仍不明。当时我们命主力集结于大小龙坪宿营，以一部在阵地彻夜袭扰敌人并严防敌人乘夜突围。第七师以一团在原阵地杨明印附近集结宿营。第九师之二十五团在大龙坪北端阵地宿营，其余主力在小龙坪宿营，二十八日晨即由该地进到大龙坪待命攻击。第十一师以一团兵力位置于大龙坪通蛟湖之间的大道附近对蛟湖之敌警戒，其余主力及第十师与教导团炮工营均在大龙坪附近宿营。各彻夜之警戒部队经常派出一班或二班轮流扰乱敌人，增加敌之恐慌，防止敌对我之夜袭或突围。

战斗经过：是夜敌人曾向我夜袭数次，我军均沉着应战，敌不得逞。后我军向之扰乱，敌则拚命射击和打手榴弹，其恐慌之情形于此可知。又我第七师在蛟湖取得缴枪四百余支的胜利，但时因敌人主力尚在该地四面高山上力谋反攻，故旋即放弃。由是日开始战斗到二十八日晨，因我无线电队失掉联络，故对各方面敌情及友军情况均不明，曾派多员四处去找，亦未获得，甚急。至二十八日四时许，得知如下情况：

1. 敌人主力似尚在蛟湖、瑶华寨及摩罗嶂之线占领阵地，与我对峙，判断有于二十八日晨向我方突围逃窜之可能。

2. 我三、五军团尚未联络到，其作战情形既不知，而总司令部的新任务亦未得着。

我们遂决心：于拂晓后由摩罗嶂高地解决在蛟湖、瑶华寨附近之敌人，并向西源、霍源前进，协同友军消灭敌五十九师。

战斗经过：将上述处置用口头命令各部首长后，时已二十八日五时许，早饭后我们即至阵地侦察敌情、地形，然因大雾之故，亦不明其实在地形、敌情，惟知其大体方向及位置而已，当即令第九、十一两师由摩罗嶂之东端山腰向西源、霍源方向前进。如蛟湖方向枪声甚烈时，即以主力由该地向蛟湖、瑶华寨进攻敌之侧背；如西源、霍源方向枪声甚烈时，则向该地前进协同友军消

灭该地之敌；如敌经摩罗嶂向固岗退窜时，即行截击。之后即转至第十一师三十二团阵地侦察蛟湖方向之敌情。时敌正在北端高地集结力量向我阵地呐喊猛冲，当得知我三军团必由安槎向蛟湖进攻，敌企图由此方向突围，故即令我阵地之守军迅速布置堵截。同时令第九师之二十五团归第十一师师长、政委指挥，协同该师主力由三十二团阵地之北端迅速前进，出击该敌之右侧背，并将教导团之一部调至三十二团阵地以巩固之。时敌愈渐接近，枪声亦浓密，情况更为严重。斯时我第七师不知何故未赶到大龙坪，而第九、十两师尚在途中，第十一师及二十五团亦尚在运动中，敌人冲锋呐喊之声已更接近，其距离不过二三百米远，我阵地之守军虽未动摇，然预备队（第七师）未到，如万一敌人突破确难收拾，除一面飞令第九、十、十一师迅速前进向大龙坪当面之敌侧背攻击，和赶调第七师前进增援外，并将总部一切战斗人员均集结在阵地之大道上，如敌由大道冲来时即白刃而消灭之。时已八时许，激战约一小时，我第十一师及第三军团先后到达蛟湖，敌遂无能继续再冲，一部已被缴械，三十二团及教导团亦向敌出击，第七师亦于此时赶到，遂大举向蛟湖前进，该敌遂全部被我消灭，时已十时左右。斯时我二十一军尚在登仙桥附近与五十二师之第三团正面对抗中。我们当即派第七师进至小龙坪附近宿营，并相机协同二十一军消灭该敌，第十一师即在蛟湖附近宿营打扫战场，并令第九、十两师相机向西源、霍源前进协同友军解决该方之敌。

十四时即奉得总司令部十三时发来如左之电令：

蛟湖之敌三团应火速解决，然后直赴霍源向五十九师右后方突击，迅速配合五军团二十二军、十二军截击之，现该敌犹在云峰山、霍源地区，切勿延迟。

同时又接得三、五军团十二时及十二时半如左之电报：敌五十九师大部向乐安溃退，少数在大路两面高山上抵抗，我军正在追击前进中。我第七军已在蛟湖取得如下战果，第一师缴枪在一

团以上，第二、三师缴枪多少尚未得报，当面之敌已大部消灭，第一、二、三师已向乐安方向追击前进。

此时第九、十两师亦已到蛟湖、大龙坪附近，遂以主力即向固冈追击前进。

追击经过：自十三时出发到登仙桥时，第七师之一团协同二十一军已将该敌解决，俘虏共约一千余名，该团大部已被消灭，后复又得教导团郑团长报告云：“据捉获五十九师师部之传令员报称，敌五十九师师长率领残兵数百现败退蛟湖之北十余里地，企图与五十二师靠拢，并请五十二师增援等语”。当即由第十一师派兵一团由郑团长率领前进搜剿，后至十五时许我先头之第七师已进到固冈，当即俘虏数百，缴获枪三百余支，其余各师亦有缴获。

六、战斗成绩

此次战斗敌伤亡、被俘颇多，计生擒敌军两个师长，击毙旅、团长、师参谋长各一名，此外，毙敌之下级干部亦甚多，这给敌人精神上之打击甚大。这一胜仗是空前未有的，是历史上最光荣最伟大之一战，这毫无疑义的是挫败了敌人大举进攻的整个计划。同时更加提高了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热忱，激发了中央苏区工农群众和红色战士的战斗热忱，增强了我们中央苏区对冲破敌人四次“围剿”的自信心。这一胜利完全达到了战略上的目的，消灭了蒋介石主力两师，减少了敌人进攻的力量，打断了敌人由北面进攻的一只右手，而我们在军事实力上得到了大量的补充。这次的胜利既大而自己的伤亡又小，这是我们最伟大的光荣的胜利。

七、战斗结束后敌我形势（略）

八、战斗经验和教训

（一）此次战役特别是战术上确有显然的成绩与进步，但仍不免有些缺点，不过这些缺点较过去有相当减少。

（二）全军指战员在战役中的表现都非常坚决勇敢，具有与敌

拚命的决心。

（三）在过去历次战役中对于部队的掌握很不够，所以失掉联络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次战斗中有进步。

（四）在过去历次战役中我们的伤亡都是很大的，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我们战士的英勇、坚决，不惜牺牲，但另一方面的确暴露出在军事教育上的弱点，特别是进攻队形的运用不好，火力与运动的联系不恰当，在敌猛烈火力下久停，利用地形、地物的不注意更为严重。这次战斗在地区上是高山丛林，在天候上是浓密大雾，故敌人了望射击确感困难，但与我伤亡率计，虽较过去略有减少，然在天候、地形有利于进攻之战斗，的确伤亡还是很大的数目。

（五）这次战斗中射击技能之进步与成绩确有不可抹杀之事实，但我们并不应满足，相反的还要督促各部更应加紧对射击技术的训练。

（六）此次作战完全是在大雾的山地里进行的，故通讯联络在战斗进行中占很重要的地位，然事实上适得其反，故无线电队有一昼夜同各方面失去了联络，致使战斗中有少数部队互相发生误会，这都是通信工作不健全所造成的严重现象。

注 释

〔1〕方面军，指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兼）、政治委员周恩来（兼）。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编为左翼队、右翼队：左翼队队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辖第一军团、第三军团、第二十一军、预备队、第十二军；右翼队队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朱瑞，辖第五军团、第二十二军。

〔2〕本军团，指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当时第一军团分为左、右两纵队，左纵队由林彪兼队长，聂荣臻兼政治委员，辖第十师、十一师、教导团、炮工营；右纵队队长徐彦刚、政治委员罗瑞卿，辖第七师、第九师、炮兵第一连。

〔3〕徐参谋长，即徐彦刚；罗政委，即罗瑞卿。

用运动战消灭敌人*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日）

现在，我军的防御阵地，自茶庵隘至杭山圩之线，横数十里[1]。自此至建宁，直亦数十里[2]。各守备部队均是奉令顽强防御，可是因防线太宽，守兵薄弱，弹药缺乏，工事不坚固，故结果处处薄弱，均易被敌攻破。又因我工事纵横距离间隔为三里或五里或七里或十余里，敌占我失之工事立足和前进，我如反突击，将其击溃，彼则利用我失之工事掩护撤退，使我没有在较长距离进击中消灭他们的机会。在这种宽大正面的对阵中，我们不得不时刻紧张地防敌进攻。但敌进攻时，待我们明察其主突击方向后再调附近部队去打击他，等我突击队赶到时，我们所守之阵地则往往已被敌占领了。这种宽大正面的防御，消耗我们子弹太多，和占用守兵人数太多。为今后取得用运动战[3]的机会消灭敌人，建议：

---

* 这是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给朱德的电报。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共临时中央开始时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命令红军到处硬打硬拚；两个月后又推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命令红军实行阵地战、堡垒战，以“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进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红一军团领导从实际出发，提出了“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中革军委以朱德名义复电称：“你们十一日（实为十日）的来电原则上是对的，惟提议防区之间要相距一日行程，我们是不同意的，因为照例不是离开自己堡垒几十里，而是要补筑工事。”

一、只在城市和要道上我能居数师军队的大居民地，预先构筑坚固的新式堡垒，以一营左右兵力死守之，并予以充分的弹药供应，加强其防御的军事、政治教育，须确能守五日以上时间，以待主力赶到突击敌人。

二、在运动战预期战场上的最重要阵地，须先敌一日或半日或数小时构筑临时的工事，以占先机之利。

三、我第一防线与第二防线应相距一天至少三十五里以上路程，以便万一我第一防线失守后，敌向我第二防线进攻时我以第二防线阻敌，而以主力在第一、二防线之间，以运动战侧击或夹击和尾击敌人。

四、我主力所在地域如附近有敌，则应诱敌和放敌大踏步前进，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如我主力不在某地而该地有敌前进时，则应以一部兵力进行运动防御战，滞敌前进。如无把握固守工事，则不应到处做工事，以免做好后反被敌人利用。

五、如敌出堡垒或要塞，一下子前进达数十里之地，在敌前进中或到达之初，其时我主力如赶不到打击它，则应以有力之一部阻敌构筑堡垒和联络堡；我主力军到达后，如见敌工事尚不坚固，则以主力攻击之，如敌堡垒已极坚固，但联络堡尚未做好，则应佯攻与围困其堡垒，而打击敌来做联络堡之部队或增援队。

注　释

〔1〕茶庵隘至杭山圩之线，指黎川南约二十四公里的漳村附近地区。这里说的“横”指东西向。

〔2〕自此至建宁，指漳村地区到建宁，约二十八公里。这里说的“直”指南北向。

〔3〕运动战，是指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进行战役和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战的作战形式。这种作战，也包括起辅助作战的运动防御和阵地攻防。

把第一团顽强抗战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下去*

（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

我们的第一团以一营兵力，扼止了敌人一师之众[1]。虽然敌人的飞机和炮弹轰炸之声震动了山谷，但丝毫不能震撼我红色战士的心胆，敌人以数倍的兵力，分几路向我冲锋，亦被我英勇沉着的战士，以顽强的反冲锋打坍下去！并且协同突击部队将敌整师兵力全线击溃，这应当写在我们的战史上，成为我们第一团三岬嶂[2]上光荣战斗的一页！

我们知道在每次作战中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要给敌人以大的杀伤，俘虏敌人的人马，缴获敌人的枪炮，不放走敌人的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但是，往往与敌人决战的部队不一定有所缴获，特别是担负正面箝制防御性质的部队。或者是与敌人争夺一个高山，一座市镇，不一定有所缴获，但在战争中却有着决定的意义。这次第一团坚守三岬嶂，顽强地扼止敌人的前进，正是完成了这光荣的任务！

我们知道，在突击队中的政治工作，是容易达到我们的目的的，因为我们的鼓动宣传与我们的行动是一致的。可是在箝制部队中，和防御的守备部队中，在精神上容易处于被动。虽然我们

---

* 这是聂荣臻为《红星报》撰写的一篇社论，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发表在《红星报》第三十一期上。

的红色战士都有最高的阶级觉悟，愿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是如果忽略了这些部队的环境，没有更深入的政治教育，和更高的政治鼓动，仍然是不能完成他的任务的。

我们更了解了这次第一团的光荣战斗，是由于一团的各级指挥员的沉着指挥，是由于老战士正确和耐心的引导了新战士，共同英勇地战斗，是由于我们的党团员的模范作用，更是由于该团的政治机关充分的政治动员，和具体指导了同志们的工作。

我们回忆洪门的战斗。我们的第一团很迅速地过河，不到一个钟头，消灭了敌九十四师的后卫部队。特别是这次在三岬嶂上，以一营兵力，同敌九十四师全部顽强抗战数小时，配合突击队，将该敌全部击溃下去。敌人的九十四师，已经是我们红一团面前的败兵了，顽强抗战的红一团，应当是我们的模范！

顽强抗战的红一团万岁！

注　释

〔1〕扼止了敌人一师之众，指第五次反“围剿”中，一九三四年二月，一军团奉命由永丰地区东调保卫建宁。二月中旬，一军团第一团由团长杨得志、政委符竹庭率领，于行进中在三岬嶂与敌第九十四师遭遇。杨得志率第二营（营长陈正湘）、第三营（营长尹国赤）先敌占领三岬嶂，以英勇顽强的精神，顶住了敌第九十四师在飞机、大炮配合下的轮番猛攻，坚守住了阵地，直到在友邻部队配合下，将该敌击退。

〔2〕三岬嶂，在黎川西南的丘陵地区，高约五百米，控制周围几平方公里开阔地，是敌由黎川进攻建宁的要冲之一。

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关于政治工作方面我有两点意见：

1. 红军两大主力会合，部队是很兴奋的，但在口号方面政治工作部门应予改正。四方面军原来的口号是打到成都去[1]，总政治部原来的口号是赤化全四川[2]。这些口号在部队中有很大影响。现在进军的方向是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与原口号有变化，对此应向部队作广泛解释。

2. 过去说要赤化川西北[3]，现在说这个地方有许多的不利条件，也要向部队作解释。应该说明，原来的意思要在这个地方与四方面军会合，现在会合了，须要前进。这就更有号召力。

---

* 这是聂荣臻在列席“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共中央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北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批判了张国焘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等偏远地区退却的逃跑主义路线，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注　释

〔1〕打到成都去，指一九三五年四月红四方面军嘉陵江战役后，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率部向嘉陵江、岷江之间地区开进。成都处于两江之间，故有“打到成都去”的口号。

〔2〕赤化全四川，指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上，刘伯承、聂荣臻建议红军打过长江，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比贵州条件要好得多，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故有“赤化全四川”的口号。

〔3〕赤化川西北，指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训令：在蒋介石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南岸的情况下，我军的战略性任务是渡过大渡河，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故有“赤化川西北”之说。

在俄界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

我完全同意中央对此次事件的处置，及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如果不这样处置，我们就要做张国焘的俘虏。

对四方面军的分析，我同意各同志的意见。张国焘把四方面军看成是他个人的军队，而不是红军。在两河口会议回去后，他按兵不动[1]。在毛尔盖时，他召集督军会议[2]，给了我们许多的刺激，这是令人不能忍受的。现在如果企图争取张国焘、陈昌浩[3]，是很少可能的 。张国焘的确是给胡宗南吓怕了的，企图跑到安全的地方去偷安，希望他北上是很少可能的。对四方面军的部队，我们还希望争取，所以对张、陈等的组织结论[4]，过早公布是不好的。

第二，由于张国焘对一方面军的态度，的确促成一方面军内部更加团结，并不是如某个人说的，是毛、张争领导权的问题。

对编制问题[5]我同意。行动要迅速，新的任务要速决，并不是到甘南去看一看[6]。

---

* 俄界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在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谴责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并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注　　释

〔1〕“他按兵不动”，是指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后违背自己曾同意的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仍提出红军全部南下川康边的主张，并延迟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

〔2〕“督军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七月中旬，在张国焘授意下，陈昌浩等连续向中央提出，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授予“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央为顾全大局，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接着，八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对中央领导层作了较大的人事变动。所以说“他召集督军会议”。

〔3〕陈昌浩，当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红一、红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

〔4〕组织结论，指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5〕编制问题，指俄界会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成红军陕甘支队。

〔6〕“不是到甘（肃）南（部）去看一看”，意思是红军要坚决前进，创造川、陕、甘苏区。

在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开幕典礼时的讲演*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

今天，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了。这个边区临时政府的成立，是客观条件形成的。自从敌人占领太原以后，我们这个地区是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同各个省政府断绝了联系，如晋东北方面已经和山西省政府脱离了联系，冀西一带也和河北省政府隔绝了，察哈尔省蔚县也是如此。当时的环境是很觉困难的，那时的情形和这个时候是不同的。兄弟那时奉十八集团军朱、彭总、副司令命令，指挥在此区之八路军[1]开展游击战争。当在五台、忻口等地撤离时，整个形势看起来很困难。那时只有宋主任[2]是在五台，还有盂县胡县长[3]，前阜平县长已逃跑了。在这个时候，深觉得必须成立抗战的根据地，好来发动民众，因为光靠几条枪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坚强的政权组织。所以，有好多地方长官全觉得有成立统一政府建立统一政权的必要。这个地区在今天以前是一

---

* 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为适应斗争的现实需要，聂荣臻在军区成立后，即着手筹备成立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隆重开幕。到会代表一百四十九人，代表边区三十九个县一千二百万人民。会议开了六天，成立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

个无政府状态，没有统一的政府，谁也不管谁，有些地方却又人人可以当政，局面异常混乱。这都是因为没有统一的政权，所以我们在今天要开这个代表大会，预备建立华北根据地，继续进行华北的抗战，坚持到底，这是有异常重要意义的。但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官僚政府是不合我们需要的；同时谁说今日要建立苏维埃工农政权，我们也会说他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成立的是各党、各派、各阶层联合组织起来的政府，是广大人民的政府，坚决抗日的政府，它有着重要伟大的任务。因此，这个政府的组织法，是本着国民政府组织法来组织的，这个政府的性质是如此。

第二，政府的作用和任务。我们处于现在的地位，应该认识这个地区发动游击战的作用。当忻口我军[4]撤退时，正太路失守了，太原接着也沦陷了，那时华北的确处在很困难的形势，敌人步步猛攻，我军节节溃退。日寇企图把我们赶过黄河，在当时是很有可能的。正因为我们在晋察冀的游击活动，把广大地域的游击战发动起来，敌人感觉愈深入愈感受后方的威胁。敌占领太原后，改作固守态势。因此才使我们这一地区的形势较为缓和下来，使我们得在晋南、冀西站稳自己的阵地，进行补充整理，继续和敌人作战。晋察冀的游击战，是在很短的期间内开展起来的，还没有作更大的活动，可是已经收得不少的效果，现在敌人如果想向我们更深入的进攻，就要费更大的考虑。我们能和各地方的武装部队取得联系，并且能把四条铁路中间的地区及平汉路以东的县分打成一片，这对我们全国的抗战有着很大的作用。

诸位要知道现时的形势，简单说来，敌人原有的计划本想快些打下华北，把华北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但是，今天的华北还有广大的区域不曾屈服在敌人的铁蹄之下。所以我们必须团结广大的群众，继续奋斗，华北的战事就能长久支持下去。现在敌人猛烈地进犯华南，是想使我们政府被迫作“城下之盟”，叫我们承认“华北国”、“满洲国”，但是，我们却坚持抗战的立场，丝毫不

和日本妥协。蒋委员长曾经说过，即剩一寸土，亦必抗战到底。这给日本以严重打击，打碎了它那好象一夜间即可占领东北，继而占领华北的迷梦，所以东京又来了一个长期作战的计划。这就证明中日战争没有决定胜负，日本的速决战已经失败，现在中日战争已经展开到全国范围，性质是全民族的抗战，战线当更要拉长。但日本希望的是“速决战”，我们却是“持久战”，只要我们能坚持到底，长期抗战，终可以把握胜利。我们应当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基础上最广泛地组织群众，坚定我们的团结，正如广播上各要人所说：“中国从没有象这样的团结！”今天国内的形势已经表现了新的动向，虽在军事上受了挫折，但是广大的群众运动已经在蓬蓬勃勃的生长起来，终会让我们争得最后的胜利的！诸位在过去从来没有这样的吧？已往的缺点是孤军抗战，现在是不同了，以此间民众这样热烈激昂，这是抗战以前所未有的形势。

再说到国际的形势。我们这里虽很闭塞，但听广播上的消息，知道日本疯狂的向中国进攻，深入到华南、华中，已经引起列强对日关系的尖锐化。因敌人在上海、在华南、在长江这样战下去，实在使英、美、法等国难以接受。现在英、美国家的人民都很同情我们的抗战，这同情将使各国有帮助我们的可能。至于苏联，那更不成问题，苏联和我们站在反日战线上，来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总之，我们国内外的形势都是很有利的。日本处于孤立状态下，定然遭受失败。无可讳言，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会毫无疑义的取得胜利！

我们应当本着过去几个月的经验，广泛组织民众，领导本区域内的民众进行抗战。这个会便是负着这样的伟大使命，它对于中国的全面抗战，是有极重大的意义的。现在敌人用各种方式来同我们作斗争，不久前向我区进攻，虽然也占过涞源、蔚县、广灵，但是涞源已经被我们收复了，蔚县、广灵我们也已逼近城下。我们的游击队在继续活动，而且能够和几十县打通，一致地来共

同合作，我们从此可以了解敌人的困难是大大的增加了，不用担心敌人也用游击战来向我们进攻，要知道他不是那样如意，兵少了，无济于事，兵多了他又没有偌大实力，亦不能用过大的兵力。现时他是在极力的扶植、扩大伪军、伪组织来作统治工具，并且收集土匪来维持秩序。但是我们一方面发动群众，把一切伪组织彻底铲除，使他根本不能建立；一方面运用游击战，发动广大的群众来坚决进行抗日，把日本强盗驱逐出去！

我们当某一城市失掉时，不可失望，感觉到没办法，因为其他好多区域仍然是为我们所有的呀！

只要我们能建立起健全的政府来，能把政权统一，那么这个区域一定能巩固起来。我们应当万众一心，发动民众，配合华北主力部队和日寇作殊死战斗，不屈服不投降，长期坚持到底，那么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这个大会负有以上的重要任务，在这举行开幕典礼的时候，真值得我们庆祝，希望政府能够领导我们坚决抗日。

注　释

〔1〕此区之八路军，指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决定，聂荣臻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等部三千人，留在五台山区开展游击战，二十五日划定“平绥路以南，同蒲路以东，正太路以北，平汉路以西为晋察冀军区”。十一月七日，八路军总部正式发布晋察冀军区成立公告：任命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为军区参谋长，舒同为军区政治部主任，叶青山为军区卫生部长，查国祯为军区供给部长，王宗槐为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杨成武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邓华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赵尔陆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明（即王平）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紫凤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周建屏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刘道生为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各军区划分范围为：

第一军分区包括灵丘、广灵、浑源、应县、山阴、怀仁等，即东至紫荆关、居庸关长城，北至平绥线，西至同蒲线，南至紫荆关、雁门关长城。第

二军分区包括五台、代县、繁峙、崞县、定襄、盂县等地，即东北至长城，西南至铁路线。第三军分区包括阜平、曲阳、完县、满城、易县、涞源等地，东至平汉线，南与第四军分区相接，西至长城，北至涞水、易州、紫荆关之线。第四军分区包括平山、行唐、灵寿、正定、获鹿、井陉、寿阳、阳曲等县。即北与第三军分区相接，东至平汉线，西至同蒲线，南至正太线。

〔2〕宋主任，即宋劭文，当时为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员，山西第一区政治部主任兼五台县县长。

〔3〕胡县长，即胡仁奎，当时为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员，盂县县长兼寿阳、平定、榆次县指导员。

〔4〕我军，是指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军队。

在平汉线袭击敌人的战斗报告*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

一、平汉线日军九日被我袭击后，极为恐慌。被我破坏之铁轨与电线至今未敢动修。昨派往望都之侦察汇报：该城时起谣风，一日数惊，日兵守在工事里不敢出。

二、 我主力集结于机动位置外，仍有小部在铁路附近游击，继续不断破坏铁路。

三、此次战斗经验，我感觉敌各处守兵都较薄弱。正因为薄弱，所以敌不重守城市，只守城内几个支点，甚至弃城而固守工事。主力隐蔽于地道内，少数守工事，设数道沙包、木栅、铁丝网固守待援，因铁路、马路增援甚易。故此对城市猛袭，夜克平汉线三城：望都、定县、新乐均以接梯攀入。同时敌警戒亦甚疏忽。

四、对各铁路线守敌之攻击，应尽可能取得配合动作，使敌不能互援。

---

* 这是聂荣臻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刘少奇、杨尚昆的战斗报告。这次战斗，是根据总部命令，为配合正面战场，牵制边区周围日军向徐州战场调集而组织的第一次破击战。此次作战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部队袭占新乐、定县、望都三城和清风店、方顺桥等车站，并袭入满城和保定城关，毙伤日伪军三百七十多人，毁坏铁路五十余公里，焚毁车站六处，一度切断平汉线北段敌之交通。此次作战的胜利曾分别受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致电嘉勉。

五、此间群众抗战情绪极好，经过之地都欢迎，沿途老幼男女对我之热烈，喜形于色。自卫队已全组成步哨，前出到铁路沿线，并且协同游击队破坏道路。

乘敌空虚速进冀东建立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六月）

（一）
给中央军委的电报

（六月十二日）

为执行创造新的根据地之任务，宋、邓纵队[1]拟乘敌空虚迅速进往冀东，首先袭取兴隆，以该处为中心。现决分两路进攻，宋支队进袭密云以东平谷、三河、蓟县，并相机进占各县城；邓支队于进逼兴隆成功后，继续向东南地区发展。

请胡服[2]告天津转冀东特委：加紧工作，并派人与宋、邓纵队联络，以便布置整个工作。

该纵队在沿途经过所见，群众抗日情绪甚高，对我军很热烈。如永宁捐税局，我们一到，把存款一千元送来。打了四海之后，附

---

* 一九三八年二月，毛泽东发布“关于建立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聂荣臻当即组织邓华支队向敌占区挺进。四月，第一二〇师宋时轮支队由雁北出发到平西。五月，在平西的主力成立第四纵队，归聂荣臻指挥。这是聂荣臻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的电报和给宋时轮、邓华并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电报。提出第四纵队拟乘华北日军南下进攻徐州，后方空虚的有利时机，速进冀东，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

近民众便自动募捐、慰劳。石匣商会慰劳四百双鞋、袜，并派人来接头。

（二）

给宋、邓在冀东活动部署的指示电

（六月二十二日）

1. 你们在北进中，沿途取得了许多胜利。每个战斗中，都表现着我们新组建部队的战斗力及干部的勇敢、坚韧与机动。但在每次战斗中，干部的损失过大，此点望特别注意。

2. 你们现既到达兴隆县，应就在此地区开始创造根据地的工作。对于敌之堡垒要塞，如无十分把握时，宜用政治工作，争取伪军反正，截断其给养之来源，或进行包围，集结主力，打击增援之敌。

3. 你们似宜依靠雾灵山向四周发展，并应以一部北出黑峪关，尽力破坏承德、滦县、平谷、通县、兴隆间之马路。同时以一部沿着山脉截断由承德经遵化到北平之汽车路，东出迁安，首先以兴隆、遵化、迁安地区为根据地。望你们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详加考虑，并电告。

注　释

〔1〕宋、邓纵队，即八路军第四纵队，根据总部命令，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平西组成，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六大队（团建制），另有教导队、骑兵队、独立营各一个，总兵力约五千人。

〔2〕胡服，即刘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湖南宁乡县人，当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

关于晋察冀之敌情及我军行动部署的报告*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日）

甲、由盂县进到柏兰镇之敌，现已在该地以西之下耿家庄被我将其围困于山沟中已有三昼夜，现仍困守中。敌我均有相当伤亡，唐参谋长[1]负伤。因该敌未解决，故对代县前进之敌就无把握解决。昨日仅四大队将其阻止于豆村以西滩上村附近。昨晚该大队已撤至豆村以东地区，与王旅[2]七一七团靠近待机。定襄之敌昨分三路向五台前进，此刻约已到达东冶。五台城墙被我完全拆毁，

---

* 这是聂荣臻给朱德、彭德怀、毛泽东等的报告。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根据日本大本营“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的部署，调集日军第一一〇、第二十六、第一〇九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第三、第四旅团共五万余人，并配有大量飞机、坦克、装甲车及炮兵，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日起，由平汉、正太、同蒲、平绥各线出动，分兵二十五路，以五台、阜平为主要目标，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攻。聂荣臻以“初则有计划地抗击，继而诱敌深入，正面避开，使敌扑空；尔后我军包抄打击敌人侧后部队”的游击战术粉碎敌人的“围攻”，取得重大胜利。战斗历经四十八天，作战一百三十多次，歼敌五千二百多人，俘日军七人，缴获大量作战物资，击毙日军旅团长常冈宽治、联队长清水。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有力地策应了正面战场友军的武汉会战。作战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曾致电聂荣臻等，表示慰问。

城内粮食、民众完全搬走，仅留着一些空东西。敌现仍阻于王快，今日尚无动作。

乙、我现将七一七团及杨成武主力控制于手中，准备配合张旅[3]，将来打击正面之敌，反攻五台，粉碎围攻是有可能的。

丙、第一二九师始终没有联络，在正太路亦未见有苦战的机动，究竟如何的部署，请左电告。

丁、张旅电台及波长和通用密码本，请周、甘电告。

戊、这次各路向我前进之敌战斗力甚强。

注　释

〔1〕唐参谋长，即唐延杰，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

〔2〕王旅，即王震任旅长的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

〔3〕张旅，即张宗逊任旅长的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

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节录）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一、在战斗中成长的晋察冀边区

我们今天在敌人远后方建立起来的晋察冀边区，包括三省七十二县、十万平方公里、一千二百余万人口，已成为敌人心腹大患的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这并不是如外间人想象的那样神密的事情，但同时却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边区的建立，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年了。这一年的历史，是一段残酷斗争的历史。边区一年来始终是在艰苦斗争环境中，在无限困难条件下，开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华北广大人民抗日民族自卫战争洪流中的产物。这一年的血肉斗争，充满着痛苦和兴奋、辛酸与悲壮。自太行山、五台山、恒山绵亘不断的山岳地带，直延至冀中的广袤平原，而达冀察热辽边境，在正太、同蒲、平汉、平绥以至津浦、北宁几条铁路干线之间，到处交织着暴敌血腥的屠戮，和千百万不愿当亡国奴的黄帝子孙抗敌的杀气，燃烧着神

---

* 这原是聂荣臻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写给毛泽东等的军事报告。毛泽东认为报告有很大的教育意义，要求修改补充后成书出版。后经作者修改补充，于一九三九年五月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在延安、重庆两地公开发行。毛泽东亲自为这本书题写书名并作序，朱德、王稼祥也为此书作了序。

圣的为和平正义生存而自卫的烽火，到处响着敌人疯狂的炮声和民族抗战的怒吼。今日的晋察冀边区，在华北广阔的领土上，无疑已经形成了相当强固的堡垒。

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堡垒从它初创到形成，自己也不自觉地居然是经过了这样一个艰难缔造的过程。

这个地区，当去年（一九三七）十月间太原失守以后，不但和国家的总后方隔离了，无所凭借，而且在这一地区的范围内，由于太原的失守，已陷于极端紊乱的状态。那时各县的政权机关，实际上已经完全瓦解。在主要的晋东北区域，除了五台、盂县两个县政府，在现任边区行政委员会宋劭文主任和胡仁奎副主任领导之下，仍能执行政务外，其他各县政府工作人员，都已逃散一空。偌大区域中，简直找不出原有地方行政负责人。社会秩序紊乱，散兵、流匪乘机活跃，汉奸随时随地欺骗造谣，影响到人民情绪的动摇，因不安而逃跑，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几乎没有任何信心，悲观绝望的失败主义情绪，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我们走过了市镇，市镇是萧条的；走进了县城，县城是空虚的；城镇上留下的多是年老的汉子和婆婆。许多县城都象是快要死灭了一般，兵燹之后的荒凉景象，支配了这整个地区，一切是无秩序、破坏和崩溃。这样就增加了我们许多的困难。

那时正值严冬的季节，五台山上积压着层层白雪，雪花象鹅毛一般，在这山地区域里昼夜纷飞着，寒冷的气候，就是过惯了北方山地生活的居民，也都感到艰难。但是，那时我们的部队，大多数指战员还没有棉衣，赤裸的双脚穿着草鞋，寒冷刺骨的风雪，打着每一个人的肌肤。幸而大众的内心，都积蓄着一股杀敌勇气，鼓舞着救国热情，还不曾变成沙场冻死的枯骨。然而部队的给养，毕竟使得当时供给部的同志经常感到苦恼。因为没有一定的供给来源，顾得今天，顾不得明天。而且又加以少数商人乘机居奇，我们在经济困难时期，又受了更多的损失和耗费。

在运输和物资动员方面，那时似乎真的已经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许多退军把车骡、粮秣往南拖去，我们的部队要往北开，就受极大的影响。当时山西第一区政治主任公署所发的文件中，就曾沉痛地说过：

"一批一批的退军，拉得一批一批的驮骡毛驴，载的东西是面粉，锅灶，破旧衣服，此外还有人。然而手榴弹、枪、子弹、炮，都是沿路扔。因此上边定下长差与短差的办法，可是实际上短差也大部都是长差，出去的多，回来的少。请求上边办理，公事上说：'已令饬该部队放还矣'，然而有多大的效果？车骡是当下养不出的，前线上死了多少，丢了多少，退军拉了多少，哪里有取不尽的车骡被征调呢？有一天，许多撤退的部队，向五台县要的驮骡总数达六七千头，这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是没有办法的。"（见宋劭文氏动员骡车粮秣的经验教训）。

在其他军队撤退紊乱的状态中，我们的供给和动员问题，当然不能不感受万分的困难。眼睁睁地看着山巅的白雪，地上的灰冰。纵然，使我们的手足冻裂，全身在风雪中颤栗，然而战斗任务激励着我们，要忍着饥饿，鼓起勇气，挺起胸膛，握着枪杆，和那残暴的敌人作战。

那时，由于战局的紧张，敌人正在到处建立伪政权，组织汉奸队伍，不断企图消灭我们的游击队，稳固他的后方。我们为了保卫国家领土与主权，摧毁伪政权及汉奸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主力部队[1]作战，不得不以我们所仅有的少数基本队伍，配合着地方上新发动的一些群众武装，积极袭扰敌人。但是，每次战斗总免不了有伤亡，而这些受伤的战士，当时既没有后方医院，又没有充分的医药，连棉花绷带都感到缺乏。许多伤员，往往几个星期敷不到必需的药剂，就是勉强能敷上一点，许久也不能换药，加以食物不足而且恶劣，吃的尽是些干涩而缺少滋养料的小米、山药。躺在民房土屋中，天气寒冷，被褥又难得到补充，

身上衣薄，且血迹斑污，一时又找不着替换的。但他们为了国家、民族，虽然辗转呻吟于床塌，却能含辛茹苦，没有丝毫怨叹。伤势稍轻的，每日还不肯放弃政治学习，仍然张着枯黄的脸，撑着如柴的躯骨，不懈地讨论着战争形势。这些中华民族优秀的热血男儿，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拚着血肉，忍受着创痛，只觉得是应该的，大家都忘记了流泪，而且也不得不忘掉流泪。我们也曾竭力设法，希望从其他地区和后方，多少找一点医药物品补充，然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直到后来，我们得到美国医疗队的白求恩[2]大夫（Henny Nonman Bethune）来军区热心帮助我们，担任军区医药顾问，建立了模范病室，才逐渐解决了部队医疗卫生工作上的各种困难。然而，起初很长的时间，我们是得不到任何帮助的。在最艰苦的环境中，只有节衣缩食，忍痛挨冻，艰苦奋斗，是我们克服困难的唯一办法。经验告诉我们：困难时期，只有自己设法战胜困难，渡过难关，舍此以外，一切消极悲观，就只有灭亡。

其次，在游击区开辟当初，我们遇到的另一个困难问题，就是兵力过于单薄，敌强我弱，而新的队伍又缺乏经验，急切难于制敌。

当时这一地区所留下的部队，实际上是非常的少。当八路军主力南下赶赴娘子关与晋南战场时，此地只剩下一个特务团，一个骑兵营和两个不完整的连。兵力单薄，又缺乏友军配合。然而紧迫的战争环境，却给这些部队以重大的战斗任务。那时我们仅仅以两个游击支队，东西驰骋于阜平、曲阳、完县、唐县、涞源、广灵、灵邱、蔚县、满城、易县、平山等地。所到之处，毁敌交通，推翻伪组织“维持会”，建立抗日地方政权机关，发动群众与组织地方武装。抛弃了一般的强迫招募方式。依靠着广泛的政治动员，创造了新的抗日部队。从战场上取得残缺不全的武器，凑合了民间捐输的破旧枪支，武装起来，与敌人进行了大小二十余次战斗，使敌人积极沿主要铁路交通线向河北、山西腹地进攻的

计划，遭到意外的严重打击。靠着地方群众热烈拥护与协助，我们的游击支队，胜利地用单独猛攻、急袭的行动，深入敌后，纵横穿插敌军之前后左右，杀伤其人马，缴获其辎重，牵制敌人以利正规军[3]作战，虽然起了不小作用，得到了许多出人预料的可喜成绩，但我们当时力量，毕竟还很薄弱。许多地方，为了要和敌人作战，给予敌人更大的打击，需要有更多的武装力量。然而，这些力量从哪里来呢？除了积极发动民众之外，显然没有第二条路。但是民众武装，也不是急切能够训练成为坚强不拔的战斗队伍的。在敌人四面包围不断威胁中，到处是散兵土匪。素来没有军队的教育与训练的边区民众，多数四散逃亡，本来不敢相信自己还有抵抗敌人侵略的力量，加以汉奸乘机造谣，诱惑群众，不要参加武装，安心做敌顺民，以动摇落后分子，更多少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固然，由于日寇残暴的抢掠、奸淫与屠杀的残酷行为，使民众从愤恨中掀起了反抗的烈火，和我们游击支队神勇战斗的模范行为，引起了群众的信仰，与军政干部耐心深入的宣传鼓动的努力，迅速地发动了觉悟的群众，积极参加到游击队和义勇军里来。然而那些在仓促中组织起来的新游击队、义勇军，毫无作战经验，而时机紧迫，事实上又来不及从容训练，只好迅速集中了已经编成的队伍，及时开上前线。依靠着老部队与个别干部及战士的领导教育和影响，高度发扬群众的抗日情绪，坚决和敌人苦战，撑持着初步建立的游击区域，在撑持中，逐渐求得发展。可是，那时许多新成立的武装队伍，首先普遍感到的就是没有武器。从战场上打扫到的敌人和退军所遗弃的枪炮子弹和缴获的武器，多数残破不全，有的没扳机，有的没刺刀，自己设法修理，勉强使用；破坏了铁路，把铁轨改制成刺刀，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我们解决武器问题的办法。所谓“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游击队歌，在这里真正得到了事实的证明。同时，也收买并搜集了些民间捐输的枪支，及义勇军自己带来的枪支，帮助解决了武

器问题。但是，除了武器之外还有干部问题，起初更表现得严重。干部的缺乏会使每个人皱眉，四面八方喊出的声音，都是要干部！要不出来也得硬要，不让他们要也实在不行，结果就是我们原有的稍为老的警卫员、勤务员以至于马夫、伙夫，也都不得不让他们要了去当队长或指导员。为了要应付紧急的战局，为了回答群众的要求，为了要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和当前凶恶的敌人搏斗，他们既有上前线血战的高度热情，我们又怎能因为恐怕他们经验与能力不够而“吝啬”地不让他们去呢?！虽然许多人盼望着：后方能给我们送一批下级干部，来弥补这个缺憾，无奈后方被敌人切断，一时难以打通；就是后方有干部，当下也不能插翅飞来。遥企着辽远的后方，何处有“神兵天将”? 况且，在全国抗战急速开展的过程中，所谓后方，到处也都普遍感到干部缺乏。自己要训练一批干部，又不是立刻可以造就的。因此除了在战斗中锻炼，大胆提拔之外，显然已没有较好的解决干部恐慌的办法了。后来我们自己开办了“军政学校”，逐渐解决了部队下级干部的恐慌。但是在初期，干部严重困难，却是无法避免的。当时在敌人四面围攻之下，以不熟练的干部，率领着新武装队伍，和强大并且装备着先进武器的敌人作战。对于没有坚决信心的人，是绝无此种勇气的。我们幸而有此勇气。但在开辟游击区的初期战斗中所遭受到的困难和苦恼，在回忆中是难以想象的。

此外，在游击区开始创立的时候，由于地方武装的复杂性所引起的不统一状态，又曾给予我们以重大的困难。

沿着太行山、五台山、恒山山麓，在敌人继续深入华北，太原失守的前后，无数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相继在“保卫家乡”、“保卫祖宗坟墓田园”的口号下，纷纷自动武装起来，千百成群聚成队伍。他们以各种名义组织起来，和敌人作战。同时，有许多原来在华北抗战的部队，因与主力失却联络，留在华北，或根本不愿撤退，决心要在敌人后方继续作战，他们也都自动地形成一

种武装组织单位，吸收当地民众参加，各自活动在敌人侧后。这种武装力量，为数亦颇不少。此外，还有一些积极抗日的军官，得到政府或地方上军事机关的承认，在华北建立游击队伍。他们派人就地收容流亡散兵，也组织了若干游击队性质的部队。这些部队和各种自发的人民抗日军，都是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武装力量。

但是，也正因为地方抗日武装风起云涌，各部分的地方工作和作战方针也就很不一致。虽然大家的目标都是“抗日”，可是各人的“抗”法不同。各武装部队对于民众的关系以及部队与部队间的互相关系，都很不密切。最可恨的是汉奸从中挑拨离间，少数兵痞、流氓乘机活跃，地方上的不安宁现象普遍存在，抢掠、胁迫、勒索时常发生。少数队伍纪律不良，给了民众恶劣的影响。我们收到这类告发信件，日必数起，老百姓有的痛哭流涕要求“剪除地方之害”。但我们觉得这些少数不良分子，假借抗日名义，实行变相的土匪政策，乃是初期紊乱状态中所难免的。我们相信：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难中，稍有国家民族观念，稍有热血心肝的人，绝不愿忍心荼毒人民；即使是纪律极坏的军队，也不是完全不能争取而转变过来的。因此，我们对于少数落后的队伍，仍然耐心的本着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不断进行说服解释工作，极力消除各部队彼此间的误会与隔膜。有时个别友军中不明局势的士兵或工作人员，偶然在外为非生事，我们为了维持地方安宁，总是平心静气，以理劝阻；有时遇到无理反抗，不得不加以扣留，但是经过一番说服教育之后，仍一律用公文送还原部队。同时就此对民众作详细的解释，以促进各方面的关系，使这些不良现象逐渐减少。虽然在各方面还没有深切了解，没有确定统一战线的办法与制度之前，此类困难与纠纷，总是无法免除的。我们的工作同志，整天耗费在这些令人头痛事件上的时间，竟达到可惊的比例。那时我们的一个连部和地方上的动员委员会，一天就曾经处理了十二起扰乱治安的案件。

至于各个部队之间作战方针上的不统一，在同敌人进行战斗时，不能共同协作，配合作战，力量分散，甚至造成军事上的损失，这在初期更是无可申诉的苦楚。往往在一个战斗中，各个部队互不联络，谁找上敌人，谁自己去干，别人只能在旁观战。事实上只管各个的防区，各自为政，力量分散，无形中便宜了敌人。在这一游击区开辟的初期历史中，此类事实不一而足。

然而，这些在游击区开辟初期的历史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只能给我们的工作以某些程度的苦恼与阻碍，却不能根本停止我们开创游击区以至于建立根据地的伟大事业的决心。在我们地方工作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我们部队指战员的英勇搏斗之下，在广大人民的热烈帮助之下，我们毕竟开创了晋察冀边区广大的游击区域。但那时我们所占领的区域还不曾稳固。虽然我们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七日就在五台县城准备成立晋察冀军区，各直属队宣布开始办公，十一月七日正式宣布了军区成立并划分军分区的命令，各军分区及其基本部队宣告成立，但各分区的武装还不曾普遍的发展，新成立的部队本身还很不健全，质量也差，还只能组织零星的游击战，没能把进攻这一地区的敌人尽数打败。我们攻克和保持的地方，还很不巩固，汉奸、伪组织的活动不曾基本肃清，民众的抗日组织没有普遍的建立，发动民众武装的工作也很不够，民众的积极性也未普遍发扬。尤其是那时在许多县分，原有政权机关被敌人摧残和瓦解后，还没有建立起抗日政权。因此，我们的工作，在当时只开辟了一个华北较大的游击区，还没有建立成一个巩固的根据地。

但是，经过一个短时间的各方面不断加紧努力，这一游击区的条件逐渐有了大的进步。这一进步，造成了晋察冀边区新的局面，踏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边区中心区域的广大县分里，军事上、政治上都有了相当巩固的基础。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游击区的形态，而是一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了。

从游击区到根据地的这一转变过程，完全是和一切困难作斗争，逐步克服那些困难的最艰苦的缔造过程。一切客观条件的改变与进步，都依靠主观的努力。

当时我们认定了：为要早日完成我们在敌人后方大规模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必须集中全部力量，把游击区扩大巩固起来，使它成为一个强大的抗日根据地。这样才能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把敌人从广大的华北领土上消灭或驱逐出去，以完成我们的战略任务。否则，我们既与国家的总后方隔绝，而自己又没有足以长期生存发展的依托。没有自己的游击后方根据地，那么，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我们的游击战争势将无法支持。我们既清楚的了解这一点，就必须提出而且坚决执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

为了执行这个方针，我们首先集中力量，进行发展武装和巩固部队的工作。我们用了全力，广泛地发动群众的武装，普遍组织游击队、义勇军，当时在晋东北各县，广泛号召组织游击队或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在冀西各县，普遍组织义勇军。积极提高并紧紧地抓住了群众抗战的热情，使他们踊跃地加入军队，发动胜利的游击战争，采取打扫战场、收买民间枪支、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的办法来武装自己。同时，把少数的基本部队，放手分散出去，并派出尽可能有的干部，坚决执行扩大武装的任务；不断提高政治教育，扩大政治影响，加强部队干部的领导；各级干部也都能埋头努力，艰苦耐劳，为完成任务而斗争。这样，我们在各分区就建立了相当大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与大量建立武装的同时，便集中精力，积极克服各种严重的错误倾向，肃清了土匪主义、军阀主义的残余，纠正了地方上初期工作中个别干部的滥发委任状，利诱式的发动武装，违背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在部队中坚决清洗了地痞、流氓等坏的分子，加强并提高了部队的数量和质量，不断发扬了战斗中的模范作用，把部队逐渐巩固了起来。

总观这些武装部队发展与巩固的全过程,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军区才成立的两个月间。那时正当边区初期作战紧张的时候，除了我们基本队伍之外，各分区的武装方在萌长；有的基本队伍正在和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未及扩大；有的新发动武装力量还很小，并且散在乡村间尚未集中；有的还正在着手发动组织。为了应付前线的战事，匆匆把已经组织和编制好的武装及时开上前线；未组织好的加紧组织，陆续调往前方，进行零星的游击战。依靠着全体指战员高度地积极和勇敢，取得了许多的胜利。如三分区的游击队在平汉线，二分区的游击队在同蒲线作战，都取得了不少的收获。在胜利中提高了群众对游击战的信心，因而参加抗战的武装动员工作就更易于进行，各分区的部队随着也有了迅速的增加。不过这一时期的中心，只是放在发展部队方面，对于部队的整理与训练还谈不上。

第二阶段，武装组织已经有了相当的成绩。各分区都成立了相当数量的队伍。这时的中心工作，就是加紧整理与扩充，开始淘汰坏分子。经过一番整顿，各区县逐渐集中起来，把赤手空拳的农民变成武器相当齐备的民族战士;把许多小的零星的游击队、自卫队、义勇军逐渐汇合而成营，成大队，成支队，于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正式成立了四个基本的游击支队。在各部队中都建立了正确的政治制度与生活制度，加强了部队的教育，同时仍继续开展着游击战争。以少数部队向四外活动，牵制敌人；大部分则集中整理，加紧训练。若干小队伍，此时已组成兵团性质。而在这一阶段终了的期间，有些大的队伍，已向正规化的道路转变。通过这一阶段，各部队的作战都更加活跃起来。这一时期也约有两个月。

第三阶段，是从今年（一九三八）二月份开始的。这时工作的中心完全放在巩固方面。这时期因为部队经过一番大整理，继续不断地洗刷淘汰了许多坏的成分,质量有了极大地改善与进步；

战斗员在政治上日益坚定，战斗力增强，所以能够全部出动攻击敌人。这些部队不但能够进行小规模的游击动作，而且能够有计划地组织大的战斗，到处表现出兵团态势的活动。大部分的部队都走向正规化了，同时在这些部队的周围，更繁殖着新的游击队。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工作，军区武装力量乃得巩固地向前发展。这些武装力量，不可否认的是八路军的产物。他能够继承八路军的光荣传统。他们都能采取八路军的制度与方法，仿效与学习八路军的精神。同时，在扩大与巩固部队的时期中，我们又和吕正操司令所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取得了大汇合。人民自卫军后来改编为八路军的第三纵队。在吕司令指导下，这个部队学习八路军的传统精神，学习八路军的经验，迅速提高和发扬了战斗力，成为支持冀中军区的伟大中心力量。当时我们把这些武装力量聚合在一起，更加强了杀敌制胜的信心。至于广泛的地方上不脱离生产的群众自卫队的建立，也于此时得到了初步的完成。而且在这几个时期的工作过程中，边区各部队的纪律也有了很大提高。在模范的纪律影响之下，其他纪律不好的队伍也逐渐改进了。在实际工作中，使大家认识了“没有优良的纪律，部队就会死亡”的真理。我们和友军之间的关系，这时更趋密切，而各友军之间彼此的联络与团结，也都有很大的进步。各武装部队都一致了解互相团结是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我们促进各方的关系，克服“只顾自己不顾全局”的错误观念。我们的同志更逐渐了解各友军之间的不同特点，在团结各友军中，渐次纠正了标准太高，求之太急的态度，严格地和团结友军工作中的“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作斗争；努力与友军建立起一种互相破除一切怀疑、猜忌的心理，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摩擦，互相学习别人的长处。我们对于各友军的胜利，曾予以普遍的发扬，以互相鼓励，坚决反对自骄自傲的态度。就是遇到友军的困难，我们也总尽力设法帮助。我们固然补充自己，但同时也积极设法补充友军。我

们曾协助友军进行了扩大部队的工作，而且发动群众帮助友军，慰劳友军。有许多友军官兵掉队、落伍、失去联络、受伤、害病的，我们总极力代为收容，招待治疗，并送其归队。一部分群众，对友军有不满和怀疑的，我们也总代为解释，使友军得以挽回政治影响。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始终保持着和友军彼此间善意的、诚实坦白的批评精神。这样，大大促进了边区以内各部队的和谐与团结，因而边区武装力量得到更强大的发展。我们运用了自己所建立的游击队，并使之从斗争中逐渐发展为游击兵团，以至发展为正规兵团，配合友军，不断去战胜敌人，发动民众。这样就造成主要的条件，具备了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力量的一环。

为了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除了建立武装部队之外，我们更积极恢复地方的政权。当时各县政权机关，在敌人摧残之下，事实已全部瓦解。但是随着地方武装力量的扩大与巩固，这一地区所包括的三省数十余县的地方，势不能任其长久陷于无政府状态。当时经我们武装力量收复的晋东北十二县，冀西二十县，冀中二十县和察南四县，与原来各省政府隔绝，无法联络，而其下层之区村各级政权，亦均逃跑或惨被摧残。为巩固抗日根据地计，实有立即恢复地方政权的必要。就是边区各界民众，在我克服县境，地方秩序略趋安定之后，亦皆迫切要求政权之再建。虽然当时各地也曾建立有群众半政权的机关，如晋东北各县及冀西某些县分中有动员委员会，冀西沿平汉线之某些县分有自卫会，冀中各县有救国会等组织。这些都是在初期无政府状态时，为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而成立的。他们的任务是：担负战时地方一切动员工作，维持地方秩序。实际上是一种半政权性质的机关。但是此类性质的机关，纯粹是混乱时期的产物，绝不能认为是长期抗战过程中的唯一合理的组织形式。而且此类组织，名称既不统一，办法亦不尽相同，其最高机关只到县一级为止。事实上不能用这种组织去统一全边区的行政，因为他们根本不是正式的政权机关。

那时山西第一区政治主任宋劭文先生亦有见于此，即积极建议组织全边区临时政权机关，以统一边区行政，使地方政治有集中之领导，以发挥抗战之力量。我们数度商谈之结果，都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措施，于是我们一面致电请示第二战区阎司令长官转呈中央，一面于去年（一九三七）十一月十八日，在河北阜平，和冀、察两省各军、政、民领袖交换意见，大家也都一致赞同这一建议。阎司令长官旋即来电转达中央[4]批准建立边区地方政权的意旨。“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筹备处”乃于十二月五日正式成立于河北阜平。除分别通知各方成立经过，并决定了代表大会召集法之外，筹备处派了宋劭文、仇友文、李杰庸、王斐然、白静斋[5]五位先生，分别到山西，平汉路东及冀西各县接洽，得到了圆满的结果。今年一月十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乃在阜平正式召开。大会继续了六天，至一月十五日闭会。正如大会宣言中所说：

“这一代表大会，有着边区全体武装部队的代表，有着四十余县的政府代表，有着一百余万群众团体的代表，更有蒙、回、藏少数民族的代表及和尚、喇嘛的宗教代表与国共两大政党的代表。在大会中，代表们都贡献出自己抗日救亡工作的经验，诚恳的坦白的检查了过去的工作，勇敢的批评并纠正了过去的缺点，确立了今后正确的新的工作方针。同时还产生了一个晋察冀边区的抗日临时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

“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包括着各党、各派、各阶层及各种民族分子。它的实际内容是贯彻抗日与真正民主。在行政的体系上，也是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接受中央政府的法律与命令。在将来收回全部失地，恢复晋察冀三省政权的时候，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任务即告终结。在这次代表大会中，充分的表现了各党、各派、各阶层、各群众团体、各武装部队的精诚团结。

在抗日高于一切的一贯的精神下，很仔细地讨论了各种有关抗日救亡的重要提案，并选举了积极抗日的前进分子，成立了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

大会充分表现出统一战线的异常巩固。这种巩固，是正在极力拆散中华民族统一战线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不能想象的。这更充分地表明了民主精神的逐渐加强，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坚决地相信：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将使华北抗战更能持久，更能适合于中央之抗战方针。因此，这次代表大会，有着它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

一切事实，都和大会宣言所宣示的完全符合，当时到会的全体代表，都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前提下，热烈地坦白地勇敢地贡献出自己的意见，决定了统一边区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教育、民运等各项方案，并且民主的选举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以宋劭文、胡仁奎、刘奠基、聂荣臻、张苏、吕正操、孙志远、李杰庸、娄凝先等九人为委员，以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当时将大会经过详情与行政委员会的组织，一一呈报上级机关，并且得到了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正式批准。

在这个统一的边区临时政权机关建立之后，边区数十余县一千多万的人民，获得了政治上的领导，千万颗飘摇动荡的心，重新得到国家的爱抚，有所维系与依托。政府一切法令，普遍统一地施行于全边区的各县、区、乡村之中。这些区域里的一切人，除了甘心卖国的汉奸以外，不分阶级、种族、党派、男女，普遍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职业、信仰、居住的自由；都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和武装自卫的权利。在边区政府成立之后，逐渐结束了各地方群众团体，各级动员委员会和救国会等在过渡期间代替政权的现象，而成立了统一的地方政权。在边区政府成立以后，逐渐有了八千个乡村政权，完全是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的。因为政府是真正代表全体人民抗日的民族利益，坚决执行抗

战时期的一切政策，所以它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成为捍卫国土主权，打击敌寇汉奸的有力武器。统计在边区政府建立以后，我们继续收复了三十五个新的县分，把这些县分里的汉奸伪政府与维持会全数扫清，建立了民众所爱戴的抗日政权，归入边区政府统辖之下。北平汉奸政府虽然在平汉沿线的某些县分中，派有伪县长，但由于那些县分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下，因此那些伪县长始终无法到任，伪政权无法建立。保定周围即为我军活动的地方，致使伪河北省府不得不设在伪中央所在地的北平。而北平汉奸的伪中央政府，事实上也是“号令不出都门”的。因为就在北平近郊的宛平等县，我们已经都恢复了县政府的组织，那里的人民所执行的是我们边区政府的命令，而不是汉奸政府的伪命。甚至就是在敌伪统治下的少数城市的人民，以及若干伪政权官吏，他们也都愿意接受和执行边区政府的命令，使用边区银行的钞票，购买我们政府所发行的救国公债，向我们政府交纳赋税，向我们报告敌伪消息，捐款接济我们政府和军队，而始终不愿接受敌伪的命令，使用敌伪的钞票，向敌伪交纳赋税。这样使得我们的边区政府，实际所统辖的地区，不仅仅限于我们已经收复的县分，而且包括了敌伪所统治的县分。同时，由于边区各级政府执行了正确的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等各种政策，使得边区的社会经济得到许多改革与进步，更加强了它在人民中的信仰。在全边区普遍实行了“二五减租”和“一分减息”，改善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提高了农村生产力。春耕垦荒和秋收运动的结果，增加了边区农业的生产量，普遍丰收，保障了人民的粮食与部队的给养，使广大边区人民的经济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财政上普遍废除了苛捐杂税，由开始时期的合理负担，进到建立统筹统支和必要的税收制度，并发行自由认购的救国公债，使民众没有感到负担的痛苦。对于战时文化教育工作的努力，创办了若干学校与训练班和小学教育，更提高了民众政治、文化水平，在政治上获得了空前进步。这个边

区政府，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成为我们在华北坚持抗战的一个坚强武器。它是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政治机构。它从与敌伪政权进行不断地斗争中发展巩固起来，适应着军事的发展，积极地摧毁伪政权，粉碎敌寇对华北统治的企图，保卫了中华民国的广大领土与主权。这样，就造成了另一个主要的条件，使我们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成为可能，而且由可能变成了现实。

但是，使晋察冀边区能够从一个游击区转化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更重要的因素，却是广大抗日民众的积极性的提高，民众抗日组织的蓬勃发展，与一般民众武装之普遍与壮大。由于边区的民众，普遍获得了抗日的初步民主与自由，因此他们一开头就表现出空前的活跃。当我们这一个游击区刚刚开辟的时候，部队也积极地帮助战地民运工作。当我们首先到达晋东北的时候，就尽可能抽出许多工作人员，组织许多工作团、小组，分散到各个地区工作，向一般人民广泛解释抗日救国的道理。因此，凡我们军队所到的地方，当地民众即纷纷起来自动地响应抗日军队，各自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团体。一时工、农、商、学、妇女、青年，在各县区里都先后成立组织，参加各种救亡工作，帮助部队从事抗战动员；实现群众生活的改善。虽然他们最初都还没有统一的组织，因而也还没有统一的工作纲领，但是，他们在一致热烈地抗日情绪的激荡之下，都发动了成千成百群众，勇敢的参加游击队、义勇军，帮助军队维持地方秩序，积极推动救亡运动，都有很大的成绩。等到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那些较大的群众团体，已经能够选派多数代表出席，而且工、农、妇女等主要群众团体，就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一月十六日），同时在阜平成立了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的全边区的筹备会，各自决定了筹备时期初步的统一工作方针。到了三月三日在筹备工作完满之后，这几个团体同时召开全边区各县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各个团体在边区总的领导机关，确定了各团体在抗战时

期的工作总方针与具体纲领。从这以后，他们的组织日趋健全，工作日益开展，开始走上了稳固的发展道路。这些群众团体，都拥有广大群众，即如农民救国会的会员人数，在成立之后很短时期中，统计已达五十七万以上，其他群众团体的会员，也都占有很大的数目。他们自成立以来，除了积极推动群众教育，普遍建立群众识字班，帮助政府改善人民生活之外，最主要的成绩，首先在于他们能够积极拥护政府。他们始终用了最大的努力，支持政府的各种政策，努力执行并完成政府抗战的财政经济动员。如：征收赋税，推销救国公债，在群众团体普遍深入的动员之下，短时间内就得到了优良成绩。他们更不断帮助政府，完成维持治安任务，实现了政府建立地方自卫武装——基干自卫队的计划，同时还帮助政府推进了民主政治，发动民众参加乡村选举运动，严格执行了反贪污斗争的章程，提高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仰，加强了各级政府的威信，巩固了边区政权。其次，他们工作的成绩，更有力地表现在对战争的直接帮助上。这些群众团体，自他们建立之日起，即以扩大武装作为中心工作之一。只就农民救国会，在成立以后不久的时间内所发动的武装来说，已达一万五千余人；工人救国会并且单独组织了工人游击队。同时各县的农民救国会和工人救国会，都非常踊跃地在每次战斗中，发动当地群众，普遍组织“担架队”，护送伤员，有时是搬运战利品，协助部队清扫战场。在过去的战斗中，有不少县农会负责人，竟亲自率领着几百个担架进到枪林弹雨的火线上，勇敢救护受伤的战士。至于接近敌区各县群众团体的成千成万会员，还能经常配合军队作战。在沿平汉路各县的群众团体，帮助作战部队破坏敌人公路、铁路、电线，动辄数十里以至百余里，每次满载而归，几乎从未间断过。我们曾继续不断地得到各种报告记载，说明群众此类英雄行动。如：去年春节的晚上，平汉路附近唐县，一个乡村的群众，自动在望都、清风店之间，割了六百四十多斤电线，立时“破坏敌人交

通”的浪潮高涨了，谁也跃跃欲试，于是一千斤、二千斤、三千斤……直至一万斤电线，都连续不断送到县政府里来。望都、清风店之间的电线，数日内完全被拆光了。鬼子们索性不要线杆，改用皮线，但没有几天又被群众割完了，敌人把线杆镶上铁皮，也被锯了。敌人用了所有的方法，都没有效果。后来计算起来，一个群众拆回的电线，共达八百多斤。又如：二月七日晚间，曲阳县城南一个村庄里有六个群众，自动去破坏敌人交通，正在动手的时候，敌人压道的铁甲车开来了，他们都爬伏在地，车过后，他们把小铁桥上的铁轨钉子很快的拔下了，不到半点钟，后面的火车，嘘着气得意洋洋的驶来，立即出轨，跌进小河沟里去，后面的车辆，迭压下来，车上七十多个日寇兵顿时都被砸死了。再如：一月二十二日晚，唐县县长带着一百多个小学教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在极度高兴的情绪下，竟忘记了一切，一齐出动去破坏敌人交通，第二天他们掮了几千斤沉重的电线、铁丝，兴高采烈的胜利回来了。象这样的例子，简直举不完。不但平汉沿线如此，就是同蒲路沿线各县，也有同样的成绩。现在同蒲路北段已成了蔓草丛生的荒野了。有些地方，青年救国会还秘密组织了许多积极青年，成立了“破坏交通先锋队”，数十人编成一中队，有计划地去破坏敌人交通。某些特殊的县分，群众团体还有“土枪队”组织，英勇地协助部队在火线上与敌人作战。地方上日常锄奸工作，更几乎完全由群众团体来担负。各区、村普遍都有锄奸组织，除站岗放哨之外，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乡村，还建立了秘密锄奸网，帮助政府及军队侦察汉奸匪徒，检举破坏分子，加强政府保甲制度。此外，各地群众团体，最普遍地执行了慰劳战士和伤兵的工作。譬如平山一线，只就农会在短短数月内募捐的鞋子，送给前线战士就有八千余双；其他如米、面、猪、羊等，更为群众赠送给战士最平常的慰劳品。一般群众，特别是群众团体的会员，自动给抗日军人家属担水，送柴、送米和帮助他们家庭耕地，挑粪等，都

成为日常工作。至于动员枪支，进行归队运动，在各群众团体的努力下，也都得到了很好的成绩。

在群众抗日积极性的不断提高之下，民众组织的普遍建立与发展，一般民众武装的成长与壮大，群众对于战争的积极援助与英勇的配合行动，日益活跃地成为边区抗日不可制服的力量。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基本的群众条件，这一条件的具备，就使我们晋察冀边区确定地从一个游击区变成了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了。

虽然，今天的晋察冀边区，还不能说已经是全部完成了它从游击区到根据地的整个转变过程。过去它已经在残酷的斗争中成长了，今后它还要在更残酷的斗争中成长和壮大。

二、一年来我们在敌后战斗的收获

总计我们从这一游击区的开辟，以至建立根据地的整整十三个月的残酷斗争过程中，在敌人四面八方围攻之下，我们部队在军区周围的各个战线上，已经和敌人不断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消灭了一万五千以上敌伪军。我们无日不在和敌人作战，特别是在配合主力战场[6]战斗紧张的各个时期和青纱帐期间，更加积极的活动，昼夜不停袭击、伏击和扰乱敌人，使敌人遭受重大损失，感到严重的损失威胁，因而引起了敌人这一次对边区布置了更大规模的新的围攻，而我们粉碎敌人新围攻的战斗，直到今天还没有最后结束。这在后面将有详细的叙述。这里，为明了过去一年间，我们在敌后战斗的经过，我想先就这一次敌人的新围攻没有开始以前的历次战斗，做一回顾。同时这对目前敌人围攻边区和我们粉碎敌人围攻的形势了解上，也是必要的。

军区从开辟的那一天起，就用了挺进、急袭的行动，与敌人进行英勇战斗，不断地获得许多光荣的成绩。其中，比较大的战斗叙述如下：

（一）开辟时期的战斗（一九三七年九月至十一月初）

这一时期还在军区成立以前，正当敌人攫取太原，向山西腹地进攻的时候，我八路军主力在平型关胜利以后，又配合忻口、娘子关战斗，接着晋南战事转紧，我主力南下增援。晋察冀这一块广大的地域，就只留下少数队伍。那时纵横游击于敌人侧后的，仅杨支队[7]和骑兵支队[8]。杨支队活动于灵邱、广灵、涞源间；骑兵支队活动于阜平、曲阳、行唐间。我们靠这两个支队的积极活动，深入到了察哈尔和平汉线两侧。杨支队于九月二十五日在灵邱附近开始与敌作战，击溃敌人两个联队，毙敌三百余；十月十日攻克涞源城；十五日伏击广灵、灵邱道上之敌；十六日收复广灵城；二十三日克灵邱城；二十六日攻占蔚县；十二月二十七日又收复龙华，占领易县。中间战斗十余次，缴获与毙敌甚多，造成以蔚、涞、广、灵四县为中心的游击区域。骑兵支队进入河北后，于九月十九日开始击退敌骑数百于阜平之倒马关，保住了阜平；十月间石家庄失守后，又复深入到平汉线敌人后方，大肆活动；十月十八日占曲阳，后击溃进犯曲阳之敌；二十四日占唐县；二十九日占完县；十一月十一日又进占满城，开创了冀西的游击区。

这两个游击支队的迅速行动和积极艰苦的战斗，配合广大民众，发动了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经过二十余次战斗，获得了不少胜利，奠定了晋察冀军区的基础。

（二）粉碎敌人“八路围攻”的战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二十一日）

在太原失陷后，由于我军区在敌后方的创立，更由于我军区部队不断地向冀、晋腹部深入活动与破坏交通，使敌感受莫大威胁，故自敌南进至临汾以后，更企图用较大兵力来“肃清”我们，巩固敌寇的后方及其交通线，把我们晋察冀抗日力量完全“扫荡”净尽。这便是第一次对我军区的八路进攻。

这次敌人的兵种，有步、骑、炮、空军及机械化部队，兵力

约两万人，分进合击，来势汹汹，大有一举而踏平晋察冀军区之势。

自十一月二十四日起，敌人即开始了“八路围攻”行动。第一路由怀来向蔚县进攻；第二路由天镇、阳原攻蔚县；第三路由应县攻浑源、广灵；第四路由保定、易县攻涞源、灵邱；第五路由定县、新乐攻曲阳、行唐；第六路由石家庄、获鹿、井陉攻灵寿、平山；第七路由平定、寿阳攻盂县；第八路由代县、忻州[9]攻繁峙、定襄。第一路开始后，其他各路先后协同动作。但由于我军区游击队的奋勇作战，和群众的积极配合，敌人的企图终告失败。当北面之敌进攻广灵之乱岭关及蔚、浑间之北四村时，即遭我军迎击，发生激战，敌寇死伤五百余人；东面由保定、易县向涞源进攻之敌，有步、炮、骑三千余人，飞机数架，进占涞源，经我军于大小龙华予敌以袭击，敌即仓惶向易县溃退，我缴获汽车及无线电台各一，其他军用品甚多。由定县、新乐攻曲阳、唐县之敌，有步、炮一千七八百人，汽车百余辆，分进至高门屯、豆家庄时，亦均被我击退；西面自代县、忻州来攻之敌，刚一开始出动，即被我游击队迎头打击，我军并袭占原平，敌死伤百余人，即败退忻、代县城；南面由平定向盂县之敌，被我伏击，大败于清城；从井陉向小塞进攻之敌，亦中我埋伏，惨败而归。总计全部粉碎敌人“八路围攻”的战斗，从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下旬结束，在不断斗争中，敌军伤亡达一千余人，我缴获枪械子弹军用品极多。我军虽亦有若干伤亡，但敌之伤亡尤重，终于把敌人围攻的计划粉碎了。

（三）洪子店、温塘战斗（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

当敌人“八路围攻”失败后，我军战斗情绪与战斗力更加提高了，民众抗战积极性也更加发展了，因而在军区周围各条线上的活动，也就日益加紧，使敌人遭受更多损失。当时，敌人对于

晋东南一带的军事运输，主要是依靠正太铁路，而正太铁路却不断被我破坏；乏驴岭铁桥亦被我炸毁，井陉煤矿被我袭占，自来水井亦遭我破坏；自石家庄至平山之汽车路，更经常遭我袭击，敌军运输大感困难，无日不受我之威胁。于是敌人乃于一月十一日抽调步、炮兵二千五百余，由平山、井陉分两路向我房山及东、西回舍进攻。但敌由南向北之一路，首先遭我伏击于南、北马塚，敌伤亡二百余，残敌固守村庄顽抗，后敌增援部队赶到。同时，温塘方面，我军与敌之主力开始接触，双方激战甚烈，敌虽伤亡将近三百人，但因两路会合向我猛攻，我军乃暂退洪子店。敌于二十三日攻占洪子店，我军机动转移至敌军后路，积极活动于平山、洪子店之间，敌以后路空虚，经我突击挫败，至二十四日晨，即仓惶退回平山城内，洪子店、温塘终被我收复。

（四）平汉线的奇袭（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

当敌人加紧进攻津浦路与晋东南，我军反攻，主力战场战事紧张的时候，我军区部队为了配合主力作战，策应晋南反攻，于二月九日夜间，在平汉线举行了大规模袭击。分九路向新乐、定县、清风店、望都、方顺桥、保定、满城一带，全线猛攻。结果于一夜之间，克复了新乐、定县、望都三城，击毙敌军官兵数百名；摧毁了新乐、清风店、望都、保定、满城一带的汉奸维持会，捕获了大批汉奸；缴获步枪、子弹、战马、军用品极多；破坏铁路总计达数百里之长；俘虏敌军多名；新乐、望都、定县、清风店、方顺桥各车站均遭我焚毁，并焚、毙负隅顽抗之敌宣抚官等十余人；还动员了千余群众破坏铁路、电线，获电线、铁轨数万斤。同时，我军另一部于是夜袭占浑源县城，与平汉线各部队行动相配合，获得了各方称誉的平型关以后的大胜利。

（五）阜平、完县、唐县、满城之役（一九三八年三月四日至十日）

平汉线之敌，于二月九日遭我猛烈袭击后，异常震惊。敌为

保护其交通线之安全，并图残暴之报复，乃抽调大兵增至高碑店、保定、石家庄之线，总数达一万二千余人，在飞机十余架掩护下，于三月四日起，分向我军区进攻：一路由易县向紫荆关前进，于次日进占大、小龙华；一路进至满城，九日进至倒马关；一路经完县、唐县，八日进占军城北关；一路经曲阳，沿途烧杀，于九日晨进抵阜平。进攻阜平一路之敌，数达五千人，另有骑兵千余人，并以猛烈炮火轰击阜平以西之法华村，以掩护其前进。我军当时正面兵力较薄，经在曲阳、阜平大道上两度苦战后，遂放弃正面阻击，待敌深入后，我各支队及游击队在敌之侧后及交通线上猛烈袭击，敌后方损失颇重，首尾不能并顾，极感恐慌，遂于十日开始撤退。退却中因受我军截击，不敢稍停，行动慎重，竭力夺占路旁高地，并在重要村庄构筑工事，队伍分三四路跑步退却，恐中埋伏。后面掩护队更不断向后无目标射击，同时复以汽车守候于曲阳、完县、唐县各地，退却部队到达，立即登车驰奔。阜平之敌亦于十日夜间慌忙逃退一百二十里，登车后复以骑兵掩护而去。我军截击，缴获手榴弹、子弹数十箱。

（六）代县之攻取（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至四月十六日）

我军一部，于三月三日向代县作猛烈袭击，把代县的敌人驱逐向阳明堡方面溃退，缴获敌军枪弹军用品甚多，并捕获雁门关以南七县维持会会长大汉奸王维堂。与敌军相持了二十余天后，敌以六百步炮增援，我军退而复进，于四月十六日再度夺城，攻入城内，毙敌六十余人，缴获子弹、手榴弹、电线甚多。

（七）涞源大战（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十一日）

军区部队在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十一日之半个月间，与敌在涞源大战。这在军区是有重大意义的战斗。敌人于三月中旬，以步、炮、骑兵十四个联队，由易县经紫荆关进攻涞源。企图打通易、涞和涞、蔚公路，并修筑机场，选择重要据点构筑工事，以切断军区与第一军分区及伸入敌人远后方各游击队的联络，使军

区活动的范围缩小，保障敌人后方交通线的安全。敌人事先在金波构筑坚固工事，屯积大量粮食，然后即向紫荆关、涞源进攻，前后六天间，经过四次战斗，始进至涞源。但当时由于我包围涞源的部队机动、坚决、勇敢，以运动战与游击战适当配合，坚持战斗近半月之久，敌不断被我袭击、伏击、夹击，大小凡四十余战。敌军每次均遭受重大损失，伤亡达一千四百余人，我军俘获人、马、武器、辎重甚多。特别是在于善铺至浮图峪之线，敌遭我四次痛击，终于四月十一日拂晓四时，仓惶向东退却，我军当即收复涞源城，并乘胜追击，直至易县城下。此役，敌军除遗弃辎重外，尚有尸体数百具焚烧未竟，臭气冲天，狼狈不堪。总计自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十一日止，在浴血大战中，我军终于完全打败了进攻涞源的敌人。

（八）冀中各县的袭占（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十一日）

平汉线东的河间、高阳、安国、大城、献县等县，曾被敌人视为冀中的军事据点，特别是安国，敌人企图久占以为其强固据点，借以阻碍我军的活动，减少我军对平汉线东西夹攻的威胁。但由于我冀中部队的英勇战斗，自一月二十六日起，即诱击高阳敌驻军板垣师团第一大队之一、三两中队，将敌全部消灭，并击毙敌第三中队中队长。其他各路亦相继猛攻，经不断之围困袭扰，安国首先于四月八日被我军袭占，敌人向定县溃退。高阳亦于四月九日被我占领，肃清残敌，俘虏甚多。大城、献县于四月十一日前后，在我军围攻之下，亦相继收复，大城之敌向唐官屯退去，献县之敌向沧州溃窜。河间亦于四月二十四日在我军与民众武力配合之下，被我克复。至此，敌人久占五县的企图，尽告失败。而我冀中军区的基础，遂臻巩固。

（九）平西之游击（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十二日）

当津浦线主力第二次大会战的时候，我军区游击支队一部，为

策应主力，牵制敌向津浦、徐州的进攻，于三月间即积极向北平方面挺进。三月十九日，一部已占领了矾山堡，摧毁了该地的维持会，解决了该地的公安局和伪警武装。一部至门头沟，于四月十日与该地反正之保安队及警察联络，与平津开来之大队敌军激战，敌伤亡极多。又一部进至妙峰山，该地伪宪兵带了全付武装反正过来，良乡西之坨里车站警察，亦全部反正。北平四郊交通，均被我游击队切断，敌异常恐慌，将北平城门紧闭。五月十三日一时，我军分途袭占昌平县城及杨坊镇，缴获长短枪、战马、子弹及其他军用品甚多，并俘获日军及汉奸十余名。同时且有敌伪宪兵二十余名反正。良乡、涿州、涞水等县亦均一度经我收复，建立了平西游击区域，成为我军向冀东及热、察、辽边境挺进活动的根据地。

（十）石保线之扰击（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十四日）

当徐州攻守战紧急的时候，我军区部队为了配合津浦线徐州主力的战斗，除了一面派遣游击支队向平西一带挺进活动外，同时于四月下旬起，更积极在平汉线之石家庄至保定一段，不断袭扰敌人。我游击队一部于四月二十八日与五月三日两度夜袭保定，并占领南关，活捉敌军，缴获大量汽油及其他军用品，敌伤亡八九十人，我军更进袭敌之飞机场。另一部于五月三日及十四日两度夜袭方顺桥及于庄车站，与当地群众配合，破坏敌之铁路、电杆、电线数十里。同时又一部数次袭击定县，亦均获胜。致令敌人不得不以大的兵力增援到保定、定县、石家庄一带，以维持其交通，我则达到了牵制大量敌军之目的。

（十一）平汉线、平绥线的攻扰（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六日至六月二十八日）

当主力战场战事中心向武汉转移，保卫武汉战斗开始的时候，我军区部队在平汉、平绥两路沿线上，分头出动，扰乱敌人，牵

制敌人。敌曾企图报复，如六月十九日敌伪以一千五百余人进攻安国，大肆烧杀，但愈激励群众与我军战士之同仇敌忾情绪，我军各路活动愈加猛烈，连续不断地攻袭敌人占领的城市据点，破坏敌之交通，多方面予以扰乱。平汉线上，我军于六月二十日即大举反攻安国，数度激战，将安国之敌击退，收复安国，并于敌军逃窜时设伏兵击之，敌遗尸百余具，伤亡三百余人，我缴获枪械、子弹甚多。六月十八日我军复向保定之敌进攻，一度袭入保定北关，并破坏桥梁一座，敌火车一列出轨。二十五日我袭敌于正定西北之东柏棠，毙敌颇众，缴获亦多。二十八日敌我遭遇于徐水、容城间，发生激战，我终将敌军击败。我挺进纵队六月十七日一部向兴隆之敌袭击，敌在该地筑有十一个堡垒，被我攻克九个；八日又在洗马庄伏击敌人，并反攻杜家庄，均有收获。二十一、二十二两日，我军在广灵附近与敌激战，将敌击溃，并将井东集、安家皂、友宰堡之敌消灭，总计前后将近半个月，平汉、平绥两路沿线敌军，片刻未曾安宁，无时不受我军之攻扰。

（十二）纪念“七七”全线总攻击（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深夜至八日清晨）

为了回答日本法西斯的对华侵略战争，为了纪念伟大抗战一周年，我军区各部队一致决定了“七七”纪念日举行全线总攻击的武装示威运动。我们的布置：在平绥线上分成五路；平汉线上分成三路；正太线上分成二路。配备完妥后，即开始向敌人进行猛烈地攻击。

平绥线上我一路某部，于六日夜前进至门头沟东北山地一带，至当夜三时（七日三时）骤然袭击北平城西北的石景山发电厂，两座大锅炉和一个火车头顿时在英勇战士们的枪炮和手榴弹的愤怒猛击之下炸毁了，北平顿时变成了黑暗世界，枪炮声音震撼了整个傀儡的所谓“首都”，敌寇紧闭四门。我同时占领离北平不远之西山、香山。直至六时许敌人始仓惶开出援兵五六百人，并以飞

机九架协同向我进攻，我军奋勇激战至下午四时，在两度反冲锋下，最后将敌击溃。我第二路进攻北水泉堡垒之敌，在猛烈冲击下，突破敌之坚固工事，攻入堡内，虽敌企图迂回包抄我军，但终被我突破，酣战至天明，于拂晓时退出战斗。同时，我另一部占领桃花堡。第三路在广灵、西合营、暖泉间展开了激战，我将敌全部包围。后敌来援，又被我截击，敌不支，全线溃退，我击毁汽车十余辆，缴获极多。第四路在九宫口、牛大人庄与敌步、炮兵激战，我军灵活机动，攻敌弱点要害，左右夹击，将敌击溃。我第五路进攻兴隆附近花盆村之敌，将驻守该地之敌伪三十五师三十二团的一个营全部消灭。

平汉线上第一路我军两部，于六日晚向易县城、店北车站、二十里铺、门墩山等处之敌进攻，彻夜战斗，激战至七日，易县除东、西城楼有敌外，全部被我占领，直至九日午后四时，我方退出城外。此役缴获极多，店北车站亦被我克复，门墩山亦被我占领，二十里铺以西铁路、电线大部被我破坏，直至九日尚未通车。我第二路于六日开始向保定、定县、新乐、于家庄、方顺桥之线进攻，分由南北夹击，将保定南北两关占领。另一部将保定、定县间铁路一段拆毁，铁轨破坏，适有敌车开来，即行出轨，我并将敌车头炸毁。定县车站亦被我袭占。清风店伪军一班，当时在我军影响之下，即行反正。第三路在徐、满一带，以步、骑配合，袭徐水以东之王村，击溃敌伪保安大队，俘九十余人，该大队长亦被我俘获。同时，我军复猛攻满城东之曹河车站，敌仓惶逃遁。我军一部进到易县时，敌警戒部队亦被我击溃。

正太线上，我某部任第一路，于六日夜间长驱直逼平山城，当地敌守军虽众，但赖我指战员的英勇，往返冲杀，展开激烈巷战，卒将城东北门占领，因我后援未及时赶到，乃安然退出战斗。第二路我军亦于六日夜间进至正定附近，以少数部队诱敌出击，然后在埋伏圈打击敌人，敌遭惨败。我破坏交通队挖毁铁路二十余

里，并获电线三十余斤。同时，我军另一部攻入新乐及长寿车站，击毙敌之守军。

总观“七七”总攻，自六日夜间开始，至八日结束全部战斗。在此次战斗中，我军主动灵活有计划地给予敌寇重大打击，使敌遭受重大损失。总共歼灭敌军约一千四百五十人，俘虏敌伪军一百三十名，伪军反正者十二人。我缴获敌步枪共三百余支，机枪四挺，驳壳枪十二支，手枪二支，迫击炮一门，子弹二万五千余发；战马十四匹，望远镜一具，钞票一千五百元，收回电线约九千斤，炸毁发电厂锅炉两座，火车头二个，铁甲车一列，载重汽车二十三辆，铁桥两座，破坏铁路百余里，其他军用品及粮食、布匹等未计。敌除了军队伤亡及被俘与武器弹药的损失外，被我夺获及破坏的物品价值亦甚重。

（十三）冀察热辽边境的游击（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至八月七日）

六月间我派遣宋、邓挺进纵队，深入到久经敌伪统治的冀东，进窥冀、察、热、辽边境，以与东北抗日联军配合。在月余的浴血苦战中，收复了冀东十七县，不断取得很多的胜利。在我军直接影响与帮助下，当地已有的及潜伏的武装，一致联合，并形成“抗日联军”，于七月九日在洪麟阁、李运昌[10]二氏领导之下，在昌黎、乐亭、滦县、迁安、遵化、丰润等县起义。七月十九日复有唐山煤矿工人七千余人暴动响应，将北宁路截断，炸毁敌伪之矿山、油库，与日伪军进行激烈战斗。我宋、邓挺进纵队与冀东抗日联军开会，结果组成了冀、察、热、辽游击军区[11]，以统一指挥，继续长期的战斗。八月四日袭占迁安县城，七日复攻克蓟县，胜利地开辟了广大游击区。

（十四）灵寿保卫战（一九三八年九月五日至八日）

九月初旬，敌人准备向我军区大举围攻的时候，为了完成其包围计划，曾首先向我位于行唐、平山之间的灵寿作三次猛烈的

进攻。第一次在九月五日，敌于清晨五时由正定出发，前后开来汽车三十辆，步、炮兵九百余人。我军一部在化皮、塔底与敌激战；另一部由慈峪跑步赶到，将敌包围，敌不支向韩家楼逃窜，又被我军迂回痛击于南义合庄。敌由正定再度增援，我与敌前后激战七小时，敌军败溃，我追击十余里，毙敌百余人，敌以五辆汽车载尸而逃。次日，我军得报，敌已准备第二次进攻，我军乃设伏于曲阳桥，以截击敌人，至晨七时许，敌军以汽车十四辆前进，到一千公尺距离时，突向后逃窜，事后知有汉奸走漏消息。我伏击未果，但敌已恐慌逃退。八日拂晓敌复以四十八辆汽车，千余兵力，向我作第三次进攻。进至南纪城，即遭我伏军迎头痛击。敌情况不明，知中埋伏，交战不久，即向韩家楼逃退。此时我主力复从灵寿赶到，截击逃敌于同下以南，以猛烈之冲锋，将敌先头部队一百五十余人，全部消灭；后继敌军亦被我击退。我复追击数十里，再毙敌八十余人，击伤五十余人，"皇协军"[12]死一百二十余人，伤七十人，敌伪军共伤亡四百余人。总计三次进攻，敌死伤六百余人，终不得入灵寿一步。

以上所述的这些，都是我军区开辟以来直至此次敌人新围攻开始以前，比较重要而有意义的战斗。此外，还有其他大小的战斗，不及详述。但根据我参谋处所统计的结果，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军区成立之日起，直至今年十一月七日军区周年纪念日止，各兵团正式报告统计的大小战斗，凡四百三十四次。至于军区初开辟未正式成立以前，未详细统计及缺略的各次战斗，以及粉碎敌人新围攻中未总结的战斗，如果都把它综合起来，那么，我们估计过去总的战斗次数，当在六百次左右。现在只就已正确统计了的四百三十四次战斗，依东西南北各线，顺序列表于后。(略)

以上在这大小四百三十多次战斗中，我们杀伤和俘虏了很大数量的日伪军，缴获了许多胜利品，破坏了敌人许多交通工具与

建筑物，这些收获，于下列表中可见：（略）

这里所统计的，同样也只是从军区成立以后至周年纪念之日止，根据正确报告调查的数字。如果把军区成立以前和未正式报告的，以及最近未详细统计的材料，综合估计，当然还不只这个数目。

但是，我们一年来的收获，实际上还不仅仅是在于这些统计数目字上。

由于军区在华北的存在，在牵制敌人，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配合主力作战上，曾经起了而且还将继续起着战略上的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太原失守后，敌人的南进主要是经过同蒲路，然而同蒲线的铁道、公路并三条干路[13]，却都被我军区游击队袭击，毁坏了两条半（有一条是时断时续没有完全破坏）。正太路方面也受我们经常的破坏，致敌人不能方便地利用，我游击队曾不断袭击正太路的敌军运输队，获得了大量军需品。当太原失陷，正规军转移时，我们能立定脚跟，修筑了韩侯岭工事，牵制敌人，使敌人不能及时继续向南进攻，长驱直下风陵渡的企图遭受阻碍。这样，就便于我们晋南主力的休息、调整，布置反攻。后来敌人不断抽调兵力向我军区进攻，但均先后被我粉碎，我经常牵制了大量敌军于军区周围。这些都证明了我军区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在战略上起了第一步的作用。

军区部队的作战，对于全国主力的配合与策应的作用，更是被铁的事实证明了的。

当津浦线战事紧张，晋南主力开始反攻的时候，我军区部队不但采取了小队伍的游击动作，并且曾经用了大队伍在平汉线以兵团的动作，举行了大规模的袭击，攻下三城，猛烈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使敌人不得不在平汉线增兵几万以上，钳制了敌人大量的兵力，使它不能开赴津浦路和晋南参加作战，减少了敌人在主力战场上的力量，配合了全国范围的战争，造成了平型关战斗以

后的大胜利。虽然所得的战利品不及平型关之多，但已完成了配合全国主力战斗的部分任务。敌人虽然恼羞成怒地向我军区边境大肆烧杀，逞其残暴兽行，从完、唐而至于阜平，但我们所完成的光荣任务，并不曾丝毫受到动摇。战争本来是富于破坏性的，我们绝不能因一二城镇之被烧杀而忽视了我军伟大的战略作用。

再如，津浦路第二次大会战时，敌人匆忙的把兵力转移到津浦线方面去。那时我们军区部队更积极地出动，袭击敌人的远后方，以牵制其向津浦路徐州的进攻。我们的挺进部队，直逼平郊，占领了昌平、阳坊镇，使北平敌伪感到极大的恐慌与动摇，良乡、涿州、涞水也都被我军一度收复。其他如石家庄、保定等地及晋东北各县，亦不断有我们的游击队，破坏敌人交通，袭击车站，占领城市，使敌人不得不向保定、石家庄一带增兵，感到首尾不能兼顾的苦恼。北平附近的宛平，早已建立了我们的县政府，摧毁了许多伪组织，使新的汉奸政权也无法建立。我们建立了抗日的地方政府，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拥护。有的县分虽然敌人占领了城镇，但我们仍然能够建立游击政权，与汉奸政权对抗，争取广大群众到抗日阵线上来。而在保卫武汉的主力战开始以后，我们更不断在平汉、平绥线上大肆攻扰，举行了“七七”全线总攻，并猛烈地向冀、察、热、辽边境开展游击战争。这些都足以证明我们在战略上对于主力配合的作用。事实上，我们军区已往的全部军事行动，其目的完全是在配合主力作战，我们的战略任务，完全是随着主力的任务而转移；我们的利益，完全服从于主力的利益。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我们的行动，无一不是为求主力的胜利。因为我们知道：只要主力远在津浦、陇海、华中、华南，近在晋南，我们都能够与他们配合。我们有时虽然明知吃亏，也要为主力的胜利着想而勇敢作战。

除了配合主力的战略作用以外，在另一方面，我们这一军区起了各方抗日力量团聚中心的作用。自从军区成立以后，影响不

断扩大，各地群众都纷纷归聚到我们这里。有些动摇不定的少数地方军队和半土匪性的军队，也因为有我们在这里而不敢投降敌人，某种程度上保持了抗日的立场，团结在我们周围。如果没有军区的存在，我们相信还有许多新的汉奸武装可能产生，现在不但他们抗日的立场稳定了下来，而且大多数都逐渐转向积极抗日的道路上来。同时，在我们坚持抗战、英勇牺牲的精神，和不断胜利的影响之下，加以敌寇残暴兽行的刺激，使军区周围许多被逼迫而暂时屈服于日寇暴力底下的武装同胞，纷纷率领部队，脱离了伪组织羁绊，举义归来，重新投入祖国的怀抱。在军区部队过去大小战斗中，各地武装反正的同胞，或一班，或一排，时有所闻，且互相影响，逐渐使武装反正成为一种热潮，反正的数目日益增多。仅就今年八月份以后说：八月二十二日有满城“警防队”石振声部四百余人起义归来，八月二十五日保定“警防队”八百余人在李允声、王彦东率领下，和徐水“警防队”四百余人，同时起义，并与石振声部会合，同来军区。最近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复有从永清县河头之“皇协军”四千余人全部武装反正。这些武装归来的同胞，我们都已经在并且还要继续在抗日神圣民族解放战争中，完全证实其英勇、坚决与忠诚。他们都是伟大中华民族优秀的男儿，高度地热爱着祖国，愿为祖国的自由、独立和光荣的胜利而奋斗到底。此外，还有许多仍然在敌人压迫下的武装同胞，时常给我们传递消息，或捐输抗日经费给我们。这样，使我们军区更加成为一切抗日力量团结的核心，而敌人在华北的统治更加动摇。

尤其特殊的是：军区的周围，紧接着晋东南、晋西北、冀察热辽和冀中等区域，而灵活巧妙地配合包围着占据几个大城市和交通线的敌人，成为华北军事上的一个最重要枢纽和收复华北及东北的前进阵地。这一地理上的特点，使军区更有力地威胁和影响整个华北，控制华北敌人交通运输全线及其后方的命脉。

然而，这些还只是偏重于军事方面的考查。实则，我们一年来在敌后英勇地坚持着长期的战斗，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得到重大的收获。

在政治上，最明显的，谁都知道，当国军南撤时，华北正到处酝酿建立伪政权，有的且已建立，但由于我游击战争猛烈的发展，收复了广大领土，并恢复了边区数十余县统一的地方政府，使已建立的伪组织全部被摧毁，未建立的始终无法建立，使敌伪欲实现其对于华北统治的企图，完全失败。而边区一年来巩固与发展的事实，不但在国内更加坚定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争取胜利的信心，促进了其他沦陷区的游击战争，而且在国际上粉碎了日寇已经占领华北的欺骗宣传，增加了外国人士对于我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甚至如美国的人士，还来电愿帮助将边区的救国公债在美国推销；美国医院愿意到五台进行救护与治疗工作。这样使国际对我的视听起了很大转变，使他们了解到：日本占领中国的某些城市是一回事，而能否统治已占领了的区域又是一回事。从而，国际间对于我国抗战所抱的态度愈趋有利。这些都不能不说是政治上重大的收获。

在经济上，由于我军区的建立、扩大与巩固，边区政府战时经济政策的实施，保障并改善了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经济，特别是促进了战时的农业生产；确定了商业贸易与金融制度，保护了民族经济，并且使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打击了敌伪经济，使敌人不能顺利地掠夺边区所生产的原料，无从继续其对于广大华北人民的榨取与剥削，更无法开发和利用我华北的资源，以补日本国内经济的枯竭，从而难以支持对华长期侵略战争中财力、物力的供给。

无疑地，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都是我们一年来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的，坚持抗战，不断顽强地战斗的收获。

三、日寇的新围攻和我们的反围攻斗争

正因为我们军区在过去一年的斗争当中，不断打击敌人，取得了军事、政治、经济上各方面的许多胜利与收获。对外的影响，尤其是在国际的影响，不断地扩大与提高，引起敌人极大的不安与忌恨。同时军区地理位置重要，更成为敌我在华北必争的场所。敌人欲肃清华北各地区的抗日势力，必然首先要进攻成为华北重要枢纽的晋察冀边区，企图首先消灭这个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堡垒，除其心腹之患，然后继续进攻其他区域。因此，在过去一年间，敌寇曾不断抽调大军，向我边区进攻，虽然过去的那些进攻都先后被我粉碎，但是敌人进攻的计划，却不曾因此而中止，反而随着我军区的继续扩大与巩固，更疯狂地更有计划地向我们举行更大规模的围攻。

最近敌人就是这样举行了对我军区新的围攻。在这一次围攻中，敌寇所动员的人力、物力、财力，较过去任何一次都多而且大，并且还在政治上采取了更毒辣更巧妙的方式，更有计划地配合它的军事行动。因为敌人对于我们军区首先就有了很高估计。就我们所看到的，在敌伪报纸的社评上，曾经用尽一切挑拨离间的字眼，无耻的诬蔑之词，大吐狂言，煽动对我军区的进攻。它们对我们军区的估计有如下文字：

“数月来中国共产匪军，即所谓朱德麾下之第八路军，乘日军大举围攻武汉之际，肆意猖獗于晋北，察南，冀东诸地……惟查彼等匪军之总巢穴，乃在山西省北部高峰之五台山附近，上述各地皆属支蔓。不图近日益居心不逞，意图扰乱内长城线，威胁京师，日军坐视不忍，遂决心分兵围剿，开始犁庭扫穴工作……以价值论，汉口、五台，各为党军及共匪军最后根据地，日军之一面围攻武汉，一面进剿五台，军事收获一般伟大。”（见十月十六

日汉奸正报的社评）

其他敌伪军通讯中，就我们所得者言，也都经常有此类文句。如敌寇的同盟社电讯曾云："五台山岳地带为共产军在山西蠢动之策源地，更为向山西、绥远、京、津诸地方实行赤化工作之根源。"（见十月五日汉奸正报载同盟社四日电讯）

在这些夹带着诬蔑谩骂的文字里，恰恰表示了敌寇对于我军区所给予它的威胁与打击，感到了极度深重与不堪的苦恼与仇恨情绪。而它对于军区的估计，也就使它不得不以相当强大的力量来应付我们。

的确，敌人此次对于我军区的新围攻，是集合它过去一年间屡次进攻失败的经验与教训，经长期准备计划之后，集中一部分力量，慎重地采取了新的战略战术的大规模围攻。

这一新的围攻战斗，是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日开始的，而且直到今天，这一围攻的战斗还没有完结[14]。

本来，敌人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计划与准备之后，自九月十日起，即已开始抽调兵力，纷纷向我军区周围各交通线增兵，直至九月二十日止，军区周围交通线上的敌人，总计已达二万人以上，至九月三十日止，敌先后向军区周围继续增兵，总数达三万余人。敌人的战术在此次大围攻中，有相当改进，敌军的动作一般都非常慎重，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步步靠拢，非有特殊情况，不轻易深入，前进路程甚短。且沿途所过，以各种新方式进行其政治欺骗，掩饰其残暴的烧杀、抢掠、奸淫之兽行。

这一次敌人围攻的军事行动，大致上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敌人第一步的围攻计划，占据军区周围铁路沿线重要城市为据点，以备深入。此时敌人以二万余兵力，首先从东面开始进攻，分兵三路西犯：第一路由定县出动，第二路由望都出动，第三路由保定出动。我们最初拟在敌人分进合击之时，即予以猛烈地各个击破，如晋东南粉碎围攻

一般。但是，因为敌人此次围攻边区的战略战术与边区的整个形势，与晋东南都有很大的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得不运用其他方式以对抗敌人。因此，当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开始进攻时，我们就避免正面不利的战斗，仅以少数部队与敌接触，只在特定的有利条件下打击敌人。当定县之敌进攻曲阳，进至七里庄时，我某部主力由李赵邱出击，与敌激战三小时，杀伤敌军百余人。当敌增援部队由某司令官率领进犯时，我即撤退，至乔家马时，则复以激烈之战斗，毙敌五十余人及骡马数十匹。从望都出动之敌，入唐县店头镇时，我军乘有利时机予以迎头痛击，激战竟日，将敌击溃于麻黄头附近山沟中，歼灭百余人。后敌增援，施放猛烈炮火与毒气，我复撤入山沟中。虽然敌人终于先后占领了曲阳、唐县、完县及吴村镇，我军未能阻止其前进。但我们在敌优势兵力下也并不企图阻止其前进，以争取在对我有利的情况下，给予突击而消耗之。当敌人占据沿铁路线各城镇据点后，战斗即从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自九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敌四面增兵，进行第二步的围攻计划。以二万三千左右之兵力，分十路向军区内地进攻：第一路由曲阳向阜平、龙泉关；第二路由忻县、定襄向东冶、五台；第三路由盂县、上社、柏兰以趋五台；第四路由代县、繁峙向峨口、五台；第五路由浑源向大营；第六路由广灵向灵邱；第七路由蔚县向来源；第八路由易县经紫荆关向来源；第九路由正定向灵寿；第十路由平山经温塘向洪子店。此时，敌仍继续增兵，截至三十日止，已达三万余人。这一阶段中，敌人的战略是以步、骑、炮、空军、机械化部队向我军区腹地猛烈进击。我军此时则以尽可能阻滞、牵制，大量消耗与个别击溃敌人为目的。

其时，东线敌军于二十四日由曲阳进至刘家马时，首先被我游击队伏击，敌军溃败，大肆烧杀，退回曲阳，在附近修筑工事，并以飞机向党城一带侦察。二十七日乃分兵三路来犯，其主力则

进入党城、灵山与王快之线。十月三日敌乃进窥阜平，我军占据方太口附近，仅以一连之兵力向敌英勇突击，将敌主力数百人完全击溃，敌仓惶退窜东土林口，我追击十余里，毙敌百余人。同时，我军一部在王快镇北伏击向阜平继进之敌，复与敌激战三小时，后敌以大军增援；五日，以步、骑、炮兵三千五百余人向阜平猛进，我军再度侧击于东、西庄、方太口一带，战斗一日，毙敌三百余，敌乃以飞机大炮掩护，发射四百余炮弹，内有毒瓦斯弹百余发。六日午时，阜平被敌占领。

北面之敌三千余人，于九月二十日后，自蔚县、广灵、易县向南深入，经我迎击于冯家沟、圣佛寺、吉略沟、灵邱各点，先后消灭敌五百余人。至十月一日，敌人始进占涞源，复图南进，被我击溃于插箭岭，敌伤亡甚重，退回涞源城。

南路之敌，自盂县进抵神泉时，以主力绕道攻上社镇，遭我某部袭击，伤亡达四百余人。二十九日晨，敌复渡滹沱河，由清水[15]部队长率领，逼近柏兰镇时，我军展开兵力，英勇冲杀，敌被夹击于山沟中，伤亡惨重，清水部队长亦被我击毙，造成此次反围攻中有名之柏兰战斗。此时自平山、井陉进犯之敌，亦与我激战于温塘，敌四次冲锋均被我击退。洪子店失而复得者凡两次，终被我反攻夺回。敌谋夺灵寿城亦未得逞。

此数方面敌人，在战斗中，均有重大损耗。后敌自西面定襄出动，与代县之敌配合进攻五台，于九月二十三日进至东冶、河边村，与我两部分部队接触，我即退入东部山地，敌乃于十月三日进占五台城。

至此，敌已先后进入军区中心各据点（阜平、五台、涞源、灵邱），乃结束第二阶段之战斗，进而开始第三步之进攻。

第三阶段自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十五日。此时敌占领各据点后，遂企图向我腹地“搜剿”分进合击，缩小我活动区域，以期肃清我军，实现其第三步进攻计划。

我军此时对续进之敌，诱于适当地点而消灭之。对据点之敌，期以围困、逼退，在退却中消灭之。

当时五台之敌三千余人，配合东面及北面之敌，分路向我台怀镇进攻，各路分进合击，均企图在石咀、台怀之线与我军决战，一鼓而歼我。但我军先将主力隐蔽于山地，集结待机，仅以小部队与敌保持接触。敌各路分进合击，步步深入，最后却扑了个空。乃发觉我主力转移于山地内，前后向敌成包围形势。敌恐慌万状，急奔回台怀，我复以小部队截击其辎重，敌遂弃台怀向沙河逃遁。其时，敌另一部自五台退回盂县，沿途遭我不断追击与截击，敌狼狈窜走，我夺获辎重一部。进攻灵寿之敌，因屡遭击败，复图进攻，于十月九日进至距城十二里之同下附近，被我伏击，亦终仓惶败窜。此时，据守边区腹地各据点之敌，因我民众坚壁清野，极感恐慌，搜剿我主力之目的又未达到，已陷入困难状态。敌人的进攻计划至此已开始失败，我军布置反攻，驱逐敌人，粉碎敌人的围攻，也就在这时开始了。于是战斗遂转入第四阶段。

第四阶段自十月十五日起，直到现在（十一月七日）还没有完结。这一阶段中，敌完全处于困守的状态，我军则坚决机动，不失任何一个有利机会，抓住敌人的弱点，予以严重的打击，并不断在敌人前后左右截击其辎重，断绝其交通，积极地袭扰、迷惑敌人，使敌人后方交通无法维持，各据点的敌人陷于孤立，造成我主力有效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粉碎敌人围攻的有利条件。

首先，东线占据阜平之敌，经我军截断其后路，与之进行了十九次战斗。其中，尤以十月二十日截击党城、王快之役，予敌严重打击，计截获敌大车二百余辆，歼敌三百，击伤敌军无数，敌损失惨重。高门屯夜袭，冲破敌之铁丝 网与工事，复将敌在高门屯所设粮站中的粮食全数缴获，使党城、王快、阜平之敌，更形恐慌。于是，阜平城之敌千余乃向后增援，而我另以有力之一部复于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次夜袭困守阜平之敌，继之以一日之

激战，敌死伤极重，遂于二十七日晨以飞机掩护，大量施放毒气，弃城向东逃窜。我军从后猛追，再度击溃逃退之敌军于王快附近。敌军固守王快，我复发动群众，协同部队，炸毁王快、党城间之石高崖，并破坏党城、曲阳间之青阳贯道路，敌给养运输益感困难，乃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十八时放弃王快向党城退走。

南面之敌，几次进攻，均遭受打击与失败，仅占领温塘一点。但因我某部于十月初进至正太路之娘子关、寿阳、盂县、平定一带活动，破坏敌之交通、截击辎重，不断袭扰敌人，遂使进攻平山、温塘、盂县之敌，不得不抽兵回去，维持其后方之安全，使前面进攻之部队改为固守，仅留少数敌兵，扼守据点。

北面蔚县、广灵、暖泉、西合营、涞源一带之敌，因遭我某部不断袭扰其平绥线后路，大感恐慌，急调兵向平绥线移动，以维持其后方之安全，各据点留部队固守。十月十八日，我军一部在广灵南之张家湾附近设伏，截击敌独立第二混成旅团之步炮兵八百余人及汽车二十辆，激战终日，敌伤亡过半。旅团长常岗宽治少将、归森炮兵大尉、山奇少佐及另一步兵中尉均被我击毙。是役，我获步枪五十余支、轻重机枪七挺、山炮一门及其他军用品甚多。十月二十一日晨，由广灵南至张家湾之敌复被我某部击溃，毙敌四十余人，俘虏晒叶中尉一名及汉奸一名，缴获亦不少。十一月七日，我复在涞源、蔚县间之明堡，伏击敌汽车三十五辆，敌军四百余人被我完全消灭。

西面敌自占据五台后，我军某部即向同蒲路东西两方不断活动，打击敌之运输辎重，使五台之敌亦不得不抽兵维持同蒲沿线之交通。此时，我军一部即移至定襄东北地区活动，准备打击五台之敌。十一月三日，敌从五台抽调四五百人，迅速秘密行动，于黄昏出发，以一夜之行程，深入高洪口附近，竟图袭击我驻防部队。我以一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另以有力之一部由柏兰镇西之绕头出动，绕至石盆口附近，截断敌之归路。敌于黄昏时由高洪

口退回至河口附近，恰中我伏，激战一夜。至次晨十时，将敌全部歼灭，计缴获大炮三门、小炮四门、步枪三百四十二支、轻机枪三十一挺、无线电一架、战马一百五十三匹，及其他军用品甚多。五台城内之敌，震惊异常，惟固守待援。

总观敌人此次以雄厚之兵力配备，凶猛的来势，对于军区的大围攻，其目的本欲从四面八方“扫荡”我军区，完成其肃清华北抗日武装力量的第一步计划。但是敌人这一“扫荡”的目的，在今天来说，已经是失败了。除了烧、杀许多房屋、居民，掠去台怀镇上的大批“破鞋”（当地娼妓之别名）之外，不但毫无所获，反而折了常岗、清水、田原、归森、山奇等数员将校。这些将校之被我击毙，就在敌寇的报纸上也已逐一登载而证实了。即如我们偶然得到的十月七日的日本福岗日日新闻报上面，恰恰就载有十月六日同盟社所发关于那位在“山西肃清战”中著有“赫赫武勋”的清水大佐战死的电讯。该报所载如下：

“……而在这些将校的死亡之外，其兵士死伤的人数，更不在少数。”截至最近止，据十一月七日合众社的电讯，日军已死伤七千人；而据我们在战斗中杀伤敌人所已得的统计言，亦达五千以上。我军固亦有壮烈之牺牲，而敌寇所喋喋不休的“犁庭扫穴”，结果就不过如此。

当然，我们所以能够在战斗中严重地打击敌人，得到这些胜利，完全是依靠着我们全体指战员在战斗中发扬了最高的英勇牺牲、坚决奋斗的精神。在军区过去一年间的战斗中，我们部队各级指挥员与全体战斗员，都发挥了高度的牺牲精神。我们的高级指挥员周建屏、朱仰兴、辛力生、陈宜盛、吴起凤、何兴云、张向松、崔明山、张妙轩、赵汝勤、纪振雄、刘裕勤、王德平、赖洪文等就是在过去一年间无数次不断的英勇战斗中牺牲了的。还有无数英勇的指战员，也都光荣的流尽了他们最后的一滴血，而在这一次反攻日寇新围攻的战役中，我们的部队，无论是直属队

或是各分区的部队，许多干部和战斗员更是表现了顽强战斗的积极精神，造成了许多壮烈光荣的模范，下面所举的就是那些模范例子的一部分。（略）

由于这些干部和战斗员的无限英勇卓越的战斗精神，敌人虽然用了优势兵力，向我们疯狂进攻，终于遭受了极严重地打击，走向失败。至于敌人此次配合其新围攻而施展的政治上的新阴谋与欺骗，更遭受了我边区有民族觉醒的广大人民，一致强烈的谴责与彻底揭破。事实上，敌寇汉奸在这次围攻中，所施展的各种分化、离间、欺骗、造谣、挑拨、中伤的新花样，基本上仍然是它们过去所用的那一套卑劣恶毒无耻的惯技，不过采取了一种新的手段与新的表现方式罢了。而这种旧阴谋惯技的新表现方式，也难以欺骗有一年斗争经验的边区人民了。

敌寇及其御用的走狗——汉奸、托派，因为看到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日趋扩大与巩固，成为不可战胜的全民抗战的力量；因为看到了晋察冀边区是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域，边区人民有坚强的团结，成为日本强盗的心腹大患；它们为着要集中力量，分裂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裂边区人民的团结，企图达到它们灭亡中国，灭亡边区的目的。因此，它们在这一次进攻边区当中，首先就分裂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提出“剿共灭党”、“灭共保安”等基本口号，还采用了“专打八路军，不打别的军队”、“专打八路军，不打晋绥军”等手段，以侮辱我抗日各友军并进行其欺骗宣传。企图诱惑我友军将士“投诚”。而对于边区某些部队，故意表示虚伪的所谓“互不侵害”的“亲善”态度。同时更无耻地扬言：“皇军是百姓的救星，不要听信红军匪徒”，企图分化边区人民与抗日部队的团结，以期达到它各个击破边区所有抗日武装，最后灭亡边区的阴谋目的。但是，我边区广大人民，从他们过去血的经验中，都清楚地了解到敌人这一恶毒阴谋。八路军坚决、英勇，不顾一切牺牲，为保卫领土主权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而流血斗争的事实，边区的人民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些野兽般的所谓“皇军”，残暴的奸淫、抢掠和烧杀行为，对于边区人民，更是一个铁的事实，证明它们才是真正的“匪徒”集团。日寇扬言“只打八路军”，正是在边区人民面前，证明了八路军是最坚决的抗日武装力量，使日寇最感威胁。这更增加了边区有觉悟的人民，对于八路军的爱护。而我边区各抗日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始终都知道，他们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忠实儿子。都明白认清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大家始终是站在一条战线上，为驱逐日本强盗，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战。在我们部队政治工作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的宣传、解释之下，边区各部队的团结和广大人民对于抗日军的拥护与帮助，更有了积极的表现。日寇的无耻分化政策，事实上已全部粉碎，无所施其伎了……

日寇因为看到它过去一贯的烧杀、奸淫、抢掠政策，遭受了全边区人民的无限愤恨与反抗，更加激起了边区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烧杀的怒潮，对它企图征服边区、奴役边区人民，在边区进行较长期的战争，而谋建立对于边区的统治是不利的。因此，日寇在这一次围攻边区中，为了掩盖它到处烧杀、奸淫、抢掠的野蛮强盗行为，乃改变策略，扬言：“只烧通八路军的老百姓的房子”而不实行普遍的烧杀政策，企图减轻边区人民对它的仇恨与反抗。同时在另一方面，更企图借此政策，以离间边区人民与我军的亲密团结，欺骗落后的民众，达到它对边区人民长期的血腥奴役统治的阴谋目的。但是，日寇并不能因此就得到丝毫的结果。它终于无法换回和掩盖它过去的丑恶暴行。日寇以往在边区各地的屠杀、奸淫、抢掠和焚烧，还非常鲜明而沉痛地刻印在边区每一个人民的脑海里。而且，在此次围攻中，敌人仍然在继续烧杀、抢掠与奸淫，特别是在敌人遭我重大打击之后，必大肆烧杀以为报复，已成惯例。这使得边区人民更彻底地认识了：要根本逃脱敌寇的焚烧、屠戮，只有积极勇敢地参加作战，用全体

人民的武装力量，驱逐日寇出边区。敌寇笑里藏刀的欺骗宣传，终于被我们用铁的事实粉碎了，下面的一段通讯，就是最好的例证：

敌人此次败溃退出阜平时，沿途各线大肆焚烧，大沙口、甘河、沟口、大园、河口、全庄、社里、四里庄、庞家庄等地，全遭烧毁。铁蹄到处，尽成焦土，大量同胞，无家可归。被灾民众，对日军之残暴兽行，莫不痛恨入骨，对日寇之“只烧八路军不烧老百姓”之欺骗宣传，更彻底明了云云。（十一月七日抗敌报）

虽然敌人在此次围攻中，收买雇用了一些汉奸，并用飞机散发反宣传的标语、传单，动员了许多人力、物力，集中大部分力量，从政治上进攻我们，以配合它的军事进攻。但是，敌人只能利用少数的汉奸造谣，而我们却有千百万人千百万个口舌和他们对抗，响亮的回答并彻底地打击了它们的欺骗造谣；敌人只能用飞机在几个城镇上撒一些满纸荒唐无稽与不通的传单，而我们却有深入山沟小道偏僻角落的无数宣传品；敌人有汉奸新闻纸，而我们也有抗敌的民族报纸[16]；敌人只能无耻诬蔑造谣中伤，而我们却以堂堂正义与正确的真理来回答它。敌人在此次进攻中，狂吠着：“军区司令部打散了”，“边区政府打塌了”，而我们的军区司令部，却安然地指挥着广大的部队，步步粉碎着敌人的进攻；我们的边区政府，在战争中却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各级政权机构，更加有了新的改进，愈益适应于战争的环境与要求。

特别重要的是：在敌人残暴的围攻之下，全边区的人民，在地方群众团体的领导之下，更加团结在政府的周围，更加和军队打成一片，积极地从事于战争的动员，积极帮助和配合军队作战，以至于更勇敢地直接参加战斗。因为，边区的民众运动在过去斗争的一年间，已经奠定了相当强固的基础。在历次打击敌人，反抗敌人进攻当中，都造成了许多光荣的纪录。而在这一次反抗敌人新围攻的斗争中，更表现出了伟大的力量，取得了许多优异的成绩，成为我们粉碎敌人围攻，争取胜利的基本因素之一。

当敌人开始进攻时，凡敌人所经之处，民众普遍地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所有粮食、用具、一切生活必需物资，都搬运埋藏了；老弱妇孺都预先迁走了；交通路口重要道路都破坏了，把敌人封锁围困起来，不但使敌人企图趁秋收之后来抢掠粮食以补救它的粮食恐慌，或焚毁我们的秋粮以困毙我边区人民的计划归于失败，反而作茧自缚，自取困毙。在我民众彻底实行坚壁清野之下，敌人的行动休止，都感受到极大的困难与痛苦。边区各地的民众，在此次反围攻作战开始时，就自动有计划地组织了各种战时动员委员会、工作团、慰劳团、突击队等，帮助政府实现战时动员计划，鼓励士气，加强地方工作。在边区新闻报纸上，满载着此类消息。（略）

这一广泛的全民抗日怒潮，目前正日益澎湃于整个晋察冀边区，牵引着广大人民，走进长期残酷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洪流中去。我们依靠着广泛的群众运动这一伟大力量，依靠着群众游击运动的开展，已经取得有利条件，开始粉碎敌寇对于边区的新围攻，而且将继续更有力地最后粉碎敌寇的新围攻。虽然，目前边区的群众运动，还存在着许多弱点，还有待于全边区的民运领导者与工作者和全体人民继续努力、推动与改进。然而，无疑的，它已经成为我们争取反围攻最后胜利的有力因素之一。

目前，我们正继续运用着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集中和配合各方面的力量，把进攻边区的敌人从它现在固守着的不多几个据点中，继续一个一个地打出边区去，达到完全驱逐敌人，彻底粉碎敌寇新围攻之目的。我们相信有力量把敌人全部从边区里赶出去，犹如我们相信我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必能取得最后胜利一样，将来胜利的经验与事实，必将最后证明我们是有力量最后战胜敌人的。

四、边区抗战的经验对于全国抗战的教训

我们晋察冀边区，在这一年当中，在敌人不断的围攻底下，曾经遭遇了无数困难。许多客观的，自然的，历史的，政治和经济条件限制着我们，给予我们工作上许多障碍。然而，在我们主观的努力之下，我们毕竟逐渐克服了那些困难，逐渐改变了客观条件，逐渐扫除了那些障碍，在敌人血腥铁蹄践踏过的旧领土上，建立了这样一个抗日根据地。

一年来所得到的一些成绩，虽然是这样的微弱而有限，然而它所给予我们的也不无经验与教训。全盘的整理这一经验与教训，还不是此刻所能够的。不过在总的方面，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提供一些，以供参考，增强我们抗战的信心。

如果要问这一年来的成绩是怎样取得的？在基本上，我们的回答是很简单的。

第一、由于我们高举起了鲜明的民族自卫战争的旗帜，使边区内广大人民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了起来，“一切为了抗日”；施行了各种抗日的政策；建立了抗日的地方政权、抗日的民众组织及抗日的武装部队，把边区内的一切力量，都发动到民族自卫的抗日武装斗争中来。

第二、由于我们紧握着统一战线的武器，在“一切为了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把全边区各党各派、各阶级、各阶层、各种族、各职业的一切抗日人民都团结在统一战线的堡垒中，彻底破除一切成见，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一心一德地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虽然，在开始时曾经发现个别分子及个别地方，违反甚至破坏统一战线的现象，但由于各方领导者及工作者，都一致坚决地和那些不良现象及一切不正确倾向作不懈的斗争，终于迅速地纠

正了。使边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飞速的扩大与巩固起来，得到了伟大成绩。

第三、由于我们在全国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战区司令长官和朱、彭总、副司令的统一意旨与统一领导下，积极地本着自力更生国策与既定的战略方针，坚决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抗战，依据各时期总的战略任务，适应主力的要求，配合主力战斗，不顾一切牺牲，勇敢作战，而取得许多胜利。

第四、由于八路军出征以来英勇奋斗，不断打击敌人，博得了华北各地广大人民的拥护，在民众中建立了威信，民众欢迎我军到来，乐意接受我们干部的领导和接纳我们意见，使我们的工作能够比较顺利的开展。

第五、由于我们各级干部，一年来脚 踏实地埋头艰苦工作与英勇的奋斗牺牲。各分区及直属队各部门干部，大多数都发扬了高度积极性，用了最大的努力，尽了最善的心思。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培育造就了大批中下级干部，巩固与改造了许多部队，恰当解决了干部的缺乏；以及后方勤务部门领导同志的勇敢积极负责，供给、卫生等工作的迅速改善，提高了工作效率。各部队中，连、排以上各级干部在指挥战斗中坚决勇敢，英勇卓绝，壮烈牺牲的模范精神。这些都积聚成了伟大的成绩。

第六、由于边区军政党民的高度一致与亲密合作，以及民众的热烈帮助，军区部队真正成为边区政权的主要支柱。部队经常与地方政府密切联系，军队帮助政府，保卫政府，严格遵守政府的法令。军队和民众团体也保持了正确关系，真正成为民众的军队。政府确定全盘施政方针，一切经过政府，但政府也不干涉军队及民众团体的工作布置与内部生活。民众团体完全有其自己的独立性，对军队及政府有批评、建议和弹劾之权，但也不干涉军队和政府。人民积极帮助政府和军队。军、政、民三方面密切配合工作，各级政府都按时举行政军民联席会议，如边政会议、县

政会议、区政会议等，协商决定一切大小问题。而民众自动热烈帮助与配合军队和政府，尤其表现出伟大的力量。如果没有民众的帮助，在这一年多的斗争中，我们将不可能取得这些成绩。

就因为我们高举着鲜明的民族自卫战争的旗帜，紧握着统一战线的武器，在全国最高统帅蒋委员长领导和战区司令长官及朱、彭总、副司令的统一领导之下，各级干部发挥了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获得军、政、民的高度亲密合作与民众的热烈帮助，正确地运用了游击战术，发挥我们自己的一切长处，抓住敌人弱点，我们才得到了许多战斗胜利。

当然，要取得战斗胜利，特别是在敌人远后方被包围区域中的部队，要取得战斗胜利，必须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尽量发现和制造敌人的弱点，攻击它的弱点，以达到消灭敌人，发展自己的目的。一年以来，我们在战斗中的经验告诉我们：敌人的弱点是能够找到的，尤其是当敌人深入到山地区域，它的弱点也就更加暴露，更有利于运用游击战术去打击它。

敌人的弱点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第一、敌军作战不能离开它的交通线，一旦离开了交通线，运输联络就感到万分困难，尤其是在我方民众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之下，敌人的给养，不能就地取给，必须随军携带。而深入山地区域，交通不便，携带大量的食用物品，辎重过多，势必影响军队的行动，增加了部队的滞笨性。我们的游击队就最便于袭击它，截击它。譬如敌人此次进攻五台的部队，就曾经用了将近一千匹牲口，携带大量辎重，每日行军至多不过十余里，经我军截击于柏兰镇附近，遭受重大损失，清水大佐亦因而阵亡。该部敌军，虽有优越的装备，亦终不得不停止前进，直待忻口、代县两路分进部队到达后，才敢继续前进，抬着清水的棺材进了五台城。收复阜平的战斗中，也是如此。当时敌军因给养困难，由党城方面以大车骡马载运粮食及军用品，被我骑兵及步兵在定县、曲阳间及

党城、王快间予以截击，各歼敌三百余，缴获大车二百余辆；阜平敌军立即感受极大威胁，这些都证明敌人一离开了主要交通线，即陷入困境，而遭受失败。

第二、由于敌人必须依赖其交通线而生存，因而就造成了第二个弱点。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敌人占据某一据点之后，如果它的后方交通被破坏，被切断，据点中的敌人，立即陷于孤立危殆的状态，无法存在，结果非败退即被消灭。最近我军收复阜平的战斗，就是最好的例证。当时，敌军极力修筑了从阜平至曲阳的一条道路以为其运输交通线。经过我游击队不断袭击其运输队，最后击溃敌最大之辎重队于党城、王快道上，终使阜平之敌陷于困境，在我主力继续猛攻之下，遂不得不败退而谋固守王快镇。但此时敌集结于王快镇的兵力，仍然不少，而其后路交通仍未遭受猛烈地破坏，照一般的情形说，敌人还有固守王快而进一步再向阜平反攻的可能。然而，由于我们发动了地方民众的武装配合游击队，彻底破坏了党城、王快间之石高崖和曲阳、党城间之青阳贯这两段道路，使敌人的联络运输完全不可能了。固守王快之敌，遂失其存在之依靠，因此就不得不放弃王快，往东逃窜。只就这一件事就足够证明，在后路交通断绝的条件下，据点中的敌人即无法立足。

第三、敌人弱于夜间战斗。因此，它最怕的也就是我军的夜袭。但是敌人最害怕的东西，我们偏要最喜欢它、运用它。事实上，夜袭确是最易得手的。用不着充分的火力准备，只要我们有最顽强的战斗力，不管敌人有多么严密的戒备，我们总是会得到胜利的。因为敌人畏惧夜间出动，所以当我军袭击其据点时，敌人只有固守顽抗，以待天明增援。如果我们能够坚决执行夜间战斗的任务，在天明以前，坚持予敌以猛烈之袭击，则在敌人未增援而亦不能增援的情形下，即不难胜利地结束战斗。此次反围攻中，我军在高门屯的战斗情形即是如此。敌人在高门屯设有粮食

站，周围装置了几层铁丝网，并筑有工事。但我负担夜袭的部队，坚决勇猛地攻击，终于冲破了敌人的铁丝网与工事，消灭了固守顽抗的敌人，焚毁了敌人的粮站，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敌人的增援部队，直到我军胜利凯旋之后，还没有渡过它那畏惧出动的时辰。

第四、敌军在山地区域里，不但机械化武器大半失掉作用，而且部队的转移运用也感到极大的困难。大的队伍在山沟里无法展开，较少的小队伍离开据点单独行动，更不敢轻易深入。过去一年的经验是如此，最近在敌人新围攻中我们所得到的经验仍然是如此。如最近的河口战斗，敌企图以四五百人，深入高洪口袭击我军，结果被我伏击于河口，全数歼灭，给予了敌人深入进攻的企图以一个致命打击。现在事实完全证明了敌人要想深入山地寻袭我军，是不易的。而我们却可以经常举行山地袭击与伏击，有计划地根据地形、敌情，适当部署，不难消灭敌之一部或全部，这是敌人最感头痛的。

第五、敌人有一种可笑的机械的惯性，由于其要保持所谓皇军的威严，怕失面子，因此在每次遭受我军严重打击之后，第二天必定要派兵进攻，并大肆烧杀，以为报复，这几乎没有例外，无形中成了一种有规律性的行动。但是，这恰恰又便于我军准备布置，继续予以打击。只要预先适当配置相当兵力于一定地点，伏击敌人，总不至于落空的。因此敌人往往遭受一次严重打击之后，必将继续遭受一次打击而后甘心。

这些都是就山地作战的经验说的。至于在平原区域，一般人总认为敌人有很多优越的作战条件，而且事实上，敌人机械化部队，在平原也的确能够发挥它的威力。然而，这是否能做出结论说："平原的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呢？这个结论是不正确的，国内已经有不少文字指出过了，同时也有许多事实证明过了。我们在冀中区一年来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

(关于这一问题，吕正操同志曾有专文论述)。这一年来的经验，完全证实了：就是在平原区域，由于我们取得了广大群众的掩护，侦察敌情，对敌封锁我方消息，我们的部队仍然能够秘密地运动，随时打击敌人，获得不断的胜利。虽然敌人武器比我们强，机械化部队在平原容易发挥威力，而我们没有机械化部队与之对抗，但我们可以利用的道路总比敌机械化部队为多，且村落多甚为荫蔽。最近敌人进攻冀中区时我们所得到的新经验，又证明了我们的短处也是可以克服的；敌人这个长处，还是没有保证可以充分发挥出来的。

最近我们在冀中区把所有的交通大道以及田野，普遍挖掘近丈深的壕沟。大道当中的壕沟可以通大车，路两旁沟沿上，可以通自行车和牲口，田野上的沟壕里，一样也可以通大车。这样就使得敌人机械化部队的坦克、装甲车等活动，大受阻碍，到处碰壁。这种普遍的壕沟，并不象寻常道路破坏后那样容易修复。过去敌人对于我们破坏了的道路，能够在很短时间内修复，现在对于这种普遍的大壕沟，一时无法修复了。可是我们军队在普遍互相联贯的大壕沟中，运动却更加便利，更能够隐蔽前进，接近敌人，袭击敌人。当然，这样普遍的大规模地挖壕沟，构筑工事，不是军队能够单独完成的，而是要动员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完成的。各个村庄同时动员，既普遍又迅速。群众在正确说服解释的政治动员之下，都非常踊跃地参加工作。就是他们自己的田地掘成壕沟，为了便于作战，他们也都非常高兴，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这项普遍而巨大的工程。同时我们发动了广大群众，把所有的城墙都拆平，几乎不留痕迹了。每当阴晦的天气，或微雨的时候，展望一片平原，完全辨认不出何处是旧日城镇。这对于敌人是一种害处，但对于我们却是有利无害。因为拆了城墙，敌人即便占领，也无所据守，我们的游击队易于反攻、袭占。许多事实告诉我们，我国旧式的城墙，对于敌人固守据点在战术上是有很大作

用的。敌人往往凭着他的重武器，固守一二城镇；我军缺乏重武器，攻城不易。可是转换位置，我守城而敌攻城，此时，我无重武器而敌有之，结果敌能攻，而我不能守。拆了城墙，则有利于我，无益于敌。这不仅在平原中如此，在山地中亦是如此。敌人也看到这一点，所以近来敌人在军区周围各据点，正积极构筑堡垒，企图固守，并封锁我们。不过这也将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因为我们有广大群众的帮助，敌人只靠几个孤立的堡垒据点，还是不济事。我挺进冀东的游击队，就曾经于一夜之间，攻破敌人九个堡垒。

实际上，目前敌人只欺我游击队无重武器，这也的确是我们很大的弱点，所以我们就不能依靠什么险要的地势。因为没有重武器的部队，事实上无险可守，守亦无益。不过今后抗战逐渐走进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这些处在敌人远后方的游击队，和正规军的关系将更加密切，我们相信将会得到正规军帮助，得到重武器补充，以克服我们的弱点。那时敌我作战形势，必然有重大转变。目前我们只有尽量避免我们的弱点，发挥我们的长处，依靠着我们已经取得的各种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去克服一切困难，正确地运用游击战术，利用我们已得的经验，积极抓住敌人弱点，攻击它的弱点，以求不断的胜利。

过去一年间，我们在艰苦斗争中，就是凭借主观努力，才能得到各方面胜利的收获，才能够在极端困难与不利的环境中立足，而且不断发展。

一般说来，我们这一地区的环境，较之华中、华南及其他地区都存在着更多的困难。

首先，在交通地理方面，我们军区处于几条铁路干线的中间，四面都被敌人交通线封锁着，这就造成了几种困难：第一、敌人调动和增援迅速便利，时间不容易估计，随时可以向我们进攻；第二、我军的活动受周围铁路线限制很大，无论向东、向西、向南

或向北，到处都遇见敌人的铁路和沿线据点。敌人构筑了各种工事，守卫着铁路及其据点。虽然我们始终毫不间断地破坏它的铁路、袭击它的据点，但因技术条件限制，这种破坏与袭击，毕竟是有限度的。这一特殊情况，是我们军区所独有的，它对于我们游击战争的开展，曾经给予了不可忽视的困难。然而，这种情形在华中、华南及其他地域很少存在。

其次，正因为我们这个军区是处于敌人的远后方而又在敌人四面包围封锁之下，和国家的总后方隔绝了，陷入无后方联络状态。从而，在财政经济，医药物品以及干部等各方面，主要都得单纯依靠“自给自足”的政策，增加了许多实际的困难问题。如果是在华中、华南或其他区域，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必然会相对的减少至最小限度。

还有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和主力军距离太远了，难于取得主力军的扶助而迅速充实我们部队的装备，提高和改进我们作战的技术条件。不如华中、华南各地区游击队容易和广大装备完善的正规军取得密切联系，容易得到主力的帮助，而充实其技术装备。虽然我们相信，在很近的将来，在战争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和主力的距离将逐渐缩短，能够得到主力的帮助而逐渐解决我们这一困难。自然这一困难的经历，在华中、华南各游击区显然是可以避免的。

至于就政治、经济的自然与历史条件上说，我们这一地区和华中、华南等地区也有显著的差异。

从政治上说：这个地区，过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旧的落后势力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比其他地方特别显得落后。人民政治生活的落后，没有斗争经验，文化闭塞，造成了政治上相当的守旧与落后。一般民众，对于社会改革，表现隔膜与冷淡，富于农业社会所特有的保守观念。这对于我们发动广大人民参加抗战的工作上，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困难与障碍。

从经济上说：旧的封建、半封建的经济关系，在这里还很顽强的存在着。加以帝国主义对于这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农村社会，掠夺榨取，更使得这个地区广大民众的经济生活，长期沉陷在半殖民地式可怜的畸形贫穷状态中。这种经济上的落后性，也就是造成政治上落后的根源。边区以内最大部分的地方，是山岳地带，真可以说得上是“地瘠民贫”。山沟小道中虽然给游击队活动以某些便利，然而交通不便，物资不丰，在敌人包围封锁之下，物质条件之困苦，物力、财力动员的艰难，也给游击战争的开展以很大的限制。

这些政治、经济的，自然与历史的特殊条件，在华中、华南等地没有这样严重，甚至于已经不存在了。在那些地方，政治经济都比较进步。近代我国经济的发达，主要是在华中、华南各省，而近十年来政治的中心，更是在华中、华南各省。那里的民众，有着丰富斗争经验。譬如华中以武汉为中心，曾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政治斗争的洪炉；华南以广州为中心，更是近百年来我国革命的策源地。尤其是近代文化运动的发展，也以华中、华南各省为普遍。人民政治文化生活都有了比较高度的发展，物质条件更远胜于边区数十倍。这些都构成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足以支持长期残酷的民族自卫战争。

如果说我们在这样恶劣的客观条件下，都还能由主观不断的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与障碍，改变了客观的条件，支持了在敌后一年余的游击战争，获得了许多胜利，那末在华中、华南各省那样有利的客观条件下，有了坚决的领导，要支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将是毫无问题的。

当然，要能够克服困难，取得胜利，必须忠诚的高举民族自卫旗帜，紧握住统一战线的武器，在最高统帅和各战区司令长官统一领导之下，建立在广大人民中的威信，发扬各级干部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精神，深入发动民众，并保证军、政、民亲密合作，取

得民众的热烈帮助，这是主观努力的基本条件。

我们一年来，就曾经依靠着这些主观努力的基本条件，在敌人远后方 被包围封锁着的客观条件恶劣的区域中，建立了三省七十二县，十万平方公里，一千二百余万人口的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这是最好的证明。

目前，在放弃广州、武汉之后，全国抗战向敌我相持的第二阶段转移，华中、华南许多沦陷区域的游击战争广泛开展，和华北游击战争的开展一样，已成为当前坚持长期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战略上的一个重要课题。而我们一年多的经验，已经完全证明了：在敌后沦陷区域建立游击战争根据地，并使之在不断斗争中扩大巩固，变敌人后方为前线，使敌人遭遇更残酷而又长期的全面抗战，准备我全国主力在第三阶段的大反攻而获得最后胜利，这完全是有可能的，而且这一可能更要逐渐成为普遍的现实了。

我们完全不用悲观。在华南、华中，以及全国其他区域，客观条件较我们晋察冀为优越，只要主观努力，取得各种有利的基本条件，将更能顺利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开辟更广大的游击战争根据地，不怕敌人的任何围攻，胜利地打败敌人。就是客观条件较我们晋察冀更为恶劣的，也能够经过主观努力，获得各种有利的基本条件，战胜困难，克服并改变一切客观的不利条件，而完成争取游击战争胜利的任务。虽然它的处境会更艰苦，但是在全国各地游击战争普遍开展之下，这一艰苦的程度，还会逐渐减轻，而最后则将会给我们以伟大的胜利。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尽管有更多而又更大于过去十倍、百倍的艰难与困苦，但是渡过了这些空前的艰难与困苦，就是空前的胜利与光明！

注　释

〔1〕主力部队，指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部队。

〔2〕白求恩，即诺尔曼·白求恩（一八九〇——一九三九），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医生。一九三六年德意法西斯侵犯西班牙时，他曾经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一九三七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一九三八年初来中国，三月底到达延安，不久来到晋察冀边区，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均称模范。由于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河北省唐县逝世。

〔3〕同注〔1〕。

〔4〕中央，指国民党中央。

〔5〕宋劭文、仇友文、李杰庸、王斐然、白静斋，即为"晋察冀边区政府筹备处"主要成员。

〔6〕同注〔1〕

〔7〕杨支队，即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该团后为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兼第一支队。

〔8〕骑兵支队，即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骑兵营。

〔9〕忻州，即今山西省忻县。

〔10〕李运昌、洪麟阁，当时为冀东抗日联军副司令。

〔11〕冀、察、热、辽游击军区，即冀东军区。

〔12〕"皇协军"，即伪军。

〔13〕同蒲路的三条干路，指由定县经阜平、五台至定襄的公路；由易县经涞源、繁峙至崞县的公路；由北平经蔚县、广灵至应县的公路。

〔14〕见本书《关于晋察冀之敌情及我军行动部署的报告》的题注。

〔15〕清水，即清水大佐，侵华日军第四混成旅团联队长。

〔16〕报纸，主要指当时晋察冀边区的报刊：有《抗敌报》(创刊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为北方分局的机关报，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七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晋察冀通讯》、《子弟兵报》(晋察冀军区报)、《边区文化》、《新长城》、《抗敌周报》、《群众杂志》、《救国报》、《抗敌三日刊》、《抗敌画报》、《边区诗歌》、《诗建设》等十几种。

永远保持并发扬平山团的光荣*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

英勇的平山团[1]全体指战员同志们！亲爱的平山青年同胞们！

此次敌寇对我军区新的大举进攻，一开始就遭受到严重的打击。我西线英勇的八路军同志，坚决执行了军区所给予的战斗任务，与冒险进攻的敌人进行了七昼夜苦战，首先获得了伟大的胜利，特别是在土楼子一带的上、下细腰涧战斗[2]，包围深入之敌，予以大量的歼灭，更决定了这一胜利战果的获得。在这一战斗中，在贺师长领导下的第一二〇师与平山团的全体英勇的指战员同志，特别发扬了我八路军的光荣传统，不顾一切牺牲，最坚决地把深入的敌人歼灭在山地里。这是平山团全体指战员同志最光荣的胜利记录。

平山团全体指战员同志们！你们无限英勇的顽强战斗精神，在我晋察冀军区的抗战史上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你们不屈不挠流血战斗的光荣胜利，已经证明了你们是八路军的模范部队之一，是中华民族最忠诚的后裔。你们是平山的子弟，边区的子弟，生长在太行山脉上，你们执行了捍卫家乡、捍卫边区的神圣任务。这特别证明了你们是平山子弟的优秀武装，边区子弟的优秀武装，你们是太行山上的铁的子弟兵！你们在战斗中锻炼

---

* 这是聂荣臻嘉勉平山团的慰问电。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在《抗敌报》上发表过。

得更坚强了。你们要永远保持并发扬这一光荣的传统，永远成为军区八路军的模范部队，成为捍卫民族、捍卫边区和捍卫家乡的优秀的平山子弟兵。我们号召全边区的兄弟子侄、特别是平山的兄弟子侄们，跟着你们走上光荣的胜利道路。

亲爱的平山青年壮士同胞们，你们的父兄弟侄，为了国家民族，为了边区，为了你们的家乡、田园，参加了光荣的平山团，在光荣的战斗里，获得了最光荣的胜利。这不但是他们的光荣，也是你们的光荣。因为他们光荣的胜利，证明了平山的同胞，特别是平山的青年壮士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是边区最优秀的子弟，秉赋着优秀的民族英雄的血统。你们要永远保持你们父兄弟侄的光荣传统，永远保持你们自己的光荣。亲爱的平山青年同胞们，勇敢地武装起来罢！参加到你们光荣的父兄弟侄的队伍里去！参加到光荣的平山团里去！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边区和家乡，要显出你们的英雄本色和男儿身手，跟着你们的父兄弟侄，走上永远光荣的胜利道路，踊跃热烈地参加平山团。

注　释

〔1〕平山团，是一九三七年十月由周建屏、刘道生率领的工作团在河北省平山县组建的。当时，晋察冀军区在组建主力部队的同时，积极发展地方武装。一九三八年一月改编为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七一八团。

〔2〕土楼子一带的上、下细腰涧战斗，是指在王震指挥下，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七、七一八团，配合地方武装在繁峙县上下细腰涧的一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将日军独立第三混成旅团佐佐木支队大部歼灭，毙伤敌七百余人，俘日军十一人；缴获炮五门，轻重机枪十九挺，步马枪四百余支。

嘉奖黄土岭战斗中炮兵部队的通令*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据东京《朝日新闻》报昭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载，敌酋阿部中将于十一月七日下午六时在上庄子附近被我迫击炮击中要害。负伤四处而亡等情。查在黄土岭战斗[1]中，我第一军分区炮兵连充分发挥炮兵的作用，给予敌人以极大的杀伤和威胁，以准确的射击命中敌酋，使敌失指挥与掌握，致全线动摇而陷于极端混乱状态中；并密切配合我之步兵获得黄土岭战斗的胜利。除通令嘉奖勉励外，仰各部队炮兵应该以此战例积极研究学习炮兵技术的提高，步、炮在战斗中动作的协同，仰我炮兵指战员努力学习为要。此令。

注　释

〔1〕黄土岭战斗，是指一九三九年十月下旬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第一二〇师一部，在河北省涞源县城东南黄土岭地区，对日军进行的一次伏击战。这次战斗，歼灭日军九百余名，击毙阿部规秀中将。日本《朝日新闻》撰文称："中将级指挥官的阵亡，是皇军成立以来未曾有过的"，"护国之花凋谢了"。黄土岭战斗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士气。

---

* 这是聂荣臻嘉奖黄土岭战斗中第一军分区炮兵连的通令。

关于开辟平北冀热边根据地的指示*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日）

开展平北冀热边区之游击战争，创立此边区之游击根据地，必须认清是个长期艰苦的过程。因为敌人已经有痛苦的教训，不会让我们的武装及一切抗日力量在其后方轻易生长起来。但同时因敌兵力不足，为敌不能解除之弱点。经常表现在敌占广大地区，固守据点，需增加兵力时，得从各据点抽调，此随时给我以可乘之机。同时又必须警觉，当我们在赶到某地开展工作时，不要过于乐观，以为马上就可以成为根据地。当敌增兵压迫此区时，或者情况不明，轻易将主力投入战斗，是不妥当的。因此，我们的干部，我们的游击队和我们的领导，都应十分认真地考虑，要采取绝对有把握而又有特性的斗争方式。不仅新地区之游击战是如此，即在基本根据地，如冀中及晋东北，在敌人据点间亦同此精神。只有如此，才能坚持与锻炼出来。以上意见请你考虑……冀东粮食在继续运输，望严加督促，转运接受，否则雨季一到，运输不易，平西粮食又将大成问题也。

---

* 这是聂荣臻给肖克的信。肖克当时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热察军政委员会书记。

军事问题报告提纲*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七、十八日）

第一部分　战争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

一、目前全国抗战形势

（一）坚持团结抗战

目前国际国内形势，都有巨大变化。据中央电示：目前世界正处在三大阵线剧烈斗争中，战争正由欧战向全世界范围扩大。德国准备进攻英国本土；美国积极扩充军备，准备参加帝国主义大战；另方面苏联的和平政策得到很大的成功，特别是在西方把帝俄时代被迫割让的土地大部分收复回来了，把波罗的海、黑海沿岸控制与巩固起来了，并在新的革命环境下，加速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扩充军备，准备应付国际间大的事变。目前世界革命的酝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高涨，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运动，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形成目前世界革命中的两个巨潮。

由于新的国际形势迅速变化，特别是德帝国主义者的暂时胜利，鼓舞与刺激了日本强盗。在欧战中，英美法不能更多顾及远东。因而日寇企图冒险行动，独霸远东，乘法国战败之际，压迫

---

* 这是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这篇文章曾在一九八五年《军史资料》第六期上发表过。

法国切断滇越铁路已成事实，更进而企图占领安南[1]。最近滇越公路亦由日本压迫英国而被割断。另方面，日寇大举进攻宜昌，狂炸重庆及大后方重要城市，增加军事压力，求得分化我国抗战内部力量，压迫中国投降。因之目前我国正处在空前的投降危险与困难的时期，目前这种危险与困难的严重性，必须明白指出，以便动员全国力量，加以克服。另方面也必须揭穿某些资产阶级过"左"的"形势完全对我有利"的鬼话，来掩盖他们实际的投降活动。

中央指出：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也增大了，目前绝大多数的抗战力量，仍有极大可能继续战斗下去。我们对国民党主体及中央军要尽量争取。投降没有出路，法国便是一个明显例子。过去依靠英美，今天已较困难。自英法相继切断西南国际交通，政府对英法已相当绝望。因之团结抗战的可能性增大，主要决定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中央指出好转可能性增大的条件是：

1. 外部的三个条件

(1) 英美法今日已不是引诱中国投降的主要因素，虽然英法还想牺牲中国对日妥协，求得保持其远东权利，有时甚至倡言中日和平，但英法本身对日的矛盾已不可解决，同时欧战已大大削弱了英法在远东的统治力量。只要我国放弃依赖英国，自力更生，则英法这一企图，将成画饼。美国主要利益在大西洋方面，在远东不过百分之七，因之美国也不可靠。

(2) 日寇在三年侵略战争中，人力物力财力消耗甚大，国内外环境困难。这有利于我之持久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3) 中国西北线的国际交通，难以割断，有强大的苏联支持，苏联是我国最可靠的朋友。

2. 内部条件也有三个

(1) 三年来，我们党空前发展了，特别是在敌后，八路军新

四军也空前发展了，这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基本条件。

（2）资产阶级内部分歧，决不可能统一来投降，来反共。

（3）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广大的中间势力，也存在着抗日的积极性。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总的任务是：争取国民党主体及一切中间力量，克服投降危险，孤立与驱逐投降派，我们党要紧张起来，成为团结全国抗战力量的核心。我们的任务是更加重大了。

（二）敌人在华所使用的兵力及消耗

据总部五月份通报及我们所知的敌兵力番号：敌人在华兵力现共有三十八个师团（一个师团有三个旅团），其中在华北的有十三个师团（其中有四个师团位置不明）及十一个混成旅团、两个骑兵旅团，华中有十三个师团及四个旅团，华南有五个师团及一个警备旅团（现我们已知番号者有师团二十六个，旅团十六个，骑兵旅团二个），共约一百三十万人。连过去死伤的七十余万人，共计来华兵力约二百万左右，兵力使用已达相当饱和状态。以后还可能组织三十个师团（连已组成的十三个在内）。但日寇绝不可能把全部兵力都使用于中日战争，否则无法应付世界大战。目前敌人虽欲继续进攻中国与南洋，但兵力已不够用，陷于僵局。日寇在中国的兵力已全面展开与分散，力量薄弱，在任何战役中，都从各处调集兵力，挖肉补疮，闪电战术难以使用，表现兵力不足，没有足够的主动地位。

今后敌人虽有可能打通粤汉路，夺取长沙，但必须用相当大的兵力，即使打通，也还须用大的兵力去巩固。至于进攻西北，切断中苏交通的企图，也难实现。即使打下西安，还不能解决问题，需要继续打下兰州。这条路线太长太深，需要兵力很多，加以敌后游击战争的展开，敌人在我“磁铁战术”打击之下，仅陷于点线占领，进展与进攻都觉困难。因之今天敌人虽加重军事力量，不

过是配合其政治诱降的阴谋而已。

二、华北抗战形势

(一) 目前敌我对抗形势

今天华北抗战形势的发展，是过去敌人所意料不到的。敌人三年来仍不能完全占领华北，反而被我牵制了约近侵华兵力的半数，打破了其速战速决的迷梦，不仅在全国方面不能速战速决，即在华北亦不可能。现敌人在华北有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六、一一〇等九个师团，外有二十、二十三、一〇八、一〇九等四个师团位置不明，合计十三个师团和十一个旅团、两个骑兵旅团。其分布位置如下：

浑源、大同、归绥一带——二十六师团、骑兵第一旅团

平绥路东段——第二混成旅团

高碑店、古北口一带——一一〇师团之南云旅团

高碑店、新乐一带——一一〇师团之小野旅团

石家庄、娘子关一带——第八混成旅团及一一〇师团之水原旅团

安阳——第八混成旅团

津浦路北段——二十七师团

同蒲路忻口北——第三混成旅团

忻口南——第九混成旅团

辽县、和顺、昔阳一带——第四混成旅团

汾离公路——第十六混成旅团

平遥、侯马一带——四十一师团

同蒲路南段——三十七师团

白晋公路[2]——二十六师团

德县——三十二师团

胶东——第七混成旅团

鲁东南——第六混成旅团

临城、徐县——第十混成旅团、二十一师团

漳德路——第一〇八混成旅团

道清沿线——第三十五师团

开封东——骑兵第四旅团

（二）敌之“扫荡”企图

敌人迅速解决华北问题不可能，“扫荡”亦难收效果，因之敌在华北已作长期军事打算，在战术上已有许多转变。敌人正积极研究过去红军内战时对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经验并检讨其抗战中与我军作战的教训，战术已有部分改变：

1. 分割各抗日根据地为大小块，封锁交通，修筑堡垒，控制据点，在铁路公路两侧挖深沟，以求切断我之交通，达到分区“扫荡”目的（在冀中、雁北都是如此）。

2. 经济上严加封锁，根据地物资输入较难。

3. 修筑横断铁路，在根据地与根据地之间或在根据地内部，尽力修筑。如改白晋公路为铁路，以分割晋东南；准备修筑济晋铁路（济南至晋城），以分割冀鲁豫边、冀南、冀晋豫边，切断我与豫冀鲁皖诸省八路军、新四军之间的联系；修筑沧石路，以分割我冀中、冀南；拟筑塘大路（塘沽至大同），分割冀中、平西等区域。

4. 修筑公路网，在据点与据点间，不论山地平原到处尽力修筑。

5. 增修据点，依靠据点作面的占领，各城镇多已构成据点，在较大的乡村亦企图构成据点。

（三）关于华北的投降派顽固派问题

这是坚持华北抗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过去由于国民党限共办法的实施，引起了华北投降派向我们武装进攻。现在国民党的溶共政策，既遭受失败，政治限共又无效果，乃改取军事限共为主要手段，企图修筑从甘肃豫旺堡横贯陕北、晋西、晋东南、豫

北、冀南至山东的封锁线，以防止我军向南发展，切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及晋东南与山东的联系，同时利用投降派、顽固派闹小的磨擦，或大的武装进攻，以各个解决我军。如山西新旧军的冲突，就是这个大的阴谋的一个表现。但结果晋西南驱逐了投降派势力，而变为更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了。同样，晋东南过去也成了主要的冲突地点之一，但后来因日寇修筑白晋路，进攻晋东南，投降派逃跑，反而巩固起来。

在冀南、豫北，民族叛逆朱怀冰、石友三与庞炳勋[3]及山西顽固派勾结，并公开与日寇勾结，指使乔明礼、侯如墉[4]在冀西进攻我军，捕杀抗日政权工作人员和根据地的群众。石友三亦在冀南进攻。朱怀冰则在豫北武安等地构筑堡垒，形成封锁线，步步向北压迫，并公开武装进攻，勾结日寇夹击我们。我们各方呼吁制止无效，乃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首先消灭侯、乔两逆。一、五两团及冀中部队一部，配合一二九师击溃朱部，并将石逆赶到陇海路以南去了。这种坚决打击与迅速结束的方针，是正确的。为要压低当时弥漫全国的投降气焰，争取中间力量，巩固抗日阵线，这种坚决打击是必须的。但打击投降派，如时间过长，不适可而止，则有酿成内战的可能。因之我们一战即突破数十个堡垒，追到豫北，即停止战斗，改用谈判调解方式解决，这也是必要的。这种有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不得已而自卫）、有利（使反投降斗争局部化，暂时化）、有节（坚决打击，迅速结束，适可而止，不逞一时之快，无发洋财观念）的反投降的武装斗争，有时被迫而采用，是正确的。

这种武装反击，在政治上有很大的收获，巩固了中间力量，使之进一步同情与靠拢我们，巩固了统一战线。在军事上，也取得许多收获，不是仅仅缴获了万多条枪，从投降派手中拿到抗日军手中来，而主要的是粉碎了投降派、顽固派反共降日的“万里长

城”计划，把八路军、新四军连接起来；另方面，过去顽固派、投降派因与日寇勾结，故其地区周围，日军之兵力很少，因而可用大的兵力“扫荡”冀中、晋东南等各抗日根据地，但投降派被赶跑后，敌人不得不在濮阳一带布防，分散兵力扼守据点，来和我军对垒了。

最近，石友三又跑到山东曹州一带，招集土匪，卷土重来，乘敌人反复“扫荡”鲁西、冀南之际，我军疲劳之时，大举来犯，结果其孙良诚[5]部全军崩溃。山西旧军陈长捷[6]乘机进攻晋东南，进攻太岳山脉，结果亦被新军击溃，消灭三个团，被赶回晋西。在山东秦启荣[7]虽经常配合敌人，打击破坏我们，但不能制止我之发展。这些投降派、顽固派在华北的阴谋活动，对我们军事上、群众工作上与抗日政权的建立上，有极大的危害性（特别是晋东南、冀南、山东等地）。我们一方面要和日本强盗战斗，一方面又要和投降派、顽固派斗争。

（四）八路军在华北

目前八路军势力，已普遍于华北。晋东南、晋冀豫、冀南、冀鲁豫、鲁西、山东等各战略区域互相衔接，北面接着晋西北、晋察冀、鲁西北以及鲁中、鲁东、鲁南各战略区，山东南部彭、张[8]两支队则为八路军新四军接合部队，鄂豫皖有李、罗、郭、徐[9]等支队，东南与新四军相接。我们一定要打破顽固分子的分割计划，把八路军、新四军结合起来，这对坚持抗战有重大意义。今天我们总的任务是坚持华北抗战，巩固各抗日根据地。中央、总部、北方局都曾有明确指示，应在部队中进行爱护根据地的教育，要了解与掌握各种政策，不管今后形势发展如何，我们必须依托各抗日根据地，坚持华北抗战，以推动与坚持全国抗战。

三、边区抗战形势

边区是华北抗战最前线的一个阵地，敌人“扫荡”华北多由边区开始，我们首当其冲。过去敌人进攻边区次数很多，牵制敌

之兵力很大。敌在边区已构成六百九十个据点，其中路西二百〇六个，路东[10]四百三十二个，平西五十二个。冀中由于敌人据点的增多，表现出敌我犬牙交错的形势，敌人占有点线，我则占有小块，在点线包围中，形成游击态势。路西山地则是较安全的大块根据地。冀东则尚是游击区域。

这三个区域的巩固程度不同，敌我战术在三个区域中也各异。在冀中敌深入易而控制难，故据点很多。在山地深入难，控制也难，故据点较少。过去敌在分散配备下，一般是构筑据点，沟通公路，但最近敌在雁北等地，有时不依靠公路，也把兵力伸出，控制据点，依凭险要，使我不易接近与摧毁。同时敌之据点增多，分进合击亦较容易而经常，而我之大的兵力活动则感困难。但敌人兵力也分散了，小的活动虽多，但大的动作也较不易。且因我破路关系，敌之运输困难。再则敌兵力不足，必须利用伪军，配合扼守据点。伪军政治的稳固程度及军事技术都很差，又便于我军夺取据点（如冀中最近夺回部分据点）。而敌人企图实施面的占领则很困难，敌人依凭据点及公路还不能够把广大区域控制起来，今后敌我的交通战将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

在目前环境中，我之困难必然增加，物力动员较难，交通运输梗阻，人力动员亦受影响。但这些困难，完全可以克服。现在边区军队、政权及群众工作，已打下相当巩固的基础，这是我们克服困难的依靠力量。我们必须正确掌握各种政策，使各方面工作打成一片，否则是难以支持的。但敌后无论怎样困难，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克服困难而发展自己。除八路军外，在敌后其他部队多是要遭受削弱和吃亏的。以今天敌人在华北的兵力而言，决没有多大开展。因敌只有点线，而我们各根据地则互相连接，敌人顾此失彼，忙于应付。敌分散活动，易被歼灭；集中"扫荡"，则我游击转移，且可相机打击与疲惫敌人，造成敌之被动。目前国际形势大变，敌如实现南进政策，武装冒险，则对华

北增兵更加困难；敌如进攻西南、西北，则必须抽调华北兵力，兵力将更形单薄，更利于我们活动。但今天我们积极加强各方面工作，准备一切力量，以应付今后的困难局面，则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部分　我们在敌后抗战的经过及经验教训

一、我们坚持抗战的方针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我党与国民党政治路线不同，军事路线亦各异。

（一）我们的方针是持久战

中国抗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处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中日两方有互不相同的两种特点，这特点是相反的。

1. 日本是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组织力虽优于中国，虽有长期侵略中国的准备，但国小人少兵少，物资缺乏，经济困难，不能持久作战；在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中，残酷地剥削人民，使之生活恶化，因之遭受中日两国人民及世界人士所反对。

2.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组织力虽不如日本，但地大物博人多，军队数量多，同时是抵抗侵略的正义战争，因之能得到国内外人士及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同情与支援。

在三年来的战争发展过程中，完全证明了这些特点。远在抗战开始时期，我党即根据这些特点，规定了我国抗战的总的方针，是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团结进步，同时用持久战的理论来反驳速胜论与亡国论的滥调。

（二）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1. 战略退却或战略防御阶段；2. 战略相持或战略反攻准备

阶段；3. 战略反攻阶段。战术运用上，在正面是以游击运动战配合阵地战，在敌后则以游击战为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在第一阶段中，战略是防御，战役上战斗上是进攻，反对单纯的消极防御。

在第二阶段中，战略是相持，战役上战斗上是速决；战略上是内线作战，战役与战斗上则是外线作战。

在第三阶段中，举行全线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我们反对单纯防御战，采取战役与战斗的进攻战；反对单纯的正规战，配合以运动战游击战；反对正规军单纯的正面作战，主张配之以广大人民的敌后游击战。

二、坚持敌后抗战方针是如何确定的

我党根据抗日战争的基本特点与友军错误的作战方针，预料在抗战初期，我国在军事上必然遭受失败，所以决定我们开赴敌后，拖住敌尾，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正面战场，并决定首先在华北战场上坚持下来，以坚定全国抗战信心。这证明党的主张完全正确，这种军事远见与正确的战略方针，对于全国抗战的坚持，关系非常重要。

因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多，交通不便，加以敌人强暴地残害人民，必然要引起敌后的游击战争，使成千成万的游击队义勇军在敌人空隙中产生出来，这是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客观条件。

三、坚持敌后抗战的经过及作用

（一）经过的几个阶段

1. 第一阶段，从平型关战斗到娘子关失守，八路军主力转移，留下一部分队伍建立晋察冀军区。

当时总部部署是，准备一部配合娘子关战斗，一部配合忻口战斗，同时准备在太原一带布置作战事宜。但娘子关转眼失守，局势大变，我军主力乃转移，只留下少数部队创造敌后根据地。乘敌人大量前进，后方空虚之际，我独立团打开了北部局面，收复

涞源、蔚县、浑源等县。骑兵营在冀西也连续收复完县、唐县、曲阳等县，南面灵寿、行唐亦入我手，西面以五台为根据地，亦收复广大区域。当时冀中部队也很快发展起来，收复了冀中平原，与路西取得密切连系，一时局面很大。随着决定建立统一的政府，由于党与国民党各方面的协商，得到国民政府的批准，接着经过民主的方式，把边区政府建立了起来，这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件事。当时我们的兵力虽然很小，但我们尽量伸张，不束缚于五台山上，尽量向冀西山地及广大平原发展，打开了伟大的局面。

2. 第二阶段，我们的游击战争，是在配合保卫徐州、保卫武汉的连续战斗中组织与发展起来的。我们部队虽少，但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四出伸到敌人交通线上活动，摧毁了许多汉奸武装及伪政权。至武汉失守前，冀中部队扫清大清河南北，收复数十县，军区版图很大，为极盛时代。当时敌人只在交通线上扼守据点，铁路两侧无强固据点。我军则尚在游击队时期。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军大举袭击平汉路，一夜连下定县、新乐、望都三城，给予敌人极大的威胁。随后敌人即抽调了一个旅团的兵力，向阜平作报复性的进攻，但在我军打击之下，随即撤走。接着敌人在南面进攻洪子店，在北面两次进攻涞源，都被击退。这时我宋（时轮）邓（华）纵队深入冀东配合地方党收复了十余县，武装了十余万人民，虽因主客观原因，未能取得应有成绩，但开展与坚持了冀东游击战争，在国内外有极大政治影响。当时部队战斗力不甚强，经验不丰富，路西部队只会游击战，不会正规战；冀中部队则只会正规战，不会游击战。

当时政权工作形式已备，但无具体内容，还保持着许多旧的成分与作风，经不住战争的考验。群众工作与地方党的工作虽有初步基础，但缺乏战斗经验，不甚巩固。

在武汉失守后，敌人大举进攻，企图肃清山地，然后“扫荡”平原，以确保占领地区。敌占据五台后，大肆吹牛，把五台

与武汉相提并论，认为已经摧毁国共两党的根据地。当时国内外人士多关心探问我们有无把握坚持打下去。这可见军区在推动全国抗战上的重大意义。这次敌人的大举围攻，首先在西面被我粉碎，东面七团及一分区部队收复阜平，北面收复蔚县，接着在高洪口歼灭敌人一个大队，结束了敌人的战役围攻。但敌人锋芒随即指向冀中平原，是为大规模“扫荡”冀中的第一次。军委曾派一二〇师到冀中，协同冀中部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经过多日战斗，终于把敌人的“扫荡”粉碎。

这时，我们虽然打退了敌人，但仅阜平一城尚在我手，敌占城市，我占乡村，各方面都显出了相持阶段的特点。当时政权、群众团体还缺乏战争经验，特别是在战争紧张时，许多区村政权支持不住（随后即普遍改选了村政权）。这次给予边区党一个大的锻炼，当时部队一般战斗力不强，只会一些游击动作，未经整训，不如今天坚强有力。

3. 第三阶段，武汉失守我们粉碎敌人大举“扫荡”后。

我们的中心工作是巩固根据地，适值总部下达整军训令，我们根据粉碎敌人围攻的经验教训，首先决定整训一批大的游击兵团，使之成为正规兵团，提出不只要打游击战，还要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歼灭战的号召。当时一般部队仍继续游击活动，同时集结了主力兵团，进行了三期的整理训练，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建立了各种编制与组织制度，整饬了军风纪，虽然还存在着不少的弱点，但战斗力是大大的提高了。以后连续打了许多正规战与歼灭战，如陈庄战斗、大龙华战斗、雁宿崖战斗、黄土岭战斗等。

当时敌人在许多村庄修筑公路，依托城镇，建立伪组织，以发号施令，组织便衣队，到处捕捉我政府工作人员，这种方式在去年冬季反“扫荡”前特别活跃。经济上则采取封锁政策，军事上则多用短距离袭击及分区“扫荡”。在四分区“扫荡”滹沱河沿岸，破坏我麦收；在一分区则进行雨季的反复“扫荡”，企图在特

殊气候条件下消灭我军。敌人占领台怀后，一路出五台，一路出豆村，一路出神堂堡、大营，企图合击我军。其最后一路被三五九旅歼于上下细腰涧，毙伤敌千余人，接着一分区在大龙华歼敌五百余，陈庄歼敌八百余，银坊伏击战歼敌一个大队，黄土岭伏击围歼战斗歼灭日军九百多人，击毙敌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这是整训后主力兵团打的运动战、歼灭战。说明我们随时已有歼灭敌人一个大队的力量，同时也给予敌人一个教训，以后一个大队以下的兵力，再不敢深入山地“扫荡”了。

在银坊歼灭战后，敌人开始了一九三九年冬季的大“扫荡”，这是对雁宿崖、黄土岭歼灭战的报复。当北面战斗紧张时，东面敌人亦向西进犯，南面西面敌人亦先后出动，合击阜平。这次敌人动员了三省兵力，约合五个联队，不要后方接济，只带几天干粮，不走大路，专走小路，企图扑灭我们。我们军事上虽未遭受多大损失，最后击退敌人，但经济被破坏甚大，敌人深入根据地内部，烧毁房屋粮食极多。

敌人在西面“扫荡”后，即转向冀中，连续反复地分区“扫荡”，同时增筑据点。这时冀中部队一部去晋东南，一部分去冀南，参加反投降战役。敌人在冀中乘机构筑了许多据点及公路。

（二）三年来坚持敌后抗战所起的作用，坚持敌后抗战是坚持中日战争的枢纽

1. 变敌后为前线打击敌人，钳制敌人，拖住敌人，支持了持久抗战，粉碎了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

2. 在相持阶段，我们更多地抓住敌人，削弱与消耗敌人。而我们部队则在不断的战斗中，锻炼了自己，提高了战斗力，蓄积与发展了雄厚的力量，组成了新的坚强部队，使军区成为反攻前进阵地。

3. 收复与保卫了广大的国土，稳定了民心，摧毁了伪政权，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粉碎了敌人“以华制华”的阴谋。

4. 保护了丰富的资源，使敌不能开发，打击了敌人“以战养战”的企图。

5. 在战争中，武装了广大人民成为游击队，发展游击队成为正规军，建设了新军。

6. 开展了民运工作和民主政治，成为全国的一个模范区，成为党的一切进步主张的实验场所，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

7. 使军区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成为坚持敌后抗战与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可能的例证，成为坚持持久战的例证。

8. 军区支持了华北游击战争，支持了华北其他根据地，并把这些根据地联系起来。

9. 以军区为依据，开展了冀东游击战争。

10. 建立与发展了党，成为军区长期支持抗战的核心。

四、我们的经验教训

（一）武装斗争与其他斗争的密切配合

敌后抗战决不单是武装斗争问题，依靠于各方面的密切配合。当军区创建时，一方面组织武装，另方面即从事根据地的建立，首先便是建设抗日政权的问题。当时我们对这一问题很注意，但友党及一部分人士则不甚重视或无信心，我们却坚决把边区政府建立了起来，施行各种革命政策。可是我们政权工作的经验是很贫乏的，过去苏维埃的经验，不见得适用，因而经过了相当长期的摸索过程。如货币问题经过多时的考虑，才得到适当解决，不然就要做日寇经济上的俘虏。在财政政策上，当时有的人依靠打汉奸筹款来解决，照此做下去，则汉奸孳生，而财政仍无办法，因之我们坚持了统筹统支的原则，严厉地制止了游击队自筹经费的现象发生。又如文化教育，在今天已成为重要问题之一，但在初期是顾及不到的。今天针对着敌人对我青年儿童的麻醉教育，为培养我们的后一代，在思想战线上，也展开了残酷的斗争。

（二）敌占区的各种政策

在我们收复的地区中，因有各种抗日政策，特别是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因之各种工作易于开展，党政军民的联系，以及各方面工作的配合也很好，冀西与冀中联系尤为密切，而定县的党政民运工作，尤为模范。如政策不好，则联庄会门四起，各种工作无法进行。

（三）部队党与地方党的一致

在北方分局统一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分工合作，联系很好。如新兵动员工作，前期是地方动员，部队配合；后期是部队巩固，地方帮助。这种经验，值得全党学习。

（四）新军的建立

有的由联庄会来，有的由旧军来，有的由地方斗争中来，经过不同的步骤，不同的方式，而变成我党领导的武装。如三纵队初期部队很大，而党的基础很薄弱，八路军的各种制度与工作作风，不能全部实现，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教育整理，打下了党的基础，逐渐变为坚强的抗日武装。

（五）对各种杂色武装的争取

争取了大批的联庄与会门武装（特别是冀中）。这些武装可能变为汉奸武装，但经过我们的政治争取，却变成了抗日的力量。我们一方面耐心争取教育，另方面对真正汉奸武装则坚决消灭，树立军威，以便于争取其他杂色武装抗日。各种会门常易被敌人汉奸及顽固派利用，在交界地区组织红枪会、大刀会，企图袭击我们或与我们对立。我们基本上采取政治争取方针，找出他们产生发展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原因，施加影响，同时检讨了我们的政策。

（六）平原与山地的联系问题

山地地形虽好，但依靠平原人力物力的供给，平原地区应向山地输送，同时平原游击战争也必须依托山地支持才能坚持下去，两方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七）变游击队为正规军

军区部队在整训前已是游击兵团，即已相当地排除了游击主义与游击习气，因之整训时间很短即告成功。

（八）在敌人深远后方游击战争的开展

必须建设机动灵活的地方游击部队，延伸其游击活动，这些地方，敌人组织严密，要派正规兵团去大量发展，是比较困难的。

（九）边区军政民的亲密联系

边区子弟兵的口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已深入于人民脑海中。边区军政民分工合作，生产作战，血肉相连，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十）建立民兵及青年抗日先锋队

是扩军最好的来源，此次扩军已完成，各分区新战士绝大多数是民兵及“青抗先”队员。

（十一）战争的指导与战术的运用问题

根据革命战争的理论及长期战争的经验与边区抗战的实际需要，具体运用了与发展了过去的经验。

我们基本上仍是游击战。游击小组是过去内战时的一种武装组织。但冀中的游击小组，在今天则成为广大的民众游击运动，到处进行不规则的游击活动。一般游击支队，则穿插于敌人点线之间，配合正规军战斗。有的游击支队则横跨于两个根据地之间，其政治意义与作用甚大。这些游击队首长必须善于掌握各种政策。至于正规兵团派出的游击部队（如侦察部队等），则在配合战斗上有重大作用，应提高政治质量与改善装备，以便抗击敌人，迷惑敌人，取得重大战果。

关于围攻与反围攻问题：当敌人围攻，我处于内线作战时，可抓紧于合击前或敌人退却时，求得集中力量消灭敌之一路。前者如柏岭战斗，后者如河口战斗。

关于攻击敌之据点问题：据点有时是可以打下而且应该打下的，如大龙华战斗中的大龙华，是敌人巩固的据点之一；最近冀

中有些游击小组配合群众即攻克了许多据点。

游击战与运动战的转变问题是非常艺术的，视环境需要而定，取决于指挥员的机动性。

其他如交通战、刺杀、短兵战斗、突然袭击的战斗等，也均有许多新的经验。这些战术的研究与发扬，在今天非常需要。

第三部分　关于军队的建设问题

一、军区部队的现状

（一）新军建设的特点

1．是在敌后人民抗日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大多数是工人农民，部分来自杂色武装，成分不一致。一种是纯粹由政治上出发来的，另一种则出发点与目的都不一定正确。但无论如何，都是从斗争中生长起来的。

2．在不断的斗争中锻炼、培养、淘汰与教育，一般是提高政治质量，改造旧的品质。

3．有坚强的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经过系统的政治教育与实践经验。

（二）各种组织与制度

我们是继承了过去红军的光荣传统，表现在政治委员制度与政治机关的建立与健全，保证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保证各种政策的彻底执行，保证了部队的坚固团结与坚决执行命令。

1．政治委员制度。政委是党在部队中的全权代表，“没有政治委员就没有红军”。特别在目前这种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敌人奸细多方破坏我们的部队，这一制度的健全，更有其重大的作用。政委人选必须审慎，宁缺勿滥，要以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最勇敢最有能力的有长期斗争经验的同志充当。

2．支部。现已在所有连队中、单位中建立起来，各部队党的

质量虽尚不能一致，但数量平均已占部队人数百分之三十以上，支部都起了堡垒作用。在战斗中党员死伤的比例很大，在巩固部队，减少非战斗减员，巩固纪律等工作上，支部有决定的作用。

3. 各级政治机关，能够有计划地有系统地进行教育。近年来部队中学习热潮空前高涨，锄奸工作虽有缺点，但巩固部队得到极大成绩。在群众工作的开展方面，各级政治机关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过去地方党幼弱时，帮助建立了地方组织。今天地方党已相当坚强，政治机关在群众运动上仍给予地方党以辅助与配合。

（三）关于整训情形

1. 提高了作战技术。由于整训结果，编制的执行，各种制度是健全起来了，军风纪的整饬及管理教育方式进步了，只有少数部队尚未严格执行编制，违抗命令，结果弄得组织涣散。在作战技术方面也大大提高。以射击言：如去年一分区雨季反“扫荡”平均八十粒子弹毙敌一名，但去年冬季反“扫荡”中平均五十九粒子弹毙敌一名，按最近五个月统计，则平均五十三粒子弹毙敌一名。以刺杀言：过去我们的体力及刺杀技术都不如敌人，经过了抓紧有效的训练，提高了部队肉搏的技能及信心。

2. 在战术方面和指挥能力方面，一般的都提高了。

（1）缺点是干部伤亡率很大。路西部队自军区成立到今年五月止，共伤亡战士七二一六名，排以上干部一一六六名，合计八三八二名。排以上干部伤亡与战士伤亡比为百分之十七弱。排以上干部伤亡与伤亡总数比为百分之十三。冀中部队战士伤亡一〇三三一名，排以上干部伤亡九四四名。总计路东路西部队共伤亡战士一八七一三名，干部二一一〇名，干部与战士的伤亡比为百分之十二点七，干部伤亡与伤亡总数比为百分之十一点三。在干部伤亡数目中，牺牲及残废的约占半数，雁宿崖一战，一、三两团干部伤亡占伤亡总数百分之十二点一。五团陈庄战斗，干部伤亡与伤亡总数比为百分之十九。在每次战斗中五团的干部伤亡率

都比较大，这证明战术运用及作战指挥上还有许多缺点。

(2) 射击教育与射击指挥有进步，但弹药消耗数量很大，节约做得不够。一般战斗中缴获较少，只大龙华战斗，消耗与缴获相等，各约五万发。陈庄战斗消耗与缴获比为五比一。路东路西弹药消耗数与缴获数之比相差约百万发，数目很大。敌我伤亡比数：由军区成立到武汉失守时期，敌伤亡一〇一一八名，我伤亡三四一二名，敌我伤亡比为二点九比一。武汉失守后到去年底，敌伤亡数为一七六三六，我伤亡为四三五三，敌我伤亡比为四比一。今年一月至五月的统计，敌我伤亡比为四点九比一。

(四) 司令部工作

各级司令部工作都已建立起来。

1. 供给机关及工业部门：这是一个庞大复杂的部门，现已走上统一与健全，三年来一般完成了供给任务。但团供给工作则较差，供给人员的选择差，工作积极性与计划性不够。

2. 卫生部门：这是今天部队中的一个薄弱的部门，各级医务人员的卫生工作医疗技术都不够，应大力培养与教育这类人才。

3. 兵工部门：这是最晚建立的一个部门，但已解决了一些问题，如手榴弹、刺刀的制造，军械的修理与生产等。但我们缺乏兵工经验，熟练工人较少，机器原料缺乏，因而产量不多，以后可能增大，手榴弹、刺刀可以全部供给，子弹可以翻造，但今天子弹消耗还供不应求。

4. 教育机关：较高级的如抗大二分校，较低级的如教导团队，一般说来，他们的成绩不能令人满意，部队中干部不能够得到应有的补充。三年中军区干部伤亡约两千余人，平均每年须要补充八百人。但过去抗大输送到部队中的干部并不多，质量也差，许多还当不了排长。至于各分区的教导队更是五花八门，如四分区教导队负责人是一个军事上政治上都很落后的旧军官，教育上当然不会得到多大成绩。只初期的军政学校成绩尚好，一年半时间

培养了千余个干部，现在这批干部在路西多为连级，在路东营级也不少，成为部队中的一部分骨干。

二、今后部队的建设问题

从部队整训到现在，已有一年多，虽然得到了很多成绩，但还存在着许多弱点。应巩固现有基础，继续提高，巩固正规化，更进一步提高战斗力，建设坚强的抗日武装，这是朱、彭总副司令给我们的要求和指示。

（一）重新确定编制

根据总部讨论结果，团应改为二千五百人，过去三千余人编制过大，团直属队也过大，不适合于现在战术要求及指挥能力，是应当坚决重新编制的。新编制表发下后，各级应即严格执行，各级首长及司令机关随时检查与点验，不准随便增加。过去五团编制不符规定，擅自增减，即是违反命令。新发的编制表，首先团以下应严格执行，分区原则上按旅的编制，还可以讨论增减。现在分区政治机关等过于庞大，许多机关重叠起来，许多干部堆积起来，而工作效率反极其微小。

（二）政治委员制度及支部工作

1. 政治委员制度及支部应更大发挥工作效能。各级政治机关应有系统地进行教育，把一部分主要力量放在部队教育上面。部队的政治文化水平需要大大提高，把军队变成学校，消灭文盲，要做到能学能看，特别是各级干部应当具备相当的政治文化程度。科学常识及自然常识，在干部中战士中都很需要。我们多是农民出身，缺乏科学教育与科学头脑，今后应当抓紧这项教育。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工程，但我们一定努力去做，使部队成为优秀的先进集体。在连队中各种组织应力求缩减，政治指导员工作要减轻，要与连长仔细分工，使政指工作不致过于累赘，而把主要的力量与时间放在部队教育及党的工作上面。

2. 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分工与协作。政治工作保证军事任

务的完成，这点做得还不够，在有的连队中，形成连长与政指分家现象。政治工作的权限与范围，应在部队中特别在新干部中进行教育，反对个别人互争军事政治地位高低的不正确观点。团长、政委在一个兵团中要形成集体领导。政委虽负有军政全责，但应侧重部队教育及党的工作方面。我们部队中还存在着一些英雄主义倾向，不愿遇事相商，这是不良的习惯和不重视党。政委制度，我们必须尊重，在处理问题时，指挥员可以提出意见，但应尊重政委的最后意见，指挥员如不同意，可以将意见提到上级来解决，但未得答复以前，还应遵行政委的意见。我们要求军事干部要学习政治，政治干部也要学习军事。政治干部在操场上战场上都有他的一定的位置。军事、政治在行政上的分工与统一必须清楚，政治机关调动军事人员必须通过军事机关，政治机关只能自己调动政工人员。

3. 巩固部队的团结与党的团结。过去一般是很好的。但有的还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往往在人员器材物力的调剂补充上，因小问题而发生恶劣的关系不好的现象，造成许多不可饶恕的恶果。须知整个部队都是在党领导下的一个集体，各个单位的建制并不是那样神圣不可分割的。今后政治机关与党组织必须巩固部队的团结，使之成为党的一个整体。部队党与地方党亦应亲密团结。各级政委及政治部主任都是党长期培养出来的干部，对这点要负完全责任。

（三）关于战斗教练问题

1. 要提高战士技术与战术的熟练程度，取消过多的制式教练，理论与实际要打成一片。

2. 要边讲边做在野外实习，采取少而精的原则，要抓住重心，这是红军的传统教育方针。如过去国内战争战略上是防御，但战役上战斗上是进攻，同时抓紧了进攻战与遭遇战的实际教育。

3. 利用一切时间，不间断地进行教育。现在部队休息时间很

多，应当学习过去红军在战场上在行军中争取一切时间进行教育的精神。

4. 以对日作战的经验及对敌战术技术的研究来教育部队。打击敌人的弱点，避开敌人的长处，不能闭门造车地进行教育。在技术上要特别着重刺杀、投掷、射击教育，要求在一定距离内才准放枪，夜间战斗不准放枪。体力锻炼还不及敌人，一般战士由农民出身，体力发展不平衡，应着重体育游戏，如掷铁球等，来锻炼腕力。

（四）干部问题

“干部决定一切”。在改善部队的领导上，干部问题是很重要的。由军区成立到现在，我们都感到干部缺乏的痛苦，虽然在部队中，提拔大批干部，培养与吸收了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地方上教育机关中输送了一部分干部，但仍感不够分配，这是我们部队向前扩大与发展的原故。今天大批培养干部，仍是主要工作之一。

1. 干部的培养问题

（1）六中全会所提出的模范干部的标准：

忠实于党和阶级的解放事业，在实际工作中能认清自己的责任；

与群众有密切联系，在群众中有威信；

在复杂环境中能独立决定方向，不怕牺牲，不怕吃苦，不怕困难；

遵守纪律，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与阶级的利益。

（2）提拔干部必须从政治上出发，反对庸俗地施行小恩小惠、感情拉拢等办法。关心干部也要从政治上出发，而不是家庭式的封建的落后的姑息。只凭个人观点出发去认识干部，决不是正确的。选择干部，误解老实死板为忠实，而企图便于驾驭也是错误的。

（3）最近总部提出的模范干部的标准：

政治坚定，正确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

忠于自己职责，能力上能够胜任；

努力学习，力求进步；

遵守纪律，为人模范。

不管自己在部队中有怎样无尚的威信，如果自己调动了工作或调别人来加强工作时，只要他能正确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应在部队中有同样的威信，不以个人为转移。

（4）今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提高干部能力问题。只有提高干部能力，部队战斗力才会提高，不然将停滞于现阶段上。因之必须不怕暂时削弱某些工作，而把在职干部适当抽出去受训，以加强他们的能力。目前干部上进心还不够，有的不愿受训练，有的只满足于狭隘的经验，有的感觉自己文化低学不好，这都是不正确的。现在大家要下定决心抽调优秀干部去受训练。军事、政治、文化及科学常识，各级干部都应具有适当的程度，因之应给以较充分的时间，把他们更加充实起来。

2．新老干部的团结问题

现在部队中新老干部间还存在些不团结的现象，这是极应纠正的。所谓“新”、“老”只是一个相对的时间问题。军区部队已有两年多的历史，许多新干部已不能单纯看为是新干部。老干部应当帮助新干部，要起模范作用，老大现象是要不得的。培养大批新干部，这是党当前的一个迫切任务，因之排斥新干部，歧视知识分子，是错误的。哪个干部都要经过新的阶段，所谓有的新干部打仗怕死等等，只是一个战斗经验的问题。

今天部队中吸收了大批知识分子，他们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易于学习与进步，这是党和八路军的一部分重要力量。一般知识分子多是小资产阶级意识，有中间性与二重性，没有浓厚的剥削意识，常常能脱离家庭的经济影响。由于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与

苏联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环境，因而知识分子易于倾向革命。轻视与歧视知识分子是工团主义者及一般封建军阀的主张，在马克思主义中没有这一点。我们爱护与教育知识分子，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无产阶级化，工农分子知识分子化，反对以落后为光荣，忌妒先进的落后观点。新干部应学习斗争经验，经验是实践过程中的产物，不是幻想能够得来的。有的知识分子自高自大，自以为什么都知道，其实什么也不真正懂得。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是一个长期斗争过程。因之应当着重实践，在实践中求得理论和经验。关于新老干部的团结问题，政治机关应注意检查与调整。

3. 学校教育

抗大二分校是我们军政干部的培养场所。过去在干部团结上，领导方式上，教育工作上，都有些缺点，培养出来的干部质量上也还差。现总校由总部领导，培养高级干部。连以下干部的培养拟设四个分校。二分校在我们区域中，主要是培养营级以上干部，因环境需要另设连级一科，即培养连、营、团三级干部。今后训练时间要延长，教育内容更提高一步，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科学常识等，并可采用考试制度，到一定时期举行考试，不及格者应留校再学，这是抗大二分校今后的教育方针。

抗大学员的成分及质量要检查。过去送来学生质量很差，部队选送的也不甚好。部队选送学员多不送好的干部，而送有问题的落后分子，浪费了抗大许多时间和力量去培养，而且损坏了抗大的校誉。其他军队中有青年干部可以争取造就的，也可送去受训。有政治问题不堪造就的，都不准送去，只能开办训练班给予民族教育后，送他出我们部队去，要保持抗大的纯洁。

学员毕业后的分配工作应由司令部、政治部及抗大共同组织委员会负责，选送受训的学生也要经过司政机关审查，校方无权分配，克服过去分配学员中的某些感情用事现象。原则上学员是

各回部队工作，但有时应根据整个需要，适当调剂，任何部队不能直接去向抗大要干部。

过去抗大军事教育在动作上不甚统一，有苏联式、日本式、士官式等等，今后应统一起来，采取一种最好的动作传播全军中去。

学员到抗大后，即为抗大的一个成员，各部队不得私送东西去，同时学员也不得私自向部队要东西，这容易破坏抗大的整体与团结。

学校中教职员工作过久的，可以抽调到部队中去实际锻炼，部队中的干部也可以抽到学校中办教育，整理经验教训，互相调剂，但应视需要决定。

现校部组织过于庞大，应略加精简。学校不设政治委员，校长为最高首长，校政治部受军区政治部领导，同时接受校长指导。校长、教育长、政治部主任应组成干部小组，开会时由校长任主席，遇事协商，集体领导。过去政治教育上有政训科，属于训练部，今后应改属政治部，较为适当。校供给处等部门应取消，由军区负责供给。

至于部队中的干部，各分区应适当调剂，新老干部要配合起来，使政治文化程度及工作经验作风，能得到调剂。在职干部的学习，应切实执行中央指示，规定自修时间及学习制度。

（五）一般人员问题

1. 部队补充人员应是工农和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民与青年。

2. 我们兵役动员要求质量纯洁，完全出于政治上的觉悟。

3. 有组织的统一动员，统一分配，以调剂数量质量保证各部队满员，这点做得不够。因为各个地区工作不平衡，政治经济发展也不平衡，所以动员的成分有的好，有的差，有的超过预定数目，有的则不足。应当统一调剂，反对本位主义、不顾大体的狭隘观点。

4. 对于供给、卫生、经济、文化艺术等有专门研究及技术的

人才，过去虽亦吸收了一部分，但极不够，今后应大量吸收。军事专门人才也需要。这对于根据地的建设很有关系，不能用狭隘的眼光，蔑视与苛求专门人才。

（六）关于武器问题

我们武器的来源，一部分是得自敌人手中，一部分是由民间动员得来，现在我们已能自造一部分简单的武器，今后大后方接济困难，更要自力更生。现有武器有的配备不很适当，各分区应自行调剂，并学习使用近代武器。各部队应负责收集原料送来，以便制造弹药。

（七）关于执行命令与纪律的养成

这要靠平时养成，应按照纪律条令切实执行，深入检查。关于通报命令等，反对官僚主义地看一下就完事，干部要成为执行命令的模范。

（八）管理教育问题

最近部队的管理还有许多缺点，旧的方式还存在很多。我们要了解干部与战士的关系，除了上下级的关系外，还有同志的关系，干部与战士同是一个阶级，职务虽不同而地位平等。今后在部队中应进行深入教育，肃清统治阶级那种管理教育的观点，才能把管理方式改好。现在管理方式许多是不严格，不认真，松懈马虎的，有的团首长连本团的人数武器都不清楚。我们管理要严格，但对下级不是摆架子、板面孔，而要和蔼与耐心，交代任务解释问题要清楚。对战士生活要特别关心，每个干部，处处先想到战士，而后想到自己。关于教育管理方式的改善与合理，对巩固部队有重大关系。部队不健康与发生逃亡，不仅要从政治上去检查，而且要从管理教育上去检查。

（九）改善工作作风

要养成一说就做，一做就彻底的作风。在工作中，要有及时的计划总结和督促检查。形式主义要彻底纠正。

（十）关于司令部的工作

各级司令部工作现已建立，但不甚健全。这是由于历来参谋人员缺乏，与主观上挑选及培养的不够。过去采用带徒弟的办法，还不够用，应挑选一批年青的连排级干部及革命的知识青年，拿来训练，才能解决参谋人员的补充问题。苏联参谋人员多是在陆军大学毕业，先做助理员，后做参谋长，许多指挥员都经过参谋阶段。今后应提高参谋人员的质量与地位。参谋人员本身也不能看参谋工作是有职无权有劳无功的附属品，这是极端错误的看法。各级司令部门，不准收容在部队中犯严重错误的分子，以保持司令部门的纯洁。参谋长是首长的第一代理人。参谋长和参谋都是有一定的职务与地位的。今后司令部工作更须科学分工，使之成为部队进步的推动机关。

1. 作战科专管作战，组织作战室。

2. 教育科同时管理队列工作，可改为队训科或军政处，管理干部升遣调补及部队教育、行政。

3. 通信科以后对于电台电话，要由上而下的统一管理。过去电台因材料困难，各自为政，这种不好的习惯应严加克服，所有人员材料，要统一调剂与分配。关于通信工作，在军区有很大的成绩，表现在通信工作的组织与干部的培养方面。今后不只要保证平时通信联络的顺畅，而且要保障战时顺畅。现在战斗中的通信联络很差，有的发生误会，互打一顿。应多想联络办法，专靠司号员是不够的。在平原地区应利用地方的关系及其他关系建立秘密通讯网，保证战时的联络，以补救电台、电话及骑马传送的不足。

4. 侦察科，关于战役的战斗的侦察，无论路东路西平时已很清楚，但一到战时往往就糊涂起来。今后应保证战时情况的清晰，建立秘密侦察网。

5. 统计工作与机要工作。过去统计工作做得很差，现在月终

统计增减数可以算出，但其他统计则差。统计工作极为重要，如过去医院的各种统计——轻重伤、枪炮伤、刺伤、炸伤，负伤部位、出院人数等，可以研究出许多战术技术的经验教训来。

机要部门主要是保守机密问题。军委总部迭有训令，各级首长应负责任，防止遗失密码、电报底稿等现象发生。

6. 供给部门，以后采买物品应统一与有计划，不得如过去那样无组织地到处乱买，影响物价抬高，通货膨胀。经费开支要适当，要保证战士的健康及装备的整齐，并应统一供给计划，力求节省。服装的材料颜色式样，应尽量求得一致，整齐美观，教育部队爱护。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由军区及北方分局共同组成经济审查委员会，定期审查，严禁贪污浪费。

7. 卫生与医疗工作，在部队中应大大加强。现在对疟疾、痢疾等流行病及急性病，预防工作很差，发生后也不能及早治愈，这对部队健康及战斗力的损害很大，而且浪费人力与经费。今后应特别注意积极的预防。药品来源困难，购买不易，应自己设法制造，搞好中西结合，要有新的发明。对于医务干部的培养，除卫生学校外，应多方培养，应有医生的部队都要有医生，在技术上政治上，都要有保证。分区对医务人员亦应注意培养，可以集中到军区受训，提高技术水平。共产党员要能掌握技术，鄙视技术是不对的。

（十一）伤亡抚恤及遗族教育问题

三年来军区路东、路西部队伤亡万余人，对于伤亡抚恤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今后应设置专门机关进行这一工作，以发扬民族友爱与阶级友爱，反对对伤亡同志冷酷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并不是庸俗的小家庭的做法。苏联在内战中的许多残废者，现在负责党的工作与其他重要工作，并不是残废了就是没用而应该弃置在一边。干部伤病，应很好的抚恤与治疗，对烈士家属及其后代，应负责教育和爱护抚恤，并应创办遗族子弟学校。

第四部分 关于作战指导及战术的运用问题

一、敌人在战略战术上的演变

战争未开始前，敌人企图不战而亡中国。战争开始后，敌人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各线不断增兵，直到徐州会战时，这种势头还是很高。但徐州失守后，敌人即逐渐转变这一战略，至武汉失陷，敌人遂做了长期作战的打算，提出百年战争口号。这时已开始走上了相持阶段，敌人采取了“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方针，对正面进攻及进展较少，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则反复地残酷“扫荡”。敌之战术演变如下：

（一）开始时期，采取正面进攻，以联队或旅团大的兵力为单位，深入突击一点（如进攻阜平、涞源），我军则采用广泛的游击动作，袭扰敌人侧后，使敌不能得逞。

（二）第二阶段，采用分进合击大的包围战术，重兵围攻，一路前进。我们则灵活转至外线，集结兵力，打击敌之一路。敌人这一战术又告失败。

（三）第三阶段，敌人研究过去红军内战时两方的经验和我们的游击战术，开始采取分散配备，扼守要点，加强公路联络与奇袭急袭等办法，并加强特务工作及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斗争，以破坏我军队、政权及群众工作。但在我们打击之下，敌人没有得到多大成绩。

（四）最近时期，敌分散配备，同时采用分区“扫荡”办法。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在第三阶段中从前年冬季围攻到去年雨季，敌人无大进展。因之敌人乃由各据点抽调兵力，实行分区“扫荡”。但其分区“扫荡”的结果，我之回旋地区更大，兵力利于转移。因而敌人又采用连续“扫荡”和大包围的办法，如去冬敌人“扫

荡”一、三分区未成功，就来大的包围，合击阜平，但结果扑了个空。敌人军事“扫荡”既告失败，乃进行经济破坏。

（五）以后敌人可能采用推广据点，修筑公路，到处构筑据点，胁迫我们紧缩我们的办法，及经常采取小部队活动伏击袭击，并破坏我政权和群众工作，捕捉政府群众工作人员，同时采取经济的封锁与破坏，使平原与山地隔绝起来。

敌对我的战术还要继续演变，将来可能采用以据点为堡垒的政策。但有两个特点利于我们：

1. 敌人兵力不足。过去内战时，对方调集了三百多个团的兵力包围我们，兵力占绝对优势。今天则敌人兵力不足，而我之根据地相连，战线甚长，敌之据点愈多，兵力愈加分散，愈陷于被动。

2. 敌人群众基础差。这点和过去内战时代不同。过去我们的群众基础主要是农民，今天则是全中国的民众。敌人则是异民族，进行着野蛮的侵略战争，因之我们能获得民众拥护与掩蔽，在据点间隙中，可以穿插自如。

今后敌人除将广泛构筑据点外，小的“扫荡”可能增多，以巩固据点，破坏我政权工作，但大的“扫荡”也不会放松。按敌之规律，大约每年大“扫荡”一次，特别在秋后。

二、对今后战争领导的意见

不管敌人战术怎样演变，但必然增加我之困难。我们必须：

（一）加强战略区的统一领导与各个区域独立战斗的精神

要反对大家庭中的小家庭各自为政的现象，愈困难愈要有统一的计划与领导才能克服一切困难，如冀中粮食的西运非有统一的计划与组织领导不可。另方面敌人将分割与缩小我占领区，封锁交通，因之各个区域在统一领导下应发扬独立战斗的精神。

（二）独立作战与协同动作

敌人在各条交通线上，都是脚跨两边，应付两面。而我们的

各个区域，则互相衔接，如敌人进攻一区，其他区应积极在敌后活动，以牵制敌人，免被敌人各个击破，而达其分区“扫荡”的目的。应在连以上干部中进行教育，以后不管有无命令，应自动配合他部作战，无论战略、战役、战斗的配合，都应如此。

（三）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

今后敌人对我将采取分割政策，切断交通，层层封锁。我们应积极破坏敌之交通，以沟通各战略区域，把各战略区域打成一片，把整个华北作为我们的回旋区与战场。无论如何，不让敌人修通沧石路，彻底破坏正太路，这对于支持华北抗战，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因之今后工作布置应特别着重交通战方面，我们应重新划分交通线上的县区，应跨有线之两侧，以强化联络。过去以交通线为县界，结果线之两侧，常常形成敌对我坚固的军事政治经济封锁线。

（四）机动部队的组成问题

各分区部队应重新配备，并组成战役的机动部队。过去各分区部队多带地方性，平均部署，与敌人对垒。当敌人分区“扫荡”时，兵力并不算大，但对分区压力则不小，使分区独立作战较为困难。其他分区部队有时配合不好，往往失去打击敌人或歼灭敌之一路的机会。另方面，分区部队若一旦抽出，则极形空虚，因之今后应当组成有力部队，控制于机动位置，策应各方作战。

（五）建制与指挥问题

部队的建制，并不是那样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在战斗中。过去有的部队到其他分区，往往不愿接受该分区指挥，而该分区首长亦以为不是自己的建制部队，而不愿多去负责指挥。这种现象往往在战斗中形成死角，对部队间的团结也有很大影响。今后任何部队，不管路东、路西，就是同级干部，也要接受驻区首长的指挥与命令，下级干部更应如自己的建制一样，接受驻区首长的指挥，如有意见可提出以备采纳。当需要去协同作战时，应自动

去请求命令与指挥，不必等待自己直属首长的命令。这个问题应在干部中进行深入教育，反对不正确的小集团观念。因驻区首长对该区地形、民情都很熟悉，由他们统一指挥较妥。除指挥外，其他军事政治供给卫生等工作也统归驻区首长负责管理。

（六）正规战要肃清游击习气，游击战要有高度的灵活性与坚韧性

军区部队是由游击队出身，因而在正规战斗中，特别在配合战斗时，多不遵守时间及划分的作战区域，不按时请求命令；有的随便撤出战斗，将部队带走，而不通知友邻作战的部队；有的在战斗紧张时，不利用电台联络而叫电台跟着伙食担子走。这种游击习气，对正规战运动战是很有危害的，必须坚决肃清。游击战则应发扬灵活性与坚韧性，这点过去做得不够。如去冬反“扫荡”战役中，三分区部队都抓在手里，既不敢拿来打运动战，又不愿放出打游击战。有的游击部队却又不愿经常与敌人保持接触，扭打敌人而不被敌打，以刺探敌情与兵力，使敌人不敢过于分散来破坏我们。现在各部队多自有小后方，掩护部队过多，后方部队庞大，因之失掉游击机能，活动不积极，战斗力及所起作用就比较差。

（七）加强游击队的政治教育及对政策的掌握

过去地方游击队与游击支队及正规部队派出去的游击部队，配合上很差。只有某些游击队配合很好，积极活动的地区，政权及群众工作亦较为开展。如冀中的游击小组及冀西的游击支队，经常能深入敌后活动，故平汉线的点线工作好，正太路则部分好，同蒲路则很差。今后游击队的政治领导、政治教育及对于政策的掌握都需要加强。敌占区及游击区民众的负担要减轻，即使要有多少负担，应完全从政治上动员启发民族意识，使民心向我，这是很重要的政治问题。要反对过去所谓要在敌占区大抓一把的做法，这样做会种下历史的祸根，等于把民众驱逐到敌人的卵翼下去。

（八）山地与平原的联系问题

山地依靠平原供给物资，今年决定由路东输送粮食六万石于西部山地，以后还须大批转运。这不仅可以供给冀中转移至山地的部队食用，且对支持山地抗战有重大作用，应把这一问题提到战略的高度，其他重要物资也要输送过来。

（九）对敌战术上要多用伏击与袭击

最近冀中游击小组经常伏击敌人，袭取据点，这种游击动作在冀中很需要，能给敌人大的扰乱威胁。但伏击袭击事先要有准备，战斗指挥特别要沉着坚韧，这依靠平时的锻炼和教育。敌人据点多，兵力少，且多为伪军防守，只要加强居民工作，布置内应，拔除或夺取据点并不怎样困难。过去许多次我们袭入据点，敌人占据房屋顽强抵抗，我即撤出战斗，说明我们的顽强性非常不够。以后如敌据房屋顽抗，应坚决烧毁之，歼敌后再向群众解释与赔偿。袭击与袭扰不同，必须事先有各方充分准备与布置，坚决要夺下据点，最后要用强攻手段，这对于优良战斗作风的养成很有关系。

（十）侦察警戒问题

目前平原的侦察警戒做得较好，山地部队则很差。此次南下部队曾遭敌袭击，不管损失程度如何，遭受敌人袭击是绝对不应有的事。警戒侦察是联系着的，警戒是消极的，侦察是积极的。不管居民及地形条件如何，都要随时适当配置，每到宿营地后，干部即应亲身去看地形，布置警戒，然后部队休息，每个干部要养成这种习惯。过去有的部队到达某地时，先休息而后布置警戒，或部队未出发即撤回警戒，最易遭敌袭击。过去高洪口战斗击毙敌清水大佐取得胜利，就是敌人警戒疏忽的结果。

（十一）内外线作战问题

基本上我们是处于内线，在敌人合击时，争取在内线集中主力打击敌之一路，待敌合围圈缩小时，相机转出外线，乘敌扑空

时打击敌之侧背。转移时平原要以道路为准，山地要以地形为准。要熟悉地形、民情，机动灵活。活动时间要求适当，过早过晚都会使部队疲劳，而遭敌打击。我们打敌人是艺术，打不过，走也是艺术。走也是为打击敌人。

注　释

〔1〕安南，即今越南。

〔2〕白晋公路，指山西白圭（祁县东北）至晋城的公路。

〔3〕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第六十九军军长；庞炳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军军长。

〔4〕乔明礼，当时任国民党冀察战区河北民军总指挥；侯如镛，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纵队华北游击挺进第四纵队司令。

〔5〕孙良诚，当时任国民党军苏鲁皖豫边区游击总指挥兼鲁西行署主任。

〔6〕陈长捷，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总司令。

〔7〕秦启荣，当时任国民党军山东别动队司令。

〔8〕彭，即彭明治；张，即张爱萍。

〔9〕李，即李先念；罗，即罗炳辉；郭，即郭述申；徐，即徐海东。

〔10〕路西、路东，指平汉路西、平汉路东。

为送回日本幼儿给日军的一封信*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二日）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其母不幸死于炮火中，其父于矿井着火时受重伤，经我救治无效，亦不幸殒命。余此伶仃孤苦之幼女，一女仅五六龄，一女尚在襁褓中，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罪行也。

---

* 本文原载于一九四二年七月《晋察冀画报》第一期。“百团大战”中，八路军部队在井陉矿区从战火中救出日本小姑娘美穗子及其妹妹。聂荣臻在送回两个日本小姑娘时写了这封信。一九八〇年聂荣臻邀请美穗子访华，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史上的佳话。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翻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安　好

关于“百团大战”对《晋察冀日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六日）

记者问：战前敌我的形势及其特点怎样？

聂答：一般地说，在战役进攻开始以前，敌人对于华北，基本上是分割政策，它广泛地修筑交通线，除原有的铁路外，还企图修通沧石、石德、白晋以及从塘沽到大同，从山东济南到道清路的交通线路，普遍的建设公路网。特别是在平原，每一个据点都有公路联络，甚至一个据点有十几条公路分叉出去。或者是环绕一周，形成纵横交错的公路网。这样，在军事上，它企图把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分割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实行分区“扫荡”，一个个的加以收拾。在政治上，企图发展伪组织，加强其伪组织的“统治”作用。在经济上，则利用它的交通线，对各抗日根据地加以严密的封锁，并隔绝各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运输联络，特别是隔绝各抗日根据地的粮食的运输，大量发行没有基金的伪钞，膨胀市面金融，抬高粮食价格，以遂其封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一般地说，今年的收成是相当好的。在麦收时期，敌人则大肆抢劫，并在其据点与据点之间设立“公仓”，企图把周围的粮食都弄到它的仓里去。并且，还预备把抢的粮食运往日本，以解决其国内的粮荒，进一步控制我们的根据地。敌人是企图用这样的方法来实

* 这篇谈话曾发表在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八日的《晋察冀日报》上。

现它的所谓“治安肃正”阴谋的。

上面所讲的是关于敌后的根据地。另外，在这一时期，华北的敌人时时在调动，准备西渡黄河，进窥西北。在这一时期，我们和敌人是始终相持着，战斗频繁的开展着，尤其是交通线，它在白天修路，我们就在晚上破坏，一刻也没有休息，给了它相当严重的打击。

总起来说，在这一时期，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敌人都用尽了各种方法，明的或者暗的，伸出毒蛇一样的嘴，企图更尖锐的插入我们的根据地，控制我们的根据地，吸吮我们根据地的血液，以实现它的所谓“治安肃正”“以战养战”的阴谋。

然而我们是必须给予致命的打击的。

问：整个战役进攻的形势演变怎样？

答：“百团大战”[1]是一个主动的进攻战役，不是战略的反攻。就在这一方面，在粉碎敌人对于我们大后方的战役进攻上有很大的意义。我们这一次的战役进攻，基本上是胜利了，给了敌人严重的打击。在整个华北的形势方面讲，河北与山西的动脉，如正太、平汉、同蒲、平绥和其他的铁路和公路，整个的被我们毁坏了，好几个星期不能恢复。在这里我们需要了解，这一战役进攻的展开是极其广泛的，是整个华北的。当然，主要是正太路。正太路，我们差不多完全把它扒掉了。

我们的用兵是极其神速的，而在边区在华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严密封锁之下，敌人完全不清楚我们的行动。当八月二十日夜间，我们开始向敌人的据点进袭的时候，敌人似乎还在做梦呢。从战斗一开头，我们一直和敌人血战着，以八路军特有的英勇果敢、猛冲猛打的精神，我们是一直在胜利中，在胜利中继续扩大战果，而终于把敌人全线击溃。但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出来的，这一战役进攻，在经济上，我们粉碎了敌人“以战养战”的阴谋，我们把敌人视为命根的占着华北煤产丰富产量的井陉煤矿毁坏了，而

且毁坏得非常彻底，无论矿场矿井，完全被炸毁了。敌人如果要把井陉煤矿修复，比修复正太路还要困难得多。

由于敌人基本的弱点是兵力不够与兵力分散。战斗一开始，就弄得它莫名其妙，手足无措，不知往哪里调兵，向哪里增援好，所以敌人是始终处在被动地位的。虽然，在整个战役过程中，在东面和西面，它曾抽调了两个旅团的兵力来增援，然而始终不能改变它的被动地位，它始终是失败的。

我们是胜利了。我们光荣的完成了总部所给予我们的伟大任务。

问：这一战役进攻的特点表现在哪里？

答："百团大战"本身就是一个特点，因为从抗战开始以来，主动的，象这样大规模的向敌人的战役进攻，"百团大战"还是第一次。我们看得很清楚，抗战开始以来，我们是一直处在被动地位的。战役的主动进攻，尚未曾有。在平常，只是敌人对我们"扫荡"，我们反"扫荡"，粉碎它的"扫荡"，而没有来过一次这样大规模的战役进攻。所以说，这次战役进攻的本身就是一个特点。这是第一。第二，从整个战役过程来讲，其中心是在交通战，大量的破坏敌人交通，把敌人的密如蛛网的交通网一节一节地截断，使那只蜘蛛被迫从网的缺口里跌下去。第三，各路同时出动，不仅在一地，而是华北的每一条大干线都动起来了。第四，正因为是八路军组织的战役进攻，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范围内，动作是完全一致的。在同一小时内进攻，在同一小时内放枪，各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络，互相配合得特别好。第五，这一战役进攻，不是在一条线上，而是在各个抗日根据地的中间展开的。是在朱、彭总副司令的直接领导之下，一齐向敌人出动的。第六，处在敌人的远后方，没有得到大后方的接济。许多部队是由游击队生长壮大起来的，他们能够和敌人这样大的兵力作战，正充分表现了自愿入伍的英勇的子弟兵的特质。第七，这一战役进攻，不仅仅是

部队的作战，而是全华北广大的民兵都参加了战斗。他们不仅仅从事运输、担架、送茶、送饭，并且有许多民兵都直接参加到团里营里去，担任破坏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就边区来讲，这次的群众动员和过去的每一次反“扫荡”都是不同的，无论在运输、担架、救护等方面，都是很有组织，很有联络的，不仅仅是壮年、青年，就是老年人和妇女，都直接的参加了战斗。在沿兵站线上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亲自给部队送水、送粥，亲自调喂伤兵，把她们的边区母亲的慈爱，给予边区的子弟兵。并且这些老太太们，她们一面调喂伤兵，一面还给伤兵以亲切的安慰，真象家里人一样，受了这样的爱抚的伤兵都感动得流出了眼泪。至于那些青年妇女，她们不但自愿的看护伤兵，募捐慰劳，还亲自沿途去担架运输，并认为是非常光荣的事情。这次五专区的党政军民共组之战地动员委员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它保证了这次战役的一切需要，保证了前线的胜利。这些，都是过去少见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过的。这是在这一战役进攻中间所获得的光辉成绩。

问：敌人是采取怎样的办法对付我们的战役进攻呢？

答：在我们的这一战役进攻中间，由于敌人基本上的弱点：兵力单薄和分散配备。当我们把正太路破坏的时候，它就只有固守待援，它始终是处在被动的地位。对付我们的办法，也只有巩固阵地，恢复交通，并在各方面抽调兵力，逐次增援，企图把它的交通线保住而已。

问：目前的战局及其趋势怎样？

答：这一战役进攻，基本上是已经胜利的结束了。我们在这样的战役胜利的基础上，完全处在主动的地位，我们还是要扩大战果，继续向敌人攻击。因此敌人还在死命的挣扎中，它不会因为我们的破坏而放弃其交通，它还是要继续修理的。但在时间上，必须承认，它是大大的失败了，尤其在这一方面，它如果要转移兵力，进攻我们某一地区的时候，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因为华北

的交通战是持久的，它修好了，我们破坏；再修好，再破坏……但同时，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鉴于过去的失败，敌人有可能采取堡垒政策，加强守备，增加据点和兵力。然而如果这样，它的兵力将更加不够，更加分散，更加被动。而它若向华北增兵就打破了向大后方进攻的企图，拖住它的尾巴，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亦正是我们的任务。

是的，敌后的战斗是频繁的，将来也许要更加频繁。由于这一战役进攻所给予敌人的教训，敌人也许会把警觉性提高一些。但如果敌人对华北要进行"扫荡"的话，它来一次，我们就来两次；它来两次，我们就再来几个"百团大战"给他看看。

我们一定能够胜利的。

问：军区子弟兵在"百团大战"中的意义、作用、及其影响怎样？

答："百团大战"，在整个华北讲起来，是八路军领导的一个主力战。而军区子弟兵是这一主力战的主角之一。在正太路上，如果分成两段来讲，军区子弟兵恰恰担任了一半。其他方面象平汉、同蒲、平绥路、平西、冀东、冀中大平原等地区，整个军区的子弟兵都参加了这一战役进攻，所以从地区上说起来，军区子弟兵是这一战役进攻的主角之一。而在地位上，我们可以了解它的伟大作用和意义的存在。

在整个华北，"百团大战"是胜利了。我们光荣的完成了这一任务。而就军区来讲，经过这次战役，军区子弟兵是更加经受了锻炼，这不仅是军区子弟兵的光荣，而是边区广大人民的光荣！边区人民将更加热烈的拥护子弟兵，将更加热烈的涌进到子弟兵的队伍里来。

问：军区子弟兵这一战役进攻的胜利，将给予晋察冀边区的巩固与发展上一些什么有利的条件？

答：军区子弟兵的这一战役进攻的胜利，一方面，粉碎了敌

人对边区的分割政策和“囚笼政策”[2]，打击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另一方面，打击了敌人“以战养战”的阴谋，削弱了伪政权的作用，而在不断地扩大战果当中，我们不但把敌人的许多深入根据地的据点收复，而且把据点里的敌人完全消灭了。敌人以为我们缺乏重武器，不可能收复它的坚固的据点，但我们终于把它收复了。这些据点，本来都象毒蛇一样的伸向我们，狠毒的吸吮着我们的血液和生命的。这些据点的收复，不但扩大了边区的版图，并且使得我们的政权、民运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将得到猛烈的开展，将更加巩固边区内部的团结和发展边区的统一战线。而在我们再次进攻时，在我们粉碎敌人的进攻时，将会得到更大的胜利！

此外，在冀中大平原上，我们把敌人的密如蛛网的交通线统统破坏了。如果它要修复，亦必须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开展我们的工作，一面再继续的给予破坏……总之，军区子弟兵的这一进攻所给予敌人的严重打击，毫无疑义的，对于边区的巩固与发展上有着极其伟大的意义和作用。

问：战役胜利后的晋察冀边区军民新的任务是什么？

答：从这战役的胜利中间，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敌人对我们的封锁，敌人的“囚笼政策”是可以克服的。同时在今天，各个抗日根据地已经可以密切的配合作战，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自信，我们能够粉碎敌人的一切“扫荡”。因此，在新的胜利面前，军区子弟兵应该发扬“百团大战”的光荣传统和精神，更加英勇的消灭敌人。边区人民也要和子弟兵一样，发扬在“百团大战”中的英勇战斗的精神，和子弟兵团结得更加坚固，边区的子弟兵和人民都应该彻底为实现中共北方分局的《双十纲领》[3]而战斗，和一切的敌人战斗，因为在今后，尤其在敌后，战斗将是长期而且频繁的，而要在这长期而且频繁的战斗里不断的取得胜利，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双十纲领”，彻底地实现“双十纲领”，因为“双十纲领”就是必胜的保证。

目前，摆在边区军民面前一个任务，就是要保卫秋收。因为秋收期已到，敌人必将继续其麦收期无耻的抢掠行为，向我们进行骚扰和进攻的。我们必须要粉碎它的一切凶恶的企图。因此，边区人民需要更加热烈地参加子弟兵，充实子弟兵的队伍，用边区人民和子弟兵的无比强大的威力，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并准备着随时随地的向敌进攻，一直把敌人打到鸭绿江边！

注　释

〔1〕“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向日伪军发动的大规模交通破袭战役。重点破击正太（正定至太原）铁路，同时要求对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德石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进行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沿线的作战。八路军参战兵力，从开始时的二十多个团，迅速增至一百零五个团，故称“百团大战”。战役自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起至十二月五日基本结束，历时三个半月。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共作战一千八百余次，毙伤日军二万余人，伪军五千余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一人、伪军一万八千余人，拔除据点二百九十三个和大量敌堡，破坏铁路四百七十余公里、公路一千五百余公里，缴获各种炮五十余门，各种枪五千八百余支（挺）。

〔2〕“囚笼政策”，是指一九四〇年上半年，日军在华北加紧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采取的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分割封锁各个抗日根据地。当时把这种政策称之为“囚笼政策”。

〔3〕《双十纲领》，是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制订的，经中共中央批准后于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颁布的《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共分二十条，简称《双十纲领》。纲领的基本精神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敌后抗战，巩固与发展边区，进一步把晋察冀边区建成一个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社会的雏形。这个纲领是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结合边区实际情况制定的。它适时地总结了我党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经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晋察冀军区供给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

我们今天召开这个供给会议，这个会虽不是总结所有的供给工作，但检讨过去，对今后工作的改进有很大的意义。

查部长[1]的报告，我一般都同意，我要讲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军区成立几年来，我们的供给工作是完成了任务的。由于我们很多同志有很丰富的供给工作经验。我们很多干部也都是在长期斗争中考验与锻炼出来的，所以在这几年的军队建设中，这一部门的工作虽然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但它基本上完成了党所给予的任务。

二、我们八路军的供给人员不象旧军队的那些供给人员。旧军队的供给人员多数是他们长官的“亲戚朋友”，“私人掌柜”。那些供给人员也都是为着他们长官的“个人意志去贪污发洋财”服务的。我们八路军的供给人员就不是这样的供给人员。我们的供给人员，一方面是属于本部首长的领导与指挥，另一方面又有他供给工作的整个系统，直属于上级供给机关的领导。他能够也应当在整个的工作计划下进行工作。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我军的供给人员是为党服务的。所以他在任何环境下，对于我全军整个制度的建立与上级命令的执行，应坚决遵守绝对服从，任何环

* 这篇讲话曾在一九四一年三月晋察冀军区《抗日战场》第二期上刊载。

境下都要坚持，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共产党员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坚决执行党的一切规定与上级的命令，水火无情、铁面无私的精神，是无可比拟的。无论何人不执行这个规定与制度时，我们都可以提出意见。因为我们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坚决遵守制度的立场出来讲话，是有充分理由的，而且也应当是这样做的。因为我们不是“私人掌柜”，不能为某一个人而去变更军队的统一规定，这是为了巩固已经确定的制度而不是对人的问题。

三、供给工作虽然有了很大的成绩，但部队是在不断进步的，供给工作应适应这种进步。我们部队是由游击队进化成为正规军的。在正规化过程中，今后还要进步。只有这样，部队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所以在军队建设上，要求我们的部队更正规化。为着达到部队更正规化的目的，我们的供给工作，也要随着部队的进步而进步，随着部队的正规化而更加正规才行，否则难以适应战争要求。

现在部队中各种供给制度虽已建立，但它还不够健全。今天最薄弱的一环，还是连队的管理班长[2]的工作。这种原因一方面是连队首长的管理不适当，一方面也是连队管理班长本身能力差，很多是由炊事员提升起来的。这样他本身能力弱，整个供给工作也就薄弱。提高管理班长能力，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应使他有排长的能力与相当于排长的等级，他才能完成任务（这需要我们报经总部批准后明令公布）。同时在学校教育中，对连、排级干部亦应进行某种程度的供给工作教育，一方面可以增加连、排干部供给工作的常识，一方面还可以抽出部分学生进行这种工作，以求彻底转变。否则连队不能做好，则全军区的供给工作，亦难以做得妥善。

四、我要说的第四个问题是关于节省的问题

（一）厉行节约要无情地与贪污浪费者作斗争。军队是个消费集团，在军队本身财政经济的开源很少。军队主要是节约，争取

做到最低限度的开支。我们今天部队开支是庞大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有非常的重要，假如只是个小游击队，即使开支再大，总共也不会有好多钱。我们今天有这样大量的游击队，还有大量的正规军，如果一个人浪费一粒米，一条线，都是很大的一笔款项。一粒米，一条线，都是我们边区人民用很多血汗换来的，不是容易的。所以反贪污、反浪费的斗争仍是当前的重要任务。对我们部队中贪污、浪费分子要进行深入地严格检查，以求得彻底消灭贪污腐化和浪费的现象。今天反对抗战的是汉奸，但这些贪污、浪费家伙，就是经济上的汉奸。我们对这些分子，绝不要只看成是一人一事，马马虎虎算了。这直接与整个边区的巩固有关，是直接与抗战有关的大问题。所以我们要用很大的力量，去进行这一工作，来反对贪污、浪费的人和事。

（二）关于预算与经费开支问题。过去司令部有一个统计，供给部也有个统计，常常发生矛盾，以致无法审查。因为司令部需要一个统计，以知道全军有多少人，财政如何开支的，编制上符合不符合，组织上怎样，打仗的有好多人，吃饭的有好多人，这些都是司令部必须知道的。但我们过去只知道能打仗的，不能打仗的，光吃饭、光消耗的则不知道，也不去统计它，这是要不得的，今后要改掉。司令部与供给部的统计应求得完全一致，以便使预算更精确，同时也便于审查。

在这种预算统计中，一切数字要求精确、实在，反对任何或多或少的虚报，任何虚报就是贪污，就是破坏财政经济，这是绝不容许的。如果自己正确的估计，人员可能增加，开支可能加大，你可以另外写出追加预算。原有预算与追加预算，都要求得详细，分别写清楚，不能马马虎虎。预算时实有一千人，而以一千五百人预算，追加与预算混同一起，是不适当的。超出预算或追加数字之外的数字，应严格审查清楚（哪怕是很少一些钱），为何超用，是否应该。

在经费开支上，要特别注意节省。非属必需，硬是一分一文不开支。但我们也不是专门“看钱柜”，叫节省，一笔钱不开支，甚至完全不开支，把钱封锁在钱柜里，那就不叫节省了。我们的节省，是根据军队的需要，进行适当的供给，在这样原则下的节省。正确的开支，不叫浪费。所以问题不是“不用”，而是怎样用，用的得当与否。

在招待费上，本军干部互相来往，营长到团部，营长与营长的相互来往，开一个一般的教育准备会，有什么可招待的？如果招待了，就是浪费。以后这样的花费，一个钱也不报销。有钱自己去请客，公家不允许这样的“招待”。当然友军的来往，特别没有办法时，可以招待，但也不应过于铺张。

过节费，要依据总部的规定，我们不应擅自用钱，未经任何批准，自己去乱过节，这是不许可的。供给机关对这样的款子不报销，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我们也无权报销。这种未经任何批准的滥用现象，以后决不许可。同时如擅自去用，公家不报销，由他自己津贴费中一点一点的去扣，并且要受适当的处分。任何供给机关对这种现象，都应严格制止，一文不报，铁面无私的去反对这种现象。

（三）服装问题。服装也要节省，但不是穿得破烂，如乞丐一样才叫节省。这样并不对。我们的节省是个战略原则，但还要估计到适合战术上的原则。军风纪需要注意，军人有军容，有军威，有军人的姿态。由于这些问题，服装方面的节省，就要去适合两个方面：一方面为着节省，旧棉衣收上来时，一点不浪费，很好的修理、洗晒，很周到地保管，使它能用两到三年，这样去达到节省的目的；另一方面还要适合军容上的要求，军服颜色要一致，形式要一致，一个领扣也都要求得完全一致。这一方面表现了一致的精神，就可以排除游击习气，这是逐步正规化所不可缺少的一环。

关于棉衣修改问题。为着节省，不能把它全部换成新的。故不能旧的完全不要，或将棉衣改成夹衣，或当成废物使用，这都不合适。但又要严整军容，这就需要我们的棉衣一收起来，把可以用的尽量利用，进行很好的整理、保存；实在破烂不堪，不能再用的，可以将面子换一换（如面子太坏），里子仍可用，需要缝补才能用者，还可以缝补，以求节省与完整，又适合军容。

棉衣修改还要从卫生观点出发，修理、刷洗不是单纯为了“美观”，单单的把面子洗了一下，表面看来倒很干净，里面很脏，这不对。应当彻底洗涤，尽量做到把棉衣拆开后，经过消毒，上锅蒸，把虱子、病菌全部杀死，次年再穿，则无问题。否则，次年造成很多被传染的病员，影响了战士的健康。我们全军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大家应正确的相互照顾，是非常必要的。

服装还要经常的登记与统计，经常对下检查对上报告，差一件衣服、一顶军帽要说清原因，否则不行，以后说不清原因的要规定赔偿。

人员调动时，要有被服调动表，详细填写清楚，随便留在本部队不对，路上卖掉或无原因的损失了要受处分；战斗中损失的要补充，但是不能随便丢掉，丢掉不对。所谓“一仗一补”，打仗必补，是不对的。

新战士衣服，一定要在洗刷、淘汰、编队过后，再发衣服，不应是先发衣服后整理，这样不对。

公家东西不允许私人送人情。这个现象在某些部队相当严重，老百姓穿军衣，带军帽者极多，他们哪里来的？很多是我们稍为破烂或多而不要，或者是小孩子可爱，可怜老百姓穷而送给的。我们是革命者不是“慈善家”，因他可爱，因他穷，就进行施舍，这是要不得的现象。

（四）为了节省，还要注意改善给养。在给养工作上，我们要

关心整个部队，在预算范围内，需注意到改善我们的给养。当然不是叫老百姓负担，而是我们自己是否能很有计划、有组织地去做。譬如油少，甚至根本买不到，现在各处都开了油坊，自己榨油，便可解决问题。柴火困难，应当寻找煤矿，发动投资开办。大量烧树、特别是枣树、柿子树等果木，是不许可的。这样一方面会引起群众不满，一方面也破坏了边区的生产。给养改善着眼于整个部队，不是少数人。要从给养的改善上来提高与加强每个战士的健康与体力。我们管理这个“大家庭”的供给人员，只要你能够很有计划、有组织的去注意，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五）提高生产效率与节约应密切的联系着。供给部的编制，应求得尽量符合要求，不要有一个闲人。在生产成绩上，供给部要有统一的调查，同时应规定最高生产量与最低生产量，闲人多，吃饭多，消耗大，生产量又低又少，这样不仅仅是极大的浪费，并且增加了本身不应有的负担，这是不适当的。

（六）厉行节约还要关心我们的伤病员。我们的伤病员同志，为了民族，在英勇战斗中，在艰苦的工作中，负了伤，害了病，这是我们应当非常关心的。我们各方面再困难，对他们在给养上、物质上的需要，应当适当解决，而且也可以解决。对伤病员马马虎虎，甚至有剥削伤病员菜金者，这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是绝不允许的。或者在伤病员身上去琐琐碎碎地抠抠索索都不对。这样，伤病员得不到很好的给养与安慰，不能及时出院。结果在政治上失掉了我们的友爱，增加了他们的痛苦，影响了全军的团结；在军事上，由于伤病员不能及时归队，影响到战斗力，直接影响作战；在经济上，由于延长休养期，会增加药费、粮费上的消耗，各方面都是不应当的。因此，不管我们困难到什么地步，一定要解决伤病员给养上的各种困难。这样，在精神上、物质上、政治上都可以给他们很大的鼓励，使他们及早出院，及早恢复健康与体力，也就是等于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同时也巩固了我们这个

“大家庭”骨肉、战友、兄弟的亲爱精神。

（七）单衣、棉衣的供给计划要提前完成，及时下发部队。每年的单衣计划，务求于不到热时即能发完，因为如能及时发下单衣，则棉衣完全可以保留。否则天气一热，棉衣厚笨，虽然抓得再紧，但拆毁棉衣现象，是很难避免的。当然我们的部队，也不应由于单衣发的晚，而任意拆毁棉衣，也是不对的。

冬衣同样要求在青纱帐未倒之前，全部完成并下发。因为每年青纱帐倒后的秋冬季斗争，已成为敌后战争的规律。战斗一开始，我们冬衣已全部发下，一方面可以省得麻烦，拿去坚壁；一方面还可以解决战士冻冷的痛苦。否则，棉衣做不成，发不下，“扫荡”与反“扫荡”一开始，这样大批东西，很不容易隐藏，容易为敌焚烧、抢去，即便不被抢去，战士们身衣单薄，会直接影响战斗情绪的。

（八）冬衣的保存问题。去年我们没有种棉花，本年虽然种了一部分，但当年棉花是不能解决今年冬衣问题的，赶不上所需用的时间。所以今年冬衣不会有新的棉花接济，没有新棉花，不仅是棉衣中之棉花接不上，即布匹也会同样感受到困难。故本年冬衣的保存非常重要。假若本年的棉衣保存不好，那今年冬天全军会有受冻的危险。我在这里再三提出，希望同志们也要再三的注意（棉衣的详细的保管法即依查部长报告严格执行）。在这里提出这样的要求——今年的冬衣要保存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个工作是个艰巨的工作，但这个工作也是个实际的鉴定。各分区（兵团）的供给工作如何，将以本冬棉衣保管的成绩而定。

冀中的棉衣保存也是个很艰巨的工作，但同时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供给机关根据当前的情况，适应这个情况与环境，去周密的计划与具体布置，才能达不损不坏的目的。

（九）节约粮、弹问题。现在路东的粮食，各部要想尽一切办法，用尽最大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运粮计划。去年由于

运的粮不够，结果是用了极大的款子到敌占区去购买粮食。这是去年不得已的办法。“平粜”[3]不是为解决军粮，而是为调济民食。因此本年度不能出大批款项去购买粮食，也不能依靠“平粜”来解决军粮的问题。现在唯一迫切的办法，还是完成运粮计划。

（十）关于津贴问题，应按总部规定坚决执行。任何机关与任何一级干部，未经总部批准，没有任何权力擅改总部的规定。有意见可以向上提。通讯员跑路很多，增加一双鞋子是可以的，也合理，这是个实际困难，应该予以解决。

（十一）厉行节约，提倡废物利用。过去对这个问题虽已注意到，但还差的很远。利用废物不要说我们应这样，即日本帝国主义它还收烂袜子与子弹壳。这一方面当然是由于其本身的困难，但另方面也说明了节约的重要。人家是帝国主义，还这样注意节约，我们应当学习这一点。任何东西都没有可以丢掉的，只看你是否善于利用它。如破鞋子、破袜子、破帽子，以至于一块很小的破布，都可以做鞋底子，即便不能做鞋底子，去做纸，又是最好的东西。这一切都说明任何东西，特别是布织品，没有可丢的东西，我们要善于利用它。这样大量的征集废物作为有用之物，可以增加生产，减低成本。

更不能滥拿有用的东西当废物利用，如有的分区把几顶旧帽子作了鞋底子，这是非常要不得的。无论一件破军衣或军帽，看其能否可以勉强用，那怕缝一缝补一补都可以。滥用“废物”，恰恰正是浪费。所以我们利用废物，也要很正当的去认识它，不能把什么东西都看成废物，也不能把非废物造成废物。

（十二）关于一些私人或某一机关做服装或其他东西问题。今后这样严格规定：任何私人与机关，不管你做一件什么东西，都要经过该直属兵团首长、参谋长的批准。兵团首长要审查要求者，是否一定需要与是否有碍生产计划。

（十三）分发东西问题，全军任何人员都有一定的组织与建制，

发军衣与棉衣以及津贴费，一定要在其本建制去领取，不要到处乱领，贪图私利，这是不允许的。今后巡视团、检查团等都要在其直属单位领取，天气热可以写信索要，同时交棉衣也要交予本建制。非本人建制，今后完全可以不发给，以资划一，以符预算，以免浪费。

注　释

〔1〕查部长，即查国桢，晋察冀军区供给部部长。

〔2〕管理班长，即连队司务长。

〔3〕平粜，即计划供应的平价粮。

粉碎日军秋季“扫荡”的经过及基本经验教训*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一、要总结反“扫荡”胜利的经验

边区成立后，日军从一九三八年第一次对根据地“扫荡”开始，年年“扫荡”，但每次“扫荡”，敌人均吃亏不小。其“扫荡”的特点是，装备好、火力强，而兵力不足，往往是单线的，比较好对付，打也好打，走也好走，对我威胁不大。这次日军的秋季“扫荡”，与过去不同，敌人根据过去“扫荡”失败的教训，这次投入了很大的兵力，采取了许多步骤，其目的仍未得逞。

我们在一九三八年反“扫荡”胜利后，采取彻底检讨工作的方法，总结经验，改善了政权、群众和党的工作，本区工作有很大转变。对这次反“扫荡”的胜利，亦应彻底检查我们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这对于应付今后环境很有意义。

二、敌投入秋季“扫荡”的兵力与企图

日军此次“扫荡”的一个基本特点，其投入的兵力比过去任何一次都大，参加“扫荡”的共五个师团和六个混成旅团，当然还不是每个旅团的全部，而是大部，总兵力达七万余人。有六个师团的番号：即第二十一师团，从去年反“扫荡”后来到平汉线，

---

* 这是聂荣臻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中共晋察冀北岳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报告的一部分。

是关东军，曾参加徐州战役，从山东到中条山参加战役后转到平汉线，以保定为中心。第三十三师团是从华中来的，参加过中条山战役[1]，在八月初来到石德路，以石家庄为中心，在我四分区附近活动。第四十一师团是从山西夏县、孝义等地来的，原来驻在晋南，沿同蒲路，从繁峙、砂河到台怀，在二分区一带活动。这三个师团差不多是整个师团都来了。这是军区周围新增加的敌军兵力。另外原来驻平汉线的第一一○师团的一个旅（津田）全部(其他部分在冀南)。第二十六师团在雁北的部分到上寨、下关。再有在平西方面的第二十七师团的一部分。所谓六个混成旅团，是常在边区周围的五个，从太原来的一个，共六个混成旅团，即第三混成旅团、第四混成旅团，第九混成旅团、第八混成旅团、第二和第十五混成旅团。各混成旅团的主力都参加了“扫荡”。敌人的宣传是这样，我们的了解也是这样，所以敌人的兵力是很大的，比进攻中条山时还大，比进攻长沙及郑州的也大。可以说一年来敌人对任何根据地的战役“扫荡”，这次兵力是最大的。这次敌已将华北所可能抽调的兵力都抽调来了，集中最大的力量向我们“扫荡”。所以敌人这次“扫荡”费的心力也较往年大。敌人号称“以百万大战来回答百团大战”。所以，在反“扫荡”中党中央对我们一直是很关心的。

敌人这次“扫荡”的主要企图是彻底摧毁边区。首先彻底破坏边区物质力量及各种建设，糟踏青苗、田禾，大肆焚烧，扬言“不给边区留寸铁”，连烈士塔的铁链子、白石头也拣走了，凡是有点用处的东西，能搬则搬，不能搬则破坏。敌之经济破坏是有计划的，那时正收统一累进税，秋收将开始，同时正在准备冬服，这种经济破坏是为达到消灭我主力的一个步骤。所以，进而就找我主力，拚命合击，企图消灭我有生力量，摧毁我们主力，进而摧毁我边区。

这次敌人“扫荡”边区以前，就有一个很大的战役部署。自

从去年冬季“扫荡”以来，即对我们边区没有停止过“扫荡”，每次“扫荡”都带有战役侦察性质。特别是第二十一师团，对边区地形不熟悉，为搞得更熟悉，费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从中条山战役起就着手，中条山战役结束后就转来边区作战。

三、这次“扫荡”与反“扫荡”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八月十三日到二十八日，从山西开始。第四十一师团，第三混成旅团，第四混成旅团，第九混成旅团联合整个雁北敌军，从山西、河北交界地方，沿长城线构筑封锁线和作战阵地，首先构筑由雁北到娘子关的封锁线。接着三十四师团以石家庄为中心，由正定迅速出动，配合由西北向东南的敌军，由东南向西北两面夹击。同时，在滹沱河南的第八、第四、第九混成旅团，则由南向北进攻我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经济建设等重要机关所在地，实行大范围的合击。并在我们后方搜山，破坏物质资财，捕捉坚壁人员，直到二十八日，敌人“扫荡”的中心都在这个地区。

第二阶段自八月二十八日后。这个地区敌主力向北，向沙河推进，配合山西一部分由西向东之敌。这时一分区所在地区的津田旅团，二十一师团，第二混成旅团，由东北向西南，由北向南运动。在三分区完县、唐县、定县的敌人也出动，一、三、四分区之敌与二分区之敌由西南向东北、由南向北，由西向东运动。上寨、下关之敌由北向南运动，形成大包围，即所谓“铁壁合围”战术[2]，全力向阜平前进。九月二日在阜平合围，企图在沙河两岸特别是沙河南岸，消灭我主力。敌以为用这样大的压力，预料我们一定突围，并预料我们突围决不向北，因北面有敌，也不向西，因在地形上不适合大部队行动，且西面有敌人在堵击。同时，敌人为诱骗我们向南突围，从飞机上丢下假命令通报，说日军已从东西两面急进，紧紧向阜平压缩，即要向阜平奇袭。并将在阜平南的兵力分开一部分，没有封锁我沙河，但在沙河以南却配备了多

层次的兵力。他以为我们看到阜平没有敌人，一定会向南转移，企图待我冲到沙河南面它的纵深配备地域，即包围消灭我们。但我们却没有这样办，及时作适当的转移，敌人又扑空了。敌人在阜平布的这个网也落空了；于是收起网来将兵力分开，以后就进入第三阶段。

敌之主力象“织布”一样，向东南西北各路分散，在每条山沟中采取纵队行进，纵队下又分横队行进，企图碰到我主力，哪里碰到即在哪里打，以求部分歼灭。但这样的捕捉网，亦未捉到我们。敌即控制我们中心腹地，控制我腹地者差不多有两万人，分驻龙泉关、方代口、王林口、王快、城南庄、广安、灵山、口头、岔头、王陈庄、和家庄、稻园以及管头、岭西、南北大悲等地，构筑据点，修汽车路，建临时飞机场，利用这些交通线运输补充物资，各据点之敌不断搜山抢粮，进一步破坏我经济建设。同时，采取分区合击，突然包围，有如“打网”，企图对我分散之主力，采取反复的各个击破，以局部歼灭我们。两月来，大概可以分为如此三个阶段。

这次反“扫荡”，的确我们很辛苦，斗争很残酷，同时也很危险。如果我们处置不谨慎，随时有遭受歼灭的可能，因为敌军随便哪一路，都占优势，我们随时随地都有被包围的危险。这次战役，我们事前曾发出七月二十三日的训令，指出这次“扫荡”的严重性，并且估计到敌人可能采取的战略战术，要求作好反“扫荡”的各项准备。但我们在时间估计上有些出入，晚了约半个月。

四、我们反“扫荡”的方针是正确的

这次反“扫荡”，我们基本上采取游击动作，极力避免与敌主力决战。敌人想消灭我们，我们就设法保存有生力量，不被其消灭，所以部队分散活动，在敌人的小圈子里钻出去。有时要打，但也是为了避免决战。我们的方针不是把主力集合起来与敌人拚一家伙，如果那样正中敌人之计。我们分散活动有时也会吃点亏，但

不会被敌人打烂，我们平时在部队建设上就注意到这一点，有党的保证，散开也会合起来的，所以就大胆放出去。

在第三阶段就不同了，有些部队集结争取主动，打击出击之敌，伏击其运输补给部队。开始是游，打也为了游；现在是打，游也是为了打。那时我们提出积极保卫秋收的口号，积极出击。

我们在战役指导上即是如此，基本上就是很耐心的与敌长期坚持，不是急躁的与敌人拚，故整个主力未受损失，这种措施是适当的，基本上粉碎了敌之“扫荡”，北方局、军分会[3]亦认为是很大的胜利。

五、认清形势，搞好总结，以利再战

这次敌人“扫荡”妄图从根本上毁灭我们，实际上这个目的没有达到，总的说我们损失较以往为大，但各地所受的损失是不一样的，二分区较一、三分区的损失为大；即在同一分区内，又有某些地区损失较大，而另一些地区比较小。在接近封锁线地区敌实行“无人区”暴行，在许多区域抢夺粮食、财物，但敌人的破坏有一定限度，即受一定的牵制。若我们给敌以打击，破坏就更小些。军队方面供给上受点损失，但敌人并没有能破坏我整个建设。敌人毁棉衣、棉布，企图使我穿不上棉衣，实际上我们则穿上新棉衣，而“皇军”则还在补他的破衣。敌人还抓走了一部分老百姓，企图大量消灭我军有生力量，没有得到成功，我军除部分的在敌合击突围时，遭受一点损失外，整个有生力量最高限度的保存下来了。这是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认为过去的办法不够，因此这次时间更长，兵力更大，这是哈达与冈村[4]的计划，但依然无效。中条山战役是敌人的得意之作，对我边区他亦采取中条山的经验，但他没有消灭我们，不管东京电台怎样宣传，一再宣称消灭了边区军队，但其战报自相矛盾，自打耳光。尤其最后一个时期，牛皮吹的那么大，但敌华北最高指挥官冈村大将对记者的谈话却充分暴露丑象，自己承认八路军还存在。十月二十日

北平汉奸电台广播冈村与记者的问答，冈村自供："华北治安的恢复困难，要想很快消灭'共匪'是不容易的，但治安的恢复是可能的"。记者又问："今后对边区八路军有何良策?"冈村回答的很有趣，他说："共匪象老鼠，皇军犹如狮子，狮子力量虽然大，但不能捕鼠，要找猫来才行，这猫即是民众"。他所谓的"猫"，即是汉奸组织，"以华制华"那一套。但我们说，他找的不是猫而是狗——汉奸走狗，狗是永远不能捕捉老鼠的。我们八路军仍然存在，冈村也没有办法，他的五个师团加上六个混成旅团，尽管各路都占优势，并把中条山的"铁脚闪击战"用到我们边区，采取"铁壁包围战"重重包围，以为一定可以消灭、摧毁我们，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他有"铁"脚，我们也有铁脚。实际上敌人脚上没有"铁"，在五台山、太行山上他就落后了。所以我们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扫荡"，经济破坏只是局部的，主力犹在，边区未毁灭，基本上我们是胜利了。它的整个计划没有成功，当然两个月的斗争是很残酷的。

北方局的指示和我们的结论与估计是一致的。北方局及其他地区，都很重视我们这次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因为新形势是在我们这个区域开始的。所以我们要很好的总结。一九三八年检查工作对根据地建设有很大意义。今后也要很好的检查我们的工作，对全华北都是很重要的。这是一次严重的"扫荡"，稍有不慎，就会覆灭，这不是过于夸大的说法。在很严重的局面下，敌人没把我们打垮，这是很大的胜利，证明我们有搞不垮的基础，那末我们就可以相信，我们有力量和这样的敌人周旋。虽然今天主要是检查工作中的弱点，但检查之前，必须有这些认识。

注　释

〔1〕中条山战役，指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卫立煌指挥所部在山西抵抗日军入侵的战役，也是日军对国民党战场较大的一次进攻战役。一九四一年五

月，日寇调集五个师团，约七万人的兵力，向中条山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国民党守军合计十一个军，共约二十五万人。由于这些国民党军队，以反共为主要任务，对日军缺乏作战准备，在日军进犯时，大部分采取避战方针。因此，虽然华北各地的八路军主动出击，截断了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白晋路等日军的交通线，给国民党军队以积极配合，国民党军仍然全部溃败。在三周之内损失兵力约七万余人，丧失了中条山及附近地区的大片国土。

〔2〕铁壁合围战术，是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重兵、多层次包围，疯狂“扫荡”的战术形式，它是在“分割”、封锁的态势下，由过去通常使用的“分进合击”，改为鱼鳞状配备的“铁壁合围”。

〔3〕军分会，指华北军分会。为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九人组成，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

〔4〕哈达，即安达二十三中将，当时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村，即冈村宁次大将，当时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武装斗争中的军事建设问题*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一、根据地军事建设的几种形式：

（一）正规兵团，是坚持根据地的主力部队。经过几年的斗争，正规兵团已经组成，在各种制度，党的保证、军事素养等方面，都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经受了考验。今后的任务，是继续提高质量，增强战术素养。象开始时那样大量的发展阶段，已经过去了。根据主客观条件，正规兵团只能有一定的数量，应使它经常满员，不断地提高质量，这是浩大的工程。

（二）地方武装，在编制上、装备上都与正规兵团不同。一年多以来，地方武装有相当大的发展，今天的任务，一般说来，要加强领导和提高干部质量。现在地方武装在战斗力上特别是在战术运用上都还较差。这些武装的发展，也要有一定数量的限度。今天的发展已经相当饱和。所以县、区游击队，要确定数量。一般说，人员与枪支应为二与一之比。

（三）人民武装，即民兵建设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要根据此次反“扫荡”的经验，加以改造和重新整理。过去民兵建设的成绩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也有弱点需要指出，否则就无从改造起。过去从组织上讲，多是带群众性的组织。“民”多“兵”少，强调独立，因之与政权、部队的关系不够密切；强调民主，也发生了比

---

* 这是聂荣臻在晋察冀北岳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报告的一部分。

较散漫的毛病。训练上带有形式主义，但反对形式主义并不是说要取消必要的形式，只是反对一切仅仅为着形式。由“民”到“兵”，还必须要有一定的形式，这是必要的，不是形式主义。但象过去操场上的正步走，制式教练，用力多效果少，以及用打不响的炮、木头做的枪进行教练等，则是形式主义的。过去在干部的培养上，曾指出要合乎游击战争需要，但实际上教的还是正规军的一套。这在实质上是教条主义的，这许多问题如果不指出来，就不能纠正民兵工作之缺点。今后军事建设，要把中心放在这里，把最大的力量放在改造与整理人民武装方面，把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口号变为现实，才能把群众性的游击战术具体化，才能把广大民兵变成为主力军的后备力量与补充源泉。今后建军重心必须放在人民武装上。

民兵工作怎样做？

1. 武器配备及弹药补充，这要看我们的条件。今天民兵的装备基本上是土炮，(不是土枪，土枪打的太近，只有在某种条件下可用）土炮可以打得远，便于民兵打炮后及时的转移，弹药又易于补充。我们要提高民兵和干部使用土炮的信心，打破否认低级武器的观点，真正演习给他们看，证明这不是空想。

2. 技术教育，土炮怎样瞄准，将来要设计改进。步枪的使用也应当教，因为我们可以夺取敌人的武器。手榴弹也要学着用，但这是一种近战武器，只能在一定距离使用，民兵还不能象正规兵团英勇冲锋，故只能配备一部分。地雷的使用也要教，它的构造简单，对敌威胁很大。

3. 战术教育，今天没有条文，过去的条文中没有民兵战术。今后要从实际战斗中来研究新的民兵战术。

4. 干部的培养，过去送的干部条件过差。几次都是冀中质量较强，成绩也较好，数量也较大。现在确定，排级以下干部由各军分区训练，但教育行政属抗大二分校[1]领导。各军分区还有一个

队，专门培养民兵干部。要求各地选送符合条件的干部来受训。为领导指挥便利起见，应送地方群众组织的领导人。

5. 管理与锻炼——反对形式主义，但要保持必要的形式，如遵守时间，动作迅速、夜间动作的肃静，防空、防毒这些教育都是必要的，但教育的份量上要少些，有些军事知识知道个大概就可以了。

6. 在组织上，区以下不脱离生产。

7. 抗战勤务主要还是由民兵来做为好，因为真正能担任勤务的主要是民兵。

8. 妇女自卫队不必取消，因为他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家庭妇女武装起来走上操场，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对抗战勤务上也有好处。但内容必须改变，操场锻炼要取消，应增加卫生教育与救护知识，这对抗战与妇女自身都有好处。同时，假如政府将妇女自卫队委托妇女救国会管，则“妇救”在群众工作方式与行政命令方式上不易统一。所以应将“妇救”与妇女自卫队分开。自卫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妇救会可以群众工作方式来保证勤务的完成。

二、各种武装的相互关系及游击战争的指导原则

（一）各级武装有其不同形式与不同建制。但低级武装必须服从高级武装，因为高级武装担任的任务更重要，只有主力的胜利，才是决定的胜利。所以人民武装应服从游击队的指挥。大的战斗中，地方武装应服从主力指挥。

（二）在同一根据地内，必须要求集中领导与统一指挥。同时游击战争又要求各个作战单位能独立行动。这种集中统一和各单位独立行动，两者不是对立的。军事上集中领导与统一指挥是一个原则，即使不加规定，在战场上也必然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同级的，常以命令规定或自动的接受指挥，或以后到者服从先到者。整个战场上不允许各自为政。游击战争的独立行动，与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不相违背。独立行动是在统一意志，整个意图下的独立

行动。游击队的具体行动不可能事事时时加以确定，但游击队的部署是在统一意图之下进行的。有些同志把这一原则丢开，只看到一些狭小的技术问题，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常看到，我们力求统一而敌人极力破坏我之统一。敌人则统一行动，因而更使我们认识到统一之重要。今天敌人不断反复合击，与我争夺地区，如我不能很好的协同配合，即易遭受敌人之各个击破。

（三）军区与军分区的性质，是正规军、是八路军的一部分，但同时又是地方性的，在地方从事各种建设与斗争。因此，具有正规性与地方性的两重性质。有的同志在发言中否认其地方性，这是错误的。在我们组建军区后，各根据地都建立了军区与军分区，也都表现了地方性。有的同志发言，指出只有县委领导下的基干游击队，才有可能配合各种斗争。这是对党军认识上的原则错误。每一个党军的部队，从根据地创造开始，从来没有脱离坚持地区的斗争。秋收、春耕等工作、处处都有主力部队参加；同时部队政治机关的各部门也参加了地方各个战线的工作（如锄奸、宣传教育等）。党的总任务下来，主力从来没有一次不参加斗争的。党军之所以与其他军队不同，是因为他不仅打仗，而且还参加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斗争，否则就没有与敌进行长期坚持根据地斗争之可能。有些同志发言中否认党军的历史和它现在的工作任务，这是主观主义的，而且是武断的。战略战术上，在八路军出征时的洛川会议上就决定了“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基本方针。有些同志否认八路军会打游击战，这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

因此，在军区、军分区的性质上、战术上与参加各种斗争上，有些同志的认识是错误的。从这种错误的认识出发，在今后敌后斗争更加残酷，主力更加需要分散作游击活动的时候，会得出今后用不着主力存在的结论。

（四）军分区的组织及作战方针，军分区包括正规军与地方部

队。其作战方针是：一般是游击战，在有利形势时才采取运动战，以求歼灭敌人。

（五）正规军与地方军划分问题，如今天晋东南的组织形式，军区、军分区统辖地方兵团。军分区有旅，为旅管区，其优点在于把正规军与地方武装分开，其缺点则是把各县的武装结成地方兵团，其他游击队则很薄弱，而且增加了许多后方机关，所以，如果正规部队没有特殊任务，则建立如同我们这样的混合的军区与军分区是比较好的，可以减少重迭的组织，而且对今天的斗争有重要意义。

（六）地区队[2]与县基干游击队的关系问题，发言很多，但原则的问题很少，主要在于相互关系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象有的同志那样否认地区队作用。例如某分区没有某地区队在南面坚持，滹沱河南的形势就会改变。敌人为什么不在温塘驻下，就因为南边威胁太大。为什么敌人几次进攻黑水坪，就因为×区队在那里，对它有威胁。为什么最近崞县、代县地区敌人反复“扫荡”，就是因为我们某地区队在那里控制了这一地区。所以，不能否认地区队的作用。我们把地区队部署在敌人封锁线以外，这对于坚持那些地区的工作有很大的意义。因而把军事建设上的这一重要步骤，加以抹杀是不对的。同志们的发言都是讲地区队个别干部的领导问题，而不是地区队本身。这些问题是两方面的，要使关系弄好，必须双方检讨，在加强党性锻炼的过程中，以自我批评精神加以解决。今天的困难是这些地区没有适应它的政治和党的组织形式，地区队与地方没有组织配合。如果地委和军分区关系好，则地区队与基干游击队之间的问题就少，反之，则问题就多。我同意有的同志的意见，地区队对基干游击队只管使用，不管其教育，以致使用也使用不好。同时地区队在几个县范围内活动，不能如同地委、军分区、基干游击队与县委那样密切。再加以地区队某些干部对地方情形了解与关心不够，难免发生不协调

的地方。但是这不能推翻地区队存在的必要及统一行动的必要。要纠正地区队现有的一些缺点，不是一两天所能办到的。这是个党性锻炼的过程，同时还要加强地区队政治工作，使之多参加地方工作，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是很注意的，从没有忽视同地方工作配合的问题。如不这样而各自为政，则敌人就会以“浸透政策”利用我们的空隙。

因此，地区队与县基干游击队的关系应确定如下：

1. 统一指挥，独立活动。统一指挥从来没有限制基干游击队的独立行动。并且这种统一指挥在残酷频繁的斗争中，可能使某些部队能够换班整理和休息。

2. 管理、教育、供给、卫生工作要统一。但统一是有限度的。管理教育的实施在于连队，主要应由连长负责。所谓统一，只是统一到教育管理的计划、教材与进度，供给卫生统一于军分区。今天的困难是在于某些地方武装人数常有变动，预算交不上来。这实际上就是游击习气的反映。如不与游击习气作斗争，则无从坚持党的财政政策。

为将来能适时的（如有必要）把正规军与地方军区分开，今天的地区队就要成为将来的地方武装的骨干，县基干游击队与地区队，就是为将来建设地方军区作准备。

三、武装与党、政权的关系

在讨论中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组织起来的任何武装，都是党领导下的武装，而不能说它是某某县委的武装。我们八路军是党领导的，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它是政权的一部分，是由政权合法的形式来指挥的。它的性质与政权性质是分不开的。

党怎样领导部队？经过党的委员会与政治机关，并由政治委员具体组织实施。政委不只是党代表，也是政权的代表。他代表党执行党的政策，又代表政权执行政权的权力。政治机关亦如此，

它代表党同时又代表政权。我们把武装掌握在手里，那么这种军事领导机关，是政权的，也就是党的。所以，今后各级党的军事组织与政权的军事组织要合而为一，今天先从人民武装开始，把武装建设的重心放在人民武装上。要求各级党在三个月内作出成绩来。

各级党领导武装，都是整体的，不能分作地方党或其他什么党。这不仅是语病，还表现为组织问题上的一种倾向。党就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党的组织形式有不同，具体工作有不同，但这只是分工的不同，而任务则是一致的。在华北从十八集团军到地方游击队，都是在党领导下的军队，决不能分出哪一段是哪一个的。

注　释

〔1〕抗大二分校，全称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在陕北瓦窑堡成立，一九三九年二月迁至晋察冀军区，是培养连、营职干部的一所学校。

〔2〕地区队，是晋察冀军区地方武装的主力，由各军分区将民兵、游击队的精锐部分集中组建而成，地区队的规模约千人左右，在保卫地方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九四二年二月，晋察冀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敌后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发布了“精兵简政”的命令，正式规定：地方军分为地区队、县基干游击队与区基干游击队。据此命令，当时北岳、冀中、平北、冀东等军区共编成三十九个地区队。

目前形势与今后工作*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

一、太平洋战争问题（略）

二、新形势下我之总方针

（一）中央指示我们："保存自己力量，巩固自己阵地，以待时机"。这是在相持阶段中我之总方针。

（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即是我们的新时期。

（三）在新时期之初，与过去形势无大变化。

（四）我们的方针，仍然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反攻，巩固根据地，作为反攻的前进阵地。

与过去不同的，是我们的准备更加明确，更加具体。因为我们已经接近于反攻阶段。

（五）在此总的方针下，按中央指示，我们在军事上应随时准备迎击敌之"扫荡"；认真开展游击战争，巩固自己的阵地；同时要整训部队，休养兵力，提高士气；长期训练干部，加强军事建设；加强对外宣传。

（六）对敌采取政治攻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之形势变化，最有利于我之政治攻势。

（七）实行精兵简政，以便长期斗争与准备反攻（保存干部与节省物资）。中央指出，党内贪污腐化的恶棍，应加严惩（经济上

* 这是聂荣臻在平山县召开的北方分局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的汉奸）。必须厉行节约，使我人力财力上都有积蓄，以便进行反攻准备。

三、我们的具体工作

（一）我区现在情况的估计

1. 敌人在这个时期内，不会放松对占领区的统治，必将加紧对我之“扫荡”与掠夺。

2. 战争中心在太平洋。华南我军的行动，是对太平洋战争的配合与策应。中国军队在太平洋战争后情绪较前大为兴奋，积极性将会提高。敌人的注意力亦会集中在华南方面。在苏联方面，日寇还会继续加紧戒备。因此敌人对华北增兵的可能已减少，象去年秋对边区的大规模“扫荡”的可能性一般亦已减少（去秋大“扫荡”必须从其他战场上调来兵力），但由于敌之交通方便，兵力转移容易，当敌在整个情况处于不利时，亦可能以集中兵力确保华北。因此将来对我之大举进攻可能性还是有的。去秋的大“扫荡”，仍应成为我反“扫荡”准备之对象。

3. 在目前局势下，对局部分区的“扫荡”可能性增多了。敌之主动性将要增强，以攻为守的动作将普遍采用。去年战斗比前年频繁，但我之主动出击较前年减少，即敌主动性增强的明证。

4. 敌之战术基本上还是分散配备，堡垒仍有继续增加的可能，现在已达一千六百余据点与堡垒，比内战时期的堡垒还要稠密。因民族战争有广大的社会基础，与内战时期不同，敌难于控制广大的面，因而不得不继续增加堡垒。由于敌之分散配备，使其兵力集中困难，大的“扫荡”也就困难。敌前线靠近我地带，主要配备日军，而敌之侧后则多为伪军。敌堡垒虽增多，但兵力未增，因此敌后的空隙大。由一九三八年至今，敌桑木师团长的精神仍在继续采用，虽在去秋大“扫荡”时敌曾企图捕捉歼灭我主力，为一劳永逸之计。但“扫荡”失败后，敌又不得不感到用大“扫荡”无法战胜我们，而回到桑木的精神上来。目前因敌之兵力并

未增加，故其机动部队极少。

5. 分割政策仍在继续。在平原、山地间，各战略区之间，县与县间，由沟到墙，由一道沟到纵深的几道沟，对我进行分割，而便于敌之“清剿”。另一方面，继续进行经济封锁，以阻遏我之物资交流，并掠夺我之物资。

以上几点，是敌寇业已一般确定了的方针。

（二）我之军事部署应注意之点

1. 一方面要准备应付“扫荡”，一方面要集中整训。因此主力应经常集结于机动位置整训，并随时应付敌之“扫荡”。

2. 现在如无对其他区域反“扫荡”之必要的配合，一般不作大规模的对敌出击与铁道破击。以免吸引过多的敌人与过多的“扫荡”，赢得时间，进行更多的反攻准备工作。因为现在大规模的出击并无决定意义。

3. 以地方武装为主（由地区队到县、区游击队），采取不断的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政治攻势，瓦解和消灭伪组织与伪军，相机收复一些地区。例如一分区我之武装宣传队，真正发挥了游击队的作用。各分区的武装宣传队，虽已取得一些成绩，但为数太少太小，尚未能收得更大的效果。这些宣传队在政治上军事上必须精干，我们必须注意组织与指导游击队与游击战争。由于敌之侧后存在着大的空隙，因此在封锁沟外的活动可能收到大的效果。否则在我主力整训时，地方武装又不积极活动，在敌之主动下，我们许多地区必不能保持，而变为总的退却。

4. 在这个精神下，要反对空喊运动战和对游击战采取消极态度。今天我们进行运动战，只有在占绝对优势时，才有可能。对游击战的消极，某些同志中是存在着这种情绪的。在地方县、区同志对我们的意见中，固然有些是不对的，但可以看出，我们更有计划的来指导游击战争还极不够。敌人采用了内战时期国民党的堡垒主义，但因民族战争的广大社会基础对我有利，使我仍能

在敌后活跃，特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对我更加有利。

（三）部队的整训与兵力休养问题

1. 加强军事、技术训练，深入战斗教育。我部队自正规化以来，已获得许多进步，在干部伤亡上与子弹消耗减少上，都已表现出来。过去由游击队进到主力时，各方面的进步能够显著的看出来，而现在则因各种制度一般都已建立，其进步不易显著看出。但教育的不深入与不经常性，在某些部队中仍然存在着。在去秋反“扫荡”战争中，这些缺点暴露得最明显，因此必须认真的进行整训。

2. 提高在职干部的教育。这几年来在职干部的学习还是很差的。

3. 实际与理论的联系，反对教条主义与狭隘经验论。有些文化程度较高的新干部，能了解一些理论，但不能与实际联系。有些老干部，仗着狭隘经验而妨碍他的进步。即在抗战以来参加革命的某些新干部，也有因循狭隘经验的。因此狭隘经验论在某些新干部中也同时存在。我们提拔军事干部时，往往多以作战勇敢做标准（这是必要的），对于政治水平注意较差，因而农民的保守性与狭隘经验论，在这些新干部中存在着社会基础。

4. 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科学常识教育，要求我们更有计划，更深入的进行反对形式主义。这在今天还是很差的。不能只满足数目字，而忽略战士们能否吸收与消化。教育时间不宜过长，使干部有时间考虑问题与作准备，战士也应有一些空隙的时间来思考。关于星期六党日问题，我们的经验只要半天就够，因此是否需要一天，亦应重新考虑。在某些连队中由于我们没有很好的按时间来进行工作，以致感觉时间不够用。

5. 连队政治工作要彻底检查，减少不必要的组织，减少会议的时间。在这方面如不能进行彻底改革，则政治工作永远不会深入。现在政治指导员的会议，平均每月达五十九次之多，得不到

适当的休息与进行准备的时间。为了深入教育部队，必须使政治指导员能有相当的时间。只要对部队无大损失，有些会议必须减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收获必较损失为大。“政工条例”[1]要加以很好的讨论与解释。

（四）长期的有计划的训练干部

1. 最近抗大二分校毕业的各级干部，作为准备反攻阶段的最后补充。

2. 各分区所训练的排级及地方武装干部，除补充部队外，应作为反攻阶段的储备。

3. 抗大二分校在本届学生毕业后，要办一个高上科，以储备营、团职干部。办一个陆军中学，抽出部队中优秀的班、排级干部受训，在军事上是中等程度，在文化知识上科学知识上也达到中学程度。办一个附属中学，吸收地方半知识分子青年，在文化与科学知识上要求达到初中程度，而军事上则初步懂得步兵基础知识。这是两年到三年的干部训练计划。在“附中”里，要逐渐吸收地方一批小知识分子青年进行训练，以改善部队下级干部的文化科学水平。地方编余的区级干部，也要吸收一批受训，给以军事与文化科学训练。他们具有地方各种斗争经验，这些干部在反攻时是非常需要的。平西可以利用抗大二分校，不必再设新的学校。冀中可自己创办中学。在反攻时，部队一定要扩大。因此今天就必须准备必要的资本。在抗大教育上，过去与实际的联系不够密切，还存在着教条主义。许多教员缺乏丰富的战斗经验与抗日战场上的经验。

4. 分区级及团级干部应具有较高的战术素养与战略眼光。今天有些干部，不注意在实战中总结经验，提高自己综观全局的能力，积极学习的精神比较差。与敌相比较，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与进步还比不上敌人。我们在小战斗中的每一失利，必须加以深刻研究，而不能以几句公式化的评语来总结了事。要了解作战全

局问题，应有丰富的知识。目前在我们的环境中，还有许多可资研究的军事和文化素材。

（五）缩编与补充

根据中央精兵简政原则，进行人力物力的长期准备，因此必须进行缩编。但另一方面还需要补充。

1. 兵团依现有人数分成三种编制。甲种团（十二连制）的编制大家可以考虑，应编为三个营还是四个营。编为四个营时，可以一个营作为山岳中熟悉地方环境的游击部队。乙种团编为九个连。丙种团可编为中央苏区时的小团（五个连）。丙种团是由大团缩编的，已经有了基础，小而精，使将来在反攻时有扩大的基础。这些都是主力兵团。

2. 各级直属队进一步照编制力求精干，在会后进行点验。

3. 今年已准备并实行新兵役制的动员。以反“扫荡”损失为基准加以补充。恢复元气，补充损失。

4. 新兵役制应按北岳区党委的决定实行（略）

（六）主力军与地方军，地方军区与军分区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根据中央的精神和我区具体情况实行之。

1. 我区军事发展与建设的特点。开始有一小部分正规军来发展游击队，而后由游击队的发展产生正规军。现在正规军的建设已进到了一定程度。我们与其他区域不同之点，在于其他区域开始时即有较大的主力，由主力进到地方化。因此在军委指示中，强调划分正规军管区与地方性军区，而我们的军区与军分区则早已地方化了。

2. 我们在组织上，地方性军区与军分区兼有主力性质，但主要还是地方性。

3. 亦有这两种性质，其优点在于能与地方各种斗争密切配合，指挥上亦更加统一。我们过去主力兼有地方性，在地区坚持、巩固与建设上均有重大的作用。在目前残酷的斗争下，如不健全加

强军分区的领导，则有许多地区的形势是不堪设想的。其缺点则在于主力不能有更大的机动，地方部队不能形成整个系统。今天我们如分成主力军管区与地方性军区，则指挥机关过于重叠，其他机关亦多重叠，与精兵简政的原则不符。

4. 根据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主力军与地方军应当统一指挥，以加强领导并减少机关。在反攻时，主力必然要出动，因此要有将来分开的准备。在军分区下成立地方武装部，领导管理地方军，地区队与县、区游击队均属其领导，使之成为过渡到地方性分区的雏型。地方武装部长应成为地委的军事部长，或在地委下设立武装委员会；由地委书记、人民武装部长、地方武装部长参加，以形成统一的领导，应与地方党更加密切起来，使地委能更加习惯于领导与掌握武装。对地方武装的指挥目前仍通过军分区实行之。

（七）人民武装问题（略）

（八）高度的节省人力物力，储蓄力量，支持长期的战争，准备反攻力量

1. 精兵问题已如上述。简政问题，北岳区党委十一月扩大干部会议已得到了解决。各级党政民机关、学校已缩小约八千人。在今天不仅财政上需要缩减，而且我们已有可能缩减。过去我们划小区，是因为我们基础薄弱，干部能力小，后来把区扩大，是因为干部能力增强，工作已有基础，而现在则已经可以再减少一些干部，因此在精神上不是消极的。

2. 财政问题，做到量入为出还很困难。今年还有把握渡过，明年则有相当困难。根据地财政问题，在今年必须估计到明年。去年统一累进税已征收，今年此税还需略略提高，才能坚持。

3. 在经济方面，必须加强根据地内必需品生产，帮助人民春耕。部队应有计划地尽可能组织生产。今年春耕生产必须很好的组织，并应以消灭熟荒地为主。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严惩贪污，肃清经济汉奸。在经济制度上，要更加进步。肃清一切铺张浪费，尤其领导干部更应以身作则。在保存棉衣，少费一件单衣等问题上，各单位应严格管理，这不单是供给机关的问题，而主要是领导干部的管理问题。

5. 加强对敌经济战。敌寇对根据地的掠夺与经济封锁，说明了它在经济上的困难。今天敌我之经济战非常尖锐。敌寇所实行的配给制度，由于中国社会的特点，没有达到很大的成功。因此有许多必需品，敌寇尚未能达到封锁我们之目的。敌寇封锁我粮食的计划，亦未能成功。在金融方面，最近敌我又已形成尖锐斗争。过去敌人大量贬值收买法币[2]，夺取外汇。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夺取外汇已不可能，因此大量向我区抛出，以吸收我区物资。这个问题在冀中已很尖锐。过去我们因要提高边币而不愿使法币流入敌手，故仍将法币按八折行使。现在则应杜绝法币流入边区，规定法币不能在市面行使，以边币为唯一本位币，法币在行使时，必须到银行按市价兑换，但边区银行应设法拒绝兑换。

四、几个问题

（一）军事斗争与各种斗争的配合问题

1. 在对敌之各种斗争中，武装斗争是主要的，但没有其他各种斗争的配合是不可能胜利的。

2. 在北岳区党委十一月会议中，有些同志觉得八路军与地方各种斗争配合不密切，甚至提到八路军正规化以后，与地方的配合不可能，这是不妥当的。但某些部分与各种斗争配合得还不够密切，这是事实。

3. 我们能不能离开各种斗争？不可能。我们不能进行单纯的军事斗争。部队中有些同志以为部队主力化了，就可以脱离地方性，可以避免地方工作中的许多麻烦琐碎问题，这是空想。我们不能这样想，不能对地方工作取不关心不过问的态度。我们是共产党的军人，不能把自己看成一个简单军人。因此在配合各种斗

争问题上，领导干部应有自我检讨。同时应纠正部队中少数干部这样的想法。

4. 我们如何更加密切军事斗争与各种斗争的配合。在各种斗争中，军事斗争是主要的，因为今天一切是为着战争的胜利。只有军事的胜利，才是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但在整个战争中间，除了军事以外，在每个时期仍各有其重心。譬如由秋季反“扫荡”结束后到现在（秋季反“扫荡”是以军事斗争为重心的斗争），我之对敌斗争重心首先放在经济战线上。部队才由战场上下来，就去帮助秋收，接着就平沟、运粮，与敌之三次“治安强化运动”针锋相对。这时候，军事活动是为着配合经济斗争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们主要是采取政治攻势。部队中组织武装宣传队。政治攻势的主要对象是敌占区群众、伪军和日军，中心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必败的宣传，配合以许多生动的例子，具体说明敌人必败的道理。这种政治攻势是有战略意义的。在金融方面，我们对敌展开了金融战。有些地区，由于我之军事上的游击活动，给敌伪以打击，使伪钞与法币迅速瓦解，在军事胜利声中，边钞的比值提高起来。在与敌争夺壮丁上，我们现在立刻就要布置，一方面我实现志愿的义务兵役制，敌寇必来破坏；另一方面敌人也迫切需要壮丁。保护与争夺壮丁，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我们要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敌占区与敌据点中的壮年，并首先吸引他们参加部队。例如优待为敌人挖沟被我俘获的壮丁，加以争取，加以组织与训练，慎重积极的争取之，使之志愿参加部队。但不能强迫参加，否则会发生不良影响。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我们每一时期有不同的重心，但各个战线都要有密切的联系。说八路军不能配合各种斗争是错误的，但如果我们对于各种斗争的联系注意不够，则不会配合得好。

（二）各种战线上军事力量的配备问题

各种战线上，军事力量有时占主要位置，有时军力与民力穿

插（如运粮、平沟），有的军事力量不是重要的，但军队亦应参加（如秋收）。总之，各个战线有其突击方面，但都应与军事力量密切配合。

如何来实现各种力量的配备（党政军民的具体关系）。只有在各方面配合密切时，才有可能。在根据地，党政军民是分工合作的，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但在分工上，则有武装与非武装之分。武装及非武装均有其单独领导系统。非武装的每一环都在地方党直接领导下。部队党的重心置于部队，地方党的重心位于地方，但这是合作与互相连结的。大的军事行动，是全党的军事方针，军队与地方都要保证其实现。非武装的斗争，部队亦应极力协助其实现。例如分局的决定，全边区部队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均应具体布置执行。过去我们也是这样做，而且一般的做到了，但还是做得不够。虽然没有大的不可终日之势的不一致现象，但任何不合拍，不和谐的现象都必须加以研究，求得一致。在某些部队中，军政关系是不够密切的。有些则是军队与地方党关系不够密切，这都有主客观原因。有的是由于军队的地方性不够，因而它与地方的各种斗争配合不够密切。要使配合密切，必须在组织上解决这一问题。除军分区地方武装部长参加地委外，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应参加地委。使军分区首长能迅速彻底的了解地方问题。在地方工作上，军分区首长也应负一部责任，这与其说是互相配合，不如说是大家负责。这样才能使武装斗争与各种斗争密切配合。

目前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与初开辟时不同。初开辟时，军队政治机关要负更多的责任。在根据地建立以后，则一切非军事的斗争主要应由地方党进行。

（三）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斗争方式

几年来坚持敌后抗战，进到非常艰苦的阶段，全边区都处于敌我交错形势下，由于敌我力量的不平衡，因此各地区应有不同

的斗争方式。这种敌我不平衡的形势，还要继续一个相当时期。由高级的武装斗争方式到和平的合法斗争方式，目前都要采用。

1. 目前主要的还是武装斗争。只有在某些地区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基本变化时，才能以非武装斗争为主。如以合法斗争与武装斗争并列，则在军事上就会成为退却，与巩固根据地、坚持自己阵地的方针相违背。我们应力求坚持武装斗争，只有在武装斗争不能坚持时，才采取其他斗争形式。但如敌已占优势，武装斗争不能打开局面，而勉强以武装斗争去开辟，是不可能的，而应用其他斗争形式。在能够坚持武装斗争时，就必须坚持。这完全要依具体情形与敌我力量对比而定。

2. 在武装斗争上，有游击战、运动战与阵地战。如百团大战，是我们对敌之阵地的攻击。由于百团大战的经验，我们曾指出，敌人的力量不足畏。但百团大战后，我们就估计敌人的防御工事还要加强。现在敌之工事确已加强，有些甚至形成要塞。今后当敌处于不利形势时，我们仍有可能对敌进行阵地攻击或采取袭击动作。当敌后方空虚时，我配合政治攻势，乘伪军之动摇，仍可攻下一些堡垒，但目前不是主要的。运动战的可能性一般说比较少。因敌行动较前慎重，据点稠密，策应较易，只有在形势对我绝对有利时，才有可能。因此目前我之武装斗争，主要仍应采取游击战的形式。不断地从小战斗中取得胜利，减少敌之主动性。

3. 和平合法的斗争方式，在敌据点中与敌占绝对优势区域中，我应主动的采取。用巧妙的办法，利用合法斗争，离间敌伪，保持我之力量。例如十分区的阵地，今天基本上已被敌夺取，但我尚有一些力量，可依凭以恢复我阵地，但在斗争方式与组织形式上与根据地都不相同。主要利用“异民族之可欺”来进行我之组织与活动。各种不同地区要有不同的斗争形式。甚至各分区及各县中各个地区都各不相同。目前斗争复杂，一种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不能适用于全边区。因此要求大家能深刻认识如何在不同地

区的不同形势下来配备我之兵力与坚持我之斗争。

总政[3]曾有指示，在敌我之间，有时可采取外交方式与他们通信，或订立局部停战协定。今天我们主要的是要争取时间，因此有些手段是可以采取的。对伪军、伪组织则应以争取与威胁并举，达到争取之目的。

（四）加强党性锻炼问题

中央“七一”增强党性决定，是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由于目前抗战环境，敌后与其他各地交通的阻隔，联络不便，与中央联系困难，又由于党员中农民与知识分子成分占最大多数，缺乏城市无产阶级成分，易于使党性缺乏。特别在成分上是党目前的重要弱点。在党内历史上，由于缺乏党性给予党的损失是不少的。特别是有枪在手的党员，例如张国焘对于四方面军的损失，应引为严重的历史教训。由于党员成分不纯，使党内发生无原则纠纷，宗派主义，特别在革命遇到艰苦与困难的时候。在党诞生二十周年时，中央的这个决定，建立在党的进一步团结与有力的基础之上，指出过去的错误，使它不致重复发生，是有重要意义的。因此我们不仅要讨论这个文件本身，而要在任何环境下，运用其各项原则。具体的检查我们的各项工作与各级领导。

1. 在部队中，有些老干部，在经验与理论的联系上至今还很缺乏。有些干部一而再再而三的入校学习，但都是被迫学习，他们自己并不愿学习。在新干部中，也有些人有教条主义与狭隘经验论思想。在我区的伟大斗争中，有些地方有些事上不能使理论与实际相衔接。有的人以为自己什么都够了。狭隘经验论，不仅表现在军事、政治方面，而且严重的表现在技术方面，特别是通信部门与医务部门。我们在这方面的技术是极落后的。因此中央一再提出这些部门的行政领导要尊重技术干部，不要自以为是，要尊重他们，爱护他们，倾听他们的意见。这些方面如不加以改进，则要使军队建设得很好是不可能的。

2. 在政治方面的责任心。我们有时不负责任的讲话太多，损害党的威信与领导威信。特别在大的问题上，当着新的时期与大的变化，在中央未决定前，对部属、群众，不要轻易说话。必须把问题弄得很清楚后，再大胆的讲话。凡是一切不负责任的讲话都应当消除。

3. 在工作上的粗枝大叶。在工作上，要严肃、慎重，再三再四的考虑。但有些同志却不严肃，随便，对问题不加考虑。每一问题如果再三思考，每次总会有新的发现。在军事上，考虑周到并不是犹豫，在下决心以前必须一再考虑。只有当已定下决心后，不去坚持执行，还在一再考虑，才叫犹豫。

4. 不愿集体领导的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军政关系不好等问题都由此发生。在我军制度中，集体领导是重要的。不愿集体领导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思想，在社会中有长期的根源。

5. 由于军政关系不好，或者包办，或者包而不办，这在连、营、团都或多或少是有的。我们的制度是集体领导，共同负责，但工作上各有分工。从红军时代起，这些关系不好的问题就存在着。这不能简单由制度与法律上来解决，而必须由党性问题上来解决。有时不从组织上坦白诚恳的处理问题，互怀成见，工作消极，在部队中时时存在着这些例子。有人甚至因此而提出要请假。我们所做的是革命工作，不是雇佣劳动，做革命工作是无所谓请假的。

6. 兄弟部队之间，互不密切，互不联络，互相照顾不周，对别人不管，只埋怨别人，不责备自己，各不相关，只顾自己，在中国社会中有长期的历史传统，这不是单纯制度、法律所能解决的问题。甚至还有以别人的损失来作为自己骄傲的本钱。我们应时时不仅批评别人，而且要批评自己。相邻部队受到损失，我们自己也是要负责任的。在一个战役中，往往纵的联系较好，横的联络较差。我们是党的军队，不论任何兄弟部队的损失，都是党的损失，稍有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之心，都是党员立场上的错误。

只有加强党性，才能保证我们在各方面的一致。不论在兵团之间，军分区之间，战略区之间，今后均需互相扶助，相互照顾。

7. 军队与地方党之间的不一致。虽不十分严重，但只要有一点痕迹，都必须加以弥补。只要大家都从党的利益出发，就不会有不一致现象。

8. 对政权与人民的爱护与保卫，军队要看成是最高的责任。我们掌握了武装，就必须对他们负责。有些同志对他们的关心是不够的。要把这种责任心提到很高的高度，特别在反“扫荡”中间，我们时时刻刻都有这种责任。对地方党与政权的同志，必须不嫌琐碎的加以照顾。

9. 物质上、干部上的本位主义。虽然各种斗争与制度，可以使本位主义不致严重发生，但还是不够的。到现在还有许多同志不负责任，虚报，随便增加预决算，要求特殊。在干部的培养上，不愿送出干部去训练，主要还是在团一级。

10. 不愿遵守制度，追求个人生活。以个人为例外，自己破坏自己的制度。甚至有人以个人地位去办不正当的事，等于是招摇撞骗之行为。

11. 遇困难愁眉不展，不能忍耐，不求积极打破难关。我们共产党员，尤其是共产党的军人，应有从积极方面打破难关的素养。不论从政治上、军事上都要注意。

12. 有些人胜利时趾高气扬，骄傲自大，不可一世，这和不能与困难作斗争往往是出自同一种人。这些都是共产党军人与政治家的不应有的态度。

13. 我们对于干部要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就边区整个来说，没有小团体与宗派主义。但有些同志夸大干部缺点，对干部不慎重，同样也是宗派主义的倾向。

以上这些问题，只有加强党性，才能彻底解决。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下都要能永不变色，无论处顺境，处逆境，都

是一样。严肃处理一切问题，遵守纪律，执行命令，以身作则，大公无私。对待一切干部，没有亲疏之分，铁面无私，只有党的干部，没有个人的干部。不铺张，不夸大，实事求是，埋头苦干，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工作精神。

注　　释

〔1〕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聂荣臻主持下，军区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着重研究解决部队大发展时期带来的各种问题。会后，草拟了《党务委员会工作条例》即此处所说的《政工条例》。

〔2〕法币，是一九三五年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依靠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所发行的纸币。

〔3〕总政，指当时的八路军总政治部。

从现在去认识过去 从过去来了解现在*

（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

恰恰一个月以前，在党的生日的纪念会上讲了些党的问题；今天又是我们党军的生日，应当讲一些党军的问题。但是讲什么呢？我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好了，就是所谓“感想”；也就是说我讲的问题不是那么系统化和原则化的。关于历史上的分段，也是我为着叙述的方便而分的。这是我在正式讲话前应先说明的几句话。

今天是我们人民军队十五周岁生日，也就是南昌暴动十五周年的纪念日。

南昌暴动是我们党首次领导的武装起义，来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与继续中国的革命运动。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大革命过程中，北洋军阀已经被打倒，革命运动蓬蓬勃勃的发展，革命军队已经取得武汉和南京。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妥协，背叛革命，转而向工农劳苦大众进攻，违反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志愿，要想独吞革命胜利的果实。他们卑鄙的向着工农大众说道：“这里没有你们的份，赶快走开吧！如果你们不重新当奴隶，那末就请上断头台！”于是向着工农大众和革命领袖开枪了，白色恐怖笼罩了广州、上海、南京、武汉及其他区域，使大革命遭受失败。为着

---

* 这是聂荣臻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在晋察冀军区直属机关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上的讲话，曾发表于《战线》第九十三期上。

继续革命运动，反对反革命的摧残，当时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和叶挺所领导的第十一军之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和第四军之第十师的一部（三十团）就爆发了有名的南昌暴动。这次暴动是正确的；用武装起义来回答反革命对中国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进攻，是必要的。但在这一运动中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犯了许多原则的错误，所以南昌暴动最后是失败了。革命军队从南昌打到东江，在潮州、揭阳、汤坑、流沙诸次战斗中遭到了最后的失败。那时军事上政治上发生许多错误，如果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的确是有些"蠢"；我自己也是当时"蠢人"中的一个。可是正因为有那时的"蠢"，今天才会变得更聪明一点。同时南昌暴动失败以后，我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却从新形式中成长起来，成为全世界闻名的朱毛红军。

在朱、毛大旗下的红军就是现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前身。朱毛红军是在革命低潮时产生的，是在极端困难、残酷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当时的朱毛红军先后由三支力量会合而成：第一支力量是参加南昌暴动的一部分武装，就是现在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同志所领导的第二十五师——当时该师在韩江上游三河坝牵制向我们侧后进攻的敌人，适值我军主力第二十四师与第二十军经潮汕与广东军接触，汤坑一战后，接着潮州被敌人占领，把二十五师在韩江上游与主力隔断。这时朱总司令就负责指挥二十五师。由于整个军事上处在失败的地位，南昌暴动的武装，一部分参加了东江有名的海陆丰农民暴动，一部分由朱德率领到赣南、粤北、湘南。在南昌暴动前，朱总司令是没有部队的，因为他在大革命时才从苏联回来，做了许多统一战线的工作，如开始说服四川军阀杨森来参加革命战争，后来到武汉朱培德处（因同学关系）办军官教育团训练干部，实际上没有兵权。南昌暴动时，他只带领叶挺部一个连打先锋，广东一战后，就指挥第二十五师在三河坝作战。当时该师既不是朱总司令直属的部队，又是"残兵败将"，

干部大部伤亡或离队，队伍七零八落，几至不能收拾，可是朱总司令与现任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同志（那时在第七十三团当团指导员）艰苦的把部队维持下去。朱总司令大公无私地对部下说："中国革命虽然暂时失败，但一定要胜利的，一定是有希望的；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这支军队虽然是国民革命军，是进步的军队，有政治工作，有一些党员当干部，但基本上仍是旧的雇佣制度的军队，在那种艰险的环境下是不容易维持的。部队从赣南拖到北江，没有衣穿饭吃，没有子弹用，朱总司令曾经化名"王楷"，借旧朋友关系暂编成范石生[1]的一个团，重新搞了些服装、军饷、子弹。广州暴动失败后，朱德发动湘南起义，随后又进到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会合。

另一支力量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武装。当南昌暴动时，毛主席穿着草鞋，背着包袱，到湘赣边界组织农民秋收起义，号召以武装暴动，来回答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同时在湘赣边与预定参加南昌暴动的一部分力量——"警卫团"会合。该团是在国共分裂时才组织起来的，其中只有少数干部是党员。在南昌暴动后，无法与主力会合，乃经铜鼓、修水到湘赣边与毛泽东同志会合，配合了湖南的农民秋收暴动，形成南昌暴动失败后的另一支武装。后来朱、毛所率领的这两支力量会合，到了井冈山。

第二年，第三支力量起来了，就是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暴动；彭德怀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才入党，当时他是湖南军队的一个团长，以长于治军闻名。在一九二八年白色恐怖很厉害的时候，由于他对国民党统治阶级的不满，与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于是领导兵变，配合了平江的农民暴动。最后率领部队也到了井冈山。

这三支力量成为朱毛红军的基干，首先在湘东及湘赣边界挂起了红旗，支持艰苦的斗争，粉碎了敌人多次的进攻，发展并巩固了湘东及湘赣边——井冈山根据地。

这里，我们应当了解什么问题呢？就是这几支红军力量都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南昌暴动和湖南秋收暴动失败后的余部，正处在白色恐怖到了极高点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当时朱、毛、彭等同志，如果不是有坚定的革命人生观与宇宙观，认清了革命的发展方向与前途，是很难支持下去的。那时环境虽然很黑暗，力量虽然很微弱，但他们没有丝毫的动摇，却抓住这点力量来发展革命运动。在白色恐怖高涨时，有的人消沉不干工作，有的人还在国民党报纸上声明脱离党的关系，但彭德怀同志却举行革命的“兵暴”来反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些领袖创造红军是如何的艰辛，对革命是如何的坚决。这告诉我们：每个革命军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能够在革命力量占优势时冲锋陷阵，摧毁敌人，猛追敌人，而最可贵的与真正的勇敢还是要在极端困难与危险的时候，能够拿出主意来掌握部队，毫不动摇地去战胜敌人。我们的红军创造者朱、毛、彭诸领袖就有这种特色。所以我们各级干部，在危险临头时，不应该把自己“坚壁”起来，穿上便衣躲避斗争；不要在困难时说：“你不要找我，你自己去干吧！”须知红军的创造是没有多大“本钱”的，怎样把这点“本钱”保存与发展成为强大的革命力量，这是值得我们每个干部警惕的。

这是红军艰苦缔造的第一阶段。

在第二个阶段中，朱、毛巩固与发展了红军，战胜了井冈山上的困难。井冈山给我们许多好处，但也给了许多坏处：那连绵险要的大山，的确是不容易攻取的阵地。可是山中人口太少，缺少粮食，而敌人又严密封锁，不断层层围攻。如何来打破围攻，克服困难，先决条件就是要把农民变成军队，把残余的旧军队变成新军，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强大的红军。当时在红军的领导上，是用最高度的民主方式，用最广泛的民主生活来根除旧军队的习气；使每个人都了解红军是自己的武装，了解革命是自己份内的事。因

之在当时，有许多事情并不是命令行事，部队首长与党代表还没有现在这样的权力，而士兵委员会在连队中却成了最高权力机关，一切问题经士兵委员会决议通过后，就须执行，没有通过就不能执行，甚至士兵委员会可以决定处罚干部。拿今天看来，这岂不是极端民主吗？的确是极端民主化。但当时没有这种宽广的民主生活，就不能彻底推翻旧制度旧习惯，就不能用群众力量来教育群众自己，启发革命的积极性。当然今天我们部队中是不需要而且也没有这样大的民主范围的。其次，就是执行官兵平等的原则，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平等。朱总司令也一块和士兵一样从山下挑谷上山，所以总司令十多年来唯一的私产就是一条扁担，上面还注有“朱德扁担”字样。因为那时只有保存一条扁担，才能很方便的与战士下山去担粮。拿今天来看，这又岂不是平均主义吗？但在当时这种平等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最高干部以身作则来克服当时的一切困难。到冬天穿不上棉衣，下了雪很冷时还穿着单衣，也没有被盖。为了严格管理物资与大公无私的分配物资，所以一衣一被都要经过毛主席的批准。哪个人须领一件衣服，哪个人须领一条被子，都得要经过毛主席亲手批条子。如果拿今天看来，岂不是又要给他加上一个事务主义的帽子吗？但当时毛主席任红四军党代表，对于爱护部队、干部与调节物资，非常严格公平，这样才能渡过困难日子。又如，在南方点菜油灯用灯芯草，虽然很小，费不了多少油，但毛主席也规定哪里只点一根，哪里能点两根，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增加一根，打算得很周密。在今天来说，这些都是小问题，如果今天这样做，大家一定要认为是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事务主义了，但在当时对于巩固部队战胜困难是有很大作用的。

这里告诉我们，用群众的力量来教育群众自己，是最有效果的。同样告诉我们：干部以身作则特别是在艰苦危险的时候，是有重要的作用的。这个真理不管在过去今天还是将来，都是这样

的。当然并不是说哪个干部都得挑一下担子，朱总司令在今天谁也不需要他这样做的。这里也告诉我们：具体的细致的管理部队，管理物资，对于克服困难，巩固部队有很重要的意义。今天有的同志一概以为这是事务主义，用不着来管，有的认为经过批准麻烦，太不自由，上级抓的太紧，甚至表示不满。有的仍然铺张浪费，对精兵简政没有贯彻执行，大机关大架子还放不下来，许多机关不必要的招待、应酬，还没有废除。如果拿来与朱、毛在井冈山上的奋斗精神一比，能无愧色吗?!要了解一切物资都是人民的血汗，用人民的血汗，作个人的挥霍，自以为是讲面子，其实是最不体面的事情。我们虽然再三要求节省，要求消除铺张浪费和虚伪的应酬，但还没有很好的做到。

第三阶段，是朱、毛从井冈山下来创造中央苏区与五次反“围剿”战役。这是非常艰苦的阶段，同时也是红军发展壮大的时期。红军到江西后即建立了很大一块根据地，但当初下山时却非常艰苦。而敌人却乘着我们撤离井冈山，新的根据地还未建立起来的时候，集中了巨大兵力来“围剿”，实行跟踪追击，环境非常艰险。那时敌人一直追到瑞金，形势危急，好在我们抓住敌人追击疲劳之际，回头一击，一个反攻把敌人打垮，这样才顺利到达了东固的游击根据地。此后在闽粤赣边及赣南，开展了大规模游击战争，经过二年多，创造了许多块游击根据地，才形成了一个大块根据地。第一次“围剿”被粉碎后，开始深入土地革命，建立了根据地。但这种根据地在当时并不巩固，里面还有许多白点子似的反动势力的土围子。政权也不巩固，还在开始创建。接着敌人来了三次进攻，每次动用很大兵力，也先后都被红军粉碎，才把苏区内的地主豪绅的武装拔掉。第三次反“围剿”后，中央苏区成了广大的根据地，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据地政权与红军的建设进入新阶段，颁布了许多社会政策，红军制度与政治工作都有新发展。同时部队扩大，成分改变——得到

土地的人民，大批动员到部队中来了，红军质量大为提高。经过一个时期后，敌人用很大的部队进行第四次“围剿”，许多著名的“将军”领导着精锐部队，向苏区挺进。但结果一仗就把这些基干部队解决——击溃两个军，消灭了三个师，活捉了两个师长，把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又打垮下去。于是敌人重新办学校训练干部，扩大部队，改进战术，经过半年多的布置，又进行第五次“围剿”。战争就越打越大，这时红军越战越强，苏区越扩大，敌人也越加用全力来对付我们，调动了三百多个团的兵力，整整打了一年。在第五次“围剿”中，敌人有系统地采取堡垒主义：一面进攻，一面大修堡垒，实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占领一地就马上修筑堡垒固守起来，我们一打，它就缩进“乌龟壳”里去。从前打运动战的横冲直撞的战术改变了。那时江西遍地都是堡垒林。随着红军长征，沿途都有堡垒，最后直到山西和河北阜平不是也筑有堡垒来对付我们吗？

从井冈山到五次反“围剿”时期，红军有了成熟的系统地军事思想：就是处在战略防御，敌人占优势的形势下，我们在战术战役上也是进攻的。往往我们已经撤走，敌人才敢前进；我们偶一停驻，敌便畏缩不前，而赶修工事固守，进攻精神很差——战术战役上缺乏进攻性。所以我们要打就打，要走就走，要休息就休息，进攻精神很旺盛，敌人常常抵挡不住我们的进攻。同时我们游击战与运动战是有机配合的，转移很灵活，有时把部队分得很散做群众工作，有时又集中向敌人突击。同时红军中党的工作，政治教育提高了，各种制度建立了，部队互相间的团结也密切了。如在几个军团之间，到哪条战线时，后来者即听从先到者指挥，协同作战。部队与地方党政民的关系也很好，不管到哪里，马上有行动，地方就帮助解决粮食输送等问题，一致为着胜利，各方面协同很好。同时部队与人民血肉相连，因为红军战士多是得着了土地与政权的农民，所以坚决保卫苏维埃，也即是苏区工农的子

弟兵。他们高度爱护人民，而人民关心红军战士也无微不至。那时，江西许多县分在经济上文化上并不比现在冀西各县优裕，拿瑞金、兴国两县来说，人口不比边区县分多，但每县动员补充主力红军外，还成立一个师，每师三个团，有好几千人，可见人力动员到了怎样的程度。如果红军不是与人民血肉相连，是做不到的。同时在一切为着前线胜利的工作上做的很好。后方机关及勤务部门对前线各种人力、物资的保证，用尽了力量，为着前线部队的吃穿。前线每人每天吃一斤多米，后方机关，中央机关，军委会，每天只吃十二两[2]“包子饭”，不管够不够，每人只有一包。饭量小的与饭量大的调剂，那是个人间的事情。那时粮食还不是那么困难，但是一切为着前线就需要这样做，而党政机关比军事机关还要艰苦。正因为我们艰苦与英勇，正因为各种建设的进步与各方面关系的协调，才能支持长时期的战争。

可是最后我们为什么离开中央苏区呢？即是由于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妨碍了红军的发展与苏区的坚持。特别是最后时期由于军事上政治上的一些错误，影响到人力物力更加困难，影响到革命阵地的变动，使红军不得不突围而长征。历史上空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整整经过一年的时间。可是所谓雪山草地究竟是怎样的艰苦与危险呢？许多同志还是模糊的。我们跋涉了许多难以通过的险山、恶水，翻过拔海三四千公尺以上的雪线——所谓“六月里来天气热，夹金山上还积雪”的雪山。当时地主资产阶级得意地说：“前有堵兵，后有追兵，八卦阵图，加上万里长城，其不为石达开者几希矣！”但我们却终于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到达陕甘宁根据地。这是第四个阶段。

这次空前艰险的进军的胜利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首先，是我党领导的正确，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掌了这个胜利之舵。在苏维埃运动末期，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造成很大的损失。如今天我们执行精兵简政，在反“扫荡”时部队更要轻便

的道理，每个同志都知道。但在当时却把长征当成了“搬家”，连石印机、铅字机都要几十个人抬着走。可是，我们的“家”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拖泥带水，那么多笨重东西，要搞二万五千里，就是主观主义的想法。红军冲过封锁线，前有敌人堵，后有敌人追，掩护这机关，掩护那机关，还要掩护资材与机器，费力不讨好，结果只得统统丢掉，连我们的几门大炮也不要了。当时有些人以为“搬家”就是从这个根据地搬到另外一块根据地，是很简单而容易的事。可是我们想找块根据地“安家”，敌人却拚命不让我们找。敌人好容易费了那么大的力量，才把我们搞出根据地，怎能让我们另找根据地呢？所以在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四川、云南各省层层堵击与围攻，使我们无法立足，不得不走。因此在几个地方，我们做群众工作，想建立根据地，但终没有成功。这使我们在长征中更觉得根据地的可贵。大部队如果没有根据地，就难以支持，行军作战也不方便，要充分休息、整理也不可能。

其次，团结友爱很重要。正因为有党与部队的团结，所以能胜利地完成长征。叛徒张国焘分裂党及红军，就给我们党以莫大损失。当时一、四方面军会合，虽然经过相当长的行程，但部队并不算很疲劳，人员还充实，尤其是四方面军更加充实。如果不老在草地上打圈子，而浩浩荡荡直到西北，那么今天的陕甘宁边区的环境会更好些，八路军的基干也不止这样多。这是两种不同现象的不同结果！这说明团结问题在困难环境中特别重要。同时也说明在困难、危险时也最容易发生意见分歧和不团结的现象。因此，必须具有布尔塞维克的高尚品质，认清革命利益，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政治上组织上完全一致，才能战胜困难。一切分裂行动就是自走死路，自寻灭亡。

再次，坚决勇敢地完成任务，是胜利的重要关键。譬如横渡金沙江、大渡河，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知道是怎样的艰险。金沙江两面都是大山，难以攀登，渡口很少，架不起桥，船又很少。

如果那时不出奇兵，抓住土司，弄到一只船，是难以渡过的。当时我们的渡河战役，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在云南，要过金沙江，敌人估计我们一定不会到缅甸，也不会到西藏，一定要渡江走石达开的路。这时刘师长[3]抓住一个土司，抢船渡河。但敌机发觉了我们左翼，集中兵力赶到江畔，布置了一个大歼灭战，企图歼灭我们于金沙江畔。我们待主力过河后乃沿着江岸小路回头兼程随右纵队过河，一个急行军，把追击的敌人丢掉了，大摇大摆的渡过了金沙江。后来敌人赶到，也只好隔江对骂了。

渡过金沙江，又要过大渡河。这两江之间是彝族区，有黑彝白彝。我们虽然想建立根据地，但这个区域是不能作根据地的。我们渡过大渡河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故事，象神话一样。过河地点就是石达开的坟墓所在地的安顺场。这时几十里河岸完全被敌人控制，而且两岸都有敌人，我们行军又很疲劳，赶到安顺场时只得到一只烂小船，只能载十几个人强渡。这十多名英雄，带着棉花抢渡急流，以随时堵塞敌弹射穿的漏孔。渡河后即冲垮敌人，夺下阵地，控制了渡河点，又抢了三只船，掩护渡过了一个师，沿左岸前进。主力从右岸沿江而上，夺取泸定桥，因为两面都是敌人，只有这样才能全部过去。当时右岸的先头部队第四团，就是今天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同志，当时为团政委，所率领的一个团，一昼夜走了二百四十里，打垮了敌人一个团，消灭了一个营，晚上还冒雨通过泥泞地，爬过一些大高山，赶到泸定桥畔。敌人还以为我们至少在七天以后才能赶到，刚把桥上的木板拆去一半。见我们部队涌来，才慌忙放火烧桥，但被我军急速扑灭，有的同志把眉毛都烧掉了。这样才控制了泸定桥，部队得以安全通过。

再次，要有高度吃苦耐劳的精神，红军一昼夜急走二百四十里，抢夺泸定桥，就是高度吃苦耐劳的表现。在草地缺乏粮食时，朱总司令还当起神农氏，来尝百草，不是要发现药材，而是想找草来充军粮。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是伟大的，是应当学习的。

最后，要绝对信仰党。当时红军服从命令，日夜行军。走到哪里去呢？不知道。因为没有根据地，就要重新去创造。可是到哪里去创造根据地呢？只是天天走就是了，而且每天都走好几十里路，一年中有十个月以上的时间都走了路。但全军从干部到战士一致的呼声是“跟着中央路线前进”！党一定会带着我们走到胜利的。

到陕北后还有许多艰苦奋斗的事迹，这里不多讲了。这是红军发展的第五个阶段。

今天是处在第六个阶段。革命形势与过去大不相同了，过去是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是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制度。而今天却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与独立、和平、民主、繁荣的新中国。这是中央在今年“七七”宣言中着重提出的问题。

拿今天与过去比较，可以看到：

第一，我们的社会基础比过去大多了。过去只是以工农群众与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做基础。由于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所以苏维埃政权也只限于狭小的区域，社会基础也就比较小。加上那时不仅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向我们进攻，而且帝国主义以巨款、军火、顾问等帮助他们，向我们进攻，我们处在孤立的地位。可是今天我们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社会基础广泛得多。除少数汉奸外，整个中国人民都与我们站在一起。同时世界上分成了两大阵营，而我们是整个反法西斯阵线的一部分，所以同盟者也比过去多得多。

第二，我们的根据地比过去也大得多了。过去的根据地是相当孤立的，虽然全国有许多苏区，但是分在各省不相连接，在战略上只能有一定程度的配合。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虽被敌人在华中、华北用点线和小块地区隔断，但战略上甚至战役上可以取得密切配合，整个区域可以协同一致，而且我们在任何

地方都是可以战胜敌人建立根据地的。

第三，我们的军队比过去更强大了。过去红军虽然强大，但因军事上政治上某些错误，使红军遭受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今天八路军、新四军数量更大，在几年战斗中，锻炼得更坚强了。

第四，根据地的人力、物力也比过去丰富得多。在江西时，棉花布匹就很难买到。要象现在每年发单衣两套，还要发衬衣，棉衣还不冷就发下来，是做不到的。我知道过去只是在漳州时发过两套衣服，以后每年只发一套单衣。因为敌人封锁，奸商的剥削，棉衣非常单薄，往往天气很冷还穿不上，穿上不过一个冬也就烂了。南方又没有羊毛来代用，所以穿的问题在江西很困难。一块钱只能买两把甚至几钱盐，有时还要吃淡饭。电池、西药，因为苏区离大城市很远，只有靠战斗中缴获来解决，这是与现在不同的。至于零用钱，鞋袜费，红军是没有这个制度的，只可能分点伙食尾子。当时已经消灭了雇佣观念，政治觉悟很高，当红军干革命是为了自己的解放。有时苏维埃政府没有钱发伙食费，于是大家三角五角的凑合起来，有些还拿出自己的伤残抚恤金借给政府。直到现在，这笔账还没有还清。在抗日战场上，一九三七年冬还有人要我还老账。我说："现在财政同样是困难，把老账还了，又会拉下新账，还是把收条收拾起来吧！"我是那时的政治委员，应该代表苏维埃政府向同志们致谢。同时我也可以告诉同志们，我在苏维埃运动时的积蓄，由分伙食尾子凑成买得两元苏维埃公债卷，直到现在还在我自己的"金库"里保存着呢！

第五，当然今天的敌人与过去不同，今天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不应该把它估计得过低。敌人还控制着大城镇与交通线，还仿效内战时的堡垒政策来分割与封锁我们，并且相当熟悉我们的战术原则。敌我正展开空前复杂的斗争局面。我们固然比过去坚强，可是今天的敌人也比较过去要"高明"些。

第六，敌人现在的堡垒政策，基本上是学习我们内战时的办

法来对付我们的。因为我们还没有重武器，不容易摧毁堡垒。但过去与现在的堡垒政策并不相同，不仅是修筑的技术不同，即在运用上亦各异。过去国民党的堡垒政策的优点，就是可用很大兵力凭借堡垒推进，纵深不要军队来守，而由豪绅地主来维持秩序，可将最大的兵力集中到第一线。今天敌人的堡垒政策，虽然也想这样推进，但遇到的困难是推进后纵深要分散兵力来防守，不然就要被我军控制或被我平毁。因为敌人兵力不足，所以纵深要用伪军防守，但伪军却不大可靠，不会完全愿意帮助日寇办事。如过去大清河北岸被日寇占领，但却是伪军、土匪联庄的天下，实际上被他们统治着。因为日寇是侵略国家，是异民族，没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与过去敌人有豪绅地主做基础不同，而仅仅依靠汉奸，这是日寇基本的困难。可是敌人虽然不大相信伪军，但还要这样干，以补救自己兵力的不足。

第七，在战术上今昔也不同。过去国民党以堡垒为前进与防御的阵地。我们撤走，敌便追击与进攻。我们反击，敌就缩进乌龟壳，怕与我们打运动战，攻击精神差。日寇恰恰相反，兵力虽较难大量集中，但不管有堡垒也好，无保垒也好，都积极找我们打。虽然我们在战术上极有弹性，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使敌人到处扑空，但敌人总想抓住我们打，总是采取进攻姿势。敌人在战术上也有发展，采取奇袭等办法。所以，今天与过去的敌人在堡垒政策及战术运用上各有优缺点。

第八，在江西、福建、鄂豫皖、湘鄂赣等苏区我们主力转移后，还留下部分红军与地方武装坚持斗争，与统治阶级的军队打得很厉害。这些武装始终坚持下来，成为后来新四军的基础。今天敌人在“确保华北”的方针下，不断向我们根据地进攻，某些地区的主力，有时必须转移。根据过去的经验与现在我们的社会基础，和敌人堡垒政策的弱点，敌人的统治虽然厉害，但在我们主力转移后的地区，仍须留下一部主力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来坚持，

这是必要而且可能做到的。当然今天的斗争是更加复杂了，需要有更多的新的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不是象过去内战时那样单纯。

第九，我们今天虽然遇到极大的困难，但还没有象国内战争时那样严重，可能今后的困难会更多。战争将继续打下去，所消耗的人力物力与时间是按正比例发展的。我们不要以为没有什么困难，或者以为现在困难已经到头了，相反的要认清困难的严重性，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多方设法来克服，任何困难是可以战胜的。

第十，要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这不是狭隘的经验论，要根据具体环境把它发扬起来。另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坏传统，最基本的是农民的自私自利，本位主义，游击主义。这是有它的历史根源，一直发展到现在。自私自利的现象仍然很多很严重，本位主义表现是只顾自己，不顾其他部队与其他部门；游击主义表现很严重，有的不爱护公物。虽然再三的讲，但始终没有克服。这是因为过去的坏传统没有消除，如过去红军物质困难时，到新区得到新东西时就不加爱惜。今天公物好象来的很容易，也不加爱护了。我有一件皮大衣，还是红军时代的，曾经有人说我保存这个东西，是富农意识。可是为什么不爱惜着穿，多穿几年呢？有些同志得到较好的东西，也是不加爱惜，还不烂就丢掉，打算再搞新的。这就是坏传统作怪，应该清除干净。

我们党告诉我们要认清今后的困难，这些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应该有过去那样坚决顽强克服困难的精神，来战胜黑暗，迎接光明。几年来我们的干部锻炼得更加坚强了，有些干部加强学习我们的军事思想，运用我们的军事科学，掌握战争的艺术，许多方面都比过去进步了。许多新干部也实践着与习惯着党军的战斗生活，正象田野里的青苗一样成长起来了。我们是朱毛红军的血统，要永远继承这一光荣传统，并要向朱毛彭诸领袖学习。中央号召我们再鼓一把劲，明年就能够打垮日寇强盗。

注　释

〔1〕范石生，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

〔2〕十二两，指十六两为一斤的秤。

〔3〕刘师长，指刘伯承，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抗战时任一二九师师长。

关于部队文艺工作诸问题*

（一九四二年八月六日）

不久以前，我们曾经讨论过关于部队文艺工作上的许多问题。为了求得全军更一致的了解，我们今天召集全军的艺术工作者来开会讨论一次，这是完全必要的。

我们所讨论的范围，只限于部队的文艺工作，范围虽小，问题却是重要的。同志们在几天的会议中，已经讨论了许多问题，但是有些问题还必须提出谈谈，我今天所讲的就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我军对文艺工作的态度

我们军队究竟是不是重视文艺工作呢？或者扩大一些说，是不是重视整个文化生活呢？同志们都在部队里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都是做的文化工作，那末，为什么还把这个问题跟同志们来谈呢？因为这个问题是关于我们的基本态度问题，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们是处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是在广大的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我们所在的地区比过去辽阔，文化也较发达。就在红军时代那样狭小落后的地方，荒僻闭塞的地区，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原上，我们虽然没有象今天这样多的文艺干部，没有象今天这样的帐篷舞台，受着人力物力极端困难条件的限制，但仍然有

---

* 这是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文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晋察冀日报》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三日曾全文发表。

着自己的文化生活，有自己的艺术。在艰苦的长征当中，我们同样有演剧、有跳舞，张国焘曾骂过我们，说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他今天已经做了革命的叛徒，他当时有这种说法，我们也就毫不觉得奇怪，因为他的观点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并不是说过去我们的文艺怎样好，满足于过去，而是用这样的事实，来说明我们八路军有着悠久文化工作传统。而这也正是我们一贯的光荣传统之一。

我们不是自己来夸耀、骄傲，但可以说，象今天八路军这样庞大的文化工作队伍和文艺活动，在中国其他的军队中是找不到的。

我们的文艺工作做得好不好，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我们军队中确有许多文艺工作者在开展自己的工作，却是事实。不仅今天在座的同志在干着文艺工作，而且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同志，都在努力进行这一工作。这是我们八路军值得夸耀与骄傲的特点，是红军以来光荣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虽然部队里的同志对于文艺工作的认识，由于各人政治文化水平的不同，对于问题的了解也许不免有出入，但误解文艺工作的究竟是个别的，少数的，如果拾取个别不好的例子，夸大看成是整个的现象那就不对了。

二、文艺工作者在八路军中的地位

也许有人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文艺工作者在八路军中的地位究竟怎样？"那末，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八路军里面的干部、战士和军事、政治、文化、后勤、经济各种工作人员，只有岗位的不同，而没有什么地位的差别；在地位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文艺工作者在我们部队中也只是工作岗位有所不同，在地位上跟全军的指战员没有两样。

更具体地说，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在组织上讲，是属于政治部门，所以他们的地位，也就是政治工作者的地位。我们的政治

工作，就是党的工作，在八路军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这样说部队文艺工作就是政治工作的一方面。这样讲也许有的同志认为抹杀了文艺工作的特殊性。那末，文艺工作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报告，我们知道：新闻记者、文艺作家，都是政治工作者——宣传工作者、宣传家。所以在部队里的文艺工作者，也就是宣传工作者、宣传家。这没有把我们看小，我们从来不争什么称号，称号不值得争，争称号是不会有好处的。

总而言之，在部队中，我们的政治工作是掌握艺术这一武器，拿这武器为战争服务。就我们的文化武器来说，不管我们在军事上的装备是如何低劣，比不上强大的敌人和其他的军队，但我们在文化武器这方面，是很注意的，我们的"装备"却不是那样落后的，这是我们的特点。

我们没有看轻文艺工作这一武器，党和军队的政治部门，紧紧掌握了它。我们既没有看不起文艺，也没有特别突出文艺。因为文艺工作是我们整个部队工作的一方面，我们把文艺和其他工作看得同样重要，这样才是真正对文艺的重视。

如果有人问到文艺工作者在八路军中的地位如何？这样问的人可能是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是其他军队对新闻记者的看法，本来新闻记者也并不是他们军队的组成部分，所以他们对待新闻记者，是象客人一般的款待。但我们没有这样做，也不需要这样做。至于另一方面，那就是根本从坏的意识出发，斤斤于名利地位的问题，这在我们部队里，根本就站不住脚跟。要想在八路军里争特殊地位，是不应当的，也是没有可能得到的。

三、文艺工作者的前途

部队文艺工作者的前途究竟怎样？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简单的。我们的前途就是胜利的前途，有了胜利的前途，其他一切军事、政治、文艺工作者才都有前途。

具体的说，文艺工作者将来究竟怎样？那么我要说，今天我

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是在丰富自己的生活，锻炼自己的修养，这是一个努力发展的过程，我们还没有成为“家”，比如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家、文学家等等。现在我们还是无“家”可归。正在寻找自己的“家”的时候。“家”就是我们发展的前途，我们的同志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努力的方向。

至于今天的文艺工作者，是不是将来都成为文艺家呢？那倒不一定。也许有的同志有一天放下笔杆，拿起枪杆，中途改行，变成军事家、政治家。因为今天还不能确定自己发展的方向，尚在摸索与认识自己的过程。同样今天拿枪杆的同志和做其他政治工作的同志，也许由于自己爱好文艺，喜欢写作，以及他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生活，而在将来变为文艺家，这也是可能的。

但对于今天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我们是一定尽量使大家向文艺方面发展，给以顺利的条件，使得将来有所成就，造成自己的“家”。不过到底能不能有所成就，这就要靠自己主观刻苦的努力了。在八路军中，有了广大的战场，有同志们英雄用武之地，一切艺术活动都是自由的，你要到连队中去，要到火线上去，都是可以的。

我们鼓励大家都有专门的发展，只要自己真正下番苦工夫，将来的前途，无疑的都可以造成自己所要找的“家”。如果中途愿意改行，要作政治家、军事家的话，也同样有自己的发展。比如今天有许多小同志在剧社或宣传队做文艺工作，但由于他们年纪小，文化政治水平低，今天还不能确定自己发展的方向。但到了一定的程度，将来大了，要做一般的军事、政治、宣传、组织工作都可以，我们决不限定他只有做文艺工作的资格。同样，如果一般的军事、政治干部，他爱文艺，要写东西，将来一旦他愿放下枪，说：“我要改行，我要干文艺”，也同样有充分可能的。比如今天许多苏联成名的作家，在革命前是不知名的，后来在红军里面当军事指挥员或政治工作人员，因为他是生活在丰富的斗争中，对

文艺有爱好，在革命后有充分的时间写出来，终于写出了成名的东西。

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将来不一定都成为什么“家”，但我的意思不是说，今天在文艺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就可以马马虎虎没有一定的方向，不是的。有的将来还是可以各自成“家”的。我们不仅希望在座的同志努力作好文艺工作，而且还鼓励一般军事政治工作人员爱好文艺，很好的努力写作，将来也能成为文艺家。我们需要大批的文艺人才，这同样是我们所需要的丰富的“家产”。

即使我们有时把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调走做别的工作，但我们的政治机关不是没有考虑，而是一方面看他向哪方面发展更有成就，同时看他自己愿意向哪方面发展，尽量征求他自己的意见。特别是青年，有的已经确定了自己发展的方向，有的还没有确定，不管确定不确定，如果他对别的方面有兴趣，他就有提出自己意见的自由，政治机关可考察他适合于什么工作，而把他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去。干其他工作也不会妨碍自己文艺方面的发展。因为今天我们还处在造就的过程，要有成就，就要与战争结合，在各种斗争过程中来丰富与锻炼自己。

同志们有充分的自由，来决定自己发展努力的方向。在军队里，我可以负责的说，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你们发展的前途，你们的前途是伟大的，光明的！

四、文艺工作者的成就问题

文艺工作者的成就问题，也就是在部队中怎样来培养文艺工作者的问题。

我们要丰富自己的斗争生活。也许有人以为在军队中从事文艺创作，会有许许多多的困难，比如时间不够啦，日常的工作太多啦。我们对这个问题，显然与这些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要在军队中真正从事文艺工作，那末，就必须去了解真实的战争生活，在烽火弥漫的战场上去丰富自己。如果脱离实际，关起

门来写东西，是不能很好的反映战争现实的。

我们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过着军队的生活，即使在剧社，生活上也多少有和连队相同的地方，但和连队生活到底还有很大的差别。如果真到连队中去，跟战士打成一片，就可了解在战场上的一些问题。在炮火连天的场合，在打枪的时候，在冲锋肉搏当中，在爬上敌人堡垒工事的一刹那，战士们脑海里想的是什么？心里发生的是一种什么感情？这些问题决不象我们所猜想的那么简单。我们今天希望有创造能力的同志到连队去生活一个时期，真正体验一下战斗生活，在必要时扛起枪杆，跟战士们一起战斗，那一定和今天的生活大不相同，会写出很真实的东西来。中国的古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很有道理。据说曹禺写《日出》，他就真正调查了妓女的生活。这种忠实于现实的精神是应该为创作者所效法的。

我们今天处在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烽火中，但写出来的东西既不象又不很真实，这说明我们的生活与战场是隔离的。

老实说，你今天只要求时间，要求一个安静的房子，要求加点煤油……这并不能解决创作上的困难问题。当然，我们并不要求同志们马上写出伟大的作品来，也不要企图写一本大东西，一举成名，象考博士、中状元一样，而是要求大家深入的体验生活，丰富自己的生活与题材。

直到今天，尽管还没有出现真正反映战争的伟大作品，战时的中国文坛，显得异常的贫乏。但我们鼓励同志们说，伟大的作品将来一定会产生，而且一定会产生在前线，产生在堡垒附近。

今天的问题是文艺工作者要真正与战争结合，走进伟大斗争中的问题。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虽然没有隔离斗争生活，但还不够丰富，不够深入。

也许又有人说，今天创作少的原因，是批评太多，鼓励太少。但实际上我对于文艺作品的好坏，就从来很少批评，这不是自由

主义，是因为我们的同志还在创作过程中。我的批评少，也不是因为今天的创作毫无成就，不值得一评。我们的作品当然也有好的，但我决不说某人的作品如何伟大，怎样空前绝后，因为这样的评论没有一点好处，过分的夸奖和乱捧一通，是害死人的事情。好的当然应该鼓励他继续前进，但过分的宣扬却会使年轻的作者短命夭折。可是，另一方面，向同志们泼冷水好不好呢？批评作品总是“一无所成”或“失却立场”这也是不好的。固然有些问题，严格地讲起来是立场的问题，但我们决不严格的批评，因为这不是作者主观上故意这样作的。我们知道，同志们多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还没有经过长期的锻炼，如果这样过分的批评，就使人没法工作。我们的批评主要是采取善意的修正的方式，使同志们在工作中有所取舍，求得工作上的改进。如果开口就是“政治问题”，闭口就是“原则问题”，这将使许多文艺工作者战战兢兢，不敢动手了。

我们鼓励同志们大胆创作，大量创作，有缺点就纠正，即使有些成就，也不必过分夸耀。

在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高干会议上的报告及结论（节录）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十五日）

第一部分　目前政治形势

一、国际形势（略）

二、太平洋战局与华北抗战

（一）日军攻占缅甸与阿留申群岛的几个岛屿后，在太平洋方面无大进展，资源仍未能充分取得。日寇欲肃清南洋，摧毁同盟国的反攻阵地，但屡被阻止；数度进攻澳洲，亦未得手；珊瑚岛与中途岛海战，又遭受很大损失，船只损失很多。现在日本高唱的夏季攻势已成过去，但新的冒险却在积极准备中。仍然继续进窥澳洲，由新几内亚向南进攻；虽然美军攻占索罗门群岛，给了他的侧面以严重威胁；但敌人仍继续南犯，企图廓清南洋。同时，今后敌寇的主要动向，还是进窥印度与北进，积极配合德国作战；现在印缅边境，已经集结了相当大的兵力，希特勒对高加索的进攻，也鼓励了日寇指向印度，期与德寇在中东近东会师。英印关系恶化，又给予日寇可乘之隙。但日寇对印度进攻的兵力，目前还是不够的。要想巩固南洋占领地区，就需要有很大数量的海陆军支持；如果再进攻印度，就需要有更大的兵力。印度人口众多，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前，英驻军即有四五十万，现在则武装至一百万，美军一部也进入印度，合计不下二百万人。英印的矛盾，固

然有隙可乘，但是印人固然反英，却亦并不亲日，印度民族是已经觉悟了的。非缅甸、马来亚民族可比，是知道日本的统治决不会比英国好些的；他们有坚决抵抗的决心，这就使日寇攻印必然要有相当大的决心与兵力。何时进攻印度还须视高加索战局发展而定；日本虽然力量不够，但也可能发动进攻，以响应与声援希特勒。因为印度战场是开辟着的，随时可以伸入进攻，比北进来树立新的敌人要合算得多，如果斯大林格勒失陷，德军深入高加索，日寇进攻印度的可能性也就更加增大。

（二）向北进攻苏联的企图，日寇盘算已久，但究在何时开始，却是大费周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寇在太平洋上还是半独立性的助威作用，但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法西斯国家相互依存的关系加大；如果今年打垮了希特勒，日寇亦自知难逃明年灭亡的厄运。所以日寇在狂喊不击破苏联就不能结束大东亚战争，日寇攻苏的准备也是很长久的，加以希特勒多次促日北进配合，因之苏日形势更为紧张，月来日兵北运甚忙，已有十万出关，飞机经华中沿津浦北飞的已有数百架，据报苏满边境日寇已集中了两千架飞机，海军集中到旅顺大连一带，绥西敌军及车辆、食盐、石油等也纷纷北运。敌政府又有许多对苏的“紧急措施”。从这些情况中，可以看出日寇攻苏的可能是严重存在着的。攻苏攻印同时并进，固然有许多困难，须要使用日本全国的兵力；但在进行决战的时候，为着挽救希特勒，南北同时并进的可能性也存在着。但是，敌寇目前的顾虑是很大的，危险是严重存在着的，因此至今尚按兵不动，特别在北进中，还有许多复杂问题；苏联同时有两面作战的能力，在东线可以单独作战，不需要西线支援，不会影响西线作战，使日寇不敢冒昧开辟北战场。形成日苏暂时的“和平相处”的状态；苏联固不愿两面作战，日寇亦不愿四面受敌。如果日苏战争一开，苏美即可在远东找到许多航空根据地，轰炸日本本土，给日寇以严重打击；特别是美国的飞机生产，每月五千

架，给予日本威胁极大，使日本攻苏顾虑更多。最近斯大林、邱吉尔会谈与英苏协定，即涉及协同对日作战的问题，决定彻底摧毁希特勒主义及其类似的军政体系，所以斯大林、邱吉尔会谈的消息传到东京后，东条即进见日皇，引起极大的注意。同时日若攻苏，那末全华北的八路军必然给敌之侧后以极大的打击与威胁，所以敌在北进前，就要加紧对我们进攻，目前对冀东、平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频繁，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侵华战争的认识，与前亦不同，认为中日战争已成为大东亚战争的一部分；实际上中日战争也是世界大战的重要的一环。日寇对中国问题已无法单独解决，敌寇占领缅甸后，沿滇缅路向云南进攻，扬言已经占领了南洋，就要来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又说这正是中国参加“圣战”的好机会，多方进行胁降诱降，但毫无效果。同时日寇采取着北上直取昆明之势，进犯腾冲、腾越，想渡怒江、澜沧江，可是这条战线在整个战场中是孤立的，而且英国威胁其后，所以日本不是真正要开辟这个战场，实际上只是为了巩固它对缅甸的占领而进攻中国的边陲，把我国军队向内地压缩一下，防止我军从侧翼攻击。敌伪最近对浙赣线的进攻，虽然占领沿线和温州各县以至临川，但因兵力不足，难以扼守，顾此失彼，并且从其他区域调集之兵力，则反影响其他地域的防务。加以美国空军威胁很大，所以终于无法巩固其占领区域。只能达到掠夺我浙赣富庶区域财物的目的，而对于占领地区终于不得不吞进而又吐出，我并收复温州、衢州，这说明日寇对中国目前只能组织一些战役进攻，而难于组织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以单独解决中国问题。

（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敌后的进攻，日益严重。敌寇已确定把华北作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具有确保华北的决心。所以日寇虽然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但必须解决华北问题。九个月来对华北人力、物力的加强掠夺，以至最近征兵计划的提出，

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反复长期的“扫荡”、“蚕食”与“清剿”，都说明了敌人的企图。

在华北，敌寇首先企图占领平原，掠夺人力、物力以削弱山地的依靠。因此冀中、冀南首先遭受了严重的进攻，我们受到部分损失，平原根据地起了质的变化，一部分变为敌占区，一部分变为游击区，平原游击战争进入了更艰苦的阶段。敌人要更严密的封锁、分割山地与平原，即在县、区之间，亦挖沟筑堡，在狭小的地区内进行分区“清剿”，使我大部队无法存在与活动。但我们必须指出，平原与山地是不能分割的，要巩固山地就必须坚持平原的游击战争，平原游击战争虽然艰苦，但必须坚持。即使平原今后在物质上不能接济山地，也必须坚持。因为平原如果丧失，则山地过于暴露，不能互相配合作战，使敌人更易对山地进攻。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不仅在物资上可以补给山地，而且有重要的战役配合作用。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是有充分可能的。冀中平原有几年的工作基础，而且有山地作依托，必要时可以转移兵力。因此冀中平原更具有坚持的条件。由于我们所进行的是正义的民族战争，由于我党我军艰苦的群众工作与良好的政治影响，由于冀中各阶层人民对日寇的仇恨日益增长，因此敌人在兵力上虽然占有相当的优势，但我在政治上却占有绝对的优势。只要我们善于适时的转变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平原的坚持是完全可能的。冀东在各种条件上都不如冀中，但在敌人长期不断的“清剿”与“扫荡”下，我冀东部队，不但未被摧毁，而且在紧张环境中深入热南，打击敌人后方。因配合冀中作战，又回师突过北宁路南，攻略滦河以东，威胁伪满，把过去失去的根据地恢复四分之三。敌对冀东“蚕食”虽不如冀中那样严重，但在冀东我之群众工作较差，而斗争又极频繁，冀东我军远处于华北敌后最前线，却能取得无数胜利，不仅冀东平原仍能坚持，而且对冀中的坚持，还起着相当的配合作用。

（五）对山地的进攻，为敌寇达到确保华北的最后一着。如果不摧毁山地，就无法实现其“华北明朗化”的阴谋，所以扫清平原然后指向山地，是日寇一贯的方针。

敌对山地进攻的方式，主要是“封锁”、“分割”与“蚕食”，以堡垒逐步推进，把我们的地区缩小到一定限度，然后用大规模的“扫荡”与反复的分区“清剿”来歼灭我们。去秋敌寇对北岳区“扫荡”的失败，使它的这一方针更加明确。本年以来敌在北岳区周围，建筑据点、堡垒与封锁沟、墙，在某些地方甚至八里之中，即建筑二十余个堡垒，一个村庄即有十余个堡垒，敌人以堡垒群政策来进攻我们，是接受过去内战时的经验，而且工事比过去更加坚固。

我们不应把反“分割”、反“封锁”与反“扫荡”割裂开来看。敌之“封锁”、“分割”，把我们区域划成许多小块，即是为着便利于“扫荡”、“清剿”，在一定的区域内，彻底摧毁我们的下层基础，以达到其所谓“扫马粪驱苍蝇”的目的。同时反“蚕食”与反“扫荡”也必须联系起来看。敌人单纯的“蚕食”还不能消灭我之主力，因此最后还必须进行“扫荡”。在“蚕食”之前敌寇往往也进行“扫荡”，以达到“蚕食”的目的，而积极“蚕食”也是为了便于“扫荡”。过去我们积极进行反“扫荡”的准备，以粉碎敌之战役袭击，是正确的。但在思想上，积极的反“蚕食”却是不够的。其实反“扫荡”虽苦，但时间不长，而“蚕食”的危害性却更大。“蚕食”易于使我们麻痹与疏忽，以致“蚕食”到我们的要害。我们对反“扫荡”在战术上、工作上都有相当充分的准备，可是在反“蚕食”斗争上准备很差，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山岳根据地的斗争，今后也进入了更艰苦的阶段，吃饭穿衣都要用鲜血去换。但无论如何艰苦，我们都必须坚持下去，不能在胜利前夕功亏一篑。同时山岳根据地，更有充分的坚持条件。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打破敌之封锁、“分割”与“蚕食”，如何使党政军

民能够更加密切配合，把各条战线的斗争结成一体，否则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可能。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曾有严重的缺点。

（六）必须认真开展游击战争，而不是把开展游击战争的许多实际问题，停留在口号阶段上，不是去空喊“游击动作”。在一月高干会上曾指出我们对运动战的空喊，对游击战的消极的缺点，但改进极为不够。广泛的游击战争决不是群众的自发运动或敌人压迫一下即可能开展起来的。中心关键是如何去具体的指导与组织游击战争的问题。我们必须反省自己，地方同志也要反省自己，过去是否真正的领导了地方武装，把游击战争开展起来？我们是在游击中长大的，可是现在对游击战争开展却不够。我们过去教训了敌人，使敌人学会了许多方法来进攻我们。但在敌人面前却表现了我们的落后，没有从敌人那里学得更多的经验，来和敌人作斗争。因之今后对于干部配备，对军队组织等问题，都要把是否能真正开展游击战争，作为主要因素深加考虑。对于新老干部都要重新具体的教育与指导。不敢深入敌之侧后活动的干部，应即撤换。必须把游击战争开展到敌人的后方去。到“敌后之敌后”去，正规军要这样做，地方军更要这样做。如果我们不到敌后去开展斗争，还到哪里去开展呢？一切强调敌后据点、公路的稠密，堡垒、沟墙的封锁等等困难而不敢积极去活动，或不设法配备干部组织部队去活动，都是不对的。困难是有的，但是从组织上与领导上来解决，这些困难是一定能够克服的。当然有许多具体问题还需要考虑。晋东南摧毁许多伪组织的经验，值得我们反省。对敌斗争的两面政策中的许多问题，如那种接近敌人据点却怕敌人借故来伤害群众，就不游不击，也不引诱敌人出来加以打击的办法，是错误的，反而会使敌人利用我们这个弱点来巩固它的统治。必须知道两面政策之所以出现，是在敌我斗争某一时期中敌我之共同需要。但最后目的是一面。敌的一面或我的一面，要在两面政策的斗争过程中来决定。如果满足于两面，幻想两面之持久，便

成为两面主义，结果成为敌之一面。两面政策必须配合游击战争，不能取消武装斗争，今天到处都可以伸进敌后，条件比国内战争时要强得多，即使有某些困难，也是可以冲破的，是无法阻止我们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

人民武装和地方武装都要继续改进。人民武装已经有了一些进步，但地方武装改进上还很不够。我们应仔细研究这次冀中反“扫荡”中人民武装与地方武装的成就与缺点。我们不应满足于数字与形式，而要使之成为坚强的力量，同时，人民武装或地方武装要有广大的群众性，就必须不脱离生产。我们取消区游击队[1]，不仅是精兵简政问题，而是要打下人民武装的群众基础。目前中心应加强游击小组，由部队抽拨一批快枪给他们，配合土枪、土炮、手榴弹，以加强作战能力。各级武装部应加强对游击小组的领导与训练，使之成为民兵与群众游击战的核心。不但能代替区游击队的任务，而且要更普遍化。

三、国内局势（略）

四、印度与英国问题（略）

五、我们要坚持敌后斗争到最后胜利

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但总的方面对反法西斯阵线是有利的。目前侵略阵线与反侵略阵线双方都在准备决战。法西斯巨头的德国，现在已倾其全力于决战之中。就其兵力消耗来说，德国已难于发动第四次攻势。第三次攻势的失败，将是法西斯德国永远的失败。今冬与明春，反法西斯阵线一定能够最后击败希特勒。

中日战争现已进入第六个年头，日寇的困难更加严重，新的冒险行动，也必然最后要遭到失败。只要在今冬与明春打败希特勒，明年就能打败日寇。这有科学的根据，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信心。即使日寇北进[2]，也不能够改变这个前途，相反的，更会促进日寇的崩溃。因为苏联有力量来打败德国和日本，苏联所计划的决战胜利，实际上是包括德、日两国在内的。英美的实力正在增

长，国际反法西斯的洪流，我国军队雄厚的力量，八路军、新四军在五年抗战的过程中增强了许多倍，这都是我们战胜日寇的保证。

如果只看到同盟国方面局部的失利现象，只看到印度问题一时尚未得适当解决，只看到欧陆第二战场尚未开辟，只看到敌寇在华北的“扫荡”更加疯狂，而怀疑到战争胜利的前途，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那种悲观失望的情绪，实际上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在黑暗中看不到光明，这正是目前的主要危险；必须防止这种情绪的增长，才能坚持斗争到胜利。另方面，同时也要反对忽视困难的盲目乐观心理。不从努力工作中去克服困难，却幻想坐待胜利的自行到来，这同样的是等于解除自己的武装。在北方局八月二十六日扩大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有极少数分子在困难面前动摇，企图逃避目前的斗争，这种投机分子在党内是不容存在的。还有些同志对当前自己的工作不安心，不耐烦，不断的请假，实际上无病，这也即是想躲避尖锐的斗争，混过时间，坐待胜利到来之时，还可以自诩为“老革命”，这是不能苦熬两年的“政治病”，也是对中央“七七”告同志书[3]中“再鼓一把劲”的号召的消极。必须着重指出：谁对党对革命忠诚，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在党与人民中间有他的地位。这也是我们鉴定干部的基本标准。如在国内战争时有许多被开除了党籍的同志，他们毫不气馁，艰苦的完成了长征，也就成为长征的英雄，党终于恢复了他们的党籍，这即是不怕火炼的真金，即是品质优良的干部。因此，我们必须坚定的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要屈服于困难而临阵脱逃，必须熬过这最困难的两年，完成最后一篑之功。我们坚决相信我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是久经马列主义锻炼、百发百中的射击手，要有强大的胜利信心，在任何困难中坚持工作，一直到最后胜利。

第二部份　会议结论

三天的讨论，对于我和副司令员[4]的报告，没有什么异议。同志们所发表的意见，也是一致的，并且提出了许多实际问题，充实了报告的内容，加深了对目前形势与对敌斗争的认识。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的一致与了解，决不能即认为满足，还必须深入的传达到下面去，使各级干部都能够有一致的认识与行动。这个结论只是综合一下同志们的意见，解释是不多的。

一、对目前形势的传达，要指出整个国际国内形势有利于我，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的胜利是有保证的。但也必须指出在接近光明前，也越加黑暗与困难，越要加强对敌斗争。必须使各级干部能够清楚认识全面的斗争形势，如果只强调行将到来的光明一面，而忽视眼前的困难，或者强调困难的一面而忽视光明的前途，那么说与做就会脱节，都易于丧失坚持斗争的信心。

但是无论接近胜利前的黑暗与困难如何严重，而我们坚持根据地的斗争，是决不会放弃的，我们只有这一个阵地，决不能退到什么第二线去。这点必须首先在认识上坚定下来，才能谈到解决其他问题。坚持今后残酷的斗争局面，不只是我们主观上需要这样做，而且也有充分的可能条件。应当拿这次会议的报告内容与我在“八一”军直干部会上的报告，在部队中进行教育，这在新老干部中都是同样需要的。老干部也不能单纯拿过去的经验去看今天的对敌斗争。譬如敌人的堡垒政策，今昔即大不相同。内战时敌之堡垒不如现在这样坚固，内战时敌之兵力多用于第一线，因有地主豪绅的社会基础，纵深不需配置多的兵力。但是今天的敌人却分散得多，兵力不够而不得不使用“不甚可靠”的伪军。因此敌在军事上虽占有相对的优势，而政治上我们却占绝对的优势，游击战争有广大的社会基础。如果说过去闽浙赣、鄂豫皖等苏区，

主力红军长征后，部分部队仍能坚持数年的残酷战争，并凭这点基础，至抗战开始，即能改组为新四军。那末在今天的社会基础上，我们有利得多；今天我们的斗争环境，无论哪方面都不到内战时的困难程度。

二、目前形势下，在政策上要反对“左”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略）

三、关于反“扫荡”与反“蚕食”的联系问题。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更认为华北是“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所以采取了“蚕食”与“扫荡”并进的方针。过去我们对反“扫荡”进行了许多教育，但对反“蚕食”的教育却极为不够。各级干部对反“蚕食”的严重性认识还差，领导机关也同样。正因为认识不够，所以不能很好去组织领导，不能及时纠正下层在反“蚕食”斗争中的某些麻痹现象。当然，敌人的战役袭击——“扫荡”，会给我们相当大的损害，应该有充分的反“扫荡”准备。可是，敌人“蚕食”政策的毒辣性与危害性，我们却没有尖锐的提出来。

今天，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巩固根据地，必须把反“扫荡”斗争与反“蚕食”斗争联系起来。敌人的“扫荡”与“蚕食”是双管齐下的，“蚕食”到相当程度时就要展开“扫荡”，“蚕食”即是为利于“扫荡”的一个重要步骤。另方面，有时敌人进行的“扫荡”，也是为了便于“蚕食”。在边区许多地方，敌即首先驱逐我方力量，设置据点，然后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特务各方面的统治设施，以遂行其“蚕食”计划。所以反“扫荡”与反“蚕食”不能分开。

并且，敌人的“扫荡”与“蚕食”，是多方面斗争配合下的所谓总力战。所以，我们也要集中各种力量来进行对敌斗争。这不只是如何配合的问题，而且需要统一的组织领导，但武装斗争是各条战线的斗争核心，武装斗争部署得不好，其他各条战线的斗争即不能很好结合与发挥力量，即易被敌击破。须知敌人对我的

总力战在配合上是很好的。有时先以军事占领，再进行政治进攻；有时则先建立其政治工作，然后进行军事占领。无论“扫荡”与“蚕食”，军事政治都是双管齐下的。可是我们各条战线的斗争的配合则颇为不够，单纯依靠对敌斗争委员会来领导，这是不够的。

四、今天敌后的武装斗争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在平原地区已绝对的减少了，甚至不可能，但我们并不是放弃了运动战。特别在山地中，大部队仍然可以集结活动，还可以寻求机会打运动战。如果敌人个别大队伸进来，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它，如过去银坊战斗与陈庄战斗一样。只要我们有一定弹药的补给，进攻精神旺盛，那么集结两三个团的兵力来消灭敌人一个大队是有把握的。当然敌人因过去常被歼灭，今后以一个大队的兵力，以一天的行程，伸入边区内部的可能是很少的；可是小股敌人脱离据点三五十里来进行骚扰的行动，仍是很多的，就可以坚决争取消灭它。不过今后运动战的机会一般是减少了。

关于正面牵制与敌后游击的配合问题，副司令员已有详细报告，这是游击战争的组织问题。过去到敌后游击的组织性很差，譬如伏击敌人本可取胜，但常因其他堡垒中之敌增援，即行撤退，这就证明我们在战术配合上极差，不会以一部伏击敌人，而以另一部伏击增援之敌，以取得胜利。不会乘我在敌后活动与敌作战回师之时而对敌正面突击。不会在正面本欲夺下敌人堡垒而先扰击敌后。不会在正面进行佯攻，而遂行敌后活动的某种目的，只是单纯的进行敌后活动或正面全线出击，往往耗费许多的时间与兵力。可是，敌人的战术上的配合却是很好的，特别是一个大队或一个中队的守备地区内配合得好，一部遭围攻各部增援是很快的。

今天，打歼灭战的机会虽已减少，但游击活动增多，就需要打小仗，争取许多小胜利以消耗与削弱敌人。在一月高干会议上已曾提出，但还未引起各级干部的严重注意。

在战术上，我们还不够灵活，作战方法不多，发挥很少，还

是老一套的作风。例如某几个部队袭扰敌人，打了一阵枪，就回来睡大觉。不意敌人抓住我们的规律，随后跟来，包围了我军驻村，配置火力，实行拂晓进击，使我们遭受一些损失。实际上，我们也相当了解敌人活动的规律，可是就不会诱敌伸出，而伏击取胜。正因为我们虽然了解敌的活动规律而不能运用以制敌，所以敌人亦敢大胆实行游击，到处活动肆扰。各据点守备之敌，基本任务虽然是守备，但与过去内战时的敌人不同，在战术上的进攻精神却较为旺盛。我们必须抓住敌之规律不断打击敌人，使敌不敢远离据点活动，就要寻求多打小仗的胜利。这种观念，在各级干部中，需要牢固的树立起来。

对于被分割的区域，特别是沟外，应争取变为我之游击根据地，必须摧毁敌人所建立的一切秩序，特别是汉奸特务。因为敌人在占领点或面后，就要建立一套伪组织——维持会、新民会、合作社、训练班、特务队等，来维持他的统治。我们只有首先摧毁这些“新秩序”，才能战胜敌人，夺回土地，解放被敌人压迫下的群众。

因此，在作战前，就要对敌进行周密的调查，并可采取分进合击的办法，数路合击一点而加以全部摧毁，使敌伪秩序无法建立与巩固。即使敌把维持会、合作社等搬入了堡垒，也就会脱离群众，而减弱其作用，使敌人更不敢伸出堡垒来。我们要特别打击敌人的特务，这是敌人的耳目，打掉了特务，敌人即难以得到我军的消息，无法应付。晋东南部队在游击区打击敌伪后，用五家联保（联环保）法，削弱了敌人的特务活动，就把敌人从若干占领村打出去，把许多两面地区争取过来了。

我们必须组织若干支游击部队，向敌后反复袭扰，不断的疲劳敌人，把敌人从面的占领压回据点去。或者，在敌占领面之中建立许多小块“活动的堡垒”——游击根据地，加强敌我犬牙交错的态势，以阻碍敌人继续进行面的占领，孤立敌之点线，如敌

前进“蚕食”，我即可转到敌后活动。使敌人不敢大胆深入活动。同时，我们应该调查研究各地对敌斗争的各种情况，来决定不同的斗争步骤与方法，各地的斗争经验是不能机械搬用的。我们力求减少敌人给群众的危害与痛苦，但也必须坚决打击敌人，摧毁敌人的堡垒与秩序，争取由敌的一面或两面变为我们的一面。决不应该采取两面主义，阻碍游击战争的发展，限制在敌后的游击部队的活动，客观上帮助敌人巩固其统治。

派入敌后游击的干部，必须经过选择与适当配备，不一定愿意去的即派去，因为这种人往往别有企图，到敌后去了，可能象敌寇特务一样的可恨。胆小怕死的不应该派去。这些人派去害了部队也害了人民，即使已经派遣出去的亦须调回来，否则不是游而不击，即是反起坏作用。必须派政治坚强有信心的干部（了解必须去与可能去）去领导。去时把工作任务交代清楚。除地方武装外，基干部队也可以拨出一部轮番到敌后游击，保持敌后经常有我们部队活动，同时又可以随时调换回来整训、休息与总结经验，换一换边区的空气，进行些政治形势和战争形势的教育。部队要这样做，地方党政及群众团体也应该这样做。

五、关于军事教育问题（略）

六、部队防守的地区划分与部署，应很好协同，不只地方武装应划分一定地区活动，主力兵团也可以划分区域。冀中部队在路西的也应划给一定区域，以山地为依托，以便随时进出冀中平原。在冀西所划定给他们的地区，他们也应同样负责，在军区整个意图下进行活动。同是党的军队，同样对党负责，在各军分区决无所谓主客之分。

七、关于敌伪军工作问题，朱副主任[5]已讲得很多。敌伪军的工作线索，必须保守秘密，割断与尽量减少横的关系，隶属与领导系统要单一。如果关系过于繁杂，就容易泄漏秘密而遭到损失，至于各个部门如何配合的问题，要从领导一元化来解决。一方面

进行敌伪军工作的领导要单一化，一方面又要保证部队能利用这个力量。

八、关于军事上争取主动问题，副司令员已经讲得很明白。在反“扫荡”初期要避免决战与避免被迫作战，部队必须机动转移。可是，如果单纯的转移，即会陷于消极与被动，必须要把“走”和“打”统一起来。在转移中，也要主动的打击敌人，主力虽不投入战斗，但应开展游击战，到处扰击敌人，配合民兵进行爆破、游击，打击敌之侧后，阻滞敌人前进，缩小敌人活动，以争取战术上的主动，使整个战役不至完全处于被动。要不断疲惫与消耗敌人，俟敌回师归巢之时，主力即寻机投入战斗，抓住敌人之一路而加以歼灭。但是当与敌人遭遇或被敌包围，则应为脱离敌人而坚决战斗与突围，不能乱跑或不战而散。第一二九师与冀中部队有许多好的经验，值得我们采用。

九、有的同志把巩固根据地与保存实力对立起来，是不妥当的。储存实力以准备反攻，是对的。但是，要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必要的损失与消耗不可避免。譬如节省弹药问题，如果只从消极方面着想，即是很危险的。实际上，没有根据地即无所谓保存实力。正因为要保存实力与巩固根据地，就应该积极作战。至于如何减少战斗中的损失与消耗，这是战术指挥与技术教练的问题。

过去节省弹药的口号，往往流于空喊，缺乏具体办法。今天我们的弹药补给虽很困难，但决定特等射手十天要打靶一次，减少在战场上乱射的消耗。特等射手必须很好培养，根据这次的检查，成绩是不很好的，必须拿出优秀战士来训练。同时，特等射手一般不投入冲锋，以减少伤亡。特等射手不应轻易调动，使他在久经锻炼中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发百中的射击手。这个观点必须在各级干部中建立起来，纠正认为过去红军时代即没有把特等射手搞好，今天也无法搞好的消极错误的想法。这样才会做到节省弹药。同时掷弹筒、枪榴弹与步枪的射程与杀伤力等，还需要仔

细研究，使部队懂得它的性能，才会有充分的信心去对敌作战。各部队应搜集各种军火材料，这点过去做得不够。我们的工业部在困难的经费、物质条件下，辛苦的制造各种军火，很需要各部队给予实际帮助。

十、关于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问题。地方武装主要是地区队及县基干游击队，与主力部队不同，主力部队多需集结，地方武装则应多分散活动。地方武装的隶属与指挥，仍应统一于各军分区。

人民武装较过去是加强了，领导上联系上都好了些。但区、村做得很差，应着重培养干部。今天区游击队虽已取消，但各级武装部，却掌握有若干不脱离生产的游击小组，这些游击小组，只有不脱离生产，才会逐渐扩大。部队应发给游击小组一些快枪，使与土枪配合，加强战斗力，但这些快枪应掌握在有斗争决心的党员手里。游击小组是各级武装部的依托力量，起着区游击队的作用；并且是更加普遍的，群众武装组织到处皆有，不是一支孤军，在游击战争中，有极重要的作用。

十一、关于领导一元化，中央已有指示，这可以解决许多的问题。今天还不能决定具体的办法，但这个方针是决定了的，等接到具体指示后，再研究执行。

注　释

〔1〕一九四二年二月，晋察冀军区为适应根据地被敌分割、封锁的斗争环境，贯彻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的决定，和十一月中央军委《关于敌后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进行精兵简政，取消了区游击队。

〔2〕日寇北进，即指日军进攻前苏联远东地区。

〔3〕告同志书，指中共中央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发布的《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

〔4〕副司令员，即肖克副司令员。

〔5〕朱副主任，即朱良才，当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在晋察冀军区卫生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同志们!

卫生会议开了几天，今天就要结束。全军区卫生部门有许多应兴应革的事情，在姜部长[1]的报告和同志们的发言中，提出了很多。由司令部审查后，有哪些工作应该做和怎样做，将以训令发布；有些属于专门性质的问题，昨天殷主任[2]已经解决了。我只就感觉到的问题与希望简单讲几点意见。

我们的卫生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两三年来都是这样。一方面总结一年来的工作；另方面，这时候正是休养员比较少，一般的工作比较闲，便于我们开会。这里我想把三年来（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二年）军区卫生工作建设上的情况概略地比较一下，可以看到我们取得了许多成绩。

记得白求恩同志在临逝世前的遗嘱上讲到今后卫生工作时，曾提出疟疾病的严重性，建议要准备大量奎宁，预防与治疗疟疾。可是那时我还是忽视这个问题，我们卫生机关也没有把他这个遗教变成现实。那时我总觉得在北方疟疾不会象南方那样严重。过

---

* 这篇讲话原载一九四九年十月《河北省军区卫生建设史料汇编》，一九八四年十月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三期上重新发表。

去红军在南方的确感到疟疾是很大的威胁，一到陕北就少了，没有普遍流行过疟疾。在一九三七年秋后和一九三八年，我们住在五台，觉得蚊子很少，没有看到疟疾，到河北后，才发现疟疾，但还不严重。所以那时白求恩讲边区最严重的病是疟疾、痢疾，应大批准备奎宁，但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结果，疟疾从南方传来后，发展得比南方还严重，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自一九四〇年以来，在部队中、居民中疟疾患者的死亡率相当大，这说明我们对药品的准备是不充分的。病后怎样调剂营养，怎样恢复健康，我们也注意不够，许多人病后一般患水肿或贫血，因而增加了死亡率。后来对疟疾的严重性大家才有了足够的认识，从一九四〇年后在药品的准备上也比较充分了。一九四一年反“扫荡”前后整个部队用了很大的注意来预防与治疗疟疾，做好病后恢复健康的工作。虽然三分区疟疾普遍严重，但比一九四〇年冬季一般要轻些。我手头虽然没有统计数字，但知道由于治疗得法，尽管去年环境比前年还坏，可是死亡减少，健康恢复较快。今年疟疾还是严重的，可是比去年减少，这从各部队死亡统计及健康情形中可以看出。对于痢疾，我们并没有因为不是主要威胁而忽视。在边区痢疾还相当流行，但今年比往年要轻些。冀中部队今年病员特别严重，是由于部队在反“扫荡”中辗转苦战，在青纱帐中长期露营，饮食不按时，以及战斗紧张，由生活较优的平原转到较贫困的山区，医疗工作跟不上，卫生设备不健全，所以病员就多。但北岳区部队今年的卫生准备却比哪年都有进步，病员及死亡较往年减少，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药品方面，我们虽处在困难的条件下，但始终保持有一定数量的药品。譬如在战争环境中，我们外科药品却不感到缺乏，还有够一年使用的储积量，纱布棉花没有间断过供给，并且质量不比外边医院差。又譬如内科特效药象奎宁等，虽然分发上还有毛病，但病人能吃到，能按时供给。同时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我

们对中药的制造和代用品的采用上，也有相当大的数量，即炮制亚砒酸生命素等已达一千磅以上，使患疟疾病的人能普遍吃到这种有效的补药。这同国内战争时期相比是要好得许多的。

再就医务干部的培养与提高上来讲，我们同样取得相当的成绩。正如昨天姜部长所报告的，国内外的医药专家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从国际方面来说，白求恩、柯棣华等对边区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去年反“扫荡”正激烈的时候，我曾接到“美国援华委员会”为五台山区八路军寄赠一千五百个床位的经费、药品的电报；美、英、印“援华委员会”对我们都抱着巨大的同情，在物资上给予许多帮助，只因交通困难及种种原因，许多药品我们没有收到。另外国内许多专家也贡献了许多力量。“白校”[3]在医疗技术的提高和医务干部的培养上，几年来已有相当大的数量与成绩。这便是我们辛苦创造与培养的结果。但有的同志觉得还有许多疑难问题没有解决，我却认为这是好事，因为我们不应该固步自封，局限于狭隘的经验，必须追求科学，向专家们学习，因此才发现有许多疑难问题尚未解决，这正是表明我们的进步，同时也表明了对专家们的信仰。只要我们力求进步，我们就真正能够进步。

我想，在今天的会议上，如果只拿一年的工作来看，还不足以表现我们的进步，如果把三年来的卫生工作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一年比一年进步，这是我们应有的认识。

但我们对这些成绩是否就应满足呢？不能。我们还有很多弱点。就整个后勤工作来说，卫生工作还是最薄弱的一环。昨天卫生部门及政治部门许多同志发言中举出了一些严重的现象，如马虎医治，草菅人命，不关心伤病员，贪污浪费等，在有些医院中存在着。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主要应该由卫生部门担负，同时要依靠整个军区部队帮助克服与整顿。我们大家都应该重视这个部门的工作，不能只怪政治工作保证不够，或者说卫生部门工作

没有搞好，或者单纯归咎于管理不好与卫生机关人员质量差等，应该从多方面去追究与了解。在座的同志都要负责，发言人也不能推托责任。关于卫生部门人员的选择，在今天有重要的意义，这点以后再讲。总之，我们的缺点是存在的，有些严重现象虽然不是普遍的，但必须克服与肃清，才能把卫生工作健全起来。卫生建设在整个后勤工作中是很繁重的，如果在敌后根据地搞不好，就会给予我们很大的苦恼，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战斗力，甚至影响到对战争的领导。

在物资供应上，我们曾用很大力量来解决。供给部门对伤病员的给养用品是注意到了，是有办法的。譬如白面、大米如何调剂，烤火费如何规定，如何消灭伤病员身上的虱子，置备衣服、垫子、被子等都做得还周到。至于这些东西用了多久，破了多少，我们各卫生部门是否有统计数字呢？一般是没有的。

就药品方面讲，不管中药西药，我们不惜耗费巨款去购买，在这方面，我们不曾吝惜过一个铜板，开支比工业部造枪械费的钱还多。但有些我们用得不适当，也没有很好考虑这个问题。譬如有的药品存放了三年还没有用，有些在窑洞里烂掉了，有些药品买来就是假的，浪费了相当的经费，我们今天还感痛心。有的地方病员还是很严重，譬如工业部[4]南厂，因为工人普遍患病而不能开工，就把工厂变成医院，一直到十一月才开工。又如休养三连，平时伤病员没药吃，搬家时却把整磅奎宁丢掉。还有发下的衣服老在库房里放着，而伤病员却没有衣服穿。这种不负责任的现象，给予伤病员很大痛苦。前年在吊儿[5]开会时，我曾提出预决算制度，依此可以看到每月消耗多少，以防止浪费，但至今尚未做好。昨天李副部长[6]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各方面节省都不能把这个部门的亏空补起来；最令人不满的，就是钱用了好多，但伤病员却遭受莫大的痛苦。这问题曾一再提出，亟待克服与纠正。

在技术方面，虽然我们整个来讲是提高了，但还很不够。我

们有许多专家，正可以做没有成“家”的人们的老师。我们技术差的同志应虚心向他们学习，向他们提出疑难问题。实验的精神是应该发扬的，但必须具备一定把握，不要以人命做儿戏，把人实验死。西医是科学的，但仅有书本上的一点知识，不能认为了不起，那还是教条，没有足够的经验是不行的。同时西洋人与我国人无论从体质上来说，从经济、生活上来说，从文化与体育发展上来说，都有很大的不同；在他们曾经是对的，在我们就未必对，如果硬用他们的标准来看，恐怕我们每个人都将成为肺病患者。所以我们在学习与吸收外国东西上，还要细心研究，不但要有科学根据，尤其要把握科学适用的具体对象。一方面要追求科学，一方面不要把科学变成教条。须知一件事物，即使有科学根据，并不是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都适用的。

这里，讲一讲我们对专家的态度问题。首先从白求恩讲起。他初到边区时，不大了解敌后游击战争环境的特点，不了解边区物质生活上落后的情形，一开始就提出建设模范医院的方案，规定要哪些设备。当时我很为难，因为照他那样做吧，行不通；但加以拒绝吧，一开始就给他一瓢冷水也不好。当时我便想折衷的办法，不根本推翻他的意见。我告诉他说：“你的办法是科学的，不过不能运用到具体环境中来”。当他在耿镇布置医院房子一时弄不起来时，我说好吧，在一切尚未妥当前暂且改造一下庙宇，把建筑计划暂放到第二步吧。接着伤病员很快就来了，组成了白求恩“模范医院”，实际上就是在一座破庙里搞起来的。经过不久，到九月二十日，敌人从平汉线、从五台山出动“扫荡”，白求恩“模范医院”不能不搬家了，先后搬到合河口、长峪等小村里。他说分散倒好，老乡都很好，对伤病员没有妨碍。我说：“那么房子不要建筑了吧。”这就是说，他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很科学的一套，拿到今天这敌后游击战争与经济落后的环境里行不通，他才改变办法，分散建设医院。一九三九年他到冀中，经历了一次反“扫

荡”，得到了怎样打仗、怎样流动、怎样救护、怎样搬动医院的经验，回来就在和家庄写了一本《师野战医院的组织与技术》，把红十字汽车换成骡子，做好架子，把汽车司机换成马车夫。这种改变就是把高度的科学知识运用到边区的具体环境，是很科学的。正因为他有科学的基础，才会想到在这样环境下怎样做到科学化。今天汽车在边区之不科学，正如骡子在美国之不科学一样。可是他的遗著，我们是否很好的研究过呢？我们口里时常叫科学化，可是在现在环境怎样才叫做科学化呢?许多同志认为这是小问题，不值得注意，其实这正是具体的科学问题。我们读过苏联红军的参谋工作条例，觉得它与白求恩的著作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譬如一个皮包多么大，带几支红兰铅笔，需要什么小刀、几张纸都具体的规定出来。同样的，白求恩也把一个医生要带好多碘酒、棉花等（一般人认为零零碎碎的问题），都具体周密地规定出来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家每件事情都经过脑子想过，不是随随便便处理问题的。这些，他一直到死还念念不忘。再就是北平东交民巷电灯公司工程师布朗斯基来到边区，在谈到工作问题时，我说：“你还是回荷兰去吧。”他说：“我已无家可归，这里有什么工作可做，还是留在这里做点工作。”我说：“好吧，你先到边区看一看，是否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下可以工作。”结果是，他提出要有什么机器才行，否则他没有办法。结果还是用我们自己的土工程师，送他到重庆去了。今天我们工业部没有一个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可是许多东西可以做。我们今天在战争中消耗很大，就要依靠“边区科学家”。不要以为“边区科学家”这个称号对他们是贬低，要知道别的科学家的办法未必在边区能用。为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今天自力更生的困难条件下能够解决问题，这就是边区科学家可贵的地方。班威廉[7]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的大学教授，他对于边区科学家备加赞扬。他说：“在今天环境下能够造出东西，才是真正的科学家；今天在艰苦抗战中他们成了科学

家，那么在反攻后新中国的建设上，他们的岗位也将是很重要的。”这是外国科学家对我们边区科学家的科学态度，我们对之应有足够的估计。昨天殷主任讲到外边的大学教授、医生认为只有在某种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器材与手术室才能治病，但今天我们的手术室却只是一座小房子，同样可以截肢、接肠子、装人造肛门，做好了许多相当繁难的手术。如果一定要协和医院那样的条件，那么在边区根本就不能施行手术了。那些人顶多只是那个地方的科学家，而不能成为边区的科学家。边区的科学家是能够在边区现实环境下想出办法来。一面不否认科学，一面要使科学运用在具体环境，这就是我们对科学家的态度，也就是科学家对科学应有的态度。

我们卫生部门的专家，不是轻易称“家”的。所谓“专家”，必须有长期研究和创造，有专门的知识和特长。在医务方面，过去我们曾集中我们的专家于部队和学校，使他们在培养干部上，在医务治疗上，发挥了威力；今年还把他们组成“医药指导委员会”，成为边区医药界的权威组织，全边区医药技术上的问题都要服从它的指导，这是很有意义的。在教学方面，他们需要了解全部队、全边区的卫生情况，加以研究整理后，提供大家执行，发挥治疗的威力，并把这些东西教给学生，使学生不会停止在书本教条上，而能与边区的实际联系起来。昨天殷主任要求大家多提问题，因为问题越多，则研究的材料便更充实，更有进步。三分区能多提出问题，是很好的，这比他们到各处去询问要好得多。殷主任指出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反映问题的材料还是太少，或不具体，缺乏必要的材料供专家们研究解答。今后应多提问题，并注意具体。“医药指导委员会”将给予边区医药界很大的帮助，今后除他们本身研究问题外，还要解决下面所提的问题，以发挥它的力量。今后医药方面的许多争论问题，只有从这里才能得到最后的结论，也只有这里才能做这个结论。这是我们尊重专家，提

高对专家信仰的措施。

关于开展边区卫生运动问题，这问题老早即已提出，可是没有搞好。今天重新提出，就要进一步想法去进行。但是仅仅组织一个委员会，没有人指导是不行的。譬如厕所问题，关系着边区的经济与文化，因为它是供给农业肥料的来源，不能完全埋掉，又没有那么多石灰去完全消灭蚊蝇，但是适当地减少其数量与多填干土，是可以办到的。再如取缔小摊贩卖零食不讲卫生的问题，可与公安局协同进行。关于整个卫生运动，可由“医药指导委员会”建议边区政府，说明预防明年疟疾、痢疾流行，在人民群众中发起卫生运动的理由和办法。一方面教育宣传，一方面从行政上督促检查，切实执行。

目前在医院工作上存在着多头领导，常常不能解决问题。今后卫生机关的工作要改变，实行领导上的一元化。现在一个机关中有行政系统，有医务系统，遇事互相掣肘，妨碍工作。今后明确规定卫生机关的任务，是“一切为了伤病员”，怎样进行治疗，保证早日出院，恢复健康，减少死亡与残废。这个任务的完成，是卫生部门工作的中心。它的指导以医务人员为中心，行政工作要适合医务工作的要求，政治工作也同样。如果说政治工作在战斗部队的任务是怎样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那么卫生机关的政治工作，就是要保证医务治疗工作的完成，要适合于医务工作的要求。一个指挥员计划部署错了，政治工作怎能保证其必胜呢？同样一个病症，医生诊断错了，处方错了，政治工作又怎能保证其痊愈呢？所以今天卫生部门的工作不是谁重谁轻的问题，而是它的中心所在的问题。今后确定医生是中心领导者，决定一切医务行政，如伤病员的收留、出院、转院，不由指导员决定而由医生决定。医生决定某个伤病员需要什么东西，行政供给人员就应供给他。在一个部门有几个医生的时候，应确定众所公认较高明的一个医生为中心领导者，大家实行会诊，一切医务治疗，由中心医生调度。

今天我们要把作风大大改变一下，不要把过去的东西一成不变，既然发现了缺点，就要断然去改正。有许多问题是专门的问题，我们既不是专家，就不要横加干涉与牵制，使之无法执行任务。更具体地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从政治上保证完成医务计划，保证伤病员迅速恢复健康，减少死亡、残废；保证工作人员与伤病员的情绪高涨，积极负责完成任务。医生的工作也要适合医院的特点，不能把连队政治工作那一套搬到医院里用。譬如连队青年队，号召每个青年成为一个好的射手，那么卫生机关青年队便有其具体内容。以看护员来说，应该号召他们每个人都成为爱护伤病员、关心伤病员的模范。一切为着医治伤员与消灭疾病，必须根据具体工作内容，改变政治工作的方式。吸引医务人员参加政治工作，是对的，但其内容应与连队要求不同。譬如对一个医生来说，他的条件与品质就是对伤病员关心爱护，态度和蔼。吸收他们参加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也就是要养成他们这种高尚的道德。不要使医生担负许多政治工作，否则会影响到他本身的工作。医生就是医生，他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诊断、治疗与消灭疾病上，好象战斗中重要的指挥员一样，不要把什么工作都分配给他。同时医生本身也应该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与道德。每个医院确定一个医生作为中心领导者，其他医生应在他的意图下，帮助完成工作，服从他的决定。当然在医生干部的配备上，卫生部门应该慎重。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强的医生不要堆在行政机关里。所有医务行政机关与人员都应该接近病人，到医院中去。反对庞大的上层机关只摆大架子，一科一股的留着许多干部，而医院却没有好的医生，甚至只用看护员看病开处方。好的医生应该放在医院和前方治疗伤病员，只是堆在机关里做科长、股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今后除留下最低限度足以执行日常行政工作的人员外，应大批派到医院中去工作。各级卫生机关要秉此精神来改组。

对医务干部问题，有许多同志的发言，我觉得不完全对。我

们要提高技术，但不要对“白校”学生要求过切，估计过高。“白校”毕业的学生，在学校学习才告一段落，还要在工作中锻炼，吸收经验，所以不应对之估计过高，马上就分配很重的工作任务，使他力不胜任。今天提的过高，明天碰了钉子，又说如何不行，反会影响他的情绪与信心，使他消沉下去。这不是培养干部，而是糟踏干部，是不妥当的。因此，要求迅速毕业就不合适。学校本有一定计划与时间，不能提早毕业，如果让未成熟的学生统统毕业，不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吗？

对于卫生部门的其他干部，昨天有些同志认为后勤部门最“拉杂”。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不管经济部门与卫生机关，干部的分配都是经过适当调整的。不久以前，我曾这样发誓：谁如果把不负责任的人往后勤部门尤其是卫生部门推，谁就是没有道德，没有“良心”。过去我们在这些部门是吃过亏的，受过苦的，可是今天已经逐渐解决着，并不是那样“拉杂”。在司令部和后勤部门，绝不要把在前线不负责的干部调来充数，在政治部也是一样。我们要肃清长期形成的不良作风，把一些不负责任的人放在后方机关，常常做出最坏的事情，这就是没有“良心”。我想再没有比用“没有良心”一语更使人诅咒与痛恨的。

至于医院中同志们所提出的一些困难问题，我觉得并不是那么难解决。如果我们医务干部将上述医药等问题解决了，那么困难就减少了一半。有了医生，有了药品，还有什么困难呢？给养适当地调剂，没有人从中揩油，这问题也就可以解决。至于同志们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如供给方面的运输勤务人员问题，医务人员做其他工作太多的问题，这些在分区甚至在医院中就可以解决，用不着提到这里。譬如运输勤务人员问题，就可以召集附近村长商量，我们替当地老乡看病，请他们替我们搬运点柴、菜，大家互惠互助，我想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一定要从抗战勤务上来拨运输人员，可由分区与专区交涉，用不着由边区政府下命令。再

一个办法，是找分区首长，让辎重队每月运几次粮食、柴、菜，也不是办不到的。此外蔬菜可以委托管理科代买一些，由辎重队驮回，也可以解决问题。这些如果都成为问题，那么工作中发生新的困难就更多了！至于看护员不断出差，影响到照顾病人，如果勤务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随之而解决了。

提高护士质量，今后可在“白校”附属医院实际训练。由各医院轮流抽调护士到那里实习，不是上课而是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一批一批地轮流训练，逐次提高。因为现有护士大多受过训练，并经过几年工作锻炼，技术水平、文化水平是较前提高了，小的也长大了些，在现有基础上把他们继续提高是可以的。

关于医药统一购买问题，有些同志的观点很不对，卫生部不准他自由购买，他便要求按季节发给。是的，应该按季节发给，但我们是从外面去买，不能完全决定于我们，因为敌人不让我们顺利地购买。实际上军区不能按时发给，分区难道就能按时发给吗？我们过去的痛苦，难道还不知道吗？药品被奸商操纵，由于我们各自争购，弄得价格高涨，市场混乱，甚至影响到整个边区的金融。譬如本来值一百元的东西，由于大家争购，提高到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假如我们统一购买，他如继续上涨，我们就不买他的，奸商既不肯放弃这个唯一大主顾，就会自动减价。同时本位主义在有些部门中非常严重，他买到的药品，你要调一点就很困难，甚至在哪里买的也不告诉你，以显示自己有本事。同志们！大家是共同为着自己的军队服务，如果只有你一个人一个部门好，其他的都垮台，在这种情况下，你有什么办法？又有什么胜利可言？这种本位主义作风，失掉了共产党员起码的品质。我们统一购买、统一分配的原则是不能动摇的。

关于随便带走器械问题，除了专家们自己的书籍、器械可以自由地处理外（也可以卖给公家），公家购置的一切东西，都不是私人的。每个医生调动时，一定要交代清楚，一把钳子，一副听

诊器，都必须留下。到哪里用哪里的东西，一切器械由公家统一分配，以有余补不足。那种随便带走公物，即是十足的私有观念与个人主义的表现，卫生机关应立即纠正，严格遵守制度。

关于中药问题，我不详细说。大家认为西药有科学的根据，是的，但因此根本否认中药，却是不科学的。今天只能说我们现有的知识，还不足以分析中药，并使之科学化。我们要学习日本人中药西化，日本医学中有汉医一科，用高度的西方科学知识来研究中药，得到了相当成效。今天我们要自力更生解决困难，就必须用中药来解决问题，真正用它来治病，绝不可认为只是用中药来应付一下，来敷衍塞责。中药是有效验的，否则我们何必每年花费巨款来进行这一“无谓的”事情呢？至于何种中药有效，能治什么病，可由“医药指导委员会”研究实验决定，是否科学，以实践为凭，并予以系统的说明。同时名目不要太多，应集中力量于几种特效药的制造。

有些同志认为只要今年准备一些西药，明年反攻时一切都可以解决，这样推断是不妥当的。我们自力更生，还要长期打算，不要认为反攻时一切都是甜的。反攻是什么呢？就是和日本决战。大战一到，一切都操在“四海龙王”和“火神菩萨”手里。我们不是成天听见上万吨的船只沉没和成千架飞机炸毁房屋、工厂吗？你以为反攻时一切都有，我却以为什么都困难，或没有。决战时期并非什么都是甜的，就是反攻以后，也不会马上得到解决。譬如荷兰工程师还要回到荷兰，把工厂恢复起来，制造好奎宁。还有船只运输问题，要经过相当时期才能恢复。那时“拜尔”大药房是否存在，还是一个问题。上海中西大药房也许会被美国飞机炸坏，北平、天津也许没有什么药品，也许住在协和医院吃五台山的党参，发疟疾要吃扑疟酊。所以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艰苦地实现自力更生，这不是应付，而是真正要起死回生，治病救人。今后由“医药指导委员会”加以研究实验，并说明各种中药的特效、

用量、用法，提出科学的根据，使医生与病人对它有充分信心，提高中药的价值。否则，明明是好药，医生、病人对之缺乏信心，以为是应付，在精神上已先起坏作用，就难以把病治好。“医药指导委员会”除本身工作外，还有许多问题，如把医生对伤病员的态度问题，伤病员对伤病员的态度问题，写成教育材料，用“医药指导委员会”名义公布，这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药商专门利用那些对人无补的“补药”敲诈发财，如象“维他赐保命”之类，对此我们曾作过决定、下过训令不准购买，但最近仍有干部病后以几十元购买请求报销，不予批报便说对他不重视。同时也有些医生以不负责的江湖态度对待病人，叫病人购用这些东西。今后可由“医药指导委员会”作一决定公布，给予科学的否定。此外，规定今后只有医生才可开处方，没有医生的处方就不发药和报销，这点也希望“医药指导委员会”加以说明。

以上这些重要问题，有的已经早有决定正在执行，我再次提到同志们面前，使同志们重新加以认识与正确执行。我讲的就到此结束。

注　释

〔1〕姜部长，即姜齐贤，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

〔2〕殷主任，即殷希彭，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副校长兼教务主任，著名医学教授。

〔3〕白校，即白求恩卫生学校的简称。

〔4〕工业部，指军事工业部。

〔5〕吊儿，即河北省平山县吊儿村，当时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

〔6〕李副部长，即李荒，晋察冀军区组织部副部长。

〔7〕班威廉，即英国人威廉·班德。

论敌后抗战*

（一九四三年十月）

华北敌后之抗战，迄今已六年多，斗争之残酷实为历史上空前所未有。就华北之一角——晋冀察边区而论，其尖锐复杂而剧烈之斗争形势，实远处大后方的人士所想象不到的。迄抗战六周年为止，共计作战一万七千四百余次，共毙伤和俘虏敌伪二十三万五千余人。我亦伤亡六万四千多人。一点一滴的胜利都是从一点一滴之流血斗争中得来的。

几年来敌我在武装斗争方面，曾经过许多发展与演变阶段。一九三八年武汉陷落之前，敌人即已开始对我举行进攻，屡次集结优势兵力，以正规战术作战，攻我一面（如阜平，涞源等地）。武汉会战之际，敌同时大举进攻我五台、阜平，且将“扫荡”华北与进攻武汉相提并论。在战术上改取分进合击的数路“围攻”方式。仍然未脱离机械的军事教条之束缚。我以游击战、运动战相辅与之对抗。因之使敌找不到我固定阵地与固定阵线，而常于扑空之余，遭我痛击。一九三九年，敌集结相当优势兵力为一路，采取“长驱直入”的方式袭击我之中心地区（如灵寿之陈庄及涞源之黄土岭等役），但均遭受歼灭性之打击。进攻陈庄之敌，全军复没。阿部中将则随其部下葬身于黄土岭，就是敌寇所谓的“名将

* 这篇文章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六日曾刊登于重庆《群众》杂志第八卷第十七期上。

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敌因屡次惨败，故自一九四〇年起，乃实行所谓“极度分散配备”，以控制平原各大村镇与山地各要点，以冀窒息我军，奈兵力不足，再加分散配备，则弱点愈多。一九四〇年百团大战展开后，我军大举出击，不仅敌在山地之若干据点被我拔除，即沿铁道的封锁据点亦均遭我猛烈破坏。在战术上不仅展开广泛游击式战斗，而且局部的展开对敌阵地之攻击。于是敌之分散配备亦告失败，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乃复调集大兵“分进合击”，向我大举“扫荡”，并一度侵占我阜平。但经我运用游击战与运动战配合打击之下，使占据阜平之敌于弹尽援绝之后，狼狈败窜。

一九四一年敌酋冈村宁次鉴于既往之失败，乃谋改弦易辙，实施所谓“铁壁合围”战术，以中条山与晋察冀为全年两大战役进攻目标。经长期之准备，企图先荡平中条山根据地，截断敌后我军与主力之联系。结束后，立即转其凶锋指向我边区。战斗一经开始即分十数路直扑而来，山沟小道，无所不至，反复“围剿”。在战术上则与“三光政策”并用，杀戮焚掠，凶残无比。然经我将士之浴血抗战，卒挫敌锋，纵敌酋冈村亦不得不承认失败，并谓：“荡清八路军，非短时间所能奏效”。而只得以“狮子扑鼠，效力不大”等遁词聊自解嘲，其窘态可想见矣。之后，敌复强调“高度之分散配备”增筑碉堡及封锁沟墙；其密度几至逐村皆是。封锁既成后，乃实行其对我根据地之“蚕食”政策。直到今天，“蚕食”政策亦经多次演变，初则“步步推进”，继则“分区扫荡”，“分割蚕食”，以达其“蚕食”之目的。一九四二年冀中区之“扫荡”战，即属此种性质。然敌此种紧缩“蚕食”之目的，至今已付重大代价而犹未遂其所欲，且将永不能为所欲。至其分散配备之结果，愈使敌军兵力之分散，由于纪律之废弛，则其腐化堕落、厌战、反战之情绪亦继长增高，战斗力亦日趋低落。如此，我军纵在堡垒如林，沟墙如网之广大战场上仍能纵横驰骋，游击战

争之火，更广泛燃烧于敌占区。变敌后为前线，远近交攻，敌我交错，我之前锋更早已越长城、榆关[1]而插入伪满边境，震撼敌人之心脏。战局之发展将益增敌寇惶恐，而促其败亡。

六年余敌我斗争之尖锐与复杂之形势，不仅表现于军事方面，而且表现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之综合斗争。自一九四一年起敌即开始其所谓“总力战”，此“总力战”之表现最显著者，即敌寇所进行之“治安强化运动”，自一九四一年起前后已举行达六次之多，其中心则各期不同。就我边区而言，敌寇在其“治安强化”运动中，集中于人力物力之抢夺，及政治上思想上之诬蔑造谣，企图达到其“以华制华”之目的。敌以兵力不足到处抓捕壮丁，扩编伪军，充实守备兵力。现敌占领区大部分均由伪军防守。此等伪军一部分为失业或流亡者之集团，敌寇本拟利用之于一时，结果多与愿违；而今敌寇去之不能，欲“肃”之又不胜其“肃”。若干地区，如大清河以北，与其说是敌寇“治安区”，毋宁说是伪军统治地。另一部分伪军，则大部为农村之壮丁，被强迫捕捉而来。他们既无战意，又无战力。尤其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敌寇必败之势日渐明显，造成伪军普遍动摇，日寇也明知其不可信，然不得不利用之于一时，此乃其严重之危机。敌寇对物力之掠夺，乃图达成“以战养战”之目的，敌曾以“开发资源”、“确保农产”、“勤俭增产”等类口号相号召。但实际上敌寇之所为，适得其反。敌寇到处挖沟筑堡，强占与毁坏人民田地房屋不知凡几。而苛捐杂税，勒索掠夺，更层出不穷，加之壮丁之被捕走或逃亡，致使敌占区农村或有地无人耕，或有人无地种，或有人而无心耕，终至“增产”成为空言，经济之危机日趋严重。而我对敌之经济封锁，更使敌寇之经济困难有加无已。敌寇明知敌后人民是与之尖锐对立的，乃极力进行所谓“思想战”，宣扬所谓“皇道精神”，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但“七分政治”之一切欺骗假面具，早被其“三分军事”之残酷暴行暴露无遗。“三光政策”之下，遍

地血腥，使广大中国人民益增与敌不共戴天之深仇。数年来，敌后军民在对敌斗争中，正不知涌现几多民族英雄，其惊天动地之壮烈事迹，传遍人民之间，记不胜记。于是敌寇“思想战”亦宣告破产。此外，敌寇所擅长者乃在政治上挑拨离间，破坏我军民之间关系，离间我抗日军队之团结，更无一日放松，且以此为谋略之重要部分。我们回答敌人的，却是更千百倍的提高了我们的警惕，肃清了各种潜藏的“第五纵队”[2]分子，加紧抗日阵营的团结，粉碎敌寇的阴谋。

六年余敌后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战争是无情的，不战不能存，不战更不能胜。我军采用之战术基本上为游击战，但此种游击战决非等闲的“游击战”，更非一般墨守战术教条者所可比；也不是仅守过去游击战争的“老一套”经验。游击战术发展至今日，乃是在既有的战争经验基础上，再从六年余抗日战争中，不断获得新的经验，而高度发展之结果。斯大林说：“在战争中不进步者即将为敌人所击败”。这虽指现代最优良之军事装备与作战技术而言（我们固然没有现代化优良装备），但我之战术，必须适应我现有装备而力求改进，其理则一也。

一、我民族自卫战，必须为全面性之总力战，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复杂配合之战争，若根据单纯军事观点去组织抗战，决难取胜。尤以我军远处敌后与大后方断绝，得不到任何补充，仅凭简陋之武器与强敌周旋，若忽视各种斗争之配合，则不仅我军事上不能取胜，敌且从其他方面以攻我。须知敌以不义之侵略战，对我正义之保卫战，政治上之优势在我而不在敌。故我须以政治上之优势与军事斗争相配合，以对抗敌之军事优势，从而在各种复杂斗争中改变敌我之优劣形势。

二、必须真正实现民主政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的生活，真正能动员、组织并武装广大人民，才能真正发挥总力战之力量，并使军民成为鱼水不可分之整体。否则孤军苦战，必

难获胜。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即有全国总动员之号召。我们坚持敌后抗战，六年来恪遵此种号召，认真动员组织与武装广大人民，参加抗日各种斗争，故能坚持敌后作战以至今日，且将继续坚持下去，直到最后胜利。

三、团结乃战胜敌人之唯一武器，军队与军队间，军队与人民间，均应以抗战第一，胜利第一为总的第一目标，消除任何不团结的现象，反对任何减削自己力量的行为，不予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

四、坚持敌后战争，必须创立赖以凭依的根据地，作为战略基地，以遂行独立作战之战斗任务。无论武装部队，地方政权，民众组织以及经济文化等设施均必须有完善具体之整套办法，更须完全适合敌后斗争之环境，不能囿于成规，固守旧习。如不明此理，武断专行否认各种建设，则抗战之胜利与建国之成功，都不过徒托空言。我晋察冀边区行政当局不仅有其各种设施维系敌后人心，团结并组织广大人民，在保卫祖国的旗帜之下，获得温饱，使敌占区同胞心向祖国，精神上有所寄托，其作用亦非常巨大。

五、在这样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要能够领导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的对敌作战，就必须有照顾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我们所坚守的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精神，不但为少数人着想，更为大多数人着想，为全国人民抗战利益着想。

六、在敌后作战之部队有成功者，有失败者。因此，我们就必须有严正之赏罚制度，虚心检讨其成功或失败的缘由，得出经验与教训。如果赏罚不明，墨守成规的军队，纵令其有充裕之补给与优越之装备，仍不免要遭受不必要之损失。这种事实，不可不使我们深刻反省。

当此总反攻时期愈形接近之今日，胜利虽已在望，而今后之困难亦必更多，敌后斗争之艰苦程度更将十倍于往昔。因此，我们亦必须以十倍于往昔之努力以支持日益艰苦的敌后斗争。我深

切的期望今后我不卷战斗之敌后部队能获应有之补给与援助。更望全国各党各派全国军民能够真正亲密团结，配合反法西斯同盟国之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使民主和平之新中国得以早日实现。

注　释

〔1〕榆关，即山海关。

〔2〕第五纵队，指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在共和国后方活动的叛徒、间谍和破坏分子所组成的反革命集团。这里原指潜藏在晋察冀根据地内的汉奸特务分子。

乘敌后空虚逼敌后退*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七日）

一、原驻平汉线之敌一一〇师团，从各地情报看来，确已到豫，在密县、登封之线。新换防之敌，望查告。

二、豫战正酣。敌企图不止打通平汉线而已，从整个战略看来，恐有继续打通粤汉线的必要。若然，则华中、华南战事将延长。因此敌后可能较空虚。华北各地已放弃不少据点，如能积极活动（围困、破袭交通线等办法，但不打硬战），还可能将敌继续逼退之。

三、我区北线求得逼退紫荆关、涞源城、北泉、灵邱线之敌；东线及东南线求得逼退第一线之敌；西及西南线求得逼退高洪口及盂县以北之线之敌。请你们根据具体情况再研究一下。

* 这是聂荣臻在延安发给晋察冀军区代政委程子华、副政委刘澜涛、参谋长唐延杰、副参谋长沙克的电报。

目前的时局与任务*（节录）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

我离开边区已经两年。在这两年之中，分局、军区及全党全军各级干部在党中央与毛主席正确领导之下，努力奋斗，坚持渡过了抗战的最后困难阶段，直到反攻胜利，在各方面工作上，都获得了大的成就。

由于日寇的迅速投降，反攻阶段为时很短。但在这短短的时期中，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多端，在许多问题上，同志们的看法尚不尽一致。现在我代表中央局[1]说明下列几个问题。

首先是关于时局的几个问题：

（一）苏联参战与日本迅速投降问题。苏联在战胜德国三个月后，即参加对日作战。一方面由于红军的强大，另一方面，日本虽然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数年来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已处于不利的形势，加上苏联的拦腰一击，使它无法继续作战，只好迅速投降。但由于日本的迅速投降，致使我们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各种准备工作都发生了措手不及的现象。

（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略）

（三）进攻大城市问题。日寇宣布投降后，我们向敌占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举行全面反攻，这种处置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朱总司令的命令，包括了军事进攻与政治进攻两方面的意义，以争取

* 这是聂荣臻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上的报告。

接受日军投降，夺取大城市。但由于蒋介石、何应钦[2]垄断受降，不许我们参加，以致日军不可能也不愿意向我投降，使我不能进占平津等大城市。我乃迅速转移兵力，夺取中小城市，壮大自己的力量，这种措置也是对的。国民党反动派依靠其合法地位，垄断中国人民八年来以无数牺牲代价所换来的抗战果实，我们的愤恨不平是完全对的，但绝不应因之而悲观失望。毛主席曾屡次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与曲折，正足以说明这类问题。

（四）国共谈判问题。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是目前全党最关心的与全世界最注意的问题。为什么毛主席要到重庆去，蒋介石在日寇投降后，曾一而再，再而三的电邀毛主席赴渝，共商团结建国大计，在此最紧张的时期，全中国和全世界都注目于国共两党，是和平？还是内战？蒋介石抓住了这个时机，虽然我在政治上有许多优势，但如果不去，我们在政治上就要处在被动地位。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和平，如果毛主席不去，就会脱离群众，去了，则我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去，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因此毛主席毅然决然而去，以去来争取我党在政治上的主动，去，本身就是一个斗争形式。蒋介石的手段是拖延时间，谈判了一个月，尚无结果，双方距离尚远，蒋介石在政治上并未对我让步。今后谈判还可能继续拖延下去。但我们一方面不应放弃谈判，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决不能以为毛主席去谈判了，便天下太平了。要使谈判有结果（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必须依靠我们的斗争和发展，有力的击破敌伪顽合流对我之阴谋，只有我们坚决的斗争，才能争取谈判的有利条件。

（五）美军登陆问题。美军已于九月三十日在大沽口登陆，其目的在帮助掩护运输国民党军队进到平津，以及将来进入东北。这个事件，说明蒋介石依靠外援，企图依靠美国来做斯科比[3]，又说明平津在我包围之下，有为我夺取可能，美国不惜暴露其帝国主义面目支持蒋介石，对抗我们。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东方斯科比的

危险，认识蒋介石在美国支援下，更进一步的积极准备内战。我们的方针，是在政治上批评美国这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在军事上避免与美军发生冲突，以求避免美、蒋的斯科比阴谋。但如美军向我进攻，则应迅速将经过情形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相信美国人民是要求和平的，他们不会赞成斯科比，他们会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与直接参加中国的内战。对于这一事件，新华社已有评论，应根据此作宣传。

以上五个问题，一方面说明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和我党都主张和平、民主、团结；另一方面则是日寇和全世界的反动派法西斯份子还在继续挑动反和平反民主的战争。特别在中国，目前存在着严重的内战危机，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积极准备反民主反和平的内战，要夺走中国人民抗战八年中用无数流血牺牲代价所取得的胜利果实，使中国继续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法西斯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的中国。

在目前时局中，我们应当怎样办？

抗战阶段已经过去，我们的任务，是为了和平民主团结而斗争。反和平反民主的势力正在积极向我们进攻，我们必须为和平民主而战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夺回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既得利益，我们必须为巩固我们的胜利而战斗。因此一切盲目的乐观心理，以为抗战已经胜利，我们已经拥有广大的解放区，天下从此便可太平的心理是不对的。我们目前正处在历史的最紧要关头，抗日战争结束了，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斗争正在开始，我们必须坚决地进入斗争中去，以不懈怠的精神继续斗争，来巩固与扩大我们的胜利。必须向全党全军及每一个要求和平民主团结的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原有的根据地，是我们的中心堡垒，必须固守之。但我们不仅要固守原有的解放区，还要继续扩大新解放区。我们要发展与巩固察哈尔（以张家口为中心）、热河两省，控制冀热辽全境，

争取我党在东北的优势，争取绥远之大部。这就是说，我们在华北要大大地向北发展，形成更大的解放区。依靠解放区的力量，配合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来实现中国的和平与民主。抗战时期与内战时期，我们长期处在敌人的包围中，现在如能实现这一战略方针，我们就能脱出全线包围，处在更加有利的地位。

要实现这个方针，必须积极行动，壮大自己的力量，采取攻势。反动派是会向我们进攻的，当我兵力尚未集结时，张家口的形势不是十分危险吗？傅作义、马占山[4]不是迫近了柴沟堡吗？抗战中他们远遁于五原、河套，现在他们又跑来"受降"了。虽然他们的爪牙已经被我斩断，但他们是决不会忘情于张家口的。我们收复了丰镇、集宁，他们又勾结日寇抢回去。他们发展土匪，到处骚扰，造成绥远民不聊生的现状。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打击挑起内战的祸首，因为他们先进攻我们，我们就必须打他们。毛主席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因为他们犯我，我就必须犯他。同时我们还要准备反动派在斯科比掩护下向我解放区进攻。我们要号召全边区的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仍在生产与战斗结合下，为和平民主而战斗。

现在谈几个具体问题：

（一）军事上的转变问题。在抗日战争中，我之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5]。今天我们在对付顽伪[6]进攻的自卫战争中，主力军必须进行运动战，配合地方群众性的游击战。但大家必须了解，进攻我们的敌人，有强弱之分，有嫡系非嫡系之分，我们已经八年没有同他们见过面，因此对之必须有新的认识，不要固守于过去的经验。大兵团的作战必须要求在军事上统一与集中，但同时又由于根据地交通不便，又要保持各部独立作战的机能。我们要积极的集中主力，但又要使根据地拥有强大的地方武装与强大的民兵，并更加提高一步，使顽伪不能进入我根据地一步。如果他们敢来侵扰我们，就会遭受

我地方军与民兵的打击，如同过去对付日本鬼子一样。在统一与集中的原则下，主力军必须整编，脱离游击队性质，进到我现有条件下的正规性，建立各种制度，严格军风纪。

在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问题上，过去曾长期的提出与进行教育，进行过拥政爱民运动，但如真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是不容易的。在我根据地中，老百姓成了主人翁，犯纪律的机会比较少些，但是一到新解放区，许多同志就把自己看成统治者，不论在城市与乡村，都障碍了我们工作的开展。军队的干部，必须了解党的主张与政策，因为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首先要由军队的行动来体现。军队中目前打骂现象与逃亡现象还很严重，固然与新战士增多，任务繁忙有关，但首先必须解决官兵关系问题，加强政治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大大地加强我军的战斗力。在这些问题上，今后要规定许多具体的要求。

（二） 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及其联系问题。我们由乡村来到了城市，这是一个转变。以张家口来说，从工业上看，已经不是个小城市了。我们入城后的工作，一般地说，还是做得好的，当然并不是一点缺点都没有。在农村里住惯了，对于城市中的一切，没有经验，不大习惯，需要一个时期才能转变。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又缺乏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因而使工作受到了许多损失，我们应很好的积累此种经验，不要把农村中的一套照旧搬过来。在农村中我们依靠农民，在城市中我们就要依靠工人，如果解决了工人问题，城市便会成为我们的根据地。

但在另一方面，象张家口这样的城市，我们只有一个。我们还没有更大的城市。要巩固我们的城市，还必须依靠农村的帮助。如果城市与农村脱离，则城市是孤立的。我们要把城市工作做好，使城市有利于乡村（例如减低工业品价格，供给农业工具，解决农民原料销售问题等），但决不能放松乡村的工作。在乡村中，我们有几十万党员，几千万农民，占我们党员与人民的绝大多数，我

们决不可忘记他们，必须加强乡村的工作。到城市里来的干部，在应当回到乡村去的时候，就要回去，不要忘记乡村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是从那里生长起来的。目前仍然是我们主要的根据地和主要的依靠。目前在乡村中还有许多严重问题，如粮价骤跌，谷贱伤农，反攻以来干线上勤务繁多（特别在新解放区），有些同志在乡村中的抓一把现象，都需要立即解决。今年各地应积极组织群众从事农业生产，并准备明年的大生产运动，不仅要运用我们的已有经验，而且要切实从组织生产中创造新的经验。我们要长期依靠根据地中的几千万农民，这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与一切困难的保证。

（三）发动群众问题。（略）

（四） 财政问题。解放区扩大了，部队增多了，开支也增大了。老百姓渴望着抗战胜利能使他们减轻负担，但农民的负担并未减轻。今后财政上必须更加统一，进一步走上轨道，要厉行节约，一方面要照顾战士的生活（现在战士生活还很苦），另一方面必须克服目前普遍存在的浪费现象。不要以为缴获的物品都是从敌人那里得来的，我们便可以随便浪费，要认识我们如果能节省一分钱，就可以减轻人民一分钱的负担。

目前我们正处在历史的最紧要关头。我党我军虽然已经经过了长期的考验，但历史还要继续考验我们。我们有了成绩，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是决不应当骄傲。我们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如我党我军及解放区之扩大，斗争经验之丰富等，但困难与艰苦斗争还继续存在。毛主席曾说过，革命本来就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我们不应当怕麻烦。中国是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国，中国革命是长期的复杂的，我们不要幻想，以为华北一下子便会完全为我们所有，我们应当不怕艰苦，不怕困难，发扬终身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精神，便不会产生侥幸懈怠的心理。

我们必须团结，只有团结才能胜利。尤其在困难的时期，只

要我们团结，任何困难都能克服。只看自己，不看别人，只看局部，不照顾全局的本位主义，各级领导机关与各部门均应检讨纠正。在目前困难的时局中，只有全党全军，团结一致，统一集中在党中央与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方针与战略方针指导下，大家为着全局而奋斗，则步调可以一致，任务也就更易于完成。

注　释

〔1〕中央局，指晋察冀中央局。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中共晋察冀分局改为晋察冀中央局，聂荣臻任书记，刘澜涛、罗瑞卿任副书记。

〔2〕何应钦，当时任同盟国中国陆军总司令。

〔3〕斯科比，英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任驻希腊盟军司令。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军在欧陆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流亡在伦敦的希腊反动政府进入希腊，指使并协助希腊反动政府向长期英勇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进攻，屠杀爱国人民。

〔4〕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马占山，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副司令。

〔5〕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第四四一页。

〔6〕顽伪，即指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军队及抗日战争时的伪军。

不计一城一地得失　力争战胜敌人*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

目前，内战的烽火由华中、陇海、山东、冀鲁豫、晋北烧到冀热辽，还要烧向东北，内战正向全国范围扩展着。我们党中央《解放日报》最近在"蒋军必败"的社论中已经分析了全国的战局。蒋介石在各个战线上，尤其在苏中和陇海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被歼灭的已经有十九个师（现在改称旅）。但是这些打击还不能够使内战停止下来。蒋介石不放弃战争，倾其兵力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投入战争。加上美帝国主义极力支援蒋介石打内战，以所谓"剩余物资"援助蒋介石，使内战规模更加扩大，时间更加延长。

大家最关心的是边区的战况，边区的战况究竟怎样呢？敌人进攻边区首先从冀热辽开始，目的是巩固北宁路，控制冀东占领承德。承德我们早就准备放弃，被敌人占领是意料中事。不过承德的放弃过早了些，使敌人对冀热辽的战役计划得提前实现。敌人本来准备先略取冀东，然后进窥承德，我们冀热辽的部队坚持和敌人斗争，延缓它这一计划的实现。可是敌人加于冀热辽的压力很大：热河十三军一个军，长城各隘口五十三军一个军，冀东九十二军主力九十四师一个师和六十二师。我们打击敌人不在于一城一镇的争夺。敌人占了我们热河、冀东的一些城镇，但它找不到我军的主力。相反，我们在建平、丰润等地方却不断地一营、

* 这是聂荣臻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上的报告。

一连的消灭了敌人。冀东有十多个县城，许多市镇，敌人占领了一个地方，驻上一个营或是一个团，它的兵力就大大分散了。就更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各个歼灭敌人。在这样的形势下，连《大公报》也不能不承认占领地方的确保和政策的推行是更困难的问题。

在西线，大同是一个坚固的设防城市，城内外堡垒就有一两千个，因此虽是孤城还能固守。大同战役以前，我军缺乏攻打坚固设防城市的经验。这次把城关的所有据点全部肃清，正准备攻城，傅作义出来了。我们本来很高兴他出来，因为在进攻大同的同时，我们也有打傅作义的一着，攻大同和打傅作义是同一个战役，我们早有准备。这次傅作义出援大同，动用了他的全部家当，首先以三个师和一个骑兵师，占领卓资山后，集结着看风势。当时我军迂回傅军背后。傅作义以三师兵力占卧虎山，攻集宁，当即与我军正面接触，发现我主力时，已不能后撤，去路已被我切断。我军陆续歼灭了傅军的十一师主力和十七师的一个团；敌三十一师作困兽之斗，向集宁城猛扑。此时，三十二师、一〇一师及三千骑兵又自绥远继续增援。由于我战场布置的不好，给养缺乏，担架、医药等准备较差，未能歼灭其一〇一师。因此，在和敌人三十一师猛烈巷战后，我乃主动放弃集宁。傅军占领集宁后，可能南下解救大同，亦可与东线蒋军的行动相策应。今天形势将进入如去年进入张家口还没有西征时期的局面，所以我们再不能屯兵于大同坚城之下，必须主动解大同之围，实行机动。

集宁战役是带有战略性质的。这个战役我们没有消灭傅作义主力，形成了目前的形势，必须在战略上重新部署，集结兵力，寻求机动，找机会打敌人，才能改变对我不利的形势。今天，主要战场移到平绥线上。估计敌人将采取东西合击。西面可能有三个师，东面可能两个多军至三个军。敌人动用兵力的多少，要看冀东及其他方面牵制敌人的情况。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察哈尔[1]，准备

在平绥线上打敌人。但是战争是长期的，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不作孤注一掷，这不是说轻易放弃一切城镇。比如张家口这个大城市是压在我们肩膀上的大包袱，并非绝对不能放弃，但决不能轻易放弃。关于布置战场，战委会[2]是个权力机关，张家口、平绥线上所有党政军民机关都要听它指挥。该疏散的一定要疏散，疏散了的不许自由跑回来，要很有秩序地布置战场，使人力财力使用，运输供给全不发生紊乱现象。而所有留在张家口的同志，都要很有秩序地在战争中继续工作。

目前敌人的进攻还是点和线的争夺。即使点和线被占领了，我们还有打击敌人的机会，而且敌人要控制这些点和线，还存在着兵力不足的困难。针对敌人的弱点，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战役指导上以速决战、歼灭战为原则；自然对敌人占据的点，也必须有进行攻坚战的实际准备。我们军队的组织和训练都要适合于今天的作战要求。边区的地方武装数量不算少，但还没有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一方面由于反攻开始就大量抽调补充野战军，新的没有抓紧训练，再则，和平停战时期的进攻、出击思想遭受束缚，形成习惯于被动挨打。今天要对敌人占领的点和线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就要加强地方武装特别是挺进游击支队。如果说大兵团是痛击敌人的大锤，地方武装就是深入敌后的利锥，两者的积极配合就能够争取在一切交通线上的主动地位。

从过去抗日战争到今天粉碎蒋介石进攻的自卫战争，都是人民战争，本质上又都是农民战争。为了反对侵略、争取独立，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必须依靠农民来进行战争，因此要坚决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民得到土地，他们有更高的热情参加战争，我们的根扎得更牢固，粉碎蒋介石进攻的胜利就更有保证。我们过去说的一切有利条件都还没有变，土地改革真正做好了，这些有利条件便会迅速发展起来。

我们绝不要悲观，也不可骄傲。有些同志满腔热望打下大同，大同没有拿下就有些失望。但必须认识形势发展的曲折是很多的，就是解放了大同也还可能撤出。这次没打好，得了经验教训，今后就会打好。对于有些因为目前形势引起波动，尤其没有经历过内战和抗战的同志，告诉他应该把全国的情况看清楚，坚定下来。《解放日报》的社论已经指出“蒋军必败”，他的困难是没法克服的，他唯一倚靠只是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但是，美帝国主义要准备未来的战争，要支持蒋介石大规模的内战，又要对付国内的民主势力，负担也不轻。

西线战役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今后当检讨其经验教训。还要估计到我们的困难也可能增大，要准备克服困难，战胜敌人，骄傲是很害事的。但西线战役中，我军全体将士都非常英勇，不怕一切牺牲，克服一切困难，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战例与模范的英雄不断涌现，这种新英雄主义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大发扬。同时前方与后方的步调一致，后方各界对前线的热烈支援，地方民兵与部队的配合参战，都是值得赞扬的，今后必须更要发挥这种精神。

现在战争进一步打开了，要准备长期打下去。希望全体同志有战胜困难的精神，思想步调一致，学习苏中[3]和冀鲁豫[4]的榜样，不断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直到最后打败敌人！

注　　释

〔1〕察哈尔，当时是一个省，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一九四九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一九五二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省、山西省。

〔2〕战委会，即战争动员委员会。

〔3〕苏中榜样，是指苏中战役，亦称苏中七战七捷。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五个整编师约十二万人，进攻苏中解放区。华中野战军十九个团三万余人，在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等领导下，奋勇还击。从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连续作战七次，均获胜利。共歼敌五万六千余人，创造了

解放战争首次大量歼敌记录。

〔4〕冀鲁豫榜样，是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下，于一九四六年八月至九月所进行的陇海路战役和定陶战役，歼敌三万三千余人，沉重地打击了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之国民党军。

关于举行正太战役的报告*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据悉：平汉及北宁线之敌，一二一师、九十五旅及二十二师，将向大清河北之永清一带进攻，石家庄之敌也有向北佯动，以牵制我回返之说。

二、 我即举行正太战役[1]，目的在歼灭正太线及石门[2]外围之敌，并彻底破坏铁路。战役拟分两期完成：第一期重点于东段，以三个纵队歼石门外围之敌；第二期以主力向西大举破击。在第一期完成后，如平汉北段之敌南援，可打时则先歼援敌，然后向西破击。

三、预计九日前打响，全战役约一月左右完成。

有何指示请告。

---

* 这是聂荣臻为发起正太战役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在报告上署名的还有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肖克、副政治委员罗瑞卿、参谋长赵尔陆。

注　释

〔1〕正太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军区部队，对据守在石家庄外围和正太铁路东段的国民党军发起的进攻战役。这次战役，聂荣臻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大踏步进退，完全主动作战的指示精神，抓住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与保定“绥靖公署”指挥不统一的弱点，集中三个野战纵队和部分地方武装，从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开始，到五月四日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五千人；解放县城七座和井陉、阳泉、黄丹沟等矿区，控制获鹿至榆次间铁路一百八十余公里，孤立了国民党军战略要点石家庄，对扭转华北战局起了重要作用。战役的胜利，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赞扬。

〔2〕石门，即石家庄。

总结经验　继续前进*

（一九四七年九月三十日）

这个会是中央局的扩大会议，也是土地会议的预备会。中央局常委检讨与总结了过去的工作，特别是最近两年的工作，并要我代表常委在这个会议上作一总结报告，把我们晋察冀党内存在的历史争论问题作一个结束，好集中全力来解决当前问题，平分土地与整党两个问题。结束历史争论，集中全力解决当前问题，这就是我们这次土地会议的方针。

中央指示我们：今后几个月是全国局势转变的关键。同时我们这个区域处在华北、东北的枢纽地带，所处的地位是很重要的，负担的任务是很重大的。但是我们各种工作，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落在了客观形势的后面。中心问题是一个发动群众的问题，也就是彻底地完成土地改革的问题。因为只有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把群众真正的发动起来，才能支援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取得战争的胜利。

日本刚投降时，中央及朱总司令给我们的任务，要我们向城市进军，我们进了张家口、承德这两个比较大的城市，同时我们取得了许多中小城市。我们曾经向平、津、石家庄、保定等城市进军，但是，由于蒋介石和日伪合流，阻止我们受降，我们没有取得那些城市。在这时候，中央给了我们一个战略任务，即进入

* 这是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土地会议预备会议上的报告（节录）。

张家口，控制张家口，掌握和巩固张家口，以这个地方作为枢纽，向察北、热北、内蒙、绥远[1]的北线发展，打通西北、东北。我们扫清了张家口外围，肃清了察哈尔及热河[2]的敌伪，并进行了绥包战役[3]。这样使得察哈尔、热河两省全部在我们手里，并配合晋绥取得了绥东的全部。同时在这中间我们向东北进军，派遣了大批干部进入东北。这些都是在中央和军委的战略意图之下进行的。在停战协议签订以后，政协会议的前后，我们曾经控制了和巩固了已得的战略要点，曾经打破了蒋、傅、阎[4]抢夺这种战略要点的进攻。我们坚决的提出了“寸土勿失，寸土必争”的方针。在停战协定后，所谓新的和平时期，全国局势仍然是很动荡的。这时我们的领导机关过多的相信了和平，就是所谓和平幻想问题。因为这个缘故，使得我们对于战争的准备极不充分。军队进行了复员，这是中央有指示的[5]。当时的情况，我们带兵的司令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预算极为庞大，所以精简是需要的。但是也有少数的不该复员的复员了。我们强调复员在部队中间起了一种副作用，增加了和平的幻想，因此有要回家的也准许了复员回家。在兵工生产方面，我们也放松了。在军区来说，过去分散经营，张家口也没有什么兵工厂，接收了敌人的一些，也没有很好的经营。军队与干部的训练也很差。日本投降以后，由游击战争转变为运动战，这一个转变极其迟缓。把游击队变为正规军就要正规化一些，要消灭游击习气，不合乎正规军大规模运动战的习气。这些习气，长期存在着而没有很快的转变过来。在编制上也好，在训练上也好，都很不紧张，不合乎大规模运动战的需要。因此和平一破坏，新的内战一爆发，我们仓卒应战，致使大同、集宁、张家口这一些战役没有打好。今天来看，当时正是敌人在全国范围内向我作战略进攻，张家口的失守是必然的。但是，如果我们准备的充分，在保卫张家口以前仗打得好，或在保卫张家口之后打得好，张家口有可能失得晚一些，而且可以在那里歼灭更多的敌人。

另外就是城市和乡村问题。我们在张家口，进行了很多的工作：工人工作，居民工作，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进行了工作，这是应该的。而且当时我们也指出了，要使张家口城市巩固，必须依靠乡村，不应放松乡村的工作。我们是在乡村生长的，乡村是我们的母亲。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却放松了乡村工作，我们对于农村工作是缺乏领导的。我们没有真正了解与掌握，决定一切的还是农村与农民，一切要从农民与农村出发，这一点可以作为我们的历史教训。

张家口时期，我就讲这些问题。所谓和平幻想问题，乡村与城市的问题，这里边都有一些错误和缺点。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对全国形势的估计有错误，过多的相信了和平，就在于不了解当时群众对于土地的要求，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对于这个问题以下我还要专门讲），就在于我们领导机关有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这些就是我们在张家口时期所发生的错误的原因。

撤离张家口以后，中央局曾召集了涞源会议，今年四月又召集了安国会议，这些会议都作出了决定，对过去有检讨，并提出了对今后工作的要求，今天来看，一般是正确的。但是为了更进一步总结过去的经验，有把下面几个问题再加一番说明的必要。

第一、军事工作方面。部队在大同、集宁、张家口几次战役中，受了很大消耗，一时补充不起来。同时军事指导上犯了一些错误，执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的方针不够大胆。那时有一种保守性，“怕失地盘”。譬如从张家口撤退下来，不愿放弃察南，还想决战。没有估计一下，是不是有利于在那里决战，如果不利，就坚决走，但舍不得，要打又不打，又不能打，又不走，假设我们明确地确定打掩护战，少数部队掩护主力转移，那不就行了。这样的例子别的还有。在这样的思想下，主动性不足，集中主力主动进攻敌人，大量歼灭敌人，这种指导思想不明确，因而运动战的思想就不能很好贯彻。这使得我们的自卫战争，在这

一年中胜利是很不足的。安国会议上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检讨，会议以后，我们有进步。我们进行了南线战役[6]，由于干部战士英勇作战，取得了一定的战绩。许多干部战士的英勇牺牲是有代价的。自卫战争以来，我们已经消灭了敌人十九万九千多人（其中包括了冀热辽歼敌四、五万人在内），缴得了很多的武器（数目记不清了，曾公布过），切断了同蒲、正太、平汉等铁路。晋察冀本身以及同太行，同晋绥，同整个西北，打成了一片。这些军事上的胜利，使我整个地区形势起了变化，这些变化对我们都有利。自然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满足了，不是的！我们还有缺点。就是说，我们消灭了好多敌人，但是不痛快，就是没有整个建制的、有决定性的歼灭敌人。比起晋冀鲁豫等友邻区来，我们还是落后的。

安国会议后，由于各个地区同志努力的结果，相当充实了野战军，把野战军整个建制建立起来了。过去我们三个纵队各缺一个旅[7]，一个旅中间缺个把团，现在是整个建制都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已经决定了野战军和军区分开，建立野战军机关[8]，使它今后更加正规地进行作战。把地方军过去的分散环境下平均分配的游击队都集中起来，集中在独立团或独立旅，使力量更加集中。这样改变组织形式，就是为的适应当前及今后的整个战争形势的需要。现在不管哪方面，冀中也好，冀晋也好，这样改变以后，就可以扩大地方军打歼灭战，并且组织新的独立旅，作为发展新的纵队的基础。我们需要很快成立这样新的纵队。我们在整个军委战略方针和战略意图下面，需要这样做。

军工生产方面：张家口撤退以后，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这许多困难我们都已逐渐克服。从七月以来，我们已经开始按照生产计划正常的进行生产。过去我们在技术上有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解决了。如果野战军要炮弹、要炸药我们也都可以供给了。根据我们现在的条件，七八月到九月底，每月可以生产一万发八二迫击炮炮弹，炸药四、五万斤，手榴弹七万到十万颗。我

们生产力还可以提高。新的工厂组织好了，炮弹——仅迫击炮弹就可以增加三倍，如过去一万发，现在就可以生产三万发。我们把各区军工生产都集中起来，不仅生产提高，而且成本减低。所以军工生产这个问题，我们是得到了适当的解决。

在兵役动员方面：各地同志做了很大努力，使得野战军得到很多补充，过去野战军在补充上有很多的困难，经常得不到满员。安国会议上中央局决定分两期动员，青纱帐期间为一期，从冬季到春耕一期。现在头一期正在集中，希望同志们检查一下，看集中了多少，还缺多少，按计划完成，这期完不成，下期还要补。

在后勤方面：过去我们没有这样的后勤组织，特别从张家口撤退以后，部队埋怨地方，地方埋怨部队，非常混乱，老百姓出了很多力，但是军队还经常感觉担架运输不够。安国会议后我们把后勤司令部组织起来了，在几个月作战中，进行了很多艰苦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作战多在冀中，在这方面来说，冀中的负担是很大的。他们在石家庄、保定外围支援动员工作，做得很好，并且取得了很多经验。

在军事学校方面：军政干部学校，纵队的随营学校，地方军区学校，都培养了一些干部。作教育工作的同志很努力，克服了很多困难。过去调来训练的干部，不管是部队来的也好，地方来的也好，数量质量都不够理想，思想上没有很好的解决问题。不是要调好多就一下调好多，常常是今天来两个，明天来两个，经常是流水帐，长流水，天天喊大批训练干部，但是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当然也训练了一些，但是很不够，离部队的需要很远。

在政治工作方面：张家口撤退以后，军队与地方关系不好，有各种不同的因素。一种是军阀主义，枪杆子在手，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老子天下第一”，过去在张家口的时候，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这可说是一种典型的表现。再一种是盲目的山头主义，这种山头主义随便哪里都有。

还有战士对地方不满，这种不满有的并不是山头主义，也不是军阀主义。这些战士的确是乡村的基本群众，是贫雇农，他们不满意区村干部，就是不满意他们不公平，不论是在扩兵问题上，负担问题上，战勤问题上，特别是平时区村干部对他们不好，脱离他们。对土地改革，部队中曾经有这样的反映，他们说我们赞成拥护土地改革，但是我们不相信共产党这些干部能够执行这个政策。所以在那时的军民关系中各个动机不同。政治工作会议[9]，集中火力来反对军队中的地主富农思想，同时反对宗派主义、军阀主义，这个方针是很正确的，应该这样做。有些同志反映了战士对区村干部的不满意，这是真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军队有错误，你们地方也有错误，这样半斤八两，就抵消了，这样一种说法，显然不对。我们承认地方有缺点，但中心是对准部队中地主富农思想开火。那时政工会议不可能在解决部队的问题时又解决地方的问题。当然，如果那时候各地方军区传达政工会议的时候，能够主动的起来反对地方山头，那末事情也许会好一些，但是我想如果对于党内的严重不纯的情况，没有象现在这样的认识，恐怕还会是形式主义的，不会深刻的。总之，那次政工会议的方针、立场、方法都是对的，但是有些同志不大服，思想上没有完全解决问题。这次大会要真正消灭宗派主义，把我们党整好，这个问题才可以得到完全解决。

我上面讲过，军事上作战和建设的问题，还有很多缺点，我们并不是很满意的，我们同其他友邻地区比起来还是落后的。因此在今天军事建设方面，尤其是在作战方面，我们要更高度地集中力量歼灭敌人。我们要求在作战指挥上更高度地灵活和机动，在战术上、技术上更加提高。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在战争过程中，军队可以打胜仗，有时也难免遭到挫折，就是说，百战百胜是相对的，并不是说打一百次仗一百次都胜利。我们的部队，只要是为了决心消灭敌人而受到挫折、受到损失，我们就不要责备。苏

联战斗条例上规定：凡是为了消灭敌人而受到损失不受任何的责备。不应该责备，只有鼓励“打得好”！

当然作为战术上的检讨是需要的。反过来说，凡是怕消灭敌人，不敢消灭敌人，只知保存自己的，就应受到纪律的制裁。我要求全党对今天我们军队作战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是撑腰的，鼓励的，而不是泄气的。凡是一次仗没有打好，任务没有很好地完成，不管什么情况，与军队的动机怎样，对战术上技术上有意见提出来检讨很好，我们欢迎。但是埋怨、发牢骚，说什么“劳民伤财”一类泄气话，实在没有好处。我们部队同志都愿意仗打好，都不愿意落后，都有勇气有决心消灭敌人。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说泄气的话，我们应该鼓励。比如：在最近大清河方面的作战，伤亡大一点，消灭了一些敌人，但是没有彻底解决战斗，就有人发起牢骚来，发牢骚差不多成了某些人的习惯，这个习惯是很不好的。我们应该这样打气：“不要紧，有伤亡再去动员补充，准备继续作战”。我想每个指挥员也好，战士也好，都是需要这样鼓励的。

注　释

〔1〕绥远，省名，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2〕热河，省名，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3〕绥包战役，即“绥远战役”，亦称“平绥路战役”。一九四五年九月，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在抢占归绥、武川、丰镇、集宁、兴和等城后，企图继续沿平绥铁路东进，夺占张家口。为打击进犯之敌，聂荣臻和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统一指挥两区主力十四个旅五万三千人，于十月十八日发起反击作战，至十二月四日共歼傅作义部一万二千余人，收复了丰镇、集宁、卓资山、陶林、凉城、武川等绥东、绥南广大地区，并一度包围了包头、归绥两城。

〔4〕蒋、傅、阎，即蒋介石、傅作义、阎锡山。

〔5〕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晋察冀中央局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

对策的指示》中关于精简整编的规定原则，作出了精简整编的决定。全军区野战军精简约十万人。其中五万人转为地方军，五万余人复员。

〔6〕南线战役，指正太战役。

〔7〕过去三个纵队各缺一个旅，指一九四六年七月，晋察冀野战军的三个纵队，即第二、三、四纵队各只编两个旅。到十二月各纵队编成三个旅。

〔8〕晋察冀军区奉命组编野战军，第一次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组成两个野战军，中间几经组编、撤销、合并。文中指建立野战军机关，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下旬建立晋察冀军区野战军领导机构，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杨成武分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耿飚任参谋长，潘自力任政治部主任。

〔9〕政治工作会议，指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召开的晋察冀军区政治工作会议，由聂荣臻主持。会议提出当前政治工作的方针是：加强军内外的团结，改进军民关系和军队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在会议的报告和结论中指出，军民、军地关系解决不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胜利。要教育全军站稳阶级立场，坚决拥护土地改革，认真作好拥政爱民工作。为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军队中团以上各级建立党的委员会，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清风店战役的三份电报*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二十日）

（一）
十月十七日关于敌第三军由石家庄北进的通报

石门敌七师并六十六团由罗历戎率领于昨（十六日）晚渡河北进，当晚停止于正定东北之蒲城一带。今（十七日）续向北进，上午在拐角铺一带休息。

---

* 清风店战役，是奉聂荣臻之命，由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杨成武、参谋长耿飚指挥所部及在部分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于河北省定县清风店地区进行的运动战战役。此役，为调动敌打运动战，晋察冀野战军采取“攻城打援”的方针，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日开始围攻徐水城。十月十五日，石家庄之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率第七师和第十六军一个团北上增援。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当即南下求歼罗历戎部，十月二十至二十二日，将罗历戎部一万三千余人全部歼灭，俘虏罗历戎。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致电聂荣臻等称赞“清风店大歼灭战胜利，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

（二）
十月十七日令野战军主力向南急进歼敌的指示

南下打敌如时间仓促，可先派一个团急进至望都以南阻击，主力亦须急进，勿失良机。已令冀晋、冀中用一切努力滞阻该敌。

（三）
十月二十日为配合清风店作战给冀晋军区的指示

三军罗历戎率七师及六十六团由石家庄北窜，昨（十九日）晚宿大小瓦房、南北各营地区（望都南）。我野战军主力于今拂晓开始围歼该敌，争取速决。保北我主力一部前昨两日已在徐水东北击退敌两次进攻，为防止万一不能速决，估计保北敌主力及石家庄敌三十二师可能来援。冀晋独一、二两旅应即以最多不超过三天行程进抵平山城地区，如三十二师北出，则在新乐一线阻滞该敌。如敌不出则相机攻占石家庄机场及获鹿城，钳制该敌，准备配合主力下一战役行动。你们行程即报我们。

石家庄战役的两份电报*

（一九四七年十月）

（一）
十月二十二日关于乘胜夺取石家庄的请示报告

敌第三军军部直属队，率第七师全部及第二十二师之第六十六团（共四个团及一个军部和一个师部），在定县、望都之间被我包围，经两昼夜激战，已于今晨被我全部歼灭（内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已被活捉）。现石门仅有三个正规团及一部杂牌军，我拟乘胜夺取石门。军委是否批准此方针，请即复。不管怎样，提议太行准许以有力部队抓住元氏敌人，以减弱石门防御力量。

我们拟乘大会空隙到前线一行，并与野战军首长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

---

* 这是聂荣臻写给中央军委、中央工作委员会的电报。在电报上署名的还有肖克、刘澜涛、罗瑞卿。

（二）
十一月一日为配合石家庄战役给各军区的指示

一、我野战军决于六日开始发动攻石门战役[1]，如保定北敌人南援，则先歼援敌，不南援，则力争攻下石门。

二、即着周彪[2]赶赴前方统一指挥独七、八两旅、十一分区与太行部队。周彪指挥所到达后独八旅即归建，周兵团及唐兵团[3]直接听野司[4]指挥。

三、冀中应令十分区部队及独九旅准备在大清河南北地区阻敌，并破坏平汉铁路，配合攻石门行动。高阳、任邱等地粮食预行疏散，防敌窜扰。

四、察哈尔独四旅及七分区部队应向涿县北至门头沟、房山、良乡之线连续主动出击，破坏铁路，重点指向门头沟威胁北平。五分区及冀中九分区部队对保定北、涿县南组织不断地破路。

五、保定南各县民兵于战役开始后，应随时准备阻滞敌人增援石门的作战。

注 释

〔1〕石门战役，即石家庄战役。是晋察冀野战军和地方武装一部，对国民党军坚固设防重镇石家庄进行的攻坚战，此役歼国民党军二万四千余人。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致电聂荣臻祝贺晋察冀军区部队攻克石家庄大捷。同日朱德致电聂荣臻指出："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特嘉奖全军"。

〔2〕周彪，当时任冀中军区副司令员。

〔3〕唐兵团，指冀晋军区司令员唐延杰所率领的独立第一、第二旅。

〔4〕野司，即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

在中共晋察冀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四日）

这次会议，团以上的干部都到了。一方面传达土地会议的精神，一方面要做两次战役的总结。刚才彭真同志[1]的讲话，已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指示。彭真同志说，我们边区要来一个大翻身。过去农民是没有彻底翻身的，他们自己说：只翻了一半。从各方面看，边区都需要大翻一下。怎么翻？就是要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实行平分土地。就全国说，就是要打倒蒋介石的统治。我们边区过去在军事上，也没有翻身，经过清风店、石家庄两大胜利，翻了一下，今后更好翻了。农民现在也准备彻底翻身。边区的土地会议开过了，这个会开得很好，大家说是翻身大会。在财政经济上，我们也要翻身，但是决定的东西还是战争和土改。群众中有一条口号："前面打蒋军，后面刨蒋根！"这个口号很生动，很正确。蒋介石的统治建筑在什么基础上？就是封建地主阶级。所以要打倒蒋介石，必须彻底消灭封建刨蒋根。蒋介石依靠什么统治？武装，所以要打倒蒋介石的统治，必须消灭他的武装力量。所以我们的斗争形式就必然以武装斗争为主。土改和战争是分不开的，也可以说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如果这两件工作我们做好了，蒋介石就会完蛋！我们集中了一切力量，决心要做好这两件工作，也就是这个缘故。就从军事观点来说，群众不真正发动起来，仗也打不好的，部队就不能满员，也难以巩固。为什么呢？群众得不

到好处，就不会自觉参军，参军的也想跑。如果群众都发动了，他们得到了好处，知道拿起枪打仗是为了自己，这样部队自然就满员，就巩固了。现在我们准备用最大的力量搞好土改，然后再扩兵，那时部队满员就不成问题。这个全国革命新高潮中边区土地改革的新形势，一定要到来的！

关于作战和部队本身工作问题：

第一、我们要全军一致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右倾情绪。这次保北作战[2]，不一定能打出名堂来，事前我们就有精神准备，不怕打不出名堂。我们啃徐水、啃涞水，啃不下来怎么办？走就是了，又有什么！但是正因为保北的苦战，我们在清风店打出了名堂。有些同志对此认识不足，精神准备不足。当在保北打不出名堂时就讲怪话，影响上级的决心。大清河北没打好[3]，本来也没有什么，但就有人说："肉没有吃上，反把门牙嗑了！"又说"劳民伤财"等等泄气话，非常不好。我们出击大清河北为了什么？为了消灭敌人！打得不好，可以检讨，但是乱说怪话是不许可的。不要说门牙没有嗑掉，就是嗑掉，镶个金牙，更漂亮。损失一千，再补一万，有什么可以泄气的。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气魄，这样的决心。大家只应当打气、撑腰，绝不应讲怪话、泄气。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敌人。为了消灭敌人，就是受些损失，也不应该批评。相反，如果没有消灭敌人的决心，就是保存了力量也要受处分，因为军队是打仗的。

在保北我们没有打出名堂，敌人也没有打出名堂。敌人也想"翻一下身"，罗历戎就从石家庄出来了，造成了我们清风店歼灭战的机会和条件。军事上就是要"动"，用"动"造成变化，再从变化中找机会歼灭敌人。我们不要怕走路，怕泡蘑菇，要高度地运动、捕捉战机，积极扩大战果。可是，在清风店这样好的战场，打这样大的胜仗，竟还有个别同志没有信心，不敢于大胆消灭敌人，不敢于胜利。内战时代，在那样条件下我们还成师成军的消

灭敌人，今天为什么反而不行？反而害怕？对这种人，可以送他一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

打石家庄我们慎重考虑了好久。我们说过，消灭了第三军主力几个团以后，就可以打。那么经过清风店歼灭战，为什么不可以打呢？我们也知道石家庄是设防的城市，可是设防再坚固，也要兵来守，兵不多是不行的，再说即使打不下来，也没有什么危险，四周都是解放区。何况不论从兵力上、士气上看，打下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决心打石家庄是对的。

打石家庄，当时讨论有两个打法：一个是围点打援，一个是全力坚决攻下它。围点打援是好办法，我们一方面把石家庄打下来，同时又 能歼灭它一部分援兵，岂不妙哉！所以我们就这样布置了兵力。但究竟怎么打，还要看情况的变化。援兵来了，我们就集中主力打援，打了援回头再打石家庄。援兵不来，就一直打下去。我们既然研究了各种因素、条件，认为可以打下来，就应当有信心，就不是盲动和冒险。我们希望打运动战，但是情况变化了，条件具备了，我们就要攻坚，就要打石家庄，没有这个决心是不对的。少数干部信心不足，顾虑太多，就是不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打，失去了战机，这就不是客观条件不让我们军事上翻身，而是我们自己不愿意翻身，不敢于胜利。

有一种所谓“事后的马克思主义”，打之前他说对，他赞成，可是要打不好，他又说不该打。昨天我们把元氏[4]打下来了，要还打不下来，这些人又会想：当初为什么不把元氏敌人放回石家庄呢？放回去一下消灭了，不是省得今天再麻烦？这种想法是不合实际的。当我们打石家庄的时候，总是想，敌人愈少愈好，不让元氏敌人回到石家庄是对的，所以我们一决定打石家庄，就派了部队把元氏敌人监视起来，分割起来，不让它收缩到石家庄。当时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打下石家庄。减少打石家庄的困难，打下了石家庄再说别的。现在我们打开了元氏，就是打不开，也不能否

认当时决心的正确。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考虑一件事情的对与不对，不然是扯不清的。过去很长时期，我们部队中存在着浓厚的自由主义，解决不了问题，又伤害团结。当然这不是不叫同志们发表意见，有组织的建设性的意见都可以谈，只是不许无组织的乱说，尤其不加思索不加考虑的乱说，对我们是有害的。刚才彭真同志也讲了民主与集中的问题，部队同样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象杨司令员[5]做的报告，他自己就说了，大家可以提出意见，准备修改，他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就是“命令”，大家就应坚决执行，不容许各搞各的。这也是我们共产党军队的特点。

第二、关于机动问题。我们团以上干部，要了解上级意图，考虑如何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我们一方面强调坚决执行命令，另一方面，我们也提倡最大的机动，这并不矛盾。正确的机动，正是为了达到上级的意图，正表示了我们的干部为革命为人民负责的精神。举一个敌人的例子：蒋军第三军十九团团长柯民生，正定战役我们就把他俘虏了，放回了他，这次清风店战役他再一次被俘。我对他说：你真吃得开，被俘了一次，回去还当了团长！可是这次又被俘了。他声明说：“我是按命令执行”。是的，他们的军官可以那样，也只能那样“执行命令”。他当团长，不为别的，只为了挣钱，只要按月发薪水，不管打多大败仗，死多少兵，他是不管的，他只是“按命令执行”。大家想想，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团长能够这样吗？不能。我们打仗，既是对人民、对士兵负责的，就要敢于负责。如果上级命令和当时新的情况不合，是可以改变打法的，我们决不能象柯民生那样，打成“光杆司令”，还说“按命令执行”。情况变了，还机械执行命令，实际上是违背了命令。对这一点，我们每个干部都必须认识清楚，都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心。

第三、团结及其他问题。一般说，我们是团结的，但还存在

很多毛病。我们反对过部队和地方之间的山头主义，也反对过部队内部本位主义发展成的山头主义，这种山头主义是很有害的。彭真同志在边区土地会议上，也严厉批评了山头主义，主要是地方的山头主义和有些地方党组织对人民的山头主义，指出这种山头主义对我们党是最大的危险。但没有着重批评部队的山头主义。并不是说部队中已经没有了山头主义，这种山头主义一定要经常检查，经常反对，否则就不能彻底消灭。这是关系我们全党全军团结的问题，也是我们有没有力量战胜蒋介石的问题。如果我们军队内部不团结，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就不能打胜仗，就什么事也搞不成。我们要向石家庄的铁路工人学习，当我们提出“大家当家”的时候，他们马上赞成，并且进一步提出：反对“各当各的家”。为什么？产业工人整体思想是最强的，也最能团结。我们就是要这种无产阶级的思想，团结的思想。任何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和这种思想违背的。

过去我们提出照顾山头，是为了消灭山头，不是为了培养山头，发展山头。现在已到彻底消灭山头的时候了。象干部问题，我们使用干部、看干部的标准，就是德、才、资，不管你是哪个方面军的，哪个山头上来的，不够这三条都不行。“德”，就是党性；“才”，是才干；“资”，就是参加革命的历史。既无党性又无才干的人，还讲什么“资”，我们干部单凭资格吃饭是不行的。现在就有这样的干部，长期住在招待所，分配不了工作，有的同志不了解情况，竟然说：“军区干部政策有问题，为什么不分配他们工作呢？”回答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请说这种话的同志去分配他们工作，看能不能分配好。如果他服从你的分配，并且能好好工作，那就算你的意见正确，我们也“阿弥陀佛”。军区为什么不分配他们工作？招待所的小米难道怕没有人吃吗？不是的。他们就是调皮，就是不好好工作，分配到哪里，哪里送回来，并不是组织上不分配他们工作。还有一种人说：“为什么不提拔我！”

对这种人，可以用第二个办法：大家投票，看他该做什么！如果你们团以上干部都不赞成他，他应当不再埋怨上级不提拔。组织上决不会喜欢那个干部，又讨厌那个干部的。说这些话的同志，实际上还有山头主义思想。

我曾说过，有时候我们不象一个政治集团。过去搞生产，建家务，倒象成了经济集团。最近总部刚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打开了石家庄，缴获了很多东西，是的，东西交公了。但也有不同情形：有的交得快，有的交得慢，有的自己还留了 一些。这就看出我们说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不是兑现了。现在我们只能说，慢交一点也可以，但一定要交，不交是不对的。执行缴获归公的关键，在我们团以上干部。只要你们思想搞通，一定可以做好。又象武器弹药问题，我们缴获的枪不少，可是交上来的，数量既不够，质量也不强。过去同志们喊：那里有多少纵队了，我们为什么不增加？他们就不想，没有武器怎么装备呢？过去我们许多部队缴到东西就是自己的，建立了许多小家务，今天就要改变这种情况，把小公家变成大公家。从抗战到现在，地下锈烂的武器不知有多少！你也埋，我也埋，记都记不清了，就是不上交，让几千年以后开矿去，说起来真叫人可惜。现在我们有了些军工生产，然而只是向外拿，没有往里进的，虽然我们不断向下面要。为什么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家务？为什么要有统一的编制，统一的军火库房？各兵团自己搞为什么不行？理由是在于今天战斗的规模比过去大多了，我们军队建设比过去更正规了。在各个兵团有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口径的武器弹药，必须通盘调剂使用，必须统一处理掌握。所以，各部队的武器弹药要很好清查一下，多的交上来，或调剂给别的部队，用不着的当“浮财”，分给民兵也比埋着好。总之一定要按编制，该多少是多少，多的一概交出来，将来作战不够再向后勤要，要不着，就暂时不打撤下来，但绝不许打埋伏！过去长期游击战争环境养成这

种坏作风，对我们力量的发展有很大妨碍，今天无论如何是要改变了。又比如石家庄敌人有一个完整的医院，本来入城以后，大家可以享受的。可是你一拿我一拿，对他没有用处的东西也拿，结果好些器材、药品拿散了，大家就享受不成。而我们自己今天还没有力量建立一个完备的医院，这不是很大的损失吗？所以希望你们很好注意这个问题，大家当家！大家享受！

扩编纵队的问题，中央已经同意我们扩编三个纵队：冀晋和察哈尔的独立旅，合成一个，属北岳军区，仍保持其山地作战的特点；冀中编一个；野司增加一个。这样就把分散的小拳头握成几个大拳头。分属北岳、冀中的纵队，必要时也都集中使用。但还不够，我们的力量还要不断生长。这也要大家负责，你们不断打胜仗，缴到的装备大量上交，加上土改搞好，兵源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可以扩编和装备新的纵队，我们的力量就会大大增强。

干部培养问题，从要求上讲，很不够。原因何在？本位主义，不愿拿出干部来。红军有史以来干部从未充裕过，不随时培养，就不能应付需要。所以我们对各纵队的随营学校，不限编制，愈多愈好。有些部队选送学员，总不愿送好干部，不愿送英雄模范，说他们“离不了”，不知道正是他们更需要教育培养，使他们提高一步，成为坚强的骨干。干部政策掌握的对与不对，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我们是不是培养好干部，就是看我们是不是选送好干部去上学。学校不是收容所，一定要送好的，不能送思想坏、毛病多的。有些干部不好，就是我们培养时找错了对象。

关于军工生产。我们要大大发展，能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严格要求节省弹药。这象是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大大发展军工生产，是因为大规模战斗的需要，然而今天基本上我们还是农村环境，生产技术和原料都有困难，所以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特别是子弹，主要还是要取之于敌人，取之于前线。我们的军工生产主要是造炮弹。一年来我们的

消耗很大，还帮助一些给兄弟地区，这是完全应当的。今后我们如果不节省，就会感到困难。据东北和我们自己作战的经验证明：我们不能也不应当象苏德战争那样，依靠炮兵解决好大问题。炮兵的任务只在于掩护步兵前进，扫除前进的障碍，进而掩护步兵突击。现在敌人的堡垒工事都很低，目标不明显，我们的炮如果乱打，或过多的打，不但浪费弹药，也不会有什么效力。十年内战时，有一次激战，某兵团子弹浪费很大，刘伯承同志当时对他们说：“你们打得很热闹，很好听，象音乐一样。但是我听了，心痛得很！”的确是使人心痛的。这次打石家庄炸药丢了很多，直到战斗结束后好几天，街上还有，就不知道我们今天制造炸药原料上的困难，硬是要浪费，这不叫人“心痛”吗？搞爆炸，一定要经过细心研究，炸什么样的工事，用一定的量，过多了是浪费，过少炸不开重炸也是浪费。我们还要打下去，弹药一定要注意节省。

部队立功运动开展以后的团结问题，非常重要。如捉师长，缴枪炮，你的我的，经常扯这种皮。我们团以上干部应当怎样了解这个问题？捉师长好不好呢？当然好，但不要发生锦标主义，别人捉了，也好，我也有一份，干部中还争这些，就没有意思。捉到师长，我们只能说是一个具体的胜利，但不是决定的东西，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打的最好，完成任务最坚决的，才是对全局做了决定的贡献。常常有这种情形：打得好又打得苦的部队，俘虏缴获却不多；相反有的部队出力不大，却有大量的俘虏和缴获。那么最大的功劳属谁？应当是前者，论功行赏也要看全面。我们各个兵团，是在一个目标下向敌人共同作战，我们必须是非常团结的，只有团结才能战胜敌人！

第四、城市问题。过去我们批判过所谓“城市观点”，究竟我们要不要城市？肯定的说，我们要城市。我们边区，正处在华北几个大城市之间，现在我们打下了石家庄。平、津、保、张家口等大城市我们还要打，这些城市最后都将是我们的。过去立三路

线时代，到处暴动，到处讲攻大城市，是不对的。今天情况不同了，敌人的城市是孤立的，周围都是我们的世界，有些城市我们已经有力量夺取，有些城市条件成熟后也可以夺取。城市一经我们解放，它就是人民的城市了，我们就要好好建设。象石家庄，我们就要使它成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中心，使它有力地支援战争的前线。石家庄解放以后，有两种情形：工人要修复铁路，恢复工厂；农民却要分商店，拆房子。我们是走工人路线，还是走农民路线呢？没有问题，我们要走工人路线，把工厂恢复，把铁路修通。敌人飞机要炸，炸了我们再修，坚决从破坏中来建设。有些同志反映了一种农民思想，不赞成好好建设城市，是不对的。不错，土改是为农民，但我们不能走农民路线，我们对城市要有正确的城市政策。盲目的仇视城市是错误的，今天对于城市已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可能要，要了以后如何建设的问题。检讨一下，我们过去对于城市政策执行得如何？很不够，不说大城市，就是对中小城市，象定县、正定、阳泉，也有毛病。象不能容许的工人失业现象，就在阳泉发生过。今后我们就要依靠工人、劳苦群众的力量，尽一切可能来建设我们人民的城市，因为城市在人民手里，就永远属于人民，建设它，对人民对战争都有好处。这一点，在战士中，在农民中都要进行深入的教育。

以上问题，关系到政策的正确执行。我所以要说明这些，在于求得大家思想的一致，只有大家思想一致了，我们的战争和工作才能胜利进行。

形势给了我们严冬作战的任务。我们就要行动了，希望大家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不避艰苦，再接再励求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注　释

〔1〕彭真，当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2〕保北作战，即指晋察冀野战军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在

保定以北地区围攻徐水等地的作战。

〔3〕大清河北没打好，指大清河北战役。一九四七年九月二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乘大清河北地区国民党军兵力薄弱之机，发起攻势作战。在歼国民党军第十六军一部后，因国民党援军迫近和连日暴雨影响部队作战，遂于十二日主动撤出战斗。此役共歼国民党军五千二百余人。

〔4〕元氏，即河北省元氏县。

〔5〕杨司令员，即晋察冀军区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

军队建设问题的报告*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六日)

根据主席[1]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将晋察冀军区军事建设问题报告如下：

一、 部队组成与部署

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组织我们的力量，反对不愿意和怕拿出力量来的保守思想，同时又必须作长久打算，反对孤注一掷的思想。在军事部署上减少次要方向的地方武装，取消肃清了敌人地区的军分区组织（三、四、十一分区），把大量地方兵团编入纵队。曾经中央军委批准新成立之三个纵队，除七纵（冀中）因有两个团需警备石门，其余兵团分别配合野战军冬季作战，未按期组成，需于本月底才能正式组成外，其余一纵（北岳）、六纵均按期于去年底先后组成，但兵力均不充实，需待三月动员新兵补充。在地方武装减少（现正在调整中，详情另报）后，普遍加强民兵的组织，特别是第一线民兵。由于党内不纯，干部作风不纯，民兵中也曾发生许多严重现象。此次平分土地运动开始时，把中心地区民兵武器收存，重新选择干部，整理组织，使武装掌握在翻身农民手中。全区民兵组织均由各军区、军分区统一指挥。无军分区组织的，皆设人民武装部指挥之。全区军队人数、武器除每月实

---

* 这是聂荣臻遵照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就有关军队建设问题向毛泽东主席写的报告。

力报告外，财政预算为：野战军十四万六千人（北岳、冀中两纵队在内），军直及伤病员四万三千人，新兵、俘虏平均每月三万人，地方军（两地方纵队在外）三万三千人，各随营学校及新编人员七千人，总共军队系统二十六万人。我区共有约一千三百万人口，在人力物力动员上都是最大的限度了。我区主要作战方向为北线，对西南角太原方向，如无夺取太原计划时仍为钳制方向。但太原处于三个战略区的接合部，三个区的兵力都薄弱，使太原之敌得以钻空子。日前到工委，遇代远[2]曾协商对阎。建议太行组成一个旅和二分区地方武装，并统一指挥北岳二分区地方武装及晋绥六分区部队，协同向太原压缩。

二、新兵动员训练与补充

全区正全力土改，新兵动员必须在三月才能开始。全年计划动员八万五千人，其中包括彭、贺[3]部一万五千人。分两期动员，第一期四万五千人，第二期（八月）四万人。根据过去经验，新兵如无必要的短期训练（学会使用三大技术[4]，单兵战斗动作和政治教育），在作战中伤亡比例很大，同时巩固亦差。故决定从部队中抽出一部分副职，使用一部分俘虏中的下级军官（排、班），组织二十个补训团。所有新兵都利用石门兵营集中训练一个时期，陆续补充部队。准备各纵队中分出主力团与次等团，主力团编制二千四百人左右，次等团二千人左右，统一由军区分别补充。

三、干部培养

根据军委指示，军区设一军政学校，培养营以上干部。各纵队、各军区设一所随营学校培养连、排干部。一年来解决了部分干部的需要问题，但数量与质量都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特别是各纵队随营学校，由于教员缺乏，和各纵队经常在作战行动中对教育工作的领导较弱，培养干部的工作更差。现决定各纵队随营学校均集中于军区军政学校附近，由军政学校统一领导，统一教育管理和供给。军政学校如总校，各随营学校如分校，切实加强

整理，估计今后收效会大。

四、后勤组织

一年来地方支前是很积极的。后勤的组织包括供给、卫生兵站，亦较有系统地组织和进行了工作。今天的问题是更合理的使用人力、节省人力。由于一方面后勤部门掌握仍不紧，另一方面主要的是部队浪费人力，即以此次保北作战而论，即达一兵一民夫之比。许多不需要的东西运来运去，甚至连白菜都从冀中运去，战役完毕又从西面运回。此不仅浪费民力，而且由于民夫车辆过多，影响部队的运动，妨碍作战，这是极可怕的现象。战役后后勤即召集会议进行检查，并规定今后士兵与民夫之比仍坚持三比一。同时责成野战军司令部在此次前方委员会中切实检讨，严整纪律。

五、全区财政供给全部统一

本区自冀热辽划出后，幅员不大，交通便利，又无敌人分割，为保证战争的供给，节省开支，全区财政供给拟完全统一。

注　　释

〔1〕主席，即毛泽东主席。

〔2〕代远，即滕代远，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副司令员。

〔3〕彭，即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即贺龙，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

〔4〕三大技术，指射击、刺杀、投弹。

进行察南、绥东战役的请示和报告*

（一九四八年二月、三月）

（一）
一月二十二日向中央军委的请示

一、傅作义部三十五军于涞水之役[1]遭我打击后，二月初调怀来、康庄整理似仍未动。暂三军（缺暂十一师在怀来）附整编骑兵第十二旅由涿县、良乡、房山地区配合高碑店、北河店、固城一线之九十四军，正向涞水、易县南北地区“扫荡”中。十六军于霸县、永清、固安地区配合王凤岗匪部[2]修碉建点中。新二军仍在保定至徐水及定兴、涞水守备。九十二军于天津、安次、香河、三河守备。六十二军（九十五师于杨柳青）主力仍于芦台、唐山、滦县线。暂四军主力于宣化、龙关、赤城、张家口（二〇一师于归绥、集宁）。骑四师于膳坊西南。整编骑五旅于张北、沽源。整编骑十一旅于化梢营地区。补训三十一师于西河营、蔚县、桃花堡。补训十七师于大同。暂三十八师于左云、阳高、怀仁。

二、经讨论，下一战役方向，如先出怀来、南口段，不能速

---

* 这是聂荣臻写给中央军委、中央工作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在一月二十二日请示上署名的还有肖克、赵尔陆、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在三月九日报告上署名的还有肖克、赵尔陆。

决，敌主力增援快，我军运动道路受限，有陷被动之虑。拟以二、三、四纵队（缺一个旅），首先歼灭蔚县、西河营、桃花堡守敌。尔后依情况向北、向东扩张战果。一、六纵队全部经浑源、涞源向阳高、天镇线进击，歼灭守敌，破坏铁路，求得吸引敌一个至两个军援兵，造成主力机动有利的条件。如敌以主力（三至四个军）寻我主力决战，则野战军主力转向平绥路东段，或乘虚回师保北。一、六纵队继续向柴沟堡或大同外围扩张战果。野战军主力抽出一个旅，配合冀热察独二师及地方军各独立团向沙城、南口段破击铁路及公路交通，迟滞敌向察南增援，保证主力方面作战计划成功。七纵队位于大清河以南，相机再出大清河北收复地区。

三、为与东北行动协同，各部定于三月上旬开动。三月十五日以后开始攻击。一、六纵队提早一天至两天动作。有何指示候复。

（二）
三月九日给中央军委的报告

兹将此次察绥战役[3]，各线配合部署报告如下：

一、冀中纵队[4]（七个团）于平汉线、保定、安新、容城地区配合三、四纵队所派之旅佯攻后，主力（欠一个旅）出大清河北恢复地区，一个旅西调满城以北，防敌向冀西山区威胁我主力之侧背。如敌北调则破击平保路滞敌调动。另八分区配合渤海一个团于十八日晚积极向天津南及津浦路北段动作。

二、冀东以独四、五两师及十四、十五分区四个团，分向平古路及三河、通县、香河、武清地区出击配合。

三、冀热察以冀察分区部队破击南口、怀来段铁路、公路。蒙汉联军[5]向张北附近活动，如敌调动则乘虚袭击该城。

四、晋绥可能以三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及独立旅向怀仁、大同、集宁线出动配合。

五、为防阎匪乘机东犯，抽石门警备部队（四个营）控制于阳泉西地区，协同二分区监视太原方向敌情。

注释

〔1〕涞水之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野战军在河北省涞水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围城打援战役。晋察冀军区为调动国民党军打运动战，野战军主力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一日开始围攻涞水城，在调动保定地区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来援后，即移兵求歼该部，十二日至十三日，将其军部及一个师共八千余人全歼于涞水东南的庄町、温辛庄地区，该军军长兵败自杀。

〔2〕王凤岗匪部，即国民党军收编的土匪武装，一九四八年被华北军区部队消灭。

〔3〕察绥战役，即察南绥东战役。一九四八年初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采取"以主力对主力"的新战法，将其主力集中于北平、天津、保定地区，应付晋察冀野战军的攻势。晋察冀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实施宽大机动，迫敌分散而歼灭之的指示，集中主力组成左、右翼两个兵团，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开始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察哈尔南部和绥远东部地区发起进攻，至四月九日，歼国民党军一万八千余人，解放了察南、绥东广大地区。

〔4〕冀中纵队，即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

〔5〕蒙汉联军，指当时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政治委员高克林。

组织晋中战役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日）

一、为保卫晋中麦收，及大量削弱阎匪有生力量，缩小阎占区，扩大解放区，华北局决定组织晋中战役[1]。

二、由向前、士第统一指挥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太岳军区主力、太行军区二分区、北岳军区二分区全部地方军，晋绥部队(能抽调多少兵力，由李、陈电告)。决定将太行军区二分区与北岳军区二分区部队，统组成一个集团，由肖文玖[2]指挥。晋绥所有参加战役的部队，亦组成一个集团，并请指定专人指挥。

三、各参战部队，均须严格进行政策（特别是新区政策）及纪律（群众纪律、战场纪律）教育。

四、战役具体部署及开始时间，请徐、周决定并告我们。

---

* 这个指示是聂荣臻草拟，以聂荣臻与薄一波名义给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第三兵团政治委员李井泉、第一兵团参谋长陈漫远及太岳、太行、北岳军区的电报指示。

注　　释

〔1〕晋中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华北军区、晋绥军区部队在山西省中部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进攻战役。一九四八年五月晋南解放后，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将其全部兵力五个军十三个师共十三万人部署于同蒲路灵石至忻县段，以确保太原为中心的晋中地区，并准备在麦熟时抢粮。为保卫晋中麦收，进一步削弱阎锡山的兵力，为尔后攻取太原创造条件，华北军区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由徐向前统一指挥第一兵团及太岳、太行、北岳和吕梁军区部队共四十六个团六万余人，举行晋中战役。战役从六月十一日开始，至七月二十一日结束，共歼阎锡山部约十万人，解放县城十四座，包围了太原城。

〔2〕肖文玖，当时任北岳军区副司令员。

举行保北战役的两个指示*

（一九四八年六月至七月）

（一）
六月十八日电报

⑩ 一、敌情：

（一）我二兵团主力，进入冀东作战后[1]，已吸引敌暂三军（缺暂二十七师），十六军（欠二十二师在杨柳青），九十四军（缺四十三师），九十二军全部，独立九十五师，新编骑兵第四师去冀东应付。连同原集结北宁线之敌六十二军及第八军，现冀东已集结敌六个军，十五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三十五军主力两个师，自十六日起，亦在调动，可能向冀东转运中。

（二）平绥线由暂四军，附暂二十七师及三十五军一部守备。

（三）平保线新二军，暂三十二、暂三十三两师仍于保定、徐水守备，近日不断东出，至大小石桥附近抢麦。暂三十一师守备固城、定兴、北河店、高碑店、涞水各点。四十三师仍在涿县。

二、我以斩断平保交通，歼灭琉璃河至漕河段分散守备之敌，

---

* 这是聂荣臻给杨成武等的两个指示，并抄报中央军委。在电报上署名的还有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参谋长赵尔陆。

孤立保定，减轻冀东负担，配合东北作战，创造攻取保定条件为目的，决定举行保北战役[2]。第一、六、七纵队全部，二纵队主力（缺第四旅）及三、五、九分区，均统归杨成武同志指挥，组成本战役序列，于七月八日开始动作。部署由杨自行拟定。炮兵旅[3]以九二榴弹炮三门、三八野战炮六门、一二〇迫击炮二十门及原配属二纵队之山炮六门参加，由杨统一配属有关部队。

（二）
七月三日电报

保北战役的具体部署，望依据敌我情况及战役总目的，适当调整。我们只提出以下两点，供你参考：

一、对分散守备之敌，如能以突然动作，迅速奏效，则应同时攻取数点，以求迅速扩张战果，使敌人猝不及防。这对战役发展将更为有利。

二、如我先攻涞水，再取定兴，则当我攻涞水时，各点分散之敌将会迅速集中定兴，固守该城以待来援，这对我战役发展必增多困难。因此，如采取这一方案时，则必须于攻涞水时，以适当兵力分割监视其他各点（定兴、高碑店、固城、北河）之敌，既不让其集中，又不让其逃走。如此方能达成各个歼敌之目的。

上述两点，供你参考，请加以研究确定后电告我们。

注　　释

〔1〕冀东作战，是指华北军区遵照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拖住华北国民党军不使其增援东北的指示精神，令华北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率所属第三、第四纵队及第二纵队第四旅，采取大踏步进退的机动作战方针，向国民党统治区热西、冀东挺进，经五月十二日至六月二十五日四十多天的作战，歼敌二万四千余人，达到了预期目的。

〔2〕保北战役，是指一九四八年七月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率第二纵队（欠第四旅）、第六纵队和第一、第七纵队在保定以北地区进行的配合作战。此役于七月十五日至二十日连克徐水、定兴、涞水、新城四座县城，歼国民党军暂编第三十一师等部一万余人，破坏了涿县至长辛店间铁路，孤立了保定。

〔3〕炮兵旅，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晋察冀军区在炮兵团基础上扩编的，下辖三个炮兵团，一个教导团。全旅五千人，各种炮八十二门。旅长高存信，政治委员李呈瑞。

配合东北　进军绥远*

（一九四八年八月九日）

关于华北的发展趋势，除太原外，目前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北线，我们要在那里想办法。消灭北线之敌是东北与华北的共同任务。二兵团打到冀东去就是为了配合东北。现在不是敌人向我根据地进攻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到敌人的线上作战的问题。二兵团到冀东一打，傅作义立刻把兵调过去，我们在保北一打，他又马上把兵调回来，狼狈不堪。有人称傅作义为“调兵司令”。现在傅部老巢空虚，根据军委指示，三兵团要排除一切困难，坚决抄掉他的老巢，给他以很大威胁。解放绥远，使华北与东北连成一片，对解放全国有战略意义。如果要问全国胜利还需要多少年？我们回答：今后三年内一定可以打垮蒋匪帮，取得全国决定性的胜利。我们要有全国胜利的充分信心。同时也要有克服争取全国胜利中的一切困难的决心。我们估计到有困难，就要准备去克服困难，有了克服困难的准备，那么困难即不成其为困难了。要争取全国胜利，我们就要拿出力量来，把战争引到蒋占区去，要坚决打出去。

---

* 这是聂荣臻在第三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动员进军绥远时的讲话（节录）。

华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两年*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

我代表华北军区全体指战员，祝贺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功，并向大会作如下报告。

华北解放区是在原来的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由华北广大人民和人民解放军长期流血斗争所创建的，在全国范围内除了陕甘宁边区以外，这是最老的解放区之一。这里曾经有我党长期工作的基础，有我党领导的“二七”以来的工人运动，第一次大革命以来的农民斗争和“五四”运动及“一二九”以来的学生运动等光荣的革命传统。特别是在这里，我们又曾经和广大人民在一起，坚持了八年最艰苦的抗日战争，粉碎了敌寇无数次疯狂的“扫荡”。为了创造和保卫这块自由的土地，我们的无数先烈和全体军民曾经付出了不知多少牺牲的代价！如果忘记了这些历史，离开了这些历史条件，就不能想象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华北解放区。

但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背信弃义，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不仅到处抢占抗战胜利的果实，而且在一九四六年六月，竟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迫使我们不能不起来反抗这种反革命战争，举行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

* 这是聂荣臻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

战争的第一年，在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反动派曾以优势的兵力，向我察哈尔及晋南、豫北、鲁西、冀南同时举行进攻。蒋匪军曾先后集中了五十个旅的兵力在陇海、平汉、同蒲三条交通线上，企图占领邯郸，打通平汉路，控制同蒲路南段，并挖掘黄河，水淹我冀鲁豫平原。在绥东、热西及平绥东段，蒋、傅军曾集中了二十三个旅向我张家口进攻，并企图由平津南下，打通津浦路及平汉路北段。当时，我们为了避免被动的作战，不斤斤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便于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转变敌我形势起见，在给予敌人一定的打击和部分的消灭之后，曾自动地在晋南、豫北、冀南、鲁西等地撤离了四十五座县城和察哈尔、雁北的二十座城市，这些城市牵制了敌人很大的兵力。由于广大乡村仍在我手，迫使敌人不得不分兵把守城市点线，而减弱了它的机动兵力，造成我军各个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因此，到一九四七年一月，蒋匪军在华北战场上的战略进攻已经顿挫了。一九四七年二月至四月间，我军已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四月初至六月底晋冀鲁豫与晋察冀我军举行了连续的攻势作战，在晋南、豫北、豫皖苏和正太线、平汉线、津浦线都不断歼灭了大量的敌人，收复和新解放了几十座县城。在第一年作战中，晋冀鲁豫地区消灭了蒋匪军二十八万六千余人，晋察冀地区消灭了十四万四千余人，共歼敌四十三万人。而且，这第一年作战的结果，已经打破了冀中与北岳之间及太行与北岳之间被敌人分割的局面，把这些地区在广阔的范围连接了起来，使敌人陷于被动和兵力不足，我军主动地位则日益增强。

战争的第二年，由于山东和西北两大战场给予敌人连续地严重打击，使蒋介石在全国各战场上都陷于被动，此时刘邓、陈粟、陈谢大军[1]先后南下，担负了最光荣的历史任务。刘邓遵照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预定计划，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在冀鲁豫地区歼敌九个半旅之后，在八月七日开始南征，克服了种种困难，渡过黄泛

区[2]，粉碎了敌人在汝河、淮河的拦阻计划，于八月二十七日全部进入大别山区。接着，在八月二十三日，陈谢大军亦南渡黄河，进入豫陕鄂地区。这两支大军和从山东南下的陈粟大军共同完成了恢复与开辟中原解放区的任务，实现了毛主席把战争引向蒋占区的伟大战略方针，使西北与山东两战场我军的反攻更加有力。因此，也就使我们华北解放区肃清腹地敌人的任务能够顺利进行。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先后解放了石家庄、运城、临汾等重要战略据点，收复了察南、雁北。最近由徐向前、周士第两同志直接指挥的晋中作战，又解放了晋中十四座县城及太原外围的全部地区。目前除太原孤城正被我军围攻以外，敌人留在华北解放区中心的据点已经全部被我肃清。因此，才造成了晋冀鲁豫与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的充分条件，并与山东和晋绥两解放区完全衔接起来。现在北线我军又斩断了平保线，孤立了保定，我军一部并已进入冀东作战，战争第三年的胜利是可以预期的。

我军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截至本年六月底止，在这两年间的作战中，在晋冀鲁豫战场共消灭敌人四十三万八千余人，在晋察冀战场共消灭敌人二十七万五千余人，合计消灭敌人共达七十一万三千八百余人。其中俘虏四十五万一千余人，毙伤二十五万三千余人，起义九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二十六万余枝，轻重机枪两万余挺，炮四千余门，及其他大量军火武器和装备。解放城市除得失相抵外，增加四十三座。现在全华北解放区共有二百七十九个县，十二个市，人口四千五百万。

我们所以能够获得这些胜利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战争的正义性，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成为人民自觉自愿参加、拥护和支持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战争。广大人民已经从自己亲身的体验中深刻地认识了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汪精卫、王揖唐、王克敏之流，一直到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蒋介石、阎锡山之流等，他们所给予人民的灾难是无穷的，在他们疯狂的压迫、掠夺与摧残之下，广大人民陷于失业、失地、失学与饥饿、死亡的痛苦深渊，不彻底推翻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反动统治，就没有民主自由，也就没有和平生活。甚至于就是蒋管区的中间阶层人士，也不能不打破和平改良和中间路线的幻想，走向反美反蒋的斗争道路，而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上。因此，今天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成为全国人民求生存的战争。因此，广大人民就自然而然地自觉自愿地参加、拥护和支持这个战争。华北人民在过去八年抗战和近两年来的解放战争中，为保卫自己和解放全国同胞所作的贡献是极伟大的。他们不但自己进行了最艰苦的斗争，而且给了其他解放区以及蒋占区人民的斗争以最大可能的支援。至今华北的某些地区，如冀鲁豫、豫北与平津保三角地区等地的人民，不但一方面要直接与蒋匪军所制造的比日寇更加残暴的烧杀淫掠以及各种自然灾害作英勇的搏斗，同时还在敌我拉锯作战的情况下，担负和完成了繁重的战争勤务等光荣的义务。如果把华北人民过去长期支持革命战争所付出的一切人力物力全部计算起来，就使我们更要敬佩人民对战争所贡献的伟大力量。特别是由于我们在华北基本地区，曾经实行过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和民主的政治生活，在日寇投降后又普遍地进行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因此，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们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及彻底消灭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他们除了对战争付出许多物力财力之外，还英勇地武装起来，大量参加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在游击战争中就已经不断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战绩；在近两年的解放战争中，他们继续发挥了这个光荣传统，英勇参战参军。这些优秀的华北人民的子弟兵，不但组成了今天这样强大的华北野战军与地方军，而且组成了刘邓大军，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

的英明指挥之下，他们英勇善战，横渡天险黄河，解放了中原三千余万人民，恢复与开辟了中原解放区。而华北人民今天仍继续以一切可能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中原的战争，这些也正是华北人民所担负的光荣义务。因此，我们的一切胜利，首先应归功于人民，胜利也就是人民自己的。

我们所进行的革命与战争，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与战争。近二十余年来的经验证明，离开了我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方针，我们就不能进行胜利的革命和胜利的革命战争。抗战时期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在朱总司令指挥之下取得了胜利。近两年来的解放战争，同样证明了毛主席战略方针和朱总司令指挥的完全正确。在这个方针之下，使蒋介石企图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以便彻底破坏我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遭受了悲惨的失败。在这个方针之下，各解放区强大的野战军坚决进入外线作战，从各个战场上向蒋匪军举行大规模的进攻，把人民解放战争推进到蒋占区，并把蒋占区变为新的解放区。这就使得处于各个解放区中心的我们华北解放区的野战兵团更能机动地各个肃清华北境内的敌人，把华北基本地区完全连成一片，并恢复相对的安定。正因为我们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依靠全体部队指战员与后勤人员的精心计划，奋勇作战，努力工作，和军队内部进行了新式的练兵，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不但加强了日常政治工作，并且特别加强了政策与纪律教育，改善军内军外关系，战士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立功运动普遍开展，战术与技术的学习也获得很大成绩。加以兵工部门全体同志的艰苦努力所获得的兵工生产的进步，使部队战斗力特别是攻坚的能力大大提高，能够强攻占领象石家庄、运城、临汾等坚固设防的城市。这就大大改变了华北解放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地位，赢得了相对安定的环境，便于顺利进行和完成土地改革，消灭封建与半封建的

土地制度，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并获得了新区工作与城市工作的经验，培养了大批干部，初步学到了对城市工商业的正确政策，为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建设开辟了宽阔的道路。而这一切就使我们能够进一步加强支援战争，取得战争的不断胜利。

我们所进行的革命战争的性质和它的最基本特点，就在于这个战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密切结合的全面战争，而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在过去抗日战争中，我们就已经发挥了人民的全面战争的特点，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统治。在近两年来，我们为彻底消灭封建的与半封建的制度，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独裁、内战的反革命政权，解放生产力，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而进行的解放战争中，这个人民战争的特点就更加深刻化了。当着广大农民要求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我党中央根据农民的要求，制定与公布了土地法大纲之后，我华北解放区大部分地区与半老区及一部分确已巩固了的新解放区，就已先后进行了和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尤其是原来晋冀鲁豫的大部地区下手最早。现在全华北基本地区，封建剥削制度业已消灭，无地少地农民已分得应有的一份土地。虽然，在广大农民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曾一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部分的某些偏向与错误，其中有些是由于我们执行政策中指导上的缺点错误所造成的。但是我们很快就陆续揭发了那些偏向与错误，在各种会议、文件和报纸上都不断地公开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加以纠正。有的纠正还不够彻底，还必须继续彻底纠正。今后在彻底消灭了封建，解放了生产力的基础上，在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和条件下，我们华北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就是以全力恢复与发展生产，努力进行各种建设，更有力地支援解放战争的前线。只有一切后方的力量充分动员与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才能够取得解放战争更有决定意义的和彻底的胜利。也只有战争的

胜利才能够巩固与发展我们的生产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亦即巩固与发展人民战争胜利的成果。这正是全面的人民战争的特点。

现在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已经开始了，在我们走向最后胜利的道路上，还要准备可能遇到许多困难和曲折，还必须作艰苦的斗争。但我们坚决地相信，在我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根据人民的意志，把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胜利是决无疑问的。我华北野战军，目前除在平汉北段和冀东继续作战外，正在彻底消灭着山西的敌人，山西全境只剩下太原与大同两座孤城，它的全部解放和阎锡山匪军的全部消灭，为期已经不远了。同时，我们还要继续彻底消灭盘据着北线的蒋、傅匪军，为解放全华北而奋勇作战，以配合与加速全国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

注　释

〔1〕刘邓、陈粟、陈谢大军，即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率领的两个纵队和一个军。

〔2〕黄泛区，指一九三八年六月，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中原进迫，国民党军队不战溃退，在河南省郑州附近的花园口决堤，结果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的四十四县约五万四千平方公里土地，受灾人口一千二百多万，淹死八十九万人。一九四七年堵口后，泛区变成沙荒地，即为黄泛区。

华北军区成立以来部队情况向毛主席的报告（节录）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

一、 华北军区兵力情况

原晋冀鲁豫与晋察冀两军区合并后，共有人员四十万六千余人，连同新成立之晋中军区合计约四十二万人。其中野战军二十一万六千余人，包括军区司、政、后机关及伤病员在内。“军大”及补训兵团计六万二千余人。野战第一兵团计七万余人；第二兵团计五万七千余人；第三兵团计五万二千九百余人；第七纵队一万四千余人；第十四纵队一万二千余人；炮兵第一旅二千七百余人，第二旅五千三百余人。野战军各兵团目前仍有很大缺额，尚须补充。地方军有北岳军区所辖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冀中军区二万余人，太行军区一万八千余人，太岳军区二万四千余人，冀鲁豫军区三万五千余人，冀南军区二千余人。

二、地区划分略有变动

原先拟根据敌情之有无，重新划分有敌军地区及无敌军地区各为若干区，后因顾虑影响一九四八年工作任务难于完成，故除某些变动外，一般区划暂时不变，但在各区之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上，仍根据敌情之有无而各异。即在有敌军地区，如北线之北岳、冀中及南线之太行、冀鲁豫，除规定地方军加强配合野战军作战外，各该军区指挥机关均向前推移，以便统一指挥对敌斗争，使巩固地区之党政机关能集中力量领导生产，以收统一领导与集

体分工之效。西线晋中区地方军与野战军则密切配合围攻太原。在无敌军地区，如冀南及现在的太岳，基本任务在于领导生产，但仍保持一定的军事组织形式，维护治安及民兵工作。因冀南、太行发现会门暴动、匪特伪装我军，劫掠城镇，特务炸毁弹药库及劫杀商旅等事件，甚至在邯郸至石家庄公路上单人不敢行走，这些情况为抗战以来所未有，亟应严加注意防范。虽然根本对策必须从制定政策，安定群众着手，以消灭会门、特务等乘机活动的社会与政治基础。一旦敌特暴动时，则军事上必须断然予以镇压与消灭，并按照惩首宽从的原则处理之。因此在这些无敌军的地区，拟于取消军区之后成立地方武装部，除领导民兵外并设常备武装一至二千人，担负警备任务，并加强公安工作。

三、 护麦斗争已取得基本胜利

西线晋中地区我之战役胜利，使阎匪抢麦计划破产。北线平保线作战亦粉碎了大清河以北及平津保三角地区敌之抢麦计划。南线冀鲁豫及太行南部安阳、新乡地区敌人活动比较疯狂，我地方军配合十四纵队作战亦有很大成绩，但接敌地区被敌抢走及烧毁一部麦子。总的方面，由于我主动进攻敌人的胜利，各地区护麦任务基本上均告完成。

四、兵工生产情况

兵工生产在六月份以前均按计划完成，军委指定拨发西北、中原及华东野战军者亦按规定数目先后送出。七、八两月份生产计划则因雨季造成部分厂房塌漏，及原料运输与经费周转等的困难而没有全部完成，准备在九月份加工补足完成之。

五、兵员补充问题

在兵员补充上以原晋察冀之补训兵团编成华北的补训兵团，编制共四个旅十六个团，每团（三个营十五个连）可接受二千五百至三千人。今年三月底在原晋察冀区开始扩军，至七月下旬止，原计划四万五千名，实际完成四万零八百余名。由补训团分配给

第一、二、三兵团及其他单位共二万七千余人。总计补训兵团现有之新战士及解放战士共一万零九百余人。

半年多来补训兵团的经验证明：凡是经过训练的新战士及解放战士，政治上就比较巩固，技术与战术亦均有提高，因而部队在战场上战斗的减员就相对减少。因此，补训兵团这一组织形式及训练方法是必需的。但补训兵团的干部十分缺乏，各部队往往不愿抽调得力干部，只调一些身体较弱、能力较差的干部到补训兵团工作。一般干部思想上轻视新兵训练工作是普遍现象。为了克服这些缺点与困难，在补训兵团开始组织时必须以各旅为单位，规定数目及标准，坚决抽调一部分干部，于新兵动员开始之前先集中这些干部受训，从思想上加强其对新兵训练工作及教育管理方法的重视，然后分配其工作。并从地方参军干部中选拔一部分政工人员，从俘虏中挑选一些有经验的班长或排长等，担任一部分军事教练工作。每期训练结束时抓紧总结经验，继续训练这些干部。这样不断改进干部的条件，才能使训练新兵的工作逐渐改善。经验证明，干部训练得好些，新兵训练工作也就做得好些，逃亡现象也就减少些。

六、后勤工作

因原有两个军区的制度与工作习惯等略有不同，故须经过一个时期才能完全统一。原晋察冀军区后勤工作的发展有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由地方负责，与部队供给、卫生等部门工作的有机配合上有很大困难，故后一时期成立后勤司令部的垂直统一机构，分区以上以军事机关为主，分区以下则以地方政权机关为主，统一民力的分配使用，组织兵站，前送后运时间及运输力的调剂大为方便，效率提高，又可节省民力。在我之大规模进攻作战中，建立这样统一的后勤工作机构完全是必要的。原晋冀鲁豫军区的后勤工作统归地方政府负责，与军区供给、卫生等部门工作的指挥系统各异。在晋中战役时部队转战太行、太岳与北岳等区，后勤

指挥遇到极大困难。现正准备采用原晋察冀区的后勤工作制度，全面统一起来。同时，华北后勤工作兼有支援外线的重大任务。今后扩展与增设固定的兵站，直连中原及晋绥之临汾，增加兵站的运输力，现有百辆左右的汽车及数百辆大车的运输力是不够的，须计划设立辎重兵团，以完成支援外线的任务并减少民力的负担。

七、政治工作

目前政治工作仍然薄弱，部队逃亡现象严重，急须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由于战争的残酷，民力负担的加重，农村劳动力的缺乏，是形成严重逃亡的客观原因。过去部队与地方互相推诿责任，是不对的，必须共同克服连队工作与乡村工作中现存的缺点。连队工作要在开展军事民主、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同时，加强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解决连队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与支部领导问题。在乡村工作中则须继续彻底克服强迫命令作风，克服乡村中的无政府状态和村干部的消极思想，以及对逃亡现象熟视无睹，甚至抱着欢迎态度等错误思想。为此，要加强政治工作，把时事教育和争取全国胜利的宣传结合起来，提高群众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自觉性与信心。只有连队工作与乡村工作问题同时解决，才能更好地巩固我们的部队。

粉碎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的部署*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

（一）
十月二十五日电报

确息，傅有以九十四军全部、新编骑兵第四师、骑兵第十二旅另附工兵一营，进抵保定后以汽车四百辆，载运炸药，袭击破坏石家庄之企图[1]。为破坏敌之计划，除已令三纵队兼程向保定满城地区[2]前进外，拟采取以下措施：

一、七纵队主力今晚立即转至保定东南地区，以一个旅在河南岸构筑阵地，准备背靠西面建立纵深防御。二十一旅明（二十六日）阻击敌人一天后归还建制。尔后纵队直接掌握之两个旅，应协同民工破坏保定至高阳、保定至望都、至温仁公路，准备于敌人进至保定后，在正面及铁路两侧阻滞敌人。纵队工兵连先进至唐河岸指导民工构筑工事。八、九、十分区部队仍然统一归周彪指挥，继续以地雷战、游击战阻滞敌人。敌逼近保定后，八、十两分区之三个独立团，即转至保定南随七纵主力行动。

---

* 这是聂荣臻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草拟的给所属部队下达的三份电报指示。在十月二十五日电报上署名的还有薄一波、滕代远、赵尔陆，在十月二十六、二十七日电报上署名的还有薄一波。

二、冀中应即派干部负责指导，准备破坏高阳至安国、望都、定县公路。

三、肖思明同志亲自掌握三分区之独立团，继续协同民兵在徐水地区破路、布雷阻击敌人。五分区部队及民兵在铁路西侧各县挖路（首先破坏完县至望都段）布雷，并注意与七纵队、三纵部队密切联络。各部队执行情形及时报告，并切实掌握情况。

（二）
十月二十六日电报

一、敌图袭击石门之情况，已见昨（二十五日）二十四时致各军区命令。这是蒋贼在各战场连续遭受严重失败后，妄图挽救其不堪收拾的沮丧士气和直接破坏我经济建设的一大阴谋。为坚决粉碎蒋贼这一阴谋，并予进犯之敌以严重打击，我们必须动员党政军民的一切力量，直接参加这一斗争，克服一切麻痹疲塌的心理。

二、为求作战之便利，决定沙河以南地区七纵之一个旅，石门中央警卫团及步校统归军区副司令员肖克同志指挥。沙河以北七纵队主力、三纵队全部及冀中、北岳两区之地方军，由我们直接指挥。

三、为实现将进犯匪军滞留于唐河以北地区，待三纵队赶到，决心以三、七两个纵队歼敌。七纵队应以方顺桥及定县两点为中心，构成面的防御地带，主力构筑坚强的抵抗阵地并纵深配备，以机动防御有力地反突击反冲锋手段完成阻敌任务，直至三纵队到达合力歼敌。在第一防御地区，包括方顺桥、定县、大庄、高阳以西地区；第二防御地区，包括望都、唐县、张登、温仁地区。应以各独立团、独立营及各县民兵组织村村联防，村村阻击，以地雷战与村落游击战，使敌人到处遭受杀伤，不能无顾虑地前进一

步，以配合主力阻击敌人，待三纵队到达。各地委、分区及县、区级党政军民负责同志，应亲自前往指挥所属部队、民兵作战。

四、三纵队已于今（二十六日）向满城以南地区急进，须克服一切疲劳，以五天时间到达指定地区。

五、目前破路是迟滞敌人汽车前进的关键，除北岳军区副司令员肖文玖已亲赴五分区掌握外，冀中亦须派专人掌握。地区划分：平汉线两侧附近及路东归七纵队冀中军区统一进行；路西由北岳军区负责。破路顺序，首先对保定向外放射之各路先行破坏，次为两侧各县城之南北道路，先完成望都以东以北，再完成定县、望都、唐县、曲阳、安国。注意唐县、曲阳间之公路桥梁，只将复土除去，使之不能通车，不要全部拆毁，其他桥梁之材料应妥为保存，不得损失。

六、只要我们把村村联防与破坏公路认真做好，我们就可以打退敌人的骑兵与汽车，使之无法通过，我们依托村落，不要怕被骑兵包围，要充分发挥民兵作用，就能达成我们争取时间的防御任务。

七、石门市已作必要之战备措施，由滕（代远）副司令在石门主持布置，不另。

华北局及军区号召，冀中、北岳两区党员和干部要领导人民群众为彻底粉碎敌人进击的光荣任务努力不懈。

（三）
十月二十七日电报

我冀中、北岳两区人民都经过长期的战争锻炼，民兵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因此，我们相信是能够胜利完成粉碎敌人此次进攻之任务的。但由于战争推向蒋管区后，解放区内地已有较长时间处于相对的和平局面，故在对敌之警惕性上和战争准备上可能

不足。此次我们能在事前发觉敌人的进攻阴谋，提高了警惕性，还必须加之以负责干部亲自组织领导，才能充分发挥我们的力量。为此，在完成破路和村落联防战之任务中，我们决定各县县长和县委书记分任县的民兵总指挥和政委，武装部长任副职，分区司令员、专员任分区正、副指挥（无分区机构者专员任总指挥），地委书记任政委，均须亲赴破路地区指挥掌握检查。由于敌人今（二十七日）可集结保定，明（二十八日）或后（二十九日）即将南犯，故保定以南各破路地区必须于今晚完成唐县、望都、高阳以北，明晚完成定县、安国、曲阳以北，先破坏南北公路及两侧可以通行汽车之大路，不得延误。各县破路情形，每天须向上报告两次，由军区汇报给我们。

注　释

〔1〕袭击破坏石家庄之企图，是指在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面前，蒋介石、傅作义为挽救危局鼓舞士气，于十月二十三日部署偷袭石家庄，以威胁中共中央和华北军区领率机关，缓和北线压力，扭转被动局面。敌偷袭的部署是：以第九十四军、新编骑兵第四师、整编骑兵第十二旅和新编第二军暂编第三十二师为偷袭梯队，向石家庄实施快速奔袭；以第三十五军、第十六军两个师和第九十二军第一四二师在平汉线保定南北地区进行策应活动。

针对敌人的企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于十月二十五日作出了粉碎敌偷袭活动的严密部署。为了破坏敌人的计划，揭露敌人的阴谋，毛泽东于十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亲自为新华社写了三则电讯，给进犯之敌以极大震慑。经我第三、第七纵队和保定至石家庄段平汉路两侧军民的共同努力，至十月三十一日，终于粉碎了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阴谋。

〔2〕三纵队兼程向保定、满城地区，即当时我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政治委员王宗槐）在平绥路南涿鹿至矾山堡一线作战，距指令到达的地点满城、保定地区约五百华里，限五天之内赶到。结果，第三纵队自十月二十六日起，经五天强行军，于三十一日凌晨赶到保定以南的望都。偷袭之敌得知我第三纵队已到，惧怕被歼，于三十一日缩回保定城。

为防北平傅作义部突围的部署*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

兹将我区地方军为配合主力歼灭平津可能突围南窜敌之部署确定如下：

情况判断

（一）自平津战役发起以来，东北主力先后截断平津及塘沽敌之交通，迫敌主力猬缩于平、津、塘三点，在我重兵压境，海逃无船，困守无援之情况下，敌已面临覆灭之绝境。

（二）我二、三兵团及东北四纵队、北岳、冀热察等部队全歼新保安、张家口敌[1]之后，堵绝了平敌可能西逃之路，故敌西逃之顾虑已大为减少。但平津以南地区无我主力，因而相对增大敌南逃之可能。

（三）根据以上情况，平津之敌目前除困守以待所谓时局变化外，在我日益紧缩包围、准备攻击之情况下，则有拼死夺路南逃之可能，敌采前者是消极的，而后者则是积极的，因此我对敌南逃之可能，须有足够的估计和布置。

（四）估计敌南逃道路可能有二：

一是北平及津塘之敌分沿平汉路、津浦路南逃。二是在津塘敌策应之下，北平敌可能沿平津路南北地区，向天津突围。并有

---

* 这是聂荣臻部署华北军区地方部队配合平津战役的命令，在上面署名的还有薄一波、滕代远、赵尔陆。

可能突破我黄村及其以南阵地渡过永定河（该河上游可以徒涉），经固安、永清向天津。尔后会同津塘之敌沿津浦路南逃，这一可能较前者为大。

我之部署

（一）阻敌南窜之重点置于津南、沧县以北地区，由冀中军区孙毅司令员统一指挥八分区部队及九分区回民支队（欠汉民大队在保定），冀南之两个营及公安大队（目前暂位于衡水附近战备整训，根据情况向东西机动）于津南地区构筑纵深防御工事，如敌沿津浦路南逃，坚决在沧县以北地区阻滞敌之前进，争取时间配合主力歼灭敌人。具体部署（略）

（二）为防天津之敌经冀中内地南逃，冀中军校（学员三百人）附两个民兵连，控制大清河桥梁、渡口，及新镇、苟各庄线，长丰、任邱线各要点，构成两线阵地，准备阻击逃敌。

（三）宛平以南平汉沿线由北岳军区肖文玖副司令员负责，确实掌握敌人动态，随时准备配合主力阻击歼灭由北平可能南窜之敌。独九团一个营位宛平（已与我东北五纵队取得联络），一个营位新城上岸村线，肖副司令员率一个营位长辛店，独五团主力于赵辛店，以一个营守备琉璃河。房山、良乡、涿县由各该县武装驻守。目前除担任上述县城之守备外，并清剿流散之敌，维护交通，如敌由北平南窜，则配合主力作战。

（四）保定市警备司令员帅荣统一指挥保定市警备部队（回民支队之汉民大队，九分区独立营）及警察武装位于保定市，发现小股溃散之敌则予以歼灭，如敌沿平汉线或其两侧附近集团南逃时，坚决进行阻击，迟滞敌人前进，配合主力歼敌。

（五）石门警备司令员曾涌泉统一指挥石市警备部队（警卫连、防空队、保安大队、护路队、警察大队）及石门市八个区的民兵武装位于石门，如敌集团南逃时，全力依据滹沱河进行阻击、迟滞敌人，配合主力歼敌，如发现小股溃散之敌，则主动予以歼

灭。

（六）如敌据守平津而不南窜或在我主力包围下而不能南窜，若在平津地区被我歼灭时，以上各部及民兵，要及时发现小股溃散之敌予以歼灭；在各要路口、渡口、车站等交通要道，广泛发动民兵设岗增哨，严密盘查，不使化装潜逃之匪首漏网。同时在各河流、渡口构筑工事，准备地雷，组织民兵联防（冀中已以牛驼为中心，北至固安，西至新城、固城，南至雄县地区组成重点联防区）配合主力全部歼灭华北地区之敌。

各部应确实掌握敌人动态，除随时报告外，并根据情况适当调整兵力部署，及时电告。此令。

注　释

〔1〕全歼新保安、张家口敌，是指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华北第二兵团解放新保安，全歼守敌傅作义赖以起家的“王牌”军第三十五军一万九千余人，军长郭景云毙命。十二月二十四日华北第三兵团和东北第四纵队解放张家口，全歼敌第十一兵团部和一个军部、五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及保安部队等共五万四千多人。

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三份报告*

（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至十四日）

（一）
一月八日同傅作义代表谈话情况的报告

八日十五时我与傅作义的代表张东荪、周北峰[1]进行了谈话。据张东荪谈：傅要我代表他出来谈判，张当即表示称："你是蒋介石的官，我是民主同盟的分子，我不能当你的代表，我只能把你的意见转达给对方，并要你派一代表同我去。"

傅对张表示以下几点：

（一）平、津、塘、绥一齐解决。

（二）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

（三）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

---

* 聂荣臻奉中央军委之命，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到达河北省蓟县孟家楼平津战役指挥部，与林彪、罗荣桓会合。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夺取和管辖平津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项事宜"。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自一月八日开始，至一月十六日达成基本协议。一月二十二日傅作义部二十五万人开出北平城，接受和平改编，平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五十二万余人。这是聂荣臻为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给中央军委的报告。

张谈：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陪衬语。

（四）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有步骤的办法，即是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如同意此方针，当由双方派代表协同拟定具体办法等语。聂问张，傅能否下令蒋系部队出城。张答：傅称，中下军官多为傅人，能控制能保证，如有不遵令者，傅可解决他。张并谈：基本是军队问题，我是外行，请你们详细考虑。聂问张：傅究竟是什么打算，能否永远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来，还是跟蒋介石殉葬，或者还幻想第三条路。张答：我的观察，傅是决不能打下去了，其原因是其主力被歼，美援无望。不久一批美援经上海时全被国防部换了一批坏货，傅很不满而失望。城内粮食不能持久。傅一脑子旧东西，不愿在中共下做事。第三条路线曾经有人活动过，我曾竭力阻止和破坏，现在傅亦没有这一打算。我看傅还是想要点面子下台，他称之为光荣的交代。其次是与周见面，其军事方针如张所谈不赘。

以上是我与张、周谈话的要点。我们判断是真假两面，如果傅真的这样，其用意是平津不战以讨好人民；不投降缴械讨好蒋介石；让出平津讨好中共。将来我军对他实行缴械时，其责任在我。傅这种打算，是真是假都很难实现，因我们判断，蒋系部队不会听其命的。我们拟回答两条如下，如傅能保证军队能听命开出城，则我们准备答复他，规定时间地点将部队调出，分驻各地缴械；如不能保证，则要傅开口子，扣军官，实行里应外合。如果这两条都做不到，则我公开宣布军事行动。请中央立即回电，因张要走，同时天津攻击在即。

（二）

一月十日关于傅作义情况向中央的报告

北平九日十三时电：今十一时见厚同[2]谈：傅于张东荪回去后

之新态度，为配合解决中央军。据刘谈：郑介民[3]抵平，对傅无影响，仅给中央军打气。冬菊[4]谈：傅与郑谈三小时后，出屋碰到他，面色很难看，以严肃态度说："十一日勿来我处，速回津去"。郑、傅所谈，外屋听不清，声音忽大忽小、忽断忽续，据估计谈话不甚愉快。近日平津战争影响刘[5]之态度，较前积极，已完全承认里应外合解决中央军思想，并谈一些具体方法，不似过去之和平论调。

（三）
一月十四日关于北平有和平解决可能向军委的报告

傅派邓宝珊[6]、周北峰及上校秘书刁某昨抵此，今与之见面时，除本中央所示之态度与内容，指出傅一再拖延时间玩弄花头应负全责外（详细内容另告），并由于傅拖延太久，天津方面今已开始攻击，故津市因战争所遭受的损害，应由傅完全负责。现傅对津只有下令迅速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对北平应照原改编方案，迅速提出具体实施步骤。在谈话中，邓取圆滑态度，主要两点：

（一）过渡期间，军队改编用人民和平军名义。

（二）傅拟将华北全部担子交邓负责出头，均为我一一拒绝。

现邓仍留此，如能够攻下天津，有迫使傅就范争取北平不战解决可能。在整个看来……有政治扒手，共同之点均为想乘此机会抓一把，所谓第三条路线。我们已有所警惕。

注　释

〔1〕张东荪，当时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副主席、燕京大学教授；周北峰，当时为国民党华北"剿总"少将土地处处长。

〔2〕厚同，即刘厚同，当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上将参议，曾是傅作

义的老师。

〔3〕郑介民，当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常务次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4〕冬菊，即傅冬菊，又名傅冬，傅作义之女。一九四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天津、北平新闻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我军围困北平期间，傅冬按照党的指示，积极劝导其父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

〔5〕刘，指刘厚同。

〔6〕邓宝珊，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

开国大典阅兵命令*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区命令

一、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日，特定于十月一日十五时在天安门广场及其附近地区，举行北平卫戍部队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部队之阅兵典礼。

二、凡驻扎北平之步兵、骑兵、炮兵、坦克装甲兵团、摩托兵团和空军、海军代表部队均参加阅兵典礼。

三、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检阅。

四、本人受命为阅兵典礼总指挥。

五、阅兵典礼一律着夏季服装。

六、各部队指挥员应派出标兵。

七、为调节阅兵场各种动作及维持秩序，特组成阅兵指挥所，由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任指挥所主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任指挥所副主任。各受检部队在阅兵场及分列式中均应听从指挥所的指挥。

---

* 这是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为开国大典发布的阅兵命令。

在全军后勤财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一日）

经过去年一年的努力，可以说在大陆上我们已取得战争胜利，除西藏还没有派兵去以外，凡有国民党军队的地方，均已肃清。这就提早完成了预定的作战计划，至少是提前了半年时间。在部队方面来说，大家很辛苦，很努力。如西北部队下了雪还没穿上棉衣。到新疆的部队，在零下二十度还住在没门窗的房子里。第二野战军、第四野战军走路很多，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差不了好多。正因为敌人溃败得快，所以没有准备时间，我们拚命的追，而交通线如此延长，道路如此困难，要照常供给是谈不上的。第三野战军虽说一年走的路不多，但对海岛作战，敌人飞机、海军的扰乱，使交通运输困难，长期处在战壕中，而致营养不良。总之，战争的胜利是很大的，部队很英勇，很艰苦，去年一年的供给工作，也是很艰巨的。另一方面虽有一定标准的供给，但物价变动很大，使战士常常不能保持规定标准的生活水平。虽然供给工作同志很努力，但也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苦处。不过整个后勤工作，在进军中是尽到了责任的，虽然工作还往往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但确实尽了责任。今年的预算已经不是预算，因已算好了，而是如何支配，如何量入为出，在数目字里边去计算。去年胜利很大，今年困难也很大，主要是财政经济的困难。毛主席的方针是统统包了，一切都算进来。如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经费几乎增加了三倍。第三野战军如果台湾打下来了，又要加倍，西北也如此，就

东北、华北少些。另外，战后百废待兴，医治战争创伤，都需要钱。但首先是吃饭问题，饭也吃得很苦，还要挤出来一些作建设用。我们军费是最低的，凡能节省的节省，可缓办的缓办，在今明年内能喘过气来。这个情况大家都知道，可能体会得更深刻些。但不管如何，仗还要打，日子还要过，建设也要搞，有困难也要干。我们怎样挤呢？首先，生活方面既不提高也不降低，保持一九四九年规定的标准，再低了也不好讲话，这牵涉到广大战士的生活，这就会使我们工作上遇到很多困难。第二，我们的兵工生产不能停，起码要保证我们的枪炮弹药基数。过去我们不造子弹，靠缴获，但炮弹则必须自己造。可是国民党打完了，没缴的了，不能等着再打再补充。所以得生产子弹，这样也加大了一些兵工生产费用，而且决不能挪作他用。第三，服装没有降低，这个预算同志们很仔细的算了一下，如官僚主义，三一三十一便完了，这解决不了问题。但我们采取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使大家知道全部家务，实事求是的计算，照顾各地情况，给予不同的调剂，使全军都能保持相当的生活水准，这一点大家回去要好好说明，不能只看到差额就想平均一下。这次的计算是合理的，过去各区独自办理，现在中央政府统一了，所有的事项要统一起来。人民币都统一了，所以就得统一计算，这对部队的团结也是好的，这就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后与各区财经委员会在计算物价标准时，看如何更合理些。各地区如果不搞好这一问题，仍不能保证部队的生活。所以这得适当的解决。华北去年这样解决了，都没提出意见，所以能够每人每天节省一两米[1]，加之种菜、养猪，使生活得到改善。这是要与各财政部门好好协商的问题。

如何把部队生活搞好，一方面在政治工作上要号召大家艰苦奋斗，一方面在物质上要想法保障部队，把生活搞好。这是不矛盾的。虽然我们财政很困难，军费很少，但不强调改善生活也是不行的。我们就这点费用，从供给部门到连队，如何把这些费用

用得合适，改善生活，这必须要有一定的组织工作，如合作社等。特别是作战部队的困难更多，甚至喝的水都要送，这就要我们从后勤工作方面研究出很好的办法，以保持战士的体力。这方面各区都有很多经验。我们不能违法，在政府法令下，想办法搞生产，不搞商业，不能走私。我们的战士要求不高，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解决他们的实际需要。

今年除有战斗任务的部队以外，毛主席指示要开展农业生产运动，如绥远开五原，二十兵团开盐碱地，兴修水利，四野如能开垦黄泛区，那是很大的好事，不然就调些部队到东北去垦荒。我们的军队不能采取简单的复员办法，那样搞对社会不利。部队可以搞很多的建设工作，如开运河、修铁路。否则不动也得吃饭，动了还会增加收入，得到一定的报酬。参加各种大规模的建设工作，还可以采取带点公债性的劳力，到几年后给予补偿，使国家财政有喘息机会，负担得了，使国家建设提早一步完成。这就使几百万部队，不因缺乏土地而无用武之地。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有些工程没有有组织的部队参加劳动，很多事情是会推迟的，有部队参加效率是很高的，我想我们是会做好的。

另外，对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过长期考验的人员，是以工农为主而又经过长期训练的骨干，可以成为干部，是国家的依托。最近教育部会议提出，办工农干部速成教育，使他们成为国家建设各方面的骨干。过去在战斗环境中，我们部队的文化教育，是不系统的，不正规的，也很难做到系统和正规，所以这方面的成绩还不突出。但最近一二年来，大家对文化学习兴趣很高，这是很好的现象。所以现在考虑办多少个中学，提高文化，再考入军大或其他专科学校。但这笔经费是没预算的，还得挤。如军队的宣教费中可以挤出一点来，或者从政府的教育费中拨出一点来，现在八张纸的标准[2]是很不够用的。

节省、爱护公物问题。我们部队虽穷，但对公物是不够爱护

的。在红军打土豪时期，大家的衣服穿旧了就扔到一边，对东西的爱护很不够。老百姓一件衣裳穿多少年，国民党军队棉衣也不止穿一年。可是我们却穿两年都不可能，衣裳很脏。到日本人的仓库中去看，都是多少年前作的服装，旧的都洗得很干净，补得很好，这一点是该我们学习的。必须教育战士如何爱护服装，及如何组织收缴保管存放，这些都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

要挤出一点营房仓库的修建费，这在全军范围来讲是很大一件事。有的仓库一旦失火，什么都烧完了，一般不能把仓库放在市区内，并要有统一的管理才行。营房很多，但不住兵，这是不合理的，许多营房都被破坏。过去住在老百姓家会受到欢迎，但打完仗再去住，这不好讲话。所以以后可以部队出劳动力，公家买些材料盖营房。如天津部队很快的就在很多地方修了营房。四川就住庙宇，庙宇改营房是方便，但还要有一个过程。总司令讲过多少次，营房建设必须交军队，虽然现在有困难，但也要一步步地，一点点地修起来住兵，不能再去挤老百姓了。

总的说，供给会议在财政很困难的情况下算了账，挤出钱来搞建设。把供给制度都搞出来，这都是必要的，建立了一定的制度，各项工作也好做了。大家都同意，只要共同努力，还会做的更好些，有困难也好克服。

注　释

〔1〕节省一两米，是指华北军区从一九四九年九月起，为救灾开展的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的活动。这一活动延续了六个月。

〔2〕八张纸的标准，指每月发给每人文化学习的用纸标准。

关于军委机关及军事院校建设问题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日）

关于一九五〇年的军事工作：继续组织解放舟山、金门、台湾、海南诸岛之战役与进军西藏；无进军任务各军遂行剿匪、生产、整训。现对本年内军委机关建设和准备整编国防军工作，安排如下：

一、 军委机关工作建设，拟以参照科托夫[1]所提总部机构建设方案，依我之需要与可能，分别缓急，逐步进行。

（一）各特种兵司令部，除已建立之空军、海军两司令部须继续加强外，为配合攻略台湾及准备正规国防军建设工作，炮兵、坦克装甲及工兵诸司令部须于本年内建成。骑兵司令部暂不设立。在干部方面，建议：

调王宏坤[2]为海军副司令员。

任苏进[3]为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苏已到京，司令员暂缺）。

调许光达[4]为坦克装甲兵司令员。

工兵司令员人选尚待物色。

（二）总参谋部：1. 作战部除一局外，拟以现属一局之队列科于今秋扩为军务局（军务部门掌管编制，对建设正规国防军虽属重要，但限于原有基础，暂不建部）。测绘局已以接收华北军区

---

* 这是聂荣臻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

之制图科为基础建立，正整顿中。2. 情报部已由中央情报部和军委一、二局合并组成。3. 通信联络部以军委三局组成。4. 军事训练部以军委四局为基础加强之。5. 军事学校管理部，拟调肖克任部长并筹划建部工作。6. 军事交通部，因大陆战争基本结束，军运日渐减少，暂不设部；动员组织部亦暂缓成立。7. 机要局暂与中央机要处一起，以后依需要再定。

（三）总政治部的建设问题，曾与中央商议暂维持现状。

（四）总后勤部已与华北后勤部分开办公，现已设立军需、军械、财务、运输、卫生等部。除卫生部为原军委者外，其余各部人事与业务仍多由华北后勤各部兼理。

（五）总干部部，现已由各军区调来十二名师团两级政治工作干部，并由总政抽调数人，进行筹备建部工作。在筹备过程中，拟暂用“军委干部管理处”名义，并建议中央调谢富治任副部长。

二、军事学校现建立者：有航空学校七所（东北五所，北京、济南各一所）；海军学校一所（大连）；防空学校、测绘学校各一所（均在沈阳附近）；机要干部学校一所（张家口）；军医大学三所（分设北京、上海、长春）。此外，拟以沈阳附近之四野炮校及吉林之东北军区工兵学校为基础，建立正规的炮兵和工兵学校，各区不设分校，以便集中人才器材，统一全军训练。并拟以华北军大在长辛店之现址，筹建陆军大学[5]，俟刘伯承同志回京主持之，以便全国部队整编时，储备与深造高级军事干部，并成为建设正规国防军之训练中心，以其研究成果作为全国建军的制式。至于培养初级、中级干部之训练班与步校，则由各军区举办，由军委统一教育内容与计划。坦克装甲兵仍须设一学校培养干部。

三、拟于三月底召集各军区参谋长来军委汇报部队情况，征求对今后部队整编和起义部队处理的意见，并彻底清查与掌握部队人数。

上列各项，是否可行，请即审核批示，以便遵行。

注　释

〔1〕科托夫，苏联驻华使馆第一任武官、苏联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当时军衔为中将。

〔2〕王宏坤，湖北麻城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

〔3〕苏进，河南省郾城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宁都起义，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任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副司令员。

〔4〕许光达，原名许德华，湖南长沙市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当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

〔5〕陆军大学，即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北京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对固定区域割据用波浪式推进政策解释的复电*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贵波同志[1]：

所问“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的解释，答复如下：主席的这一军事原则是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创建革命的根据地，巩固根据地，再依托根据地，扩大发展根据地，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进政策，使巩固根据地与发展根据地相结合的原则，所谓波浪式的推进，就是根据地扩展到某一境地，就要暂时停止推进，而进行新区的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等项巩固工作，到新区已经可以作为依托再行推进。请参看毛选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

注　释

〔1〕贵波同志，即罗贵波，当时为中共中央驻越南的联络代表，后为中国军事顾问总团顾问。

* 这是经毛泽东主席审定的聂荣臻答复罗贵波的一份电报稿，标题是作者这次审查时加的。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聂荣臻的报告批示“同意”，并在发给罗贵波的电稿上加了“既”和“又”二字。

附：聂荣臻给毛泽东主席的信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主席：

罗贵波来电请解释你在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曾由李涛起草一电，我嫌太冗长，另压缩一电较简略，兹一并附上，请你审核。

在全军参谋会议闭幕会上的总结报告（节录）

（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历时十五天的参谋会议，今天就要闭幕了。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要进行整理，呈报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副主席、周副主席审阅，要经过他们同意，并批准。现在我就会议讨论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第一、部队整编问题

这次参谋会议，是根据中央政治局精神和毛主席所规定的全军数目范围，事先经过各大军区、各野战军详细研究和讨论，又根据出席会议的各参谋长及其他同志具体研究和讨论，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复员和整编数目作一个全国范围的调整，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使得我们的整编工作与复员工作从今年起就可以着手了。

整个来说，我们随着全国形势的胜利发展，人民解放军的数目扩大到五百五十万人。当前我们要搞经济建设，有这么庞大的军队，确实是国家财政上一个很大的负担，这个问题我不多谈了，陈云同志已向大家作了报告，同志们对全面情况是了解的。我们处在这种困难底下，必须要想出一切办法来克服它。首先我们人民解放军要进行整编。这不仅是全国的问题，即使从军队本身来说，装备就没有办法来改善，军队生活亦无法改善。另外，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讲，特别是从恢复国家经济与发展上看，整编与缩编我们的军队是完全必要的。就是从今天整个国际形势及国内情

况看亦不必保留五百五十多万的部队。整编问题要使全体同志了解，缩编数目不是削弱国防力量，相反地有利于加强我们的国防建设和国防力量。要知道，在进行整编中有些人要复员，当前有一种舆论，“胜利了，我们吃不开了，不要我们了”。有的人稍有不如意和不舒服，怪话就来了。一百多万人复员，的确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此，在整编复员工作中要加强思想教育。这不是说，国防建设和人民解放军不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国防力量的增强，不仅是一个数目的问题，而且还包括着许多方面。具体的来讲，我们要现代化，仅是五百五十万的正规军，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及特种兵部队，现代化的国防建设与国防力量怎样去加强。故我们必须要缩小陆军数目，减少财政开支，加强空军、海军及其他兵种建设。并使我们的陆军能与空军、海军及特种兵部队保持适当比例。虽然，我们才开始建立空军、海军，数目很小，只有十几万人。但是，其经费开支是相当大的，而且需要长期建设与培养。因此，缩减陆军减少财政开支，增加其他军兵种经费开支，都是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建设与国防力量。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曾经讲过，因为我们要打台湾，敌人逼得我们要迅速建立空军、海军。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

另外，我们在进行复员工作时，对人不能够推出去了事，应该慎重处理。毛主席常常讲，要从各方面使得我们复员的人民解放军各得其所。比如资本家还向我们要求各得其所，我们以调整公私关系的方法来解决资本家的“所”字。故我们在复员一百多万人的时候，应本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负责到底，以各得其所的精神进行复员工作。不要简单认为是消极裁军，应该了解从国防前线转业到经济战线上去是为了从事经济建设。当然，一百多万人的复员，有的转业到其他部门，但绝大部分是转业到生产部门。我们必须从生产方面着眼，才能解决各得其所的问题。所以，在部队中进行教育的时候，对此应该着重说明。简单的裁军

思想是不对的。受过去那种裁军影响，更是不对的，它在人民印象中太坏了，我们应该分别开来。这是我关于部队整编工作中要讲的一点。

第二、 复员工作

现在中央已确定了组织各级复员委员会，中央确定周总理亲自负责处理这件事。毛主席曾经讲过：部队曾经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离开了部队以后，工作就转到地方；这个工作最复杂，最复杂的任务还在地方。所以，周总理亲自主持这件事情。现在中央复员委员会已经拟好了复员工作大纲和草案，准备在政务院通过，并以军事委员会主席、政务院总理名义颁布这个条例。我们各级委员会应遵照这个条例来办理复员工作。关于条例，我想不要在这里念了，我们大部分同志已经参加讨论并经过修改，待政务院通过后印发给大家。不过在这里，我想简单说一点。在复员工作中应该要注意两种偏向：第一种是完全从政治出发，把大批俘虏兵复员；第二种是完全从身体状况出发，把大批健壮俘虏留下，反而将老解放区参军的身体不好的老战士复员。这两种办法都不好。在复员中间，我们应该在部队中保持适当的成分比例，适当的调剂。因为我们部队解放战士[1]占着很大比例，特别是战斗部队，恐怕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现在情况变了，他们在政治上已经起了很大变化。解放战士大都是在长江以南过来的，并且绝大部分是没有经过土改的新区。西南也占着很大部分。如我的家乡四川，历来是出兵的地方，特别是蒋介石到西南，在四川疯狂抓丁，不管在东北、西北等地俘虏蒋介石的军队，西南人特别是四川人最多。这一批人要复员回去，暂时无法安排，这就是在我们部队中为什么要保持一定解放战士的原因之一。关于复员一部分老解放区的战士是必要的。现在华北地区劳动力很缺乏，同时，土改已完成了，回去以后就可以参加生产，所以复员回乡的老战士大家是很欢迎的。另外，老解放区的战士经过了长期的斗争考验，应该培

养一批成为我们干部的后备来源。至于，大家所谈的坚决要求留队不愿意复员的情况，我想这是必然会发生的，特别是老弱、长期在医院疗养的及一批老战士，把部队看成是他们的家。估计这有一个相当的数字，我们对他们不要勉强复员，这是由于数十年的战争才有这种情况。一方面对部队有了感情，一方面离开了部队，的确他们也无法生产，只有在部队帮助下才能安家立业，故我们应该适当的分配他们的工作。如大家所谈的做生产管理工作，看守仓库等等，我们不应该随便地裁减他们。毛主席关于复员老弱的老战士问题，一提起来就感到不安。在一九四二年，由延安复员一批老战士，经过西安一路骂街："革命胜利了，不要老子了"。毛主席发觉了这个问题，又将他们收回来。因为这一批人从土地革命起就参加了部队，由于二十多年来的战争拖累，才有身体衰弱的情况。这一批同志在部队生了根，以部队为家。因此，对这一批人应该慎重处理，而且，应该处理得很好。在复员中间政治部应很好地进行宣传教育，不要使走的人员寒心，留的人员不安心，使大家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复员。如果复员工作做得不好，宣传教育不够深入，会造成将来实行义务兵役制的障碍，征兵来源出现困难。过去由于战争环境对复员有的处理不够好，今天的复员工作，部队也好，地方也好，都要处理得很周到，使大家没有话讲。政治部的复员动员指示中还应加上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宣传内容，对于留队的人员要讲解清楚，不是辈子兵，现在在部队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将来实行征兵制还是要复员的，所谓"换班"，二年或三年一换。所以，这个宣传内容在部队不应该缺少。同时，在共同纲领上规定了这个问题。政治部动员教育要点中还要提出进行巩固部队的工作。使复员工作不要在部队中造成很大波动。你要回家，我也要回家。好了，大家把包袱背起来都回家吧。这样一来，谁去保卫祖国呢？所以在进行动员教育过程中，应该照顾到以上两方面。

关于复员工作条例，同志们走时可以带一份回去，按照条例进行工作。

第三、编制装备问题

将来的编制，要根据我们国家的经济条件、地理条件及我们的经验与现有装备条件来确定。首先对编制上的许多认识问题必须弄清楚，取得一致。要想一下子把编制搞得比较固定，或完全固定，或在相当时期内不动是不现实的。关于装备，要根据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来考虑，前面陈云同志讲过了。我国现在是恢复与建设阶段，特别是重工业还没有上路。虽然，东北有一些工业机器，但是，还不能满足需要，应该增加。兵器工业的生产方面，现在有不少问题急须等待解决，然而，在国家经济没有走上轨道以前，是不能单独来建设兵工工业的。我们的兵工生产工厂有的还在山沟里，交通很不方便。在过去，工厂地址愈偏僻愈好，敌人才不易来破坏。今天，这种状况很难存在。同时，过去由于战争的关系，生产的军火质量很差，今天严格来讲就不行了，要特别注意军工产品的质量。

我们有数百万军队，在过去武器弹药还可以从战场上缴获补充，现在仗不打了，缴不来，可是打靶还要打，不仅是为了打靶，万一国家有事，我们要有一定的弹药基数。其基数又如何规定？象淮海战役打了二十多个基数。是不是我们全国军队亦保有二十多个基数，包括各种弹药在内，需要很好研究。因此，关于弹药生产的种类与数量也是很难确定的。至于，今天弹药生产怎样进行？经过我们研究，在新式武器还不能制造的情况下，主要的是维持我们部队中主要武器的弹药供给，保持其一定的基数。因此，目前虽然国家经济困难，兵工生产条件差，还是要想办法保证需要，提高质量。

编制问题。目前搞编制除了要考虑解放台湾的需要，同时还要照顾到将来。正如朱总司令所说，我们随时准备应付帝国主义

挑起战争。毛主席也常常讲，我们有这么多的军队，若是长时期和平下去更好，一旦战争爆发，我们也不怕，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当然，和平我们是极力争取的，我们还签名拥护世界和平，反对原子战争。同时，我们刚刚取得胜利，和平愈长愈好，对我们更有利。但是，我们着眼点应从坏的方面打算，完全从好的方面设想是会吃亏的，过去我们曾吃过好的打算的亏。今天确定了我们的编制，一旦国家有事，就可以进行卫国战争。根据我们部队的具体情况和担负的任务，进行整编、复员力求少动，不要动得太宽，尽量不要影响剿匪与“攻台”任务。其次，要尽量保持军、师机构，其数目暂不确定，由毛主席决定。因为各个地区已经有了规定的数目，我们根据这个数目进行整编，对于原有番号尽量保持。

对起义部队的整编有两种形式：绥远、四川形式。前一种毛主席曾经确定，不但不整编而且补充一部分。为什么呢？如华北绥远部队，刚刚收拢来急需进行集中教育，彻底改造。改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将其拆散建制，分别编入我们部队内进行溶化；一种是抽一部分骨干编入起义部队，帮助他们改造。后一种是四川形式，四川是全国起义部队最多的地区，对其采取大量的整编与取消。上次，邓政委[2]来京的时候，就决定将起义部队统统编散。因此，我们对于全国起义部队就可以确定一下，采取按功分别待遇。一方面一视同仁，一方面有所不同，哪些取消，哪些暂时保留，哪些暂时须要补充，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对地方武装，这次华北整编以后，就没有地方武装了。在长江以南的少数地方武装，复员以后也就没有了。其留下的仅是质量、装备很差、数量极少的小部队，大家意见暂时维持现状，不编入国防军。其余部队统一编入国防军、公安部队。即是说现有的地方武装一部分编成公安部队；一部分编入地方公安师。上述部队，均有番号，一样编制，一样待遇，不分彼此。过去在待遇

上有些不同，地方军比野战军差些，而地方军今天剿匪非常辛苦，如果在待遇上不一样，是有点不大合理的。现在，一样编制，一样待遇，而只是任务不同。

关于全国陆军，编成国防军、公安部队或称内卫部队两种。根据大家意见，国防军统统整编起来，以师为单位，并保持军的指挥机构，其编制要比过去精干简单。兵团、野战军机构[3]取消，实际上均改为军区。有的兵团调来建立海军、空军司令部，其余兼省级军区。因此，整编后的军、师，统归各大军区直接指挥。或在某些情况下，军、师可配属省级军区，暂时归省级军区指挥。这里特别说明一下，除三野有“攻台”任务，要组织“攻台”部队编制外，一、二、四野战军均兼军区司令部，统率与指挥所属地区的武装部队。

第四、炮火配备问题（略）

第五、组建公安部队

公安部队十八万人，占全军四百万人数的百分之四点五。各地人数均已分配。由公安部根据十八万人，提出编制和配备方案，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进行调整。公安部队的要求，按罗部长[4]要求的水准，目前恐怕达不到，只能做到整师、整团建制部队拨给公安部。若是要求从部队抽出百分之八十的功臣、英雄等，等于削弱了正规师的战斗力，等于割去了人家身上的肉一样。因为大家是知道我们部队目前政治质量情况的。当然，公安部队政治条件要求应该高一点，但是根据大家所知道的情况只有慢慢地解决。把现有十八万人编成若干师，待明年后年部队整编的时候，公安部队可以复员一批，再吸收一批新的成分，逐渐地改善，逐渐提高公安部队质量，是比较妥当的。其次，军委成立公安指挥所，统一指挥全国公安部队，命名为公安司令部，或中央公安指挥部。我想，军委有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为了统一，称为公安司令部[5]较好。各大军区亦均建立这样的机构。上面所说的公安部队编

制是正规部队编制，属于军事系统。现在各地所有的公安部队，省、市、县、区公安武装，属于人民警察范围，在编制上已确定属于政府系统。特此说明一下。

第六、人民武装问题

大家一致意见，在军委机构内建立人民武装部，统一领导全国民兵工作与兵役工作，暂时不成立兵役机构。同时，在共同纲领上，亦曾提到组织民兵，怎样实施义务兵役制的问题。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过去国民党的所谓兵役制，实际上就是拉壮丁，给予人民印象太坏了。我们的兵役工作是从抗战时期的民兵工作开始的，现在需要改进一下，其原则是自愿性、半群众性、半武装性的民兵制，因此，现在我们应提出议案，交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后实行。以年龄说，十八岁至三十岁的男性公民统统编组民兵，成为规定的义务制民兵。以后我们要实行征兵制，这不是愿意不愿意，是法律上所规定的。若是说自愿性，半群众性，半武装性的，那好了，你自愿我不自愿，我要去生产，这样，谁来服兵役。国防军的兵源从何而来，谁来捍卫祖国。因此，实施国民兵役制在目前是很迫切的问题。我想，在三年内全国土改大体完成，老区、新区同样的加紧民兵工作，使之过渡到征兵制，解决国家兵源问题。同时，应着手进行义务兵役制的宣传教育。这个，共同纲领上也是有的。毛主席经常讲：我们不管谈什么问题，均应翻一翻这个文件，因为这是人民所规定的。同志们没有的话，我可以介绍一下，书店里有印制得很精致的小本子，大家可以买一本。现在我们国家不管决定什么问题，都要依照这个小本子办事，中央考虑什么问题也要依这小本子做根据。就拿资本家来说吧，他们就非常关心共同纲领，他们关心的是哪一条哪一句对他有利。譬如各得其所，他就要求我们，他们还没有“所”字呢？这样大家按照共同纲领办事，就没有话说了。人家既然会利用共同纲领，我们为什么不遵照实行呢？毛主席常常讲：人家为什么能够很好研

究，我们的干部就是死心眼儿不去研究。将来我们要进行考试，恐怕到那时，我们的干部就知道共同纲领上哪一条是怎样讲的了。

实行兵役制的依据就是共同纲领。在人民武装部成立以后，即应着手研究征兵制度怎样实行，如何区分现役、预备役、后备役，各役的训练及组成，这不仅是一个庞大的机构，而且是一部很大的、很有学问的兵役学，我们应该很好研究，取得经验，并把它贯彻到人民中间去。

第七、 各级司令部组织

对司令部机构大家要求上下一致，我想是可以的。有的部门可以进行局部调整。有的部门还须慢慢建立。至于大家所提出的分工要细一些，这是对的。但我想分工太细了也不大高明。我曾经与苏联同志谈过，他们的经验认为分工细好，但我们认为分工应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确定。说到军事学校管理部与军训部合并问题，我曾与朱总司令谈过，为了上下求得一致，暂时合起来。人民武装部建立以后，把训练工作再分一分。军务部我们原计划将其工作附属于作战部，大家意见作战部的工作太多了，要求把它划出来，现在我们确定成立一个部门，暂时不成立部，成立处或局，总之成立了一个独立部门易于进行工作，专管部队之队务工作。关于干部的升、遣、调、补等工作，划在干部部。在编制表上有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后勤部四大部，他们的关系问题，从我们历史上以及现在组织上的关系，捎带解释一下。政治部不变动，建立干部部。过去我们的干部工作，司令部与政治部各兼管了一部分，一个干部的调动，要绕几个圈子。因此，必须建立新的机构干部部，统一管理全军干部工作。它的工作内容是很多的，包括干部升、遣、调、补、军阶、抚恤等问题。特别是在战后复员之际，我们的干部，需要一个机关来管理，不要随便把数十年斗争得来的宝贵财产任意抛弃。因此，建立干部部是完全必要的。毛主席也赞同建立。它与司令部、政治部关系是密切的，同

时它应该直属于首长。后勤部，大家意见可隶属于司令部。我们研究了一下，也用不着，因为司令部是属于作战、教育、管理的系统。供给、卫生、后勤等又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同样属于首长领导，但又是在参谋长指导之下的。我们从有红军以来，就习惯了这样的关系，命令是首长下达，参谋长可以利用首长名义下达命令，也可用参谋长名义对这一部门的工作进行指导。这就是说参谋长与后勤部是指导关系，后勤部是在参谋长指导下进行工作的。因此，我们不要简单地认为编制表上四大部门并列写着，就好象没有关系了。我们要知道参谋长是首长助手，并非是象通信员那样转传报告，为此问题，毛主席曾要我通知各部门，凡是呈递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报告，首先送到参谋长那里。对于技术性的报告参谋长有权处理，直接解决，用不着呈报上去。一定须要经过毛主席、朱总司令批准或急事请示，参谋长应拟出方案，提供参考意见，减少首长处理问题的时间。至于批准与不批准，是另一回事。如果一切问题均由首长处理，那还要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干什么呢？因此，参谋长与各部门关系就很明确了。我们不要因编制表上四大部门并列，中间没有连着就认为是分了家，互不相关。这对历史并没有否定，所以在执行新编制的时候，思想上不要认为这是改变了我们历来形成的关系。

第八、操典、内务条令、纪律条令，这是军队走向正规化的重要内容（略）

第九、武器调整（略）

第十、全军统一

毛主席曾讲：过去分割的时期，在军事指导上军委方面是战略的，各地也不向军委要钞票、小米。至于当时的全国统一，只是在毛主席总的战略意图下的战略统一。因此，各区均在毛主席战略方针、战略意图指导下去各打各的。各个地区有自己的供给标准和发行的钞票等等。许多方面是不统一的。整个来说好象一

个联合国。现在全国统一了，假使不统一，每一个问题，每一个步骤不一致，就影响了全局。过去常常顾虑，提出统一是否太早了，有什么妨碍？现在全军上下已经一致，我们感觉再不统一，事情就很难办，工作不易开展，形势发展亦要求我们统一。凡是关于命令、制度、条令都须要统一，不管今天规定的在实施中有何缺点，在最短时期，除非有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情况而外，均不要去修改它。若要修改，就象今天的会议，大家讨论，大家认为要修改了，经过毛主席批准，批准了就修改。过去我们有一个毛病，今天大家讨论意见一致，经过毛主席批准，颁发遵照实行。过了几天，那个地区根据自己的情况又要增加几条，要求批准，毛主席看了，不批准吧又有理由，只得照准。过了几天，这个地区编制上又有点变动，又只好同意，等等。这样，过了数月后你这样他那样又变成不统一了，完全变了。去年在西柏坡想统一全军编制，其结果仍是各不相同的编制，各有千秋。今天，我们有条件来统一我们的编制了。大家讨论后确定的编制，希望不要随便修改。今后，凡是经军事委员会所颁布的编制等，不要随便提议修改，要知道，提出意见若是不同意，好象又有理由，若是同意就得改，要懂得仅仅几个人的事情好办，涉及数百万军队的事情就不大好办。因此，希望大家在思想上要明确，已经定了的事情，不能说不能改，要改也要有个程序，需要经过批准。这次会议大家所讨论的编制、条令等等，待军事委员会批准颁发执行。我想这次各项原则都定了，大家也同意了，可能在执行中还会遇到问题，可能有不习惯的地方，还是要求大家认真贯彻执行。

今天，我就讲这么几点。

注　释

〔1〕解放战士，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经过教育，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士兵。

〔2〕邓政委，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3〕兵团、野战军，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及其下属辖几个军级单位的兵团指挥机构。

〔4〕罗部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

〔5〕公安司令部，是根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二日命令于十一月八日在北京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领导机构。以第二十兵团的部分人员为基础，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八日，按照国防部命令，公安部队改名为公安军。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公安军番号撤销。

在人民政协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军事报告*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六日）

共同纲领给人民解放军规定了伟大的任务，这些任务是：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解放中国全部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并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基础之上加强国家武装力量的建设，保卫地方秩序，镇压反革命，巩固国防。我今天所要报告的，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八个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残余匪军及执行几项重要任务的大概情形。

过去八个月中，人民解放军经过在大陆和近海岛屿的作战，解放了除西藏、台湾、金门岛及其他少数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粉碎了敌人的海上封锁。战争的发展是迅速的。蒋介石匪帮的军事机器，已经腐烂，一遇人民解放军的进击，便立即粉碎。当去年十月中央政府刚成立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仍控制着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诸省的全部或大部，陕西、湖南、湖北各一部，并保持着白崇禧[1]、胡宗南[2]两股主力。但是为时不过三个月，号称精锐的白、胡两股匪军就被歼灭，上述广大地区就被我军占领，蒋匪企图利用西南地区负隅抵抗的幻梦破灭了。人民解放军在没有海空军配合的情况之下，完成了渡海作战的任务，解放了海南岛，从而使舟山群岛的匪军慑于被歼，逃往台湾。在这

* 这篇报告，事前经毛泽东主席审查修正。

个时期内，原在对方的许多爱国军人率部起义，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这对于迅速地瓦解敌军及较好地维持地方秩序，是起了作用的。

在过去八个月中，人民解放军又和转化为土匪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战，在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各地剿灭了土匪部队数十万人。

上述八个月作战，计歼敌正规军八十八万余人，非正规军及土匪五十八万余人，共计一百四十六万余人。若从去年四月二十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之日算起，至今年五月为止，则歼敌数为正规军一百八十三万人，非正规军及土匪九十八万人，共计二百八十一万人。

以上是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情形。

人民解放军现正执行下列诸项任务：

第一，准备进军台湾、西藏，解放全部国土

我人民解放军是由高度的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所武装着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解放全部国土，统一全中国，是人民的意志，也就是人民解放军的意志。祖国的旗帜，必须插到西藏、台湾、金门岛、澎湖列岛、万山群岛、南沙群岛等一切国土上去，必须巩固祖国的全部国防。因此，人民解放军还有重大的战斗任务，必须本着毛主席的指示，戒骄戒躁，发扬英勇奋斗、不怕艰难困苦的传统作风，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克服一切可能遇到的困难，再接再励，以竟全功。

第二，消灭残余土匪，安定地方秩序

过去八个月中，人民解放军和转化为土匪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战有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没有剿灭干净，现在西南、中南、华东及西北各区还有土匪四十余万人，散在各偏僻地区，为害人民。人民解放军必须继续剿灭这些土匪，并将此看做当前的重大任务之一。为达此目的，人民解放军的各个分散剿匪的部队必须执行

毛主席的“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指示，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和人民政府领导的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根绝土匪依托的封建势力，最后地消灭一切土匪，安定社会秩序。

第三，参加生产建设工作

人民解放军在抗日时期，曾经参加过劳动生产，借以渡过极困难的年月，战胜了敌人。现在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除担负作战任务的部队外，都以一部分时间参加了当地可能的生产，借以改善部队生活，增加社会财富，帮助国家的建设。西北方面的人民解放军，在新疆已开垦土地六十六万余亩，完成巴楚洪海水库，迪化[3]和平渠、新盛渠、太平渠、皇渠等水利工程，可灌田一百二十一万亩。在陕西已开垦四十五万余亩，在宁夏已开垦十二万亩，在青海已开垦四万余亩。在甘肃的人民解放军则参加山丹、古浪、临泽、武威等处的水利建设工程，并担任建设陇海路天宝段（天水至宝鸡）及天兰段（天水至兰州）的工程。在东北的人民解放军已垦修水旱地六十五万余亩。在华北的人民解放军已开水旱地二十一万余亩（绥远尚未统计），组织了几十个农场，并参加永定河、海河、滦河、滹沱河、子牙河、桑干河等二十三条河流的挖河、复堤、开渠、筑坝工程。华东、中南、西南三区还没有详细的报告来。这三区荒地较少，军队垦荒不多，但种菜养猪等工作则已在普遍地进行。西南区的人民解放军因剿匪还是严重任务，其生产任务今年尚不能过多。

第四，加强教育工作，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

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有了高度的政治觉悟，成为中国人民中的优秀部分，他们现在除总结战争经验，提高军事艺术的修养和提高政治水平而外，还必须使自己的文化水平普遍地提高一步。这就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将军队看成为大学校的指示，将全体指战员组织到学习文化的热潮中去。我们计划在三年之内，消灭部队中的文盲和半文盲，使全

体战士达到高小毕业的程度。并在军队中设立中等程度的文化学校，抽调干部入学，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准。同时为了加强各兵种的建设，应设各种专科学校，培养各兵种的干部，特别是空军和海军的干部。

第五，整编和复员工作

人民解放军现已达五百五十余万的庞大数目。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条件之下，准备在今年下半年将全军加以初步整编，复员一百五十余万，保留四百万。整编和复员工作是一个必须用严肃态度去做的工作。应组织各级复员委员会，在中央领导之下，要妥善地处理复员军人，实施复员教育，发给生产补助金直至还乡就业诸项问题。要在军队中与人民中普遍进行发扬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的教育和服兵役为人民尽义务的教育，使复员军人回乡之后能成为当地民兵的骨干，加强民兵的建设与训练，使之成为义务兵役制的基础。复员军人曾经光荣地参加了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地方人民政府和当地人民群众必须对复员军人，采取热烈欢迎的态度，使每人都能就业，不使流离失所。

中国革命已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处在历史的新时期。我们的军事任务，较之过去时期是不同了。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将人民解放军提高一步，发展空军、海军和其他技术兵种的建设，以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行为，有效地保卫国家的独立，巩固国际的和平事业。为此目的，人民解放军的各部分，包括起义部队在内，必须巩固地团结起来。全军必须维持良好的纪律，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全军应在今年复员工作做好之后，从冬季开始，来一次从上至下的整风运动，克服一切不良现象。必须教导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不要骄傲自满，不要以功臣自居，不要看不起起义部队和地方部队，而要谦虚谨慎，耐劳耐苦，对敌人很勇敢，对同志对人民则很和气，借以团结全军全民完成自己光荣伟大的任

务。

我要向此次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作的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就是这些，请诸位予以指教。

注　释

〔1〕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2〕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川陕甘绥靖公署主任。

〔3〕迪化，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关于军队整编复员工作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这里开全国民政会议，谢部长[1]让我把部队整编复员工作谈一下。这一工作军委和政务院已颁布了决定，中央复员委员会也发了关于复员工作的指示，我想大家可能都看过，或者有的同志在来时对这个工作已作了布置，这个问题不是新的。因此，今天我不谈许多，只提出几个问题来和大家研究，有些问题也许大家比我感受更深刻。在讨论中，希望大家提出更多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提交中央复员委员会作出补充指示，这对整个复员工作是有很大好处的。

一、关于部队整编复员

这个问题，军委作过讨论，也开过参谋会议，研究过部队进行整编复员工作，并作出了决定。为什么要有这样措施呢？因为整个大陆上的武装敌人基本上已被消灭，随着军事上的胜利，我们的部队象通货膨涨似的也逐渐膨胀起来，大西南解放时部队总数已超过五百七十万，除去一部分已资遣返乡[2]，现在还有五百五十万，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根据目前形势，消灭残敌和肃清土匪，用不着这么多的部队。即从整个国防上来讲，中国这样大的国家，要用相当多军队，但也用不了这么多。另外这些军队成员中好多是起义和俘虏过来的，是根据毛主席指示包下来的。为了

---

* 这是聂荣臻在全国民政会议上的报告。

提高部队质量也必须加以整编。目前的整编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过渡措施，因为国防工业尚未很好发展，我们还不能作出一个定型的编制。根据目前的情况，这次整编复员虽是过渡的却是必要的。计划将部队减少到四百万人，这样就须复员一百五十万人，这是个庞大的数字。这不是说军事胜利了，这一批人就不要了，也不是说胜利了要削弱我们的武装力量，相反正是为了加强我们的武装力量，是为了建设整个国防军与公安部队。我们的部队很多是从游击战争中发展起来的，主要是陆军，今天要建设正规的国防部队，除陆军外还必须要有强大的海军、空军。建设海、空军要用很多钱。因此不能不减少一部分陆军来建设我们的海军和空军，使陆、海、空军有适当比例。也只有我们有了强大的陆、海、空三军才能真正巩固国防。

二、对整编复员应有的认识

同志们知道，国家财政开支是很大的，整个部队几百万人的开支占很大数字。毛主席讲财政经济好转的三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便是“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缩减一部分人员，对减少开支，恢复与发展生产是很重要的。同时也只有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才能谈到加强国防军的建设。因此，这次复员意义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无论从加强国防上还是发展生产上，都是正确和必须的。现在西藏、台湾还残存少数敌人，西南、华东还有一些土匪，但我们所留下的部队，并不妨碍我们解放国土与肃清残匪的任务。可以这样说，假若今年和明年，国际情况没有大的变化，还要继续安排复员，在两三年后这几百万中的大多数人都要复员的，因为我们不能使大家当“辈子兵”。这样没有兵怎么办呢？这就需要动员入伍。安排复员、动员入伍，安排复员，这将是今后国家的经常工作。共同纲领上规定，今后要实行义务兵役制。为什么现在还不这样作呢？因为我们刚刚胜利，好多地方是新区，封建势力没有肃清，基层政权尚不巩固，只有在全国范

围内完成了土地改革，随着地主阶级的消灭，乡村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手里，才能够实行。

国民党的征兵制，实际只是“抓壮丁”，在群众中留下极坏的影响。如果我们今天提出征兵，新区人民是非常害怕的，这必须采取过渡办法。如在老区的民兵制，新区可在反霸、减租、土改过程中组织民兵加以训练，以便在这个基础上逐渐过渡到正规的义务兵役制。这准备要在两三年后实现，要配合土改来进行。义务兵役制实行以后，复员工作就不会象今天这样费劲了。

在今天讲，复员工作是一个繁重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复员，这还是第一次。过去虽曾进行过复员，但那基本上是精兵简政，是局部的，各区有各区的方案。整个说来，工作做得不够好，复员人员不满意。宣传教育、安置生产、建立家务，都没有搞得很好。这次我们必须把安置工作搞好，使每一个复员军人各得其所。这次从中央到地方都来搞这个工作，要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丝毫不能马虎，这里一方面是军人和部队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必须说明，不但这次复员，以后还有复员，如做不好，就影响社会安定。不久以前，在河北遵化对残废军人问题处理不当，结果使荣誉退伍军人和地方对立起来，一直到现在还未很好解决。如果复员工作搞不好，就会发生很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乡村，若组织不纯，秩序不好，几百万人放在乡村中，发生不团结，生活不安定，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这是关系几百万人的事，必须负责来搞。另外部队和地方的关系，也不会团结。即在地方基层组织中，同样也会造成不团结的现象，同时也将影响到今后的动员工作。假使几百万人都对我们不满，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会使青壮年将来对服兵役寒心，会影响到国防部队的巩固与国防军的建设。

这个工作是麻烦的，这是历史给我们的麻烦。这个任务我们必须担负起来，不但不应怕麻烦，而是应该解决这个麻烦，否则

麻烦将更大，这是几百万人的群众性的问题，我们必须努力把这个工作搞好。

三、复员工作是军队和政府共同负责的工作

复员工作是要军队、政府和地方团体共同负责的。不过地方上的麻烦要多一些，军队麻烦不过一个月，主要还是要地方负责，当然部队也不能推出了之。这次复员军人决定由部队集中训练一个月，本来部队是靠平时的教育，但在这个问题上突击一下，也会解决些思想问题的。对于复员军人的教育，我们提出了复员军人的四项守则，即：

（一）保持革命军人光荣，争当劳动人民模范。

（二）爱祖国，爱人民，遵守政府法令，爱护公共财产。

（三）勤劳生产，节约互助。

（四）不骄傲，不居功，虚心向群众学习，遇事和大家商量。

真能都作到这四条，就好了，但不一定一个月都做得好，可是在思想上有所准备，是会减少地方上若干困难的。

地方上做些什么工作呢？我想首先应给复员军人以精神上安慰，热情地欢迎一番。动员时敲锣打鼓，欢送出来，复员时打垮敌人回来更应欢迎。在宣传教育上要实事求是，不要说空话。如有的明知办不到，但为了自己工作的方便，却对复员军人说，你们回去，什么都不成问题，甚至对没有老婆的说，“老婆也早给你们准备好了”，实际上不但没有给准备好，相反自己原有的老婆也没有了。政治宣传，不要有丝毫欺骗，更不要开空头支票，能做到的便讲，不能做到的就不要讲。华北出来人很多，约有一百多万人，军属哪一个村都有，甚至有的村子家家都是军属，在照顾上是有困难的。特别是老婆问题，是相当普遍的，革命军人走了，老婆守了一年、二年、三年，但由于战争的持续，和音信的隔绝，就丧失了坚持的信心，或认为是牺牲了，于是又嫁了人。这种情形估计不在少数，为这个问题也最易闹出纠纷。如最近东北一个

战士回家后，因为老婆改嫁，一枪把她打死了，政府要依法处理，结果引起全体在乡军人的反对。对待这种问题，地方政府应强调主观上照顾得不够，要进行检讨，要作自我批评，争取主动，把工作做在前面。部队在这方面也应进行思想教育，说明老婆可能改嫁，可能偷人的道理，使其打通思想，不要因此而难过，这样双方都作准备，问题就容易处理或少发生些纠纷。总之，军属的问题是复杂的，要告诉下面有所准备，不然会闹出乱子。部队生活虽说苦，但它是有规律的，吃饭有管理员，生活水准比农民高。一旦回去，什么也要亲自来搞，虽然我们给他们些路费和生产补助粮，但那是很少的。国家财政经济很困难，就需要乡村作具体的帮助，否则，生活困难，吃喝没有，就会影响情绪，不是灰心丧气，骂大街，就是沦入歧途。这不是说我们要把饭也给他们做好，而是要想法安置他们，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根据过去的经验，是可以解决的，特别是在老区，一个村里不过回去十多个人，也不都有困难。农村有这么多年的工作基础，多少困难都克服过，只要各级政府经常主动检查是会做好的。

四、各种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

部队成员，在全国范围内各个地区都有，不同地区应有不同的办法。如有的地区灾荒严重，有些新解放的地区还有土匪，社会秩序不安定，有些解放战士觉悟程度不高，平时表现不好，这些暂时都可以不复员，以减少地方负担。在老区有些解放战士没分到土地，无家可归，也可以暂时不复员。在西北地广人稀的地方，可把全部复员军人组织起来，集体转到生产战线上去，把复员经费，转成生产经费，东北也准备这样做。今天我们的困难是条件不许可我们把几百万人完全集体转业，大部分还是分散回乡去生产。过去开垦是失败的，因为他是大资本家大地主的经营方式。移民也是失败的，政府未用很大财政与技术支持。现在我们采取集体转业形式，用很好的干部带去，开垦、移民同时进行，是

能够实现这个计划的。这是相当大的问题，也只能在东北、西北地区来做。有些地方采取解放军的组织形式与管理方法，是可以办到的，并已获得了良好的成绩。

所谓复员军人，都是参加军队取得军籍的，资遣的俘虏不属复员范围，干部原则上不复员。这次复员人员在成分上有翻身农民，解放战士，个别干部，起义部队，老弱的也有，青壮年家庭缺乏劳动力需要照顾的等等，成分既然不同，政治觉悟程度也不同。因此我们必须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予以适当的安置。总之，不论其成分如何，都应一视同仁，使他们各得其所，不应有所歧视，要团结他们，教育他们，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人民解放军中解放战士有的占百分之三十，甚至有的占百分之八十，这要靠我们的教育，不能强调成分歧视人家，在我们的教育下他们有的进步很快。因此，复员后，同样要团结教育他们，成为模范公民与生产战线上的骨干。

对复员军人，不只形式上给以安慰，要吸收他们当中好的做村干部工作，有不少战士觉悟程度高，眼界宽，知识丰富，吸收他们当中一部分参加村里工作，可以与复员军人互通讯息，这对地方工作是有好处的。

这次复员工作是在统一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与全军范围内进行的，一切都要统一规定，即使具体的问题也要统一，倘稍不慎，工作就会受到很大损失。

这里只是简单的提出几个问题，既不原则，更不具体，希望各地区同志们讨论后提出意见。

注　释

〔1〕谢部长，即谢觉哉（一八八三——一九七一），湖南省宁乡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任政务院内务部部长，主管民政工作。

〔2〕资遣返乡，指在解放战争中被我军俘虏或投诚起义的原国民党军官

兵，愿意还乡生产或另谋生路的，我军发给路费和部分生活费，并开具证明，遣返家乡。

动员部队老战士补充志愿军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为了使抗美援朝志愿军部队取得迅速有效的补充，以保障战斗力。根据彭德怀、邓华、韩先楚、宋时轮、高岗[1]等同志意见和你[2]的指示，拟从未参战的关内国防军与公安部队中，用动员志愿军赴朝参战自动报名方式，抽调一批有作战经验的老战士前往朝鲜补充志愿军部队。这样，不但可以使志愿军得到有效的补充，而且可以在部队中作一次有力地抗美援朝的政治动员，以提高部队战斗意志。同时每军动员人数仅占十六分之一，数目不大，各地又正在动员新兵，补充甚为容易。

兹将《军委对补充志愿军兵员决定草案》和军委总政治部动员指示一并送上，是否可行，请审核批示。

注　释

〔1〕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当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韩先楚，当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宋时轮，当时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你，指毛泽东主席。

---

* 这是聂荣臻十一月二十六日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毛泽东主席十二月二十七日批示："同意，即发。略有修改，请周（恩来）再酌。"

复部队补充改装诸问题*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二十六日电悉，所询各节兹答如下：

一、杨得志兵团[1]奉毛主席示，暂时仍位于现地区整补，已决定由东北新兵中调二万人补充该部，并决定从苏联订购之步兵武器中拨一部予以全部改装，明年一月可补充改装完毕，加紧训练，待命出发。

二、傅作义部已决定改编为二十三兵团[2]，正由绥远调往冀中衡水县地区整训，不与杨得志部合并。

三、空司[3]已派一小组到朝鲜调查机场情形，并曾约朝方航空局长来北京商谈在朝空军使用诸问题，除前电告我军和友军空军情况外，空司正与专家商讨组织机构赴朝的各种技术问题，待确定后再告。

四、此外决定由关内各正规师中，分两期征调有半年军龄以上的老兵七万余人，并规定其中至少要有百分之五十以上为参加过一次以上战斗者，官兵及民工共十万余人，组织三十二个补充团、八个独立营，分期补充志愿军。第一期四万余人规定在二月十日前在各地集中待命调动，大约二月底三月初可开到三八线及咸兴地区补充各军。

---

* 这是聂荣臻给彭德怀并东北军区司令部的一份电报。此电发前经毛泽东主席审查修改。

注 释

〔1〕杨得志兵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

〔2〕二十三兵团，即绥远起义的董其武部队，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组成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董其武、政治委员高克林。

〔3〕空司，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

在东北军区第一届后勤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日）

参加后勤会议，听了汇报，得了很多经验，解决了很多问题。现在只简单讲几句。

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与我们全体后勤人员，与东北党政军民的支援分不开的。但对后勤工作有很多意见，周纯全[1]同志给北京的报告指出：志愿军在朝鲜，“英勇极了，辛苦极了”。这话很对，打仗英勇，供应困难。今天对志愿军的支援供应是依靠全国的力量，但成为前方最有力的支援的还是东北。部队对东北无意见。主要是出兵仓促，准备很差。去年上半年还没有准备打这一仗。第十三兵团是调来增强边防的，第九兵团未准备用，第五十军、第六十六军根本未准备调来，结果一下都用上了。虽然东北准备了很多物资，但运输工具既少又不好，又有飞机轰炸，运不上去，仗虽然打胜了，但部队很苦。第九兵团反映：“我们打无准备的仗。”但战士们又认识到了，如果我们不打，敌人便打到鸭绿江边来了。毛主席说：“九兵团能在这种情况下作战，以后我们便能在任何情况下作战。”

后勤的同志绝大部分是积极负责的，但我们缺乏准备，人力不足，全国大陆解放后，很多后勤干部调到政府财经部门工作。新干部无经验，老干部的经验也难以适应新情况与新要求。今天首先是出国作战，过去每个村庄都有我们的仓库，每个老百姓都是我们的后勤工作人员。而今天则不然，言语不通，交通不便，困

难很多。

会议总结了经验，具体地解决了不少问题，今后工作一定会好些，但仍有很多困难。我们要准备克服这些困难，以完成任务，在克服困难中取得经验，把后勤工作提高一步。我们研究了很多具体问题，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

对后勤的认识与对工作上的整风问题。后勤干部是有些包袱的，看不起后勤，也有些人有个人英雄主义，但战争要胜利，必须各种组织配合。拿破仑的时代过去了，即使是拿破仑，也是由于后勤未搞好而吃了败仗。我们“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的时代也过去了。我们在朝鲜打败美帝，不但是小米加步枪，还要加很多东西。因此，我们的后勤，也要加很多东西，将来联合兵种作战，我们的后勤便是联合后勤，后勤将随部队的进步而加重负担。计划性组织性要加强，没有计划、没有组织是不行的，统帅下了决心，司令部下命令，后勤要制订物资保证计划，才能打胜仗。后勤与司令机关必须有密切联系，征求意见，了解情况，才能使后勤工作不掉队。

朝鲜我军装备很复杂，口径也复杂，步兵、联合兵种，日式、美式、苏式都有，后勤供应困难。第十九兵团来后，可将苏式枪换给他们。其他兵团没有时间换枪，要求各军以师为单位适当调整，以利于子弹供应。部队调整后，后勤要清楚地了解哪个部队用什么式的枪械，什么口径，尤其军械部要心中有数。

前面又发生新情况，敌人企图夺取汉江以南桥头堡。另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谈判，敌人想借谈判多占地方。我们已经布置下去了，要打击他们，他们要地盘，我们也要在和谈中多要点地盘。因此，后勤工作同志要布置得充实些。我想同志们一定能胜利完成任务。

注　释

〔1〕周纯全，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政治委员，司令员由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

采取措施迅速恢复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战斗力*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三日）

为了迅速而有效地恢复三兵团及十九兵团的战斗力，拟采取如下办法：

一、将三兵团之六十军现余兵员分拨给该兵团之十二军及十五军，所余六十军的各级机构即开回关内接补新兵，重新组成。

二、将现由西南调至华北待命之十一军于六月底开赴朝鲜，编入三兵团序列，顶补六十军的缺额。

三、将十九兵团现有的三个军，缩编成两个军，而将另一个军之各级机构开回华北，重新接补新兵训练。同时，即将由西南调至华北之十六军（该军原为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初期，由杨得志任纵队司令员之冀鲁豫第一纵队）开赴朝鲜，编入十九兵团序列。至于三兵团之十二、十五及十九兵团之另两个军尚不足额之兵员，可由西南调赴东北之四个补训师中补足之，采取这种办法，对增强两个兵团的战斗力最为有效。是否可行，请示，以便遵办。

---

* 这是聂荣臻鉴于第三、第十九兵团在赴朝作战中消耗大，于六月十三日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建议采取措施加强该两兵团的战斗力。毛泽东六月十四日批示："照办。望加速进行，争取六月底调配完毕。"

关于第二十三兵团情况和入朝部署的报告*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现将二十三兵团的几个问题报告如下：

一、该兵团自接到军委命令准备入朝执行任务后，部队中已进行了动员教育，士气很好。现该兵团出发所需补充之武器、弹药、被服、工作器具、通信器材、医药器材等均已按照编制予以补充完毕。运输工具除决定补给小吉普车十五辆外，卡车、大车、手推车因总后勤部现无存车，只好留待以后再说（担任修建机场任务尚无大影响）。

二、该兵团人数原根据军务局与华北军区计算应为四万五千人，但现在实有四万零三百二十二人，其中除伤病员及学员外，实际能够出发入朝担任任务者仅三万六千零六十九人，因此平均每个机场即无法保证有一万个劳动力，估计在八千人左右。

三、根据该兵团情况及机场修建在时间上的要求，拟令其九月三日出发，因机场地址现仅选定二处（泰川、院里）。故拟令三十七军军部率两个师进至泰川担任该地机场修建任务（该军较强，泰川也较重要，故先作重点修建）；兵团部率三十六军两个师拟经

---

* 这是聂荣臻写给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副主席的报告。周恩来八月三十日批示："拟予同意，请主席批示。"毛泽东八月三十日批示："退聂，照办。"

辑安、熙川直运院里，担任该地机场之修建任务。若第三个机场选定时，可由院里抽出三十六军军部率一个师去担任。

四、该兵团副司令边章五同志因身体不好，不能入朝，为加强兵团的领导，拟以姚喆同志兼任兵团副司令员（绥远军区副司令职务仍保留）到朝鲜去，董其武亦有此要求。若主席同意即请军委下令（华北局及一波同志已同意），（周注：前次已面报，故聂、薄已电姚喆来京）。

五、已电该兵团师以上干部，于八月三十一日到京开会，并给予欢送，以资鼓励（周注：已告聂、薄约傅作义同往讲话）。

以上各项是否妥当请批示。

朝鲜战场运输工作现状及我之对策*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兹将吕正操[1]同志参加东北运输会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朝鲜铁路自七月山洪暴发，敌机集中轰炸以来，情况极端严重，断时多，通时少。敌机轰炸重点：郭山、定州、云田洞间，新安州、鱼波间及价川、顺川间，沿线弹坑累累，运行速度降至每小时五至十公里。成为铁路的咽喉地段，电话经常不通，只能用人引导行车，空、重车皮积压五千余节，形成堵塞，运输效能极其低下，与日益增加的运输任务极不相称。因此就发生了以下情形：

（一）前方物资供应不上，影响作战，而铁路部队、员工昼夜抢修，修好又炸，炸后又修，仍不能通车，病员增多。

（二）全国铁路已供应车辆百分之二十，其中棚车占百分之六十。因此，必须催促前方回送空车，而前方同志亦急于回送空车，以便疏通线路。但因通车时间少，而通车时又必须抓紧抢运急需物资，致使前方车辆愈压愈多，既增加前方线路的堵塞，又增加国内运输的困难。

（三）中朝铁路领导机关，虽已组成联合军事管理局，但因后勤机关尚未统一，中朝双方局长仍各自接受其直属上级的命令，一

---

* 这是聂荣臻在听取吕正操汇报东北运输会议情况后写给彭德怀的报告。

旦通车，各自按上级命令争先抢运，以至产生矛盾，影响运输效能。

以上是九月上半月以前的运输基本情况。由此可以判断敌人对我方铁路轰炸是一种战略行动。而我们的铁路运输工作，还缺乏反轰炸的经验，因此感到缺乏对策。

二、 保障前方用到十二月底的运输物资有粮食、全部冬服、汽油、弹药、杂品及空军、炮兵、坦克和供给朝鲜人民军的物资，及铁路器材等。这样，在九月下半月至十月底共需要长途运输一万二千车皮（修机场物资尚不在内）。按铁路运输能力，即在最好情况下，一个半月仅能运输六千个车皮。周总理指示，特种兵装备缓运，减少弹药杂品，主要保证粮食及被服、汽油，总车数尽可能缩减至七千个车皮。根据这一指示精神，经运输会议反复讨论，采取车辆增载十分之一，改善包装及使用大型车辆等办法，亦需要七千五百个车皮。

三、为了反对敌人轰炸，力争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我们拟定了以下对策：

（一）加强对敌斗争。请求军委及志司增加高射炮火，配备在咽喉地段，对付低空轰炸之敌机（米格式飞机只能在高空作战），并严密搜查特务，打破敌人空、地联系。总结在轰炸情况下的行车经验，提高员工斗志。

（二）充实抢修力量。于九月十五日将五个新兵团开赴前方，重点配备在咽喉地段，预定九月二十日修复全部大桥，九月下半月整理全部线路，增加站线，提高行车速度十至十五公里。修复通信线路，增加迂回通信线路。保证铁路线路三分之二夜间能够通车。

（三） 统一运输指挥。凡是前运紧急物资，均由联合司令部统一下达命令。为此建议组织联勤，以便统一调配运输物资，节省运输力。关于此事当由周总理另电金首相[2]商办。

（四）开辟球场至德川公路线，利用汽车倒运，每夜可倒运危险品十至十五列车。开通东线沿海铁路，经派人调查，东线线路尚可利用，已有粮车运到咸兴，但需由我铁道部调干部一百名，供两个管理局分配。另抽一千或二千人组成抢修部队及至少一个团的警卫部队执行保障任务。

（五） 改善装载办法。经在现场检查由于打包松弛，装载不好，押运人员多，至少浪费车皮百分之三十，而体重物资亦不满载。决定今后体重物资一律增载十分之一，轻浮物资一律按统一标准打包、装箱，尺码、重量必须一致。建议后勤按规定派人监视装车，军运机关负责检查，并决定由东北军区后勤及铁路军运机关联合组成检查组，严格检查，如果能彻底改善装载办法，则可节省极大的运输力，必须引起后勤机关及军运机关十分注意。

（六） 就地取材。如木材、石块、煤炭等（如取暖煤，机车煤亦可混合使用），建议在朝鲜指定地区，组织人力开采，就地使用，以节省运输力。

（七） 搞好军运机关与铁道部门关系。专门开一次会，双方提出意见，进行自我批评，建立会议制度互通情报，以保证顺利完成运输计划。

四、根据上述决定和意见，立即由刘居英[3]同志回朝布置，动员全体员工战胜轰炸，打破敌人企图，努力完成这一紧急任务。

上述各项意见，是否有当，请考虑予以指示。

注　释

〔1〕吕正操，当时任铁道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

〔2〕金首相，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

〔3〕刘居英，当时任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副司令员兼车管总局局长。

从朝鲜战场抽调三十万部队到东北整训的方案*

（一九五一年十月九日）

从朝鲜战场抽调部队及机关勤务人员到东北地区整训待机，以减少朝鲜前线供应需要量与运输之间的矛盾问题，遵照毛主席指示，今日曾召集邓华、陈锡联[1]、李涛[2]等同志进行了具体地研究，大家除了完全拥护毛主席的决心外，特提出执行方案如下：

一、根据朝鲜战场作战的需要，拟留八个军担负正面作战，其中以六个军担任第一线作战任务，以两个军作为机动部队。东西海岸各以两个军担任东海岸元山至咸兴地区、西海岸海州至安州地区防敌可能登陆的作战任务。另以一个军位于球场地区，作为策应东西海岸作战的机动力量。定州至新义州段，则仍以五十军担任海防任务。这样朝鲜战场上不管敌人从正面进攻或从侧后登陆均无大危险。

（一）正面的八个军，拟以十九兵团三个军（六十三军、六十四军、六十五军），四十七军、四十二军、二十六军，二十兵团两个军（六十七军、六十八军）担任。三兵团三个军（十二军、十五军、六十军）调回东北。

---

* 这是聂荣臻写给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周恩来十月十日批示："此方案可予同意，请主席批示。"毛泽东十月十一日批示："同意，退周办。"

（二）东线海防仍以九兵团之二十军、二十七军及十六军之四十七师担任之（该兵团虽较疲劳，本应抽回东北整训，但因该兵团对元山、咸兴地区地形较熟，加之作战经验较三兵团多，故放在东线可减少顾虑）。

（三）西线海防。三十八军、四十军均位现地不动，若十一月份敌仍未登陆，则三十八军除留一个师在肃川、顺川地区担任机场掩护任务外，主力两个师可北移南市、泰川地区，这样在减轻运输困难上，是有好处的。

（四）三十九军移至球场地区，准备随时策应东西海岸的作战（德川地区因增加运输困难，故放在球场）。

（五）五十军除一个师仍担任后勤的掩护任务外，主力集结到定州至新义州之间地区。

（六）二十三兵团在修机场任务完成后，调回东北整训（本月二十五日，即可完成土方任务，预计十一月中旬即可调回）。

（七）志愿军后勤部队的机关及部队人数现已达十五万余人（若加上准备回国之民工人数则达十八万人），在部队减少与实行精简编制的情况下，可以减少到十万人左右。

（八）以每个军为单位，从机关部队中抽调二千人到东北训练，以备与前方的干部轮换。兵团部则再次精简，以减少供应之困难。

（九）炮兵、坦克部队的徒手单位，均抽调回国装备训练。

（十）在部队减少的情况下，拟将部队炮火予以加强，为此拟令火箭炮二〇九团，榴弹炮二十一团，野炮四十八团及三个独立营，共约七千人，调到朝鲜参战。其中除野炮团拟配给十九兵团外，其他炮团则留志愿军司令部作机动。

二、根据上述方案共可抽回东北之人数为二十六万五千人。若加上三十九军、三十八军北移清川江及其以北地区，对减少运输困难上，可等于抽一个军到东北地区，因此虽然抽回到东北的部

队与机关人员为二十六万多人，但加上朝鲜境内的调整，故在减轻运输的困难上，可相当于抽调三十万人回东北。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批示，以便再电商彭司令员与布置执行。

注 释

〔1〕陈锡联，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

〔2〕李涛，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部部长，后任政治委员。

组成工程与屯垦部队方案的报告*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日）

关于各种工程和屯垦部队的调拨与建设问题，根据毛主席十二月三十日批示的精神与周副主席一月一日在财经后勤部长联席会议上的布置和指示，特又召集粟裕、肖华、徐立清[1]等同志作了专门的研究，现将执行的具体方案报告于后，妥否请批示。

一、关于工程部队调拨组成问题

计分为四类：

（一）铁道工程师五个，五万人。即由西北军区调拨二个师二万人；西南军区调拨一个师一万人；华东军区调拨一个师一万人；二十一兵团拨一个师一万人。以上五个师调拨无大困难。

（二）水利工程三个师，三万人。即由华东调拨二个师二万人；

---

*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聂荣臻上报了关于编余部队和机构的调拨计划。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在该计划上作了“我希望调拨为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的数目能有三十万至四十万”的批示。这个方案是聂荣臻为落实毛泽东的批示而重新拟订的。毛泽东一月四日批示：“这个计划很好。按照铁道兵团的经验，以四十万部队转为工程军和屯垦军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经济上是很合算而有大利的，国家又立即增加四十万工业工人和使用机器的农业工人。应即刻筹办，并请苏联帮助，中财委订购工程和农业的机器，开办工程学校和农业技术学校。”一九五二年二月二日，毛泽东正式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一个师转为建设师，其中十五个师参加农业生产建设。

二十一兵团调拨一个师一万人。估计这三个师调拨亦无大困难。

（三）林业工程二个师，二万人。若朝鲜战争能迅速停战，即从东北军区志愿军中拨给二万人。若朝鲜战争三月份以后始停战，则此二万人将待第二期整编时再拨给。

（四）建筑工程十一个师，十一万人。即中南军区二个师、华东军区二个师、东北军区二个师、西北军区一个师、华北军区一个师、西南军区一个师、中央财委[2]直属二个师。

以上四项，合计为二十一个师，按上述方案，似可执行。

二、关于屯垦部队调拨组成问题

屯垦部队十九个师，十九万人。现已较有把握进行屯垦的部队为十一万二千人。即：新疆屯垦自给八万人。西北计划屯垦一万人。华东计划屯垦二万人。西南计划屯垦二千人，雷马坪地区以一个团一面屯垦，一面开辟工作。

根据粟裕同志估计，只要经费问题能解决，华东再增二个师进行屯垦是无问题的。若如此，则共为十三万二千人。不足之五万八千人则待第二期整编中解决。

三、关于工程与屯垦部队转化问题

至于转为工程部队与屯垦部队，究竟如何转化，这是个大问题。经过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及军委有关各部商讨的结果，并与华东军区再三研究，觉得这些部队的转化，须要有一个过渡时间。在此时限内，仍保留解放军的番号（可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工程某师；屯垦部队则可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几师），按解放军同样之待遇。加上国家的生产投资，估计经过一年的过渡期，到了明年即可生产自给或半自给，到一九五四年即可变成熟练而强大的生产大军。为了及时顺利地转化，拟以一二两月份为进行“三反”[3]运动及政治动员时期。动员大纲由总政编拟。惟屯垦部队为不误农时，须即刻确定，于一月底完成动员和一切生产准备工作，二月中旬即须开始布置生产，三月即开始进行组

织调整及技术学习，主要是在工作中学习，部队中配备工程干部指导。至于这些部队的武器，恐不宜全部上缴。屯垦部队的武器可以全部或大部保留。工程部队则以其性质酌留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或保留若干。这些部队在过渡时期的领导，须由财委与各军区双重领导才行，建制则归财委系统。为领导这些部队，财委各部可吸收一批军队干部参加领导工作。

注　释

〔1〕粟裕，当时任副总参谋长；肖华，当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当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

〔2〕中央财委，即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3〕“三反”，即从一九五一年底开始，在共产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侵朝美军进行细菌战及我采取措施情况的报告*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根据近两日前方报告：敌人撒放昆虫细菌仍在进行中，平壤以北三十八军、五十军驻地亦发现有昆虫细菌。由北京送前方的鼠疫疫苗，今日起已开始在部队中注射。但因在朝的化验专家太少或思想上有问题，故对细菌的化验工作进展很慢，至今仍不能确定为何种细菌。为加强此项工作，现已动员京、津、沪各种专家四十四人，其中，昆虫学专家十一人，细菌学专家十五人，流行病专家六人，毒物化学专家四人，病理学专家七人，营养学专家一人，明日上午八时乘飞机到安东转赴前方。为鼓舞他们情绪，已商妥明早由抗美援朝总会进行欢送，并由新华社予以公布。关于前方所要多种疫苗，拟在三月十日前送五联疫苗两百万份；四联疫苗三百万份；赤痢疫苗八十万份，加上以前计划送前方的鼠疫疫苗、霍乱疫苗等均可满足前方的要求。

至于防毒的准备，现计划：

一、先将现存在东北的一万八千一百八十九具新防毒面具送志愿军司令部，现东北仍有两万五千多具，关内可以修好的面具二十万具，拟即从昆明调一些技术人员进行赶修。估计敌人如使

---

* 这是聂荣臻写给周恩来总理审阅后报毛泽东主席并转朱德、刘少奇、林彪的报告。

用瓦斯亦是战术性、试验性的。因此有二十多万具防毒面具即可解决第一线部队的要求。后方部队和人员则由总后赶做些防毒口罩即行了。此事已布置由杨立三和贺诚[1]同志负责。

二、据报敌人内部进行细菌、瓦斯和原子弹的教育情形看来，敌人在朝鲜战场可能会进行战术性质原子武器的试验，估计不可能大规模使用，我们亦须预做准备。为此已将去年前方缴获敌军内部的文件——关于原子弹的效力和预防法的教材，进行了翻印，拟于明早随专家送前方二百本作为领导干部和机关的参考。此文件经钱三强[2]同志校正后，认为结论正确，在部队中可做参考。

以上各项处置是否妥当，请批示。

注 释

〔1〕杨立三，当时任军委总后勤部部长兼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业部部长；贺诚，当时任军委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

〔2〕钱三强，著名核科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

发扬全军体育运动大会的精神 开展经常性群众性的体育活动*

（一九五二年八月）

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五周年而举行的，同时也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地走上正规化、现代化道路的第一次全军体育运动大会，经过了紧张、热烈的十天竞赛之后，现在已经顺利地结束了。

我们这次运动大会，其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成绩之优良，都是我军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在各种比赛的成绩上，我们已有若干项目突破了解放以来全国的最高纪录,创造了新的成绩,其他项目许多也都达到或接近了全国的最高水平。我们的各项军事体育表演，也表现得十分精彩和出色。数十万观众对于我们在短短的时间内所获得的进步，一致予以好评。我们的文化教育，由于“速成识字法”的推行和广大指挥员、战斗员的努力，也得到飞速的发展。尤其是在整个竞赛过程中，各个代表队所表现出来的进取精神，学习精神，遵纪精神，以及团结友爱精神，更反映出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显示了我们部队体育运动的崇高美德。这次的体育运动大会，可以说给我们全军的体育运动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其前途是十分光明的。

---

* 这是聂荣臻在庆祝“八一”建军节二十五周年全军体育运动大会闭幕会上的闭幕词。曾刊登于一九五二年《八一杂志》第十七期。

同志们，我们这次运动大会，一方面是对于我们两年来在部队中开展军事体育运动的成绩作了一次总检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运动大会，将更有力地推动部队今后军事体育运动的开展。这个道理，正如同志们所知道的，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建设，不仅需要我们全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具有更高度的政治觉悟、军事技术和较好的军事科学素养，以及一定的文化程度，同时也要求我们全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具有更加强健的体格和持久的体力。体育运动的正常而广泛地开展，就正是锻炼我们身体，增强我们体力的有效办法。而且不仅仅这样，体育运动同时又是培养我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发挥我们的进取精神、协作精神、坚忍耐劳精神和灵敏机智等种种美德的良好活动。因此，在部队中普遍地把体育运动开展起来，使它不仅是少数人的运动，而变成为广大的群众性的运动；使它不只是一种临时的现象，而能够经常与健康地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参加这次全军体育运动大会的男女选手们，你们是部队体育运动的优秀分子，开展部队体育运动的任务，首先就落在你们身上。希望通过你们对体育运动的爱好和技能，在部队中掀起一个开展业余体育运动的热潮，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都动员起来，参加到各种形式的、至少是每人一项的体育运动的战线上去，同时在各项体育运动中，坚持和贯彻部队体育运动的美德，使部队的体育运动成为更进一步地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有力助手。

全体指战员同志们，现在我代表大会主席团，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二十五周年第一届全军体育运动大会胜利的闭幕了。让我们继续发扬大会的成绩，牢牢地记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指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锻炼自己成为铁的体质，保卫我们最可爱的国家”。

当大会闭幕的时候，让我代表主席团感谢组织和参加这次体育盛会和文艺演出的同志们以及参加军事体育表演的全体指挥

员、战斗员同志们，也感谢为这次体育大会服务的全体同志们，祝你们健康，祝你们进步！

关于由民兵制过渡到义务兵役制方案的报告*

（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

为贯彻普遍民兵制和由民兵制过渡到义务兵役制，特提出以下报告：

一、民兵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和现在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苏区）中的农民赤卫队，到抗日战争以来的民兵组织，是我国民兵制发展的全部过程。民兵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都出色地执行了保卫人民革命胜利果实，巩固政权，协助政府贯彻各种政策，以及配合人民军队作战等任务；并成为人民军队的后备力量。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大陆范围胜利后，民兵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在协助军队和公安部队剿匪作战中，同样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作战和补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兵员中，发挥了伟大的作用。因此，民兵在保卫祖国、进行经济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强大国防等伟大事业中都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

* 这是聂荣臻写给毛泽东主席并党中央的报告。经毛泽东、中共中央审批后，据此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暂行条例》，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联名颁布。

二、全国民兵现况

据今年三月份统计，全国已有民兵一千八百六十多万人，约占全国农村人口四亿一千万人的百分之四点五，较一九五一年春季全国民兵统计一千零四十九万人，增加了八百一十多万人。

自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中央军委下达“关于加强民兵建设的指示”后，一年来，全国各地均初步地整理了民兵组织。清洗了成分不好、作风太坏的分子和政治嫌疑分子，提拔了大批积极分子为民兵干部，使民兵组织在老区进一步纯洁巩固。河北、山西、察哈尔等省，民兵已达农村总人口的百分之七点五到七点八，接近完成普遍发展的任务。随着土地改革逐区完成，新区民兵也在迅速发展，政治觉悟也有了很大提高，但组织尚不够纯洁巩固。

一九五一年冬季各区参加冬训的民兵占民兵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八十多（以华北最多），训练时间平均由九十小时到一百五十小时，使民兵的政治觉悟和军事基本常识均有提高，为今后民兵普训打下了基础。

三、贯彻普遍民兵制和由民兵制过渡到义务兵役制的实施步骤

人民武装工作的当前任务，一是贯彻普遍民兵制；二是如何将民兵的觉悟水平，提高到高度的爱国主义觉悟程度，并准备将民兵制过渡到义务兵役制。

（一）随着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的即将完成，就具备了实施普遍民兵制的基本条件。根据河南省遂平县人口调查工作的报告，只要经过深入的宣传，普遍民兵制的贯彻已无大的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条例，拟以军委和政务院联署颁行。如按农村人口百分之九预计，全国普遍民兵制实现后，将有民兵三千六百多万人。城市中除组织工人纠察队外，不设民兵组织。

（二）为了防止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加强国防力量，除工业准备外，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军后备力量。志愿兵役制已不能满

足这一要求，势必结束，义务兵役制则势在必行。否则须保持庞大的常备兵额，每次动员新兵亦耗费很大；同时对长期的志愿兵在复员时也增加许多困难。根据去年动员新兵时报名参军的踊跃情况看来，说明人民并“不怕当兵”，而是“怕当一辈子兵”。青壮年轮换着服兵役，担当起保卫国家的任务，已成为较普遍的要求。而且全国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即将于今冬完成，封建的地主阶级和土地制度已被彻底推翻，人民的觉悟程度则普遍提高。以上这些条件，成为实行义务兵役制主观和客观的有利条件，说明实行义务兵役制，不仅需要，而且是可能的。

（三）由于民兵负有保卫地方秩序的责任，不是单纯的军队工作。因而需要党、政、军、群有机地配合实施，在组织形式上，须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建立由中央到乡的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以保证人民武装建设任务的实行。各级人民武装部仍为民兵的组织、训练、指挥机关，并成为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四）在普遍民兵制实现的同时，应按照县的大小等级，建立不同人数的县基干民兵团，成为民兵制的基干组织，以便更有效地进行军事、政治、文化教育。这些基干民兵团也就是实行义务兵役制时的征兵对象，除从政治、年龄、身体等条件选择外，并应根据其家庭劳动力的可能条件，加以照顾，以免妨碍经济建设。并可废除代耕制度，而由其家人自行耕种。服兵役者，可免除其本身应缴之公粮，以减少组织代耕与经济方面的困难。

（五） 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长期抓兵抽丁所造成的恶果，在群众中还遗留着很深的恶劣印象，故结合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义务兵役制的宣传动员是十分重要的工作，须有计划地实施。请中央宣传部统一制订宣传大纲。

（六）全国各地实施土改前后不一，群众觉悟程度和其他各种工作的开展情况亦不一致，且我们对实行义务兵役制这一中国历

史上的创举，全无经验，为吸取经验，进而推广，拟于一九五三年先在华东、山东、东北等老区试行，征召若干万人，补充部队缺额。并在一九五三年内完成全国民兵普遍登记工作。自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三年中，按常备陆军战士员额（约二百万人）每年征召与复员三分之一，可以在一九五七年全部实现义务兵役制度。

（七）由于我国工人数量尚远不能满足工业建设发展的需要，为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故至少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期间，暂不在工人中征兵。同时由于各种干部的缺额较大，高中以上的学生比重尚小，故学生中亦暂不征兵。可在各大、中学校，结合爱国主义教育，通过青年团组织一些射击、野营等有关军事常识和生活的教育活动。每年按照军队建设的需要，由中央人事部分配一定名额的大、中学校毕业生参加军队工作。

（八）国家之兵役法，本应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但在目前我国情况下，民兵组织法（即民兵制兵役法）拟不经政府委员会，而用军委与政务院命令颁行，作为内部下达，不在报纸上公布为好。义务兵役法正在研究中，将来由中央人民政府公布。

以上方案是否可行，请指示。

关于入朝部队轮换问题的指示*（节录）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日）

为使国内部队获得对美国帝国主义军队作战的锻炼，同时又照顾到出国作战较久的部队能得到必要的休整，决定选调国内部队以军为单位进行轮换。关于部队轮换计划问题，遵照毛主席批示，根据在朝部队出国作战时间的长短及在不影响前方作战和国内防务的原则下，拟分两期进行。

一、第一期，由二十三军、二十四军、四十六军分别换回二十军、二十七军、四十二军，已实施中。

二、第二期轮换的时间，为减少冬服装备改换的困难和浪费，决定自明年三月开始实行。具体轮换部队及次序如下：即以华东十一军，该军现辖两个改装师，以一个师拨归十六军建制（十六军现辖两个改装师），另一个师拨给六十军，以六十军一八〇师拆散补充朝鲜各部。调整后以西北一军与东北十六军入朝换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回东北，五十军两个师回山东半岛及长山列岛设防。以中南四十五军、华北二十三兵团（现辖两个改装师另由六十六军调一个改装师配属），入朝换四十军回广州，六十三军回京沈线。以中南二十一兵团（三个师）、四十一军入朝换六十四军回华北、四十七军回广东潮汕地区。以华东二十一军入朝换六十五军回徐

---

* 这是聂荣臻写给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杨得志，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指示。

州地区。

三、经上述轮换后，在朝部队则共为十五个军四十五个师，其中七个改装师，比现在减少一个军。其中除三兵团之十二军、十五军、六十军与二十兵团之六十七军、六十八军未行轮换外，其余（占在朝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二）均已换回国内休整，并可依进口装备的到来逐一进行改装。暂未轮换之五个军（占在朝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则待替换后，调至朝鲜次要防区进行战地休整或尔后再行轮换。

四、轮换后国内部队分布情况如下（略）

五、鉴于以上情况，请你们考虑：

（一）实施这个计划对朝鲜战场有无影响，你们对从三月起每月轮换部队与实施时间有何具体意见。

（二）依国内部队来看，进行这两期轮换后，未轮换的部队即行战地休整为好，国内部队不再轮换，因海防部队均需先行接替始能北调。这样办有何困难。

（三）依数量上来说，朝鲜减少一个军，但质量上加强了，对作战有无影响。

（四）其他如特种兵除装甲兵、高射炮兵采取换人不换装备外，其余则不进行轮换。

你们意见如何，盼复。

关于组织国内军队机关干部分批到朝鲜战场实习的报告*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

遵照毛主席指示，为使国内各机关干部取得朝鲜战场的实战锻炼，拟组织机关干部实行分批轮换，具体计划如下：

一、由总参谋部各部负责轮换志愿军司令部（简称志司）各处以下干部，具体分配：由作战部换“志司”作战处之作战科；军务部换“志司”军务处；情报部换“志司”作战处之情报科；通信部换“志司”通信处（包括报务员）；由中央机要局换“志司”机要处（包括译电员）。

二、在朝各兵团直属机关处以下干部，分别由华北、中南、西南、华东各军区司令部负责轮换，具体分配：由华北军区司令部换二十兵团司令部；中南军区司令部换十九兵团司令部；西南军区司令部换三兵团司令部；华东军区司令部换九兵团司令部。

三、轮换时间，明年一月至五月份二至三批轮换完毕。

四、政治干部及后勤干部之轮换由总政及总后分别提出计划。

五、作战部张震部长已到“志司”参加作战业务会议，并将

---

* 这是聂荣臻写给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并报彭德怀副主席的报告。毛泽东十二月六日批示：“阅，退聂办。同意这个计划。政治、后勤两系统，请聂告两处负责人拟出一个计划来。”

此意见与“志司”首长具体商定后施行。

六、总参谋部已有二十四名团以上干部赴朝实习，每期实习时间为三个月，现第四期十五名尚未回。

关于组织编制问题的总结*（节录）

（一九五四年一月）

遵照彭德怀副主席的指示和大会主席团的决定，要我把在大会讨论中关于组织编制问题的一些意见集中一下。为了避免重复，在大会讨论中完全一致的意见，我就不再提了。现就以下几个问题，经主席团的同意，总结如后：

一、定员定额问题

（一）在最近几年内，如情况无大变化，全军包括公安部队，定额三百五十万人是适宜的。如再减少，势必缩减现有战斗部队，削弱我国防御力量，根据目前国际和国内形势来看，是不够稳妥的。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按照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变化，即我国兵工生产的情况，义务兵役制实行的情况，军队各种干部培养和准备的情况，以及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等，到那时，总定额问题还可再行考虑。

（二）各兵种和军种的比例，应当根据国家的工业基础、财政力量、国防要求和军事战略方针等决定。目前我们还没有条件来和具有强大的现代工业的国家去比，故基本上仍以保持现在的比例，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巩固提高为主。但将来随着国家工业生产的发展，经过一两个五年计划、甚至三个五年计划，逐渐地解决了各种装备之后，各兵种和军种的比例，就可以逐步地加以改变，

* 这是聂荣臻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这也是应该的。

(三)经与各军区和各兵种交换意见并考虑研究后，定额如下(略)

(四)此次会议中只能定额定员，各大军区可根据定额和总参谋部所拟的组织编制自行调整，于今年三月底提出定员的具体意见，报军委批准实施。定额定员后在一定时期内必须认真执行，各级首长各个部门，均不得擅自更改。

二、组织与编制问题

(一)现在国防军步兵师的编制，按照现代战争的要求和以帝国主义侵略军为作战对象，都是合适的。在陆续改装中，从国内最先改装的六十六军到后来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改装师，都经过较长时间的实验，并搜集过意见，已经作了必要的修改。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机动力的问题，由于朝鲜战场汽车的损失消耗，需要补充，就不能不把改装师的一大批汽车和一些火炮抽出，支援前方作战。因为在“边打边建”的情况下，在军事方面实际上是以打为主的，军队的建设不能不服从于朝鲜战争。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汽车的抽调，改装师的机动力就感到不足，移动时发生困难。同时各型特种车大部还没有解决，也增加了一些困难。这一困难在我国没有生产汽车以前，还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故在完成全国国防军步兵师改装的过渡期间，不得不以一定数量的大车代替汽车；同时仍须把有限的汽车控制一批，以保证作战部队使用。在长江以南广大的水网地区和山岳地区，除了有限的公路以外，即便解决了汽车，部队机动性依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停车场都不易找到。根据这一具体条件，我们是否应当考虑另外规定一种适合于水网地区和山岳地区运动的国防军轻装步兵师的编制呢？我想是不必要的。因为这种没有炮兵的轻装师，不仅不适合于合成兵种的战术，不适合于统一训练，不适合于全国军队统一调动使用，也不适合于对现代的

帝国主义侵略军的作战。如果大的战争爆发，敌人向我大陆进攻，我们在战略上是防御的，在战术上主要是正规的攻防战和正规的运动战。由于作战对象的不同，由于装备的改变，像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的形式，将大大减少。因为双方的重装备都不能进入缺乏公路的水网地区和山岳地区，所以这些地区将不是敌我主力作战的战场。但为了适合现在已经决定设防的地区之作战要求，有计划地逐步地增建公路网，则是很重要的工作。海南岛、云南及华东沿海地区公路建设的初步计划已包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内，但全部解决尚不可能在一个五年计划之内做到，需要长期的经营。现在国防军步兵师中没有山炮，将来是否需要制造一批，以备执行特定任务之用，这须作进一步的研究考虑。尚未改装的步兵师同样要执行国防军的编制，这是为了在组织机构上求得一致，以便适合新的组织系统，进行教育学习新的工作方法。至于原有装备的武器则仍应按原来的编制配备人员。

（二）我们的海防作战部队现在有两种：一种属于海军系统，包括各种作战舰艇、海岸炮兵和海军的航空兵等；另一种则是属于陆军系统的海防和海岛守备部队。后者是担任反敌登陆作战的坚守部队。海防第一线阵地应有固定的守备部队占领阵地，第二线阵地则应依情况于必要时由机动部队派出值勤部队，不必专设固定的守备部队。

海防和边防守备部队的组成，本着节约兵力的原则，请各大军区研究后提出编组的方案。担任海防和边防的公安部队，将来只执行侦察、警戒、封锁、巡逻和反对特务破坏活动的任务，不是坚守部队，故现有之公安部队应尽先以必需数量的兵力担任分散配备的侦察警戒任务，如兵力尚有多余，且能胜任执行守备任务者，则以公安部队加强装备，改编为国防军守备部队。其不能由公安部队改编者，则以现在国防军的军、师进行因地制宜的编

组，以免突破总定额。

为统一各设防地区的指挥，应划定若干防卫区，例如远东防卫区、图们防卫区、津榆防卫区[1]、胶东防卫区、淞沪防卫区、舟嵊防卫区、福州防卫区、厦门防卫区、潮汕防卫区、珠江防卫区、海南雷州半岛防卫区、滇南、滇西防卫区，等等。防卫区的指挥机构，即由担任防务之军或师的指挥机构兼任，统一指挥防卫区内之机动部队、守备部队和公安部队（公安部队之建制仍归省军区）。山东、福建、云南之防卫区归二级军区指挥。其他各地之防卫区则归大军区直接指挥。这样，除大军区和二级军区有指挥国防军的任务外，省军区一般的不指挥国防军，省军区和军分区负责指挥辖区内之公安部队，完成对海防边防的侦察警戒任务和内卫与警备任务。

（三）省军区的任务在全国应求得一致，东北军区各省不应例外。国防军步兵师与军分区的机构应分开，不再兼任。

（四）公安部队自成立以来，在执行边防、海防和内卫等任务中是有成绩的，今后在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障社会主义的改造过程中，执行海防、边防的侦察警戒和内卫任务，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人民军队的组成部分。但是为了集中指挥，必须由各级军区统管，不宜垂直领导（东北军区亦不例外）。各区因公安部队的多少不同，可分别组织公安部队部或公安部队处，成为各大军区主管公安部队工作的业务机关。责成各大军区参谋长根据各区具体情况，研究提出各区公安部队的整编方案，包括：甲、担任海防和边防的公安部队；乙、改编为国防军守备部队的部分；丙、应拨归政府系统之公安部队；丁、担任内卫之公安部队。经大军区首长、各中央局书记及公安部队与公安部门负责同志共同研究后，于四月底报中央军委批准实行。这样实施后，在三百五十万人之总定额内，应减去拨归政府系统的公安部队，将总定额减少。但今年公安部队预计应缩减之十万人，在划归政府系统之公安部队

中应占适当的比例。在整编中，准备划归政府系统之公安部队，不应再行集中编组。

铁道公安部队在平时隶属铁路公安局，其供给问题，亦应由铁道部解决。

（五）关于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人员的配备问题作如下修改和补正：

1. 军委公安部队部及防空部队部均设精干的直属政治部，负责领导直属部队和直属学校的政治工作。炮兵部、装甲兵部和工程兵部均不设政治部，仍保留政委办公室。

2. 志愿军部队各级政治部仍保留敌军工作部门。华东、中南、西南各军区政治部及海军部政治部均设精干的敌军工作部门。

3. 团以上各级政治委员不兼任政治部（处）主任。

4. 步兵连及师属独立通信连增设副政治指导员，其他连队因人数较少，不设副政治指导员。

5. 部队所属体育队仍保留，但应缩编，以八百人为准。

6. 坦克团取消营的副政治教导员，增设连政治指导员的意见，尚须与有关部门再度研究后决定。

（六）军直属队的供给处、招待所和炊事兵问题，同意修订，由军务部拟出方案后经军委批准下达。

（七）各兵种指挥机构的名称，统一改称为部。军委的财务部和军训部名称仍旧不变。

三、领导关系问题

关于各兵种的领导关系在讨论中没有不同的意见，会后应明文决定下达。各兵种和各部门的职责亦应逐步由各部自行拟出，经军委明文规定公布。炮兵、装甲兵、工兵之干部任免及管理问题，同意总干部部所提之第三方案，即团以下任免归大军区，军区干部部统管军师建制内的各兵种干部，同时军区各兵种的指挥机构设干部处。

军械部应确定归炮兵首长领导，因无论平时与战时，军械部门的工作均以炮兵的比重最大，炮兵司令员均必须负责掌握。同时各级参谋长对军械部的工作，亦均有指导之责。

四、关于人员处理的问题

（一）听总干部部徐[2]副部长说，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政府人事部已原则决定，将军队编余的干部（包括非队列的干部）准备转业者全部包下来。这是党和政府对于军队整编工作极有力的支持，因此，我们就必须迅速而切实地做好准备工作，求得在今年内基本上处理完毕。编余的战士，则应由各军区负责处理，亦应在今年内处理完毕。

（二）决定将军队中大批妇女同志转业地方工作的问题。（略）

注　释

〔1〕津榆防卫区，指天津至山海关地区。

〔2〕徐，即徐立清。

伟大五年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九五四年十月一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召开，中国人民经历了伟大的五年。在这伟大的五年中，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用自己的英勇斗争和忘我劳动，奠定了全国统一的局面，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完成了各种社会民主改造，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进行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并积极参加了国际和平运动，从而粉碎了美国侵略集团在朝鲜和印度支那两个战线上对中国武装干涉的阴谋，提高了祖国的国际地位。现在全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目标继续前进。

在这伟大的五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忠诚地执行了自己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任务。它在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援和配合下，胜利地进行了解放全部大陆和剿灭特务、土匪的作战，积极地参与了社会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时期的建设工作，并在本身的现代化军事建设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从而为解放台湾、彻底完成祖国的解放和统一事业准备了条件。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蒋介石匪帮的残余军队，还

---

* 这篇文章曾刊登于一九五四年十月一日的《人民日报》上。

盘踞着我国南部、西南部的广大地区，负隅顽抗。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各路大军，在全国人民的热爱和支援下，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在短短的七个月的时间，歼灭了大陆上的蒋贼残余军队，先后举行了湘中衡阳宝庆战役[1]、粤中阳江战役[2]、粤桂边战役[3]、黔川战役、川东战役、川西战役[4]，扫灭了敢于顽抗的蒋介石匪军，争取了部分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投诚，从而全部结束了蒋介石卖国集团在大陆上的反动统治。随后，又举行了海南岛战役[5]和舟山战役[6]，使我国南面屏障的海南岛和丰富鱼产区舟山群岛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

一九五一年夏季，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四川和新疆跋涉万水千山，和平进驻西藏，从而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中国大陆全部统一的局面。

截至一九五二年春末的两年半时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蒋匪军的溃散地区和土匪反动武装盘踞的地区，还进行了巨大规模的剿匪作战。我军采取了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在人民群众的积极协助下，敉平了各地的土匪特务武装，使人民中国有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安定秩序，并为各地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恢复工农业生产提供了前提条件。

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和人民的和平劳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防、边防、空防部队，日日夜夜警惕地守卫着祖国神圣的领土、领海、领空。他们常常在人烟稀少的边疆和沿海，不论风雨晴晦，忍受着一切辛劳艰苦，严密地监视着敌人，并给予不时窜扰的蒋介石残余匪军、飞机、舰艇、特务以严重地打击。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使敌人望风丧胆的英勇战斗队，并且是人民无限信赖的巨大工作队和生产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我军进入新的解放地区，协助中共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政府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和人民团体，发动并团结了各族人民，在广大

地区开展了镇压反革命、减租减息和伟大的土地改革等运动，组织城乡人民群众恢复了工农业生产，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成为党在进行群众工作中的忠实而有力的助手。在发生灾害和疫病的地区，我军以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积极地协助人民政府救死扶伤，战胜灾害，并帮助人民恢复生产。中国人民解放军还直接参加了祖国的恢复和建设工作。在大陆全部解放之后，实行了部分部队集体转业，组成了巨大的铁路、公路、水利、石油、农业等工程和生产大军，开赴经济建设的前线。他们以忘我的精神、巩固的纪律和集体的智慧，从事着创造性的劳动，他们巧妙而迅速地掌握了技术，使劳动效率保持相当高的水平。从劳动生产中，他们不仅增强了对祖国的热爱，并且使他们获得从事社会劳动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必要的专门技术，为祖国生产战线上增加了生力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英勇顽强、勤劳朴素的高贵品质和排除万难、战胜敌人的英雄气概。他热爱人民，并以自己的优良传统鼓舞人民；人民也热爱他，并以自己的一切来支持他。在党的正确路线、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军民钢铁一般地亲密团结，就成为推动和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牢记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7]，"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8]，并为实现这些指示，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牢固地树立了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将自己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以完成解放台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祖国安全，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任务。

五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已逐步地在原有步兵的基础上，建立了各特种兵部队和空军、海军；将落后的装备改变为较现代化的装备；提高了部队的文化水平，使他们能够掌握现代的技术兵

器和装备；建立了各兵种各级的正规军事学校，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军官补充的源泉；建立了国家统一的军事领导机关，从而统一了军事训练，统一了各种制式和制度，颁布了统一的条令。这些工作的结果，使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步完成着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伟大历史转变。现在我们已经不仅有了一个强大的陆军和各特种兵部队，而且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基础的空军和海军了。

应当特别提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辉煌贡献，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当美国侵略集团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侵略我国台湾、威胁我国安全的时候，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在两年零九个月的英勇而艰巨的战斗中，严重地打击了美国侵略军及其帮凶军，取得了光辉的胜利，终于迫使敌人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签订了停战协定。中国人民志愿军击败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侵略军的宝贵作战经验，是中国人民武装的珍贵财产的一部分，对于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艺术水平，将发生极重要的影响。

还应当特别提到，苏联对于我国工业建设伟大无私的援助，使我国工业化建设的速度加快了；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使我们能够有足够强大的现代化国防，来防御任何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美国侵略集团一向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曾经不断企图从台湾、朝鲜、印度支那三个战线上进行对中国的武装干涉和战争威胁。虽然朝鲜的停战和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使亚洲的紧张局势逐步趋于和缓。但美国侵略集团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相反，为了制造新的紧张局势，它正在加紧利用逃在台湾的蒋介石卖国集团，对我国大陆和沿海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策划签订所谓美蒋“共同安全双边条约”，并在不久以前，胁迫其仆从国家签订了敌视中国和亚洲人

民的所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清醒地懂得中国人民所托付给自己的光荣任务，那就是解放祖国的领土台湾，防御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祖国人民的和平劳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的联合宣言，庄严地宣布了中国人民的意志，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为实现人民的托付而奋斗到底！一定要在解放台湾的战斗中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强大无敌！

我们应当严正地警告那些敌视中国人民的战争挑衅者：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来侵犯中国的神圣领土，任何讹诈政策更吓唬不倒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再一次地证实了我们的一个牢不可破的信念：觉醒了的人民力量是无敌的。

注　释

〔1〕衡阳、宝庆战役，指一九四九年九月至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二、第十三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在湖南衡阳、宝庆（今邵阳市）地区对国民党军白崇禧部实施的进攻战役。此役、歼国民党军四万七千余人，解放了湘南、湘西大部地区。

〔2〕粤中阳江战役，指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在粤中纵队配合下，于广东省阳江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兵团部及四个军残部共四万余人的歼灭战，是广东战役的主要组成部分。

〔3〕粤桂边战役，即广西战役。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七日至十二月十四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主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在桂滇黔边纵队配合下，先后在广西博白、钦州地区歼国民党军白崇禧和余汉谋集团残部共十七万三千人。

〔4〕黔川战役、川东战役、川西战役，都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地区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在第四野战军第五十、第四十七、第四十二军配合

下，先在黔北咸丰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四兵团；接着在川东南川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第十五兵团大部，并乘胜解放重庆；最后，人民解放军上述部队与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相配合，将数十万国民党军包围于川西成都地区后发起全面进攻。迫使国民党军的第十六兵团、第十五、第二十兵团残部、第七兵团先后宣布起义，第五兵团负隅顽抗，除少数逃往西昌，全部被歼。整个进军西南的战略行动，共歼国民党军九十万人，其中起义四十余万人，投诚十万余人。

〔5〕海南岛战役，指一九五〇年三月至五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琼崖纵队接应下，对海南岛国民党军进行的渡海登陆作战。此次作战，守敌共十万余人，被歼三万三千余人，余敌逃跑，我军解放了海南岛。

〔6〕舟山战役，指解放舟山群岛的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于一九四九年八月至十月先攻占了舟山外围之金塘、桃花等岛，接着进行解放舟山本岛的作战准备。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三日，国民党军盘踞舟山群岛的约六万人被迫秘密撤逃，人民解放军即渡海追击，十九日舟山群岛解放，先后共歼敌八千八百五十人。

〔7〕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九九一年六月版，第一四二六页。

〔8〕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九七七年四月版，第六页。

对十二年科学规划中国防研究项目的意见*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二日）

从发展方向提出有关国防工业今后十二年（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规划要求，作为军事科学技术研究的基础。此规划经初步研究，现综合为五大类分述如下：

一、关于航空的发展方向问题

（一）提高喷气式飞机音速倍数问题。（略）

（二）火箭、导弹问题。鉴于喷气式飞机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科学基础状况，今后的研究方向，应首先集中仅有的技术力量用于火箭、导弹方面的研究和制造。首先要研究制造短、中程的火箭与导弹。在用途上要有：（1）防空导弹（地空导弹），射程一百公里；（2）地对地或地对海的导弹（地地导弹），射程五百至六百公里；（3）空对空或空对地的导弹，射程××公里。

（三）要求以最快速度在几年内解决上述火箭、导弹的制造，其步骤：

（1）设立研究设计机构，这个机构必须是综合性的和集中的。尤其是机械、空气动力学与可控制的电子学，航天航空器可控制

* 一九五四年十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确定聂荣臻主管军工生产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工作。这份规划是聂荣臻主持草拟，由他审定上报的，后作为中国《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组成部分。

与不可控制的研究设计，必须集中统一在一起。

（2）先向苏联订购一定数量的导弹、火箭，以训练部队。同时先派一部分技术人员赴苏联学习，打下将来在本国制造的基础。

（3）建立为研究设计服务的生产工厂，可以先依照苏联图纸进行生产。

（四）导弹、火箭的研究、设计到生产，是个很复杂、艰巨的任务，困难很多，但也有其有利条件：（1）有苏联的援助；（2）我国有一定数量的技术人员和干部，且有充分信心；（3）有全国党、政、军以及各个工业部门的大力支持。

二、关于电子科学（无线电技术）方面的问题

（一）基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军事技术装备的发展趋势，我国工业发展速度，以及国际科学发展水平，特对电子科学（无线电技术）提出今后十二年（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的研究设计工作的基本任务要求：

（1）研究、设计由发现敌机、导弹到直接操纵我军的飞机、导弹实施阻击与拦截的成套设备体系，研究反操纵敌人导弹的可能性。

（2）寻找利用电磁波的新波段、不可见的光线、超音波的频带、热波和放射线转化为电能的设备与方法，利用于水下通信和发展新的通信、测位与操纵的新工具。

（3）在光声的炮兵侦测基础上发展为测量敌人的弹道，以准确测定敌人发炮的阵地和军舰的成套设备，达到有效地歼灭敌人的炮兵和舰艇。

（4）最大限度地扩大红外线的有效距离，与小体积的电视相结合，达到在黑夜能够目睹战场情况与显示目标。

（5）搜索雷达机最大限度缩小体积、最大限度地提高功率，使它所使用微波电子管可变波长的范围尽量扩大，以合乎抗干扰和扩大利用雷达用途的可能性。

（6）发展多路的、自动化的、直接显示的通信设备，并有可靠的远程操纵的衔接设备与保密设备，使移动通信枢纽部和舰艇获得扩大通信能力的可能。

（7）发展超小型化的通信设备，使它能为排长、班长、重要火炮的射击手所直接掌握，不仅要轻便，且应能达到越级联络的实效距离要求。

（8）发展改进飞机全天候降落的航空仪器设备，使在恶劣气候条件下与不能目视情况下有较安全的活动保障，按照新的飞行速度、高度及穿过不同的气流层条件下改进投弹瞄准仪。

（9）发展新的自动扫瞄搜索的全景显示器，与无线电波信号的频谱分析仪，作为无线电技术侦察工具（包括雷达波等一切电波信号在内）。

（10）发展抗干扰的研究工作，和发展对敌一切通信设备、测位设备与远距离操纵设备的干扰研究工作，一方面达到力争保存自己设备的可靠作用，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干扰敌人的电子设备，造就对我比较有利的条件。

（11）电子计算机、电视机、雷达等器材的综合研究，应用于军队指挥机构。

三、关于热核子的应用问题

（一）热核子的应用，应与原子能和平利用相结合，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二）鉴于原子弹的临界体积缩小，应研究应用于火炮的弹体和导弹弹体以及水鱼雷的原子弹头。

（三）将原子能用作潜艇及远程轰炸机的燃料。

（四）军队机械化装备的发展，对电力、燃料需求将大大增加，而部队大量携带燃料和电源机械，势必影响其快速机动，因此，应考虑建立可以移动的小型原子发电站。

四、关于防化与军事医学问题

（一）防化问题。要解决防护敌人以原子武器和各种化学毒剂的进攻。

（1）应研究能大量生产的防护原子弹的冲击波、光辐射及其他化学毒剂的服装、面具器材。

（2）应研究解决氧气的再生和氧气在不同条件下的应用问题。

（3）进行示踪原子的研究，以观察毒剂在生物体内的运动规律和效能。

（二）军事医学问题。

军队卫生勤务工作，在军队建设和今后的战争中，是十分繁重和复杂的，它不仅一般地要进行医疗、防疫、保健等，而且要在敌人使用原子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情况下，保障部队胜利地执行战斗任务，因此提出（一九五六——一九六二年）的军事医学研究工作规划，主要内容：

（1）建立和开展放射生物学的研究工作。

（2）建立和开展防化学武器和毒理学及化学毒剂损伤的治疗与防护的研究工作。

（3）进行微生物学、寄生物学、昆虫学、流行病学和免疫学的研究工作。

（4）关于输血和血液代用品的研究工作。

（5）建立和开展军队卫生学、航空生理、航海生理学的研究工作。

（6）建立和开展创伤外科、军队医药卫生器材装备的研究工作。

为了在最短期内，从事上述工作的研究，除即着手调整国内各学系组织、增建必要的研究室外，应迅速派遣国内有关专家赴苏联、东欧参观学习，以便使这些研究工作在上述国家所达到的科学水平上进行 。

五、关于常规武器的改进问题

常规武器的改进，主要问题是减轻重量，提高质量，增大威力，便于运动或自行的问题。

（一）提高钢的质量，减轻重量，增强抗击能力。

（二）进行坦克和自行火炮的研究，减轻重量，增强超越障碍、爬山能力。

（三）进行高速大马力内燃机、蒸气透平机和喷气式发动机的研究，并缩小体积，增强耐久性的研究和使用原子动力的研究。

（四）研究提高舰艇的续航能力及航速和威力。潜艇的航程要能往返洲际，一般时速要超过外国的驱潜舰，并能携带核子鱼雷。

（五）研究导弹、火箭、原子炮在舰艇上的应用和炮火及鱼雷发射的自动控制装置。

（六）鱼雷发射距离要增到一百公里以外能命中目标。水雷要有对音响、水压、磁性等都能起作用的综合性能及其控制系统，并保证有最大限度地稳定性和上升速度。

（七）研究缩小飞机的起飞和降落跑道的长度。

（八）研究海军歼击机、侦察机、水鱼雷机、轰炸机能在海上航行降落和起飞，及研究在上述飞机和直升飞机上装置反潜及探测水雷的装置，同时在直升飞机上应有扫雷器材的装置。

（九）改进探照灯光的强度（十五亿到二十亿烛光）探照距离高达三十公里以上。

（十）常规武器改进的研究，除应列为国家规划外，在战术方面的改进应由军队内部解决。因此，应在军队系统建立军事技术科学研究院，各军种、兵种也应设立专业的军事技术科学研究机构，军事技术科学研究院应与国家科学院取得密切联系，以进行军事科学技术的研究。

关于我军科学技术研究的组织及工作条例已提请有关方面草拟。

加强我国研制导弹问题的报告*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

一、我们对导弹的研究制造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

我国目前的情况，虽科学技术与工业水平还很落后，但分散在全国各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目前仍在资本主义国家待争取返国的留学生、科学技术人员，也还有一定数量和一定水平。且有曾在外国参加过火箭、导弹研究设计的人员，他们都具有信心，只要确定上述方针和采取积极地措施，即使争取不到外援，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力量独立进行研究的。苏联已答应为我国培养技术人员，我若再向其说明情况努力争取，援助可能会大些。其他兄弟国家也可能对我提供一些帮助。

我们现在应采取的步骤：即先研究试制初级的，尔后再研究试制高级的。钱学森[1]表示，目前在空气动力、推进机、弹体方面设计像美国“诚实约翰”[2]一类没有控制装置的射程一、二百公里的火箭是没有问题的（美国开始也是先搞初级的，以后才逐渐解决自动控制的问题），较困难的是自动控制的设计方面，但在目前从国内还可找到科学技术人员先行研究；并可自制一套控制设备，

---

* 这是聂荣臻写给周恩来、彭德怀的报告。周恩来当天批示：“即送主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核阅。拟予原则同意。”中央和军委批准了这个报告。

利用旧飞机进行试验。主要困难是元件和仪器设备的生产赶不上，有些我国目前尚不能解决，但在初期因用量不大，可先从苏、德、匈、捷等国进口一些，以后我可仿制。以往的经验证明，只有自己积极动手，才能取得经验和成效，也只有自己先搞起来才有可能获得国外的支援。

因此，建议请批准上述方针，一方面争取与苏联谈判，同时积极筹建此项工作（即抽调一定数量的科学技术人员，组建研究机构，进行基本建设，购置急需的仪器、设备和实物样品等。已组织专门小组进行具体规划）不宜再迟。

二、关于培养干部问题

苏方提出接受我五十名留学生，学习导弹专业。为争取时间，应选派具有一定科学技术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作为研究生派出。并将第二机械工业部派赴莫斯科航空学院及“包曼”工艺学院的留学生一部转入导弹专业学习，以及将其他与导弹专业相近的一至四年级的留学生之一部转为导弹专业学习。国内除应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组建导弹专业外，还可在通信学院、邮电学院、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设立有关导弹的专业（科学规划[3]时已提到），以适应导弹及其他科学发展的要求。

三、落实规划问题

科学规划时商请各方面抽调的科学技术人员，请批准早日抽调。尔后视发展情况再考虑充实。同时，考虑到我国目前科学技术人员缺乏的情况，照顾到各方面的困难，在科学技术干部的使用上应力求合理，以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因此，凡属共同性的科学机构，可集中研究或组织协作；在个别人员上，亦可采取委托任务的协作办法，进行研究、教学工作。

四、争取苏联援助问题

为力争苏联政府的援助，仍需组织代表团赴苏谈判，以便将

中国目前科学技术力量、准备情况，以及中国同志的积极情绪作较系统地反映，进一步了解苏联在这方面的情况，争取给予我们更多的援助。同时我们应考虑从其他兄弟国家聘请专家来华，进行某些专业（如无线电电子学等）的帮助，和某些技术设备的援助。

五、为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

应设法搜集外国发行的科学技术情报资料，组织力量进行翻译、复制，以供科学研究和教学参考，并建议经由我驻外使馆设法购买导弹实物样品和元件仪器等。这将给我国对导弹的研究、设计以很大便利。

注　释

〔1〕钱学森（一九一一——　　）应用力学、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工程控制论、物理学、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的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我国航天事业的元勋，为我国科技事业，尤其是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上海人。一九五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九届至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2〕“诚实约翰”，是美国一九五四年研制的战术地对地导弹，射程七点五至三十七公里，一九六〇年装备部队，一九七六年退役。

〔3〕指《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

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一九五七年十月）

伟大的南昌起义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我们的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从南昌起义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今天我们回顾当年的斗争，全面地认识它的历史意义，总结它的经验教训，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党和毛泽东同志对于南昌起义早已做出了正确的历史评价，并且规定了以南昌起义的光荣日子——“八一”作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毛泽东同志的许多军事论著已经正确地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加以理论的概括，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学说的高度水平。

恰如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说的：“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

---

* 这是聂荣臻一九五七年十月为纪念南昌起义三十周年而作，原载于《星火燎原》第一期，一九八一年《军事学术》杂志第八期转载。南昌起义前作者任前敌军委书记，于七月中旬赴九江进行起义准备工作，后任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

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1]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和毛泽东同志的其他有关的军事结论一样，是对于南昌起义最好的历史总结。

南昌起义以前，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若干严重的不利于革命的变化。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虽然处在一个强烈的动荡和变化的过程中，但是它仍然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国内反动派正在进行新的勾结。他们正在向革命势力和人民群众进行最残酷的进攻。在北伐战争已经取得了巨大胜利，武汉群众正举行庆祝大会的时候，英、日、美等帝国主义就大量增兵到中国。英国驻威海卫的第二舰队的炮舰和鱼雷艇等二十七艘，已经绕道上海沿着长江溯流而上，并且炮击南京，干涉革命。当时国内新旧军阀也已经进一步勾结起来。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召开市民大会，抗议英舰炮击南京，竟然遭到四川军阀刘湘的大屠杀。事后据刘湘军部传出的消息，这个大屠杀是蒋介石指使的。当时的情况充分表明，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对外受帝国主义的操纵，没有民族独立，对内受反动势力的压迫，没有民主权利。处于这样的重重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只有坚决地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并且要紧紧地掌握武装力量，不让反革命势力抢劫革命的果实。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2]。这正是从实际斗争的无数经验中得出的不可更易的结论。在南昌起义以前，中国革命的工农群众就已经起来，普遍地要求掌握武装。他们跑到各地工会和农民协会去要枪要手榴弹，自动地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他们懂得：在那样残暴的

敌人面前，离开了武装，就不可能有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自己如果没有武装，就没有一切。

我们党在当时已经逐渐地认识到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虽然这种认识还是很不够的，但是比起前一时期却有了显著的进步。以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的叶挺部队为例，这支部队由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所组成。最初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一个独立团的编制，后来扩充成为第二十五师。在北伐战争中，这支部队一直是打先锋的。首先打进了湖南，击败了敌人；接着攻打汀泗桥、贺胜桥，直下武昌城，所向皆捷，因而才给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在整个大革命时期，我们共产党人在军事工作上和政治工作上都发挥了积极的先锋队作用。当孙中山接受了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改组了国民党以后，在伟大苏联的帮助和我党积极的推动下，很快就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创办了黄埔军校，而我们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中都担负了繁重的任务。一九二五年的二月和十月，广东的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事变[3]等战役，共产党人出力最多，终于打垮了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等的叛乱，巩固了当时广东的革命根据地。接着，我们党推动和支持国民党发动了北伐，并且在北伐进军过程中，我们党的各省组织，特别是两湖[4]和江西等地的党组织，动员了广大的工人和农民，起来支援北伐战争，配合北伐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无论在军队中或是在地方上，由于我们全体同志不顾一切牺牲，英勇奋斗，前仆后继，只半年左右的时间，北伐军就由珠江流域打到了长江流域，进入河南，节节胜利。全国人民都以为这次大革命的完全胜利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客观形势却向着一般人估计的反面发展。

由于买办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他们同我们党的合作一开始就准备了分裂，他们包藏祸心，阴险毒辣。而我们当时缺乏经验，上了一个大当。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北伐初期势力

不大，羽毛未丰，处处要求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在军队中他们要求我们去做政治工作；在战场上要我们冲锋陷阵；在地方上要依靠我们同工农群众的亲密联系，要人力，要粮饷，要情况，要办法。总而言之，要我们替他们去拚死命，替他们去打天下，等到自己羽翼丰满，势力雄厚的时候，他们就要一脚踢开我们，并且要想一下子就把我们斩尽杀绝。北伐后期的国民党反动派正因为看到革命战争节节胜利，他们的势力强大了，于是就背叛革命，取封建军阀的地位而代之，张开血口，实行“反共”，要想把工农群众永远践踏在脚底下，好让他们为所欲为地实行买办资产阶级的专政。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坚决地掌握党和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坚决地发动群众，武装工农，消灭封建，挖掉地主资产阶级的老根，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是，我们当时没有能够这样做。尽管有许多同志提出了正确的主张，也不能普遍实行。整个说来，当时我们的党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支配之下。这条路线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陈独秀把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变成套在无产阶级脖子上的枷锁。他根本不敢胜利，也不懂得怎样去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巩固革命的胜利。他看到工农群众一起来就害怕了，怕“破坏”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他不懂得只有无产阶级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只有工农群众真正得到了革命胜利的果实，有了强大的力量，资产阶级才不敢破坏统一战线，即使他们企图破坏，我们也才能够粉碎他们的阴谋。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出卖了革命。他只叫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为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去卖命，去当“苦力”，替资产阶级打天下，而不叫工人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工人农民起来了，他却不许要政权，不许要武装，不许要土地，不许触动地主资产阶级的命根子。这样他就抹煞了农民土地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破坏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同盟军的关系，维护了地主资产阶

级的利益，从而使党和工人阶级以及一切劳动人民完全陷于被动的和毫无权力的地位。广大农民当时都要求向豪绅地主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分配土地，陈独秀却竭力反对，并且污蔑农民运动。对于工农群众自动武装的要求，陈独秀更加反对，甚至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这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必然断送掉中国的革命前程。

毫无疑问，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正符合于当时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符合于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当时反革命势力就利用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错误，猖狂地向革命势力步步进攻。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蒋介石下令解散南昌市党部，十七日又命令杨虎指使青红帮流氓，到处进行反革命活动，包围攻击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接着派兵占领了这两个机关。四月六日蒋介石、汪精卫等举行秘密会议，商定要使共产党停止一切活动。四月十二日就开始了上海的大屠杀，蒋介石完全公开地叛变了革命。四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调遣皖北的军队威胁武汉。五月十七日夏斗寅叛变革命，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包围长沙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大肆屠杀工农，这就是“马日事变”[5]。虽然在夏斗寅叛军攻到武昌附近的时候，叶挺部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生曾给予叛军以严重的打击，粉碎了这次叛乱，但是这并不能扭转当时急剧恶化的形势。七月十五日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党也公开宣布背叛革命，开始大规模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

而对着当时的严重形势，我们许多同志决心要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决定举行南昌起义。这个决定是在紧急的情况下做出来的。这个起义正如后来举行的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所说的，乃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当时我们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有驻在九江的由叶挺同志

率领的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的二十四师，有驻在马回岭车站的第四军二十五师的两个团。还有由贺龙同志率领的第二十军，新从鄂东开到九江，这支部队在北伐时期树立了卓越的功绩。在南昌方面有朱德同志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在武汉方面有卢德明等同志领导的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还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也完全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当时敌人在南昌方面的力量却比较空虚。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正在庐山，他所属的第三军和第九军分别驻在吉安、进贤一带，南昌城内敌军只有朱培德的一个直属警卫团，第三军的两个团，第九军的两个团，第六军的一个团，加上机关人员，总兵力约一万余人。我们估计起义可以成功，行动的计划就决定下来了。

起义是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一九二七年的八月一日清晨二时，南昌城内响起了起义的炮声。由于我军布置周密，对敌军进行突然的打击，仅仅五小时就全部解决了战斗。起义胜利了。参加起义的部队约有三万多人，整编为九、十一、二十军，仍然沿用了旧的番号，第九军，副军长朱德同志；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同志；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同志；还有若干警卫部队，共有十五个团的兵力。只有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员，因为途中受阻，没有赶上起义。前者由卢德明等同志率领，转入湖南，成为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湖南地区秋收起义的一部分武装力量。后者被张发奎强迫改编为第四军教导团，[6]随张发奎到达广州，后来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

南昌起义的胜利大大地震动了敌人。南京、武汉、广州的反革命势力，立即联合围攻起义军。

当时起义军的力量是不弱的，客观的条件也是有利的。在江西和两湖，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广大农民正在迫切地希望革命的武装力量去支援他们。如果我们当时就

在南昌一带把力量展开，面向农民，与湘、鄂、赣广大群众运动相结合，广泛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就完全能够大大地推动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因为中国的革命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也就是农民战争。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不能有一时一刻脱离广大的农民同盟军。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是依靠什么力量呢？农民！进行武装的革命斗争要依靠什么力量呢？农民！如果离开了农民，我们就将一事无成。

事实上，当时在江西、湖南、湖北各省，不但铁路和矿山的工人群众普遍地组织起来了，特别是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已经震动了全国。如果我们当时有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把南昌起义的武装力量和工人农民的运动结合起来，就在这个重要的战略地区，进一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建立乡村的革命政权，创造革命根据地，高举红旗坚持革命斗争。可以肯定，由于这个地区的群众已经起来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革命战场，我们可以凭借着有利的群众条件，不断地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革命的阵地。当时国民党内部是不统一的，新军阀互争雄长，不相上下，只要我们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各种矛盾，就能够各个击破敌人，不断消灭敌人。当时只要我们能够在广大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依靠根据地来发展革命战争，我们就能够不断地扩大根据地，并在扩大中巩固根据地。这样波浪式的发展，正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我们当时还缺乏这种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思想，而希望回到广东重整旗鼓，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再举行北伐。于是就形成了单纯军事行动的错误方针，因而招致了新的失败。

广东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非回去不可呢？广东并没有特别好的条件。英勇的广东工人和农民曾参加了反帝反军阀、创造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斗争，起了伟大的作用，但是他们和其他地区

的劳动人民一样，没有从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制度下面解放出来，广东封建势力的老根依然存在，特别是四月十五日以后，广东的工农运动受到严重的镇压，广东的革命根据地已经变色。当时我们想打回到广东依凭于海口争取外援，这是一个原则的错误。在当时的形势下，重新占领大城市是已经不可能的了。我们应该把革命力量从城市转入农村，在自力更生的条件下争取外援，而不应该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外援上面。这个原则上的错误，也是造成当时整个行动错误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起义军终于在八月六日全部离开了南昌城，也离开了南昌附近的广大地区，孤立地南下了。当时归叶挺同志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的第十师蔡廷锴所部，作为南下的前卫部队，在出发的第二天，竟然向浙江方面逃跑了。第十师三十团团长是共产党员范荩同志，作战英勇，北伐期间树立了多次战功，后来被胁迫离开该师，不知所终。当时南下的起义军还有许多没有经过严重的考验，成分也不够好，革命的立场不坚定，这又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可以想象得到，在旧军队中，无论有没有我们党的领导，无论党的工作是强还是弱，如果不经过根本改造，原有的组织形式和思想作风是不可能适应新的革命任务的。而改造这些军队的最好方法，必须要有党的基层组织并与当地的群众运动相结合，在斗争中改造部队的成分，吸收新鲜血液，锻炼和考验大批干部，树立新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使部队在思想作风上根本改变面目。我们在南下中虽然感觉到这些问题很严重，但是还不懂得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老实说，我们那时候还不会打仗。遇到敌情，不论在战术上战役上都没有周详的歼灭敌人的作战部署和计划，因此常常没有消灭敌人，而只是把敌人打垮，自己也有许多伤亡。很明显，依靠这样的军队，要想在革命失败以后去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南下途中，经过临川、宜黄、广昌、瑞金等地，沿途没有做

什么群众工作，以致群众不了解起义军的性质，起义军也经常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天气炎热，给养困难，士兵害病逃亡的现象相当严重。向瑞金前进的时候，得悉钱大钧、黄绍竑的反革命军队约十几个团的兵力，已经进驻瑞金的壬田市和会昌，威胁我军前进道路的侧背。我军当即决定攻击壬田市的敌人，并且进攻会昌的敌人，然后折回瑞金，转道福建的长汀、上杭，进取广东的潮州和汕头。我军于九月二十四日进入潮汕，但是部队得不到适当的休整和补充，而敌人却以逸待劳，从容地在潮汕附近集结兵力，并且在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军舰配合下，向我军进攻，我军终于因为众寡悬殊，而遭受了挫败。

当我军进入潮汕的时候，曾决定由朱德同志率领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将二十军的第三师留守潮州。这样分兵把口的结果，就使得最后向揭阳进军的主力部队只剩下了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的第一、二两师，共计不足六千人，进到汤坑，遇到敌人新编第三师薛岳等部，一场恶战，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后来双方都撤走，未分胜负。而当我军在揭阳方面失利以后，黄绍竑乘机又攻我三河坝朱德同志的部队，切断了我们之间的联络；当我军向海陆丰前进的时候，在普宁的流沙遭到敌人的袭击，指挥系统被截断，而部队又发生了大批的逃亡和叛变。这里又不能不指出因分散兵力而造成的错误，这种错误当然是属于战术性质的错误。当时如果在战术上不犯这些错误，也许不至于使我军失败得那样快。但是，这并不能扭转因整个战略方针上的错误所造成的严重不利的战局，这是一个无可换救的失败的局面。

失败后的一部分部队同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撤出的武装相会合，在东江地区继续活动，后来又因为在政策上和军事上犯了地方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错误，也失败了。只有留守在三河坝的二十五师，在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下，收容了零散的部队，沿着福建、江西、广东的边境向西进军，经过艰苦战斗，进入湖南，结

合农民群众，发动了湘南的年关武装斗争；后来这支部队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合，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后来中央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的前身和基础。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充满了革命的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这是我们的党领导我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及革命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反动派彻底决裂之后，单独地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并且唾弃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坚决地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开端。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便打开了新的一页。这个起义的胜利和失败，是同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失败相关联的，这是当时全国革命的高潮和低潮的整个形势的反映。在南昌起义以前和以后，划分了中国革命战争历史的两个不同的阶段。研究这两个阶段转变中的胜利和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对于广大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将具有极其深刻的教育意义。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方向是正确的。我们的党当时还很年轻，却已直接参加和领导了中国的大革命。由于我们还没有经验，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经验，所以这个失败是难免的。但是，这个失败作了我们的反面教员，使我们从中吸取了极其可贵的经验教训。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南昌起义以来，我们共产党员和无数革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斗争经验，已经高度集中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并且不断地发展着和丰富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我们的战友们和烈士们的革命精神和他们所献身的革命事业，随着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发展，正在整个亚洲，在东方，在全世界发射着万丈光芒！

注 释

〔1〕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一九九一年六月版，第五四七、五四八页。

〔2〕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一九九一年六月版，第六三四、六三五页。

〔3〕杨、刘事变，杨，即杨希闵，当时任驻粤滇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广州革命政府委员；刘，即刘震寰，当时任驻粤桂军总司令兼广西省省长、广州革命政府委员。一九二五年六月，杨、刘勾结在一起，发动叛乱，亦称杨、刘事变，企图颠覆广州革命政府。国民革命军从东江回师广州，迅速平定了这一叛乱。

〔4〕两湖，指湖南、湖北。

〔5〕"马日事变"，中国韵目代日表上，二十一日称"马日"，故称马日事变。

〔6〕第四军教导团，是由叶剑英向张发奎建议而成立的，保存了部分革命力量。

关于尖端、精密生产和研究工作中的清洁和秩序问题*

（一九六〇年十月四日）

今年以来到各地看了一些工厂、科学研究所和大学。其中不少单位在清洁和生产秩序方面情况不好，即使是承担有关精密、尖端技术任务的单位，情况也不好。人不讲究卫生，就会生病，生产和科学研究不注意清洁和秩序，产品也要得“病”。看来，工厂、研究所和大学都有必要根据爱国卫生运动和提高产品质量的要求，充分发动群众，加强检查，注意清洁，注意生产秩序，以养成认真对待质量的习惯。

不同的生产，对清洁的要求固然有所不同，比如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把一座高炉的清洁条件和一台精密机床一样要求，但是任何生产都应该有一定的清洁标准。现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做尖端、精密产品的单位，本来是有必要也有条件保持高度清洁的，但是清洁工作也没有搞好。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车间或试

* 这是聂荣臻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十月十八日，中央书记处批示指出：“在工业生产和研究工作中，特别是精密和尖端技术的工作中，经常注意清洁和生产秩序，是很重要的。它对掌握尖端精密科学技术和保证产品质量，有着重大的影响。希望你们根据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在抓产品质量当中，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发动群众，加以检查，采取措施，定出制度，不断改善。”

验室中尘土、油污很多，有的单位把许多标语、大字报悬挂在有精密设备、仪器的车间或工作室里，而不是张贴在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公共场所中，因为纸片上积尘很多，灰土不断飘落，反而给精密设备和产品带来损伤。宣传讲话和文娱节目一般是应该在上班前、下班后和在公共食堂、俱乐部、广场上广播的，而有些本应十分安静的车间，却在进行紧张生产和需要精神高度集中于工作的时候大放广播，其实人们也听不清楚，而且嘈杂不堪，分散注意力，增加疲劳，很容易招致质量事故和工伤事故（张贴大字报和广播，还有一个保密问题，机密的事情就不应该广播或写在大字报上）。对设备工具的使用、维护、保养也注意不够，特别是有些单位用精密设备来加工粗活，使设备很快就丧失了精密度。一件产品，特别是精密尖端的产品，从原料材料的检验、保管、半成品或零件的存放、加工，成品的装配、检验，一直到包装出厂，都应该有准确的规程秩序，才能确保质量，而有些单位现在还没有建立起必要的制度与秩序，存在着许多影响质量的漏洞。

正如毛主席和中央一再指示的，在人民群众生活中大搞爱国卫生运动，绝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消灭疾病、增强人民体质、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的大事。在生产和研究工作中，特别是有关精密和尖端技术的工作中，注意必要的清洁和秩序，也绝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于我们在现代工业上能否过质量关的大事情，是掌握尖端精密科学技术的起码条件。对于仪器仪表、精密设备、无线电技术、喷气技术、新型金属材料、化学试剂、高能燃料以及制药等行业，更是重要。生产中的不清洁和秩序紊乱，是发生质量事故和人身事故的重要原因。例如，我们在试制某一种新型发动机当中，零件加工的不清洁，曾是发生爆裂的主要原因。某种发动机的涡轮泵，曾发现其中有螺丝钉头，石墨舵中有布屑，幸亏及时清除，才免出大事故。某厂制造十万千瓦发电设备，在装成试车时，竟检查出其中有石子。有些军用精密产品，每个零件

都按工艺规程做了，因为加工处理过程不干净，装起来不合格，一再返工报废。这些问题如不及时纠正，不但损失很大，而且会发生重大事故。上面这些事例，固然并不完全是不讲清洁之故，有些是政治破坏事故，但是也说明我们在生产秩序、清洁、保卫、保管等工作上有漏洞，予敌以可乘之机。因此这些单位在提高政治警惕的同时，应该十分注意清洁，整顿秩序，否则在今后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为此，各地党委，各有关部门在抓爱国卫生运动和抓产品质量当中，对工厂、研究所和大学的清洁情况和生产秩序要进行检查，特别是对于有尖端技术和精密产品的单位要严加检查，务必按照不同的生产性质，限期达到必要的要求，注意清洁，注意生产秩序，以养成认真对待质量的风气。同时，各地方各部门在确定工厂、研究所的布点时，应考虑各类单位的环境条件，注意不要把清洁要求高的单位和烟尘、污染较多的单位放在一起。

在五院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〇年十月九日）

今天我们来开个座谈会，请大家畅所欲言，交换意见，并且和大家谈谈心。既然是谈心，同志之间无话不可谈，我们就谈得深一些，要求大家也和我一样，坦诚相见，有话即说。

我今天要谈的是两个问题：（一）我们五院所处的形势和任务；（二）对大家提出几点希望。

（一）

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对五院的事业很重视。我们大家肩膀上的担子很重，也很光荣。

形势部分（略）

我们要尽力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以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同时，我们自己要准备两手，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手是揭露敌人的“和平”欺骗，争取真正的有利于人民的和平，一手是作好一切准备，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要有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我们要用

* 这是聂荣臻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九级以上教授、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最快的速度，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建设得越快，越强大，就越能制止战争，或者在战争中越早取得胜利。我们五院的事业就是要建设我国自己的导弹技术，是我们现代化国防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帝国主义者，最害怕的是具有高度革命觉悟的、英勇的中国人民获得了现代化的核子、火箭武器。资本主义国家的头子们和外国报刊上经常议论我们这方面的进展，总以为我们不能自力更生地把导弹工业很快地建立起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都很关心我们的工作，经常督促鼓励，并给我们以人力物力上的各种条件，希望我们给国家争一口气，尽快地把自己设计的导弹搞出来，尽快地建立起强大的导弹技术基础。中国人民是有志气有骨气的，我们大家都是有志气有骨气的革命干部，我们一定能够争一口气，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埋头苦干，急起直追，攻克这个堡垒。

从我们自己的工作来看，五院这几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到高，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059”[1]的仿制已经基本上完成任务，我国生产的第一颗地地导弹，不久即可在祖国的大地上试射[2]。通过这次仿制，我们可以掌握苏联资料和技术（当然还要经过发射的考验），现在就要前进到自己独立设计的阶段。自己研究，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当然要比仿制难得多，但是这一关非过不可。我看，只要我们鼓足干劲，化气愤为力量，我们也一定能够过这一关。苏联专家最近都走了，我们大家把技术上的担子全部挑起来了，结果怎样呢？前两天五院几位领导同志向我汇报，说苏联专家走了之后，大家都勇于负责，干劲很大，甚至有些问题专家在的时候解决不了，专家走了之后我们自己摸索解决了，而且解决得很好。我不是提倡骄傲，我们在总的技术水平上，距离苏联的水平还远，过去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仿制，掌握技术，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前一段

的打基础，也不能有现在这么快的发展，我们始终是感谢苏联人民的帮助的。但是我们自己更要有信心、有志气。我们一定能够用自己的双手，设计和制造出我们自己的导弹。苏联的导弹技术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他们从“1059”制成到洲际导弹上天，也大约是十年左右的工夫。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总路线[3]，有在座的及全院同志的干劲。中国人也绝不比任何人笨。我相信中国专家和中国工人的智慧和力量，我们一定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搞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

自力更生，发奋图强，争一口气，突破从仿制到独立设计这一关，迅速发展提高，建立我们自己的高度技术水平的导弹技术体系，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的光荣任务。这个任务的完成，不但会增强我们的国防力量，而且对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都将产生影响。我们是我国第一批火箭科学技术队伍的战士，我们一定要坚决完成这个战斗任务。

（二）

完成任务依靠谁？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五院的队伍主要是三部分组织起来的。一是领导骨干，是经过战争和革命锻炼的干部，他们在政治和组织上担负着领导工作。二是技术骨干，这是在理论和实际工作经验上比较多的高级技术人员，在技术上负主要的责任，在座的各位同志就是这些骨干。三是年青人，他们是工作中的生力军。我们这里也是一个“三结合”。只要我们这三类干部能够密切地团结起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一条心，一股劲，我们的工作就会大有进展，大有希望。

在座的，从开始筹备就到五院来，到现在组成这样一个队伍，做了很多工作。大家在仿制“1059”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专家和苏联专家共同工作，带领年青的技术人员，作了很多

事情，而且也自己独立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但是，过去是仿制，研究和设计工作基本上是国外做过了的，工艺也有国外的规矩可循。因此，我们自己的研究、试验、设计工作并不多，今后就不同了。自己独立设计，这些工作量就大了，我们自己专家的作用也就更大了，英雄就更有用武之地了。在苏联专家还在的时候，我就一再说过，我们要向苏联专家学习，而不是依赖苏联专家，无论在什么时候，我国火箭技术的发展都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己的干部和工人。现在大家都很着急，都想作更多的事情，更快地提高自己，以适应工作的需要，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有这股劲，就一定能够成功。各位在技术上比我懂得多，我只想就政治上和工作方法上，根据大家当前的情况，提出几点同志式的意见，以供参考。

这些意见可以归纳为这样几句话："加强学习，加速进步。勇于负责，技术民主。提高自己，培养后辈。又红又专，终身努力。"

1. 加强学习、加速进步

经过反右[4]、整风[5]、双反[6]等历次政治运动和一九五八年以来"大跃进"[7]形势的教育，通过在五院工作中的亲身体验，同志们都大有进步，绝大部分人都进一步的向党靠拢，听党的话，跟着党走，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中一些同志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更多的同志正在努力争取作一个党员。但是，是不是我们在立场上观点上和思想方法上都已经没有问题了呢？不是的，问题还有。形势要求大家进一步加强学习，加速进步。有的同志政治上不够开展，不敢暴露思想，不能主动进行自我改造，谨小慎微，存有戒心，"逢人只说三分话"、"和气忍让第一"等等。总之，和党还存在一定距离。这个距离要取消。其实，组织上是信任同志们的。上面说过，许多同志是从筹备的时候就参加了五院的工作的，大家都共事多年了。五院是个最机密的部门，党把你放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与工作有关的机密就交付给你了，还有什么信

任不信任的问题呢？我们不单现在在一起工作，而且将来也在一起工作。五院就是大家的家，五院的工作就是大家的终生事业，我们希望同志们下决心在这个光荣的岗位上干一辈子，为国防技术献出自己的一生，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这是万世之荣，大家有多大本事就尽管发挥。因此，并不存在组织上是否信任的问题。至于在运动中考查一个人的历史或者帮助你搞清哪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是为了帮助大家改造，对工作是必要的，同时也是组织对同志在政治上的关心和爱护。尽管在个别人身上所用的方式方法也许厉害了一点，但是良药苦口，事后大家可以想一想，是背着包袱好呢？还是卸掉包袱阔步前进好？而且清查过了，批判过了，只要真是清楚了，还不是一样的给予很重要的、机密工作吗？因此，请大家不要心存隔阂，三心二意，只要你相信组织，靠拢党，向党交心，积极要求改造，党没有不相信你的，党一定会帮助你改造自己，提高自己。

同志们绝大多数都迫切要求更快的自我改造，这是进步的表现。立场观点的问题不解决，观察问题，处理事情，作人作事都不会正确，不能与组织和群众溶合在一起，也不能做到干劲十足，心情舒畅，工作就做不好，自己也感觉苦恼得很。但是有些同志对改造缺乏勇气，缺乏信心。缺乏勇气，就是撕不开面子，放不下架子，脏东西舍不得拿出来，不敢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其实大家都是旧社会过来的，沾染了一些旧东西，并不奇怪，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自己舍不得丢掉。就是共产党员，哪怕是很老的党员，也还要不断改造自己，不断的学习才能跟得上形势。大家就更不要顾虑了。有的同志以为年纪大了，没有信心，其实不然。在座的同志比我年纪大的恐怕很少，正当壮年，今后要做的事情还多得很，象大家都知道的刘仙洲[8]、陈垣[9]等老先生都能够争取入党，我们还怕年纪大改造不好吗？改造的关键问题是靠拢党、和党一条心。改造的途径，周总理曾经指出过：一是通过

社会实践，二是通过学习马列主义，三是通过业务实践。这几条途径我们都是完全有条件走的，条件很好，又为什么自甘退步呢？

我看我们大家都要拿毛泽东思想战胜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精神武器，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都要经常学习、掌握这个武器。我希望大家在政治进步和思想改造上面也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来个跃进。我预祝同志们明年这个时候再来总结一年来的进步，获得思想上的大丰收。

2．勇于负责、技术民主

组织上信任你们，把技术上的负责岗位交给你们，苏联专家走后，技术上的担子就更重了。因此就要求大家在技术业务上更加勇于负责。有些同志在工作上不够大胆负责，甚至看别人的脸色说话，不敢拿出自己在技术上的见解，这是不对的。工作当中要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当然不是毫无根据的意见。凡是应该自己负责的事情就勇敢地担起来。我们要提倡在科学技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提倡大家在技术上说真心话。技术上的问题，不同的意见要大胆提，充分讨论。大多数的问题，经过讨论是可以趋于一致，可以选定比较正确的方案的。如果一时定不下来，也可以暂不作结论。有的问题要求及时处理，而条件所限，又不能几个方案一起试验的，那就可以通过大家讨论研究拟出一个可能比较正确的方案，先进行试验，让实践来做结论。如果条件容许而又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几个方案都进行试验。总之，对科学技术的问题，大家都要服从真理，而真理的标准就是实践的验证。我们鼓励大家试验。科学研究试验，本来就有不成功的可能，重大的试验，往往要经过多次失败才能成功。因此，领导上要给予支持。只要大家尽了心，用了力气，失败了不要紧，要打气，绝不要泼冷水，更不会追究责任，要坚持下去，吸取经验，反复试验，直到成功为止。大家不要畏首畏尾，要拿出主人翁的态度，勇于负责，敢于发言，大胆工作，党和领导上是支持你们的。

更重要的是技术民主，就是在技术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大家过去缺乏群众斗争的锻炼，受的教育又都是资产阶级体系的教育，因此还不善于吸收群众的意见，不会做群众工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们是技术上的骨干，应该在技术上起带头作用，因此，必须要努力学会走群众路线。跟打仗一样，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勇敢总是有限的，要把群众的智慧和勇敢集中组织起来，才能取得胜利。技术上也是如此，一个人考虑技术问题总有不周到、不完全切合实际的地方。动员大家来想，大家来提方案，然后把这些好的想法都集中起来，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方案。同时经过群众讨论，群众对这个任务就有了底，就会主动地想办法，克服困难，就比单纯的从上而下的布置、由群众机械的执行任务要好得多。有些科学技术专家事无大小，都要自己单干，自己考虑，不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不吸收群众的智慧，这是一种手工业的工作方式，不是现代化大生产的方式。现在你们一个人带好多助手，应该善于发挥群众的作用，把任务、问题，完成任务的途径等交给群众，大家讨论，分头研究，这就总比一个人单干要快得多、好得多。技术革命的过程，是群众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群众智慧不断发挥和集中的过程。我国几年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充分证明了科学技术上不但可以走群众路线，而且必须走群众路线，这是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根本道路，要多快好省地发展我们的导弹技术，就必须走这条道路。听说一分院三部和二分院[10]的一些专家同志带动群众提方案，提意见，结果技术上和思想上都得到很大的收获。有的同志说："过去我只相信我自己，现在感到群众的智慧比个人高明得多，有些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大家一讨论，主意一凑起来就解决了"。我看这样作得对，应该推广这样的工作方法。

3. 提高自己、培养后辈

大家在技术上都不应该自满，应该努力提高自己。大家是我

国第一批火箭技术工作者，是在火箭技术上带头的技术专家，党对你们有很大的期望，来日方长，将来要完成的任务还要更多、更高，所以不但要做好现在的工作，而且要不断提高自己，永不停滞。对此，我有几点建议：一、无论是年长的年青的技术人员，都要有时间学习提高，要有时间看书、查资料，作研究工作。在关键的时候，突击一下也是必要的，但不能把加班经常化，要注意劳逸结合，保证有学习、提高的时间。领导上要为技术人员的学习研究时间创造条件。我们现在要抢速度，时间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因此，要十分珍惜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时间。例如，劳动锻炼可以结合工厂、实验室的劳动，不必非下乡劳动不可；刚毕业的学生要让他从速参加专业工作，免得把学校学的一点东西都忘记了；一些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可以精减一些，作行政组织工作的干部要把行政事务工作承担下来，尽可能让技术专家们专心从事研究、设计工作（例如我们把钱学森同志从行政事务中摆脱出来，专任管技术工作的副院长）；要给各位专家准备必需的物质资料条件，如阅览室、图书室、外文书刊、技术情报资料等等。二、正确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理论从实际中来，理论要经过实际的验证。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都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不能狭隘的了解联系实际，有的同志竟把看书、查资料、研究理论，进行理论计算等都说成是脱离实际，那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重视理论研究，应该看得远一些。五院本来就没有什么纯理论，最后都要搞出成品。没有理论，光有实践，实践就将是盲目的，没有方向，没有把握，更不能提高。我们现在要独立设计，理论工作的基础还很不够，还要大大发展。三、特别重要的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哲学。科学院和各大学的教授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但对思想改造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对于研究科学技术也有很大好处。特别是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对于科学技术工作者有很大的启示。我建议大家吸取这些经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已出版，

这是一件大事，同志们要很好地学习。

提高自己，同时还要培养后辈。我们应该看得远一些，要培养我们的年青一代。对年青新生力量的成长，我们应该高兴。年青的一代，一定胜过我们年老的一代。我们年长一辈的人之所以艰苦奋斗，就是要为我们的革命后代开辟前进的道路。社会进步就是因为一代比一代强，这是必然规律。绝不能一代不如一代。我希望年长的专家们，要把年青人当成自己的子弟一样，培养他们，在科学技术上尽自己的可能来帮助他们。师高弟子强，我希望大家当好老师，教育出更多更强的弟子。

4. 又红又专、终身努力

这句话不用很多解释。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又红又专的努力方向，要求尽快地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我们每个人所终身努力的就是又红又专，红透专深，活到老、学到老，使自己成为一个红色的科学技术专家。

在这里我想特别谈几句关于力戒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的问题。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青的，万万不要向党和人民翘尾巴，讲价钱。任何人只要翘了尾巴，没有不在前进道路上摔跤的。全国人民正在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个人和这个伟大的事业比起来，真是渺小得很。任何个人主义、名利地位、自满自大等等都是庸俗的低级趣味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的脏包袱。它只能腐蚀自己的革命意志，成为自己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因此，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告诉我们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真理，切不要把在党的领导下做出的一点工作，作为自己的本钱，闹个人主义，向组织翘尾巴。我们大家都要永远唾弃这种低级趣味的东西，兴无灭资[11]，作一个高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永远朝气勃勃的红色专家。

（三）

今天我还想请大家来提提意见。五院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组织工作是做得好的，同志们都觉得在政治上、技术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工作上、生活上都有许多便利的条件，这就是证明。全院的政治工作人员、行政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一切人员的工作都很努力，做得不错。当然，由于缺乏对知识分子工作的经验，而且草创期间条件也未完全具备，因此，在具体工作上也有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例如，在政治思想工作上如何充分发挥我们自己专家的作用，如何结合各类人员的特点进行工作做得还不够，个别谈心少，方式方法还不够活泼，有些问题解决得不够及时，会议多了一些，时间安排也有些缺点等等。希望所有在座的同志都坦率地提出改进的意见。今天有各室的政治委员同志参加。过去大家合作共事，政治委员同志对大家有很大帮助，起了政治挂帅的作用。政治工作是灵魂、是统帅，是一切工作的保证，今后我们要更加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我希望专家同志们要更主动的向政治工作人员谈思想，谈工作，商量问题，交换意见，彼此更密切地合作互助。我们做政治工作的同志是从部队里来的，带来人民解放军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这是很好的传统。而专家们和青年技术人员都来自其他的单位，对部队的工作方法、制度不熟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家切不要产生误解，以为政委就是监视人、整人的，甚至以为象国民党的政工人员一样，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我们搞军队的人都知道，政治委员是自己政治上最可信托的同志，是大家最知心的朋友。在座的政治委员同志都是愿意在政治上帮助大家提高，共同努力，作好工作的，我希望大家把已经形成的团结合作关系更进一步密切起来。我希望政治委员和专家们共同研究一下各自的工作方法，坦率地交换意见，彼

此多谈知心话。只要我们老干部、专家、年青的同志同心协力，扭成一股劲、一条心，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以成倍、成十倍的高速度前进。

同志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这几年走过的道路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初步的基础，初步形成了一支队伍，已经能够开步走了。五院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是令人兴奋的。我们的任务是光荣的。我们所做的事情还仅仅是开始，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在今后的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甚至还会有挫折，我们要作好思想上的准备，在困难的面前，我们绝不要气馁，我们坚信，只要我们认真对待困难，埋头苦干，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我们的事业就是在不断克服困难当中前进的。党和国家对我们国防科学技术工作者寄予殷切的期望，我们一定要不辜负这个期望。我们五院的同志们，在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下，和有关部门、工厂密切合作，一定要发奋图强，埋头苦干，一条心，一股劲，力争以最快的速度，最可靠的质量来完成党中央和军委交给我们的光荣的战斗任务。

注　释

〔1〕“1059”，是指我国仿制的苏联“P－2”地对地近程导弹的代号，射程约五百九十公里。

〔2〕试射，指一九六○年十一月五日，聂荣臻亲临现场主持的第一枚“1059”发射试验，并获得成功。

〔3〕总路线，指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4〕反右，指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当时，极

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党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

〔5〕整风，指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6〕双反，指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月《人民日报》社论提出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

〔7〕“大跃进”，是指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后，在全国形成的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到一九六〇年冬，“大跃进”运动才被停止。

〔8〕刘仙洲（一八九〇——一九七五），工程教育家、机械工程学家。河北完县人。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他是我国最早从事工程教育的著名教育家，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他热爱党，一九五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七五年因病逝世。

〔9〕陈垣（一八八〇——一九七一），史学家。广东新会人。解放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热爱党，一九五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七一年因病逝世。

〔10〕一分院三部和二分院，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第二分院，成立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

〔11〕兴无灭资，指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

关于西北地区国防工厂情况的报告*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这次我们到西北，从兰州、宝鸡、虢镇、兴平到西安。在这一线上，今年有生产试制任务的国防工厂共二十一个，看了十八个，找了一些干部谈话。三机部的工作组也反映了一些情况。简报如下：

一、有些改进，问题很多

总的说来，自中央九月十三日电话会议[1]以后，各厂发动群众，大抓质量，两个多月来有些改进，但是问题仍然很多、很大。这十八个工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领导决心大，发动群众充分，对关键问题心中有数，解决了一些质量问题，有的正在陆续解决，各项管理制度正在建立和贯彻，工厂工作已经走上轨道，产品质量情况有所改观。这一类工厂目前还是少数。象西安航空发动机附件厂就是例子，这个厂认真深入地开展了提高质量的群众运动，坚决贯彻了各项管理制度和文明生产，目前产品质量较为稳定，今年担负的二十种产品中，已有十七种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返修报废的数字也较小。大多数的工厂属于第二类，

* 这是聂荣臻视察西北地区国防工厂后起草的，以他和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赵尔陆名义给中央军委并党中央的报告。

这类工厂的领导思想开始扭过来了，但是决心还不够大，抓得还不够狠，群众开始动起来了，但是认识问题解决得不够彻底，也还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攻关键，对产品质量问题的症结所在还是不够清楚，各项制度没有认真贯彻，工作没有走上轨道，产品质量问题还很多。还有第三类工厂，领导思想还没有扭过来，没有把质量运动当成自身的需要，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领导上对产品的质量问题心中无数，各项制度很不健全，工作仍然混乱被动，产品质量情况很坏。象宝鸡厂和兴平厂就是例子。这两个厂都发生了严重的质量事故，生产的测距机、示波器、高度表、小电机，都在大量返修，但是工厂领导没有从这些事件中认真总结经验，得出教训，还没有深入发动群众来彻底扭转质量不好的情况。直到现在，前者的三种主要产品没有一种产品算是过了关的。后者在五十五个品种中，有一半没有过关，即使过了关的也不稳定。由于这两个厂产品质量不好，出不了厂，影响着几十个军工厂的产品不能按时配套出厂。

从这些工厂来看，产品的质量问题都没有真正解决，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一类工厂也不例外。多数工厂都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以上的品种未过关，交不出合格的产品。有的过去过关了的老品种，现在又退步了，走回头路，而新品种则大多迟迟上不去，工作很被动，问题严重的工厂靠银行信贷渡日。看来，今后要突出地狠抓军工厂的产品质量问题，突破技术关键，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形成风气，才能打下巩固的基础，带动整个国防工业生产技术水平的大提高。

过去国防工业处在掌握苏联技术的阶段，资料是人家的，国内供应不了的材料就向国外订货；有些关键材料和元件，苏联留一手，就靠进口实物解决；技术关过不去，就请苏联专家。现在形势一变，矛盾暴露出来了，迫使我们自力更生，自己解决问题，一切立足于国内。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些问题，坚决扭转这个局面，

艰苦工作，克服困难，并要把这些困难变成鞭策各项工作前进的动力。

二、工厂需要抓的几项工作

现在有许多产品不能过关，今后又有更多的新产品，需要不断地过关。因此大抓质量的工作绝对不能松弛，必须突破现有的技术关键，把规章制度建立起来，使现有产品的质量能够稳定过关，并为今后生产更多的更高级的新品种作好准备。根据我们所接触的情况，工厂里现在需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提高思想认识

工厂内各级干部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糊涂和错误的认识，而关键又在于厂一级领导和主要科室、车间负责人的思想认识。例如：有些同志把完成任务和保证质量对立起来，而不是在质量合格的基础上来完成任务，似乎是制造出废品也算完成了任务。有的同志仍然没有跳出追求产值、不问质量的圈子，盲目追求产值翻番，不分工厂性质和可比性，一律以总产值的翻番多少来做为衡量工厂好坏的标准，助长了盲目投料、浮夸虚报之风，结果发生了“产值”往上升、产品出不来的奇怪现象。例如西安航空发动机厂，产品试制还没有过关，为了搞产值翻番，就盲目投料十五台分，可能造成浪费。还有些同志现在还怀疑军工产品质量第一的提法，认为这是片面的，甚至说：“总有一天要检查现在片面强调质量的问题的”。有的干部认为这次抓质量是搞突击运动，是临时措施，而不是当做根本性方针，总希望早点收场，以便草率“过关”。有的干部对党委领导与责任制度、群众运动与集中领导、破除迷信与科学分析、大胆创造与通过试验等，缺乏正确的了解，思想上有些顾虑，不敢狠抓质量，不敢建立严格的制度与纪律。有的干部把提高质量看做是少数人的事情，不依靠党委集体领导和

充分发动群众来解决。凡此种种，都说明有些工厂领导对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学习不够，这些思想如不搞通，工作是搞不好的。应该在党委会上把一切不同的看法、一切的顾虑都端出来，结合学习文件，反复地实事求是地进行讨论，以求得领导思想的明确一致，然后才能有力地发动群众，领导运动。

（二）集中人力、物力和领导精力，加强生产第一线

军品工厂的领导精力、技术力量和物力，应该集中到军品生产上面来，集中精力来攻现有产品的质量关，不断地突破新的技术关，决不应该分散精力。在军工任务第一、确保军品质量数量的条件下，多余的力量要生产民用产品，支援地方的经济建设，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必须贯彻军品第一的方针，不断提高军品生产技术，试制新的军工产品，随时做好动员准备，这是军工厂的根本任务。军工厂所安排的民用产品，应该当做军品生产的练兵，必须工艺相近，安排得当，适合工厂的特点，不妨碍工厂主要任务的完成。这次我们就遇到几个主次不分、分散精力的例子。西安地区四个军工厂承担了十套小高炉的任务。这些工厂都是生产精密产品的工厂，生产小高炉很不适合，容易损坏设备，而且这些小高炉占用了军工生产材料，小高炉的设备配套要工厂自己去跑，从加工、制造到基建安装，直到交付生产，都要军工厂包下来。宝鸡的无线电工厂，所承担的飞机用的高度表、敌我识别器等主要军工产品还没有一个过关的，却要和附近公社合办十一个卫星工厂，从本厂设计规定的机床中，抽调一百零五台机床（为原设计规定机床总数的六分之一），其中包括三十五台国外进口的精密机床，拨给了卫星工厂。卫星工厂的工人工资全部由这个军工厂开支，产值是六、四开（工厂六成、公社四成），利润是七、三开（工厂七成、公社三成）。象这样的分散领导精力、人力，占用军工材料，抽调军工设备，军工生产怎么能够搞好呢？过去部局不少负责同志下厂，有些情况由于有官僚主义没有发现，有

些情况虽然发现了，却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既未向省、市委领导同志提出，又未向中央反映报告，这是错误的。这次我们已将这些情况向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同志和省、市委同志作了反映。

为了当前和今后不断地过技术关，要求我们大力加强生产技术的第一线。军工厂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调动频繁，稳定不下来，很不利于掌握技术和业务，同时生产前线力量也较薄弱。例如西安飞机附件厂从开工以来，共调出两千零八十二人（其中支援地方一千零七十五人，输送新厂五百九十二人，动员回乡四百一十五人），其中工艺、设计、检验三个技术科室的主管技术人员，三年未动的还不到百分之十，有的车间在三年内调换了十一个机械师。现在首先要把得力的人放在生产技术的第一线，每个厂起码要有一半以上的技术骨干和生产管理骨干坚决稳定下来，让他们钻进去，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成为这一门技术的专家。过去苏联专家在时，我们自己的技术人员作用发挥的不够。现在苏联专家走了，技术核心还没有形成，许多技术人员和老工人解决问题的本领还不足或者还不敢发言。在技术问题上，我们的发言人还是很少的。每个工厂都要通过工作，加速培养自己又红又专的技术骨干，包括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形成技术领导核心，和广大职工群众结合起来，有信心有把握地具体解决本行业的技术问题。各厂对于这些同志的政治进步、业务学习、生活安排等问题要予以关心，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大胆使用他们。许多工厂的主要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的身体都不大好，而且会议、杂务很多，没有时间学习提高，应该注意改变这种情况。

（三）贯彻严格的工艺纪律和高度的文明生产

严格的工艺纪律和高度的文明生产，是保证军工产品质量的必要条件。这方面不但没有进步，而且不少工厂是退步了。许多厂的工艺纪律松弛，甚至无所谓工艺纪律，怎样做都可以。对于修改工艺规程，不是贯彻“充分发动群众、一切通过试验”的方

针，而是毫无根据地乱改。生产中的清洁文明和秩序，也做得很差，最近虽然中央专门作了批示，但各厂注意得还不够，情况还没有彻底扭转。设备的使用维护很差，有的滥用精密机床来干粗活，加以不少机修工具车间都忙于搞民品生产任务，不搞维修，据三机部工作组调查，现在已有一半以上的设备在“带病”工作。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才建起来的一些新厂，设备都是第一流的，但是现在已经有不少设备“未老先衰”，如不赶快补救，这笔损失将无法挽回。

应该结合这次大抓质量的群众运动，把生产中的规章制度尽快建立和健全起来。目前各厂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无章可循”，二是“有章不循”，比较突出的又是后者。完全没有制度可以遵循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当前大量仿制产品的质量不好，大多是由于不遵守工艺规程、不执行规章制度造成的。例如产品三级检验、工具的鉴定验收、产品定型验收、设备维护等制度，并非没有，而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过去我们从苏联要来了技术资料和请来了专家，交了“学费”，现在不少工厂都把它丢掉了。通过这次运动，一定要根据需要，抓住关键，发动群众，迅速建立、健全和坚决贯彻执行科学的规章制度，才能保证产品质量，并使产品质量能够巩固下来。

（四）大力解决原材料和协作问题

各厂所需材料和协作件，有的订不到货（其中有统配物资、有自销物资）。而订到货的，在质量、数量、品种、规格和到货时间上都没有保证。货源又不能固定，时常变动，使工厂难于掌握规律。这是当前各军工厂普遍存在的大问题。这些军工厂自己所生产的产品，又是飞机、舰艇的组成部分，产品交不出去，互相牵扯，装备交付不了。这些工作，要部局帮助厂里一起抓，切实组织材料来源和协作，否则军工生产势必要落空。现在各厂东奔西跑，有的协作厂和材料厂不愿意承担军工任务，或承担了又不负

责任，或者提出一些不可能办到的交换条件。有的材料和元件在现有工厂不能生产，就要赶快研究试验和采取措施。所有这些问题，都要上面帮助才能解决。看来，要彻底解决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除了各军工厂大抓提高产品质量以外，凡是为军工厂生产原材料和协作件的工厂，也要毫无例外地大力提高产品质量，同样坚决地贯彻“军工产品质量第一”的方针，供应合格的材料和协作件。一些主要材料厂、协作件厂，要由各军种、兵种派军代表驻厂检验，才能使军工产品的质量从头到尾都得到保证。

此外，工厂里还要注意安排职工生活。这方面了解的不多，但是已经发现了一些问题。其中特别是劳逸结合问题，许多工厂尽管任务不满，产品并未过关，但仍然是月初空闲，月末突击，“苦战几昼夜”、“几天几夜不下火线”，结果材料浪费了，人的身体也搞坏了。不少工厂的会议冗长繁多，每天晚上总要开两三个小时的会，职工的学习、休息、处理个人生活，都无时间，这种情况亟需予以纠正。其次，在当前情况下，干部与职工群众如何加强团结，更妥善地安排生活，解决一些应该解决而又有可能解决的生活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我们就遇到有些南方来的工人没有棉被与棉衣，有些车间工段克扣工人应得的粮票（炮瞄雷达厂的一个车间，就扣了三千多斤工人的口粮，名之为机动粮），个别工厂经常没有菜吃等等，这些情况都是不利于职工团结，不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

三、工厂的领导作风问题

这次虽然是“走马观花”，也初步感觉到工厂领导干部的作风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少数质量问题严重、生产混乱情况迟迟不能纠正的工厂，看来与领导作风问题关系很大。我们觉得中央所指出的农村中的五风[2]，在工业生产中也是存在的，在一些落后工

厂中，情况还相当严重。例如拿浮夸风来说，宝鸡的无线电厂主要产品质量都未合格，但却在年初向市委虚报提前二十三天完成一月份的任务（七天就完成一个月计划）。部局有官僚主义，没有及时发觉他们向市委的虚报，市委据此布置该厂的产值任务，工厂则大肆浮夸多报。任务尚未做完，厂部就给车间预发完成计划的红旗，助长了车间工段的浮夸。为了多报产值，就把废品、次品也算产值，连生产中所用的工具、工艺装备等都算作产值凑数。在这样的情况下，质量、工艺纪律、设备维修、文明生产等等都谈不到了，命令风滋长了，加班加点增加了，材料浪费了。

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也不限于农村，向工厂平调的东西也不少。协作、办卫星工厂、支援农业和地方建设，本来都是应该办的好事情，可是有时就在这些题目下搞一平二调。当然工厂也有刮公社的共产风的，比如在副业生产、相互协作之中，有些工厂又占公社的便宜等等。对生产的瞎指挥风，在工业生产中也是存在的。有些厂采取所谓分片的办法，正副厂长、正副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各人分管两三个车间，把工厂的组织机构、技术人员、管理干部撇在一边，有时完全不按工艺规程和规章制度办事，这就常常带来严重的质量事故的恶果。

产品质量搞得很不好的工厂，都存在一些干部不团结的问题，其中比较严重的是厂一级的领导干部闹不团结。这些厂的领导思想不一致，对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贯彻得不好，既缺乏集体领导，又未很好分工负责，不同的看法没有在党委会内放在桌面上来讲清楚，求得一致，这是不团结的根源之一。而且滋长了一种不反映真实情况、掩盖矛盾的庸俗的个人主义风气，许多不合理的事情和矛盾，不再三追查就反映不上来。我们认为凡是这类领导不团结情况严重、业已影响工作的工厂，须由省、市委有关部门和部局派人专门处理。

四、关于基本建设问题

关于基本建设情况，我们看的比较少。任意削低生产厂房标准的作法，从检查成都飞机厂厂房质量问题以后，已经得到纠正。但是有些新厂的建筑和安装的质量还是不好。建筑安装单位也有片面追求工作量的偏向，对质量放松了，不按照设计要求来施工。工作量大就干，小的就不干，因此收尾工程往往不愿承担；有些施工单位不管是否合乎质量要求，一味追求进度，质量坏了也要交工。过去有甲乙双方的合同，有工厂对施工单位的监督制度，现在这种监督制度实质上是取消了，使施工质量毫无监督，建议把它恢复起来。

五、建议作出若干规定

上面所报告的国防工厂中的问题，有一些需要从上面作出具体规定，工厂才好办事。有的规定过去虽有，但目前有必要重申。我们所看到的有以下几条：

（一）今后考核军工厂的计划，以按品种的任务作为主要指标，产值只是这些任务的价格核算结果，不能作为考核指标。只有按品种、按质量、按数量完成了生产任务，才算全面完成国家的计划。凡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不算数量，也不算产值。

（二）军工厂的民品生产任务，必须适合工厂的生产特点，特别不要使军工厂的设备受到损坏。地方布置军工厂的民用品生产任务，要征得部局的同意。军工厂办卫星工厂，要合理安排，并经部局批准。

（三）军工厂的人员和设备未经部局的同意，不能抽调出厂；为军工生产所发的材料，一律不能挪用于非军工生产的用途。

（四）军工厂的军事代表根据已规定的质量要求来验收产品，不合格就不收，当军代表的检验意见和工厂的意见矛盾时，即令是军代表的意见和厂党委的决定不一致，也要请示上级（部局和军事订货部门）决定。工厂各车间的检验人员受工厂检验科和车间的双重领导，而以检验科为主，检验人员根据质量要求来检验产品，认为不合格的，就不能向军代表交付。检验人员和车间意见不一致时，由厂长、党委书记、军代表决定。工厂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监督工作要建立健全，一切材料、资金的使用开支都要有登记、有制度，凡违反制度的资金、材料开支，工厂会计财务部门应该提出制止、检举。

（五）凡是军工厂向材料厂、协作件供应工厂订的货，都要按规定的技术规格严格验收。这些材料和协作件应该纳入国家计划，如不合格，应该退回原厂。军工厂应该和供应厂一起研究问题所在，共同设法改进质量，但是不能把不合格的材料收进来。这些不合格的材料和协作件，必须做到合格交付为止，在未合格交付以前，负责供应的工厂不能算作完成任务，在这个工厂完成计划的统计中，要扣除这一部分数量。材料的代用，要经过试验，其中重要的要经过部局批准，不能随便代用。

（六）几年来，工厂内技术人员、工人全未晋级（大学毕业工作了六七年还是技术员，而中技校刚毕业的学生也是技术员；工人当了几年还是无等级的徒工），这对正确使用干部和正确反映工厂的技术水平情况，很为不利。建议今后工厂的技术人员、工人可以随技术提高而晋级，为了适应当前市场物资紧张情况，工资可暂时不动或少动。建议劳动部和有关部门研究，作出规定。

（七）我们在西安看到各工厂都动员职工家属回乡，这个做法值得研究。现在农村粮食很紧张，职工的父母妻儿，都是老弱妇孺，回乡不能增加生产，反而增加消费；而对职工来说，不但生活上很不便，而且两头开支，增加职工本人的负担。因此，除了

职工的非直系家属而能劳动的，或者是职工家属真正自愿回去的以外，似不宜一般地动员回乡。农村已经出现了紧张情况，在城市就不宜于人为地制造紧张。有的工厂动员的方式很生硬，一进车间门口就贴着大幅标语："同志！你的家属回乡了没有？"有的标语就贴在机床上面，这种做法，弄得人心不安，对我们是很不利的。我们已向省、市委同志反映了这个情况。其他地区如有这种做法，也要注意纠正。

注　释

〔1〕中央九月十三日电话会议，指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三日晚中央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召开的电话会议。会议由彭真主持，旨在研究解决当时国防工业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聂荣臻出席了这次会议。

〔2〕"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一九六〇年十月中共中央部署整风整社时曾提出反对"五风"。

军工生产中的几个问题*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我几乎看了所有的兵工厂，其中大部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或投入生产的。当时我的印象是比较满意的，基本建设、设备、安装的质量都比较好，生产也比较有秩序，军代表制度和质量检验也比较严格，我们出的常规武器和第一批喷气飞机，质量都还是不错的。国防工业在党的领导下，全体职工奋发努力，成绩很大。去年和今年，我又看了中南、西南、西北的一些兵工厂，接触到一些情况，感觉到有许多问题。下面，我谈几个问题。

第一，贯彻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的方针

这是一个总方针。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和林总[1]、贺总[2]的讲话都说过了。最近大家又听了邓小平[3]、李富春[4]等同志的报告，从形势到方针都听了，我不多说。过去国防工业处在掌握苏联技术的阶段，苏联的帮助对我们是有益的，起了不少作用，但是部、局的领导上却滋长了严重的依赖思想。资料是人家的，国内供应不了的材料和毛坯就向国外订货；有些关键材料和元件，苏联留一手，就靠进口实物解决；技术关过不去，就请苏联专家。在形

* 这是聂荣臻在国防工业部局厂三级干部会议上讲话的节录，全文共三部分，这里收入的是其中的第二部分。

势变化了的时候，矛盾就暴露出来了，搞得很被动。我看这样逼一逼，倒是件好事情，我们争一口气，困难反而可以变为推动前进的动力。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这些困难，狠狠地抓紧，一个一个地解决，真正练出自己的本事，打下自己的基础，真正建立起完整的体系，一切立足于国内。

今天各部、委的同志都在这里，我要提一下新型材料和精密技术的问题。现在我们很多兵工厂半停工，部队的装备开不动，很多尖端上不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新型材料，没有各种特殊的和精密的设备、仪器。这些都是国防尖端技术的基础，一定要切实解决。各个工业部门都要有个国防观念，都要为国家为人民的安危负责。美帝国主义在我们门口放火，我们不能高枕无忧。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要你们协作供应的事情，务请你们用国防观念、国家安危的观念来对待。大家要一条心，雷厉风行，分秒必争，积极解决困难，不要官僚主义，不要推卸责任。有时组织实现一件事情很不容易，这一环通了，那一环不通，往返周转，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时间都白白浪费了，很费力，很着急。新材料的建设项目，中央早就批了，原来今年一年的计划，现在用两年来完成都很困难。原因固然很多，但也有不少问题纯粹是办事上耽误了的。有些部门还是没有把配合国防工业的任务放到应有的位置上来。例如一机部承担的几种重要设备，是火箭工业和原子能工业解决材料问题的关键设备，一再商量，结果有的还是推迟到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才交货，为什么不能提前一两年交货呢？据冶金部同志说有些一般的大轧钢机、大高炉不是很急需的，可以适当推迟，我看可以把这几种军工用的重要设备安排提前一些。国防工业和尖端的需要，技术上要求比较严格，大部分是新东西。有些单位就是满足于搞容易的东西，不搞品种、质量，困难的就不想干。这个问题不解决，谈什么自力更生、攀登高峰，提什么高大精尖新，都是空谈。象这类事情，要请各部门检查，切

实解决。

至于国防工业自身的完整体系问题，国防工委[5]已有三、五、八年的初步规划，我们要极力促其实现。我们大家一定要彻底清除依赖、崇外思想，踏踏实实，埋头苦干，把一切工作的基点放在国内。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如果不抓紧时间，尽可能快地完成，我们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时间是不留情的，任何推拖、懈怠，都是对国家、人民的安危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大家都要负起责任。

第二，加强党的领导，依靠群众，加强工厂管理。认真彻底地贯彻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是能否管好工厂的关键

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确定和坚持的工厂管理体制，实践证明，也是完全正确的工厂管理体制。我看到的有些军工厂，执行得不好。有些工厂到现在实质上还是一长制。不是厂长一长制，就是书记一长制。反了厂长一长制，有的厂实际上又成为书记一长制。总之是个人决定问题，没有党委的集体领导。厂长一长制的残余还要继续反对，但是工厂党委书记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偏向，也要反对。我们要实行党委集体领导，重大的和原则的问题，必须经过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不要厂长或是书记一个人来作决定。有些工厂在厂一级干部之间闹不团结，有意见不摆在桌面上讲清楚，其根本原因是集体领导不健全，已经严重地影响工作，要尽快的解决。我们要提倡敢于讲真话、敢于向坏人坏事和不良倾向作斗争的风气。领导干部要善于组织大家商量重大问题，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绝不要个人指挥一切，包办一切。对于技术问题，要特别注意和我国自己的专家、技术人员、老工人多商量，要使我们的技术骨干能够勇于负责。当领导干部的人，不要不懂装懂，个人轻率决定。有些工厂采取所谓分工把口的办法，书记、厂长、工会主席每人把住两三个车间，撇开一切的组织形式和责任制度来指挥生产，撇开技

术人员和工人来工作，这是工厂中的瞎指挥风、命令风，使工厂管理陷于混乱，很不好。工厂原有的有利于生产的制度，应该恢复的就要恢复，不大合适的就要改革，还要根据新的需要搞新的规章制度，不能毫无章法，瞎指挥一通。

关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央和毛主席在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都作过专门指示：《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6]。我希望同志们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这两篇文章好好地学习一下，在党委会上讨论几次，学会正确的工作方法。

工厂里一定要依靠群众，加强政治工作，贯彻中央所指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7]的方针，并且把群众运动和责任制结合起来。我们要依靠群众来管好工厂，这是根本的一条。工厂里的生产、生活，都要依靠群众搞好，而且要事事都有人负责，有人检查，既有明确分工，又有相互配合。不可能想象，一个现代化的大工厂，可以不要责任制，不要规章制度，那样生产就会混乱。工厂有许多好制度，是适合于工厂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应该认真执行，有些制度是对生产不利的，就要经过群众讨论，经过试验，予以修改或重订。对一些重大的基本制度的废除和重要修改，要请示报告，不要轻率决定。中央对于规章制度的破与立，早就提出“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通过试验”的方针，这两句话是不可分割的；并且指出既要大胆地破，又要及时地立。有些工厂对规章制度不加分析，一概破除，而且只破不立；有些工厂有章不循，徒具形式，这些都形成生产中的某些混乱状态，是应该纠正的。

这里还要讲一下与工厂管理体制有关的军代表问题。有人说军代表和工厂有矛盾，有些工厂竟然提出“取消军代表、解放生产力”的口号。我试问：工厂生产为的是什么？不是为了要生产质量良好的军工产品吗？军代表驻厂工作，也是为了保证军品质量，这本来是一致的，只要工厂生产注意质量，产品良好合格，矛盾从何而来呢？事实证明，哪一个厂哪一个时候重视产品质量，这

时工厂与军代表的矛盾就比较少或者完全一致。而近几年来工厂越来越不注意质量，废品率越来越高，当然双方的不同意见就越来越多。如果说的是这种矛盾，我看倒是很必要的，是好事情。毛主席说过，没有矛盾，就没有发展，要树立对立面。工厂里有人经常检查生产，反映情况，抓紧质量，这有什么坏处呢？我管过一段兵工生产的事情，纠纷争论是有的，但是，哪一个工厂、哪一种产品有争论，有反映，我反而放心，睡得好觉，因为问题清楚了，就能够设法解决它。可怕的倒是军代表制度被削弱了以后这一段情况，没有争论、没有反映，出了质量问题，工厂自己就作决定，军代表的意见上不来，群众的意见也听不到，结果坏人坏事得不到揭发，矛盾被掩盖起来，大家都蒙在鼓里，不知道问题的底细，甚至连真实情况都得不到，那倒是很不能令人放心的事情。难道这样的处置方法，这样的所谓一致，是对军工生产有益的吗？现在更可以看得清楚，有军代表这一个检验质量的关口，对国防工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当然军代表要虚心学习，依靠群众，讲究工作方法，既要坚持标准，也要帮助工厂做好工作。我认为，军代表对产品的监督制度以及工厂中各项专门的和群众性的监督检验制度，必须尽快地建立、健全和认真执行。现行的军代表工作条例要重新修订。

为了确保军工产品质量，在考核军工厂的计划时，应该做出明确的规定。工厂的任务是否完成，以按品种的任务作为考核指标，只有按品种、按质量、按数量完成了生产任务，才算完成国家计划。凡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不算数量，也不算产值。凡是军工厂向材料厂、协作工厂订的货，都要按规定的技术规格严格验收。这些材料和协作件应该纳入国家计划，如不合格，应该退回原厂；这部分不合格的原材料和协作件，对供应工厂来说，便不能算是完成国家计划。凡是为军工厂生产材料和协作件的工厂，也要坚决贯彻军工产品质量第一的方针，主要的工厂要派军代表驻

厂检验，使材料和协作件的质量能够得到保证。

第三，认真贯彻严格的工艺纪律和高度的文明生产

这是保证军工产品质量和掌握尖端技术[8]的中心问题，是必要条件。没有严格的工艺要求，没有高度的文明生产[9]，就没有精密工业，就不会有任何精密的产品，更不可能有什么尖端。有一些工厂，近几年来这方面不但没有进步，而且是退步了。工艺纪律松弛，怎样做都可以，不通过试验，就任意修改工艺规程。有些工厂乱改工艺，不经试验成功，就大批投料，造成重大的大批的报废事故。技术是一种很严格的事情，有它的客观规律，不是依我们的主观愿望而转移的。在工艺上面，一定要有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精神，不能马虎，不能草率。

不少工厂生产中的清洁文明和秩序，做得也很差，很脏很乱，往往就因为一些灰尘，就搞得产品过不了关，零件大量报废，有时还发生事故。这种情况不扭转，我们现有产品的质量关过不去，精密尖端技术也是上不去的。毛主席指出，清洁卫生是一件振奋民族精神、移风易俗的大事情。在生产中的文明清洁，也绝不是小事情，是一件移风易俗的大事情。一年多以前，美国人在报刊上曾经讥笑我们说：中国人不会搞出什么尖端，因为中国没有精密产品，而没有精密产品的原因是中国人太脏，掌握不了精密技术。我们要争这口气，这是争民族的气，争人民的气，不要没有出息。我们一定要搞好文明生产，为过尖端精密关准备条件。此外，工厂里设备的使用维修很差，滥用精密机床来干粗活，已经损失了许多设备，现在要赶快挽救。本来，工艺规程和各项有关文明生产的规章制度，过去各厂都有，从苏联要过技术资料，请过专家，交过“学费”，只要结合我们的情况，加以分析，其中有许多是有用的；而且在群众运动当中，更有许多很好的创造和建议。各工厂一定要发动群众，根据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抓住关键，迅速建立、健全和坚决执行这些科学的规章制度，把这些制

度用条文规定下来，成为生产中的纪律，大家遵守，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产品质量，使产品能稳定过关。

我在这里还要向厂长和党委书记同志讲几句。我们原来都不是搞工业的，都不懂技术，搞部队工作、地方工作比较熟悉一些，搞大工厂是不熟悉的。有些同志虽然到国外实习过，也在工厂里做了几年工作，自以为内行，其实还不成，还不能说掌握了工厂生产的规律了。即令懂了一些，也不要翘尾巴，须知生产和技术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任何时候，自满只能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前几年大家还比较注意工艺，注意管理，在这方面，苏联专家也干了一些好事情，后来自以为过关了，就把这些丢掉了。我们应当时刻留心，虚心学习，戒骄戒躁，不断加强对生产技术的管理。的确，不要什么制度，不要什么严格的工艺规程，不要搞什么文明生产，完全凭自己的主观想法来做工作，凭自己的习惯来做工作，似乎是比较舒服的。所以工艺纪律松弛、生产不文明，也有一定的习惯势力，并不很容易扭转过来。关键在于领导上要下决心，要依靠群众。事实证明，只要向群众说明情况，群众对这种混乱状况是不满意的，是想改变这种状态的，依靠群众，工厂的面貌很快就会改观。毛主席有一段话，对我们有很大启发。"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10]。

第四，搞好几个三结合，不断突破技术关

我们现在还有许多技术没有过关，今后还要不断地过新的技术关。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今天是新的，明天就落伍了。这个特点在国防工业更为明显。例如我们现在某些新的产品还没有试制成功，便已经落后了，很快就成为淘汰的对象。因此

思想上要有准备，今后新产品任务会不断而来，技术是过了一关又有一关，日新月异。在这上面，我们要很好领会“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精神。在技术上的不断革命，就是永不满足，永不停滞，不断地试制更新的产品，提高军工产品的技术水平。任何工厂在技术上都不能停滞不前，都要精益求精，不断进步。同时，又要有阶段。根据军事部门的战略、战术要求，装备计划也要分阶段，一定时期有一定目标，国防工业要据此定出一个时期的明确目标和具体措施。一个技术问题或一个新产品解决了，一定要把专家、技术人员、老工人和群众结合起来，进行科学的鉴定，实事求是地制订既先进而又可行的规程或标准，把这个新技术稳定下来，拿到手，站稳脚跟，再向前进攻新的技术关。事物总是波浪式前进的，有破，就要有立，有高潮，就要有巩固。出现了新鲜事物、新创造，还只是一个现实的可能性，只有抓住不放，一抓到底，艰苦工作，把前后左右、里里外外的问题都切实搞清楚，切实解决，然后这才能变成我们生产中的现实。要通过切实的工作，不断地提出新的目标，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不断地突破新的技术关。

过技术关，要靠三结合。在工厂内部是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三结合。我们的尖端技术，只能是依靠我国自己的工人和专家。领导干部要善于使用他们，从政治上和技术上培养他们，提高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工厂外面，是工厂、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三结合，工厂要善于利用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力量，要互相帮助，并且在试制和运用研究成果上面，给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以便利。就整个国防装备来说，还有一个使用、研究、生产的三结合，这对我们是特别重要的。一切为了使用，为了战胜敌人。各军、兵种所要求的战术、技术性能，应该是我们的研究设计与生产的目标，生产部门、研究部门要经常倾听使用部门的要求和意见。生产部门要积极帮助研究部门解决物质技术

和试制条件。研究部门既要注意抓新苗头又要时刻注意不要脱离生产，要帮助生产部门提高科学技术水平。而这一切，都是为使用部门服务，为国防服务。

第五，集中人力物力和领导精力，加强生产第一线

我这次去西北，就遇到几个分散精力、本末倒置的例子。西安地区四个精密的兵工厂，承担十套小高炉任务，用精密机床加工粗活，挪用军工材料来做小高炉，而且设备配套、基建安装一直到交付生产，都要军工厂包下来。宝鸡无线电工厂，军用产品还没有一个过关，却从本厂六百多台机床中抽出一百多台来办附近公社的卫星工厂，其中包括三十多台精密设备，卫星厂的工人的工资全部由兵工厂开支。军工厂的干部工人调动很多，生产第一线薄弱，西安飞机附件厂开工以来共调出两千零八十二人（其中输送给新厂的只有五百多人），主要技术科室的骨干技术人员，三年未动的只有十分之一，有的车间三年内就调换了十一个机械师。这些问题，部、局应该负责任，但是地方也有关系。今天各省、市党委的工业书记同志在这里，请同志们回去向党委汇报，并且告诉有关的业务部门，要有国防观念，对国防安危负责，要认真执行中央电话会议上的规定，不要随便抽调军工厂的人马、材料和设备，不要任意安排不适当的民品生产任务。国防工业虽然不特殊，但是有它的特点。今后军工厂所安排的民品任务，必须工艺相近，不得妨碍军品任务的完成，不得损害军工厂的设备。军工材料一律不能挪用于非军工生产的用途。各工厂应该把得力的人员放在生产第一线。每个厂起码要有一半以上的技术骨干、管理骨干坚决稳定下来，让他们钻进去，三年五载，十年八年，成为这一门技术的专家。工厂里要从政治上和业务上关心培养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使之形成技术领导的核心，和广大职工群众结合起来，有信心有把握地解决本行业的技术问题。

第六，培养我们自己的又红又专的国防工业队伍

刚才说到工厂里要充分运用现有技术力量，形成技术领导的核心，这是一方面，从今后来看，更要抓紧培养新生力量。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工厂等各方面都要大力培养我们自己的又红又专的国防工业队伍。高等院校一定要认真办好，给兵工厂输送质量良好的毕业生。工厂和研究机构也要认真搞好业余教育。必须严格保证国防工业职工在政治上的纯洁性，一定要认真、严格地清理队伍，而且要培养他们，给他们创造不断提高的条件，要求他们精通技术业务，要求他们具有我军的“三八作风”[11]。当前，不少的工厂、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里，都有一个通病，就是会议杂务很多，使技术干部、工人、教员、学生都没有时间在政治上和业务上学习提高，没有时间做研究试验和阅读文献，也得不到适当的休息。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中央已经三令五申，而有些单位还没有认真执行，中央的规定没有传达下去，没有贯彻，部和地方都有责任，这种情况必须认真地迅速改变。

国防工业要全面彻底地贯彻中央和军委关于国防工业生产建设的方针路线，需要做一系列的工作。上面所提到的，仅仅是我所接触到的当前国防工厂生产当中几个需要注意抓紧的问题，并不是工厂工作的全部问题。

注 释

〔1〕林总，即林彪，见本书《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注〔2〕。

〔2〕贺总，即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3〕邓小平（一九〇四—— ），四川广安县人。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4〕李富春（一九〇〇——一九七五），湖南长沙人。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5〕国防工委，即国防工业委员会。成立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当时主任为贺龙。

〔6〕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第一三四〇页和一四四〇页。

〔7〕“两参一改三结合”，是“鞍钢宪法”的主要内容。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为中央所写的指示中把鞍钢的企业管理经验称为“鞍钢宪法”，并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生产、技术等问题上实行领导干部、技术（管理）人员、工人相结合的经验，简称为‘两参一改三结合’”。

〔8〕尖端技术，指区别于普通技术而言的。五六十年代对新兴的高新技术，如计算机、半导体技术等，概称为尖端技术。

〔9〕文明生产，指按现代科学方式和要求进行的生产。这是现代工业生产的基本要求。

〔10〕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第一四八一页。

〔11〕“三八作风”，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的优良传统作风。

集中力量加速研制地对地导弹*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日)

一、调整力量，缩短战线，积极突破和发展地地型号。我们现在搞地地型号，条件是比较成熟的，通过对“P—2”导弹[1]的仿制，锻炼了技术队伍，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老的科学家也比较集中，这方面的基本建设也有了相当规模。在这个基础上，求得更快一些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条件是具备了的。各种型号的导弹原理差不很多，地地导弹突破了，其他的也就容易些了，“P—2”仿制成功后的新发展，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从各国发展导弹的情况来看，苏联、美国也都是从地地型号“V－2”[2]这个老祖宗起家的。我们也要从地地型号突破。这是个战略问题。我们国家人力、物力还很困难，更需要集中力量突破一点。什么都想搞，各种型号全面摊开，结果分散了力量，什么都搞不成，欲速则不达。任何事情都有个首先突破的问题，五院虽然是个导弹综合研究院，但是存在着先从什么突破的问题。不仅五院，工厂和其他研究机构都应该有个重点，也都要考虑首先从哪里突破的问题，这在我国工业和技术力量薄弱的情况下，是十分重要的。

五院的技术队伍，已经初具规模，但仍感力量不足，主要是摊子铺得宽了一些，没有配套。一方面感到力量不够，另一方面又撒了不少人到三机部各厂帮助仿制几种型号。由于工厂还没有

---

* 这是聂荣臻与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钱学森、王诤的谈话纪要。

具备同时仿制几种型号的条件，基本建设还没有搞起来，资料、材料、设备都困难，仿制工作短时间还展不开，这些人呆在那里无事干，看不到东西，不能进行实际研究，长此下去，这些人的技术水平不仅不能提高，反而会将刚学的一点东西丢掉，这实际上是浪费了人才。现在要下决心把派到工厂的人除仿制地空、空空型号的外，都收回来，其他跑材料、搞设备的都应适当调整，以求集中突击地地型号。一定要充分利用地地型号已有的有利条件，机不可失，否则，我们将会犯历史性错误。经过这个调整，既可缓和五院当前技术力量的紧张状况，加速地地型号的发展，又能使放到工厂的大学生迅速得到提高。同时，由于五院基本建设生活设备跟不上，住房、吃饭都是问题，人再大量增加，也很困难，也需要适当调整巩固。一味招新人，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五院今年要求增加的人除国家已分配的外，主要从内部调整去解决，不要再从外部大量增调。

二、积极培养五院的技术骨干。近几年来，五院的发展是很快的，中央、军委给了最大的重视，先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现在技术干部已将近万人（大学毕业程度以上的数千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力量，只要我们组织得好，使用得好，我国的导弹事业是大有希望的，发展速度决不是慢的。目前的问题，除了集中力量外，就是积极培养技术骨干，最缺乏的是“班、排、连”[3]干部，搞导弹决不能靠人海战术，必须有一批坚强的技术骨干，而且必须在五院内部培养训练。如何培养训练呢？最有效、最迅速的办法，就是通过地地导弹的研究设计。因为已摸到了些门道，又有一些老专家，资料、实物、设备也都方便。这次将力量调整集中后，要采取边工作边学习，边打仗边训练的办法。这样，我们的技术队伍一定会成长得更快。此外，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带好新的一代，钱学森同志每月抽出适当时间，给大学生、室主任及其他技术骨干上些大课。几千人都去听，从导弹的基本理论开始，

系统地作些讲述。这是很重要的，过去我就向五院提出过这个问题，我接触到的一些大学生都向我提出这个要求，他们感到很迫切。钱学森同志决不要客气，一定要把这几千人很好带起来。除钱学森同志上大课外，其他老科学家也要上些小课、专业课，大小课结合，钱学森同志讲“合同战术”[4]，其他同志讲“兵种战术”[5]。讲课所用的时间都算在六分之五以内。五院党委要认真把这件事抓好。除讲课外，还要选择一些优秀的大学生有意识地培养使用，指定一些老科学家经常给予指导，工作条件给予重点保证，以便使他们尽快成为技术骨干。

三、搞导弹必须具有战略眼光，做这一步一定要想到下一步。五院有这样的设想是很重要的，有些就可定下来，有些还要继续收集资料。地地系统就先这样定下来，要搞三班，从三班倒去考虑安排力量：一班搞中近程战略导弹，一班搞近程战略导弹，另一班搞更远的型号。由近程到洲际，中间可再搞个几千公里的，有一个阶梯可能更容易些，更稳妥一些。洲际的一定要搞，五院应根据这个总的方向分期有步骤地建设，不能放松，这个拳头是松不得的。几百吨推力的大试车台可以放在导弹试验基地。

红旗1号[6]要积极进行，这也是个战略问题，将来可考虑向反导弹系统发展，现在世界都在搞这个事，都还没有过关。红旗1号困难是不少的，决不能怕困难，不能有丝毫松劲。听说有些同志看到地地一个一个型号出来，红旗几年还搞不出一个型号来，因而有些急躁情绪，这是不必要的。不要去比，不要以型号多少去衡量成绩，只要我们同志认真努力，不会在时间上去逼同志们的。

关于星际航行系统，究竟从洲际系统上去，还是另搞一个大推力系统，暂不忙定，可继续收集资料，以后再研究。可以考虑科学院通过搞探空火箭，为将来向星际航行开辟道路。科学院一方面要与五院、二机部密切协作，为五院、二机部服务；一方面搞探空火箭。上海机电设计院与科学院有关的所应扭成一股劲，积

极为这方面创造条件。

四、军队的几个研究院和三机部，都是为国防服务的；他们所属的研究机构和基本建设，都要统一规划，通盘考虑，在国家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决不能各搞一套。五、六、七、十各研究院[7]都要很好与生产部门联系，主动地去商量问题，搞好关系，密切协作，扭成一股劲，一定要使生产部门在研究机构合并统一后，觉得更有依靠了，对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更有把握了。这个思想，一定要在全体同志中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中深入教育，并贯彻到实际行动中。

五、科学研究部门的政治工作要很好研究，现在有不少问题没有认真解决。政治工作一般化，不看对象、不考虑特点，许多事情处理得简单粗暴，伤害了一些同志，对科学研究工作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科学研究部门中有专家，有工人，既不同于工厂，又不同于连队。就是连队也有军官、士兵，有新兵、老兵、超期服役兵等，也不能千篇一律。现在科学研究机构的政治工作问题不是干部少，主要是工作方法没有很好解决。有些同志还不知道科学研究部门政治工作的目的是什么，科学研究部门的基本部分是科学家、是技术研究人员，政治工作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为科学研究服务，要保证充分发挥所有科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认真地做个勤务员，我就是个大勤务员，我们所有政治、行政干部都应该做好勤务员的工作。要很好地为科学家和所有科学研究人员服务，有些同志总是拿管理战士的办法去对待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不重视他们的劳动时间，摆资格，论军衔，对他们的生活不够关心。工厂搞运动知道不停止生产，而科学研究部门搞运动，动辄就停止工作，好象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劳动，不是生产。我们有些同志只是口头上喊要过技术关，要突破尖端，而在实际工作中却不认真执行。一定要使同志们真正懂得，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在我们这样的工业和技术力量条件下，时间

是何等重要。如果科学研究时间随便都占去了，过关、突破尖端岂不是空谈。科学研究机关的政治工作一定要渗透到研究工作中去，要改进方法，讲求实效，会议不在多，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要占很多时间。政治工作必须围绕中心任务，影响了中心任务就失去目的性。政治工作方法不改进，一年中用将近半年时间去搞“红”，结果研究工作耽误了，政治上还是不红，同时对红的要求也应根据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不红则白，这样评价一个人，这是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严格地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历来是按左、中、右区分的，这是最科学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有左、有右，中间也有中左、中中、中右。不红则白，实际上否定了有中，否认中，结果常常搅乱了左，也打击了左，伤害了些好同志。目前我们国家经济上很困难，很紧张，帝国主义和一切坏分子在百般造谣诬蔑，如果在政治上在我们人民内部的关系上再搞不好，就更被动。这点我们的领导同志一定要很好注意。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需要我们反复学习，认真贯彻。只要我们的队伍团结得很好，大家在政治上都心情舒畅，我们的事业就一定可以飞快发展。

注　释

〔1〕“P－2”导弹，见本书《在五院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讲话》注〔1〕。

〔2〕“V－2”，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研制的弹道式地对地导弹，最大射程为三百公里。

〔3〕这里所说的“班、排、连”干部，是形象的说法，系指在基层从事专业研究的技术骨干。

〔4〕“合同战术”，原指指导和进行诸军种、兵种合同战斗的方法。这里是借此比喻系统地讲解有关导弹研制的各种基本理论。

〔5〕“兵种战术”，原指各军种所属兵种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这里是借此比喻具体地讲解导弹各分系统的知识。

〔6〕“红旗1号”，是一种地对空导弹的代号。

〔7〕五、六、七、十各研究院，即国防部第五、第六（航空）、第七（舰船）、第十（电子设备）各研究院，除第五研究院成立于一九五六年外，余均成立于一九六〇年。

山城堡战役*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环县山城堡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一个师。这个胜利的战斗是长征的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这一战斗对国内和平和抗日战争的实现，起了重要的促成作用。

一

历时十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以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彻底失败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而结束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经过一年的时间，以超乎寻常的毅力，战胜了军事上、政治上和自然界的无数艰险，于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地到达陕北。中央红军一到陕北，就与由鄂豫皖北上的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会同在一起，共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从而扩大了红军声势，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并且迅速地打开了新的局面。

---

* 这篇文章曾以“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斗”为题刊登在一九六一年《星火燎原》第四卷，同年六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先后转载。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正进一步地向华北进攻。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占领全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疯狂侵略，正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全国人民的生存。广大爱国人民更清楚地认识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外不抵抗，对内加紧反共反人民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罪恶面目，因而更加同情和拥护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由“一二九”学生大示威而掀起的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标志着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英明地预见了这一大好形势，适时地提出了全党的任务：“革命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仍然坚持其反动政策，进一步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继续向红军围攻，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周围大量的增加兵力。山西阎锡山也沿黄河布置层层军事堡垒，置以重兵，企图拦阻我军向华北抗日前线开进。宁、甘马鸿逵、马鸿宾等回族封建军阀部队亦加紧阴谋活动，不断向我军挑衅。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党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直接对日作战，以求进一步推动抗日运动，实现党的抗日主张，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举行了东征作战。在东征作战中，红军给了阎锡山部以有力打击，共歼灭和击溃敌三十一个团，毙伤俘敌一万七千余人，粉碎了其沿黄河的封锁堡垒，一度解放了同蒲铁路沿线的广大地区，直逼太原近郊。红军东渡后，蒋介石一面增调十几个师进入山西，阻止我军东进抗日，一面以陕甘驻军积极向我后方进攻。一九三六年五月党中央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东征回师的通电[1]，但是蒋介石集团悍然拒绝议和。为此，红军回师之后，紧接着又于六月进行了西征[2]。西征作战先后击溃了马鸿逵、马鸿宾等部，解放了

环县、豫旺、定边、盐池等县城，以及东西一千余里，南北数百里的广大地区，大大地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并团结和教育了回族人民，推动了回族人民的抗日运动。

通过东征、西征作战，陕甘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声威也更加扩大了。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已成为广大人民的一致要求。

二

在中央红军、陕北红军积极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同时，红军二、四方面军在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和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后，正迅速由川康地区北上，一九三六年八月底，红军二、四方面军主力进到甘南渭源、陇西地区。

为了迎接二、四方面军，中央决定红军一方面军主力西进直插西兰公路[3]静宁、会宁地区，会合二、四方面军。八月底，我们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由豫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出发南下，经过连续几天急进，于九月初突然插到静宁、会宁地区，迅速打破了西兰公路敌人的封锁，占领了会宁城。十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会宁、静宁地区先后胜利地会师了。会师后，主力即向北转移到海原、打拉池地区休整，并在打拉池举行了庆祝会师大会。

红军主力的会师，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围追堵截的彻底破产，给全国人民展示了新的希望，极大地增强了爱国人民的抗日信心。

但是，蒋介石集团对于红军主力的大会师却惊恐不安，不甘心失败，不顾民族危机，不顾全国人民的意愿，不顾我党一再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竟继续坚持其反共打内战的政策。蒋介石错误地认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连续

作战，力量已大为削弱，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于是急忙调集了二百六十个团的优势兵力，企图乘红军十分疲劳，尚未来得及休息之际，一举将我消灭。

当时仅在静宁、会宁地区，敌人就集中了第一、三、三十七、六十七、新一等五个军。当红军主力向海原、打拉池地区转移时，敌人分四路展开追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地区。一路敌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一路敌第三军王均[4]部，两路同时由会宁地区出发，分别经冯家堡、郭城驿向靖远追击；一路敌胡宗南[5]部主力第一军四个师由静宁地区经新营向海原追击；一路为东北军第六十七军、骑兵军由隆德地区经固原向黑城镇追击。

在当时敌我众寡悬殊的形势下，根据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尔后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人主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对敌毛炳文、王均部则予以威胁牵制相机予以打击；对东北军王以哲[6]部由于他们当时已有了不愿继续打内战的倾向，并秘密地与我军建立了某些联系，因此，采取了积极进行统一战线的方针。

红军主力转到打拉池、海原地区稍事休整后，即继续向豫旺堡、同心城地区转移。各路敌人前进很快，十一月初即进到了海原及以北地区。敌人压的很紧，情况很紧张。当时天已下雪，部队衣服单薄，粮食又不足，困难很多。当我们转移到海原以北时，海原之敌马鸿宾第三十五师及东北军一个骑兵师曾向我侧后攻击，企图截击我军。我们以红一师及七十三师予敌以坚决反击，于何家堡消灭敌两个团，俘敌千余人，余敌逃回海原。

我军转移到同心城西南地区后，曾准备利用同心城西南之关桥堡、驼厂堡地区有利地形打一仗，以求粉碎敌人追击。后来由于敌第三军由贺家集迂回到同心城我军右翼，东北军也进至豫旺堡并向我右侧后迂回，我们遂改变原来计划，继续向东转移。十一月十九日先后集结隐蔽于环县以北之山城堡南北地区。山城堡

地区土寨很多，地形复杂，很便于我隐蔽和依托，是个比较好的战场。

敌占同心城后更加骄纵，认为红军已不堪一击，已向盐池方向撤退。因此竟以胡宗南部第一军孤军深入，急速向惠安堡、盐池方向前进，主力两个师直插盐池，十一月十九日侵占惠安堡。其七十八师经豫旺堡、古城，二十日侵占山城堡。敌人企图从两翼合围我军于盐池以南地区，与此同时，东北军六十七军亦由豫旺堡地区东进策应。

十一月二十一日，当敌七十八师由山城堡继续向东攻击时，预伏在山城堡周围之我一军团及十五军团一部，突然地向敌展开猛烈的反击，首先截断了敌人西逃的退路，尔后由东、南、北展开三面攻击。敌人凭借围寨顽抗，战斗十分激烈。经过一昼夜战斗，将敌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及二三四旅一个团全部歼灭。与此同时，向盐池方向进攻的敌人也被我二十八军击溃。经过这一战，敌人遭到沉重打击，主力即向西撤退，整个进攻被我粉碎。

三

山城堡战斗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合后的第一次战斗，尽管我军经过长征，蒙受了重大损失，总数已不到三万人，装备又十分低劣，但是这支人民的军队，由于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和与人民的紧密联系，它永远是无敌的，它的胜利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蒋介石集团在红军长征中千方百计地想消灭红军，但都遭到了彻底失败。在红军主力会合后，不管他再用多大优势兵力，同样也逃不掉失败的命运。中国工农红军能不能取胜，人数和装备固然十分重要，但不是最根本的因素。根本的因素是它的政治军事指导思想、部队的团结、士气和作风。一旦人数增多，装备改善，它的胜利就必然更大更快。红军主力会合——山城堡战斗及以后的

发展充分说明，只要我们紧紧地沿着毛泽东同志所指的道路前进，认真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一定能够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与此相反的是张国焘在红军将要会合时坚持分裂，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强令四方面军主力渡黄河向甘肃、新疆西进，结果是一败再败，最后虽然有部分同志抵抗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回到了党的怀抱，但是所遭受的损失是十分沉痛的。

山城堡战斗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这个战斗是在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当时情况很复杂，外有强敌，内有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三个方面军刚刚会合，部队十分疲劳，又是寒冬季节，衣食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趋利避害，以少胜多，争取主动，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毛主席在每一个具体的策略和在战役战术上都给了我们及时而明确的指导。例如：毛主席在给我们的电报中一再指出要“坚决打击蒋胡军主力，歼其一部或全部，以达到分化孤立敌人的目的，以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正是由于毛主席的这些正确指示，所以从迎接二、四方面军会师到战役转移，直到山城堡战斗的胜利，使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始终是明确的，坚定的，行动上始终是主动灵活的。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是山城堡战斗胜利的关键。

山城堡战斗的胜利，又是毛主席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胜利。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不仅在全国人民中得到了积极的响应，而且在包围和进攻我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中也引起了日益强烈的反应。当时各路敌人矛盾很多，胡宗南部是敌人的主力，自恃是蒋介石的嫡系，骄横嚣张。张学良[7]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8]率领的西北军深受蒋介石集团的排斥、驱使，都表示不愿意继续打内战。特别是在东北军中，广大官兵家乡遭受日寇蹂躏，他们普遍要求抗日，打回老家去。张学良、杨虎城是两位有民族正义感的将军。他们亲眼看到红军在长征后，力量更集中了。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更加迫切和红军坚决北上抗日的英勇行动影响

下，他们已逐步认识到继续被蒋介石驱使打内战是错误的。因此，他们曾先后与我军秘密订立了“互不侵犯、抗日友好”协定[9]，在这些部队里抗日救亡的情绪日益高涨。当时被迫与胡宗南部一同向我进攻的右路东北军王以哲部，曾表示决不愿意与红军为敌，不愿意见到“萁豆相煎”[10]的不幸局面。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遵照毛主席提出的坚决打击敌人主力、孤立分化敌人，以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的指示，一方面集中力量给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以狠狠打击，一方面对王以哲部则严格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积极进行了工作。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等口号。当时很明显，只要给敌主力以痛击，整个进攻就可打破。只有有力地打击和孤立顽固势力，才能迫使其接受我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也才能团结和争取中间和进步势力。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山城堡战斗的胜利，更加促使张、杨两部进一步认识到内战再也不能打下去了，只有调转枪口一致抗日，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经过山城堡战斗，他们与蒋介石统治集团的矛盾进一步尖锐深刻化了。十二月十二日终于爆发了“西安事变”。经过我党倡议和积极努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打开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全民抗日的新的大好局面。

山城堡战斗由于全体指战员英勇善战，不怕疲劳，发挥了我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因而取得了重大胜利。它象我军的无数个胜利战斗一样，在我军战史上将占光辉的一页；它是我军在历史伟大转折中的一个重要战斗，回忆它、研究它，对我们有着重要意义的。

注　释

〔1〕通电，指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撤回黄河以西，结束东征。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南京政府及其海陆空军部队发出的《停战

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2〕西征，即西征战役。一九三六年五月至七月，红一方面军对陕西、甘肃、宁夏三省边界地区发动的进攻战役。红一方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中央军委为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发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五月十八日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西征，以打击坚持反共内战的马鸿逵、马鸿宾军阀部队为目标。经过两个多月作战，俘敌旅长以下两千余人，缴枪两千余支，战马五百余匹，占领十余座城镇，开辟了纵横二百多公里的新区，同时为尔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三大主力会师，开展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3〕西兰公路，当时称西兰大道，即西安至兰州的大路，也是那时通往新疆地区的主干道。

〔4〕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

〔5〕胡宗南，当时是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山城堡战役时为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第二纵队司令。

〔6〕王以哲（一八九六——一九三七），吉林宾县人。当时是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

〔7〕张学良（一九〇一——　　），著名爱国将领，奉天（今辽宁）海城人。当时是国民党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与西北军的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送蒋到南京，被蒋囚禁，东北军亦被改编。一九四六年被押送台湾囚禁于新竹。

〔8〕杨虎城（一八九三——一九四九），陕西蒲城人。当时是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西北“剿总”第三路军总司令。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一九四九年九月于重庆被害。

〔9〕“互不侵犯，抗日友好”协定，指一九三六年四月，我党代表周恩来同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在肤施（今延安）秘密举行会谈，九日达成了与红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

〔10〕“萁豆相煎”，语出“七步成诗”典，相传为曹植所写。

关于贯彻“科学十四条”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七日）

今天的会议，是五院的干部大会。到会的，有党员同志，有非党同志；有年长的专家，有年轻的科学技术人员；有政治工作干部，有行政工作干部。而且还有其他部门和有关研究机构的负责同志参加。

今天准备和大家谈的是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以求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更加多快好省地出成果，出人才，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关于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最近根据中国科学院、产业部门研究所的一些经验，起草了一个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工作十四条[1]。我们国防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机构，也应该结合自己的特点和情况来实行。这个文件经中央批准后，可以发给大家讨论研究。我今天讲的是十四条中的主要精神，而且根据国防科学研究机构的特点加以补充。

为了方便，我分四个问题来讲。一个是对人的政策，对科学技术队伍的政策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着重点是关于科学技术人员的红与专的问题。第二个是对学术工作的政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第三个是技术工作中的技术民主、技术责任制问题。第四个是如何适应工作要求，加强党的领导，改进工作方法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初步意见，和大家研究商讨，将来以中央批准的文件为准。

(一)

我们对科学研究机构,对科学研究人员的主要要求是什么?这个问题看来很简单,而在实际工作中却是不够明确的。我们认为,根本要求是出成果,出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不是抽象的,它要求工人生产工业产品,要求农民生产粮食,当然也要求科学技术人员出科学技术成果。党交给五院的任务,就是研究设计和试制新型导弹武器,培养中国的导弹科学技术队伍,为我国国防现代化服务。这是我们的根本任务。如果根本任务完成得不好,其他活动搞得再好,也没有用。我们的一切工作,一切措施,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根本任务。凡是对此有利的,我们就要提倡,凡是对此不利的,我们就要纠正。

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和三年来的连续跃进的实践,我们在科学事业中基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的问题。我们要求科学技术人员努力向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成为红色的科学家,做到红与专的统一。要求科学技术人员自觉地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和研究成果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红的标准是什么?红,首先和主要的,是指人们的政治立场。对自然科学工作者来说,红的初步标准是两条,一是拥护党的领导,二是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六项政治标准[2],其中核心的两条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红的初步标准,就是根据这两条而提出的,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提出的两条左派标准。达到了这两条,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基本政治态度就摆对了,为谁服务的问题就明确了。

当然,这两条还是初步标准。在这个基础上,知识分子还要继续进行自我改造,逐步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共

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抛弃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树立唯物的辩证的观点。这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是自我改造的过程。从这两条初步标准，到解决世界观的问题，到真正地红透（完全地透彻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就算是党龄三四十年的老党员，也还是在向红透的目标努力。因此，对知识分子的这个改造过程，要积极诚恳地帮助他们，但要有耐心，不能操之过急。

目前，有些单位对科学技术人员红的要求，确有一些不切实际、不加区别、要求偏急等毛病；有时甚至主次不分，求全责备，乱戴白专帽子。而且只是空洞地要求红，忽视对专的要求，忽视对实际工作表现的考察。这样做，效果是不好的。政治是灵魂，是统帅，自然科学工作者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学习时事政策，但是不要要求他们象党政干部、象社会科学家一样，用那样多的时间。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要求每一个自然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和社会科学家，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成为共产党员。有些同志往往用党员的标准、甚至比对党员还高的要求来衡量党外人士，用政治活动家的标准来衡量自然科学家，用青年人的尺度来衡量老年人。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都用很多的时间参加各种政治社会活动，往往不是从大节、从根本政治态度来看他们，而是主次不分，甚至对于生活作风、脾气性格上的一些细节问题，也求全责备，指责过多。这样反而使不少人对自己的改造丧失信心，谨小慎微，顾虑多端，不能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

红与专应当是统一的。只红不专，便是空头政治家，只专不红，就会迷失政治方向。因此，红必须落实，不能是空空洞洞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考察科学工作者的政治觉悟，必须看到他们钻研科学、为社会主义为国防服务的积极性。通过业务实践来提高政治觉悟，这

也是知识分子进步的一条重要途径。在目前条件下，许多知识分子经过了十年八年的考验，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能够在社会主义的土壤上，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扎下根来，积极工作，开花结果，从大多数情况来说，就应当认为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是红的一定表现。即使有一些人，工作积极，社会主义觉悟不高，我们也要鼓励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引导和帮助他们提高觉悟，而不可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求他们专，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对专家不要求专，是毫无道理的。我们今天专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专得不是太深，而是太浅。尤其是有杰出成就的著名科学家更是太少了。我们国家需要很多杰出的科学家。自然科学工作者专的积极性，是必须保护、必须鼓励的。当前有一种偏向，而且是严重的偏向，就是有不少同志把红和专对立起来，似乎专就一定妨碍红。一看见人家钻研业务，多看了些技术书，在科学工作上有抱负，就说是想“成名成家”，搞个人主义。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如果努力钻研业务，积极搞研究工作，在大是大非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少参加了几次会，少贴了几张大字报，学习会上少发了几句言，就认为是走“白专道路”，这是不对的。在反右派之后，剩下中间派和左派，在这里面拔白旗，简单化地把科学工作者划分为红专和白专，非红即白，开展斗争，往往就把一些业务上钻研较好、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较少的人划成白专，使许多人不敢钻研业务，不敢放心做技术工作。这样，红，既没有指出正确的方向，专的积极性却受到打击。长此以往，就会红也红不了，专也专不进去，给工作引来很大损失。

白专这个提法是不确切的。如果一个人政治上是白的，就是说，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政治上的右派，那么，批评他政治反动就是了，不必说他是“白专”。如果一个人不是右派，就不应当给他戴上“白”的政治帽子，也不应当说他是“白专”。

“白专”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解，好象专和白是必然联在一起的，只要专，就容易变白，似乎愈不专愈保险。搞得大家不敢钻研技术，而且对思想改造也没有好处。我们提倡的是又红又专，我们要纠正的是只专不红和只红不专，这已经是很明确很全面的提法了。以后不要把“白专”作为批判用语。我们不开这样的帽子公司，我们不承认这顶帽子，过去扣了这顶帽子的，要去掉。

至于有些单位中政治排队的作法，也需要研究。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人们的政治态度是异常鲜明的。根据各人在那次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的实际表现，进行政治排队，划分左、中、右，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政治排队是人们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所表现的政治立场的如实反映，是我们党在阶级关系急剧变动时所必须采取的一种阶级分析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也经常地频繁地进行政治排队，同时又不以重大的政治动向为根据，而以某些人在某些个别问题上一时的表现为根据，甚至以某些人随意说出的几句不恰当的话为根据，任意地轻率地进行这项极为严肃的工作，其效果必定是不好的。它不仅不能如实地反映知识分子的政治动向，确切地分析知识分子的状况，便于我们党做好工作，帮助他们进步，而且还将引起许多人的误解和疑虑。今后，各个研究机构在日常工作中，不要在全体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排队。当工作中有必要判断某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时，应当根据他几年来的变化和今天的实际表现，作出具体的分析和判断，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作什么性质的结论。对于那些在反右派斗争中表现不好的人，也要根据这几年来的变化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关心、帮助和欢迎他们哪怕是微小的进步。

对于我们自己培养的青年一代，和对于从旧社会来的老一辈人应有所不同，必须要求严格一些。一方面，必须特别抓紧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他们一开始就打下好的思想基础，提高辨

别能力，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防止他们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走上错误的道路。另一方面，在业务上要严格的要求他们，勤学苦练，踏实钻研，戒骄戒躁，虚心地向老专家和一切有长处的人学习，加强基本训练，力求成长得更快一些。青年时代，是学习知识、经验的黄金时代，今天到会的很大部分是青年同志，我希望同志们好好地利用这一段宝贵光阴，积极学习本事，提高能力，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红色的专家，不要辜负党、国家和人民对你们的培养和期望。

“红与专统一”的认识问题解决之后，政治思想工作、行政工作的方法要改进，这样六分之五的时间[3]才有保证。过去一个时期，研究时间得不到保证的问题是严重的。真正做研究技术工作的时间不到六分之三，有些党员技术人员和骨干只有六分之一、二，甚至几乎完全脱离了技术工作。去年年底，国防部对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下了命令，我也一再讲过，情况确实好转一些，但是还没有完全解决。搞学习，开各种会议，还是有形式主义，时间拖得很长，收效很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般人员能够基本保证，技术骨干没有保证。技术骨干是我们攻克技术难关的主力，如果他们坐不下来，在研究技术工作的第一线时间很少，老是被一些行政事务纠缠住，这就非常危险。我们要大声疾呼，下最大的决心，按人、按工作性质采取措施，认真、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其他一切措施都是空话。业余时间，一定要保证科学技术人员能够读书、做研究、休息，不许乱占用。

和这些问题有关的，是培养人、用人当中的平均主义问题。这种倾向必须纠正。现在有一种风气，不承认个人钻研，不承认水平有高低、成绩有大小，把个人的努力钻研和个人主义混淆在一起，反对人家立志成为科学家的抱负。写学术论文，只有什么组，什么室的名字，不署人名，好象我们只要什么科学组，没有科学家似的。在某些单位，实际上，对于业务上有成就的人，不是爱

护培养，反而是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出了尖子也要削平。其实，业务上出了尖子是好事情，有了尖子才能帮助大家普遍提高。科学工作者应当努力做一个红色专家。没有这种抱负，是没有出息的。为国家争光荣，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成名成家，对社会主义有利的成名成家，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是十分需要的。今后要采取开名单的办法，对于高级科学技术人员和最有希望的青年，要由五院和国防科委掌握，重点培养，重点支持，象国家培养乒乓球选手一样，使优秀人才能够更快地顺利地成长，并且大力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乒乓球出了庄则栋、丘钟惠[4]，我们科学技术界难道不应该出更多的庄则栋、丘钟惠吗？

以上所讲的，就是有关我们科学技术队伍的主要问题。我们这样做法，是不是对科学技术人员要求不高了呢？恰恰相反，这样要求是更高了，要求你们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求你们听党的话，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地为党、为国家工作，做出成绩，拿出货色来，而且要求你们更快地提高自己的水平，迎接今后更困难的任务。五院一成立的时候，我就讲过，我们的火箭技术，一定要依靠我们中国自己的专家和工人，大家一定要争一口气，发展我们自己的导弹事业。我完全相信，我们在座的同志，一定有这个雄心壮志，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二）

在十四条意见当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五院的情况和一般自然科学学术研究机构有所不同，但是作为一个政策，是同样适用的。同时，今天还有各部门、中国科学院的同志参加。所以我比较详细地讲一讲。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发展科学文化的根本政策。正确执行这个政策，就可以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得到比较迅速、比

较健康的发展。毛主席曾经告诫我们:“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5]

在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鼓励各种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和对于具体学术工作的不同主张,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自然科学学术问题的讨论,要不戴帽子,不拿棍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去压服少数;要允许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既要提倡批评,还要鼓励和保护反批评;以便通过自由讨论、科学实践和时间的考验,逐步辨明是非。在人民内部,在学术问题上,一定要有自由和民主,否则就不利于学术的发展。

因此,要正确执行这个政策就需要:第一,由党来领导。党组织既不要放弃领导,听任某一学派实行垄断;又不要自己对学术争论问题作出结论,强制推行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学派。也就是说,党对自然科学的学术争论,是既要领导,又要超然一点。党组织必须经常教育干部,端正政策思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保证党对学术工作的正确领导。第二,鼓励属于不同学派和持有不同学术见解的人互相尊重、互相探讨、团结共事;而不是坚持宗派门户之见,互相攻击、故步自封。第三,提倡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尊重事实,而不是轻视群众、轻视实践、不顾事实。

在科学技术工作中,要正确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具体工作问题之间的界线。对于学术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不要随便当作思想问题来批判,更不要把思想问题引申为政治问题来斗争。不要用开群众批判大会、贴大字报等方式来处理学术争论的问题。由于这几类性质的问题有时互相掺杂,界线不易划清,因此,在问题的性质还难以断定时,要首先

把它当作学术问题，采取自由讨论的办法，以便弄清情况。

自然科学技术，同社会政治学说不同。同样一种自然科学技术，可以为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给自然科学技术的不同学派和不同主张贴上什么“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之类的阶级标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遗产，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用的自然科学成果，我们都必须掌握过来，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如果有人曲解自然科学成果来论述社会政治问题，假借自然科学的名义，进行反动政治宣传，那就不是自然科学学术问题，而是政治性质的问题了。至于有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在学术著作中，发表了一些有政治错误的言论，对这种情况，则要加以分析。如果本人在政治上总的方面是好的，这些有政治错误的言论是局部的、次要的、偶然的，或影响不大的，可以向本人指出错误所在，让他们自己来纠正，不必登报和在公众场合批评。如果本人坚持不改，必需公开批评时，也要注意不要把整个学术著作全盘否定。

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的争论，有的是反映在理论概括和研究方法之中的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争论，有许多则不是这种性质的争论。不要把本来不是这种性质的争论和一时还不能判明它的性质的争论，轻率地提到哲学的高度。即使是有关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争论，也是属于学术性质问题，也要进行具体的分析，通过自由讨论来解决，不能采取简单地扣帽子的办法来解决。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积极倡导自然科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这种思想武器。但是，第一，要引导而不要强制人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第二，要认识到，在自然科学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不仅要

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原理，而且必须通过具体的科学研究的实践，才能逐步做到。

我们要积极提倡和帮助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且逐步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但是运用毛泽东思想解释自然科学的学术问题，应当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不要牵强附会，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在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计划指标、研究方法以及鉴定和评价研究成果等问题上，常常会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这些争论，有些的确反映了某些科学工作者的思想问题。但更多的是属于工作做法和学术见解的问题，应该当作学术问题，采取自由讨论的办法来解决。不少单位，往往把这些方面的问题随便提到科学工作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轻率地给人家戴上坚持资产阶级科学道路的帽子，使得许多科学工作者不敢讲不同意见，这是很不好的。必须仔细地区别具体学术工作上的不同意见同科学工作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区别科学上应有的求实精神、怀疑态度同思想上的因循守旧、轻视群众。同时，即使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包括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凡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采取民主讨论的方法、和风细雨的方法、耐心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压服的方法。有些科学工作者，即使思想上有问题，对工作上的有些意见却是正确的，对这些正确的意见，仍然应当听取和接受，不能抱有成见，因人废言。这样做，不但有利于发扬学术民主，而且也有利于团结更多的科学工作者，教育他们提高思想觉悟。

具体工作上的分歧意见，不同于单纯的学术观点的争论，往往需要作出决定，以便安排工作。今后对于此类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通过科学工作者充分讨论，通过一定的领导组织作出决定。同时，仍要允许保留自己的看法，不要随便给持有不同见解的人扣帽子。

有些学术问题的争论，涉及各部门、各地方所制订的某些技

术政策和技术措施。科学工作者对这些技术政策和技术措施提出不同意见，不但应当允许，而且应当鼓励。在这些问题上，不让发表不同意见，或是把这些不同意见都当作反对党的政策，是不对的。制订技术政策，推广技术措施，一定要经过充分地讨论，要经过试验成熟，不能主观地草率地决定。对于已经决定和公布了的技术政策，完全可以讨论，让不同意见得到发表，并向有关部门和科委反映，以便提醒我们，防止在生产技术指挥上发生偏差。至于实现既定的技术政策的具体办法，以及各种技术措施，更应该充分展开讨论。

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关的，还有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

科学研究应当为国家建设服务，这是不能有任何疑问的。从全国范围来说，直接结合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需要的研究工作，是急需的和大量的，在国家的科学计划中，应该占首要地位。凡是承担这些任务的研究机构和科学工作者，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来进行。放松这方面的工作，是要误大事的。必须集中力量，确保重点，安排落实，坚持到底，力争国防尖端和工农业生产中的重大关键问题过科学技术关。当前最要紧的是把研究任务稳定下来，强调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研究，得出结果。

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途径是十分宽广的，在这方面要有全面、长远观点。直接为近期的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的研究工作，应该多投入力量；间接的或在远期才能发生作用的研究工作，也必须作出安排。研究课题，可以是从生产建设任务中提出的，也可以是从各门学科发展中提出的，两者不可偏废。即使有一些探索性课题，目前还看不出应用价值，如果有利于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客观世界，也不能忽视，投的力量可以少一些，但不能丢开不管。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每一个学科和学科的每一个分支，都要有人去做工作，逐步填补空

白。

现代生产技术的重大变革，没有自然科学的理论指导是不可能的。没有理论研究，不把理论研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就不能保证自力更生地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忽视理论研究是要吃大亏的。开展理论研究，不但对于明天是必要的，而且在今天就很需要。现在，许多尖端技术不能真正过关，许多群众创造不能提高发展，重要原因之一是得不到理论的指导和总结。理论研究已显得落后于实际需要。所以造成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具体的安排，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少同志狭隘地片面强调实用，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偏向。因此，有必要再一次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并做出实际的安排。研究设计单位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完成任务，为了独立设计，理论研究工作也应该积极开展。

关于“以任务带学科”。几年来，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提出了“以任务带学科”这个口号，意思是说：要根据国家建设中提出的科学技术任务，有计划地组织各有关学科的力量协作进行研究，通过这些科学技术任务的研究解决，来带动各个学科的发展。运用这个方法组织科学研究，使研究工作的目的性更加明确了，对于科学工作的跃进起了重要作用。五院就是任务带起来的，根据任务，进行建设，用任务来带动科学研究，带动各方面的工作。今后还是这样做。但是，只提这个口号也有片面性的缺点。主要是，许多学科都有一些理论研究和基础研究不容易用“任务”带动起来，需要从“学科”的角度进行安排，只提“以任务带学科”，这部分工作容易被忽视或否定。事实上，某些科学工作者，从学科出发搞些理论研究，就曾经被不正确地批评为脱离实际。同时，这个口号本身，概念也不大清楚，如“任务”两字，即可以作多种解释。虽然我们曾经几次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指出“以任务带学科”是具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一种好的方法，在今后，它仍然是应当采取的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有些工作也应

该从学科出发进行安排。在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即曾专门做了基础学科的规划。以后历年的年度计划也都注意列入理论研究的课题。但是，这个口号已经在科学界广泛地传播开来，而这些说明并没有同样为人们所知晓和重视。因此，到现在，仍然存在着由此而来的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片面理解，和忽视理论研究的危险。因此，今后应该使用“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理论联系实际”这些准确的说法。至于“以任务带学科”，作为一种方法，应该按照上述解释，加以全面的说明，以避免思想上的误解，和工作安排中的片面性。

有少数科学工作者根据自己的专长、兴趣和新的学术见解，提出一些研究课题，有时和国家计划结合不上。这样的情况虽然不多，但是，如何处理，很值得研究。进行这些工作一般只要很少的人力物力，不会影响整个计划的安排。让少数人在完成规定的计划之外，搞一点自由课题，搞点自留地，不但能够进一步发挥这些学者的专长和积极性，而且对于科学探索、繁荣学术活动，也是很有必要的，是有利无害的。因此，在大计划之下可以有小自由，对于这些国家计划以外的自由选题，应量力予以支持，或列入补充计划。

（三）

关于技术工作方面的问题很多，我今天想，着重讲讲技术民主和技术责任制的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应该注意发扬技术民主的问题。实质上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具体技术工作中的运用问题。在选择和确定研究任务、指标、方法以及鉴定和评价研究成果等问题上，允许有不同主张、不同看法，应当发扬民主，由科学工作者充分讨论。既要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又要提倡实事求是、科学分

析，允许人们抱怀疑态度，提出自己的看法，进行探讨。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要由一定的领导单位作出决定。决定必须遵守，但对决定的不同看法允许保留，让科学试验来做结论。领导上一定要创造这样一种气氛，使科学技术人员能够大胆负责，工作中要敢于拿出自己的技术见解，在技术上说真心话。既不浮夸，又不隐瞒。尖端技术的问题，带有综合性，很复杂，所以，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是很好的事情，毛主席经常讲，要善于听相反的意见。我们要通过科学工作者的充分讨论，互相补充、互相修正，最后由科学工作者自己提出比较全面、比较恰当的方案。而且，在执行中，领导同志要为科学技术人员撑腰，即使失败了，也要鼓励。科学研究试验本来就有失败的可能，愈是重大的课题，往往要经过多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试验失败了，我们也还要打气，绝不能泼冷水，要吸取经验，反复试验，一直坚持到成功为止。

科学技术专家也要学会运用技术民主，走群众路线。一个人考虑问题，总有不周到、不完全切实的地方。因此，善于倾听大家的意见，并吸取其中正确的部分，加以集中、提高，就能找出比较全面、比较切实的方案。把任务、问题、完成任务的途径，都对同志们讲清楚，然后大家讨论，分头研究，集思广益，这总比一个人单干好得多，也快得多。这样做，对专家本人是有益的，可以从群众中、青年中学习并吸取许多好东西。对培养广大青年技术干部也是有益的，可以使青年技术干部在参加讨论研究过程中，逐步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我们的科学技术专家，是技术战线上的指挥员，有责任、有义务把你所带领的战士带领好，要善于在战斗之前开诸葛亮会，把大家的正确意见归纳起来。当然，我们提倡技术民主，提倡群众路线，还要有集中的一面，不是做群众的尾巴。在技术问题上，有时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意见比多数人的意见更正确，不能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因此，大

家所提出的技术见解和方案，有正确的，有比较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要采纳的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意见，对于不宜采纳的意见，应该向提出的人加以说明，同时允许别人仍然保留自己的看法，并且通过尔后的事实和试验来作最后的验证。

在技术民主的基础上，必须加强技术责任制度。科学技术问题，每一件每一项都要有人负责。特别是高度综合、复杂的技术，更是要有严格的技术责任制。现在，在一些研究机构或工厂中，讨论技术问题的时候，科学家、工程师反而没有什么发言权，技术上没有什么责任，这是不好的。技术责任制度松弛，否定和忽视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其结果是技术上的瞎指挥，事故增多，质量低劣。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尖端武器上，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的。技术问题，首先是要科学技术人员负责任。应该由科学技术工作者充分讨论，提出解决的意见或方案，通过领导组织作出决定，组织科学工作者去负责实现，组织其他工作予以保障。例如，五院需要成立技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院党委的领导下，统一指导全院的技术和学术研究工作，比如说，由钱学森同志当主任，由有关的领导同志及各单位的专家们参加。重大的技术问题，在技术委员会上充分展开讨论，要充分考虑各种不同的意见。对这些不同的意见，不能只看哪是多数人的，哪是少数人的。有时，如果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在技术上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技术委员会的主任就应该根据正确的意见来作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不是靠举手投票来决定问题。技术委员会的主任要对院党委负责，向院党委提出报告并提出技术上的结论，院党委经过认真讨论审查后，支持它，批准它，并通过行政技术系统贯彻执行，做一系列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使这个决议变成群众的思想，群众的行动，各级领导一定要坚决保证其实现。这样，党委通过技术委员会，来实现对具体技术工作的领导，科学技术上既有广泛的民主讨论，又有高度的集中指挥和明确的责任。我认为，这才是五院

党组织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正确方法。

我们党内的各级领导同志要承认自己还是外行。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不但在政治思想上，而且在技术业务上也要领导。但是，要领导得正确，在技术问题上，就必须听内行的意见，帮助和支持他们，让他们有职有权有责。在这上面，比资格、比军衔是不成的。比方说，对于方针、政策和总的任务要求，我可以提出意见（当然也要征求同志们的意见和经过军委批准），但是，对于具体的方案、涉及到科学技术问题，我要听钱学森同志和各位专家的，由你们提方案，而不是由我来提方案。具体的研究、设计、试制、试验工作，由你们去指导、去检查，而不是我来包办。

发扬技术民主的风气，建立技术责任制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实现这两点，首先和主要的是要求党的组织和行政领导下决心保证，切实帮助和支持科学技术人员的工作，并且做一系列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才能真正贯彻。技术工作要有民主、也要有纪律。在讨论过程中，要充分发扬民主，作了决定以后，实行中就要有纪律。技术负责人决定了的技术思想、技术措施，下级要切实贯彻执行。执行中要有统一指挥，不允许各行其事，不允许存在无政府状态。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不能不执行决定。国防科委和五院各级领导，应该定期检查技术民主和技术责任制度的执行情况，并且以此作为考核各单位党组织和政治工作做得好坏的标志之一。对于技术人员来说，勇于为国家负责，为党、为人民的事业负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大胆钻研，大胆工作，这是思想觉悟的具体表现。顾虑多端，畏首畏尾、不敢负责的毛病，对自己的进步固然有妨碍，而更重要的是对工作有害处。大家一定要拿出主人翁的态度来，一切为了出成果，出人才，为了祖国的国防科学技术事业。只要我们把技术民主和技术责任制度搞好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全体科学技术人员、干部和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更能使我们的科学技术问题比较快地

过关。

和技术责任制度有关的，还有一个培养技术工作中的良好风气的问题。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必须把革命性和科学性结合起来，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坚持真理，说真话，报实情，有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和严密的方法。敢想、敢说、敢干和严肃、严格、严密相结合。尖端技术工作必须一丝不苟，扎扎实实地按照科学要求来完成，错一点，马虎一点，浮夸一点，就会引来严重的损失，甚至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一切试验试制工作，都必须要有严格的规程，而且要严肃地、准确地按规程办事，一切工作都要严格保证质量。规程的修改变动，一定要经过反复试验证明和上级批准，不能随便改变。测试数据、计算、图纸一定要准确。研究结果一定要写出报告，经过审查鉴定。各项技术资料一定要及时的很好的总结整理，建立专题档案。试验室和工厂中，必须要讲究清洁和秩序，研究工作要求安安静静，干干净净。这个我反复讲了多少次，中央也专门批发过文件[6]，这方面的情况要经常检查，坚持下去，形成好的习惯，好的风气。否则，我们在尖端和精密技术上是过不了关的。在全体工作人员中大力提倡严肃、严格、严密的风气，移风易俗，是五院各级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把这一套风气养成了，五院才算有了发展尖端技术的起码条件。这是我们对国防事业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们要把它看作是重要的政治问题，是国家的安危问题，切不可马马虎虎，等闲视之。不要刮一阵风，风刮过去了，便又退步了。在这方面，五院已经有了几年的经验，有可能，也十分需要制订一套制度和纪律，雷厉风行，认真执行。

（四）

第四个问题，是改进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五

院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有成效的，基本上是做得好的。各级领导、政治工作干部和全体党员都做了许多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也有不少好的经验。这是基本的一面。但是，应该看到，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我们在工作方法、作风上还有一些缺点，工作中也有不少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回避工作中的问题，而是严肃对待这些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有错误就改正，有偏向就纠正，以不断地提高工作水平。

我感觉到，首先要注意的问题是：明确目的，结合特点。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国防科学研究机构内，必须不断地加强，而不允许有任何的削弱，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明确目的，结合特点，才能发挥更大的威力。五院是国防部门的一个组织，同时它又是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因此，五院的政治思想工作，就跟部队不同。虽然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军人，但是不能用管理连队的方法来管理知识分子，不能完全搬用部队工作的一套方法来处理科学技术问题。否则我们的工作就会文不对题，不但收不到应有的效果，而且可能招致损失。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保证完成任务，出成果，出人才。政治思想工作是否成功的标志，就是看是否能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充分发挥各类干部特别是科学技术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造成一种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他们能够放心负责地去做工作，踏踏实实做出成果。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围绕中心任务，保证中心任务的实现，影响了中心任务，工作就失去目的性了。如果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不是使人们的积极性愈来愈高，而是不能保证他们集中精力进行研究工作，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那么，工作就值得检查，值得改正。

第二，要改进方法，讲求效果。任何工作，不只要看是否有良好的动机，而且都要讲究方法，讲求效果。

国防科学研究机构，必须要根据上面所说的目的和工作对象的特点来进行工作，关键问题是改进方法，力求收到比较大的效果。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加强，思想斗争必须进行。但是，一定要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区别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区别大节和小节，区别主流和支流。要学会细心地团结、争取和教育中间分子，而不能沿用反右派斗争的方法来对待中间分子，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学会更多地运用耐心的、和风细雨的方法，运用正面教育、自我教育的方法。要按照中央指示的："在尊重他们的科学工作，发扬他们科学研究的积极性的前提下进行，而不是以损伤他们的自尊心的方式来进行。"

组织科学工作者进行政治学习的方法，应加以改进，力求时间短而得实效。应当按照各类人员的不同条件，采取不同的形式、方法。例如对于科学技术人员，特别是大专程度以上的人员，政治学习的主要方式是自学，同时还可以组织一些有内容的报告，有准备的座谈讨论等等。凡是可以精简的会议，一定要坚决精简，必须开的会议，也要妥善安排，要有准备，要解决问题，不要把时间拖得很长，终日空谈，浪费时间。

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做政治思想工作，要以亲切诚恳的态度，同知识分子谈心、充分地自由交换意见，做到象知心朋友一样，并且从政治上、工作上、学习上和生活上关怀他们，帮助他们进步，建立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合作共事关系。同时，要深入了解科学工作者的具体思想状况，进行切实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力戒空洞说教和形式主义的作法。

第三，深入工作，抓活的思想。在战争的时候，政治思想工作要上火线。在科学研究单位，政治思想工作要深入到业务工作中去，到科学研究的第一线去调查研究，抓经常性的工作。不能终日坐在办公室里等人家上门来，不能光依靠搞运动来做工作。有些同志反映，一个星期只有一天开会，思想政治工作不好做。把

在办公室里开会或者是在大会上讲话，作为做思想工作的唯一法宝，这是不对的。有些政治工作同志反映，到研究工作第一线去，人家都在做试验、做计算，自己去了，插不上手，同志们还要给你让坐，招待一番。可见就是因为下去少了，所以同志们才把你当客人看待。我以为政治工作同志要到研究室里去，首先是帮助工作，就算做一些辅助性的劳动也好，总可以和大家在一起，开始熟悉研究工作的生活气氛，知道同志们在干什么，自己也可以在这里面逐步学一些技术知识。熟悉了情况，就能逐步发现工作里有些什么思想问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就可以逐步认识、逐步掌握科学研究工作的规律，政治思想工作就会更加深透，就会更有声有色。在这方面五院有不少政治干部做的是很不错的，已取得了些经验，应该很好总结推广。我们要抓思想，这就是活的思想。这些工作做好了，对研究任务的完成，帮助就最大。人不是机器，在工作中，总是有思想活动的，特别是研究工作者，主要的劳动就是脑力活动，表面是不易看出来的。因此，我们的工作要越做越细，力求做到能够彼此交心，能够知道他们有什么苦恼，什么疙瘩。例如，有些人个人生活有问题，有些人对工作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工作遇到困难信心不足，诸如此类，都需要我们具体地去帮助。而且不光是说一般的道理，是要具体分析情况，耐心帮助，需要采取具体措施，具体解决问题。总之，工作中哪里有问题，就到哪里去细致深入地做工作。这样，就不是只靠六分之一的开会时间，而是变六分之一为六分之六，随时随地做工作，把政治思想工作渗透到业务工作中去。这样的工作方法，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这样政治思想工作才能真正起“灵魂”、“统帅”的作用。

党组织怎样领导科学研究和技术工作呢？党组织怎样起领导核心作用呢？党组织的领导，首先是方针政策的领导，政治思想的领导。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

示，研究和决定各方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包括业务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在工作方法上要善于抓大事情，抓那些影响到科学研究、影响到工作、影响到群众生活的大事情，善于发挥科学工作者和行政及其他组织的作用，防止事无巨细包办代替、独断专行等毛病。对于具体的科学技术问题，应该组织科学工作者的民主讨论，通过行政领导和技术领导组织作出决定，动员科学工作者去努力实现。党组织对于各个具体的技术问题，主要是听负责的科学技术人员的意见，不要自己过早地轻率地作结论。至于室一级的支部和党小组，首先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党组织的堡垒作用，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的正确贯彻，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党员应该首先做好自己所承担的工作，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影响群众。每一个党员对所在单位的行政领导和技术领导人，不管是否党员，都应尊重他们的职权和领导。党员个人不允许超越自己的职权，随便在工作上发号施令。党员科学工作者当然要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指示，遵守党组织的决议，但是在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当中，党员个人的见解，并不代表党，党组织也不要求党员一定要拥护或反对某一种学术见解，党员科学工作者同党外科学工作者一样，应当也完全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平等地参加讨论。

我在上面讲了许多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领导方法，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应该认识，我们各单位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党对技术业务工作不是抓得太紧，而是抓得不紧、不深。如果认为这么一来，党就少做思想工作，党就绕开科学技术走，这是完全错误的。问题在于工作方法。有些单位工作没有搞好，是方法不对头，把党的作用降低到行政命令、事务主义的水平，该管的大事没有管，该运用行政、技术系统去做的事情却包过来了，形式上好象抓得很紧，实质上是削弱了党的领

导，放弃了真正的政治思想工作，没有抓紧关键，没有深入工作。政治要挂帅，党要领导科学，这是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的，但是要真正挂起帅来，要领导得好，就需要组织大家去做工作，发挥各种组织和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果不是这样，纵然少数人忙得要命，工作还没有做好，甚至会做出错误。因此，当前的首要问题是改进方法，提高领导艺术。我们全体党员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同志，要从积极的意义上去理解、去实行这些办法，切不可从消极的意义上去看待这些办法。

在这里还要提一下行政工作的问题。研究机构内的行政工作干部必须树立为科学研究工作服务的观点，努力改进和做好服务工作。一切行政工作的规章制度都应当便利科学研究工作，适合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很多同志过去在部队里大小是个首长，是指挥人的，发号施令的。现在的工作岗位，则要求为科学工作服务，要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来做组织保障工作，需要亲自动手做很多具体事情，特别是五院建立不久，发展很快，条件保障工作十分重要，十分艰巨，这和过去的工作情况大不相同，确实是一个大变化。因此，有些同志就不大习惯这种工作，不会做这种工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少数人由此产生抵触情绪，不大安心，这就是不正确的。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老老实实地做好人民的勤务员。我们这个工作，也就是做人民勤务员的工作。我自己就是个勤务员，我有志于当个科学工作的勤务员，为研究工作努力创造各种条件，保障科学工作者必要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这是党分配给我的工作，是否做得好，我不敢说，但是，我一定好好地认真地去做，把这种服务工作当作是我终身的光荣任务。研究机构内的党组织，必须教育全体行政工作干部，使他们认识到：为科学工作服务好，就能使科学工作者为社会主义服务好，这是对党的事业有利的，也是党所需要的。这只是一种分工，同样都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样都是光荣的革命工作，并没

有什么高下轻重之分。担负行政工作的党员干部，应该以身作则，安心做好服务工作。在科学工作者和行政工作干部之间，还应当提倡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合作的优良风气。

（五）

最后，我想向大家提两点希望，一是加强团结，克服困难；二是加强学习，提高水平。

大家知道，五院当前的工作，只是开始迈出第一步，今后的任务还更艰巨。同志们工作都很努力，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有些缺点错误的产生，是由于大家都缺乏经验，也是由于我们领导机构对下面帮助不够，指导不力，不能怪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领导上，首先是我自己，要把责任担起来。我要再三强调，上面所说的这些意见，是为了改进和加强领导，而不是放弃和削弱领导；是要加紧工作，保证重大的技术任务过关，而不是放松工作，遇难而退。经过几年来的发展，在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关键问题上，现在正处于攻坚的阶段，要攻破许多硬堡垒才能取得阵地，前进一分一寸都是不容易的。除此以外，目前还存在某些器材条件和生活供应上的困难。在这些困难面前，一方面，要强调不怕困难、克服困难的精神；另一方面，各单位的领导要正视困难，积极地切实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加强政治思想领导，进一步团结、鼓励和组织广大科学工作者勇敢地承担各项艰难的研究试制任务，埋头苦干，自力更生，把工作做到家，成果拿到手。我们要和广大科学工作者和广大干部讲清楚，要攀登科学高峰，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的，这正是对我们的考验，正是需要我们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团结，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我们的领导骨干、技术骨干、青年技术人员和政治、行政等各类干部，在困难的面前，更要互相帮助，紧密合作，不怨天，不尤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踏

踏实实，埋头苦干。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不管来自哪一方面的困难，都不能动摇我们的决心，都不能阻止我们的前进。

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我们要戒骄戒躁、努力学习。刘少奇同志在庆祝我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号召全党干部展开一个新的学习运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以便多快好省地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号召，对于我们在国防科学技术岗位上工作的同志，更加重要，更加迫切。应该认识，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大多还是外行，在领导国防科学技术工作上面，我们是缺乏经验的。就算是一些学有专长的专家，也只是专一门，对于这样高度综合性的尖端技术，作为整体来说，也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和其他各类干部，也都迫切需要学习提高。要把这些工作组织好，迅速突破技术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努力学习。我们每一个人的水平，和党对我们的要求比起来，都还是很不够的。要领导得好，必须提高政治水平，以逐步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客观规律，掌握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这一套，我们懂得还不多。我们不怕不懂，就怕不懂装懂。不懂就要学，不要安于外行，只要努力去学，一定能够学会。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我们大家都要下定决心，在党所指定的工作岗位上，决心干一辈子，做到老、学到老，为我们祖国的强大国防，献出我们全部的精力，献出我们的一切。

五院和到会的全体同志们，我们要加强领导，改进方法，多出成果，多出人材，为发展祖国的国防尖端技术争取更大的胜利！

注　释

〔1〕十四条，即《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由聂荣臻主持拟定。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聂荣臻的汇报后，原则批准这个文件。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发全国各

科学研究单位遵照执行。批文指出："这个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的部门和单位，都是适用的。"

十四条的内容是：①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②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③正确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④计划的制订和检查，要从实际出发，适应科学工作的特点；⑤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坚持工作的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⑥坚决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时间；⑦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⑧加强协作，发展交流；⑨勤俭办科学；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⑪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⑫加强思想政治工作；⑬大兴调查研究；⑭健全领导制度。

〔2〕六项政治标准，即"六条标准"，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原文是："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3〕六分之五的时间，指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三日《国务院关于在科学研究机构中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和保证科学研究时间的通知》中的规定：必须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六分之五的时间（即每周四十小时）从事专业工作，政治学习和党、团、工会活动每周只能占八个小时。

〔4〕庄则栋，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三次蝉联（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并与他人配合获第二十八届男子双打冠军。丘钟惠，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中国第一位女子单打世界冠军获得者。

〔5〕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第三八八页。

〔6〕文件，指中央书记处一九六〇年十月十八日批准并转发《关于尖端、精密生产和研究工作中的清洁和秩序问题》。

在听取五院领导汇报工作时的指示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六日）

一、对副博士的工作要清理一下，看看我们的工作安排是不是适当。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他们的军衔、级别是不是合适，待遇怎么样，注意防止平均主义。学位、学衔今后还是要搞，大学毕业生到五院经过一定的见习时间，就应当提为工程师。在工作中还可以采取写论文等办法给副博士、博士的学位。

二、五院的大学生很多，把队伍组织好是非常重要的。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来的大学生都可以提为工程师。工程师制度必须搞起来，如果自己不提拔，几年以后还是没有我们提拔起来的工程师。

三、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不可动摇的。技术责任制，肯定应当是以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基础。但是，党委对技术的领导要集中在院和分院两级，不能分散。中央规定：大学党委是基层组织，大学的教学领导集中在大学党委这一层组织，班、系的支部、总支只是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目前，党领导不集中，整个的偏向是支部权力过大。农村支部由于权力过大，产生对人民实行“专政”的错误。工厂、学校的支部权力也是太大。党的领导分散不集中，这是当前的主要偏向。

四、实行技术责任制，不能实行三长制。行政、政治、技术不能三权鼎立，而是有机的结合，统一在首长分工负责制的基础上。技术问题由技术人员下决心，但是必须报告党委批准，通过

技术、行政组织去贯彻执行；不是技术人员只提出意见让党委决定，而是由技术人员下决心，由他们负责。这是党委的领导方法问题，这样党委领导就主动了，最近科学院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技术人员普遍感到担子重了。在讨论技术问题时，行政、政治干部应参加，一定要参加，以便了解情况；也可以表态，但不要过早说话和轻率的去作“结论”，否则技术人员就不好讲话了。技术、行政、政治三者是不可分离的，如果三者并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总之，技术问题一定要技术人员下决心，将技术人员的意见集中统一在党委领导下，通过院首长的分工负责制，成为全院的决心。我们对技术问题的规律还没有摸清，规律要慢慢的摸，急不得。技术问题还是让技术人员去解决，这样党委就更主动了。

五、苏联的经验我们要学习，但不能照搬，应该从我们的实际出发。自动控制设备的研制，一、二分院要集中，不能平均使用力量。苏联人多，我们人少，他们能搞两套，我们现在不能搞两套。由于我们的技术力量薄弱，全国都需要集中，五院内部还能分散吗？思想不通，也要集中。现在只能这样做，这样做是合理的，将来情况变化了，不合理了，再修改。五院成立一个技术委员会，分院搞一个技术小组。

六、组长应该是技术尖子，副组长根据任务设一至两名。组里不管行政，行政事务工作由室里担任。副组长担任技术管理。研究室的主任究竟是配技术干部还是行政干部？要因人制宜，如果技术干部任正职，就不能受军衔、级别的限制，正职可能比副职的军衔、级别低。研究室行政副主任的工作，大量的是技术管理工作，不仅是生活管理，不能将研究室的行政工作简单的看成是管理员的工作。行政副主任必须钻到技术业务工作中去，进行技术业务的管理和保证工作。

七、五院的技术工作如何领导、如何管理，技术人员如何组织、职务名称和级别待遇如何确定？应该搞一个条例。现在条件

成熟了，参照科学院的条例，搞一个自己的条例。规章制度早日定下来。

八、五院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特别去年，留学生、大学生、工程师、军队干部增加一万多，情况非常复杂，问题很多，工作是艰苦的，是不容易做好的，必须认识到这一点。特别是军队来的干部，过去是搞部队工作，现在是搞科学研究工作；工作是新的，过去工作对象是战士，现在的对象是知识分子。认识特点，摸到规律需要一个过程。现在工作还是做得不错，有一些偏向是全国性的问题，五院当然也要受些影响。工作中有些缺点要主动检讨，过去红与专的问题，批评错了的加以清理、摘掉帽子，领导上主动检讨。有些行政干部、政工干部思想上不通，让他们好好学习文件，认真地研究一下，问题就解决了。现在的问题还是有些人不敢讲话，要充分发扬民主。现在强调技术，不是否认政治。对于各方面的偏差认识，不要批判，不要斗争，主要是加强正面教育，统一认识，解决思想问题。

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日）

一、当前我国国防尖端技术的基本情况

我国国防尖端技术在一九五八年前还是一片空白。几年来，在中央、军委和各有关部门的关心与支持下，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

导弹技术方面：仿制的近程地地导弹，已在一九六〇年试射成功，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进设计的地地导弹正进行试制，预计今冬明春可进行靶场试射；自行设计的中程地地导弹现已着手若干关键部件的设计、试验，将在改进型地地导弹试制成功后全面展开，争取一九六三年试射。现在五院已拥有大学毕业以上的技术干部几千名，各级技术骨干约几百名；研究试验设备现在可保证近中程导弹的需要，明年全部建成后，可大体保证中程导弹的需要。五院的两个试制工厂，各种工作母机和精密机械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目前主要是土建工程跟不上，许多设备不能安装。这套试制工厂建成后，可担负中程地地导弹、地空导弹的发动机、弹上控制设备和全弹总装的试制任务，但地面设备及材料、元件等，仍需请其他单位协作。导弹靶场的第一期工程一九六〇年已基本完成，并担负了仿制的地地导弹和空空导弹的试射任务（空空产品不合格），还可试射地空导弹。今明两年靶场的扩建工程主要是为试射改进型地地导弹和自行设计的地地中程导弹作准备。

---

* 这是聂荣臻给毛泽东的报告。后经毛泽东、周恩来等圈阅同意。

原子能方面：二机部现有大学毕业以上科学技术干部几千人；几年来的地质勘察，已查明能利用的铀矿金属储量，足够现在这一套工业生产的需要；三个铀的主要矿山将于明、后年建成；选矿、冶炼、金属加工和武器装配工厂，已有大部分设备，一部分关键设备，正在安排试制，争取于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先后投入生产。这一套建设项目完成后，即可制造一般的原子弹。大型原子反应堆和放射化学工厂目前主要是搞研究设计，这是为制造可以装在导弹上的比较高级的原子弹和氢弹服务的，争取在一九六五或一九六六年建成。配合原子能工业的原子能研究所，一九六二年可基本建成，现已拥有一个实验性反应堆、一个回旋加速器和核物理实验室、简易放射化学实验室以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功率反应堆等科研设备，可以初步进行冶炼、反应堆、放射化学和原子弹基础物理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对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二机部已集中一批科学家，摸索了一年多，找到了一些关键问题，个别的已经初步突破，大部分正在攻关。在这方面，苏联没有给我们任何具体援助，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尽量争取不迟于一九六三年提出初步设计方案。原子弹试验靶场目前主要是进行土木建筑，许多地面设备、测试仪器尚需研究设计，安排试制。

总之，国防尖端技术的研究试验基地已具有一定规模，集中和培养了相当数量的技术干部，并已摸到若干重大技术问题的关键，有些问题已进入攻坚阶段；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国防尖端技术是有条件的，有信心的。

但在前一时期，由于对国防尖端技术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在战术上对它重视不够，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战线太长，力量分散，不仅不利于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而且使国防尖端技术和工业基础之间本来就不太适应的情况更加突出起来。

国防尖端技术包括两个任务，即掌握国防尖端的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成批生产。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工业上能够成批生产，以尖端武器装备部队，但三、五年内主要是科学技术上能否突破，还不是成批生产、装备部队的问题。在这期间，无论应付局部战争或世界大战，我们还只能靠常规装备，但必须抓紧这段时间在技术上突破尖端，为下一步成批生产作好准备。虽然遇到国民经济暂时困难，这个方针和决心也不应改变。所谓在技术上突破，就是说尖端武器本身以及研究试制工作中必需的各种新型材料、各种元件、仪器仪表、精密机械、特殊设备、各种化学试剂等等，都要过技术关，能够试制出来或小批生产。它不要求很大的数量，但品种规格要全，质量水平要高。这个要求和三、五年内工业战线上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是完全适应的，而且对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国防尖端技术和当前工业基础有它不相适应的一面，也有它积极推动的一面，如果安排得当，突破国防尖端对贯彻八字方针不仅是一致的，而且是必要的。

因此，根据我国目前经济情况和工业技术水平，我们认为，三、五年内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应该是抓两头：一头抓科研试制，一头抓工业基础。在科研试制方面，应以贯彻“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为中心；在工业基础方面应以贯彻八字方针，发展品种、提高质量为中心。至于尖端武器生产基地的建设，虽然也很重要，但因国家力量有限，科研试制、工业基础都未过关，条件尚不成熟，可以尽量紧缩或适当推迟，着重进行准备工作。

二、调整任务、调整力量

尖端技术战线太长，主要是因为：

（一）苏联政府曾于一九五七年前后承担义务，援助我国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当时是在这个前提下进行安排的。外援中断后，我们虽然也做了若干调整，但不够坚决有力，基本上仍旧是按照原

订计划，研究试验基地的建设和几种型号导弹的仿制生产同时并进；再加上国民经济计划的大幅度调整，尖端技术的战线太长也就更为突出。

（二）技术力量的使用不集中，“大家办尖端”、“广种密植”，同一个任务几个单位同时进行。这种办法虽然起了一定的动员和“练兵”的作用，但终因人力有限，条件无法解决，真正碰到技术关键问题，便显得软弱无力。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已经和正在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条，即调整任务和调整力量。

1. 调整任务

导弹方面：根据中央批准的战略方针，确定以战略性武器的地地导弹为重点，争取三年左右突破中程；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突破了这种型号，其他战术导弹就比较容易解决。苏、美等国的导弹技术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同时，从可能性看，在我们已经初步掌握近程和中程导弹技术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向更远射程发展，也是有条件的。此外，对战略防空导弹也需投入一定力量，为下一步向反导弹导弹方向发展做准备。但这一工作排在第二位，发生矛盾时，优先保证地地导弹。

依此安排，五院的建设计划调整为：集中保证地地导弹设计部，适当发展地空导弹设计部，推迟飞航式导弹设计部（两三年内不建）。

原子能方面：集中解决核燃料生产基地的建设和原子弹的研究设计试制，争取四年左右建成核燃料的一套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比较初级的原子弹；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建成更先进的一套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能够装在导弹上的、比较高级的原子弹。有关原子能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除若干必要的基础理论和长远探索性研究任务外，一般在两三年内都推迟进行。

按照以上安排，今明两年的基本建设拟集中保证“两弹”的

研究试验基地和核燃料生产基地。其余六院（航空）、七院（舰船）、十院（无线电）及各兵种科研机构，除个别急需、配套项目外，基本不新建。

2．调整力量

主要工作有二：一是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和《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1]，从方针政策入手，进一步调动科学技术干部的积极性。一是改变“广种密植”的协作方法，减少协作单位，集中使用中国科学院的力量，明确规定科学院对突破尖端，和五院、二机部一样，负有同样责任。为此，科学院已和五院、二机部分别组成导弹、原子能两个核心协作网，先后调整了二十几个研究所的大部分力量担负“两弹”的科研协作任务，另外还有十几个研究所间接为“两弹”服务。协作的具体组织工作最近亦有改进。前一时期，二机部、科学院会同组成人员审查小组，在既利于保密、又便于工作的原则下，组织双方科学技术人员，在一定的业务范围内，互相交底。这个方法，进一步调动了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明确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办法也较落实，双方都很满意，一致反映“力量可以用到刀刃上了。”

把科学院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是一个很大的加强。这两个核心协作网建成以后，今明两年，五院除少数缺门外，可不大量补充技术干部；二机部原来的技术力量较弱，除中央已批准抽调的技术骨干外，对一般技术干部的需要量亦可适当压缩，主要是补足缺门专业和配套问题。

以上所述调整任务、调整力量的各项办法，有的已经作了，有的正在贯彻。可以预期，调整以后，战线缩短，重点突出，力量得到加强，各种保证条件也将得到改善，对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肯定是有利的。但发展国防尖端技术毕竟要占用一定的国力，必要的投资和条件还需要确保，各种加工、试制任务也需要优先安

排。战线缩短以后，对“数量”的要求必将减少，但对品种、质量的要求并未降低，和工业基础的矛盾仍然存在。因此，在缩短战线的同时，必须狠抓工业基础，只有这两个措施都落实了，国防尖端技术才能顺利地向前发展。

三、贯彻“八字方针”，提高工业技术水平

目前我国工业基础和突破国防尖端的需要在很多方面是不适应的。首先，这个不适应反映在新型材料问题，即材料的品种、规格上。这些新型材料绝大部分没有技术资料，需要解决技术问题，还需要解决原料和科研试制所需特殊设备、仪器仪表等等；而这些特殊设备、仪器仪表，绝大部分也是需要研究、设计、试制的新产品，要有许多新型材料才能制造。所以，现在是许多新型材料的技术问题卡在特殊设备、仪器仪表上，而特殊设备、仪器仪表又卡在新型材料和特殊加工上。

其次，“两弹”的研究试验基地和核燃料生产基地的建设需要国内供应成套装备，其中很多关键设备也需要研究设计试制。几年来，我国机械工业有很大发展，有它相对地长处的一面，但在大型、精密、特殊设备、新型仪器仪表、各种元件等方面则是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目前正是这个薄弱环节承担着为发展新型材料和国防尖端技术提供关键装备的任务，将来还要承担“两弹”生产基地关键装备的制造任务。因此，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目前既卡在新型材料上，又卡在装备问题上。现在，材料问题已被很多同志所注意，需要继续抓紧解决，对机械工业的薄弱环节也有必要着重提出来，以引起大家重视。

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高工业技术水平，不仅是突破国防尖端的迫切需要，而且已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建设的历史任务。过去，我们强调了数量，对品种、质量抓得不紧，造成许多困难，不仅尖端上不去，飞机、舰艇上不去，甚至某些常规装备的生产以及经济建设中的很多问题也不好解决。

现在，数量压低了，品种、质量必须跟上来。去年六月中央上海会议[2]时，毛主席就曾强调提出抓品种、质量。这个关是无法回避、一定要过的，而且必须过好。不然，三、五年后，我们只是在数量上恢复到过去的水平，高质量的成果却不能真正拿到手。

贯彻“八字方针”，提高工业技术水平，首要关键在于把方针具体化。鉴于“八字方针”和在技术上突破国防尖端技术有很大的一致性；同时，在品种、质量上满足了国防尖端技术的需要，其他方面的要求即可基本解决，因此，贯彻“八字方针”应把适应国防尖端技术的需要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发展品种、提高质量，很大一部分应根据国防尖端技术的需要来进行规划。

再次，在具体步骤上，考虑到当前的实际困难，应采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前三年着重解决迫切需要的主要品种规格和重要关键设备；投资较多、技术复杂的，则用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去完成。以新型材料为例，根据国家科委最近提出的计划调整意见，原计划二百五十二个项目，今、明两年压缩到九十个左右，如能全部完成，一九六三年再继续建一些中、小型项目，即可达到以下水平：在化工、石油方面，可解决几种主要品种的有无问题；在冶金、建工方面，大体可解决三、五年内一般新型材料的试制和小批生产，但某些特宽、特大、特粗、特厚等品种规格，需要解决大型设备，如二点八米的轧机、三万吨水压机等。这些设备，照现在的安排，约需到一九六五年才能陆续制成。我们认为，这样的规划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应该力争实现。

第四，贯彻“八字方针”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共同任务，彼此之间关系非常复杂，而且在很多方面又是互为因果、互为条件，必须制定具体措施，进行细致的组织工作。各部门、各地区应对如何贯彻“八字方针”提出具体计划；然后，在全国范围内再进行综合平衡。在国家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中，对各种新型材料、各种元件，仪器仪表、精密机械、特殊设备等等，都应提出具体

要求，规定指标，并订出保证实现的措施计划。计划执行过程中，应经常进行监督检查，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国家计划要对品种、质量有约束力，各地区、各部门应按照计划规定指标，互相配合，保证实现。

毛主席经常说，要把科学分析和冲天干劲结合起来，在暂时困难面前，同样需要头脑冷静、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分析，同样需要冲天干劲。越是困难，越需要树立信心，鼓足干劲。我们必须充分挖掘潜力，尽可能少花钱、多办事，力争在三、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完成突破国防尖端技术和提高工业技术水平的历史任务，攻下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腊子口”[3]。

注　释

〔1〕《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即一九六一年七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草案就正确理解对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的要求，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明确科学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出成果、出人才)，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时间，改进研究机构中党的领导方法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规定。

〔2〕中央上海会议，指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四至十八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二年）的补充计划问题。聂荣臻列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六月十八日在会上讲话中指出：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我们曾经讲数量，今年要抓质量、品种，要把质量、品种放在第一位。

〔3〕腊子口，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是四川通往甘肃的要冲，地势很险要。一九三五年九月红军长征途中浴血奋战夺此天险。聂荣臻在此借以形容向现代化进军的艰巨性和决心。

在军工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日）

孙志远[1]同志要我来给大家讲话。我日常工作与军工虽有不少接触，但是最近没有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发言权很少，今天只能谈点希望、感想。会议简报大体上都看了，觉得会议开得好。大家回顾了两年来的工作，学习了中央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开展增产节约与五反运动的指示[2]精神，传达了中央关于国防工业的决议[3]，在思想认识方面，上了一课。这一课很重要，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不能迷失方向，阶级观点都不能有丝毫的模糊，这是最根本的。这一课上好了，自己头脑里的武装加强了，回去就能更好地领导生产和运动。

关于形势问题，国防工业总的方针任务的问题，孙志远同志已经作了传达。国际斗争的胜利，一方面取决于我们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取决于我们外交斗争政策的正确；另一方面，又取决于我们国内的工作做得怎样。特别是国防工业，它是直接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我们大家的工作是整个斗争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讲一讲和国防工业过技术关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今天分两个部分来谈，一个是关于四个现代化的问题，着重讲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问题。第二个是加强国防工厂的技术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

两年来，在中央、军委的关怀与领导下，由于国防工业部门广大干部、职工的努力，国防工业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在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4]之后，深入贯彻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整顿；去年夏天，开展了紧急的备战整军工作。各级干部和职工群众经受了考验，总结了正面、反面的经验，正如大家所说的，各项工作逐渐走上了轨道，许多方面出现了新的气象和新的局面。

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国防工业是直接为对敌斗争、为增强国防服务的。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就没有现代国防。国防工业能不能快点搞上去，是我们国防建设中头等尖锐的一个问题。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互相勾结起来，正在搞反华大合唱。全世界革命人民、被压迫的人民都热切期望中国尽快地强大起来。打不打，并不决定于我们，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我们要备战整军，保持高度的警惕，要作好各种准备。现在这一段时机，十分宝贵，我们要分秒必争，尽最大的可能来提高国防工业的前进速度。我们准备得越好，我们的对敌斗争就越有力量，帝国主义就不敢轻举妄动，即使战争发生了，我们就可以更主动一些，争取胜利的进程也可以缩短一些。

提高我们部队的战斗力，不外乎是从这三个方面着手，即政治思想工作、训练工作和装备。政治思想工作是最根本的，要大力加强，不久以前刚开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5]；训练工作也在抓紧，要使部队在战斗中过得硬。装备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呢？那就要看大家的工作了。我们的部队是觉悟很高的、英勇善战的。在中印边境的斗争[6]和沿海的斗争[7]中，都有很好的表现。在自然条

件很恶劣、高山严寒作战经验很少的条件下，部队在喜马拉雅山上打得很好。美国人说，中国军队在那里打得好象刀子切黄油一般。虽然经过了十多年的和平环境，我们的部队也是经得起考验的，继承了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保持了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的本质。新武器、新装备，掌握在这一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手里，就会发挥更大的威力，就会成为保卫社会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国防工业一方面要提高常规装备的生产，提高常规装备的技术性能，一方面要大力突击尖端，"两弹"要尽早地过关。尖端什么时候过关，这不但是个军事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天天在猜我们"两弹"什么时候出来。他们最害怕中国人民拥有核武器、火箭武器，中国人民有了这些武器，他们向世界人民的讹诈就彻底地全部破产了。去年八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说：美国在一九四五年第一次使用原子弹，一九四九年苏联作了第一次原子爆炸试验，一九五二年英国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到一九六〇年法国也爆炸了，这是一个国际的核竞赛。他们最害怕中国拥有原子弹，但又不得不估计，中国是今后头一批拥有原子武器的国家之一。他们估计，加拿大、中国、以色列先过关，然后是西德、日本，然后是意大利、印度、瑞典，十年后，几乎任何一个工业国都会拥有原子弹。他们每隔几个月就又猜测一次，认为中国有原子武器，对他们的实力政策、威慑力量是一个最大的挑战。突破尖端，加强常规，建成一个独立完整、配套齐全的国防工业体系，这是今后国防工业建设的主要任务。

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国防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而又相互制约的。我们要从全面的观点、辩证的观点，来看这四个现代化。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我们发展工业、国防、科学技术，都要与农业所可能提供的粮食、原料、市场和积

累相适应，同时，又要促进、支援农业的发展。这个道理，这几年大家体会得逐渐深入了。国防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的关系，这几年我们也有很多体会。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要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国防现代化要立足于自己的国防工业上面。而国防工业又要立足在整个现代工业的生产上面；原材料、设备、配套产品必须要能够在国内完整地配套，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要靠整个工业的支持，几乎没有哪一个工业部门是和国防工业生产建设没有直接关系的，更不用说间接的关系了。比方说，尖端和常规武器所需要的特殊材料，象特厚、特薄、特宽、特大、特小、超纯等金属材料，没有大设备就出不来。因此，我们布置了九大设备[8]的设计、试制。这些设备，标志着我们工业的威力，也标志着我们国防的威力。国防工业要立足于国内，这些工业必须要搞起来。另一方面，国防工业的发展，对一切工业部门，特别是冶金、化工、机械等部门，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促进国民经济中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我们工作做得好，协作配合得好，计划安排得好，就能相互促进、赢得更快的速度；做得不好，就相互牵扯，速度就上不去。这些问题，大家也逐渐认识到了。

对于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中的作用，周总理最近几次指出，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我在农业科学技术会议上讲过，十年科学技术规划要抓两头，一个是农业过关，一个是国防过关，这两头过关，又需要工业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科学技术工作应该为农业、国防和工业的发展，提供系统的科学技术依据，解决其中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从国防工业来看，在首先解决方针、政策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前提下，最突出的就是科学技术问题了。科学技术问题的解决，是我们国防工业自力更生的关键，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能前进。过去我们国防工业主要是苏联的成套项目和聘请苏联专家，的确加快了速度，打下了初步的底子，但是有一条很大的教训，就是产生了一种依赖

性。人家把关键的技术卡住了，不给我们。给生产工艺资料，设计资料不给；材料给了，材料的技术资料不给；给一般的型号，新的型号不给；给战术的，不给战略的；给防御的，不给进攻的；什么都留一手，如步枪的例子。总之，企图使我们的军事工业只能成为一些加工仿制厂，总是要我们落在他后面一大段。原料、材料、设备、元件没有了，就只好伸手再进口。我常常说，这是“控制论”，这不是科学家们研究的控制论，而是政治上的“控制论”。他们就是企图在技术上控制我们，封锁我们，企图把我们压服。要压服我们，这当然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我们决不拿政治原则来作交易。专家不是撤退了吗？东西不是不给了吗？很好！从此我们就完全摆脱了这种“控制”，反而激发我们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加速我们自力更生的进程。近两、三年来，我们在技术上也过了一些关口，掌握了一些真本领，这就是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结果。

创制任何一种新装备，或者是对现有装备的重大改进，都需要经过一系列工作。首先是科学研究，掌握规律，提出数据，然后据以设计，同时着手解决材料问题，工艺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经过试制、试验成功，或者是进行必要的建设，或者是在现有条件下组织生产。在以前，在一些重大的科学技术任务上面，我们自己的研究、试验工作很少，不能独立设计，材料与工艺问题也能解决一些，但关键的往往不能独立解决，这也是需要通过研究试验才能解决的。现在，情况大有进展，不少材料与工艺问题自己能够解决了，有些装备能独立设计了，研究试验工作也逐渐能为设计、材料、工艺的解决提供成果了。但是，缺门还是很多，还没有彻底翻身，还没有完全解决。要自力更生，科学技术问题一定要能够独立解决。研究、设计、材料、工艺、试制、试验、组织生产，这是每一种武器装备成批大量生产出来的七道关口，每一个产品都要过这几关。围绕着每一个环节，又都有大量的协作

工作。

常常听见人们说，工业生产建设方面要有科学技术基础，没有科学技术依据，生产建设不能顺利进行，水平提不高。另一方面又说，科学技术要以工业为基础，没有工业条件，科学技术上不去。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又都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建设，是互相联系的，互为因果；有互相制约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有互相促进的一面。工业生产与科学技术，两者相互作用。第一不要互相等待，第二要互相促进。生产向科学技术提出要求，促使科学技术解决关键的问题，使科学技术获得很大的推动力。科学技术工作为生产建设提供成果，为生产建设服务，并促进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需要工业生产的支援，要求工业提供试验仪器和装备物质条件，提供试验试制的条件。这样，生产推动科学的前进，而科学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又促进生产的发展，生产进一步发展后，又提出新的要求，推动科学再进一步，反过来又促进生产的提高。这是一种反复循环、相互提高的过程。

科学技术和生产建设的这种健康的相互作用，是实现国防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国外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私有制的束缚，更能自觉地安排好科学和生产的相互支援与促进，这个优越性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比不上的。过去，有的同志把刚才所说的七个环节比喻为接力棒赛跑，一个接一个，我以为更妥帖一点的比喻是军事上的多兵种协同作战。这七个环节，有先后的顺序关系，但是也有互相交叉、互相促进的关系，就好象在整个战略方案中，前一个战役还没有打完，后一个新的战役就又开始组织了。这里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单位和生产单位扭成一股绳，在全面安排之下，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和作用，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所有这些环节

的工作，都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彼此都要严格要求自己，要体谅对方的困难，重视对方的要求，共同设法缩短试制与生产的周期。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你是一个公司，我是一个公司，矛盾重重，互相推诿、互相埋怨。我们要更加发扬协作配合的精神，总结经验，搞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加速从研究设计到生产的进度。要提倡各个单位、各个环节的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反对相互分割、相互促退，这样，才能使尖端和新型常规装备尽早过关。

我们大家要深刻地认识，我们国防工业的水平还是落后的，和世界上六十年代的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最近初步摸了国民经济中一般工业的技术状况，看来大体上是处在四十年代水平，有些是五十年代前期的水平，也有三十年代的水平。国防工业的情况怎样，差距多大，大家可以议一议，其中恐怕有不少的行业，差距总在十年至二十年左右吧！各行业的情况不平衡，有些差距大一些，象一些新的工业部门：无线电、自动化、火箭技术等，差距在十年以上。有些轻武器，就相差不多，差两三年，也有基本上和国际先进水平一致的。但是，在一些关键的、重型和精密的、技术要求特别高的行业里，差得比较多一些。大家可以议论一下。这还只是静止的差距。国际上近年来技术发展很快，一个军备竞赛，一个贸易竞争，把许多新兴工业、新兴技术搞上去了，今后十年我们如果不更快地赶，那时我们可能还要落后。

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不同。民用工业可以把引进国外技术与自己的研究试验工作结合起来，加速技术进步的速度。国防工业当然也要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通过购买样品、参观考察，有可能取得一些工艺、材料的资料，但由于保密的关系，关键的部分是搞不到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有很大限制，一定要自己下功夫去突破。因此，国防工业追赶先进技术水平的任务，就更加艰

巨繁重。国防工业是我们对敌斗争最关键的工业部门，在这方面，一定要努力赶上去。要埋头苦干十年，赶上世界六十年代的技术水平，并且准备向七十年代的技术水平过渡。

我们现在前进的速度，是不是已经最充分地利用了可能的条件、已经够快了呢？应该说，还有潜力，如果我们力量更集中，更协调，组织得更好，还可以更快。最近，派了两个航空小组到西欧国家去考察，也摸了一些日本的资料，有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情况。国外航空工厂的规模小，人员少，但生产速度比我们高，周期短，而且能够多品种生产。法国、荷兰、意大利的航空工厂，一般在一千五百人左右，小的几十个人，最多的也只三四千人。法国有一家飞机公司，五十个人，一千四百平方米生产面积，能够生产两种联络机，月产七架，使用的主要机床也还是老皮带床子，只有几台较新的电焊机，但是产品能够出口，成本比一辆高级汽车还便宜。法国整个航空工业有八万七千人，其中飞机导弹从业人员五万二千人，机床约三万台，已经能够自行设计生产两倍音速的歼击机，带原子弹的轰炸机。他们和英国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破坏，战后航空工业陷于瘫痪，十年努力，这个速度是不算慢的。至于日本，起步和我们差不多。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间，他们仿制F—86，我们试制米格17，水平基本相同。而一九五八年以后，日本仿制成功了两倍音速的歼击机（F—104J），自行设计了双发动机的涡轮螺旋桨旅客机（YS—11），已经走到我们的前面去了。我们在这里举法国和日本做例子。因为这两个国家和英、美不同。日本是战败国。法国虽是战胜国，但战时被德国占领。他们不象英美。英美没有受过什么破坏，而且战时和战后，军事工业一直在发展。

清醒地承认差距，找出我们速度不快的原因，目的是为了更快地缩短差距。应该看到，从落后赶到先进，迎头赶上，这在科学技术历史上是不少先例的。德国赶过英法，美国赶过英法德；苏

联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〇年前后，艰苦奋斗，集中力量建设，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机会，大量进口技术装备，经过两个多五年计划，斯大林同志就宣布苏联的工业水平占欧洲的第一位；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后追赶先进水平的速度也很快。举个人造纤维做例子。战后日本穿衣问题很严重。最近有个同志去日本参观，他在日本的老同学告诉他，战后穿衣困难得很，有些人用报纸遮屁股。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开始搞人造纤维，一九五九年大量在市场供应，现在已过剩，向全世界倾销。我们解放前现代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搞了两个五年计划，不是也大体赶到了四十年代水平了吗？现在我们的基础比以前大得多了，技术发展的速度应该可以加快。当然，我们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力量还很不足，前进途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勤劳勇敢的人民群众，有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传统，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又有前一时期科学技术工作的积累。我们在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下，继续努力，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中央关于国防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各项方针政策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团结一致，群策群力，不断地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国防工业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赢得更高的速度，更大的胜利。

（二）

为了使国防工业尽早过关，必须大力加强国防工业中的技术工作。这里涉及的方面很广，我今天只是着重讲一下和国防工厂直接有关的几个问题。

第一，科学研究和生产的密切结合问题

原则上，我刚才已经讲过。但是还需要有具体的措施、办法。从现状来看，在前面讲过的几个环节中，新装备的研究、设计主

要是在专门的研究设计单位承担的；材料问题，有其他工业部门承担的，也有国防研究单位和国防工厂承担的；工艺问题，主要是工厂为主，也有研究部门帮助解决的；至于试制和组织生产，主要是依靠工厂。每一项工作，研究设计单位和工厂都要密切配合协作。研究设计单位能够专门从事系统的研究设计、试验工作，力量比较集中，这是它的有利条件，没有这些“拳头”，新的东西就难以上去。但是，工厂比研究设计单位也有许多长处，生产实际经验比较丰富，有较好的设备条件，技术人员很多。所以，彼此应该取长补短。

国防工厂中的技术人员，是有潜力的，可以腾出更多力量来试制新的型号产品。在简报上看到，大家也认识到这一点。型号的不断翻新，是军事工业的特点和首要要求。因此，研究设计单位和工厂要扭成一股绳，把从研究设计到试制投产的一系列工作组织起来。在研究设计阶段，工厂的技术人员就要参加工作，使设计更加切合生产实际，更符合工艺要求。设计拿到工厂去试制，工厂要大力支持，很好地安排力量，研究设计单位要到工厂去和工厂的工程师们商量，在试制中验证这个设计，听取工程师、工人的意见，共同把设计修改得更完善，大家同心协力，把新型号试制出来。试制中的工艺、材料问题，工厂里解决有困难的，研究设计单位应该帮助工厂，一起解决。工厂里的设计技术人员有潜力，应当参加新型号研究设计工作。大家不要各搞一套，而是结合起来，共同把国家需要的新型号搞出来。

研究设计单位的技术人员，要经常到工厂中去，运用工厂的生产条件，既帮助工作，又吸取知识和经验。工厂里的技术人员，也要到研究设计单位中去，提出问题，商量问题，或利用研究机构的试验研究条件，有些工程师还可以指导一些研究试验工作。总之，为了我们发展新装备、新武器的共同事业，应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用最快的办法，把新东西快点搞出来。

第二，关于技术责任制的问题

国防工业的生产，是技术高度复杂的现代化大生产。要使生产能够正常顺利进行，出产质量良好的产品，一刻也不能离开责任制，要有集中统一的指挥，要有秩序，否则就变成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一团。在责任制之中，建立技术责任制又是其中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工业七十条[9]里就有关于建立技术责任制的规定。

工厂里的技术问题很多，大大小小，随时随地，都需要有人去解决，去决定。在技术问题上，我们要工程师、技术人员负责。生产斗争必须尊重自然的规律。自然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尊重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去生产，就会得到预期的结果。违反自然规律，就会碰钉子。工程技术人员应该根据已经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总结生产实践的经验，对生产中的技术问题负责。党和行政组织，应该撑技术人员的腰，支持他们负责地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一般日常性的、技术人员职责范围之内的技术问题，应该由技术人员来作决定。重大的技术问题，例如技术方向问题、生产中的技术关键、重大的技术措施等，应该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研究讨论，由负责的技术人员（比如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工艺师等）来作出判断，党委和行政领导根据他的判断来考虑，作出决定，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来贯彻实施。

在技术人员中间，对于一个技术问题，有不同的见解，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有时还是一件好事情，可以便于分析比较，考虑得更全面、更周到一些。我们既要有技术民主，又要有高度的集中。经过充分的民主，达到集中的目的。有一些问题，比如重大的技术方向问题，是不必或不可能立即作出决定的，应该给以一定的时间，进行研究试验、调查研究，充分的讨论，力求得出比较正确的答案。有一些技术问题，不能议论不休，需要及早作出决定。负责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应该有民主的修养，倾听各方面的技术见解，倾听工人群众的意见，但是，技术问题不能采

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决定，负责的技术人员应该拿出自己的看法，作出自己的判断。作出了技术上的决定，不同的意见可以保留，但是大家都应该按照这个决定去办理，不能各行其事。重大的技术决定，还要经过党委的讨论，由厂长下达命令。当然，已经决定了的方案，如果在实践中证明是不对的，那就要勇于改正，重新考虑，及时更正。

技术问题，特别是一些新的科学技术问题，带有许多未知因素，技术人员要尽可能周密地考虑这些因素，尽可能提出妥善的解决方案。但是，判断错了的情况，有时也是难免的。研究试验本来就是通过许多次失败才能成功的。国外没有哪一种导弹，不是试验几十次之后才定型的。不怕失败，就怕失败了找不到原因。新的技术难题，往往也是要经过许多次的试验才能解决的。试验不成功，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找出错误的原因，改正不合理的地方，继续进行试验。对于这些难以避免的甚至是必经的挫折和失败，不要去追究责任。党组织和行政部门要鼓舞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信心，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支持他们继续进行新的尝试，一直到这个技术难题解决为止。每一个技术问题在解决之后，都应该经过严格的科学鉴定，把数据和方法肯定下来，编入技术规程，在今后生产中认真实行。这样，我们才能够巩固已得的成果，把技术难题一个一个地彻底解决。在试验过程中，一般都要经过反复，试验成功、鉴定通过之后，才能投入生产，投入生产就不应该再反复了。只要把好鉴定这一关，我们在成批大量生产中就不会造成损失。

工程师、技术人员要有负责的态度。要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看到有不符合科学规律的措施，要及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果这种事情是在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要加以制止。想到了有利于生产建设和提高技术的意见，要及时提出。有时，自己的见解虽然是符合科学、符合实际的，但是一时还不能为人们所理解，那就

要解释，要宣传。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共产党员的领导干部，对于这些建议和意见要采取欢迎的态度，使专家和群众的意见能够充分地反映出来。对于这些建议和意见，要很好地加以研究，有益的、能办得到的建议，要加以采纳，目前条件办不到的，或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也要加以说明，有个交代。

孙志远同志告诉我，已经制订了工厂总工程师的条例，还在拟订其他的一些技术责任制方面的条例，我认为这样很好。总结经验，并且使之条例化，贯彻执行，才能使我们工厂的工作走上轨道。实行这些条例，也不是很简单的，要克服许多困难，要改变一些习惯势力。工程师、技术员在进一步认真负起责任来以后，会遇到不少矛盾，会遇到一些困难，甚至有些事情会使自己很不愉快。一个人要做工作，总是会遇到矛盾的，问题是要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对于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也是在思想上、修养上和技术业务上的一种锻炼。不经过一点风吹雨打，不挑过担子，不在实际工作中经过磨炼，就不可能锻炼成为一个红色专家。要抱着一切从工作出发的精神，对工作有利的就坚持，对工作有害的就反对；发现自己有错误，就要坚决改正。领导干部要支持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各种困难，同时，要热情地、耐心地从政治上关心和帮助他们的进步。技术工作者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和科学技术水平，要勇于承担技术上的艰难任务。领导干部和科学技术工作者要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建立起一种同志式的共事关系，成为国防工业战线上的亲密战友，为我们的国防现代化事业团结奋斗。

这里，我想说一下军代表制度的问题。最近对军代表制度有些反映，我看这是好的，有了矛盾就研究，就解决。我认为，军代表制度是需要的，是起了好作用的。在某些工厂里，有些军代表同志的工作方法可以改进，比如，军代表本来是从使用的观点，

来监督、检查生产的质量和进度，但是对一些应该由工厂负责、工程技术人员负责的问题，军代表有时干预得不恰当；有些军代表同志的工作方式比较生硬，态度不够好。这些都是可以改进的。工厂的同志和军代表同志，应该坦率地交换意见，总结经验，研究更好的互相配合、提高生产和技术水平的办法。工厂的同志也要认识，军代表从使用的角度来把质量关，密切使用和生产的联系，这是对工厂工作有好处的。军代表对质量的监督检验，并不是不相信工厂的表现。基本建设中有甲方，有乙方，难道这也是对施工单位不信任吗？不同的工作岗位，有不同的角度，因而有时产生不同的见解，这是正常的，应该根据上级的指示和技术要求，求得一致；不能一致的，报告上级解决。现在工厂里发生的问题，大多是属于职责范围不明确的问题。工厂里的工程师要不断改进设计、改进工艺，这是很好的，应该支持，这是工程师的本分。但是改变了以后，对质量影响如何？即使证明对质量没有影响，甚至还有好处，但是否要修改战术性能？对于这些问题，军代表不能作主，因此需要组织技术鉴定，并要经过一定的批准手续，然后才能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军代表不作决定，要请示上级，这是对的。我们要研究提高效率，使手续简便而又能确保质量，主要是从工作方法和具体办法上来改进。

第三，加强工厂工艺工作的问题

有了设计，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优质高产，关键在工艺。设计如果不考虑工艺要求，那只是纸上谈兵。工艺如果落后，再好的设计也实现不了。我们的工艺水平还是比较落后的，要配合尖端试制工作，存在许多难关；就是在现有常规武器的生产中，也有许多工艺是不能保证质量或不够经济合理的。改进工艺的潜力很大。所以，加强工艺是工厂当前技术工作的一个中心内容。美国人自己总结人造卫星落后的原因，说来说去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协调不好，矛盾扯皮，进度受影响。一条是工艺不好，承包商

的质量没有保证。他们认为理论计算上他们不落后，而且还很先进，就是有些承包工厂的工艺不认真。

改进工艺工作，首先要有严格的工艺纪律，要一丝不苟地按规程生产。我们在科学工作十四条中曾规定，科学研究试验工作要有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这种“三严”的精神，对工厂的工艺工作，也是适用的。我们现在在生产中，还有很多不文明的习惯，有些工厂的工具乱扔乱丢，车间尘土飞扬，图纸改得乱糟糟的，机器的安装和操作不按规程，工艺加工方法自行其事，这样怎么能够稳定质量、大量生产呢。严格工艺要求，认真文明生产，应该成为全厂职工的风气，应该成为每一个职工的习惯。工厂如果没有这样的传统与习惯，那就谈不到现代化生产，谈不到什么优质生产。

其次，就要注意革新现有的工艺，采用新的工艺方法。我们现有的工艺，可以革新改进的地方很多。这些革新有大有小，对于大的根本性的革新，如提高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等，固然要抓紧，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改革。但是对于小的革新，也千万不要看轻，象工夹具等工艺装备的改进、上活下活方法的改进，以及一些小的机械化的改进，都能给我们带来很可观的效益，许多小的改进积累起来，就能够大大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每一项革新，都要有关技术科室去总结、鉴定，证明行之有效并能保证质量之后，就要纳入工艺规程，加以推广应用。还有许多新的工艺方法，象新的精密加工、精密铸造的方法和新的焊接、锻压等方法，使许多过去做不好的零件做好了，效率大幅度地提高了，这些新的工艺，要经过科学鉴定和整理，大量推广。象最近一个时期，三机部展览会上就展出了一些很好的新工艺，应该大力组织鉴定、总结，有计划地推广。

前几年，在群众运动中，大家劲头很大，热情很高，搞出来很多好东西，但是有时对科学性注意不够，因此也出现了不少不

科学的东西，有搞错了的。这两年调整、巩固，就是要巩固已得的成就，改正那些搞错了的东西。可是，又可能产生了另外一种偏向，那就是不敢革新，畏惧困难，什么东西都不敢动了。这种理解是不对的。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革命热情要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在我们的技术工作中，就是要敢想、敢说、敢干和严肃、严格、严密相结合。五十年代末期技术革新的那股劲头，是可贵的，要保持下来，加上科学的求实精神，我们就可以创造出更多扎实的新成果。

群众性的技术革新，不要搞一个运动就完了，要使它经常化、制度化。大跃进以来，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成果要巩固下来，拿到手，纳入规程，在生产中应用，使它在生产中扎下根来。工厂里要把群众的精力引向生产技术问题的解决、技术的改进上面去。这样，就有许多技术问题可以及时、就地解决。

改进工艺工作，需要许多条件。有些是物质条件，要按需要和可能，给以解决。比如，在许多精密、尖端产品的生产中，需要恒温、恒湿、防尘、防震的车间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产品过不了关，或者合格率只有百分之几，浪费很大的人力物力。我们不能因小失大，必需的条件不能省，凡是确属必要的，要很快地配备起来。也有许多是不需要多少投资和器材的，只要抓紧就能解决。有些是组织管理条件，是纪律习惯的养成，这更是不花什么钱的。象一般的文明生产，清洁卫生，哪里需要多少器材呢？工厂要重视这个问题，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要认真移风易俗，把文明生产的风气树立起来。

第四，关于加强技术后方的工作

如果说生产操作是生产的前线，那么设计、工艺、检验、中心试验、计量、工具、机修等工作就是技术上的后方。技术后方的工作不上轨道，前方的生产就必然搞不好。而且越是现代化的大生产，技术后方的作用就越大。这些工作，有的在科室，有的

在专门的车间（如工具、机修车间），都要充实加强。过去有一个时期，把后方的力量都拿到前方去，工具机修车间搞零件生产，大修理基金挪用去搞基本建设，甚至技术科室的人员大部去车间做辅助劳动，结果前方不但不能加强，效果适得其反。因此，技术后方的力量一定要配备起来。比如，从三机部[10]一九六二年经济活动分析中看到，设备失修的情况仍很严重，去年需要修理的精密设备是二百多台，实际上只完成了一半不到；有些工厂的设备，附件损坏与丢失的达到百分之五十；很多仪器仪表损坏、失灵，光学仪器有百分之七十不合格，热工仪表、无线电仪器有百分之三、四十不合格，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加强管理制度，切实把这些工作做好。

除了上面所讲的几项技术后方工作以外，还有一个标准化系列化工作。我们过去是基本上抄用苏联的标准，今后，要自力更生，许多原料、材料的标准要适应我国的条件加以改订。例如，我们缺镍铬，在不影响使用性能的条件下，能够代用的就要以其它合金钢种来代用。我们自行设计的装备逐渐多了，也要有我们自己的标准。今后工厂还要搞多品种生产，不是一个品种，在同类产品、不同规格的生产中，就有系列化的问题，系列化搞得好，可以大大节约生产能力和技术力量。举个柴油机做例子。现在民用的柴油机，分散在十三个部门生产，系列型号很乱，有九百多个品种，这次农业科学会议上内燃机的专家们在一起研究，归并为二十一个系列七十三个品种就够用了。我们现在军用产品的品种慢慢多起来了，因此标准化、系列化的工作要早抓，抓得早，品种容易上去，浪费也少。凡是军民通用的标准，原则上应由国家科委组织有关部门（包括三机部）来制订。军工专用的标准，有关的国防部门就应该自行制订。标准定下来，就要坚决贯彻。前年国家科委草拟了标准管理办法，试行了一年多，去年年底国务院通过发布了，大家应该找来看一看，贯彻实行。

第五，关于加强无线电电子工业和仪表仪器工业的问题

无线电电子工业和仪表仪器工业是我们工业方面的短线，非常薄弱，已经影响到国防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的生产建设。这两门工业上不去，国防和民用工业都上不去。中央决定成立四机部，专管无线电工业。我们各个方面，应该大力支援无线电工业的发展，同时，要着手研究仪表仪器工业的加强问题。

把这两门新兴工业促进上去，我们要有信心。可以举日本做例子。日本的电子技术原来也落在世界水平的后面，特别是半导体方面，也是在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以后才开始搞的，他们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自己大力展开研究工作，现在，半导体技术已经进入国际上第一流的水平。仪器仪表也是这样，他们到一九四八年才有第一届仪器仪表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只四十人，开始在硫胺工厂（因为日本当时粮食问题很严重，迫切需要发展化肥）和钢铁工厂运用仪器，到一九五五年，才成立了计测学会（就是计量与仪器的学会），近十年来仪器工业很快地发展起来，现在水平也不算低。固然他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强，技术人才比较多。但是，这些新兴的工业、新兴的技术，发展的年代不长，大家都是从头开始，只要我们看准了，真正集中力量，大力去抓，我们的速度还是可以快的。到一九七二年，我们在无线电电子技术工业和仪器仪表工业中的重要方面，赶上或接近世界六十年代的先进水平，并准备向七十年代过渡，这是可能的。

无线电电子和仪器仪表技术要更快地发展，关键在哪里，我请教过许多同志。我想，这里一个是技术问题，我们的研究试验和设计力量不够。另一个是这些新兴技术的安排生产问题、工业化问题。在当前，这个问题似乎更突出。研究机构、大学都设计了或试造了一些新型的仪表和无线电装置，但是没有工厂安排生产；而另一方面，现有的工厂又只是出产一些“大路货”，不能多品种生产。这条路子不沟通，研究设计得不到考验，也没有生产

需要的刺激，技术发展不快。许多新的东西，只是在试验室里，无法在国民经济和国防中大量应用。无线电电子技术和仪器仪表，用于军用，也用于民用，军民结合，以军为主，这样，较低于军用要求的产品，可以在一般工业生产中应用，使电子和仪表工业得到发展，这就有利于军用品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否则，对军民工业都不利。这些想法，提出来，请大家研究一下。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个问题，那就是军工厂的建厂方案问题。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我们从苏联成套进口，都是建综合性的大厂。有同志说，这是美国四十年代大量生产的形式。五十年代起，工厂专业化有很大发展。工厂小，专业化，协作发达，生产品种转变得快，灵活，可以多品种生产。相比之下，我们的大厂就显得不够灵活，转变产品很困难。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我们新建的工厂，怎样考虑，是值得研究的。

第六，关于工厂中的技术队伍问题

我们技术上要过关，归根结蒂，都决定于我们自己的科学技术队伍。这是我们自力更生的根本问题。怎样使我们的技术队伍更快地成长、壮大起来，有许多事情要做。例如，在专业技术工作时间的保证、工作的稳定、人才分配与使用的合理、优秀人才的选拔等等方面，都要花很大力量去改进。我们要充分发挥现有的已经成熟的专家和老工人的作用，同时要抓紧培养青年人，使他们能够接班。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工厂里工作了五年、十年，就应该成为他所从事的那项技术的专家，这时正是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精力旺盛，创造力也较强，应该成为我们科学技术力量的骨干。青年工人也是这样，要他们在技术上好好学，好好钻，把老工人的技术继承下来，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现在，我们许多工厂对技术队伍的成长，关心不够，人才成长得很慢，固然这七、八年工资冻结，对青年技术人员成长有些影响，但是，在对他们的使用培养上面，工作做得的确不够。老是说缺乏工程师，那么多

年青人，为什么不可以培养他们成为工程师呢。我经常接到在工厂中大学毕业生的来信，说在工厂里学用不一致，净是打杂，没有机会专心致志做技术工作，这里面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不安心工作的，企图调换工作地区的；但是，更多的是申述了实际情况。要反对浪费物资，这个大家开始注意了，可是人才的浪费呢？至少是注意不够。我们要爱惜人才。要采取种种措施，尽快地提高工厂里的科学技术队伍的水平，形成能够独立解决本厂技术问题的技术力量。

各厂要注意抓职工教育，要有计划地提高工人、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办夜校，办讲座，办训练班，帮助他们提高技术。特别是年青人，要抓紧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对他们要严格要求，正面引导，组织他们学政治，学技术，把青年人的精力引向又红又专，引向学习和钻研工作。这是一支广大的科学技术生力军，他们的水平提高了，我们的技术水平就能大大提高。

（三）

最后，我谈一谈学习。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他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11]。国内国外的形势发展很快，要求我们的工作水平更快地提高。我们不懂的东西很多，必须善于学习。

要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毛泽东思想，学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这是一切工作的灵魂，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保证。要结合形势、结合我们的实际工作学。老干部不要以为自己资格老，经过一定的锻炼，就可以不学，要抓紧自己的思想修养，不断改造

自己思想中非无产阶级的东西，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政策水平，才能适应工作发展的要求。新干部，知识分子，更要抓紧自己的思想改造，要坚定自己的政治方向，要用又红又专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老共产党员，从事了二、三十年的革命斗争，也还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锻炼少一些的同志，更应该抓紧。

我们同时还要努力钻研科学技术，学习科学技术。党把我们分配到国防工业的岗位上来，对我们大家有很大的期望，给予很大的信任。业务水平，是我们完成具体革命工作的本领。要把党分配给我们的工作做好，就必须要钻业务，学科学。生产斗争的知识，阶级斗争的知识，都是可以学会的，我们不怕不懂，就怕不懂装懂，就怕不懂而自负。不懂就要学，只要努力去学，一定能够学会。

我从简报里看到，有同志反映，有些干部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爱克斯”阶段[12]，学技术，学业务；“大跃进”以后是马克思阶段，学政治，政治挂帅，不计报酬；这几年来是“百货公司”阶段[13]，精力都用在搞个人生活上面去。这当然不是全面的情况。而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只是学技术，也学了政治；“大跃进”以来，不只是学政治，也学了业务。但是，有些干部这几年如果陷进了“百货公司”的阶段，这就危险得很。虽然这种情况还是少数，但很值得我们警惕。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是个人主义，是低级趣味的东西，是和一个革命干部的精神面貌不相容的。我们大家要学习雷锋，学习他那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14]。我们要努力提高阶级觉悟和政治水平，努力提高科学技术和业务水平，努力向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给我们的任务。

注　释

〔1〕孙志远，当时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

〔2〕增产节约与五反运动的指示，指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3〕中央关于国防工业的决议，指一九六二年十一月，有关部门开会研究国防工业生产与科研之间的关系问题。十二月四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国防科学研究机构和国防生产部门的关系，可维持现状不变，个别不适合的进行个别调整。"

〔4〕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是第三机械工业部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召开，由部、局、厂三级干部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目的是整顿国防工业，加强国防工业建设。参加会议的还有有关国家机关、军队领导机关、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军工的负责干部。军委贺龙、聂荣臻副主席到会并作重要指示（见本书《军工生产中的几个问题》）。

〔5〕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一九六三年二月一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会后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

〔6〕中印边境的斗争，指从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进行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

〔7〕沿海的斗争，指自一九六二年六月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为粉碎台湾国民党军企图进犯东南沿海地区所进行的紧张的战备工作，和沿海军民全歼九股窜犯大陆的国民党武装特务等一系列斗争。

〔8〕九大设备，指（1）三万吨压力模锻水压机；（2）一点二五万吨压力卧式挤压机；（3）辊宽二千八百毫米冷轧铝板机；（4）辊宽二千八百毫米热轧铝板机；（5）直径二——八〇毫米轧钢管机；（6）直径八〇——二百毫米轧钢管机；（7）辊宽二千三百毫米冷轧薄板机；（8）辊宽七百毫米二十辊特薄板轧机；（9）一万吨压力油压机。一九六一年五月中央向第一机械工业部下达研制任务，到一九六七年检查时约完成总工作量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十年内乱期间，研制工作停顿下来。

〔9〕工业七十条，即《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简称。

〔10〕三机部，即国务院第三机械工业部，是管理国防工业的一个部。

〔1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第一四八〇、一四八一页。

〔12〕“爱克斯”阶段，即X，在数学中常用来代表某个可变量的数值。“爱克斯”阶段指当时干部注重钻研科学技术或业务问题。

〔13〕“百货公司”阶段，指当时有些干部不热心工作与学习，把主要精力用于考虑个人生活，常到百货公司购买东西。

〔14〕引自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

向张履谦同志学习*

（一九六四年二月六日）

看了介绍张履谦[1]同志的材料，令人高兴。张履谦同志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自觉地认真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努力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因而能够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服务，顽强地钻研科学技术和业务知识。他在技术领导工作中，善于把思想工作和科学的、细致的技术业务工作结合起来，研究室办得好。我认为，这是一个又红又专科学技术干部的代表，是国防科学技术战线上优秀的基层技术指挥员的代表，值得提倡学习。

五院抓住了这个典型，在全院树立这个标兵，展开学习，这是完全必要而适时的。张履谦同志是国防科学技术单位中青年一代向又红又专迈进的优秀代表人物，培养这样的一代，是我们的一项根本任务。各单位应该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五院的这个材料，可转发国防科委系统各单位。我相信，通过这次学习，一定会涌现更多更好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科学技术组织工作者，一定会出现更多更好的先进单位，一定还会出现更多更好的成果，把我们的工作推进到新的水平上面来。

---

* 这是聂荣臻写给国防科委领导张爱萍等的信。

注　释

〔1〕张履谦，我国著名雷达专家。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一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当时任国防部五院二分院雷达总体室主任，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业务尖子、领导骨干，是五院又红又专的科技干部典型。

一九六一年二分院推广了他的经验，一九六三年五院决定在全院开展学习张履谦的活动，一九六四年聂荣臻看了他的事迹材料作出指示后，总政治部、国防科学工作部号召大家以张履谦为榜样，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学习。

对十院十四所贯彻自然科学政策的主要情况的批语*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二日）

十院十四所这份材料很好。从材料中可以看到，这个所坚决认真地执行政策，工作比较深入细致。在领导干部中，统一思想认识，政策抓对了，决心下得大，做好思想工作，这是办好一个研究所的决定性关键。在这个基础上，集中群众的智慧，从实际出发，切实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实行科学的管理方法，这样研究所工作就有秩序了，就上轨道了。这样做，成果才能又快、又扎实地出现，人才才能又快、又健康地成长。抓好思想工作，使科学技术队伍不断革命化，再加上科学管理，使各项工作科学化。这样，研究试制的进展会是很快的。

十四所的经验，虽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但在加强思想工作、贯彻执行科学工作政策和进行业务建设方面，有不少值得推广的地方。这份材料，我建议再加以整理后，连同国防科委按语，转发给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系统的各个科研单位，以供研究推广。

---

* 这是聂荣臻在看了《国防科委关于十院十四所科研组织领导方面的经验》后的批语。

给国防科委南京现场会议的信

（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日）

这次国防科委在南京开现场会[1]，是我军科学技术队伍的一次大集会，并且还有中国科学院、一机部、四机部、上海、南京以及各总部、各军兵种等方面负责科学技术工作的同志参加。今年是大比之年、大学之年。通过对十四所[2]工作经验的参观和座谈，定能大力改进工作，把我军的国防科学技术水平和科学技术组织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一步。这是一个促进会，有很重要的意义。我因病不能前往参加，现在提出几点意见，供同志们研究考虑。

一、几年来，十四所的工作一般说是做得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已开始形成，政治思想工作较有成效，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工作走上了轨道，各项工作为科研第一线服务的思想比较明确，领导干部、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开展得好。全所同志艰苦努力，发扬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研制任务完成得较好，科学技术干部的成长也较快，三八作风[3]和三敢三严[4]的作风也初步树立起来了，可以说是国防科研队伍中比较先进的单位。

十四所之所以取得较好的成绩，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红旗，政治思想工作比较深入细致，领导同志的指导思想比较明确，能够动员和组织科学技术人员和各类人员比较认真地贯彻执行科学工作十四条。十四条是党在自然科学工作方面的政策规定。十四条的精神，不是新提出来的，是根据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历次指示归纳起来的，是结合科学技术工作实际

情况把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具体化的结果。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在科学研究机构中加强党的领导，在人的工作方面，要深入细致地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正确地帮助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在科学业务工作方面，同样也要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实行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工作中要把技术民主和科学技术的责任制很好地结合起来。它的目的，是调动科学技术人员和各类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达到出科学技术成果、出又红又专人才的要求，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些精神，都是毛主席和中央反复教导过我们的。

政策，是一个极关重要的问题。政策对了，就能够把群众的积极性动员起来，就能够使工作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政策是从群众、从实践中来的，它又必须回到群众中去，回到实践中去。人们对于政策的认识，也不是一次完成的，有的同志可能认识得深一点、早一点，有的同志可能认识得浅一点、晚一点。因之，一个单位的领导同志，必须先在干部中组织研究、学习党的政策，改正那些对政策的不正确的认识，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再加深对政策的认识。在实践中，原来规定的政策对不对，反应是很灵敏的。政策对了，群众的积极性就会发扬起来，工作就得到发展，在实践中就会取得较好的效果；政策不对头，效果就会适得其反。看来，十四所是认真地把党的科学技术工作政策贯彻执行到实际工作中去的，实践的效果是比较好的，科学技术人员和各类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各项规章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了，人们在政治上、业务上都有相当的进步，任务完成得比较好。这是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科学技术工作政策的结果。其他的研究机构，凡是这样做了的，也同样取得较好的效果。

毛主席曾经反复教导过我们要认真研究和执行政策。他说过：

“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在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的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5]我们要认真地学习、思考毛主席的这个指示。

二、我们科研机构的中心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继续认真贯彻执行科学工作十四条，更深入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和业务建设工作，不断地革命化和科学化，更好地实现出科学技术成果、出又红又专人才的要求。

科学技术队伍的革命化，这是方向问题。科学技术工作者的革命化，首先是进行立场的改造，这就是十四条所提出的：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提高思想觉悟，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划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做到坚决地而不是摇摆地走革命的道路，自觉地、主动地、全心全意地而不是不自觉地、被动地、三心二意地为人民服务。当然，正如十四条里所说的，红不是到此为止的，在首先达到这两条政治要求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进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世界观的根本改造，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和逐步实现的过程。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并且用以指导自己的工作，这是每一个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前进的必经途径。我们在科学研究机构中，要经常注意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使科学技术队伍不断地革命化。

科技队伍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机构，要热情、耐心、积极地

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业务里去，抓好活的思想工作。只要是爱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从事科学技术工作，就应该很好地团结他们，帮助和教育他们，信任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和工作积极性。这样，对党的事业有利，对这些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改造有利。对于科技队伍中大量的青年，应该比对于老一辈的专家要求得更严格一些。必须特别抓紧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加强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使他们一开始就打下较好的思想基础，提高辨别能力，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防止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走上错误的道路。同时，在业务上要求他们勤学苦练，踏实钻研，虚心地向老专家、老工人和一切有长处的人学习，力求提高得更快一些。要特别注意培养、提拔年青科学技术干部的工作，大胆使用，热情帮助，严格要求，使新生力量迅速地、健康地成长起来。在向又红又专方向前进的前提下，要提倡新老知识分子的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团结进步。总之，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做人的工作，是一项最细致的工作，也是很艰苦的工作，要做得细、做得活，要针对不同的觉悟水平、不同条件的人，采取恰当的、有效的、对症下药的工作方法。科学技术工作者具有不同的觉悟水平，有的觉悟高一些，有的觉悟低一些，这是很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要认真研究总结和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以求取得更大的效果。

有了革命精神，还要有科学态度。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科学化。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革命精神要同科学态度相结合。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我们提倡三敢和三严的结合，就是敢想、敢说、敢干和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和严密的方法相结合。要用科学实验的精神，寻求科学的规律，按照客观的规律性去办事。研究试验和生产技术工作，要严格认真，一丝不苟。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也要这样做。这两年来，根据“科学十四条”的原则精

神，有不少研究机构，结合自己的工作特点，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制订了若干具体的条例和规章制度。例如对科学技术干部和各类人员的培养使用，领导干部、科学技术人员、工人的三结合，技术民主和技术责任制的实施，研制工作的程序和计划管理，研究室的工作制度，试制工厂对研制任务的保证，器材仪器的供应管理，六分之五时间的保证，工作秩序和文明生产习惯的养成以及生活管理工作等等，出现了许多较好的制度和办法。十四所在这方面有不少较好的经验。这些工作，都是科学技术机构中的“基本建设”。这些基本功认真做了，我们才能扎扎实实地前进。

不久以前，曾经有人问，要求红，是否就不讲专了。这种认识当然是不对的。我们要认识，红和专应该统一，而不应该割裂。只专不红，就会迷失政治方向，而只红不专，便是空头政治家。在科学技术人员中，必须坚决纠正“只专不红”的错误倾向，而对不刻苦钻研业务的倾向也必须克服。我们提倡的是又红又专。科学技术工作者如果不钻研科学，在科学技术上不求上进，拿不出科学技术成果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那就正如一个革命战士不去学会打仗一样，红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所以，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必须大力鼓励和支持科学技术工作者钻研业务，必须坚决地、毫不打折扣地保证六分之五的科学技术工作时间，尽量减少科学技术工作者不必要的各种活动，使他们能专心致志地做科学技术工作。我们在国防科研机构中的一切工作，包括政治思想工作在内，都要围绕出成果、出人才的目的，为国防现代化服务；就好象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要提高战斗力、打胜仗、消灭敌人一样。

只要我们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政治思想工作加上科学管理，我们的工作是大有希望的，我国国防科学技术自力更生的进展，是完全可以大大加快的。

三、十四所有不少好经验，很值得认真总结、学习。在总结、学习时，要注意三点：(1) 要用“两分法”。既要认真学习其长处、优点，又要注意改进和克服其缺点与不足之处。要有分析，才能很好地总结。各单位自己有什么好经验，也要拿出来相互交流。(2) 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学。各科研机构有共性，也各有特点。生搬硬套、只学形式，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要抓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头，把政策和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把先进经验和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这样才是正确的学习方法。各所在回去之后，带着这次会上学到的好经验、好办法，应该和本单位自己的经验、具体的情况结合起来，依靠群众，经过一定时间的努力，把工作水平大大提高一步，并实事求是地逐步修订原有的和建立一些新的规章制度，认真贯彻实行。这样，才能使各项工作得到落实，并且能够持久地搞下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研究国防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工作中若干共同性的问题，制订一些基本的规章办法。(3) 一定要牢牢记住，我们在研究机构中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保证实现出科学技术成果、出又红又专人才的目的。这样才能抓住中心，工作才有好的效果。

以上意见，请研究修改，如果同意，可向参加会议的同志转达。

注　释

〔1〕国防科委南京现场会议，是为贯彻“科学十四条”于一九六四年四月六日在南京十院十四所召开的一次现场会。

〔2〕十四所，即国防部第十研究院所辖第十四研究所。

〔3〕三八作风，见本书《军工生产中的几个问题》注〔4〕。

〔4〕“三敢三严”作风，见本书《关于贯彻“科学十四条”的讲话》。

〔5〕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第一二八六页。

关于地地导弹靶场试验和地对空导弹研制问题*

（一九六四年六月三十日）

（一）关于中近程地地导弹靶场试验问题

这次第一发试验时间，按计划要求，是推迟了几天，实际上不是延误，因为靶场试验就是要求要在标准条件下进行（如气象），这样便于检验测定出导弹的基本性能和准确数据，不然，数据不准了，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影响，就要费很多周折。未知数太多，检验太困难。在标准条件下试验，得出了准确的数据，今后在特殊条件下就能主动调整数据，有把握地使用了，这样做有利于以后的战斗使用。有的同志讲“不要带着问题上天”，很对。心中没底，未知数太多就不要忙于试验。现在靶场的各种试验设备都很缺乏，很困难，因此也要求我们认真地准备，发射一次，力争取得更多的数据。

（二）关于靶场试验鉴定问题

国防科委和基地都要严肃对待，这是严格的科学实践问题。要试验就一定要严格按照要求和条件去进行，不能马虎，基地要按规定办事，没有把握的可请示国防科委定。不这样，将来部队使用不灵，不能作战，谁能负责！

（三）红旗2号[1]的设计必须有个目的性，过去说过几次了，

---

* 这是聂荣臻在听取国防科委安东副主任汇报工作时的几点指示。

要能对付三万公尺以上的敌机，现在已经有了这种飞机。刘主席[2]最近看国防工业馆时，也指示要这样做。这就是目的明确，设计出来才有用处。配套雷达应同十院共同研究，也要跟上来。

（四）关于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研制情况及定型情况，除及时向党中央、军委、各元帅和总长反映外，同时向几个总部负责同志反映，要请他们了解，请他们指示，并争取他们支持和帮助。

注　释

〔1〕红旗2号，即我国自行研制的地对空导弹代号。

〔2〕刘主席，即刘少奇，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

关于导弹核武器试验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我这次来西北，主要是到导弹试验、核试验基地主持导弹核武器试验的。既然到了新疆，也很想到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来看看，向同志们学习，这是早有的愿望。到此正遇上你们开三级干部会议[1]，恩茂[2]同志要我和大家见见面，与同志们见面我是很高兴的。有的同志没有见过面，今天有机会见面。有的同志许久没见面，恩茂同志还要我讲讲话，本来没有准备讲话，也确实没有什么要讲的，特别是很多情况不了解，按说是没有发言权的，“下车伊始”哇喇哇喇发些议论是不合适的。我离开北京时，中央工作会议还没有开完，毛主席、周总理等极为重要的讲话，我都没有听到，你们都已听了传达，比我更清楚。

我想向同志们简要谈一谈这次导弹核武器试验问题。这次试验是在毛主席亲自关怀，周总理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这次试验的成功，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这个胜利给了世界革命人民以巨大鼓舞，给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沉重打击。试验中由于大抓了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以毛泽东思想统帅和指导试验，使整个试验场变成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大课堂，从而保证了万无一失，百分之百的成功，一切按预定计划，按设计要求如期实现。试验结果证明，我们的尖端科学技术已有相当的水平，

* 这是聂荣臻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发展速度也相当快，这使得帝国主义极为震惊，不得不承认中国两年内取得了美国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其他四个核大国[3]，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快。

在核试验基地我到处看了看，参加了他们的群众大会，听了基地党委的汇报，感到他们的工作做得不错，上上下下团结一致，情绪很高，他们已初步有了一套进行核试验的经验，也有一股建设戈壁滩的雄心壮志。这些都与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的直接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特别是基地初建时期，正是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为这个基地的建设，花了很多心血，给了多方面的保证和帮助。我在这里代表国防科委向同志们致以谢意。今后这个基地不仅要担负越来越繁重的试验任务，还要担负起建设戈壁滩、改造戈壁滩的光荣任务，把基地办成既是科学试验基地，又是工农业生产基地。基地有很好的条件实现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把基地真正办成为一个以试验为主，又兼军学、军工、军农、军民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今后在新疆除核试验基地外，还要陆续建一些新的科学试验项目，我相信，这些项目在自治区党委和军区的大力支持下，一定能够及早建设起来。

我们发展国防科学技术，从无到有，今年整十年了。毛主席历来就十分重视我们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尖端武器的发展，不断给我们提出新的任务，新的号召。一九五六年亲自批准了我们组建尖端武器的研究部门，并提出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要有自己的原子弹。一九五八年又提出要搞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并说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一九六四年当我们的导弹、原子弹即将搞出来时，又及时提出要搞反导弹导弹，指示我们组织一些人，吃了饭不干别的事，五年不行，十年，总可以搞出来。今年初又进一步向我们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他们。这里毛主席提出的已不是赶的问题了，而是要快，要超，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任务。毛

主席的每一个指示，都最集中的表达了伟大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成为我们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最大的动力，坚决地按照毛主席指示去做，认真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管他什么美国水平，苏联水平都不在中国人民的话下。现在我们不仅有了飞机运载的原子弹，也有了核导弹。我们的氢弹、洲际导弹、人造卫星的研究，也正在加速前进。我有充分的信心，在不长的时间内，看到我们自己的人造卫星在宇宙翱翔，听到我们自己的人造卫星从太空不断播送出来《东方红》[4]宏伟的歌曲。我们的前途很伟大，很光明，但工作也很艰巨。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就指出："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5]。毛主席这一极为重要的指示，在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上表现最为突出。当我们想到今天国防科学技术的光辉成就时，我们不能不更加拥护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不能不更加热爱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最后谈一点观感。这次顺便去和田、喀什看了看，除看了正在进行和准备建设的科研项目外，也到部队、工厂、公社看了看，总的感觉形势很好。内地来的支边青年很安心，民族关系也是融洽的。南疆军区担负着繁重的边防任务，看来领导抓的也较紧，部队政治空气较好，士气也高。这些都说明自治区党委、军区的工作成就。当然缺点和薄弱环节一定会有的，只是我走马观花地看了看，没有进行调查研究，今天就不可能提了。另一个突出感觉是，我从北京坐飞机过了包头，沿路都是沙漠戈壁，戈壁沙漠虽然很荒凉，但是对我们搞尖端武器试验，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没有这些地区，我们的导弹、原子弹还不好试验。这次我们能够在自己国土上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这在世界上是很少的，或者

说没有。几年来我们利用这些沙漠戈壁地区建设了相当规模的试验基地，不仅完成了试验任务，而且为建设和开发这些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新疆确实是个很好地方，百闻不如一见，我虽然只到了一小部分地方，但已深深感到新疆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新疆确实越变越新了。最后祝同志们在进一步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任务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向保卫和建设祖国西部边疆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注 释

〔1〕三级干部会议，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署、县三级干部参加的会议。

〔2〕恩茂，即王恩茂，当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3〕四个核大国，即美国、苏联、英国、法国。

〔4〕《东方红》，中国革命歌曲。曲调取自陕北民歌，一九四二年冬，陕西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作词。全曲以庄严雄伟的气魄和亲切动人的感情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爱戴。

〔5〕见《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把核动力潜艇研制工作搞上去*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不是做指示，和大家见见面，谈一谈自己的想法，表一表个人的愿望。

会议很重要，是在我们氢弹响了之后，我们的尖端技术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形势下召开的；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国防科研做了新的决定，要进行调整加强，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召开的。形势是大好的，任务是紧急的、艰巨的、光荣的。大家积极性都很高。希望同志们集中精力，安下心来，切实把这个会开好，把核潜艇工程进一步安排落实，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做出新的贡献！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主席就指示，要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1]。一九五八年六月又指示，在今后若干年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并告诉我们有希望，干十五年，就有很大希望。毛主席对我们的海军建设，对舰艇的科研试制，历来是十分关怀、十分重视的。海军装备的科研生产，耽误了很长时间，走了不少弯路。海军的同志体会最深。鱼雷是打击敌人大型舰艇的主要武器之一，海军缺得那样严重，可是一个鱼雷厂，竟可以拖拖拉拉搞十来年建不起来。我国是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一万二千公里的海岸线，我们祖国的台湾还没有解放，我们

---

* 这是聂荣臻在核潜艇工程第三次协调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随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来自海上的侵略。同志们搞潜艇，搞原子动力鱼雷潜艇，搞原子动力导弹潜艇，是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伟大的战略任务，我们希望同志们拿出最大的干劲，发挥最大的智慧，争取最快的速度，搞出高质量的产品。

当前，我们海军的装备还很落后，但是我们打了很多很好的仗，这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政治，这是根本的、永远的。但我们是搞海军装备科研和生产的，决不能满足于这点。我们的任务是为虎添翼，为我们英勇的海军指战员，增加优良的技术装备。我们的工作做得越快越好，我们海上作战的伤亡就会越小，胜利就会越大。一九五三年一月，毛主席曾经指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2]

现在美帝国主义在海上，最怕的是我们的潜艇，特别是我们的核动力潜艇。敌人越怕，我们越要加速搞。一定要使我们的海军，有一支强大的装备精良的潜艇部队。帝国主义国家的核垄断、核讹诈被我们打破了；帝国主义的空中优势一定会被我们粉碎，帝国主义的海上封锁、海上优势，也一定会被我们打破。

同志们的任务很重，希望同志们：

1.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任务越紧，困难越多，越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越要从毛主席著作中吸取力量，武装头脑，提高觉悟。要把核潜艇的研制、生产过程，当成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课堂。毛主席著作学得越好，任务就会完成得越快。

2. 要很好学习和掌握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要正确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希望同志们注意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光辉著作，很好领会重新发表这一光辉著作的重大现实意义。

3．要很好学习和掌握毛主席提出的“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3]的指示。核潜艇工程工作量很大，协作面很广，一环套一环，紧紧相扣，每个部分的工作都要从大局出发，只能提前，不要拖后，不要因为自己的部分，影响整个进程。困难是很多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克服解决，要鼓足干劲，奋发图强。

4．要很好掌握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原则。工作要做得快，也要做得细。象核潜艇这样复杂的尖端产品，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还有很多必然王国，工作中会有很多曲折和失败。这次氢弹试验，就有很好的教训，不可少的工艺，不可少的工序，一定不能少。要有革命性，也要很好注意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一定要注意保证质量，这看来是慢，实际上是快；忽视了质量，只图快，实际上是慢。

就谈这些，希望同志们把会开好，把工作安排落实，把核潜艇工程很快搞上去。

注　释

〔1〕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审查海军建设计划方案时提出的：“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2〕一九五三年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成立时毛泽东的训词。《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三六〇页。

〔3〕“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是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对罗瑞卿关于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建议成立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报告上的批示。

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八年八月四日）

我们这次全国民兵工作会议，开得很好。

会议充分发扬民主，讨论和修改了民兵工作条例、武装基干民兵发展规划、专职武装干部的配备原则和有关问题的规定等文件。这些文件经过审定颁布之后，全国的民兵工作也就有了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的章程。

这次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华主席[1]的指示，系统地总结了在民兵建设上同林彪[2]、“四人帮”[3]斗争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明确地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民兵建设的任务和要求，这对于进一步贯彻军委全会提出的方针、任务，发展壮大我国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当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满怀革命豪情，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进行新的长征。我们国家要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必将极大地推动各项工作的发展，也必将推动民兵建设的发展。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进一步提高全党全军对民兵战略地位的认识，恢复和发扬民兵工作的优良传统，这是当前加强民兵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就这个问题讲几点意见。

我国民兵，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创建的，是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哺育下，在同国内外强大敌人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毛主席在领导我国人民进

行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一贯重视人民群众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国革命战争从星星之火开始，逐步形成燎原之势，最后打败了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等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就是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武装群众，实行野战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体制，以及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理论宝库，是我们必须代代相传的革命传家宝。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播下了武装工农群众的革命火种。一九二五年，毛主席从上海回到韶山，领导开展农民运动，亲自摸索和总结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经验。一九二五年八月，毛主席来到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特别注重组织学员学习武装斗争，强调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对学员讲：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一九二六年，周总理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时指出：民众武装十分重要，建立农民自卫军为势所必需。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当时即将兴起的工农武装革命培训了领导骨干，把革命火种燃向祖国大地。一九二七年三月，毛主席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发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并以极大地革命热情赞扬农民运动中出现的梭镖队，严厉痛斥了陈独秀之流是被梭镖队吓坏了的胆小鬼。在毛主席武装工农的伟大思想鼓舞下，工农运动迅猛兴起，群众武装纷纷建立，涌现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梭镖队、工人纠察队，广泛开展了反对地主武装和反动军队的武装斗争，对北伐战争给予巨大的支援。第一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武装工农的旗帜却飘扬在革命人民的心中。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发生后，风云突变，烟雨莽苍，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我们党英勇地领导了南昌起义[5]、秋收起义[6]和广州起义[7]，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反

动派的叛变和屠杀，极大地鼓舞了战斗在血泊中的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一九二七年，毛主席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秋收起义后，毛主席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亲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树起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大旗，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的革命道路。毛主席在创建第一支工农红军和第一个农村根据地的同时，还广泛地建立赤卫队、少先队、工农暴动队等群众武装组织，开创了我国的民兵制度。在土地革命极其艰苦的年代，毛主席始终把武装群众作为发展人民武装斗争，建立、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围剿”的一项战略任务。明确规定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外，要尽量帮助人民群众武装起来，提出扩大红军的路线需“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8]。毛主席深刻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只要主力红军，不要群众武装，只要“正规战”，不要群众的游击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群众武装迅速发展壮大。他们积极参加打土豪、分田地，配合主力红军作战，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为保卫红色政权，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显示了巨大的威力。毛主席曾赞扬说：“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9]。

抗日战争，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的一场长期浩大的人民战争。八年抗战，艰苦卓绝，我们能够打败日寇，赢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由于党和毛主席动员和武装了全国的老百姓。抗战一开始，毛主席针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规定了我党独立自主的领导武装斗争的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八路军、新四军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先后向华北、华

中敌后挺进，纵横于晋、冀、鲁、豫、察、绥、热、辽以及苏、皖的广大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和壮大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一九三八年五月，毛主席发表了《论持久战》的光辉著作，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10]的伟大战略思想，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武装民众实行自卫，配合军队作战，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人民，激发起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抗战热忱。抗日根据地的广大民兵在日寇残酷的“三光”[11]政策面前，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反“蚕食”、反“封锁”、反“扫荡”，广泛开展了人民游击战争。他们一面生产，一面作战，巧妙地创造了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一整套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坚持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打得日寇侵略者闻风丧胆，草木皆兵。广大民兵，在侦察敌情，封锁据点，破坏交通，扰乱、袭击敌人，打击汉奸，以及在敌人进攻时带领群众进行坚壁清野，掩护群众，保卫地方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民兵战绩辉煌，震惊中外，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人民战争的壮丽诗篇。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下，发动了全面的反革命内战。在我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形势下，毛主席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的伟大号召，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解放战争。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毛主席一再强调指出：必须迅速扩大民兵组织，要求各地民兵，按照当时当地的条件，整顿组织，加强训练，提高战斗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各地的群众武装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民兵队伍猛增到五百五十万人，还有几千万的人民自卫队，军民一起汇成了埋葬蒋家王朝的强大洪流。广大民兵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尤其在空前规模的运动战中，一批一批的民兵师团，长期随军远征，解放军打到哪里，民兵就支援到哪里，前线需要什么，民兵就送上什么，他们推着小车，抬着担架，

挑着扁担，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奋勇支前。整营整团的民兵，源源不断地补充野战军，使我军越打越大，越战越强，得以高度机动地作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为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国民兵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作出的卓越贡献，已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但是，在未来的战争中，民兵还有没有用？它的地位和作用是降低了还是提高了？对于这个问题，还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我们的主要作战对象是帝国主义，这是我们最直接、最危险、最主要的敌人。它们不仅拥有大量的先进的常规武器，而且还拥有大量核武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将利用其装备优势，在空军、海军、空降兵配合下，使用大量坦克机械化部队，实行高速度大纵深的进攻，企图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我们要战胜这样高度现代化装备的敌人，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靠人民战争。

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核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论武器如何发展，都改变不了人民战争的规律，改变不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根本原理。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承认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任何新式武器。我们重视武器的作用，所以要搞国防现代化。不搞，就会落后挨打。我们搞现代化建设，是为了打好物质基础，以利于更大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就是我们的武器装备高度发展了，我们还是要坚持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打人民战争。毛主席曾精辟地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2]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地大人多，制度优越的有利条件，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积极参加和支援战争，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的人民战争。这样，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创造出制服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敌

人的办法，弥补我们武器装备的不足，变敌人的长处为短处，变我军的劣势为优势，经过持久作战，最后战胜敌人。人民战争是我们的根本优势，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过去靠它，现在靠它，将来还是靠它。

民兵是进行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坚实基础。越是现代化战争，越要强调三结合武装力量的整体威力，越要强调民兵的作用。无论配合作战，补充部队，支援前线，巩固后方，都离不开民兵。未来战争的整个进程和各个环节，都要有民兵参加。民兵担负的任务更加艰巨，要求更高。对于这一点，大家要有足够的认识。忽视民兵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将会贻误革命，犯极大的错误。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广泛运用于军事，未来战争将是突然的，战争的规模大，消耗多。战争一打起来，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把部队扩编起来，以粉碎敌人的战略突袭，阻止敌人的长驱直入，掩护我国由平时体制迅速转入战时体制。同时，要在持久的战争中，使部队得到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整个战争过程，部队所需要的兵员不是几百万，而是上千万。这样大量的兵员从哪里来，就是靠民兵。民兵是人民解放军的雄厚的兵力源泉，强大的后备力量。

未来反侵略战争，我们的战略方针仍然是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在战争的全过程中，游击战是必不可少的，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以地方部队为骨干，动员和组织千百万民兵和群众，运用游击战的传统战法，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到处袭扰敌人，疲惫敌人，牵制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摧毁敌人的军事设施，截断敌人的后方供给，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样，就可以分散敌人的兵力，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迟滞敌人的行动，削弱敌人的装备优势，从而为我主力部队在运动战中聚歼敌人创造有利条件。活跃在敌后的广大

民兵，就是我们的活导弹，必将在广阔的战场上，导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是未来战争中的重要课题，对战局的发展和变化有重大影响，但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靠部队，也要靠民兵。战争打起来，敌人将出动大量坦克进行突然袭击，同时，凭借其所谓“空中优势”，对我前方后方实施空袭和空降。我国民兵人多、地熟、分布广。敌人从哪里来，民兵就能在哪里打，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打。只要我们充分发挥民兵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人人出主意，个个想办法，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三打”运动，实行军民结合，土洋结合，是完全可以对付它的。

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是我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也是敌人妄图破坏和夺取的重点目标。保卫和坚守城市，对于稳定战局，保存战争潜力，支援长期战争，有着重要意义。在城市防卫作战中，防空袭，消除空袭后果，掩护群众转移，维护城市秩序，同敌人开展地道战、街垒战、巷战，都离不开民兵，都要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我们的国家大，城市多，离开了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援，单靠部队，要保卫和坚守城市是办不到的。

现代战争，我们更需要一个强大巩固的后方。在后方，民兵既要同敌人的空袭、空降作斗争，又要和广大群众一起，努力发展生产，满足军需民用，以足够的物资支援战争，同时，还要锄奸反特，维护交通，保卫生产，保卫政权。巩固后方，民兵的任务十分艰巨，作用非常重大。

总之，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民兵的战略地位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民兵的作用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更加依赖于人民群众，更加依赖于民兵。离开了民兵，军队就成了“独臂将军”，成了无源之水，也就失去了进行人民战争的基础。我们要夺取未来反侵略战争的

胜利，就一定要重视民兵建设。这是关系战争胜负、民族存亡的大问题。

建国以来，我国民兵建设虽然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但是在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民兵的组织、装备、教育训练都有了很大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目前，我国民兵已拥有两亿六千万，武器装备的数量相当于解放战争末期全军装备的四倍半。这样宏大的群众武装队伍，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这是毛主席开创的一个伟大事业。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民兵工作的光荣传统，着眼于未来战争的特点，把民兵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要在普遍贯彻民兵工作“三落实”[13]的基础上，重点抓好武装基干民兵[14]的建设，切实把这支队伍组织好，装备好，教育好，训练好，搞得扎扎实实。要抓紧制订和落实战时部队扩编计划和兵员动员计划。除一般兵员外，技术兵从哪里来，干部从哪里来，都要有安排，有措施，有着落。民兵训练要加强。训练工作应考虑到未来战争的需要，尤其要把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和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的“三打”、“三防”训练搞好。在城市，特别是重要战略、战役方向上的城市，要搞好地道战、街垒战、巷战的训练，进行必要的演习。要根据民兵的作战任务，研制和改善民兵武器装备，增强民兵的战斗力。各军区在制订作战计划、进行战场建设时，必须把民兵的作战纳入到统一计划之内。要注重民兵传统战法在未来战争的应用和发展。各种传统战法，都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有所发展，创造新的打法，使之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发挥更大的威力。

回顾我国民兵发展壮大的历史，分析民兵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目的是要我们大家认识民兵工作的重要，看到它确实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大事。加强民兵建设，是坚持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坚持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大问题。前几年，“四人帮”在民兵问题上大做文章，全盘否定毛主席关于民兵建设的理论、路

线、方针和政策。他们疯狂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抹杀民兵的历史作用，分裂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改变民兵的性质任务，极力破坏战备，大搞“第二武装”，为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四人帮”对民兵建设干扰破坏很大，对此，我们决不可低估。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进一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把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迅速统一到毛主席、华主席的指示上来，恢复和发扬民兵工作的优良传统，按照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加强民兵建设。

加强民兵建设，是全党全军的共同任务。全党要抓军事，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下，更好地贯彻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对民兵的双重领导制度。各级地方党委，要重视民兵工作，把它摆在重要位置，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既管文又管武，既管钱又管枪。要清醒地看到，我们是在一个很不安宁的国际环境中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强大的祖国，我们的敌人是不会甘心的，一定要进行破坏和捣乱，必须看到虎狼在前，重任在肩，要居安思危。我们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全局出发，把民兵建设同当前的革命和生产任务结合起来，既要动员组织广大民兵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充分发挥民兵在生产战线上的主力军作用，又要扎扎实实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使民兵真正成为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强大力量。

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三总部[15]和各大军区负有重大责任。总部和大军区是三结合武装力量的领率机关，对军事工作要有通盘考虑，一手抓部队，一手抓民兵，要统一安排部队工作和民兵工作。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人民武装部是军事系统的一级领导机关，除了保持军事系统的领导外，又是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主要任务就是搞民兵工作，更要切实把民兵工作管好。省军区、军分区还要把地方部队作为开展民兵工作的一支骨干力

量。全军各部队也要积极开展民兵工作。中央军委把加强民兵建设作为治军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从加强三结合武装力量的整体上来考虑的。我们各级干部都要懂得这个道理，努力做好这项工作。

为了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我国人民开始进行的新长征，我们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力建设民兵。这是我国安全的最可靠的保障，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必将淹没在我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全民皆兵，威力无穷！

注　释

〔1〕华主席，即华国锋（一九二一——　）山西交城人。一九七六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十月，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九八〇年九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接受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鉴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2〕林彪（一九〇六——一九七一），军事家。湖北省黄冈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一九五九年九月后，任国防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坠机身亡。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3〕“四人帮”，指以江青为首的，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的反革命集团。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后党和人民的严重困难，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十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粉碎了这一反革命集团。

〔4〕"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此后，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的军阀相继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形成了一个反革命高潮，导致国共两党合作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5〕南昌起义，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击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在江西南昌发动的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这次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合。

〔6〕秋收起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共中央为了挽救革命，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武装起义。随后，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纷纷起义。九月，毛泽东在湖南东部、江西西部一带领导农民、工人和部分北伐军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一支工农革命军，以后转战到了湘赣边的井冈山地区，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7〕广州起义，是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驻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联合广州工人、市郊农民，经过激战，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二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战舰炮火的掩护下，向广州反扑。起义部队十三日被迫撤出广州。张太雷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撤出的起义部队，分别与东江、湘南一带的革命武装结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8〕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第九十八页。

〔9〕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第四九二页。

〔10〕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第五〇九页。

〔11〕“三光”政策，指日本侵略军实施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

〔12〕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版，第五一一页。

〔13〕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这是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九日提出的。见《辞源》第四一三七页。

〔14〕基干民兵，根据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实行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民兵分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基干民兵为第一类预备役，普通民兵为第二类预备役。二十八岁以下的退伍士兵和未到部队服役而经过基本军事训练的公民，编入基干民兵，成为民兵中随时准备参军参战、执行应急任务的骨干力量。

〔15〕三总部，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

与刘华清谈武器装备发展的几个问题*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当刘华清同志谈到拟购买外国反坦克导弹时，荣臻同志说：我们不要只买武器，一定要注意买专利。引进的目的主要还是通过仿制研究，从而为今后自力更生地设计制造我们自己的东西创造条件。同时，我们的外汇有限，要把钱用在刀刃上，不能什么都想买。去年报的引进计划中就有这个问题，我批了几句。要看到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和技术人员的积极热忱。

当谈到核潜艇的生产问题时，荣臻同志说：核潜艇搞了很久，首艇已搞出几年。据说设计和质量经过这些年的检验还是好的。当然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那是不成问题的，哪有一次就完全成功的。再一个问题据说主要是生产质量的问题，不是设计的问题。同核潜艇配套的鱼雷是与核潜艇同时研制的，现已研制出来了，据说是由于工厂建设问题还未投产。要六机部和研究院再好好抓一下。××电池太贵的问题怎么解决好，是否先少量生产点用着，再研究用别的电池换。装备核潜艇的武器（鱼雷和导弹）是在布置研制核潜艇时，一起布置研制的，因潜艇研制进度快，鱼雷研制、特别是导弹研制进度大大拖后，所以形成不配套的状况。要抓紧解决好鱼雷和导弹的研制。但不能因此就把艇的建造完全停下来，进度可放慢点，生产线还应保持。记得一九七三年叶、李副主席[1]

---

* 这是聂荣臻与当时的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刘华清谈话的纪要。

参观这艘艇后定了还要生产。因我未具体管，后来情况不清楚了。我们是近海防御，但对敌人的核潜艇（有鱼雷核潜艇，也有导弹加鱼雷的核潜艇）总要有个对付手段，不然只有招架之功，甚至还招架不了。各国目前在太平洋有几十条核潜艇，还有百条左右的常规潜艇，我们要加强对付的手段，核潜艇不搞恐怕不行。你们要与海军好好谈谈，找叶飞[2]同志研究，最后给军委写个报告。

当谈到常规武器生产的问题时，荣臻同志说：过去援外太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部队和民兵的武器装备。可是越南这次是拿着我们援助的武器又来打我们。这个问题已引起我们深思。今后援外要首先从能否保证我们自己装备需要出发来考虑。我们应力争尽快按编制齐装配套，并有必要的储备。我们现在的装备问题，有些还不是什么现代化的问题，还是个有无的问题。象海军装备就可怜得很，其他军兵种的常规装备也都有个补缺配套解决有无的问题。十多年来武器装备的研究被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各研究单位所受损失很大。直到现在有的单位还不重视抓科研工作，有的领导同志只满足于抓产值，完成上交利润的任务，全不顾能否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如何巩固国防的问题。已有不少同志给军委写信反映意见。最近五机部科研局于学驷同志的来信意见就很好。其中还谈到瞎指挥的问题。一位副部长怎么能把坦克发展的方向和其火炮口径不得超过多少毫米，这样重要的武器装备体制问题由个人决定了呢？这是军委讨论决定的事，下边怎么能随心所欲呢？这已不止是瞎指挥的问题了！现在王震[3]副总理也在国防工业内部抓。你们要组织装备部把军队的装备问题理一下，包括总结这次自卫反击战中在装备上有些什么问题，如何解决。针对敌我情况搞出发展规划和计划，何时达到齐装配套，何时更新提高。总之，先解决有无，随着提高更新。齐装配套不能只看数量，要保证质量。有了规划计划也便于有步骤地引进国外先进装备和技术。

此外，根据加强战备的需要，建议把军工厂中的“独生子”问题尽快解决好，这个问题我已呼吁很久了。现在看更加刻不容缓。例如我们生产大口径炮的炮厂本来少，那时又选址不当，一旦有事对我们将是一个严重威胁。我原想，象大口径炮的生产就可在某重型机械厂里搞军民结合，稍加一些设备，就能解决一定问题。这样以后再逐步调整部署。其他“独生子”的问题都可因情制宜，逐步解决，当然越快越好。

以上这些是我个人想法，供你们参考。

注　释

〔1〕叶、李副主席，指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

〔2〕叶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3〕王震，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

关于研制武器装备的意见*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

武器装备依靠进口技术搞现代化是妄想，我们不能靠进口买个现代化，还是要立足自己动手，以自力更生为主，当然不排除引进个别关键技术。至于整套引进，那是作梦。我们没有那么多外汇，外国人也不会把技术全部卖给我们。现有的武器装备，首先是争取尽快搞好齐装配套，一旦有事能打仗，即使性能落后一点，总比小米加步枪好。在此基础上，科研力量的分配就是用一部分力量搞改进。如苏式武器笨重，我们要改轻一点，把我们的科研力量组织好，总会想出些办法来。再用一部分力量研制新的。把这几方面工作安排好，这样来搞我们的国防现代化。战略导弹走的就是这条路，先搞近程战略导弹，那是很陈旧的了，先仿制，然后再改进，走我们自己的路。

武器装备科研工作中，使用、科研、生产部门总是有矛盾的，但不能长期争论下去，不能让这些矛盾阻碍我们的发展。

当洪主任[1]汇报到改进自动步枪时，聂荣臻说：我过去就主张自动、半自动结合起来，对越南自卫反击战后，部队普遍要求用自动步枪。过去说子弹供不起，那是个教育问题。对于自动步枪生产线，我是主张保留的，现在恢复了没有？去年有个来访的日

---

* 这是聂荣臻在听取当时的国防工业办公室洪学智主任汇报研制武器装备问题时的插话。

本人说，过去他们很重视刺杀训练，现在从武器装备现代化来看，实际上根本用不上刺刀了。

步枪不能随便改，特别是口径，不能太复杂，口径越简单越好。

当汇报到地对空导弹时，聂荣臻说：地空导弹要改进，一个是高度，一个是准确性。海、空军的导弹也要改进。七机部[2]的固体燃料已解决，国防工办可以接过来用。要地防空的导弹应该减少车辆，能进工事。要重视改进工作，要安排科研力量，一步一步向前进，总看到国外的好，自己的东西不用，那是崇洋媚外。

当汇报到运 11 飞机[3]，泰国、菲律宾想买，国内无人订货时，聂荣臻说：速度慢一点不要紧，农业、林业均可用，重要的是安全可靠。要定个方针，凡是国内有的，不能向外国买。

直升飞机要抓紧发展。研制多用途直升飞机花了那么多钱，不要轻易下马。已经确定的项目要搞到底，不要碰到困难就放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外国导弹、飞机不买了，很好。

当汇报到海军舰艇时，聂荣臻说：海军装备长期没有得到重视，海军装备落后，你们要抓紧。

当汇报到两种型号导弹驱逐舰改进时，聂荣臻说：先要把钱落实下来再谈。没有钱，签不了合同，信誉不好。

当汇报到某型常规潜艇研制情况时，聂荣臻说：要协作，不能各搞各的。

聂荣臻问鱼雷为什么还没有解决？××厂为什么还搞不出来？

聂荣臻说：近海防御，快艇还是有用的。埃及就有这个经验，导弹快艇很起作用。

当汇报到三线建设时，聂荣臻说：生活供应问题也要解决好。

注　　释

〔1〕洪主任，即洪学智，当时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

〔2〕七机部，即原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九六五年改为国务院第七机械工业部。

〔3〕运 11 飞机，我国研制的小型多用途运输机。

祝贺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成功*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八日）

热烈祝贺参与发射运载火箭的全体同志取得圆满成功。这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大力协同的伟大胜利。

---

* 这是聂荣臻为我国远程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的题词。

发扬创业精神，为国防现代化贡献力量*

（一九八三年十月）

值此基地创建廿五周年之际，特函祝贺！

廿五年来，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尖兵！远在五十年代，许多同志就毅然来到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栉风沐沙，破土兴工，建设起我军第一个现代化的战略武器发射试验基地。现在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了。凡是去基地参观过的同志，无不称赞基地的建设，称赞同志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我在回忆录里，也写了你们的光辉业绩。我国战略武器的发展、航天事业的发展都和你们各基地的杰出努力分不开的，全国人民感谢你们！在这个欢庆日子里，我们不能忘记为建设基地流过血汗的同志，特别是献出宝贵生命的同志们，我们要永远崇敬怀念他们。他们的英雄事迹是教育青年一代的很好教材。

为适应发展的需要，今后基地的建设更要加强。要进一步做好人才的培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激发他们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工作热情，并为他们工作、学习提供更好的条件。要进一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贯彻执行四项基本原则[1]、两个文明[2]建设的基础上，继续发扬以基地为家，以艰苦为荣的优良传统。基地还要进一步加强生活方面的建设，争取地方政府的更多帮助，千

---

* 这是聂荣臻给某导弹试验基地建场二十五周年的贺信。

方百计想办法，并发动群众创造改善生活条件，务使全体同志安居乐业，一心振兴，为建设现代化的强大国防贡献力量！

祝全体指战员健康进步！

注 释

〔1〕“四项基本原则”，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简称为“四项基本原则”。

〔2〕两个文明，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再接再励，为发展计算机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慈云桂[1]同志来信告诉我，我国第一台亿次级巨型计算机已研制成功了。这确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快事！我由衷地感到高兴，特向同志们表示热烈地祝贺！

亿次机的解决，不仅为我国第二代战略武器的研制提供了有力的手段，并对其他军事部门和国民经济各部门，以及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目前，在国际上能研制出亿次计算机的没有几个国家。听说你们在研制中，也遇到许多理论上、技术上和工艺上的难关，但经过六年的拚搏奋斗，在有关单位的协同下，终于成功了！使我们巨型计算机的研制水平与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大缩短了，标志着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很值得庆贺的事！

回顾五、六十年代，我们白手起家干科学技术，凭着革命热情，凭着科学态度，硬是自己动手向这些尖端技术进军。当时，我们的口号就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我们的办法就是集中力量、大力协同。这就形成一股强大的动力，使我们无坚不摧，无攻不克。昨天我还看到一位日本朋友在评论中国四化前景时说：就中国人搞原子弹、氢弹的成功来看，只要他们战略需要，他们就会全力

---

* 这是聂荣臻祝贺国防科技大学银河亿次计算机研制成功的贺信。

投入某个部门，那就什么都能搞出来。所以他坚信我们四化建设会成功。现在，你们亿次机的研制成功，正是这种精神的再现。再次证明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也再次给那种无所作为，只想吃“现成饭”的懦夫懒汉以当头一棒，再次给那些只知争名夺利，没有国家观念，不愿大力协同的分散主义、本位主义者以当头一棒。要他猛省，为振兴中华，必须发奋图强；为祖国四化，必须同心同德，集中力量，拧成一股绳，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把我们的重点项目一一搞上去！

我国第一台亿次级巨型计算机的验收顺利通过，在庆贺之馀，希望你们进一步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再接再励，尽快迎头赶上世界最先进水平，为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注　释

〔1〕慈云桂，中国电子计算机专家，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教授，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从事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四十多年，专长雷达、电子计算机，对我国电子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和培养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坚持艰苦奋斗，努力发展核武器事业*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日）

光阴荏苒，基地研究所已成立二十周年，特向你们遥致最热烈地祝贺！

二十年前，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前夕，为了行将进行核爆炸的研究和核武器性能参数的测试，你们研究所便应运而生。所以，基地研究所的诞生，正是标志着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的阶段，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二十年来，你们参加了三十次核试验，为产品的改进和作战防护提供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和情报，成绩显著，获得各有关单位的赞扬。二十年来，你们还培养了大批人才。一些老专家逐渐离休或退居二线，大批中青年科研人员已接班受任，基地的研究工作正在欣欣向荣，蓬勃发展。据说这些年获奖的科技成果达四百余项，其中有些项目还居国内领先地位。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是与你们辛勤努力分不开的。

二十年来，同志们在边远地区，在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较艰苦的情况下，能够做出卓越的成绩，我想这主要是靠你们对我国国防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你们高尚的情操给千百万青年树立了榜样，教育他们如何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以革命事业为重，以

* 这是聂荣臻给核试验基地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的贺信。

艰苦奋斗为荣，把青春献给人民的壮丽事业，将个人利益得失置之度外，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我国国防建设、基地建设，乃至一切振兴中华事业的发展，都需要有这种高尚的精神！在纪念研究所成立的喜庆日子里，让大家回顾一下建所的艰辛历程，从中得出几点道理，以奋同志，以促后进，以育来者，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这也是我的祝贺之愿！

航天事业要继续攀登世界新技术的高峰*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八日）

这一段时间，你们都辛苦了！

四月八日发射的试验通信卫星，只经过八天的紧张测控，就进入了同步轨道。又经两天通信试验证明，此次试验很成功。这确是值得大庆大贺的事！这样的试验水平，在国际同步通信卫星发展史上是少有的，真令人高兴。特向所有参试的同志们致以衷心的祝贺和谢意！

在试验前夕——四月七日那天，您[1]来看我时，我已预祝试验成功。这不是恭维的客气话，因我素知这支科技队伍是一支坚强的攻关队伍。从指挥员到战斗员都身经百战，百炼千锤，基础扎实，善打硬仗。在同步通信卫星的关键技术上，已攻关了数年，又经过上次的试验摸索，故这次成功的希望非常大！当然，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你们异常辛苦、紧张的情景，我是想象得到的。

这次试验成功的意义很大，对我国四化建设将起重要的促进作用，使我国航天技术、信息技术等都有新的重大的突破，为我们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增添了力量和信心！这是我国广大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尤其是航天战线上的同志们的骄傲！新的成就

---

* 这是聂荣臻在我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发射、定点成功后写给张爱萍的信。

虽然很大，但全面衡量，我们与世界先进技术比，差距还相当大。我们更要艰苦奋斗，继续发扬自力更生和勇于拚搏的精神，同心协力，集智攻关，一步一步奔向世界新技术的高峰！耑此，再致贺忱！

注　　释

〔1〕您，指张爱萍。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聂荣臻军事文选
作者＝
页数＝５６３
ＳＳ号＝
ＤＸ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